

1924

一九二四年以前
台灣社會主義運動
的萌芽

LA EKANTA SOCIALISMA MOVADO DE TAJVANO ĜIS 1924

邱士杰—著

本書已申請數位物件識別號 DOI:10.978.9866480/195

一九二四年以前

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

邱士杰 著

La
Ekanta
Socialisma
Movado de
Tajvano
gis 1924

海峽學術出版社

內容簡介

在風雷激盪的一九二〇年代，社會主義運動伴隨著一代運動者的誕生而萌芽於東亞海域中的台灣。他們是背叛皇國家庭的「灣生」日本少女、是掙扎於左右之間的島內社會運動家、是輾轉於東京與北京的安那其主義者、是從彰化前往莫斯科的黨人、是與「異端」共產黨接觸的馬克思主義青年、是前往東京參與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未來指導者，同時也是秘密集結於上海的台灣、日本、朝鮮與大陸各省過激派。他們活動、集結、潰散，並且再起，同時也發展出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最早的論述。這是一幅集中在一九二四年之前揮灑開來的畫卷，同時也是本研究所將追尋、鉤沉，與細數的史像。

序一

林書揚

邱士杰君的勞作碩士論文另以《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為題而改寫成冊了。邀我一篇序，因時間上有所緊湊，請邱君容以數段感想以代。

按帝國主義控制下的殖民地，之所以每有反植民主義運動，幾乎可說是物理上作用反作用的社會動態化，是不論兩造間的文明文化距離之大小的。但這類主要以民族群員為單位對象的壓迫方式（植民方式）在資本帝國主義時段，因植民本國社會性質之直接規定，（亦即金融寡佔的境外壓榨體制之設計或制御方式）是大同小異外，倒是因為被支配社會的本然性質，對新支配系統的反影響還是多樣態的。這一點只要看看東南亞一帶（如印尼、菲律賓、印度、緬甸、安南等），西歐海權年代時期所營造的植民地群，和近中世以降封建大王朝在本洲歐陸上網羅的大小屬地，多屬血緣分支的支配實況的差異是甚為突顯的。當然，東、中歐（還包括部分南歐）的民族問題，最重要的是宗主國與屬地之間，宗教文化、血緣等民族要素的相近性與東南亞屬地和西歐支配者之間的異性之大是不言而喻的。若論殘忍性，更不可同日而語。至於十九世紀末葉，東海新起的日本帝國之領據台灣，情況之特殊性之一，在於被領治地雖屬大陸東陲一海島，但非屬南太平洋系島嶼群之一。在地緣政治上是大漢（大清）政治文化圈的一部分。雖屬後期主要移民團的屬性。但其時空條件背景下的島民精神面貌，若以文化範疇表中的位置關係說來，又非盡如歐亞洲其他植民塊可列舉的小被大領——（雖然台灣一島小於日本列島），落後被治於先進——（雖日本植民本國已大致現

代化,而台灣則尚未),台灣漢人移民社會仍在其大漢中華傳統意識(先驗認同)下,悍然以土製烏槍對抗日軍村田銃(日本新式軍工廠出品之新步槍)且以「日本蕃仔」蔑稱之。稱「日本蕃仔直目!」直說日本人種屬夷種,雙目僅能直視前方,攻時迂迴傍擊即可。以四十比一之慘重死傷代價與「日本蕃仔」斷斷續續周璇二十年。直至跨世紀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年)歐洲大戰爆發後的噍吧哖事件才全面落幕。接著隨著日本殖民本國之政治歐風化,在國內有政黨議會政治上軌,歐戰幾不費力則靠日英同盟而躍上戰勝大國之一,所謂「大正民主」開幕的新趨向出現。

其實,在所謂的「台灣抗日武鬥期」的廿年中(一八九五~一九一五),台日雙邊有關內外情勢的變化不少。二〇世紀初葉的文鬥新局勢出現的因素,除了上提歐戰結束後日本當局的殖民文治化的新策略是因也是果外,這段因果律的掌握恐怕少不得歐亞兩洲一些新因素的考察。而為了簡單化而尋出一個代表性特別重大的里程碑,則恐怕落在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紅黨勞農革命的成功及兩年後一九一九年第三國際的成立。及一次大戰後重建秩序為號召的國際聯盟的出現。以及新歷史條件下的戰後政治經濟思潮之舉世澎湃激盪。

先行日本自明治維新(一八六八),後繼中國有武漢革命(一九一二),落在西歐主要大國產業革命及政治革命期之後。日本以後進資帝的姿態急起直追歐洲新局,而中國則有民間孫文救國運動,宮廷試探性的維新動向,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五四運動。日本更以脫亞入歐的心理渴望直入資本主義體制圈為其帝國主義新列強之一。中國則在熾烈的帝國列強競相浸蝕之危局下,孫文等一派趨向急進武鬥終於武漢一幕革命劇推倒了數千年封建,成立了亞洲首起的共和國。而回顧台灣,其艱辛的武力抗日二十年正好處在如上的歐、日等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群的激烈競爭期,終於激出一個歐陸大戰,且戰爭更使社會體制中由封建到資本主義立憲共和制的移行大量風行,直到更見深刻的社會階級體制的內部矛盾的一次大爆發。終見俄羅斯革命的成功。這些歷史大戲都推出了嶄新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思想的大浪潮襲擊了舊思潮體制,使得二十世紀初葉的世界性氛圍急劇地罩住了中日兩國關係甚至包括台灣的抗殖民地新頁。直入地說,邱君注意到的一九二〇年~二四年的台灣,其對殖民本國的抵抗性已經超越了起事階段十九世紀末的傳統中華漢族優越論,再超

越了西歐牌民主共和市民革命論，而直追當時已成新史觀中所謂「最屬根源的歷史行為」的生產階級系列論的社會運動範疇了。而以生產系列中的階級鬥爭論時期的運動意識，來著眼台灣近代化社會思潮發端之首項條目，邱君的定題意義正在於此，筆者甚感妥適。由此而論，所謂當年台灣的「資本主義論」實乃不過「階級乎、民族乎」論爭之附論而已。

蓋一種社會衝突的內部因素容有多端，但在多範圍的社會關係中最屬根源性者，亦即說得上歷史延續的唯一基本條件者——生存資料之集體生產外無他。其關係的定型定向以保證連續性乃所謂之生產關係之存在與維繫乃成為所有其他社會人際關係的本源基礎。其存、社會存，其亡、社會崩解，則其維繫任務乃成社會群體最高權柄之所在，史上唯委之國家最高權力體。至於群體史上出現的民族，乃如前述基於數種自然、文化因素的，群體史上的派生型態之一。雖然以其生於斯，長於斯的先驗認同的個、群體認同而成為歷史進程中一定時期的一要素，因而也會展現出時流中一段民族鬥爭期、民族進化期等，但依一般社會形成論言，階級系列之成型在先，而民族必須以經濟紐帶為形成因而出現（史上存在過的原始共產體，迄今仍未被呼為民族。）

有關民族與階級問題在學理上或尚不無紛爭，但以史實論二十世紀以降歷史唯物論者常以「社會主義內容，民族主義形式」為理論處理或運動實踐上的原則。是有其道理的。以邱君著作而言，在論台灣左翼運動史的論述中以「民族主義乎，階級鬥爭乎的論爭」為首章是十分自然的。

總之，一個時代的政治鬥爭，因「政治」本身的複雜性與苛烈性，從社會客觀到成員主觀反映的迂迴性多樣性，往往表現在運動先行期的記錄中，是十分無奈的。特別在主觀條件上往往遭到難以一時克服的早熟性或不成熟性、邊緣性等，使得那段先行期中的少數里程碑一直是有幾分蒼涼甚至悲戚感的。但無論如何，有先行者的，那怕是孤單身影幌動著的社會，還是有方向的，亦即有未來的社會。在這意義上邱君勞作的意義之重大還是不會被埋沒的。

至於進入階級鬥爭期後的無政府主義 VS 共產主義，當時或以日外語安那其主義與布爾塞維克主義呼之，其出現更屬難予避免。

蓋自十九世紀中，馬克思與普魯東之間《哲學的貧困》與《貧困的哲學》

的論爭起，由哲學論爭到組織路線運動路線之間的激烈論爭，乃眾所周知者。無政府主義者總被一般群眾認為多一分哲學的浪漫，也多一點組織和運動的衝動。也許是前前十九世紀中葉起，無政府主義在殖民地、屬地間的發展讓人覺得時而大於急於一般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馬克思共產主義的聲勢。說不定屬地、殖民地的重層權力結構使得被壓迫群眾的權力嫌惡感更易凝結。更何況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需要一定堅實度的勞工階級為社會心理層的基礎。我們可如此設想，一個屬地、殖民地在具有一定成熟度的產業工人階級存在之前，它的知識人、農村小地主、小工商人等可能是未來資本主義階級結構作用下被編入「小資產階級」的，對現狀已具有一定反叛心態者，較有可能投入的，多半是無政府主義，以自由結合為主旨的安那其主義團體。要不是歷史發展的曲折性，出了列寧一班運動者，在馬克思共產主義的科學性上面鍛造出帝國主義論和勞農蘇維埃制的戰鬥性，第一國際時期以來巴枯寧主義的流域大概還會擴張一點。而在大情勢中釘立了方向指示牌的兩大歷史事件，是一九一七年的俄羅斯革命和一九一九年的第三國際的成立。及稍前中國武漢革命的成功，日本勞動運動初發與反閥族政治的護憲運動普選運動，漸入左翼思潮激盪年代，特別高等警察制度的成立等，這些都是直接間接影響武裝抗日頓挫後的，二〇年代台灣社運時代的承啟契機。也是邱君研究的起點。

當年台灣海外留學生有兩大走向圖。一為留日，另一為留中國。前者屬法理上的殖民本國，後者是被割離不久的精神母國。心知故鄉的殖民地抗暴運動，在父兄等缺少日式現代教育的年齡層者的推動下，已遇上難以跨越的瓶頸的台灣留學生們本身，除了民族主義派與階級鬥爭派的第一層分歧外，也少不得安那其與布爾塞維克的立場之分。但在實際運動上，大致尚能維持那一時代環境下的聯合抗日，雖說不算有多堅固，說得上也是先行期中的必然現象。如初期的一些思想團體——如連溫卿領導下的黑色青年同盟甚至中期後周合源等人為主的孤魂聯盟，其初期成員中往往包含有一些紅色青年。其實，兩者間在哲學上的爭論雖然極其尖銳，甚至「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極反現象」「極端的權力主義者」等的相互定位論都出現。記得恩格斯帶一點規勸的話：「讓國家像一朵花過它的盛開期而自然掉落吧。」

邱君著述中有一段連溫卿於一九二四年訪日本東京參觀五一勞動節的示

威行列文字。連溫卿受到極大的感動和衝擊，對勞動者行列通過上野公園山麓時的情景，用簡單動人的筆調描繪過。文字是用當年盛行的台灣白話文。他描述隊伍的最前頭是黑色旗子的隊伍，接著是紅色旗隊。他的評語只是淡淡地：「黑色旗是主張自由聯合的，紅色旗是主張統一合併的。」說得上是語短意長，也反映了當年連氏所處運動環境的一定氛圍。另外，他還簡潔地但感動地提到歌聲、口號聲、萬歲聲，就是不曾介紹到當日 MayDay 歌的歌詞。讓人有一點失落感。當然，有一種可能性，可能剛好連氏站著的那一段沒有唱歌，第二種可能是當天沒有唱歌（但明明說「雄大的歌聲」），為甚麼連氏於一九二四年東京 MayDay 的參觀日記中獨漏歌詞的介紹？

顯然，當天的示威行列是黑紅兩派工會的連合活動。隊伍的行進序列是安那其在前，布爾塞維克在後。而歌是唱紅色的？而連氏是否以一絲苦笑處理了他在日記中的目擊文？

筆者稍帶莞爾笑意翻了一些文獻。據記載，日本的五一示威第一次是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連氏遇到的，如果二三年沒有中斷，應是第三次。歌已經有了。是東京勞動組合會議認定的。全部五首。曲調套以「步兵歌」調。我親自聽到已故周合源老先生唱過。之所以沒有忌諱軍歌調，大概是因為當時日本左派沒有像中國聶耳氏那樣的人材，再說日本全國皆兵，兵源多來自農村青年、城市勞動者，工會會員應人皆熟知歌調，不必另行練唱，隨時開口唱新詞毫無困難。「反正每次的示威，都有反軍、反戰的口號嘛。」周老笑著說。

我翻看昭和九年版森戶辰男監修的社會科學辭典。東京勞動組合會議的 MayDay 歌全五首都有了。我不知道這就是連溫卿於一九二四年聽到（或沒有聽到）的歌，反正這就是當年身穿滿身油漬的工作衣勞動者們拉開嗓門唱出的「文句」，是他們的思想動員的努力的成果之一，試著中譯下來。也許，對邱君勞作的小小一點補白！

一、聽到嗎，
萬國的勞動者。
搖撼天地的，
MayDay 聲！

示威者齊一的，
步伐聲浪。
預告未來的，
吶喊聲浪！

二、放棄你負的
工作部署。
覺醒自己的
生命價值！
二十四小時的
全休日，
為直衝社會的虛偽與壓迫！

三、長期受盡
剝削苦難，
無產的人民
蹶起蹶起！
今日二十四小時
階級戰已經來臨了！

四、起來吧勞動者，
發奮起來吧！
把被搶走的
生產大業，
以正義的手臂
奮還吧！
彼等苦守
能算甚麼！

五、我們步武的
最前衛
迎風高舉著
自由旗！
保衛它 MayDay 勞動者！
保衛它 MayDay 勞動者！

二〇〇九年三月

序二：馬及馬及的靈藥

唐 曙

1974 年 6 月，加州州立大學的歷史學副教授羅伯特·布雷奇（Robert Blackey）在《現代非洲研究期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法農與卡布拉：一個非洲革命理論的比較》（Fanon and Cabral: a Contrast in Theories of Revolution for Africa）¹的文章。文章從非洲革命的性質、社會階級結構、黨的組織與領導權、革命的暴力以及文化在革命中的作用等角度，比較了兩人的革命理論。

1974 年對非洲而言是個重要的年份之一，因為這一年的 4 月，葡萄牙國內發生了被稱為「康乃馨革命」的軍事政變，由基層青年軍官所組成的「軍隊運動」（MFA）推翻了執政逾五十年的「新國家」法西斯獨裁政權。這場政變也使得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幾內亞比紹、安哥拉、莫三比克、聖多美與普林斯比以及維德角同時獨立。1961 年至 1974 年間葡萄牙發動非洲殖民戰爭，企圖消滅各殖民地的反抗軍，這些反抗軍包括了卡布拉（Amilcar Cabral）所領導的「幾內亞與維德角獨立非洲黨」（PAIGC）、內托（Agostinho Neto）所領導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工黨」（MPLA）、孟德連（Eduardo Mondlane）所領導的「莫三比克解放陣線」（FRELIMO）以及卡斯塔（Manuel Pinto da Costa）所領導的「聖多美與普林斯比解放運動——社會民主黨」，這些反抗軍大多從 1950 年代就開始組建，除了卡布拉的 PAIGC 之外，其他都是旗幟鮮明的社會主義組織。這些反抗軍頑強地與葡萄牙殖民勢力持久戰鬥，拖垮了殖民當局的經濟與政治，也瓦

¹ Robert Blackey, "Fanon and Cabral: A Contrast in Theories of Revolution for Afric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2, no. 2 (1974): 191-209.

解了殖民軍隊的士氣，「軍隊運動」(MFA)的政變行動正是這場歷久反抗的直接結果。

按照當時的時空氣氛來說，全面開始探討和總結葡萄牙殖民歷史和反殖民運動是絕對必要而且及時的，但布雷奇的文章卻耐人尋味地只做了卡布拉和法農的比較。在這篇有關兩人非洲革命理論的文章中，他較多地談到了兩個人之間的差異。

在非洲革命的性質方面，他指出了兩個人不同的革命氣質：法農強調獨立革命是被殖民者和殖民地社會重生的過程，而卡布拉則強調獨立革命的具體目標、獨立後如何捍衛革命成果；²他提到了卡布拉對格瓦拉「游擊中心」的反對以及兩人雖都傾向社會主義，但都自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³

在殖民地社會的階級結構方面，布雷奇比較了兩人對於農民的革命信心問題，法農對農民充滿信心，但卡布拉則對這個階級的革命性有所保留；法農認為殖民地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一樣是既得利益者，但卡布拉則認為殖民地工人不如歐洲工人，是「小無產階級」；法農完全否定流氓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卡布拉則將流氓無產階級做了區分，認為新從農村流浪進都市流氓無產階級具有潛在的革命性；法農認為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對革命而言是無用的，但把它稱為「小資產階級」的卡布拉則認為它由於受過歐式教育、為殖民政府服務但卻又處於社會的夾縫中，所以會感到痛苦與挫折，這將會引導它重新思考並透過群眾的革命運動來確認自己的社會定位。⁴

在黨的組織與領導權方面，法農主張革命精英應從外部領導農民，適時地引導農民的革命能量，卡布拉則認為革命的精英應與農民共同學習成長，才能有發揮領導作用。法農反對一黨專權，卡布拉則認為在落後的殖民地，只有全國性的黨才能發揮真正的民族解放的功能，才能集中力量強而有力地對抗殖民勢力。⁵

在革命的暴力方面，法農認為殖民的暴力只能用更堅決的暴力回應，透過革命的暴力，群眾才能了解真實的社會。卡布拉除了強調革命暴力是對殖民

² Blackey, 193-195.

³ Blackey, 195.

⁴ Blackey, 197-202.

⁵ Blackey, 202-204.

地壓迫的回應外，並沒有特別討論革命暴力的性質，但他卻強調了由於幾內亞比紹沒有向阿爾及利亞一樣大量的殖民母國移民，所以不需要採取恐怖主義攻擊的形式。⁶

有關文化在革命中的作用方面，布雷奇認為兩人都視文化為人民在解放鬥爭中自我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雙方也提出了殖民者是如何地透過對被殖民者日常的壓迫來消滅其文化。

布雷奇的文章，運用了西方學術界慣用的解釋系統與範疇歸類，將所謂的「非洲革命理論」，透過法農和卡布拉的論述與差異確定下來。這裡形成了一種「和諧」與「矛盾」。「和諧」的是兩人的論述可以透過這樣的學術範式得到西方的理解和再分析，「矛盾」的是「非洲革命理論」在比較之後，在同樣的命題下，卻產生相互「矛盾」的結果。「和諧」使得非洲革命的成功得到了分析的合理前提，「矛盾」則得出了非洲革命後的內戰和經濟破敗的必然性，西方的理性主義，再度在學術上獲得全知的勝利！但真的是這樣嗎？

布雷奇的文章有意識地選擇了與西方學術界語言較能相通的兩位知識份子的革命論述，而且強調法農與卡布拉雖然對社會主義心嚮往之，但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共產黨員，儘管他們運用馬列主義對各自的社會都進行了深刻的分析。這種強調在冷戰對峙時代的非洲是有其用意的。

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時，卡斯特羅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內承認這個革命具有社會主義性質。1961年剛果總理盧蒙巴被丹加丹省分裂份子沖伯處決的原因，就是因為他不該在比利時殖民勢力支持丹加丹省分裂獨立時，向美國求援失敗後，轉向蘇聯求助。這引起了美國的恐慌，決定要置他於死地。這樣的警惕與教訓都是所有第三世界反帝國主義以及反殖民的抵抗力量必須慎重對待的。與卡布拉相比，法農並沒有像本·貝拉所領導的阿爾及利亞解放陣線（FLN）那樣深刻地捲入解放戰爭中。做為一個革命的宣傳者，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更像是回應西方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界的聲明，從他的第一章與薩特1961年版序言都以暴力為主題，就可以看出這一點。

卡布拉在幾內亞比紹的革命實踐，對西方學術界而言，具有一定的「純潔

⁶ Blackey, 204-206.

性」。他認為幾內亞比紹的革命不必使用極端的恐怖主義暴力(不是因為他拒絕,而是因為用不上),他也在戰術上堅持只對軍事設施進行襲擊,他堅持古巴的革命援助只能是醫療和教育,古巴不能直接參加戰鬥,他反對格瓦拉的「游擊中心主義」。⁷除了「一黨專政」外,這些原則都給西方學術界提供了一個「小而美」的解放戰爭典範,不必疲於奔命地去爭論暴力使用的原則性問題。然而,也正是同一個卡布拉,在1965年哈瓦那所舉辦的亞非拉國際團結會議上,和格瓦拉遙相呼應地闡述了他的「新人」思想,並共同支持了格瓦拉所提出的要建立「第二個、第三個越南」的呼籲。

布雷奇文章的選擇性還在於忽略了葡萄牙殖民地其他抵抗力量的社會分析、政治方針與革命策略,這種忽略使得有關非洲革命理論缺少了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對這個部分略而不談,就無法解釋為何這些殖民地在取得獨立之後,又陷入了長期的內戰。

冷戰對峙是第三世界反帝革命解放運動如此複雜的根本原因之一。微弱而新獨立的殖民地為了在複雜的國際夾縫中生存下來,不得不謹慎面對強大的帝國主義勢力,這和1920年代殖民地知識份子因十月革命勝利而充滿解放信心,看來似乎不同,但這只是時空背景因素影響下的、表面的不同,對於反對這個帝國主義宰制的認識,卻沒有不同。到了非洲大陸革命運動高漲時期,恩克魯瑪和卡布拉甚至進一步提出了沒有消滅新殖民主義就不算真正獨立的見解。

所以,布雷奇指出的法農和卡布拉之間的差異,其實不是差異,而是非洲革命整體的一部分,就像內托、孟德連、卡斯塔、本·貝拉、盧蒙巴、曼德拉、薩姆·努喬馬(Sam Nujoma)、格瓦拉和卡斯特羅一樣,都是非洲大陸革命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這些不可分割的整體反映了使理論聯繫於實際的努力。而直面種種困難與問題的這些革命者則是唯一使這一聯繫成為可能的媒介。

任何一個殖民地解放運動都要面對一個複雜的文化省思:「文明先進」、「有效率」的野蠻殖民體制的一切在什麼意義上是值得學習或不值得學習的

⁷ 見紀錄片: Jihan El-Tahri, *Cuba: An African Odyssey* (2007).

呢？十九世紀主張黑人「自治」的思想家阿弗里卡納斯·霍頓（Africanus Horton）就認為應該要向殖民者學習，並且要透過積極的學習讓殖民者認同，進而向殖民者證明黑人是可以自治的，霍頓甚至還隨英軍參加了兩次對西非阿散蒂王國的戰爭。⁸但有更大的一群人卻選擇了負隅頑抗。1905 至 1907 年間，德屬東非的黑人由於不滿殖民當局強迫栽種棉花並課徵棉花稅，憤而起義。這些人只有獵槍、長矛和弓箭做為武器，宣稱蛇神附體的巫師恩格瓦列（Kinjikitile Ngwale）於是泡製了稱為「馬及馬及」的靈藥，可以將敵人的子彈變成清水，黑人因此士氣大振，奮勇抗擊殖民軍隊。三年奮戰間，黑人死亡人數竟高達二、三十萬人之眾。⁹德國的人類學家後來還特別研究了這種「靈藥」，他們發現其中的成分只有蓖麻油和黍稷的種子而已。按理講，只要一上了戰場，子彈不能變成清水，起義軍勢必瓦解，是甚麼讓這些黑人前仆後繼地抵抗了三年呢？

1906 年，英國人為了要逼使更多黑人到金礦區當礦工，決定向自給自足的祖魯族課徵人頭稅每人 1 英鎊，這對缺乏現金的祖魯人來講根本就是奴役，為了拒繳人頭稅，祖魯酋長邦巴薩（Bambatha）帶領族人抗稅，後來為英軍所敗，死於多波森林，但族人多不相信他已陣亡，有人甚至認為他已經變成了多波森林的守護神了。¹⁰

從西方理性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落後野蠻的黑人所做的抵抗都是荒謬而且毫無意義的，他們這種以卵擊石的自殺暴動，再次證明了他們的愚蠢，也再次證明了殖民的白人肩上那種「文明開化」重任的必要性。但西方理性的殖民者不了解的是：馬及馬吉的靈藥並不在於它的成分，邦巴薩的生死與否並不在於梟首示眾數十年，關鍵在於被殖民、被壓迫的人們透過這種看似迷信荒唐的儀式，找到了源於自身文化的認同和戰鬥的位置，所以尼日利亞小說家齊努亞·阿切貝才能不卑不亢地在他的小說《分崩離析》（*Things fall apart*）中，透過愛哲烏魯勇敢地展現他部落的全貌，也才能不畏冷戰肅殺的政

⁸ 有關霍頓生平，見：Christopher Fyfe, *Africanus Horton, 1835-1883: West African Scientist and Patrio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⁹ Robert Gellately and Ben Kiernan, ed. *The Specter of Genocide: Mass Murde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¹⁰ K.G. Gillings, "The Bambata Rebellion of 1906: Nkandla Operations and the Battle of Mome Gorge, 10 June 1906," *Military History Journal* 8, no. 1, <http://samilitaryhistory.org/vol081kg.html> (accessed 18 April, 2009).

治氣氛，寫詩讚揚為安哥拉解放事業奉獻一生的內托。

同樣地，邱士杰的著作向我們展示了 1920 年代全球所有受壓迫者深受十月革命鼓舞，迫切希望拿起理論武器尋找各自社會革命動力的熱望。在邱君的著作中我們會看到來自東亞各地的革命青年，從朝鮮、從日本、從海峽兩岸，他們跨越了語言和地區的藩籬，尋求解放全世界的道理。邱君書中所提到的這些人也許由於有限的鬥爭經驗，無法提出列寧和卡布拉那種既宏觀又具體的革命戰略分析，但他們早已懷著像法農一樣的革命樂觀情緒，努力提出他們那個時代的問題，就教於後來的革命者了。

像布雷奇那種有意或無意的研究選擇，會將歷史囚禁起來。這就像某些研究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歷史時在史料、對象、時間斷限，與問題意識上所做出的選擇一樣。這些選擇似有若無地找尋這樣或那樣的著力點以同最根本的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同東亞、同兩岸、甚至實際上同台灣本身一刀兩斷。然而一個蒼白的囚犯，是無法唱出多彩生動的歷史之歌的。

是為序。

2009.4.19

凡 例

1. 在本文中，凡是加粗的**黑體字**，俱為本研究所加。
2. 凡是文字加上底線者，即表示此文字原文如此。
3. 花括弧〔 〕表示補字，或表補充說明。
4. 方括弧〔 〕表示校定前一個字或字串。部分係屬舊式漢字或外國用法，仍校定，比方「働」校定為「動」。
5. 重要人物在每章正文首次出現時，都將附上生卒年或別號。

目 錄

序 一
序 二
凡 例
目 錄

導 言／1-68

引 言、二十世紀末的《左翼》故事／1

第一節、理解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前提／4

1. 「運動」的對象性何在？／4
2. 爭論不休的問題：革命「一步到位」或者「分幾步走」的選擇／12
3. 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論述與陳映真的研究業績／21

第二節之一、在「半封建社會」論中通向

「新民主主義革命」（1920s-1940s）／25

1. 殖民時期的「持續替代」肯定論：矢內原忠雄與山川均／25
2. 從「持續替代」肯定論到否定論：王學文、許乃昌、台共／28
3. 半封建社會論：「持續替代」否定論與「新民主主義論」的結合／31

第二節之二、「半封建社會」論向

「半封建政權」論的轉化（1960s-1970s）／36

1. 實際上是「半封建政權」論的劉進慶「半封建社會」論／36
2. 逐漸成為問題的資產階級／39
3. 史明與左雄的「資產階級」論戰／40

第二節之三、在「半封建政權」論中遠離

「新民主主義革命」(1970s-1980s) / 44

- 1.《台灣人民》以降的七〇年代 / 44
- 2.爭取資產階級的「迷思」：「民主主義」與「專政」的隱沒 / 52
- 3.七〇年代以來的島內論述：「新殖民地」、反壟斷、「波拿巴國家」論 / 58

第三節、研究的總結與再展開 / 63

- 1.第二節的總結 / 63
- 2.出現於 1924 年之前的「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述 / 64
- 3.研究的再展開：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 / 66

第一章、一生只能開花一次的青春 / 69-94

第一節、余清芳與謝晉青 / 70

- 1.無政府主義者余清芳 / 70
- 2.無政府主義者謝晉青 / 72

第二節、背叛保守家庭的造反少女：山口小靜 / 75

- 1.皇國氛圍的台北與社會主義的東京 / 75
- 2.離開學校之後的生活鬥爭 / 78
- 3.馬克思主義者小靜 / 80

第三節、山口小靜的生與死 / 82

- 1.連溫卿與山口小靜的相遇 / 82
- 2.白色恐怖下的島內秘密讀書會：馬克斯研究會 / 86
- 3.花蕾落地 / 90

第二章、島內社會運動的社會主義萌芽 / 95-118

引言、路線對立中的蔣渭水 / 96

第一節、社會主義色彩的「台灣第一號政治結社」 / 98

第二節、從「馬克斯研究會」到社會問題研究會 / 103

- 1.關於「社會問題研究會」的一般說明 / 103
- 2.山口小靜的返台與馬克斯研究會的形成 / 105

3.社會問題研究會的歷史意義／108

第三節、結論／110

1.島內社會主義者與島內外社會（主義）運動的關係／110

2.蔣渭水眼中的路線對立／112

3.一九二〇年代台灣社會運動的總趨向：左傾化／114

第三章、台灣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119-154

引 言、黃玉齋的《台灣革命史》／120

第一節、台灣的無政府主義起源：東京與北京／122

1.東京的台灣人與他們參加的社會主義組織：可思母俱樂部與其他／122

2.北京的台灣人組織／127

3.范本梁與無政府主義者的交往／130

第二節、難獲「共鳴」：長期獨行的范本梁／134

1.「新台灣社」的結成：范本梁與許地山的合作／134

2.從「新台灣社」轉化為「新台灣安社」／138

3.從勉力維持到返台被捕／141

第三節、結論／143

1.重新檢視黃玉齋《台灣革命史》／143

2.也是城南舊事：北京無政府主義者跨國人際圈的後續／147

3.「思想武器同爭戰 死筆誰言遜死彈」／149

附錄 1：〈謹迎新春〉明信片全文考證版／150

附錄 2：〈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為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被拘〉全文考證版／151

第四章、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首次組織化／155-188

引 言、上海的兩個祕密集會：1921年7月／155

第一節：上海的複雜背景／158

1.上海：「主義」的激戰地／158

2.上海台灣青年會及其成立前後的局勢／165

3.報端上的一瞬：「台灣赤華會」與《平平旬刊》的出現／168

第二節、平社與《平平旬刊》：兩種「主義」的兼容與分裂／171

- 1.概觀：平社及《平平旬刊》／171
- 2.「主義」對立：從平社、《平平旬刊》到赤華黨／175
- 3.台灣人青年組織的興衰與轉折：以1924年為中心／179

第三節、結論／181

- 1.介入現實／181
- 2.從上海走向全東亞／184
- 3.平社及「赤華黨」的歷史意義／186

第五章、台灣社會主義者的最初論述／189-206

引言、連溫卿《台北市志初稿：社會志—政治運動篇》的背後／189

第一節、范本梁的論述／190

- 1.兩種暴力觀／190
- 2.中國革命中的「以暴易暴」問題／192
- 3.將「以暴易暴」概念引入台灣革命／194

第二節、連溫卿與許乃昌的論述／195

- 1.范本梁：「現實存在」與「客觀趨勢」相對立／195
- 2.連溫卿：把「現實存在」視為「客觀趨勢」的派生物／196
- 3.許乃昌的論述：以請願運動發生的變局為中心／199

第三節、結論／201

- 1.范本梁與無政府共產主義之關係／201
- 2.客觀趨勢與現實存在之關係／203
- 3.餘話／205

第六章、「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與革命性質的抉擇

——兩岸社會主義者的首次對話／207-244

引言、從彰化通向莫斯科的道路／207

第一節、許乃昌與瞿秋白的對話／209

- 1.許乃昌〈黎明期的台灣〉的內容概述／209

- 2.比較一：其他論述如何論證無產階級運動的可能性／216
- 3.比較二：其他論述如何論證既存社會運動如何沒有進步性／219

第二節、許、瞿對話所可能具有的多重面向／222

- 1.許乃昌對兩條路線的認識是否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223
- 2.許乃昌眼前的「國民革命」形態是否影響他的選擇？／226
- 3.比較：異端共產黨「今日派」與中共之間的革命性質論爭／230

第三節、結論／236

- 1.如何決定革命性質／236
- 2.為何、如何論證資產階級的革命性／238
- 3.餘話：許乃昌的蘇聯之行／240

第七章、「歷史建構」的條件／245-284

引言、舊雨來，今雨不來／246

第一節、在歷史事件的重新評價中建構「革命史」／248

- 1.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國民革命」／248
- 2.重新塑造於一九二〇年代的「國民革命」／250
- 3.關於「國民革命」統一戰線的設想及其發展／258

第二節、1924年「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興起／260

- 1.1924年的排外風潮／261
- 2.「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與「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興起／264
- 3.1924年「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後續發展／268

第三節、結論／272

- 1.兩種史觀的抉擇／272
- 2.殖民地「資本主義化」的限制／276
- 3.遠非成王敗寇／278

附錄 1：謝廉清的「反帝大聯盟」文獻／280

第八章、「蠹魚」的旅行日記——1924年連溫卿的赴日之行／285-310

引言、一次特別的報告會／285

第一節、〈蠹魚的旅行日記〉尋蹤／286

- 1.戴國輝的追尋／286
- 2.〈蠹魚的旅行日記〉考證／289
- 3.「蠹魚」為何得以成行／293

第二節、向著五一節的東京而去的蠹魚／295

- 1.在前往日本的船上（4月26日至30日）／295
- 2.從神戶到東京（4月30日）／297
- 3.參與東京的五一節遊行（5月1日）／298

第三節、為了與山川夫婦的見面／303

- 1.在東京展開訪問行程（5月2日至4日）／303
- 2.為日本世界語學會而續留於東京（5月5日至14日）／305
- 3.訪問山川夫婦與返台（5月14日至20日）／308

結語、其實地上本沒有路／311-332

第一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起源問題的總結／312

- 1.世界背景／312
- 2.東亞背景／313
- 3.台灣背景／316

第二節、台灣社會主義者的革命論述／317

- 1.台灣「全盤資本主義化論」、革命性質論，以及歷史建構／317
- 2.如何透過「民主主義革命」與「國民革命」改善研究／321
- 3.通向1927年的道路／323

第三節、「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331

圖

圖 1-1: 山口小靜與連溫卿／83

圖 1-2: 《綠蔭》(Verda Ombro) 封面／87

圖 3-1: 1926年《台灣革命史》書影／121

圖 3-2: 1922年《北京台灣青年會月刊》封面與內頁／129

- 圖 3-3: 1923 年《新台灣創刊的宣言》影像（局部）／137
- 圖 3-4: 〈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139
- 圖 3-5: 1924 年《新台灣》第二號封面／144
- 圖 3-6: 1926 年《新台灣》第三號封面／145
- 圖 4-1: 許乃昌著作影像系列一／161
- 圖 4-2: 許乃昌著作影像系列二／162
- 圖 4-3: 《平平旬刊》與《嚮導週報》／174
- 圖 6-1: 登載許乃昌〈黎明期的台灣〉一文的《新青年》季刊封面／214
- 圖 6-2: 〈黎明期的台灣〉的一頁／215
- 圖 7-1: 依據表 7-2 的數據 T、A、C、D、F 而進行的比較／253
- 圖 7-2: 依據表 7-2 的數據 T、A、B、C 而進行的比較／256
- 圖 7-3: 依據表 7-2 的數據 T、D、E、F 而進行的比較／257
- 圖 8-1: 1924 年《蠹魚的旅行日記》剪貼本封面／291
- 圖 8-2: 《蠹魚的旅行日記》剪貼本內頁／292
- 圖 8-3: 前田寬治於 1924 年所繪的《五一節》（メーデー）／301

表／333-373

- 表 2-1: 治警事件前夕，文協與島內相關團體、核心幹部／334
- 表 3-1: 范本梁的人際關係網／336
- 表 3-2: 新台灣（創刊號—第三號）目錄／338
- 表 3-3: 《台灣新青年》創刊號目錄／340
- 表 4-1: 蔡惠如在 1921 年／341
- 表 4-2: 關於《平平旬刊》聯絡人及聯絡處的記載／342
- 表 4-3: 《平平旬刊》目錄／343
- 表 4-4: 「平平同人」資料考證略表／346
- 表 4-5: 1924 年前後上海台灣人諸組織的活動簡表／350
- 表 4-6: 「表 4-5」簡示／353
- 表 4-7: 各種組織及刊物的中文、英文、俄文名稱對照表／354
- 表 4-8: 許乃昌所謂的十三名台灣左翼積極份子（對照表 4-7）／356

表 4-9: 上海各事件、組織的關係人列表 (以 1924 年上海為中心) / 358

表 6-1: 兩條路線 / 361

表 7-1: 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目錄 / 362

表 7-2: 以《中國青年》與《嚮導週報》為對象的數據統計表 / 363

表 8-1: 〈蠹魚的旅行日記〉結構簡表 / 372

表 8-2: 〈蠹魚的旅行日記〉與連溫卿後續文章之關係略表 / 373

徵引書目 / 375-405

後記 / 407-409

Por la Komunumo en la 21a jarcento

導 言

引 言、二十世紀末的《左翼》故事

對於台灣來說，1999 年是個不平靜的一年。7 月初，兩岸交流霎時中斷。同月底，一座因為土石流而倒塌的高壓電塔造成全台前所未聞的大停電。沒多久，以南投為震央的「九·二一」大地震撼動全台，造成大規模死傷與設施破壞。……無獨有偶、接二連三，許許多多的事件在世紀末的這年陸續發生。

此時，一份 A5 大小的騎馬釘黑白刊物在這些事件的間隙中萌現。也許是在「唐山書店」地下室樓梯間之類的文化場所，或者是在這樣那樣的社運團體辦公室，許多地方都有在索完之前看到這份刊物的可能。如果仔細翻閱這份創刊於同年 11 月 22 日的刊物，會發現這份刊物因為手工裝訂而留下的種種缺陷，甚至會發現因為供不應求而不斷加印從而在封面上記下的印刷次數：二刷、三刷、四刷……。

這份刊物，叫做《左翼》(*The Left*)。

雖然今日的人們仍難總結二十世紀末創刊的《左翼》對於「左翼」的意義或貢獻。但無論這份刊物能否「啟後」或者已然「啟後」，這份刊物首先都是「承先」而來的產物。《左翼》第一號所登載的〈左翼社會運動的展望——從局勢演變談起〉一文，鮮明地體現了該刊對於總結（乃至統合）過往台灣「左翼」運動（史）的意圖。這篇形同發刊詞的文章，由一位筆名「黎建江」的七〇年代「釣運」知名領袖所撰寫。因為這篇文章，一場綿延至翌年民進黨陳水扁政權上台之後的論戰，在《左翼》這個舞台上展開了。

「政權性質」是最先被提出來的問題。黎建江認為：由於「台灣的工農階

級或其他弱勢團體，基本上都處在自在階段。尚未能夠決定社會的走向，甚至不能影響社會的輿論。因此，在探討台灣的宏觀局勢，無可避免地，主要得分析統治階級的動向。」他認為，李登輝為了推動台獨，遂在上台後「強化了大資產階級與地方派系的力量」以獲支持。此舉導致「政權性質」的「資產階級性格更加凸顯」，因此台灣的「政權性質」發生變化。兩蔣時代的「半封建」政權轉化為「資本主義」政權。¹¹

黎建江的文章引發《連結》雜誌社去函反駁。《連結》認為：（1）不應該把台灣「獨立」當成李登輝一系列作為的根本原因，從而不應該把李登輝上台視為台灣「政權性質」發生變化的轉捩點；（2）不應該用 1949 年之前中共所規定的中國「社會性質」（「半封建社會」）去規定 1949 年之後的台灣「政權性質」（「半封建政權」）。

「社會性質」乃是《連結》為了加強其論證而引入的範疇，該範疇並未在黎建江論述中出現。《連結》認為：由於黎建江所集中討論的「政權性質」乃是由「社會性質」所規定的範疇，因此黎建江必然基於這樣或那樣的「社會性質」認識，而規定了兩蔣時期或李登輝時期「政權性質」。也就是說，《連結》推測黎建江把 1949 年之前的中國「社會性質」延伸於之後兩蔣時期的台灣「社會性質」（即兩者都是「半封建」社會），從而決定了台灣「政權性質」。¹²

《連結》的回應激起了更多人的回應，¹³署名「官土生」的曾健民則影響了討論方向。他指出：「社會性質」並不必然決定「政權性質」，「兩者有一致的地方（時候）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時候）」，他推測黎健江的說法是指：「失去了大陸的社會下層建築的國民黨政權，遷逃台灣後仍舊維持其在大陸時期的上層建築。」換句話說，曾健民認為 1949 年前的中國社會性質決定了國民黨政權

¹¹ 黎建江（1999: 1-3）。

¹² 《連結》雜誌社（1999: 25-28）。

¹³ 有論者批評《連結》用統獨去衡量《左翼》，比方論者「梁三」。他認為應當把「社會性質」視為一個語意不斷變遷的概念，因此不應該過度質疑黎建江的論點（梁三，2000: 33-34）。不過這個回應遭到《連結》的強烈批評（《連結》編輯部，2000: 1-7）。也有論者進而討論在兩千年新上台的陳水扁民進黨的「政權性質」。見：伍艾蘭、林書揚、瑟珂蕙在《左翼》第五號（2000 年）的討論。或者討論《連結》雜誌社進而提出的中共「政權性質」問題與中國大陸社會性質問題，見：林書揚、黃志龍（陳明忠）、王哲、石家駒（陳映真）以「中國共產黨與新資產階級」為主題的討論（陳映真，2001）。

的「政權性質」並延續到國民黨敗往台灣之後。¹⁴由於曾健民所提出的見解，使後來的討論大致沿著他所區分的「政權性質」與「社會性質」的方向前進，其中包括《連結》。¹⁵因此《連結》也稱「台灣社會及政權性質」為該次討論的「核心問題」之一。¹⁶論爭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陳映真（1937-）在「政權性質」與「社會性質」的對立架構下，以所謂的「波拿巴國家」（Bonapartist State）回應了「半封建政權」的說法。他認為兩蔣時代之後瓦解的是國民黨「波拿巴國家」，而不是「半封建政權」。「波拿巴國家」瓦解之後便「還政」給台灣本省籍資產階級中的壟斷資產階級。¹⁷

熟知二十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人必然清楚「社會性質」一語乃是一九三〇年代「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中發展出來的術語。但二十世紀末的《左翼》為什麼要爭論「社會性質」問題，並且在台灣史的脈絡下爭論這個問題？「社會性質」與所謂的「政權性質」有何關係？「波拿巴國家」究竟所指為何？……論爭留下許多尚未得到耙梳與整理的線索，同時也留下不少尚待解答的問題。

雖然發生在《左翼》上的這場論爭沒有結論，實際上無疾而終。然而這場由不同世代運動者所參與的論爭，以及論爭中的問題意識和討論框架，卻如燈塔般照亮了通向這場論爭的「前史」。這場論爭正是**二十世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縮影。

¹⁴ 官土生〔曾健民〕（2000: 35-38）。

¹⁵ 但是，既然黎建江畢竟沒有討論台灣的「社會性質」，便不能直接認為黎建江是循著《連結》所設想的那套邏輯而思考。只需從黎建江把考察對象集中在掌控政權的統治階級而不是被壓迫的社會各階級，便可看出《連結》對於黎建江的指控不免過度推論。

¹⁶ 《連結》編輯部（2000: 4）。

¹⁷ 鄒議〔陳映真〕（2000: 1-4）。

第一節、理解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前提

1. 「運動」的對象性何在？

「社會主義運動」常與「社會主義」同義，¹⁸但「社會主義」本身並不是容易定義的概念。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曾將社會主義區分為「空想」（utopian）與「科學」（scientific）兩種。他認為，空想社會主義著眼於描寫理想的未來社會制度，並想要立即解放全人類，而不是首先解放某一階級。科學社會主義則是考察當下社會之階級矛盾——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資本家與僱傭勞動者之間——的結果，同時也是歷史中產生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鬥爭的必然產物。科學社會主義不再構想理想的未來社會制度，而是研究產生這種階級衝突的「歷史的經濟的過程」，並且從中找出解決衝突的手段。¹⁹無論如何，恩格斯的區分多少有褒科學而貶空想之意。林書揚（1927-）所定義的「左翼運動」也強調運動以直面階級矛盾為其特徵：「所謂的左翼運動，就是把這種社會中被壓迫、被支配的關係的根上溯至社會結構中最基礎的部份，也就是階級結構中最基礎的部份，有意從此部分來加以改造。這種運動的目標及理念便是左翼的、激進的、革命性的反抗運動。換句話來說，也就是把殖民地中經濟上的剝削關係，列為首要的攻擊目標，這就是所謂的左翼運動。」²⁰林書揚的觀點與恩格斯很接近。

雖然上述定義很有幫助，但本研究傾向於將「社會主義運動」視為多樣性的統一。多樣性包括了社會主義者個人、社會主義的群眾、社會主義活動、社

¹⁸ 保羅·斯威齊（Paul M. Sweezy）為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辭典》定義「社會主義（socialism）」時，直接從「社會主義運動（socialist movement）」談起，顯然是把社會主義直接視為運動（Sweezy, 1983: 444-446）。

¹⁹ 恩格斯（1995b）。

²⁰ 林書揚（1992a）。

會主義組織、社會主義論述，乃至更多。這些個別存在的多樣性，是「社會主義運動」得以具體的根據。²¹多樣性所共同擁有的「社會主義」屬性，則使各個多樣性具有向彼此轉化的可能。

作為多樣性之一的「組織」經常被視為「社會主義運動」成形的標誌。將「運動」定義為「長於瞬間的某種集體推力」的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認為：「運動」在包含現當代在內的「歷史資本主義」時期裡，體現為「常設組織」（permanent organization）的存在。他稱「常設組織」乃是「歷史資本主義中造反技巧的偉大發明」。而「勞動—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運動」，就是依托著種種「常設組織」，而得以從十九世紀開始成為「持續存在的、官僚化結構的兩大歷史形式。」²²某種經典定義則認為，社會主義運動還有三個應當重視的要素：「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以及作為兩者之結合的「先鋒隊政黨」。²³

從上述定義來看，二十世紀顯然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對象性得到高度展現的時代：

- (1) 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常設組織從「政黨」轉化為「國家」；

²¹ 伊林柯夫：「具體，具體性，這首先就是現象的現實聯繫的同義詞，是呈現在人的直觀和表象中的對象的各個方面，各個要素的相互聯結和相互作用的同義詞。因此，具體可理解為對象的各種存在形式的內部經過分解的總體，這些形式的獨特的結合只是該對象的特徵。這樣理解的統一，不是通過現象的彼此相似而實現的，恰恰相反，是通過現象的區分和對立而實現的。」馬克思是在下述情況下使用這個術語的：他必須把對象描述為統一的、在其全部多樣表現上相互聯繫的整體，描述為相互制約的各種現象的『有機體系』，以此來反對形而上學的觀點，後者認為對象是只在外表上、或多或少只是偶然地發生聯繫的各種不變成份的機械組合。」（Ильенков, 1993: 2）

²² Wallerstein（1993: 66-67）。中譯見 Wallerstein（1999: 38-39）。

²³ 基於俄國經驗而出現的先鋒隊政黨並非密謀式組織，因為密謀式組織基本上並不積極尋求群眾基礎，而訴諸於自認為少數先覺者的個人手段，如暗殺、少數革命家的暴動。黨也不是形成於工人運動之中的組織，如工會。列寧認為，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它的任務不是消極地為每一階段的工人運動服務，而是要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給這個運動指出最終目的，指出政治任务，維護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獨立性。」不過列寧也曾談過黨如何先於運動而存在。列寧曾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即日後的共產黨）的運動史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的「社會民主派是在沒有工人運動的條件下存在的，它作為一個政黨當時還處在胚胎發育的過程中。」即便如此，列寧仍視之為「運動」發展的一個時期。列寧還認為，「各國都經歷過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互不聯繫，各行其是的時期。」而兩者實現相結合並出現黨，則「都是歷史地形成的，都經過了獨特的道路，都是以地點和時間為轉移的。」不過，上述討論還必須納入其他同時被討論的問題才能理解，比方群眾的自發性與黨的自覺性之間的關係（列寧, 1995b: 284-285; 1995c: 455）。

- (2) 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之後，常設組織從「俄國的政黨」轉化為「國際的政黨」；
- (3) 二戰結束後世界新興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使常設組織從「俄國的社會主義國家」轉化為「國際的社會主義國家」；
- (4) 最後，1991年「蘇東波」後的「亡黨」、「亡國」，瓦解了先前發展起來的各種形式的常設組織。

雖然上述定義可以產生具有對象性的「運動」，卻不能使所有「運動」都產生對象性：

- (1) 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無政府主義運動。德里克 (Arif Dirlik, 1940-) 指出，由於中國(乃至東亞)社會主義運動以無政府主義為先驅並為重要組成，因此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對於革命組織乃至革命本身，至少存在著兩種鮮明有別的設想：一種是無政府主義者所期待的「自發」型社會革命，這是社會在偶然中自發產生的革命；另一種則是多數社會主義者(也許特別是作為布爾什維克的馬克思主義者)主動「發動」的社會革命。²⁴無政府主義「運動」基於他們「自為」的設想而不積極「組織」自身，因此現象上難以作為一個對象。
- (2) 第二個例子則正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一方面，島內屢屢出現運動斷層，打擊了運動的對象性。這是二十世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直觀特色。1931年至1945年間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第一次斷層，這是配合日本侵華而出現的第一次白色恐怖。1950年代則是第二次斷層，這是國民黨為了鎮壓共產主義者而出現的第二次白色恐怖。這兩次斷層區隔出三個時期：第一期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第二期是戰後五年，第三期則是七〇年代及其之後。另一方面，即便是這兩次斷層所隔開的三個運動時期，運動本身也始終面臨當局打壓，因此運動的對象性也未必能受眾人所承認。

雖然「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已在史料及研究俱有積累的條件下，初步展現出對象性。²⁵但因運動的對象性是在片面的研究方法下揭示的，因此對象性

²⁴ Dirlik (2006: 10)。

²⁵ 以一九二〇年代為研究時段的主要代表作有 Frank S.T. Hsiao (1983)、若林正丈 (2007)、盧修

反遭片面性的解消。以一九二〇年代的運動為對象的研究來說，通常有兩種問題：

- (1) 第一種是「1927 年中心論」。多數研究把研究時段集中在社會主義者公開奪取文化協會領導權的 1927 年之後，並視這一分裂為島內社會主義運動的開端。²⁶因為此後的社會主義運動公開了自己反資本主義的目的，甚至自我宣稱為社會主義，從而非常容易辨認。這種作法體現了無可厚非的時代限制，但也留下弊病：由於 1927 年的左右分裂變成社會主義運動的開端，從而無法考慮社會主義運動在 1927 年之前產生的可能性，甚至倒過來使 1927 年之前的史料，成為鋪陳這一分裂而聊備一格的補白。²⁷
- (2) 第二種是「台灣共產黨與共產主義運動中心論」。雖然研究集中於文協分裂之後，但更多是集中在台灣共產黨的興亡之上，實際上是以台共史作為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替代品。以「台灣共產黨史」為限定的研究，最明顯的問題就是以參與台共建黨的成員為主要對象，並向前、向後追溯這些對象的個人活動史。²⁸這種追溯式的方法，產生一種「必然通向台共組黨」的歷史書寫，也使早期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範圍窄化。²⁹台共史無疑只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一部份，但台共史

一（1989）、簡炯仁（1997）、陳芳明（1991, 1998, 2004）。

²⁶ 正文所列舉之既有研究成果幾乎都是此種方法的典型研究。其中，若林正丈將文協脈絡下的社會主義運動及文協分裂置於民族主義運動的脈絡下分析。台灣共產黨則專闢一章。

²⁷ 與這種看法相反，若林正丈對於文協分裂有獨到的看法。若林正丈（2007: 287）認為，連溫卿率領無產青年奪取文協領導權，是要在文協內部形成如國共合作那般的左右統一戰線，只是這一舉動失敗了。因此，與其認為是連溫卿刻意要讓文協分裂，不如視之為統一戰線失敗的結果。

²⁸ 最典型的就陳芳明的研究。其《殖民地台灣》一書，凡以個人作為研究對象者，俱為台共黨員。他甚至還為謝雪紅個人以專書形式立傳。簡炯仁一書也有這種傾向，以致他竟然以 1930 年代被檢舉的台共黨員（30 人）為對象，從中「抽樣」分析其家庭背景及教育背景以替代調查 510 名涉嫌人（簡炯仁，1997：第一章第四節）。

²⁹ 此外，又因為早期台灣社會主義者與中期台灣社會主義者之間存在人脈與組織上的斷裂，因此，中期台灣社會主義者所撰寫的運動史回顧多半無法追及一九二〇年代中期以前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在很大程度上，這些運動者無論願不願意，都只能以《台灣社會運動史》作為書寫這段歷史的第一參考，比方蕭友山（1946）、張深切（1947, 1961）、李振芳與郭德欽（年份不詳）、楊克煌（1956）、連溫卿（1988）。那末一來，對於一九二〇年代中期以前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認識，迄今已然墮入從《台灣社會運動史》出、並從《台灣社會運動史》入的迴圈之中。從上述回憶錄的出版日期可以發現，這些運動者在光復之後不久便陸續取得這部份管密藏的《台灣社會運動史》。雖然取得原因尚不清楚，但已有學者注意到這一問題（戴國輝，2000）。

的上下限並不等於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上下限。台共成員的個人史與台共組織史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

無論採取什麼定義來定義「運動」，都難以迴避某種中心論或者單線史觀。雖然沒有必要為了這樣或那樣的政治正確而批判中心論或單線史觀，但以某種標準考察「運動」的方式，總存在著不少問題。以「常設組織」這一標準來說，組織之所以成為「常設組織」，總是後來才能知曉的事情。如果組織真的發展為常設組織，並成功使常設組織成為各種社會主義多樣性的轉化媒介，運動的「開端」顯然就得從組織最初設立的時間點算起。然而組織出現之前的發展階段可能被解消；這就好像說中共成立之前可以有社會主義多樣性的「前軀」，但沒有中國社會主義運動。

就算這些「前軀」也可以被視為「運動」的一部分，但「開端」之所以為「開端」，正在於「開端」之後還有「後續」；又因為「後續」的存在，所以「開端」成為有意義的「對象」，從而致使「開端」之前的「前軀」得到研究。但是，對於另一些同時通向同一個開端，只是「開端」同時等於「結束」的對象來說，如果他們沒有特殊標準下才能得到定義的「後續」，是否容易導致他們的「開端」遭到否定？

應當認識到：常設組織固然是組織長期發展的結果，但組織本身也是結果，它是前一階段種種多樣性因緣際會轉化而來的產物。在通向「組織」的道路上，有不同的人群努力著。有些人成功了，因此他們的發展脈絡得到研究；有些人失敗了，因此他們的發展脈絡遭到忽略。但若不能把各種攸關成敗的因素考慮進來，那末，得到研究的發展脈絡也未必因為得到研究而失去得更少。

當「運動」的考察背後存在著某種中心論或單線史觀，便預設了運動應當有某種可從質、量、時間上衡量的存在形式。比方「運動」可能被視為常設組織長期牽動著大規模群眾的結果。然而「組織」要包攝多少人才算得上「組織」？「組織」需要存續多長時間才能稱為「常設」？多少人才能算是「群眾」，「牽動」群眾又是什麼？³⁰這些問題永遠無法從形式上衡量、無法兼具質量標準，有

³⁰ 到目前為止，以社會主義運動在東亞的形成史為對象的研究並不會只把群眾運動（無論是工人運動或農民運動）當成唯一的對象，而通常先從社會主義常設組織的組建來入手，並強調個別活動家的經歷。比方石川禎浩（2006）。或如「『初期共產國際與東亞』研究會」近年以共產國際遠東

時甚至僅由成王敗寇所決定而已。³¹

無政府主義運動與其他社會主義運動流派的差別，正能體現固定標準或定義的危險性。如德里克所言，「歸根結底，兩種革命之間的這種區別不是自發和組織之間的區別，而是不同類型的組織之間的區別。無政府主義者反對的不是組織本身，而是反對政治組織。」³²「早期的革命運動不是自發的，也是『發動』起來的——雖然它與 1927 年後的革命運動有根本的差異——而無政府主義者在『發動』這場運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些限制條件使我們不能把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看作單個人的隨意性的活動，或沒有內在一致性的散發式的激進主義。」³²

總之，當衡量本身由許多基於某種中心論或者單線史觀而產生的「應然」標準構成之時，「組織」、「常設」、「運動」、「群眾」、「成敗」之類的範疇，就會拉開其與研究對象之間的距離，並實際上解消研究對象的對象性，³³或者更多。³⁴

書記局、日本、中國、朝鮮，以及蒙古為對象的研究（「初期コミンテルンと東アジア」研究会，2007）。

³¹ 按這種觀點，八十年的蘇維埃國家不算長，活不過八十天的巴黎公社則恰恰證明其短。

³² Dirlik (2006: 10)。

³³ 牽涉人數與持續時間乃是最簡單而且便宜的衡量標準，按這種方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及其組織大概就是一九二〇年代最具群眾基礎者。但問題是，如果進一步將運動訴求的高度、理論的深度、組織的嚴密度，乃至鬥爭的堅決度考慮進來，請願運動便應區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總督府當局認為危險的那些人，這些人通常就是構成組織本身的運動幹部群，多數是地方精英（local elites）。第二個層次則是那些參與連署卻不被敵人加諸更多打擊（這是很低度的運動參與方式）、從而不直接負擔更多危險與責任的群眾。以 1923 年底為了打擊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而在島內發生的「治警事件」來說，首批牽涉其中的人物不過百人上下，此點正體現了請願運動的實質骨幹。組織與群眾是否敢於共同使用激烈鬥爭手段並共同面對鎮壓（無論是組織站到群眾那裡，或者群眾站到組織這邊）也是檢驗運動「群眾基礎」的試金石。而組織與群眾的脫離正是請願運動衰落與台灣文化協會發生左右分裂的原因。

³⁴ 「運動」對象性的解消並非研究上唯一的危險，而還包括：（1）運動的「社會主義」性質被連帶否定。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社會主義」性質（也就是國際性）被解消的具體現象，就是只把運動理解為相對於「台灣右派」才能存在的「台灣左派」，而不是國際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運動向台灣的延伸。缺乏國際視角的結果，一方面導致社會主義多樣性及其之間的轉化不容易得到觀察，另一方面則不容易考察「台灣」如何成為轉化的媒介以及多樣性藉此獲得的「台灣」屬性。也許這些應當觀察的對象才真正構成了社會主義運動史。不如此把握這些應當觀察的對象，就可能把握不到這段歷史，或把握到別的東西，甚至使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成為這種或那種運動的左翼版。（2）「為何研究」將變成問題，否定研究或質疑研究動機則成為潛在的答案。無論研究本身在史料佔有或分析推理上展現出多大的客觀性、無論這種客觀性如何體現在從動機到結論之間的過程，以社會主義運動為對象的研究（無論研究有多嚴謹）往往會遭質疑，特

為了證明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對象性，德里克曾替「運動」提出方法上的說明：「可以說中國有無政府主義運動嗎？我想是可以的，只要『運動』這個詞不被證明為由一個有形的中心決定的活動——這個限制性的規定正是無政府主義者挑戰同時帶其他社會革命運動的目標。」無政府主義在思想上的廣博性和組織上的『無中心性』（同一問題的兩個不同方面）使人們難以識別無政府主義者或界定作為一種運動的無政府主義的外延。「雖然他們的運動缺乏一個中心，但我們還是能夠辨別出他們在思想上和社會活動方面的某些相對的『中心』。這些『中心』以及在其中積極活動的個人……為我們提供了無政府主義運動多年來持續發展的線索，以及思想上某些程度的內在一致性和依稀可辨的活動模式。」³⁵

對於包含台灣在內的東亞社會主義運動來說，德里克對於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理解有移用之可能。因為：（1）東亞初期的社會運動都深受無政府主義運動影響；（2）就算其影響得以排除、就算將來的運動發展得以持續，初期「自在」存在的運動也與「自為」選擇「無中心性」的無政府主義運動非常類似，都是組織鬆散、短命、人數少，而且不穩定。即便是最強調組織的、以布爾什維主義為媒介的共產主義運動也不能自外。共產國際指導成立的東亞各地共產黨幾乎首先都只是一個有著「共產黨」名稱的組織，然後才在「常設組織」從主觀願望變成客觀現實的過程中獲得「共產黨」的實質，或者說，打造成一個共產國際所滿意的樣子。³⁶

如果用德里克的觀點重構沃勒斯坦的「運動」定義，則「常設組織」應當視為「常設」的趨勢以及「組織」的再生產之間的中介物。就算「組織」人數很少甚至無法「常設」，但若「常設」能夠成為一種動力驅使「組織」在不斷

別是質疑研究動機。而質疑研究動機往往變成推翻所有得到展現之客觀性的工具。此種見解體現一種對於研究對象乃至研究者的偏見，從而拒絕面對社會主義運動在不同地域所面臨的不同境遇，彷彿社會主義運動在各地全是當權派或者全都失敗。這種見解同時也完全不考慮「歸納」與「演繹」之間在動機、對象、論證，以及結論這些研究環節上所表現出的關係，彷彿只要以社會主義為對象的研究都是從動機直接跳到結論（當然，某些研究確實如此，從而也就歪曲了史料）。然而抱持著此種見解者能否自外於此見本身？或只是更接近 McCarthyism？也許這需要時間來檢驗，或者已經得到檢驗。

³⁵ Dirlik (2006: 10-12)。

³⁶ 推動這一過程的動力可能是外在的，比方共產國際；這個過程在一九二〇年代下半年被稱為「布爾什維克化」。

的扼殺中如野草般萌生，便應當承認這個過程體現了「運動」的對象性。

如果某個時段的「運動」被認為具有對象性，則應當探討對象性為何不存在於該時段之前，或另外設想一種方法來探討該時段之前的對象性。如果該時段之前的對象性不足以使人信服為運動本身，至少也應視之為運動的起源或「萌芽」。「萌芽」，根本不深，但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產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原因，是不會中途夭折的」；「真正的……萌芽，總是具有多發性，是可以重複觀察到的。」³⁷此外，從「當時的運動幹部如何形成」³⁸的角度來考察「運動」的形成與維持，也是很好的切入點或理解方式。

为了更好地揭示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對象性，必須向上向下延長研究時段，必須儘可能正確理解史料、擴大史料，必須正確分析當時的論述，必須批判既有研究，並且必須將研究對象擴及台共之前與之外的社會主義流派。以一九二〇年代「台灣社會運動史」為例，雖然《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本研究以下均簡稱為《台灣社會運動史》）是考察二〇年代「台灣社會運動史」的基本線索，但只有超出並批判《台灣社會運動史》，才能研究「台灣社會運動史」以及「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

然而揭示台灣「運動」對象性的更重要的方法，則是首先把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視為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然後考察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如何相對於其他運動而成為「左派運動」。因為：

- （1） 台灣地方狹小，社會主義的多樣性不可能完全在台灣的環境中培養出來。加上台灣在東亞地緣政治上處於四戰之地，因此運動本身的發展也以該地緣關係為發展的媒介，特別是中國、日本、朝鮮，以及美國（這是一九七〇年代以後）。
- （2） 在社會主義運動的「國際」性極為顯著的二十世紀裡，不跨地域的社會主義運動本就難以想像。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始終都是跨地域的運動史的一部分，從來沒有孤立存在的時候與可能。僅以今日為人所熟知的台灣共產黨（1928 成立）來說，最初的創黨成員幾乎都有中共及日共的黨員背景。即便是一九二〇年代受到共產主義運動擠壓而快速衰

³⁷ 引文為吳承明對於「資本主義萌芽」的定義（許滌新與吳承明，2003: 6）。

³⁸ 林書揚（1992a: 81）。

落的無政府主義運動，雖其內在具有相當強烈的反組織傾向，也相應形成了類似的跨地域「連帶」（「れんたい」泛指運動所產生的聯合，即 solidarity）。³⁹

- (3) 島內運動因為各時期統治者的鎮壓而造成一次次的斷層，所以組織或個人必須以島外作為迴旋之地，在島外培養、鍛鍊，乃至逃避鎮壓。個別地方運動及組織的潰滅不影響運動整體存在。因此台灣的社會主義運動並不只是相對於島內既存社會運動而相形而成的「左翼」，而更是社會主義運動在殖民地台灣的延伸（與再延伸）。

但是，如何從「國際」的運動來考察台灣的「運動」？本研究認為，社會主義「論述」是一個可行的媒介。而革命「一步到位」或者「分幾步走」這兩種選擇，則是多數社會主義論述所關心的問題，同時也是足以抉出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對象性的切入點。

2. 爭論不休的問題：革命「一步到位」

或者「分幾步走」的選擇

對於誕生於西歐並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運動而言，社會主義革命歷來是基本目標。就**革命任務**而言，社會主義革命要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支配的私有制社會，並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新社會；就**革命動力**而言，社會主義革命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工人階級所推動；就**革命性質**而言，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則被視為革命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關鍵指標。⁴⁰

³⁹ 關於東亞無政府主義的跨地域連帶，最扼要的介紹可見曹世鉉（2005: 53-58）、Dirlik（2005b）。

⁴⁰ 馬克思恩格斯在 1848 年發表《共產黨宣言》之時並沒有考慮到奪取政權的問題，而是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將因社會分化為人數佔絕對多數的工人階級與絕對少數的資產階級，而導致革命的發生，並進入無國家的時代。但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者在 1871 年巴黎公社失敗開始形成奪取政權的想法，但「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必須建立起工人階級自己的專政。參見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與《紀念國際成立七週年——摘自關於 1871 年 9 月 24 日倫敦代表會議上的

但當運動延伸到多種生產方式並存、生產方式之間存在某種消長趨勢，或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尚不取得支配性地位的地區時，社會主義革命有沒有必要、有無可能、如何可能，就成為顯而易見的問題。

由於私有制下的每個生產方式內部都有階級對立存在，因此，在多種生產方式並存的條件下，特定區域之內可能交錯著各種階級對立。比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階級對立是「資產階級／工人（無產）階級」，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內則有「地主／農民」、「奴隸主／奴隸」之類的階級對立。

社會主義運動也許可以不考慮這些對立而直接進行以工人階級為革命動力的革命。但從歷史上來看，運動在多數情況下還是願意考慮聯合可能聯合的階級。⁴¹比方聯合農民去進攻。以十九世紀末的俄國來說，當時的民粹派主張俄國可以依靠農村公社而免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俄國的發展。以普列漢諾夫、列寧為代表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卻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在俄國開始發展，並出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階級對立。所以，從工人階級立場出發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些無產階級化的貧苦農民可以成為同盟者，資產階級化的富裕農民則是敵人。當然，馬克思主義者的這番見解並不只是為了說明誰是敵人、誰是朋友，而更是藉由批判民粹派的論點而打擊民粹派。⁴²

中國馬克思主義運動也出現過類似的問題。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未征

發言記錄）（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1995: 1-122, 125-126）。

⁴¹ 從負面的角度來看，這種考慮通常會被稱為機會主義。當然，不考慮也會被稱為機會主義。因此前者常被稱為右傾機會主義，而後者則被稱為左傾機會主義。——「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魯迅語）

⁴² 馬克思主義者與民粹派之間的關係頗為複雜。馬克思早年曾嚴厲批判民粹派的先驅赫爾岑，但晚年卻非常關注民粹派的發展，並向他們表示，從前資本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歷史發展，首先僅限於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歐：如果俄國走上這條路，就必須經歷西歐所發生過的所有不幸（馬克思，1995）。馬克思死後，恩格斯一方面在〈法德農民問題〉指出必須在農民淪為無產者之前就爭取他們，另一方面則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指出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已經變成不可抗拒的趨勢（恩格斯，1995c）。與恩格斯同時代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也有同樣的看法，因此他們最初便是以批判民粹派起家，批判民粹派各種否定資本主義發展的論述，特別是貧困化導致消費不足，從而導致資本主義國內市場不可能實現的這種見解（列寧，1990a）。但列寧在1905年革命之後開始重視資本主義不發達的事實（因為農奴制殘餘嚴重）。他認為：雖然民粹派的理論是錯的，但其理論卻有反對農奴制以及促進資本主義全面發展的內容。這可以分為兩方面，要求平分土地的俄國民粹派「社會化」主張雖在主觀上意圖維護行將消滅之村社，客觀上卻有利於反對農奴制。而無論是平分土地（不管是國有化之後才平分或者就地平分）或者中國「民粹派」（列寧指孫中山）的「土地國有化」政策，都能為農業資本主義化創造條件。其中，「土地國有化」甚至可以創造最大條件，因為它將消滅絕對地租並使土地有最大的買賣自由（列寧，1990b）。

服全中國，致使工人階級的數量少；加上中共在 1921 年建黨之後所推動的工人運動在 1923 年「二七大罷工」失敗後轉入第一次低潮，因此工人階級能否與其他階級合作、與哪個階級合作、⁴³如何合作，成為中共必須面對的問題。又由於合作總是要找尋各階級都能接受的步調才能進行，就產生了革命應該「一步到位」還是「分幾步走」的問題，也就是如何選擇革命性質的問題。當然，這也是前述俄國革命中早已出現的問題。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成立說明中共決定「分幾步走」。然而當時的中共沒有將「階級」分析緊密聯繫於「分幾步走」的決定。因為「階級」是 1925 年的「五卅」慘案之後才得到關心的問題。如瞿秋白（1899-1935）所云：「五四時代，大家爭著談社會主義，五卅之後，大家爭著關階級鬥爭。」⁴⁴然而「階級」分析與「分幾步走」的決定也沒有在「五卅」之後產生緊密聯繫。因此周恩來（1898-1976）曾評論云：「什麼叫革命性質？革命性質是以什麼來決定的？這些在當時都是問題。後來才知道：應以革命任務來決定革命性質，而不是以革命動力來決定革命性質……」⁴⁵

直到 1927 年國共分裂激化了共產國際內部的路線鬥爭，才使聯共（布）黨內長期存在的革命性質論爭——即「分幾步走」或「一步到位」的選擇——藉由中國的場合而再次得到討論：

- (1) 以斯大林（И. В. Сталин，1879-1953）、布哈林（Н. И. Бухарин，1888-1938）為代表的共產國際主流派主張中國革命必須「分幾步走」，每一步有每一步該完成的革命任務以及完成該任務的政權。第一步是實現多階級共享的政權（比方工人階級與農民共治的「工農民主專政」）。這個政權把推翻前資本主義社會當成革命任務，而這一步的革命通常被稱為「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則是工人階級所獨掌的政權（「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政權把推翻或阻止第一步所可能實現（或已經實現）的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支配階級（「資產階級」）的政權當成革命任務，而第二步的革命通常被

⁴³ 也就是說，明天的敵人也可能成為今天的朋友，比方理應打倒的資產階級。

⁴⁴ 瞿秋白（1926: 23）。

⁴⁵ 周恩來（1983: 158）。

稱為「社會主義革命」。⁴⁶

- (2) 托洛茨基 Л. Д. Троцкий (1879-1940) 反對派主張「一步到位」。他們認為：所謂的第一步的政權「工農民主專政」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完成民主主義的革命任務。被主流派擺在第一步去完成的革命任務，恰恰只能直接透過第二步的政權才能完成。至於第二步的政權能不能進而完成第二步本身的革命任務，取決於各種條件，特別是世界革命的進程。⁴⁷

兩派之間的爭論從蘇聯延燒回中國，引起中共黨內的分裂以及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論戰參與者有主流派、反對派，以及國民黨左派；但主要是前兩者。論戰的焦點是所謂的「社會性質」問題。當時所謂的「社會性質」，大致可從馬克思所曾提到的兩組關係來理解：第一組是「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關係，第二組則是「生產方式」與「社會形態」之間的關係。馬克思是這樣說的：⁴⁸

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

⁴⁶ 斯大林一派的主要觀點可參見斯大林（1972）的系列論文。

⁴⁷ 反對派的論述非常多，除了托洛茨基本人及其追隨者（特別是中國托派，如鄭超麟、王凡西、彭述之）的系列著作之外，還可參見國際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主義者）（1997）的簡要回顧。

⁴⁸ 馬克思（1962: 8-9）。

演進的幾個時代。

艾蒂安·巴里巴爾 (Étienne Balibar, 1942-) 指出：(1) 馬克思的「社會形態」有時與「生產方式」有關，「具體的社會形態通常包含著若干不同的生產方式」；⁴⁹ (2) 「社會形態」有時則被用於一種具體分析的對象 (如「1860 年的英國」)；(3) 在某些馬克思主義文獻中，「社會形態同它的經濟基礎 (經濟基礎本身往往是同某種生產方式聯繫著的) 經常混為一談。」⁵⁰

巴里巴爾所指陳的混亂性，在「中國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中也能看到：有時「社會性質」相當於「生產方式／社會形態」框架下的「社會形態」，有時則相當於「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框架下的「經濟基礎」。因此「社會性質」同時具有「經濟基礎」與「社會形態」的意涵。

「社會性質」之所以成為論證「一步到位」或「分幾步走」的論據，與主流派、「生產方式／社會形態」框架有密切關係。當時的與論者侯外廬 (1903-1987) 指出：⁵¹

社會史論戰的幾個主要問題，都涉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方法論，而首先是關於生產方式 (當時我稱為「生產方法」) 的理論。如對怎樣了解社會性質，或者說，究竟什麼是決定社會性質的根本原因，當時不少論者的認識很膚淺，甚至很混亂。其中有「技術決定論」，也有「剝削關係決定論」，在論及當時中國社會性質時，還有「流通、商業資本決定論」，……這些錯誤觀點，在今天看來，都是常識問題，但在 30 年代，在馬克思主義不能合法宣傳和普及的條件下，它們是多少能迷惑人的。

在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當中，雖然一般都認為生產方式是決定社會性質的根本因素，但對生產方式本身如何理解，並沒有統一的認識，有些人的解釋，據我看來，多少偏離了馬克思的原意。

⁴⁹ 這意味著「生產方式」與「社會形態」是不同抽象水平的範疇，「生產方式」比較抽象。「具體的社會形態概念是按照從最抽象的概念不斷向較低抽象的概念的推演 (succession)，直到具體的社會形態概念形成為止的程序產生的。」(Ben Fine, 1993: 14) 「抽象」與「具體」的關係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大問題，其經典闡述可見蘇聯學者伊林柯夫 (Ильенков, 1993) 的說明。

⁵⁰ Balibar (2001: 253)。

⁵¹ 侯外廬 (2007: 255-256)。侯外廬是社會性質等論戰中非常強調「生產方式」範疇的學者。

對於主流派來說，存在於中國範圍內的**各種生產方式**⁵²各有相應的階級對立，⁵³因此分析各種生產方式本身及其之間的關係，能夠探知中國各階級的力量對比與經濟利害。以此為基礎，便能決定工人階級應該同誰合作、以誰為敵，進而決定革命是否「分幾步走」。就反對派而言，其實未必需要以「社會性質」作為「一步到位」的論據，因為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支配以及中國在其中的地位可能更有利於論證「一步到位」。⁵⁴但因為主流派積極討論這方面的問題，才引起反對派的積極參與。總之，如德里克所言：主流派與反對派雙方「得出了共同的結論：中國的分析並非存在於國家與社會之間，而是在社會內部——在存在著敵對利益的社會各階級之間。」⁵⁵

雖然「生產方式／社會形態」框架與「一步到位」或「分幾步走」的爭議有密切關係。但「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框架並未因此而被忽視，甚至可能更重要。雖然該框架的基本原理是上層建築適應於經濟基礎，但因百年來的中國國際地位的低落，上層建築反而成為帝國主義勢力影響中國經濟基礎的媒介。國民黨左派特別重視這個框架。因為他們強調中國的經濟基礎沒有主流派或反對派所說的那些問題，問題出在與帝國主義勾結的上層建築，因此需要來一場推翻上層建築的政治革命。⁵⁶

雖然這三次論戰使「社會性質」的兩種分析框架基本成形，但全面從兩種框架說明「社會性質」與「革命性質」的論述，還要更晚才出現。此即一九四〇年代初形成的「新民主主義論」。

⁵² 比方侯外廬（1987: 23-24）認為：「有趣味的是，《資本論》裡用資本主義這一範疇甚少見，而做形容詞用的是取 capitalist，如資本家的社會，資本家的生產，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社會，就是因為資本主義是按一個諸制度並存的構成看待。我們在《資本論》第一章中曾見有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絕沒有資本主義之生產方法。」所以，capitalist 只能譯為資本家的，……譯為資本制的，實在是誤解，即譯為資本主義的，或資本主義制的亦甚不當。因此，如《資本論》貫首語，Society in which capitalist more (mode) of production prevails，其中 in which 二字必須用『所居以』表示出來，因為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和別的生产方法都在這一社會，而前者則是居於主導的地位，亦猶之乎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方法亦有多種，而只有一個生產方法主導著發展。」

⁵³ 比方「封建」生產方式常被視為蘊含著「地主／佃農」之間的對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則蘊涵著「資產階級／工人階級」之間的對立；此外，在華外國資本的存在則被認為可能使資產階級本身依附之（被稱為「買辦資產階級」）或對抗之（被稱為「民族資產階級」）。

⁵⁴ 可參見當時的反對派鄭超麟針對其同志尹寬在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中的論述而作的評論（鄭超麟，2004a: 448-451）。

⁵⁵ Dirlik（2005a: 68）。

⁵⁶ Dirlik（2005a: 68）。

「中國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與中共所逐漸取得的實踐經驗與獨立地位，為共產國際戰略的中國化創造了條件。一九四〇年代初期形成的「新民主主義論」就是中國化的具體成果。「新民主主義論」的綱領性文獻以毛澤東（1893-1976）所撰寫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以及〈新民主主義論〉為代表。毛澤東說：「只有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才能認清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和）轉變。所以，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⁵⁷

「新民主主義論」有鉅觀與微觀兩個層次的架構。其鉅觀架構主要是從歷史階段論的角度說明中國本身的歷史發展與入侵中國的外國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微觀架構則是從階級的角度說明中國國內的階級關係、說明誰是工人階級的敵人、誰是工人階級的朋友。

先來談鉅觀架構。

前述三次論戰確立了一種規範認識，論爭中的各派都承認中國存在著一個「封建」生產方式佔支配地位的時代，問題只在於上下限。⁵⁸以這種規範認識為基礎，「新民主主義論」分別從「生產方式／社會形態」與「上層建築／經濟基礎」兩方面分析了中國「社會性質」問題：

- (1) 從「生產方式／社會形態（＝「社會性質」）」來看：中國「社會性質」在鴉片戰爭之後仍以「封建」生產方式佔支配地位，雖然外國的侵略開始瓦解這種支配地位，但並不能完全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而代之。因此中國「社會性質」便陷於封建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彼此僵持（乃至前者佔優勢）的「半封建」狀態中。
- (2) 從「上層建築／經濟基礎（＝「社會性質」）」來看：

甲、首先，中國的「社會性質」決定上層建築的性質。「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於

⁵⁷ 毛澤東（1971b: 111-112）。引文中的補字，乃《毛澤東選集》所收版本加上的。

⁵⁸ 關於這方面的學術史，其開創性研究當屬李根蟠（2004: 146-172）。近年由於馮天瑜（2007）一書批判歷史學領域中的「封建」範式，引起了李根蟠、林甘泉等人的大力反批判。相關論辯文章已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2008）。

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而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文化與和政治經濟的關係及政治與經濟關係的基本觀點。」⁵⁹

乙、其次，如果中國在外國侵略中完全失去自己的上層建築，就成為「殖民地」；但中國畢竟維持著自己的上層建築，因此被稱為「半殖民地」。「新民主主義論」藉由「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來說明中國「社會性質」的「半封建」化並非中國本身自然所致，而是外力介入的後果。

為了凸顯中國「社會性質」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條件下走向「半封建」，「新民主主義論」做出如下規定：（1）鴉片戰爭後的中國「社會性質」被規定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不僅僅是「半封建社會」。（2）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淪陷成為「殖民地」，因此包含東北在內的中國「社會性質」就成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仍然不僅僅是「半封建社會」。⁶⁰

由於「新民主主義論」強調「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對於中國「社會性質」的影響，因此該論所謂的「半封建」不能理解為「半資本主義」的另外一半，而必須理解為一種畸形存在的「封建」。⁶¹按「新民主主義論」的邏輯，「半資本主義」理應由民族資本所構成；外國資本不被承認為「半資本主義」的一部分。但由於外國資本極大打壓了民族資本的發展，就導致了「半資本主義」不存在，從而也不可能成為「半封建」的另一半。總之，「新民主主義論」中的「半封建」不等於「半資本主義」。

再來看微觀架構。

⁵⁹ 毛澤東（1971b: 149）。本段在《毛澤東選集》中的修改較大：「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這是我們對於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係及政治和經濟的關係的基本觀點。」（毛澤東，1967b: 624）

⁶⁰ 毛澤東（1971a: 150; 1971b: 103-110）。

⁶¹ 關於「半封建」實際上被理解為「封建」，可見奧村哲（2004: 24），並請參考中村哲（2002: 49-52）。關於「半殖民地」與「半封建」連用的歷史，學者一般認為以蔡和森（1982: 12）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為始，故有「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國」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之語。固然詞語的提出並不代表概念的形，但「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早在1924年就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況」一語說明中國的處境（李漢石〔李伯剛〕，1926: 217），這點值得進一步探索。近年來的相關討論見陳金龍（1996）、陶季邑（1998）、張慶海（1998）。

如何認識「封建」生產方式內部的階級對立，是「新民主主義論」微觀架構得以成立的前提。在學術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王亞南（1901-1969）首先按時間先後把三次論戰中成為共識的「封建」時代再細分為「封建領主制」與「封建地主制」的兩個時期，並且把「地主／佃農」關係視第二個時期內的主要階級對立。⁶²

「新民主主義論」對於封建生產方式的理解也是「地佃關係」，並認為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始終存在「封建」生產方式。因此「新民主主義論」提出了如下的階級分析：地主階級是應當打倒的敵人，農民階級則是應該團結的朋友。雖然中國也存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但因為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打壓了企圖發展資本主義的一部分資產階級，因此資產階級也不應全部視為敵人，而應該爭取這部份試圖發展民族經濟的資產階級，也就是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雖然農民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必須透過私有制來維護其利益，但他們都是工人階級可以爭取的盟友，因此工人階級必須把以消滅私有制為內容的社會主義革命做為革命的第二步，而第一步必須採用足以促使各階級步調一致的要求，即民主主義革命。又由於資產階級孱弱，因此不可能期待資產階級來領導曾經在西歐實現的民主主義革命，必須由工人階級來領導。而工人階級所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就是毛澤東所命名的「新民主主義革命」。⁶³

⁶² 王亞南的「封建地主制」理論在 1949 年後得到胡如雷（1979）等學者的體系性的發展。李根蟠（1997: 125-129）近年則進一步指出，「封建地主制」理論得以成立的關鍵並不在於「地佃關係」所佔比例是否夠多，而在於「地佃關係」是否或如何成為其他階級對立的轉化媒介。比方自耕農雖然與地主沒有直接關係，而與國家相對立。但自耕農卻可能因為破產而下降為佃農，或者因為兼併他人土地而上升為擁有佃農的地主。以中村哲（1997）為代表的日本「中國史研究會」則反對把「地佃關係」視為本質性的存在，而主張視之為「國家／自耕農」之關係的擬制。故有「中間性地主制」之說。換言之，該研究會認為國家與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自耕農之間有生產關係。並請參考王德權（2003）的回顧。

⁶³ 關於毛澤東的論述，還可參考汪暉（2008: 28）的看法：「毛澤東是在一種全球性的、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關係中闡述中國革命與階級政治的動力與方向。離開這一世界性的視野，中國革命者很難將農民置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主體地位之上；離開這一獨特的對於中國社會性質的概括，毛澤東也不可能清晰界定國際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民族資產階級（城鄉資本的生產關係）、小資產階級（自耕農、手工業者主和小知識階層）、半無產階級……等等範疇。正是以這樣一種歷史判斷為前提，……毛澤東將馬克思式的結構式的階級分析方法（以租佃與僱傭為主線）運用到中國農村社會之中，並為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改革提供理論根據。」

3. 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論述與陳映真的研究業績

「社會性質」與「革命性質」也是二十世紀台灣不斷出現並被爭論的問題。但既有研究對於這方面的關注很少，甚至在理解上存在很大的偏差。既有研究經常忽略或弄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與概念，導致史料經常缺乏正確解讀或選擇性使用。如果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研究有「困境」，則「困境」首先絕不在於史料不足，而在於如何重新正確理解大部分的既有史料——特別是理解保留在史料中的各種論述。

雖然德里克指出「革命論述」未必是「意識型態」的反映，甚至可能嫁接於其他意識型態。⁶⁴但「革命論述」總得先是一種論述。就像魯迅（1881-1936）說的：「革命之所以於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為它是文藝。」⁶⁵如果不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論述進行研究（並且進行符合歷史實際的研究），就將解消研究乃至歷史本身。

- （1）既有研究中，盧修一（1989）的考證與分析是迄今為止最好的台共史研究，然其全書卻沒有深究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所密集討論的「民主主義革命」論，反而把視角集中在僅佔綱領之一角的「台灣民族」論述。⁶⁶該問題的研究雖然非常重要，但在過分忽略「民主主義革命」論的狀況下，盧修一的側重顯然更直接反映他（乃至多數相關研究者）的關懷。
- （2）簡炯仁（1997）的研究則以錯誤百出的引文、考證，以及分析為特色。他花了很大的力氣去分析台共建黨大會的中共中央代表「彭榮」（簡炯仁謂之即彭湃）如何干涉台共綱領之制定。在他眼中，建黨大會實乃綱領草案（日共的渡邊政之輔制定）與綱領定稿（中共彭湃制定）之間的鬥爭，前者

⁶⁴ 關於「革命話語」與「意識型態」的區分見 Dirlík（2006: 36-38）。

⁶⁵ 魯迅（2005a: 85）。

⁶⁶ 關於「台灣民族」論的問題，可參見歷史當事人蘇新（1993b: 265-266）的說明。

強調工人領導，後者強調農民。而後者之所以強調農民，則是因為彭湃專攻農民運動。但問題是：彭榮是否為彭湃，尚有疑義。而從現存的台共建黨大會會議紀錄與相關回憶錄來看，中共中央代表也沒有改動多少日共幫台共所擬的草案。⁶⁷誠如若林正文所言：「彭榮的批評並不重要，是以將該『大綱』草案和大會所採行大綱視為同一內容而加以討論是沒有問題的。」⁶⁸至於農民領導或工人領導，則完全是人工編造出來的矛盾，關鍵是徹底誤讀了台共綱領。共產國際指導下所成立的共產黨或延續其傳統的各種左翼組織，無論多麼重視農民的作用，都不可能否定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而共產黨是作為工人階級（而非所有階級）的先鋒隊而出現的。簡氏全書無視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常識而嚴重曲解史料。

- (3) 陳芳明（1998）的問題與簡炯仁同。陳芳明詮釋台共論述時出現的關鍵錯誤就是誤解台共所規定的革命性質。陳芳明認為台共當時面臨所謂「殖民地革命／階級革命」兩種革命性質的選擇，並稱台共主張前者，而中共則企圖干涉台共接受後者。但眾所皆知，國際共運在一九二〇年代所產生的分裂，是兩方面的對立：一方面是以「工農民主專政」為目標的「民主主義革命」，另一方面則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目標的「社會主義革命」，不是「殖民地革命」對「階級革命」。⁶⁹台共「一九二七年綱領」規定台灣必須進行以「國民革命」為代名詞的「民主主義革命」，台共「一九三一年綱領」重申這一革命性質。此外，從台共支配下的《新台灣大眾時報》嚴厲批判「階級鬥爭」口號為「觀念論」（=唯心主義），⁷⁰就能看出台共（特別是陳芳明所謂中共干涉後的台共時期）反對直接進行「階級革命」。更重要的是，無論台共、中共、或日共都成長於共產國際之下，因此他們對於民主主義革命的規定**沒有也不可能**有疑義，忽視這一基本歷史事實便顯示了該研究對於「左翼」

⁶⁷ 〈台灣共產黨成立大會紀錄〉（山辺健太郎，1971：245-256）、謝雪紅（2004：261-266）。

⁶⁸ 若林正文（2007：322）。

⁶⁹ 相關批判可見許南村〔陳映真〕（2002）所編論文集。

⁷⁰ 新台灣大眾時報（1931：20-21）。

或社會主義的理解偏差太多。

相較於上述研究所出現的偏差，陳映真以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論述為對象的研究業績則相對正確而豐碩。以他在 1992 年發表的〈台灣現代文學思潮之演變〉⁷¹與〈李友邦的殖民地台灣社會性質論與台共兩個綱領同邊陲部資本主義社會構造體論之比較考察〉⁷²為起點，「以感謝與驚異之心親炙前人在台灣社會構造理論上的建樹」⁷³的陳映真，陸續發掘出台灣過去的「社會性質」論。

「台灣馬克思主義者，以馬克思的知識思想體系，寫成理論文章，成為台灣馬克思主義文獻的並不很多，但也還是不少。」⁷⁴陳映真發現到：台灣在兩岸分斷之前已有許多仁人志士為了推動社會變革而產生了許多有「社會性質」之實質的論述，並不是只有他自己對台灣各歷史階段的「社會性質」感到興趣。而且這些兩岸分斷之前所形成的論述——如同大陸上形成的「社會性質」論那樣——都認為台灣是「半封建社會」，並且從「半封建社會」得出台灣應當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的結論。按歷史事件的時序來排，陳映真陸續探討了以下各時代的「社會性質」論：1926 至 1927 年的中國改造論爭；⁷⁵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一九三一年綱領」與 1940 年代的李友邦論述；⁷⁶1949 年《台灣新生報》「橋」副刊的羅鐵英論述；⁷⁷1949 年蘇新的台灣革命論。⁷⁸如此等等。⁷⁹

由於上述論述都以「半封建社會」論與「民主主義革命」論為內容，因此陳映真經常將這些論述類比於中共的「新民主主義論」。陳映真的類比未必全然合宜，但有一定道理。因為「新民主主義論」曾經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一段時期內的主流見解——首先是戰後五年間的島內運動，其次是一九七〇年代的海外運動——因此有可能藉以把握一定時段內的運動發展。即便是在「新民主主義論」尚未影響台灣的時期，台灣的部份運動（如台灣共產黨）也因共產國際

⁷¹ 陳映真（1992b）。

⁷² 本文原為陳映真在 1992 年李友邦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發表的論文。正式發表時名稱略微修正（陳映真，2003）。

⁷³ 陳映真（2003: 48）。

⁷⁴ 陳映真（2002a: 1-2）。

⁷⁵ 陳映真（2002a）。

⁷⁶ 陳映真（2003）。

⁷⁷ 石家駒〔陳映真〕（1999）、卓言若〔陳映真〕（1999）。

⁷⁸ 陳映真（2002c）。

⁷⁹ 通論性的介紹還可見陳映真（2002a）。

的關係而主張「民主主義革命」。總體來看，雖然島內屢屢出現運動斷層，「民主主義革命」論從未中絕。因此，包含「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內的「民主主義革命」，可謂二十世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線索。甚至可以說，以「民主主義革命」論為綱領的時期，形成了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二十世紀。

雖然「民主主義革命」論在台灣的發展同樣需要「上層建築／經濟基礎」與「生產方式／社會形態」兩種框架，但前一框架可能突出得多，是後一框架的框架。這至少有兩個原因：

- (1) 百年來矗立在台灣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並不是經濟基礎本身的產物，而始終是從外界延伸、遷入，乃至突然被拔除的存在，因此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關係的看法，不見得能直接套用。⁸⁰如陳映真所指出的：「殖民地的政治的上層建築，例如台灣總督府，是比較先進的、獨佔資本主義階段日本國家的下部機關。它和比較落後、複雜的台灣殖民地土著社會的生產關係即下層建築，並沒有，或者沒有完全的對應關係。如果一個社會的社會構造體或社會形態，是『受到一定生產力制約的經濟基礎（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統一』；是『社會的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的接合體』，如何看待這種殖民地社會上下部構造間重大的杆格？」⁸¹
- (2) 又由於「上層建築」始終外來而且不是「民主主義」的存在，因此外來的「上層建築」本身不難構成對立面。加上某些階級必然依附於這個對立面，某些階級也必然因為這個對立面而團結起來，「民主主義革命」論就有引入其中的可能。

如陳映真所言：「怎樣評價殖民地社會中由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帶來的資本主義在生產關係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殖民地社會論的爭點之一。」⁸²從後見之明

⁸⁰ 但必須說明一點：雖然本研究試圖用「經濟基礎／上層建築」這個最簡明的範疇來把握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及出現於其中的論述，卻不是說歷史上出現過的這些論述必然明確區分了「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實際上，本研究也不是要強調這種區分、不是要強調兩者之間是否可以類比為社會與國家的對立。相反的是：本研究希望能透過這種區分來說明「經濟基礎／上層建築」之間的聯繫，或者只有在這兩者之間才能得到較好說明的問題（比方「官僚資本」）。

⁸¹ 陳映真（2003: 51-52）。

⁸² 陳映真（2003: 53）。

的角度來看，「上層建築」能否（或是否）為「經濟基礎」創造足夠條件，⁸³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持續替代**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而使台灣的「社會形態」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支配，始終是潛藏在二十世紀台灣社會主義論述背後的問題意識。無論這個歷史上實存的問題意識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這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意識應可成為分析台灣社會主義論述發展的一個方法。

第二節之一、在「半封建社會」論中 通向「新民主主義革命」（1920s-1940s）

1. 殖民時期的「持續替代」肯定論：矢內原忠雄與山川均

就研究史來說，不加批判地把「資本主義化」當成發展的指標，或者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持續替代**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趨勢（「資本主義化」），是首先在台灣發展起來的看法。1926年山川均（1880-1958）所寫下的〈弱小民族的悲哀——「一視同仁」「內地延長主義」「醇化融合政策」之下的台灣〉（又名〈殖民政策下的台灣〉）⁸⁴以及1929年矢內原忠雄（1893-1961）所出版的《帝國主義下的

⁸³ 比方土地改革或引進外資，等等。

⁸⁴ 山川均原以〈弱小民族の悲哀——「一視同仁」「內地延長主義」「醇化融合政策」の下に於ける台灣〉為題發表於1926年的《改造》5月號。同年12月以《植民政策下の台灣》為名，發表增補後的單行本，後者收錄於山川均（1976c: 285-291）。1926至1930年間山川的論文曾經三次漢譯。第一次漢譯是1926年《台灣民報》的張我軍譯本，題名〈弱小民族的悲哀：在「一視同仁」「內地延長主義」「同化融合政策」下的台灣〉（山川均，1926a, b, c, d, e, f, g, h, i, j）。第二次漢譯則是1926年廣州《民國日報》的李繼煌譯本，題名〈嗚呼台灣的民眾〉（山川均，1926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α, β, γ）。第三次漢譯則是1930年北平《新東方》的宋斐如（筆名蕉農、宋蕉農）譯本，題名〈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山川均，1930b, c），同年出版單行本《台灣民眾的悲哀》。此外，台灣大學圖書館還藏有自《新東方》剪貼而來的合訂本，仍題名《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

台灣》，⁸⁵大概就稱得上是這種典範性研究。

這兩篇著作認為，在日本國家的支持下，日本資本（主要是糖業資本）在島內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持續替代」。在山川來說，他認為當時的台灣正處於馬克思《資本論》所說的——為了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以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消滅對象，使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原始積累」階段（其稱為「原始蓄積／げんしちくせき」）。在國家與資本的合作下，台灣也出現了原始積累。其具體表現就是土地的集中與階級的分化。矢內原也認為台灣出現過「原始積累」（其稱為「本原的資本蓄積／ほんげんてきしほんちくせき」），但他的分析還及於《資本論》所描述的其他現象。矢內原特別重視各日本資本之間的互相兼併，此即不同於「資本積聚」（concentration of capital）的「資本集中」（centralization of capital）。以此為線索，他勾勒出這樣的發展過程：日本資本從流通領域（商業資本）進入生產領域（產業資本），在生產領域之中因為「資本集中」而走向壟斷，與銀行資本相結合（從而變成金融資本），甚至進行不同於商品輸出的資本輸出，如此等等。由於他認為他所勾勒出來的這條日本糖業壟斷資本的發展過程相符於列寧所定義的「帝國主義」，定義的現象，因此他稱之為「糖業帝國主義」，⁸⁶而上述整個過程就是他所謂的台灣「資本主義化」。

就用語來說，「資本主義『化』」應當是描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的消長，比方前者對後者的持續替代。但矢內原實際上花了更多的篇幅在描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階段性發展（比方從自由競爭走向資本集中及壟斷），並稱這種實際上已經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內的變化為「資本主義『化』」。誠如劉進慶（1931-2005）所云：矢內原所謂的「資本主義化」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概念、是一種「資本主義化萬能論」。⁸⁷與劉進慶同期的學者涂照彥（1936-2007）則指出：矢內原意圖描繪一種日本資本可以在侵入台灣之後便獨立發展的過程，從而刻意忽略了島內日本資本的發展在每一個階段上都與島外日本資本的發展階段有關，並把日本資本（企業本身）的發展等同於台灣經濟基

⁸⁵ 矢內原忠雄（1929）。

⁸⁶ 矢內原雖然強調日本國家襄助了日本資本的在台發展，但他由此挾出的「帝國主義」卻刻意略去日本這個國家，因此他才會說出「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不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以及「糖業帝國主義」（不是日本帝國主義）之類的话（柯志明，2006: 3）。

⁸⁷ 劉進慶（1970: 37）。

礎的全盤資本主義化，然而島內的日本資本「絕不是其本身具有獨自一套的歷史性發展形態」。⁸⁸涂照彥的言下之意是：**如果抽掉了日本資本，矢內原所勾勒的獨立發展過程是很難想像的。**

簡而言之，涂照彥認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並沒有完全實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持續替代」，至多只是部分替代。他認為必須重視不同於日本資本的本土經濟實力者的存在（其稱為「土著資本」），並必須關注日本資本與本土經濟實力者之間的關係。涂照彥所關注的實力者並不依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存在，而是依賴於他所說的「地主制」（以「地主／佃農」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生產方式）。

弔詭的是，肯定「持續替代」的山川與矢內原其實在他們的論述中，留下許多反映「持續替代」有其限制的線索：

實例一：以山川來說，雖然他想論證日本資本促使農村發生階級分化，但他的論證集中於農民在「自耕農」、「自耕農兼佃農」、「佃農」之間的對比變化（並得出「佃農」愈發增加的結論），⁸⁹而不是去論證農民是否因為日本資本的關係而破產為農業僱傭勞動者（「無產階級化」）以及某些農民僱傭了這些破產農民而成為富農的「分化」過程，似乎意味著這種「分化」無法在台灣の場合裡被考察。⁹⁰雖然山川緊接著就把「自耕農／佃農」之間的對比變化聯繫於「農村的地主和無產農民兩者的階級分化」，⁹¹但「無產農民」一語並不能簡單理解為處在僱傭關係之下的農業無產階級。因為「無產」二字在一九二〇年代日本社會運動的語境內，指涉的對象非常廣泛，因此有「無產市民」、「無產農民」、「無產大眾」、「無產勞動者」之類的用語。簡單來說，「無產」二字在當時著重於表述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卻不直接等於兩者之間會重新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僱傭關係）下結合起來。⁹²當然山川也可能是確信兩者之間可以產生聯繫，比方台灣的「佃農」可能就是將來的「無產階級」或將強烈帶有「無產階級」性

⁸⁸ 涂照彥（1999: 536）。

⁸⁹ 關於租佃關係如何反映資本所帶來的「生產者與生產資料之間的分離」以及尾隨而來的階級分化，可見列寧（1949: 62-71）的見解。

⁹⁰ 就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果來說，農業中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分化確實沒有大量出現。

⁹¹ 山川均（1976c: 263-264），中譯見山川均（1930a: 12-13）。

⁹² 相關討論請見邱士杰（2009a）。

質。

實例二：原來在馬克思的想法裡「只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的「原始積累」，在矢內原與山川的場合裡卻僅僅是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收奪（主要是土地）；他們並不交代這個收奪的結果是否確實創造了在僱傭勞動生產關係之下同生產資料重新結合的工人階級。⁹³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的「勞／資」關係並未因此而廣泛出現，反而前資本主義的地主階級以及佃農廣泛存在著。但矢內原為了迴避這一事實，竟以「中產階級」稱呼地主階級。

總結來說，由於山川並不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持續替代」已經在台灣完成，而是肯定「持續替代」的趨勢本身。因此，縱使其論述不斷暗示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存在，論述也不必然會出現破綻。就此而言，山川的論述比認為「持續替代」已在台灣完全實現的矢內原包容了更多可能。在山川來說，以資本收奪土地為內容的原始積累仍在進行。矢內原則認為已經基本結束，並認為台灣的全盤資本主義化導致土地的強制收奪不需要也不可能。⁹⁴矢內原顯然是認為台灣的原始積累已經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確立。這也許正是矢內原更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規律——特別是資本集中與壟斷——的理論前提。

2.從「持續替代」肯定論到否定論：王學文、許乃昌、台共

從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之內的最終結果來看，台灣確實如涂照彥所說的並未全盤資本主義化。真正的結果是多種生產方式的並存，也就是有限的「持續替

⁹³ 就馬克思自己而言，雖然原始積累不過是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但他並不認為「分離」必然構成「原始積累」，比方「羅馬的無產者並沒有變成僱傭工人，卻成為無所事事的游民」。這是因為「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在更後來的場合裡，馬克思甚至強調足以構成原始積累的「分離」只「限於西歐各國」（馬克思，1995: 342, 761）。

⁹⁴ 但土地收奪之所以不可能，並不必然與台灣的全盤資本主義化有關，而可能與「現代」土地所有制度的確立有關（柯志明，2006: 40-51, 230-231）。

代」。因此，認為當時的台灣尚在進行原始積累的山川顯然比矢內原更貼近現實，因為原始積累畢竟是一個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關係為基礎的範疇。

與山川、矢內原同時代的社會主義者們正意識到了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存在。日後知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王學文（1895-1985，中共黨員）在他放棄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的博士學位之後，為了與台灣農民運動家楊春松（1899-1962）會合，而到台灣待上一年（1927年至1928年間）。返回大陸之後，王學文旋於1928年底至翌年初發表了關於台灣殖民地經濟的論文：〈日本帝國主義治下的台灣——殖民地台灣之經濟的意義〉。⁹⁵這篇論文非常特別。因為這篇是目前僅見以羅莎·盧森堡（Róża Luksemburg，1870-1919）的「資本積累論」為基礎的研究。無論在當時或日後的大陸或台灣，均是如此。

盧森堡認為，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部類（即第I部類）與生活資料部類（即第II部類）之間不可能互相完成擴大再生產，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沒有獨自存在並發展的可能性。她認為，必須依靠第三者——前資本主義環境——的廣泛存在，才能使兩部類得以交換。侵蝕前資本主義環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條件，當這個條件消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就在地球上走向滅亡。

也因此，雖然馬克思的「原始積累」與盧森堡的理論都重視兩種生產方式之間的消長以及隨之而來的「生產者與生產資料之間的分離」，但馬克思重視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不斷出現的「分離」如何有一個開端並形成一條獨立發展的過程，盧森堡卻重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於不能獨立發展所以必須侵蝕前資本主義地區。⁹⁶雖然矢內原完全清楚盧森堡理論，⁹⁷但他畢竟沒有選擇盧

⁹⁵ 汪鐵峰（王學文）（1929a, b）。

⁹⁶ 如何理解「原始積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的關係是很有意思的問題，而這個問題甚至還牽涉到如何理解馬克思原來的想法。盧森堡認為馬克思的「原始積累」是《資本論》中唯一牽涉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前資本主義之關係的範疇，並認為馬克思主要關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因此「原始積累」對於馬克思而言就只是一個「偶然發生的、僅僅在於描繪資本的創世紀在世界上的首次出現」，同時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封建社會中出現時的「分娩」（Luxemburg, 2004: 345）。盧森堡的詮釋意在指出「資本主義／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的關係——如「原始積累」——並不是最早發生而且已然結束的事情，而是始終與馬克思所理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時存在的事情。對於盧森堡的理解，羅曼·羅斯多爾斯基（Roman Rosdolsky）批判地指出，馬克思並不像盧森堡所說的那樣，把原始積累當成一個歷史枝節或者置於「經濟分析主題範圍之外」，因為原始積累的關鍵是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而這種分離可以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得到保持、再

森堡的方式來說明日本資本如何使前資本主義的台灣「全盤資本主義化」。然而依托於盧森堡理論的王學文卻由此抉出了一種能夠考慮前資本主義存在的「持續替代」肯定論。

發表〈日本帝國主義治下的台灣——殖民地台灣之經濟的意義〉之後，王學文馬上以〈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前途〉一文參與並發起了中國社會性質論戰。該篇文章把「封建的（半封建的）經濟關係，剝削方式和其他阻礙資本主義發展之封建的束縛」的「依然存在」，⁹⁸作為著重論證的問題。

王學文在中國社會性質論戰所提出的「半封建社會」論，乃是一種「持續替代」否定論。雖然他對大陸的分析不同於他對台灣的分析，這種不同卻未必是矛盾。因為他確實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為種種「封建束縛」而無法在大陸上發展，同時又認為台灣有發展的條件。⁹⁹

然而當時在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之內異軍突起的看法，正是王學文沒有用來說明台灣問題上的「持續替代」否定論。

首先是 1926 年至 1927 年間《台灣民報》上的「中國改造論爭」。該論爭由於社會主義者許乃昌（1907-1975?）對於陳逢源（1893-1982）一篇主張中國先發展資本主義實業的文章提出批評而挑起，並旋即引來蔡孝乾（1908-1982）、翁澤生（1903-1939）等人助戰。許乃昌認為當時的中國處於「帝國主義時代特殊的殖民地式中間型態」。其既「不是封建制度，也不是資本主義制度而且更不是普

生產，以及規模的擴大。所以「原始積累」包含在資本概念之中」（Rosdolsky, 1992: 307-308）雖然僅僅把「原始積累」理解為「資本主義／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範疇的盧森堡因此不合馬克思原意並且是錯的。但盧森堡把「原始積累」視為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共生共死之存在的觀點卻得到許多學者的沿用，比方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以此描述第三世界所遭剝削的根源（Amin, 1974），而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則由此另創「掠奪式積累」（accumulation of dispossession）之類似概念（Harvey, 2003）。

⁹⁷ 可參見矢內原忠雄（1963: 71-73, 180-181, 475-476）。矢內原在這些篇幅內反覆說明盧森堡如何把屬於「非資本主義的環境」的「階級」、「各國」、「殖民地市場」作為「資本主義的存續條件」。並明白指出「非資本主義」被「資本主義」完全消滅之時，資本主義就必然崩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決這種不可調和的矛盾。

⁹⁸ 王學文（1930: 抽印頁 25）。

⁹⁹ 實際上，在他發表以台灣為對象的研究之前，王學文就認為當時的中國「依然未能脫離半封建式的經濟階段，至於新興有產者所支配的資本家的經濟，在大的半封建經濟之中，不過只是形成一個小小的萌芽型態。」（王學文, 1986: 65）

通的封建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間的過渡期。」¹⁰⁰這種型態的內容是：¹⁰¹

一、因受外來的已成熟的資本主義的影響，在來的封建制才急激開始崩壞。

二、封建制度雖積極崩壞，但卻不能向資本制度發展。

三、外國資本主義壟斷了一切市場，政權也直接間接屬於外國帝國主義。……

許乃昌的觀點在 1928 年 4 月秘密建黨於上海的台灣共產黨那裡繼續發展。台共第一個綱領——「一九二八年綱領」——指出，由於「統治台灣的日本帝國主義本身也遺留不少封建殘物，而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唯有依賴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是故，現在的台灣事實上尚殘存著甚多的封建遺物。」而「高度的〔日本〕資本集中與落後幼稚的〔本土〕資本部分以及〔本土〕非資本主義經濟之間，存在一種根本難於獲致解決的重要矛盾。這個矛盾即是台灣革命發展的主要動因。」¹⁰²

許乃昌與台共分別透過「持續替代」否定論導出了台灣或大陸應當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的結論。又由於中共推動「民主主義革命」的媒介，是國共合作之下席捲全國、撼動東亞的「國民革命」，因此許乃昌與台共也同時以大陸的「國民革命」來代稱台灣「民主主義革命」，並成為台灣在戰後正式併入中國革命的預示。

3. 半封建社會論：「持續替代」否定論與

「新民主主義論」的結合

台灣共產黨在 1931 年遭到日本總督府當局強力鎮壓而潰滅。成員或者流

¹⁰⁰ 許乃昌（1926a: 10）。

¹⁰¹ 許乃昌（1926b: 10）。

¹⁰²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c: 25-26）。

亡大陸，或者下獄乃至轉向。除了島外的運動接續部分外。¹⁰³此後十多年間，台灣島內進入社會運動整體無法發展的空窗期。1945 年台灣光復至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展開前的五年間則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再興期。這是由於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入島而重新活躍起來的五年，¹⁰⁴同時也是二十世紀海峽兩岸短暫的統一時期。

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束為存活下來的老一輩「運動者」(無論活在島內或島外)與新一代的青年「運動者」的集結與重新集結創造條件。但他們的集結基本上終究被吸納於台灣省工委之中或周圍。因此戰後五年間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整合在中共以全中國為範圍而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中。

隨著國共內戰在大陸上的展開，形勢為當時的台灣社會主義者提供一個從全中國的範圍思考「台灣解放」問題的機會。但他們沒有特別的理論建樹。可能的原因是：

- (1) 由於運動幾乎納入省工委的指導，因此中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論述成為當然方針。
- (2) 由於老一輩「運動者」在二〇年代已經從「持續替代」否定論發展出「民主主義革命」論，並透過大陸上的「國民革命」來理解該綱領。因此，他們可能較易接受同樣從大陸輸入、並且屬於「民主主義革命」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論述。
- (3) 由於這個時期的社會主義者大多直接投入實踐，甚至出現了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少見的大規模武裝鬥爭(從二二八中的武裝鬥爭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前夕形成於各地的武裝基地)，理論有否建樹遂成為次要問題。

雖然此時期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沒有特別的理論建樹，但台灣復歸中國之後所出現的種種問題仍需社會主義者來回答：如何理解海峽兩岸在台灣光復之前與之後的關係？如何理解光復給台灣帶來的變化？

1947 年至 1949 年之間在《台灣新生報》的文藝副刊《橋》(以下簡稱《橋》)

¹⁰³ 島外「接續期」過程的研究可見林書揚(2001)，當時的理論建樹則可參見陳映真(2003)以李友邦當時的「殖民地台灣社會性質論」為對象而提出的分析。

¹⁰⁴ 或者還可以這樣看：藍博洲以光復後最早返台的中共台籍幹部張志忠(1910-1954，嘉義新港人)的返台與死亡為線索，指出一個「長達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鬥爭史」(藍博洲, 2007: 157)。

副刊)所發生的台灣文學論爭討論了這個問題。由「歐陽明」所引起的論爭涉及了非常多問題。其中有兩個問題是由如何評價兩岸過去與現在的「社會性質」而展開的：第一個問題是**五四運動是否仍有現實的學習意義**，第二個問題則是**台灣新文學與中國新文學之關係**。

- (1) 第一個問題的爭論點是「五四」以來的中國「社會性質」是否發生變化：有輿論者認為，由於五四運動之後的中國「社會性質」發生變化，因此「五四」已然過時，不值得學習。但另一名輿論者孫達人則指出，自五四運動迄今，中國的「社會性質」並沒有改變：「『學習五四』這個口號之提出，其主要意義就在於三十年來中國的社會背景未變，所以文藝工作者仍應根據『五四』的精神，繼續為反帝反封建而努力，因此決〔絕〕不能認為是倒退」。¹⁰⁵
- (2) 第二個問題的爭論點則是台灣「社會性質」是否因為光復而改變。筆名「駱駝英」的羅鐵英(1917-1985)認為：光復之前的台灣與大陸分別為「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但兩岸都受到外在的帝國主義與內在的封建主義的二重壓迫。光復之後的台灣從「殖民地」變成「半殖民地」，而二重壓迫仍然存在。¹⁰⁶顯然，羅鐵英以1945年上層建築的轉移做為台灣從「殖民地」變成「半殖民地」的論據，實乃沿用了「新民主主義論」套用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上的邏輯。

由於羅鐵英挾出台灣「社會性質」的媒介是文學問題，因此畢竟是隱晦的論述。但對流亡至香港的台灣社會主義者蘇新(1907-1981)來說，就沒有這層顧忌了。1948年至1949年間，蘇新分別在〈台灣人民之出路〉以及〈談台灣解放問題〉二文中指出：

- (1) **第一點：「半封建」是台灣「社會性質」的本質屬性；「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則是外爍屬性。**蘇新指出：「台灣的社會性質，雖然有某些程度之差，但基本上還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這點與中國其他任何省份都沒有差別。」但是，「尤其是在目前，由於反動派賣國

¹⁰⁵ 孫達人(1999: 106-107)。

¹⁰⁶ 駱駝英〔羅鐵英〕(1999: 169-184)。

政府的出賣，台灣殖民地化的危機日趨嚴重。」¹⁰⁷

- (2) **第二點：在第一點的前提下，就算把國民黨政權從台灣島上趕走並且另立政權，該政權的性質也不可能克服「半殖民地」與「半封建」這兩種屬性。**蘇新指出：「這種『台灣獨立政府』，假如能夠實現（事實上是絕不能實現的），這個政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是無法拂拭的。因此，這條道路也只能造成台灣資產階級及地主階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權，起來代替蔣政權而已，而這一派『分離運動份子』的企圖也正是這一點。」¹⁰⁸
- (3) **第三點：資本主義只能附屬於前述外爍屬性才能存在，無法替代「半封建」而成為「社會性質」的本質屬性。**蘇新指出：「由於經過日本五十年的經營，在台灣資本主義確有某些程度的發展，但本質上是依靠日本本國的『殖民地經濟』，沒有獨立性，而且也不是正常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不能因為在台灣資本主義有某些程度的發展，就以為台灣的基本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台灣收復後，從前日本的資本主義企業和土地都成了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而表面上雖然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控制著台灣全體的經濟命脈，但這些官僚資本之中，美帝資本佔了一大部分。……目前賣國政府離開了美帝資本，無論任何小事業都建設不來。」「在『土地經營』方面，大部分仍然是小規模的舊式農業，封建剝削制度還是普遍存在著。」¹⁰⁹

從「新民主主義論」開展出來的上述觀點把台灣光復視為變（從「殖民地」變成「半殖民地」）與不變（「半封建」社會）之綜合。但上述觀點在後來的運動發展中發生分化。以學者劉進慶和作家陳映真為代表的台灣社會主義者繼續發展這項觀點，史明（1918-）及其後續者則持恰好相反的觀點：

- (1) 劉進慶與陳映真認為：台灣的經濟基礎沒有變化（即所稱之「社會性質」仍是「半封建」），但上層建築改變。雖然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是「半封建」性質，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卻從「民族之間」復歸

¹⁰⁷ 蘇新（2002: 2）。並可參閱林書揚、陳映真、曾健民在同期《左翼》對於蘇新這篇文章的評述。

¹⁰⁸ 邱平田〔蘇新〕（1993: 231）。

¹⁰⁹ 蘇新（2002: 3-4）。

為「民族之內」，也就是從「殖民地」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基礎無法在日本總督府上層建築移除之後，為資本主義在台灣的發展提供持續替代的動力。¹¹⁰

- (2) 史明的觀點則恰恰相反：他認為台灣仍由「異」民族所支配，因此仍為「殖民地」。而史明甚至認為：由於「半封建」的國民黨政權落後於日本殖民統治下「資本主義化」(甚至重工業化)的台灣社會。所以接收台灣的落後上層建築破壞了台灣相對進步的經濟基礎，¹¹¹「迫使台灣一下子倒退到相近清朝末期封建的『資本原始積蓄階段』的社會狀態去」。¹¹²

雖然兩派對於 1945 年有不同評價，但兩派都關注日本殖民統治是否造成台灣經濟基礎發生積極的變革。兩派共同的問題意識與日後八〇年代的台灣「近代化」論爭——其論爭焦點是「近代化」始於 1895 年之前還是之後——很類似。但是，除了劉進慶與陳映真注意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必然「持續替代」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而兩相「溫存」)之外，¹¹³多數論者都不加批判地把「資本主義化」或「近代化」當成發展的指標，或認為這兩種指標所指涉的對象有持續發展的趨勢。由於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單線進化史觀，因此這些論者所關心的問題其實是「資本主義化」或「近代化」的起點——雖然爭論幾乎只是在「中國統治時期」(1895 之前以及 1945 之後)或者「日本統治時期」(1895-1945)之間進行近乎「零和」的論證。¹¹⁴

¹¹⁰ 比方：劉進慶(1975a)、陳映真(1992a, b)，以及許銘義整理(1993)的陳映真演講稿。相關分析見邱士杰(2009b)。

¹¹¹ 類似觀點可見許登源(1987)。

¹¹² 史明(1970d: 14)。史明(1970a: 13)還認為：「這個植〔殖〕民地統治的近代式精密機械，一旦落在中國人那些封建殘餘(軍閥、特務、官僚、黨棍、買辦商人)手裡去，乃立刻體無完膚的被加以摧殘破壞，而且過後所造成出來的災難與困苦，而均落在被統治的臺灣人身上呢。」雖然主張台灣在光復前後都是「半封建社會」的論者也認為國民黨政權給台灣經濟造成打擊、混亂，與收奪。但「半封建社會」論其實還暗示一種可能：由於日本國家及資本離開台灣，而且國民黨政權並不是一個比台灣經濟的本質更優越的存在，因此台灣經濟基礎的本質——半封建——檯面化。如果可以從「外因為條件，內因為根據」去理解，則當時的經濟倒退也許正是內因在外因誘發下突顯出來的結果。

¹¹³ 從而批判了產生這種「溫存」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¹¹⁴ 關於八〇年代以後的所謂「台灣近代化論爭」，可參見張隆志(1998, 2004)。

第二節之二、「半封建社會」論向 「半封建政權」論的轉化（1960s-1970s）

1. 實際上是「半封建政權」論的劉進慶「半封建社會」論

雖然劉進慶與陳映真的觀點最接近於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下的結果，兩人的觀點仍有差異。以下先從最早形成的劉進慶論述談起。

劉進慶的論述形成於 1971 年，¹¹⁵該論述結合了講座派山田盛太郎（1897-1980）的再生產「分析」理論與西方二元經濟論，並以中國「社會性質」論作為最終的理論依歸。

在台灣「社會性質」的表述上，劉進慶嚴格依照「新民主主義論」的典範。該典範強調「半封建」為本質性的規定，並且在修辭上用這樣那樣的「半封建社會」去表述這種規定（比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或「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或「半封建殖民地社會」）。但劉進慶「半封建社會」論最弔詭的地方，就在於他的「半封建社會」必須把國民黨政權視為「半封建政權」才能得到界定；如果不把國民黨政權視為「半封建政權」，他的「半封建社會」論便難以成立：

- （1） 台灣光復後，國民黨「半封建政權」接收了日本資本留下來的、足以控制「台灣經濟的生產、流通及金融三大部門」¹¹⁶的大規模產業，從而形成日後的公營事業。因此，即便這些產業屬於資本主義生產方

¹¹⁵ 劉進慶於 1971 年 4 月於東京大學通過的博士論文《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で》。該論文後來分別出版日文版與漢文版（劉進慶，1975a, 1992）。此外，他在 1971 前後陸續發表的研究成果還有：劉進慶（1970, 1971, 1972a, b, 1973）。劉進慶（1973）曾有中譯發表在《台灣人民》第九、第十期（劉進慶，1974, 1975b），而《台灣革命》第四期曾發表文章批判劉進慶該文（台灣革命，1976a）。

¹¹⁶ 劉進慶（1992: 105）。

式，也受到政權性質影響而有半封建性質。

- (2) 土地改革後，國民黨「半封建政權」與米糖部門的小農之間也形成了「半封建」、「地主式剝削」¹¹⁷的地佃關係。
- (3) 國民黨「半封建政權」將公營事業與米糖部門所獲得的剩餘轉移到財政，並有相當巨大的部份用於保衛「半封建政權」的軍事開支。

當以上三個環節成形，五、六〇年代台灣的再生產結構便得以奠定。由於政權性質為「半封建」，因此「規模龐大的公營企業在型態上雖然完全以資本制的企業方式展開累積運動，但其本質則是公賣式的收奪，而所吸收的勞動剩餘則為財政所吸收，並且大半為軍事性消費而支出。」¹¹⁸

劉進慶並指出：即便是從大陸遷移來的資本、外國資本，以及台灣的本土資本——這些都是「以私人生產關係為基礎的私業支配部門（民營企業）」¹¹⁹——也需要依靠半封建政權的支持。「本地資本的累積方式貫穿了在公權力支持下的獨佔和保護兩個主軸。此一特質雖有程度上的差異，在本質上仍可視為與大陸資本視同軌進行的。」¹²⁰

最後，不但大陸資本與本土資本逐漸融合為「自我一體的本國資本」，¹²¹由資產階級所控制「私業」資本也開始與國民黨官僚所控制的「公業」相融合，產生劉進慶所稱的「官商資本」。「外國／外省／本省」、「公業／私業」、「官僚／資本家」這些矛盾在「官商資本」的形成中消弭。過去的「官僚資本」是資本家與官僚的身分重疊，現在的「官商資本」則是資本家與官僚的彼此勾結。¹²²

劉進慶論述中最突出的現象是：為了分析戰後台灣二十年（1945-1965）之發展，劉進慶引入許多既有或者自創的範疇；比方「官僚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半封建政權」、「殖民地遺制」、「公業」、「私業」、「官僚資本」、「官商資本」，如此等等。雖然劉進慶賦予了這些範疇之間以一定的邏輯關係，但這些範疇之間最根本的關係是「資本主義／前資本主義」（或「近代／前近代」）兩種屬

¹¹⁷ 劉進慶（1992: 329）。

¹¹⁸ 劉進慶（1992: 129）。

¹¹⁹ 劉進慶（1992: IV）。

¹²⁰ 劉進慶（1992: 247）。

¹²¹ 劉進慶（1992: 275）。

¹²² 劉進慶（1992: 282）。

性的對立統一。也就是說，每一個由劉進慶引入論述的範疇，如果不是具有「資本主義」的屬性，就是具有「前資本主義」的屬性；二者必居其一。在劉進慶的論述中，這兩種屬性的對立統一，不斷出現在一個範疇向另外一個範疇的過渡之中。

雖然劉進慶引入了許多分別具有前述兩種屬性的範疇，他卻著重突出具有「前資本主義」屬性的「上層建築」範疇，即所謂的國民黨「半封建政權」。劉進慶認為國民黨政權的半封建屬性規定了一切矛盾的發展：¹²³

具有由國家領導及介入廣泛的經濟過程特徵的經濟體制，說起來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體制。……但在台灣的狀況，它的特點是一方面它繼承了日本殖民地遺制而形成的；另一方面則受中國國民黨官僚資本主義的制約。換句話說，這個特殊的台灣國家資本主義體制，在本質上可說是順應國民黨統治集團的階級利益而形成的。眾所週知，戰後逃到台灣的國民政府是迄今少見的半封建軍事專制獨裁政權，為此專制權力階級利益代言的國民黨官僚資本主義，對重組台灣經濟構造的制約不可謂不大。

雖然劉進慶認為「半封建政權」規定了一切矛盾的發展，但這種看法恰恰暗示了「上層建築」是「前資本主義」屬性最後的殘餘處，而「經濟基礎」的「資本主義」屬性愈發顯著、越來越「資本主義化」。因此劉進慶的「半封建社會」論實際上是「半封建政權」論。而「半封建政權」與「半封建社會」在劉進慶論述中的曖昧關係，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劉進慶將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或者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界線加以抵除的傾向。¹²⁴

如陳映真所云：「台灣社會的『封建性』，今天看來，應該還有討論的餘地」。¹²⁵陳映真將劉進慶的論述修正如下：（1）台灣從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至戰後五年間，都是「半封建社會」。他對這時段的定性，與劉進慶同。（2）1950年至1962年間，「土改完成，半封建性消失」，因此這個階段的台灣是「半資

¹²³ 劉進慶（1992: 91）。

¹²⁴ 實際上，劉進慶（1992: 91, 93-96）明白表示了「國家」與「社會」之對立在七〇年代以前的台灣尚未出現，因此他以「公業」與「私業」的對立替代之。

¹²⁵ 陳映真（2005）。

本主義社會」。從這個時段開始，其定性與劉進慶異。(3) 1962 年之後，台灣進一步發展為「資本主義社會」。¹²⁶

雖因劉進慶論述過分突出「半封建政權」而頗有問題，但這個問題正體現出：以往強調經濟基礎之「半封建」屬性的論述，開始由強調上層建築之「半封建」屬性的論述所取代。

2. 逐漸成為問題的資產階級

由於一九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以及冷戰、內戰「雙戰結構」的成立，台灣的社會主義運動進入斷裂期。然而復興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努力仍在島內外持續存在。在台灣島內，運動由大大小小的白色恐怖所鎮壓的對象承載著，這些對象綴成了零碎的軌跡；在台灣島外，運動則表現為以日本與美國為根據地的連續性的運動發展，雖然人數不多，卻是運動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之後首次連續發展的時期，同時也是資產階級成為運動主要問題的時期。

自一九二〇年代以來，資產階級與革命動力的關係始終成為問題。最為當代所知的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曾從資產階級中區分出一塊所謂的「進步的資產階級」，認為該階級可為革命動力。台共「一九三一年綱領」排除了所謂的「進步的資產階級」。戰後五年間的中共台灣省工委再次把資產階級劃分出一部分，但此時稱之為「自由資產階級」。¹²⁷ 必須補充一點：由於以上各時期都有「小資產階級」的界定並肯定該階級的革命性，因此本研究略過小資產階級的問題。

台共「一九三一年綱領」的見解顯然比較特別。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共產國際在 1928 年之後激進化，縮小了革命動力的內容。總體來看，由於 1949 年兩岸分斷之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未在台灣產生政治上舉足輕重的資產階

¹²⁶ 這是陳映真至 2000 年為止的觀點（鄒議〔陳映真〕，2000: 3）。在此之前，他的看法還有一些不同，可見邱士杰（2009b）的分析。

¹²⁷ 見「省工委」在 1948 年「香港會議」的方針（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1951）。

級，因此資產階級的「整體」或「部分」有無革命性，不是太大的關鍵。畢竟民主主義革命的跨階級性質，首先由農民的參與所決定。

然而兩岸分斷之後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顯著了起來。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社會主義者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能否「持續替代」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問題上，曾出現了「肯定論」與「否定論」兩種回答。這兩種回答在七〇年代劉進慶的論述中得到統一。一方面他肯定國民黨「半封建政權」主觀上有意促進「持續替代」，另一方面卻又認為「半封建政權」的存在客觀上會使「持續替代」遭到限制。雖然劉進慶與同時期的台灣社會主義者未必有直接聯繫，他們也都突出「半封建政權」的存在與作用。

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成為顯著的存在，因此資產階級與革命動力的關係成為越發顯著的問題。在劉進慶的論述中，「外國資本／外省資本／本省資本」、「公業／私業」、「官僚／資本家」這些矛盾都將在「官商資本」的形成過程中解消，被壓迫者則是工人階級與農民；這兩大階級構成了所謂「基底」（這是劉進慶從山田盛太郎那裡繼承而來的概念）。同時期海外台灣社會主義者的論述卻強調這些矛盾未必得以解消。他們特別突出本省籍資產階級也如工農階級一樣是被壓迫者，從而視之為革命動力。雖然這種見解的論者並沒有在七〇年代結束之前發展出比劉進慶更具深度與體系的論述，但這種見解的出現比劉進慶論述稍早。六〇年代出現於日本的史明（1918-）就是其代表。

3. 史明與左雄的「資產階級」論戰

史明及其「獨立台灣會」（原名「台灣獨立連合」）是今日最為人知的海外「台灣左派」。然而一個長期為人所忽略的事實是：史明於1962年首次以日文出版的《台灣人四百年史》與社會主義無關。在這本蒐集各方資料而寫下的著作中，只有討論日本殖民統治的部份稍有社會主義色彩，但這種色彩的來源很難

不把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納入考慮。¹²⁸《台灣人四百年史》於 1974 年發行日文增補版。原文未改，但增補了〈蔣父子獨裁專制下的殖民地統治〉一章。¹²⁹史明在這一章中大量引入馬克思主義術語以及相應的理論架構，對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提出了他的分析。也因為這一章的增補，使得 1974 年版成為兩種論述並存但不連續的版本。到了 1980 年，《台灣人四百年史》發行漢文版，¹³⁰但實際上是全面改寫，內容與前兩個日文版並不相同。而這個經過馬克思主義術語及其理論架構加工後的版本，才是今日人們所熟知的《台灣人四百年史》。

《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幾次改寫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1）史明始終把國民黨政權視為一個由「(半)封建」、「獨裁」、「軍閥」、「特務」等屬性所構成的上層建築，即所謂「半封建政權」。（2）《台灣人四百年史》的歷次改寫之間，海外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內部都曾產生路線分歧。路線爭論促使史明修改了自己的觀點，改變則體現在史明所發行的《獨立台灣》。《獨立台灣》創刊於 1967 年。雖然史明在創刊初期便提出了他的論述，但論述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不明朗。因為史明沒有按照國際共運所常見的方式去組織他所引入的許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術語。¹³¹1970 年旅美台灣社會主義者「左雄」的出現挑戰了史明，史明的論述自此開始出現變化。

¹²⁸ 1962 年的史明移用 1929 年矢內原忠雄見解的最顯著之處，就是史明也強調矢內原所講的台灣「資本主義化」並移用了矢內原該書的一項最大理論特色：從地權調查、土地收奪的「原始積累」、度量衡與貨幣統一、驅趕外國資本，一路講到日本資本在台灣形成壟斷（矢內原忠雄，2002: 11-169, 222-224）。此外，就史明把「中產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視為「指導民族運動」者的見解來說，也顯然沿用了矢內原所謂「中產階級」指導（或有利於指導）民族運動的見解。但在台灣的資本主義化程度的問題上，史明比矢內原走得更遠。他力圖說明 1945 年之前的台灣社會已經形成了不同於中國大陸「半封建社會」的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並得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資本主義化」。這是他為了說明 1945 年之後的經濟恐慌而埋下的伏筆與寫作策略（史明，1962: 336-366, 421, 441-446）。但需特別一提的是，1969 年的史明改變了他的「中產」定義，將之用來描述「以自耕農為中心勢力的中產階級」（史明，1969b: 22-24）。

¹²⁹ 〈增補 蔣父子獨裁專制下の植民地統治〉（史明，1974: 644-776）。

¹³⁰ 史明（1980）。

¹³¹ 史明在《獨立台灣》創刊之初宣傳一種號稱「比任何民族問題或階級問題，還來的〔得〕深奧」的「人性解放」論。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必須進行同時包含「民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民族革命」。但他並沒有說明「民主革命」與「社會革命」是否就是國際共運所理解的「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史明，1967）。

論戰的起點是左雄在 1970 年《獨立台灣》第 23 號發表的兩篇文章，¹³²史明馬上在當期提出回應。¹³³兩人的爭論如下：

- (1) 第一個爭論問題：史明認為革命對象與革命動力之間的差別在於前者是外來的壓迫民族（「中國人」）而後者則是被「殖民」的被壓迫民族（「台灣人」）；後者包括一部分的本省籍資產階級。他將可以爭取的本省籍資產階級稱為「台灣『民族資產階級』」，不可爭取的稱為「台灣『買辦資產階級』」。左雄則認為，革命對象是國民黨政權及與之同謀的本省籍資產階級，革命動力則是被前述革命對象所壓迫的外省人與本省人
- (2) 第二個爭論問題：史明主張以「台灣獨立」或「獨立台灣」為總口號。左雄則認為台灣已經獨立，並主張只有敢於強調「革命」的「獨立」才不是投機的空話，因此左雄以「台灣革命」為其總口號。

第一個爭論問題乍看之下只是要不要打倒本省籍資產階級的問題。但更精確地說，則是國民黨政權是否可能扶植本省籍資產階級，以及要不要**先聯合**（某部分）本省籍資產階級打倒國民黨政權然後**再將其打倒**的問題。也因此，這個爭論問題同時是革命在「一步到位」與「分幾步走」之間的選擇。但之所以需要進行這樣的選擇，在於左雄與史明對於本省籍資產階級與國民黨政權之間的關係有不同的看法。左雄認為兩者必然共謀，而史明則認為兩者存在矛盾。

左雄與史明的論戰曾在當時島內引起小小關注。¹³⁴而在海外，左雄的論點獲得了較多支持。多數人都同意不應該把「中國人」當成完全打倒的對象或認為不必強調台灣是殖民地，¹³⁵甚至有人提出將《獨立台灣》改稱《革命的台灣》的意見。¹³⁶

由於論戰的機緣，左雄與史明都修正或發展了他們的見解。（1）左雄仍然堅持本省籍資產階級具有反動性格；但在要不要立刻打倒該階級的問題上，出

¹³² 也就是：左雄（1970a, b）。並可參見後來的左雄（1970c）。

¹³³ 史明（1970b），並可參見後來的史明（1970c）。

¹³⁴ 鄭鴻生（2002）回憶：「我們當時認為台灣最大問題在於親美的黨國威權體制，『統獨問題』並不存在，我們向來也沒有本質論地去否定台獨，還曾興致勃勃傳閱過左雄與史明關於台灣民主或民族革命的辯論文章，因此不僅沒有對立的心理，反而抱著同情與敬意，認為是向黨國威權體制抗爭的盟友。」相關回憶並見：鄭鴻生（2001: 126-131）。

¹³⁵ 美國 B.T.O（1970）、台風（1970）。

¹³⁶ 讀者 C.K（1970）。這是對左雄（1970b）「革命的台灣」口號的呼應。

現反反覆覆的態度。¹³⁷(2)史明則因左雄的刺激而透過 1970 年 9 月發表的〈台灣革命過程中的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社會革命〉與 1972 年 11 月發表的〈階級·民族·革命〉二文全面重構其革命論述。¹³⁸這兩篇文章以台灣歷史各階段為對象，分別規定了 1962 年版《台灣人四百年史》所沒有涉及的社會性質，並且首次涉及當前的革命性質、動力、任務、前途。這兩篇文章是 1980 年《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與史明後續著作之革命論述的雛形。¹³⁹第一篇文章與「左雄／史明」的論戰有密切關係，第二篇文章則出現在一個特殊的時間點：北美第一份台灣人社會主義刊物《台灣人民》的創刊。

¹³⁷ 左雄原來主張打倒本土資產階級，但後來改用右的語調說：「在現階段，階級鬥爭的意義並不在『反資本家階級、反地主』，而在於反現存的政治社會體系。」「不顧及現階段的台灣社會條件而喊出『反資本家階級、反地主』是在（左）傾的機會主義。」並主張「階級」與「民族」鬥爭並重（左雄，1970d）。可是隔沒多久，左雄卻回過頭去用左的語調說：「台灣資本等於台灣資產階級資本加 Kmt 武力資本再加上帝國主義經濟軍事資本。去掉 Kmt 的台灣社會，如未能擺脫帝國主義掌握，能倖免剝削的命運嗎？在帝國主義扶持下建立起來的政權，不管當政者是不是台灣人，將永遠是台灣人民之敵。」「今日，台灣社會矛盾關係的總結已不再是民族對立，而是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階級對立了。」（左雄，1970e）。到了 1971 年，左雄開始批判與帝國主義勾結並且反共的資產階級台獨運動（左雄，1971b）。但他後來又指出：「只要台灣資產階級肯起而反對 KMT 及帝國主義，我們竭誠歡迎，我們絕對採取合作態度。」「只准談民族立場，不准談階級立場，只許談政治問題，不許談社會經濟結構問題，只可罵 KMT，不可罵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立場，我們斷然不能接收〔受〕。」（左雄，1971c）。

¹³⁸ 史明（1970d: 1-35; 1972: 4-15）。

¹³⁹ 除了這兩篇文章之外，1980 年漢文版還有其他來源。史明在更早之前便已經在《獨立台灣》上的〈台灣民族——其形成與發展〉系列連載中重新提出了他詮釋台灣史的架構。比方，該文一方面重申 1962 年《台灣人四百年史》的「資本主義化」觀點，另一方面則發展了矢內原批判日本殖民者選擇性釋放「文明」要素的觀點。矢內原認為日本殖民統治雖使台灣得到了「文明」發展要素的「資本主義化」，卻沒有讓台灣人參與「政治」（矢內原忠雄，2002: 225-226）。史明在這種要素不平衡釋放論上走得更遠：他認為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實現了「近代社會」所應有的「資本主義化」（而且是重工業化），卻沒有實現「近代社會」也應有的「民主化」、「人性解放」、「民族形成」（史明，1969a）。〈台灣民族——其形成與發展〉系列連載主要是建構起一套 1962 年《台灣人四百年史》所沒有的、有馬克思主義色彩的「殖民地」台灣歷史發展階段論。但史明直到〈台灣革命過程中的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社會革命〉才另外建構起有馬克思主義色彩的革命論述。

第二節之三、在「半封建政權」論中遠離 「新民主主義革命」(1970s-1980s)

1. 《台灣人民》以降的七〇年代

(一) 以刊物發行為線索的概略史

左雄一方面在《獨立台灣》發表文章，另一方面則繼續從第二個爭論問題發展其「台灣革命」論。¹⁴⁰強調台灣人民必須不依靠外力而「自求解放」¹⁴¹的「台灣革命」論，必須擺在以下兩個層次的時空背景中才能理解：

- (1) 首先是一九六、七〇年代的世界革命風潮。這個風潮由日本的安保鬥爭、中國的文化大革命(1966)，法國的「五月風暴」(1968)，以及古巴、越南、巴勒斯坦等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鬥爭所構成。
- (2) 其次則是 1971 年前後的兩岸局勢的劇變：一是保衛釣魚台運動在美國的中國學生示威中檯面化(1971.1)，二是國民黨失去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1971.10)，三是海外「資產階級」台獨派出現呼應「革新保台」的傾向(以 1972 年 3 月創刊的《台獨》為代表)。

形勢的不斷變化促使台灣社會主義者實現集結，地點在北美。1972 年 10 月，北美的「台灣人民社會主義同盟」(簡稱「社盟」)創辦《台灣人民》雜誌。左

¹⁴⁰ 除了前面提及的左雄著作外，還可參見：左雄(1971a, b)。

¹⁴¹ 「自求解放」在後來成為很重要的關鍵詞，詳見本章後面的說明。而左雄(1970c: B17)則是這樣使用這個關鍵詞的：「台灣現代史已經證明台灣資產階級理當領導而未能領導台灣民族自求解放的鬥爭。」

雄是主事者之一。¹⁴²另一位主事者則是早從六〇年代中後期便在北美組織台灣學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許登源（1937-2009）。¹⁴³

雖然創刊之初的《台灣人民》曾經宣示「我們相信台灣革命的民族民主要求在現階段只能以『台灣獨立解放運動』的形式開始表達出來」，¹⁴⁴但《台灣人民》更重要的口號是台灣人民的「自求解放」與「台灣革命」。¹⁴⁵這兩個口號反映社會主義統一派與獨立派透過該刊（乃至「台灣人民社會主義同盟」）實現了統一戰線，¹⁴⁶統獨問題因此次要化。這種「次要化」體現了他們對世界局勢的觀點：

- (1) 「台灣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過分期待「革命」從他處（特別是當時作為世界革命「中心」的中國）「輸出」到台灣，將導致機會主義。¹⁴⁷
- (2) 基於上述理由，他們反對國共間的「和談運動」並主張革命推翻國民黨政權。

統獨兩派透過《台灣人民》實現了統一戰線。¹⁴⁸這個統一戰線的直接打擊對象是呼應國民黨「革新保台」的資產階級台獨派。《台灣人民》把那種呼應

¹⁴² 1987年的「台灣解放社」社員許宏義認為，「回顧近乎二十年的台灣左派運動，無可諱言的，它是一個以左雄為中心人物的運動。」許宏義指出，左雄因不滿史明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傾向」而在北美洲結合了反史明的統、獨社會主義者，共同創立「社盟」（許宏義，1987：35）。

¹⁴³ 許登源友人林盛中於1972年10月由美國到北京工作之後，旋於11月在北京見到許登源和他的夫人陳妙惠赴北京訪問，令林非常吃驚。許登源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官員有一年的打交道經驗，由於海峽兩岸長期隔絕，兩岸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差距很大，因此他們希望跟中共中央反映對台工作的意見。所以他們三位一起討論，起草《對台工作意見書》。該工作書認為「應當在旅美台胞特別是本省籍台胞中加強對社會主義的宣傳。在保釣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本省籍積極分子力量還不足以勝任這項任務的情況下，建議和台獨左派建立統一戰線，共同辦《台灣人民》雜誌，在旅美台胞中間宣傳社會主義。」「當時擔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喬冠華同志接見他們夫婦，答應把我們的《對台工作意見書》轉呈周總理。喬冠華同志並當場同意我們和台獨左派搞統一戰線的做法，合辦《台灣人民》雜誌，在旅美臺胞中宣傳社會主義。」（林盛中，2009a, b）關於許登源的生平事蹟，可參見：鄭鴻生與陳信行（2009）、新國際（2009）。

¹⁴⁴ 社盟角尺組（1972b：13）。

¹⁴⁵ 關於「自求解放」與「台灣革命」論，見：社盟角尺組（1972a：9）、台灣人民社會主義同盟鋤頭組（1972：5-19）、準台灣人（1972：25-27）、社盟評論員（1972：4）、李寬（1973：32）。「李寬」的文章特別值得注意，該文不但肯定「自求解放」，還強調不能拒絕外在的協助，特別是中國人民。

¹⁴⁶ 關於《台灣人民》內部的統獨聯合與分裂，可參見柏克（1977：24-25）。

¹⁴⁷ 關於「台灣革命」與世界革命之關係，見：社盟評論員（1972：3-4）。

¹⁴⁸ 林盛中指出，許登源和他討論之後，認為可以考慮和「台獨左派搞統一戰線」，共辦刊物，「在旅美本省籍同胞中宣揚社會主義思潮。」（林盛中，2009a, b）

視為「國台合作」的反映。因此《台灣人民》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¹⁴⁹這方面的批判是《台灣人民》的主旋律。

但《台灣人民》內部的統獨平衡很快被打破。首先是第 3 期登出的〈台灣牌的社會主義〉引起爭議，¹⁵⁰其次在 1973 上半年（也就是從發行第 4 期開始），發生了加深內部統獨嫌隙的所謂「李清一事件」。¹⁵¹總之，「發行不到四期，兩種政治路線的鬥爭也就開始明顯化。」¹⁵²《台灣人民》第 8 期刊行後（1974.3）出現拖刊，直到同年 12 月才又刊行第九期與翌年停刊的第 10 期（1975.2），而後兩期則把中國統一規定為該刊目標。如果從口號的變化來看，則《台灣人民》經歷了一次方向轉換：從「中台」之間「同志加兄弟」的傾獨路線變為「兩岸」「無產階級聯合」之傾統路線。¹⁵³

在這種形勢下，部分以左雄為代表的《台灣人民》同人另創更強調「獨立」的《台灣革命》雜誌（1975.9）。他們稱第 9 第 10 期的《台灣人民》編輯者是「新台灣人民派」，並強烈批判後兩期的轉變及其論據。¹⁵⁴《台灣革命》發行至第 5

¹⁴⁹ 關於批判「革新保台」與資產階級台獨派，《台灣人民》具體的批判文章可見：社盟角尺組（1972a: 10）、紐約客（1972: 65）、本刊評論員（1973a: 1-5; 1973b: 1-4）、楊文隆（1973: 11-12）、徐三郎（1974: 24-25）、羅春雄（1975: 6-19）。

¹⁵⁰ 關於〈台灣牌的社會主義〉（社盟鋤頭組，1973: 31-39, 29）所引起的問題，林盛中指出《台灣牌的社會主義》招致一些保釣運動者攻擊許登源，「污蔑他搞台獨，連我在北京工作的也都受到波及。」由於辦《台灣人民》與「和台獨左派建立統一戰線，在旅美臺胞中間宣傳社會主義」是「得到喬冠華副外長的首肯」，因此那些攻擊讓「許登源覺得很冤枉」（林盛中，2009a, b，此二文的敘述與指涉人物略異）。第 8 期《台灣人民》的〈編輯報告〉指該文引起了「一些爭論」，並批評之「遷就島外台灣小資產階級的認識能力，沒有處處從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解釋事物。」（台灣人民，1974a: 封底）

¹⁵¹ 所謂「李清一事件」乃因《台灣人民》同人李清一赴北京建立聯繫，由此在同人間引發一系列矛盾與分裂。事件發生後，第 7 期《台灣人民》曾不點名批判該事件中所萌現的島外組織解消論與兩岸無產階級聯合論（邱武川，1973: 23-27）。第 9 期《台灣人民》首次公開出現「李清一事件」一語並稱該事件導致「本組織不得不停止出版工作」（台灣人民，1974b: 65）。反對第 9 期以後之《台灣人民》的《台灣革命》也針對該事件提出長篇批判（台灣革命，1975a: 8-24）。

¹⁵² 許宏義（1987: 35）。

¹⁵³ 「同志加兄弟」原為描述社會主義「國家」間的戰鬥友誼的用語。因此《台灣人民》創刊初期引用這個口號實有「自求解放」之意（台灣人民社會主義同盟鋤頭組，1972: 19）。第 9 期開始提出的「無產階級聯合」則是在肯定「自求解放」的前提下，強調台灣的「解放」也可以透過海峽兩岸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倒蔣統一戰線」而加速實現（本刊，1974；本刊評論員，1974）。而「統／獨」之細微差別，正蘊含在這兩個口號之中。

¹⁵⁴ 歷期《台灣人民》的內容也能看出內部細微的統獨分歧。但明確朝「統」傾斜首先見於第 8 期台松（1974）的文章。這篇文章暗示台灣革命「內容」的不斷發展將需要新的革命「形式」來適應。然後是第 9 期暗示兩岸應當統一的「無產階級聯合」口號。在這個轉換過程中，毛澤東思想開始被明

期後停刊（1976.12），但翌年旋續創辦《台灣時代》（1976.1），發行十三期後停刊（1982.4）。

在《台灣時代》後期，年輕一輩的台灣社會主義者與許登源創辦了《台灣思潮》（Taiwan Tide）雜誌（1981.5）。由於這份被《台灣時代》視為「新台灣人民派份子」¹⁵⁵的刊物在理論上達到新的高度，¹⁵⁶因此，雖然《台灣時代》在第13期「史明問題討論專刊」指出，「在徹底分析討論史明問題之後，我們必定會好好對待《台灣思潮》的問題」，¹⁵⁷《台灣時代》卻就此悄然停刊。

從《台灣革命》以來，島內黨外勢力蓬勃興起。因此《台灣政論》、《夏潮》以及郭雨新、陳逸松等黨外雜誌或人物，都成為《台灣革命》與《台灣時代》所討論的對象。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島內政情急遽激化，加速了海外（特別是北美）台灣人運動內部的分化與對立，¹⁵⁸《台灣時代》就是停刊在這種形勢中。據

確稱為指導性思想，並將《台灣人民》原已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口號用大陸上的經驗來解釋（春發，1974）。因此《台灣革命》第1、2期（1975）的全部內容幾乎都在反駁上述論點。但即便是《台灣革命》所大力批判的第9、10期《台灣人民》，也不見得能視為鐵板一塊。因為第9期的撰稿者中，也有繼續列名於《台灣革命》者。

¹⁵⁵ 台灣時代（1981: 1）。完整地說，該文視該刊為「新台灣人民派份子」與「民主運動支援會份子」等派的結合。

¹⁵⁶ 「高度」的另一面或許就是「不勝寒」。張良澤二度訪美（1983）時，「夜宿許登源家。細談之下，才知道他原是台大哲學系的助教，來美深造後，以思想向國民黨挑戰。他們創辦了《台灣思潮》，是海外台灣人刊物中最有思想的一種。因為是很思想而非謾罵，所以愛看的人不多。」（張良澤，1989: 404）。

¹⁵⁷ 台灣時代（1982: 1）。

¹⁵⁸ 當時北美台灣人運動內部出現以下幾種「左右」形勢：（1）第一種形勢：「左派」之間發生爭論。這一種形勢基本上是左雄與史明兩派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在1981年史明赴美之後再次激化。可參見：《台灣時代》第13期「史明問題討論專刊」、史明（2001: 129-136），與許宏義（1987）。（2）第二種形勢：「左派」敢於放言批評「右派」，而「右派」基本上無力反擊。這一種形勢也在1981年達到高潮，左雄的台灣時代社代表在「費城政治討論會」（1981.4.25）上放言批評海外台獨運動不敢提出「台灣民族主義」與「反帝國主義」兩項綱領。請參見：《台灣時代》第13期「史明問題討論專刊」以及美麗島週報（1981a, b, c）同時期除了《台灣思潮》全面批判了左雄一派的論點外（何青〔許登源〕，1981a, b, 1982），「右派」陣營基本上沒有出現更具系統性的反駁。如果考慮到《台灣思潮》畢竟不是左雄一派所要批評的「右派」，就更能看出左雄一派所批評的「右派」當時並沒有辦法全面還擊，因此當時有人直言「海外台灣革命運動中的右派理論」處於「真空狀態」（楊公哲，1981）。其他對於台灣時代社的批評還可參見：柏也（1982）。同時期似乎只有支持「台灣民族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綱領的《海外政論》社親近於台灣時代社。實際上，左雄亦曾以筆名在該刊發表文章，呼籲推動「革命的自由主義運動」（陳河石〔左雄〕，1981）。關於兩社之間的合作歷程，可參見李明（1987: 16-23）。（3）第三種形勢：「右派」大量引入各種「左派」術語來表述自己的路線。這一種形勢則形成於史明與《美麗島週報》合作之後。兩派合作後，《美麗島週報》明顯左轉。其左轉大概也顯示了一種對於「真空狀態」的彌補。一方面，該報一

說《台灣時代》停刊之後，內部曾檢討刊物的停刊源自於團體本身的「思想低落」，以致只能用攻擊史明來迴避面對《台灣思潮》。¹⁵⁹這或許也是一種解釋。無論如何，不滿《台灣時代》停刊及其後續形勢發展的一部分人在 1987 年另外創辦《台灣解放》。目前僅見創刊號（1987.2）與第 2 期（1987.6）。

敘述上述發展脈絡時所提到的史明、左雄，以及許登源，大致反映了幾種分分合合的路線。當然這只是大致的概括，**詳細情形肯定不止於此，勢必還得修正。**¹⁶⁰如果把其他刊物（如鈞運、統運各刊物）算進來、如果出現更多的回憶錄或進行更多的口述訪問，也許可以勾勒出海外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更複雜的形象並糾正上面的概述。遺憾的是，這是此前尚未開展的研究工作。

（二）《台灣人民》對於正式登上歷史舞台的資產階級的看法

在這些複雜的組織流變與刊物發行中，作為「一本讓當年的台灣左派很感驕傲的自辦雜誌」¹⁶¹的《台灣人民》最重要。因為：

- （1） 《台灣人民》統獨並具、發行最早。
- （2） 《台灣人民》開創了許多日後持續延燒的議題，比方「自求解放」、「台灣革命」、「反對「革新保台」、「反對「國台合作」、「反對「和談運動」。

時之間出現不少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文章。除了史明的論著外，還能看到鄭自才「台灣前進會」的論著。另一方面，他們先後成立主張兩階段革命論的「台灣民族民主革命同盟」（1982.8）與「台灣革命黨」（1985.1）。這些團體的綱領論述都引入了相當多的馬克思主義術語（台灣民族民主革命同盟，1983；台灣革命黨，1985）。然而這些術語多半隨著這些團體的消失而不再為海外台獨運動所用。史明與左雄所發明的「台灣民族主義」可能是海外台獨「左派」較具長久影響力的術語。但即便是在八〇年代初期，所謂的台獨「右派」也不必然接受這個概念。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彭明敏在《台灣公論報》（1981 年創刊）創刊號上撰文指出，應當以「台灣國民主義」替代「台灣民族主義」一語（彭明敏，1981）。還可參見戴國輝對於左右兩派此種差異的觀察（陳映真與戴國輝，1988: 154）。「台灣前進會」的論文，均收錄於台灣前進會馬列主義研讀小組（1981）所編文集。

¹⁵⁹ 許宏義（1987: 25）。

¹⁶⁰ 以上的敘述主要依靠當時刊物的內容來判斷路線分合。《台灣思潮》則曾提出《台灣人民》、《台聲》、《台灣時代》這樣的分法（台灣思潮社，1982: 94）。

¹⁶¹ 「許登源遺孀陳妙惠女士表示，他們對於開辦《台灣人民》能獲得喬冠華的肯定很感欣慰，但該刊沒有得到大陸任何財力或其他方面的支持。陳妙惠說，『《台灣人民》完全是一本讓當年的台灣左派很感驕傲的自辦雜誌。』」（鄭衣德，2009）

(3) 更重要的是，《台灣人民》克服了先前史明與左雄辯論中各執一詞的態度，而對本省籍資產階級採取了既團結又鬥爭的立場。

《台灣人民》對於「國台合作」的揭發最能體現他們對於本省籍資產階級——即「台灣資產階級」——的提防，但他們所批判的「國台合作」的「台」首先是指海外的本省籍資產階級台獨運動。至於島內的本省籍資產階級，《台灣人民》認為「部分台灣資產階級雖然也成了國民黨體系的一部分，但並不是與國民黨一體。」¹⁶²

該刊認為：1949年之前的中國「半封建」的經濟基礎決定了當時國民黨政權的上層建築也是「半封建」。國民黨失去大陸後，把「半封建」上層建築原封不動搬到台灣。雖其上層建築願意促進「持續替代」，但持續替代卻會因為「上層建築」的半封建性質而遭阻礙。畢竟「國民黨國家機器是外加式的」，其本身的「時代錯誤」遂使「它的反動本質也規定著它的發展方向——少數人集團高度自私的機構化。這個性質使國民黨機器不曾也不會隨著台灣社會的變化或需要而作有意義的調整。」¹⁶³

由於某部分本省籍資產階級被視為可能聯合反蔣的盟友，因此台灣革命必須分幾步走。第一步是同這些資產階級合作推翻「半封建」的上層建築。雖然左雄與史明的論爭已涉及革命「一步到位」(左雄)或「分幾步走」(史明)的問題。但直到《台灣人民》，**台灣農村的「資本主義化」問題**才成為上述問題的論據。他們的觀點如下——

——雖然國民黨上層建築是「半封建」的，土地改革卻使經濟基礎中的可能與之勾結的封建勢力(比方「地主」)消失，從而「延長自己的半封建政權的命運」，「這一個因素對二十年來台灣革命情勢的漲落發生了極大的作用。」¹⁶⁴然而「半封建」的上層建築卻把自己的基礎安置在「帝國主義」(或稱「國際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以及「民族資產階級」(或稱「台灣大資本家」)之上。¹⁶⁵

——土改之後，國民黨政權仍對農民使用封建剝削(比方「半封建式賦稅」、「肥

¹⁶² 社盟角尺組(1972a: 4)。

¹⁶³ 社盟角尺組(1972a: 7)。

¹⁶⁴ 洪明仁(1973: 7)。類似觀點並見台灣人民(1972: 42)。另有論者認為「土地革命」的條件因此而消失(吳志成, 1973: 32)。

¹⁶⁵ 這種三角關係論可見：社盟角尺組(1972a: 4)、洪明仁(1972: 15)。

料換穀，大小租」），以致農村蕭條。「國民黨政權取代舊地主而成為農民的寄生蟲」。雖然七〇年代初期的國民黨政權提出「新農業政策」以促使資本主義剝削替代封建剝削，此舉卻是為了促進農村出現資本主義階級分化下的新「富農」，使之成為「向農村積極發展新的權力基礎」的媒介。¹⁶⁶這將導致農村的階級鬥爭形式發生變化。¹⁶⁷此外，雖然農業問題恰恰「拘束著」資產階級本身的發展，但由於資產階級對於國民黨、帝國主義勢力的態度有兩面性，因此資產階級對於農業問題的態度「模稜兩可」。¹⁶⁸而國家資本主義將支持富農。¹⁶⁹

——關於國家資本主義與農村的關係，同人還指出：過去由於國民黨國家資本主義「為了養活其軍政集團而加諸於農產品價格的嚴格控制」，控制了以農村為主的島內市場，致使資產階級只能向海外市場尋求發展。但海外貿易反而促成了資產階級能夠發展外銷工業，並使其成果為該階級所享有。¹⁷⁰

——然而農村也因為國民黨層層剝奪了農業生產者的儲蓄與資金，使得生產方式之改良所不可缺少的資本累積無法產生。由於資本不足，台灣農業遂無法脫離小農生產而進於「資本主義化」，「這是國民黨式生產關係所加諸於台灣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束縛的一個明顯例證。」¹⁷¹又由於農民的被剝削以及國際資本的存在，因此過去二十年間的台灣工農業關係失調。一方面，農民購買力低導致「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缺少國內市場」，因此只能依靠「國際貿易」。「在外

¹⁶⁶ 洪明仁（1973: 13）。

¹⁶⁷ 「當年國民黨以『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破壞了封建勢力，產生了小型自耕農的生產型態。今日國民黨為了促使農村進一步商業化，不惜向自耕農開刀。」這些政策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實施，不折不扣等於策劃土地再集中。於是台灣農村在土地集中與資本集中之下產生了不同於舊日地主——佃農對立的另一種階級對立。這種新的對立基本上是資本家與僱工的矛盾關係。農村無產者勢必大量出現。『耕者有其田』之後，國民黨政權取代舊地主而成為農民的寄生蟲。在農業商品化的情形之下，新形成的富農階級（其來源可能包括較富裕的自耕農、半農半商的階層，也可能包括東山再起的衰落舊地主）不久就要取代國民黨成為農村無產者的主要剝削者。台灣農村面臨了另一個形式的階級鬥爭。」（洪明仁，1973: 12）

¹⁶⁸ 社盟角尺組（1972a: 8）。

¹⁶⁹ 洪明仁（1973: 13）。

¹⁷⁰ 洪明仁（1973: 13）。

¹⁷¹ 社盟角尺組（1972a: 6-7）。在《台灣人民》的內部書信討論中，成員「M」曾批評《獨立台灣》上的鄭自才將台灣農村的危機視為國民黨在國際上政治孤立與經濟孤立而導致的結果。M 則認為「台灣農業之所以瀕於破產，實在是台灣社會一般的生產力與現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所造成的。國民黨的剝削方式及機構（指生產關係——編者按）著重對農民的榨取，在一定時期之內，這個集團除了收割自肥之外，還能使台灣的工農業有發展的餘地。」（台灣人民，1972: 44）

貿、外資、外債三部曲的引導之下，台灣經濟已不再為台灣的需要而發展，它成了為貿易而生存，隨著人家的需要而發展的畸形怪物。」從而導致工業無法扶持農業，農業也必然破產，「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體的正常資本主義關係發展受著這數種的箝制，乃不可能得到應有的進步。」因此「農業危機是蔣氏集團覆亡的前奏」。¹⁷²

——同人並認為資產階級必與國家資本發生鬥爭：由於國際市場的不穩定以及「國民黨國際地位的動盪不安」，因此在海外貿易與台灣工業上獲利的本省籍資產階級必定想要返台同國家資本爭奪國內市場，以降低外銷工業所帶來的重重風險。「這將加強台灣資產階級葉落歸根，奪回島內市場主導權的心意。於是產生了台灣資產階級與壟斷獨佔的國家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一旦國民黨政權控制不了農產品價格，台灣資產階級喪失了擴展外銷工業的有利條件，這個緊張的對立關係必定要白熱化。國家資本主義與台灣資產階級也許在短期內互不侵犯，或未嚴重衝突。但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性質不可能允許二者永遠和平共存。這就種下了台灣資產階級與國民黨政權鬥爭的火種。」¹⁷³

《台灣人民》關於本省籍資產階級的討論，反映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正式在島內展開。不但農業正在資本主義化，資本主義的工業也同時在發展。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都站上歷史舞台並成為《台灣人民》可以分析的對象。同理，雖然某些規範認識到了八〇年代仍然未變（比方「半封建政權」論¹⁷⁴），但台灣的工業——製造業——卻已發展到足以成為《台灣思潮》所能深入探討的對象。¹⁷⁵相較於第一期與第二期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這是很大的不同。¹⁷⁶

¹⁷² 社盟角尺組（1972a: 7）。

¹⁷³ 洪明仁（1973: 14）。

¹⁷⁴ 比方南民〔南方朔〕（1986: 17-23）就把國民黨依據「長輩關係」而形成的接班機制視為一種缺乏「道德正當性」的「新封建結構」。

¹⁷⁵ 見王茂盛（1981a, b, c, 1982）以台灣製造業人口為主題的系列論文。不過該論文對於台灣製造業人口的考察從二十世紀初開始，其一方面認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某一時期曾有一定的製造業人口，另一方面則認為這些人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台灣這個「社區」（而不是「社會」，或只是從屬社會）得到發展之下的產物。因此該文高度評價了《台灣思潮》第一期便譯載的連溫卿（1981）論文，因為連溫卿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台灣的發展來分析台灣問題。該論文首先由戴國輝所公開（連溫卿, 1975; 戴國輝, 1975），詳情請見本研究第八章。

¹⁷⁶ 此外，在《台灣思潮》上圍繞著陳玉璽「依附發展論」而展開的論戰，也反映出台灣社會的劇變促使台灣社會主義者的革命論述有了新發展。然此已非本研究所能盡述。

2. 爭取資產階級的「迷思」：「民主主義」與「專政」的隱沒

總體來看，七〇年代海外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普遍認為資產階級——以本省籍為主體——是應當爭取的對象。這種看法的存在本身，或許正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第三期的特色。為了爭取本省籍資產階級，當時出現了兩條路線。第一條路線是「民主主義」，第二條路線則是「民族主義」。就二十世紀國際共運的標準而言，這兩條路線實不屬於同一層次。因為國際共運所關心的「革命性質」問題只在以專政問題為核心的「社會主義革命／民主主義革命」之間做選擇，「民族主義」永遠是外爍的。以國際共運中常出現的「民族民主革命」(National-Democratic Revolution)來說，並不是「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簡單相加，而是一個屬於「民主主義革命」範疇內的概念。因此，雖然「民主主義革命」並不必然聯繫「民族主義革命」，「民族主義革命」卻必須同時是「民主主義革命」。(以上關於「民族民主革命」的問題，本研究第七章有詳細討論。)

由於七〇年代的運動論述多半在字面上並舉「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加上這兩條路線都有利於爭取本省籍資產階級，因此很難僅僅從字面上判斷個別論述與這兩條路線之間的關係。但由於第二條路線有無條件爭取的傾向從而蘊含著背離國際共運傳統的危險，而第一條路線沒有，因此這種差別有可能成為鑒別的手段。

無條件爭取本省籍資產階級的首要代表是史明。他與左雄的論戰已經表露他是第二條路線的擁護者。由於史明公開反對國際共運，因此他直接從第二條路線發展他的論述。他認為，由於台灣存在「民族矛盾」，因此台灣應當進行以民族為單位的革命，而本省籍資產階級是理所當然的革命動力之一。為了論證他的這一論述，他竟在二十世紀國際共運所辯論的「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兩種革命性質之外另外發明一種革命性質，即其所謂的「殖民地革命」。

有條件爭取本省籍資產階級的代表則是前面已經分析頗多的《台灣人民》，因此該刊更接近第一條路線；這可能與《台灣人民》以「新民主主義革

命」為綱領有關。¹⁷⁷然而同樣接受「新民主主義革命」論述的《台灣革命》¹⁷⁸之傾向卻頗為詭異。雖然《台灣革命》從有條件爭取的角度指出：「台灣無產階級不能不提防而且囿限台灣資產階級妥協、軟弱的落後性，同時積極去發揮、聯合、領導這個階級反封建反帝的進步性。」¹⁷⁹但《台灣革命》的基本路線其實是無條件爭取。就像這段奇妙的話所說的：「當前的革命必須先打倒國民黨封建統治階級以及帝國主義，而不是先打倒台灣資產階級。現階段，台灣社會的階級鬥爭焦點在於、也必須使之發生於台灣革命人民與國民黨、帝國主義之間，不在於、也不能使之發生於台灣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之間。」¹⁸⁰

當路線遭到挑戰，這種無條件爭取的姿態就更加鮮明：

- (1) 第一個例子是該刊對於劉進慶論述的批判。該刊以《台灣人民》第九第十期所轉載的劉進慶論文為對象，¹⁸¹批判該文從共謀的角度分析本省籍資產階級與國民黨政權之間的關係，從而抹煞了本省籍資產階級（即《台灣革命》所謂的「台灣『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¹⁸²
- (2) 第二個例子則是該刊與東京朱世紀（1940-2007）所辦《台灣文化》之間的論戰。《台灣文化》反對《台灣革命》爭取資產階級的意圖，認為應該依靠工人階級與農民，但《台灣革命》堅持爭取。¹⁸³這一堅持延續到高舉「台灣民族主義」綱領的《台灣時代》時期。

《台灣時代》時期最顯著的現象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論述幾遭廢棄。這可能與「世界革命」在七〇年代走向低潮、文革結束、中共對台政策的轉變以及島內民主化運動高漲有關。以王凡西（1907-2002）為代表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在

¹⁷⁷ 《台灣人民》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部份可見：本刊評論員（1973a: 1-5; 1973b: 1-4）、春發（1974: 9-23）。

¹⁷⁸ 《台灣革命》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部份可見：台灣革命（1975a: 8-23; 1975b: 50-52）。

¹⁷⁹ 張敏（1975: 49）。

¹⁸⁰ 張敏（1975: 48）。

¹⁸¹ 劉進慶（1974, 1975b）。

¹⁸² 相關論點見台灣革命（1976a）。該文認為劉進慶所舉的紡織業資本恰恰不能說明本省籍資本與國民黨政權之間有共謀性格，因為紡織業資本多屬外省籍資本。關於這種見解，可見瞿宛文（2008: 209-214）的反駁。

¹⁸³ 《台灣文化》與《台灣革命》之間的討論可見台灣革命（1976b）。關於這場討論的評論可見美麗島週報（1981b: 12）所登載的《台灣時代》代表言論以及朱世紀（1981）的回應。朱世紀的生平可見陳銘城（1992）與吳明時（2004）的介紹。《台灣文化》還曾以「台灣民族解放統一戰線」的名義發行一些出版物。

1977年9月發表《我們對台灣革命問題的意見（討論大綱）》，該文明顯吸收了《台灣人民》以來的台灣論述但批判當時主張「新民主主義」的海外台灣社會主義者。可是，主張「新民主主義」的《台灣革命》當時早已停刊，而後起的《台灣時代》只偶爾提到一兩次且沒有上升綱領的層次。此一廢棄的過程體現出：由於「新民主主義革命」在1949年從理論成為實際，其典範遂使後來的第三世界國家及地區意圖模仿，並因為各地具體實踐的不同與局勢轉變而發生拆解或廢棄。¹⁸⁴

雖然「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在七〇年代的交錯與本省籍資產階級有關。但兩條路線的交錯也體現出「民主主義革命」論無法在台灣純粹出現的事實。當「民主主義革命」論多出一塊「民族主義」、當本省籍資產階級逐漸打開

¹⁸⁴ 「新民主主義」本身有幾個相互交錯的層次：第一個層次：「作為推翻舊社會之革命論述」的新民主主義，1919至1949年屬於該論述所適用的階段。第二個層次：「作為建設新社會之社會論述」的新民主主義，分別由1945年之前的陝甘寧邊區以及1949年後至社會主義改造之間的全中國大陸這兩個階段所構成（于光遠與韓鋼，2005）。「新民主主義」對於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各階段的影響以第一個層次為主，但略有差異。第一次影響是包括在全中國範圍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省工委鬥爭時期，當時第二個層次還沒有在中國消失。第二次影響則屬於是七〇年代海外社會主義運動，這是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並發動文革之後，也就是第二個層次在中國消失之後。雖然不同時期的參與者將因他們的存活而延續他們對於「新民主主義」的理解與感覺，卻也使這些彼此互異的理解與感覺發生衝突。因此就出現了從第二個層次延伸而來的「新民主主義」，姑且稱之為「被遺憾的新民主主義」。近年陳明忠與陳信行在《思想》上的爭論（呂正惠與陳宜中，2008；陳信行，2008）就是如此。這個層次的「新民主主義」可以包攝在大陸學界前陣子的熱烈討論之中：社會主義改造是否不可避免？「新民主主義社會形態」是否等於蘇聯的「過渡時期」？是否等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否可能重來？「二陳」之間的爭論屬於第二個層次上的辯駁，不包括第一個層次。而且他們並未實際討論「新民主主義」在什麼層次上仍具有有效性，或是否已然完全無效。在他們的爭論之前，汪立峽、蘇杰、蕭喜東（《中國與世界》雜誌創辦人）曾經在《左翼》第6至11號爭論過第一個層次的「新民主主義」與中共對台政策（轉變）的關係。這些爭論大都預設某些領導人（如毛澤東或鄧小平）的存在或決定可能扭轉了歷史的方向，差別只在於這些存在或決定究竟只是個人的、主觀的偶然，或者是某種集體的、客觀的必然（並以這些領導人做為這種必然性的載體）。若套用卡林尼克斯（Alex Callinicos）對於某些著名托洛茨基主義者歷史觀的評價，則前者有唯意志論的傾向，後者則是唯意志論的鏡像（Callinicos, 2007: 160-162）。但不管如何，目前以菲律賓為代表的第三世界地區仍然堅持第一個層次的「新民主主義」，並且已在尼泊爾付諸實現。這些地區的激越發展是否將會引起台灣的進一步討論？或者完全不能？值得關注。對於台灣來說，以「新民主主義」為對象的討論實際上牽涉到台灣人看待1949年及其之後的許多變革（如大躍進、文革、改革開放）的方式。學者呂正惠（2007）把台灣人是否認同1949年的變革視為台灣人「接近中國之路」的關鍵，某些學者則認為這種觀點是勝利者的回溯史學。雖然後者的觀點不無道理，但呂正惠觀點的關鍵也許並不只是認同1949年本身，而在於能否從1949年進而把勝利與失敗交織的1956年、1966年、1979年、1989年全部當成自己的歷史的一部分。如果只認同某段的歷史並且無法把「失敗」的歷史當成自己的一部分，就不可能認同整個中國。

一條奪取上層建築的道路，「民主主義革命」的內容便不免受到裁切。¹⁸⁵涉及社會主義運動奪取「上層建築」的「專政」問題就是經常遭到裁切的內容。

就國際共運的傳統而言，「專政」與各階級間的「統一戰線」是一體兩面的問題。如果主張無產階級一階級專政，當然就沒有統一戰線問題，或者只剩下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問題。¹⁸⁶但若主張兩階級專政（比方工農民主專政）或者多階級專政（比方人民民主專政），專政就直接成為了統一戰線；或者說，未來的問題便成為了當下的問題。因為當下的統一戰線之所以可能，有賴於未來的專政作為號召。又因為未來的專政性質決定了當下的統一戰線到底由哪些階級所組成，便進而決定了革命性質，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與「民主主義革命」的選擇問題。

台灣共產黨「一九二八年綱領」中的「政治大綱」（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c: 24-38），是台灣「運動」史上最出名的「民主主義革命」綱領（並別稱為「國民革命」）。雖然該綱領提出兩種政權設想，而這兩種設想同時也代表革命要分兩步走，但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專政性質卻沒有被這份綱領所提及：

- （1） 第一步設想：「共和國」口號。這個口號同該綱領的「台灣民族」概念有一定關係，同時也與該綱領認為「進步的資產階級」可以爭取有關。
- （2） 第二步設想：「無產階級專政」口號與「工農政府」口號。「一九二八年綱領」將二者視為在將來的「一定的時期」才要提出的口號。

雖然「工農政府」字面上長得很像「工農民主專政」，從而像是在表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權。但當時國際共運中的「工農政府」定義有歧義。有人將之視為「工農民主專政」的同義語，有人則視之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代名詞。¹⁸⁷由

¹⁸⁵ 關於民主主義在當時遭到其他主張（主要是「獨立」）所解消的問題，可見陳佳宏（1998: 180-183）的研究。

¹⁸⁶ 由於二十世紀初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導致一部分工人階級支持社會民主黨，另一部分工人階級則支持共產黨。這種分裂形勢促使工人階級統一戰線變成顯著的問題。

¹⁸⁷ 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十月革命的勝利，促使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發生劇變。傳統上構成「第二國際」主體的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與1919年成立的「第三國際」所率領的各國新興共產黨分道揚鑣，彼此打擊。但在歐洲革命形勢屢遭打擊的情況下，共產國際開始思考如何爭取各國社會民主黨影響下的工人階級。對此，1921年的共產國際「三大」與《十二月提綱》提出了「工人統一戰線」戰略。1922年的共產國際「四大」再次肯定這一戰略並提出了「工人政府」與「工農政府」口號，但主要是「工人政府」。德國共產黨的實踐經驗是「工人政府」口號提出的關鍵，而共產國

於「一九二八年綱領」將「無產階級專政」與「工農政府」並稱，因此台共比較可能將兩個口號視為同義。也因此，「一九二八年綱領」顯然只談「共和國」而不涉及「共和國」與專政的關係。然而這是很有問題的提法。

日本共產黨「一九二七年綱領」是考察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問題之重要參照系。¹⁸⁸共產國際為日共設計的這份綱領也規定日本的革命性質為民主主義革命。又由於該綱領認為日本的革命性質可以在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直接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因此只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權應當是「無產階級專政」，並同樣以「工農政府」稱之。

由於台共也認為台灣的革命性質有直接轉變的可能，因此，他們之所以不談民主主義革命的專政問題，其理由可能與日共相同。但既然革命性質的轉變

際對於這個口號的肯定促使了德共得以在 1923 年同社民黨共同在地方議會中組成聯合政權。但是，由於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的兩個國際組織——偏右的第二國際與偏左的「第二半國際」——於同年宣布合併（1923 年 5 月），共產國際內部便出現反對與社民黨共組「工人政府」的聲音。共產國際從 1923 年 6 月開始著重宣傳「工農政府」口號並放棄「工人政府」口號。這種變化乍看之下是強調工人與農民的聯合，實際上卻是於不再爭取同樣由工人所支持的社會民主黨，所以要著重爭取農民。無論是哪種「政府」（government）都能體現共產黨把「奪取政權」視為最重要任務的理論認識。但在這兩個圍繞著「政府」而提出的口號之前，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奪取政權」的設想是圍繞著「專政」（dictatorship）而產生的。巴黎公社失敗之後，馬克思得出了工人階級必須先奪取政權（＝工人階級專政）的結論。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則在十九世紀末期從工人階級專政延伸出工人與農民聯合專政（＝工農民主專政）的想法，並引起長久的論戰。因此，當「工人政府」與「工農政府」口號提出之後，馬上就面臨到如何解釋這兩個新興的「政府」口號與古典的「專政」論述之間的關係。左傾的解釋通常是強調「政府」就是「專政」，右傾的解釋則是強調「政府」是通向「專政」之前的步驟。當「工人政府」口號被放棄之後，「政府」與「專政」之間的關係急遽轉向左傾的解釋。1924 年的共產國際「五大」將「工農政府」解釋為「無產階級專政」。此後，由於革命形勢在歐洲與中國出現空前挫敗，遂使共產國際日趨左傾。1928 年 7-9 月的「六大」不但繼續強調反對社會民主黨，更開始把社民黨視為資產階級的左翼，而不再是工人階級內部的右翼。總體來說，「六大」的戰略意圖是把各國的階級關係簡單化，因此要求各國共產黨打擊同樣也有工人階級基礎的社民黨，並要求各國共產黨放棄因為各種因素而產生的「兩黨論」，以避免產生任何可能同社民黨混同的政黨並削弱共產黨的力量。自此之後，共產國際從統一戰線時期進入了所謂「（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左傾時代。以上，關於「工農政府」與「專政」問題的相關書目，本研究主要參考了 Фирсов（1985, 1988）、宋洪訓（1987）、程玉海（1987）、李忠杰（1988）、Резников（1988）、許可成與孔寒冰（1988）的論文。由於這些論文的年代較遠，因此不能反映最新的研究狀況，只能勾勒大概的歷史狀況。至於相關問題與台灣的关系，請詳見邱士杰（2009a）的介紹。

¹⁸⁸ 此綱領全文及其版本與傳播過程可參見山辺健太郎（1977: xxix-xxx, lxi, 84-95）所編資料集。該資料集所收之「一九二七年綱領」是綱領定案後於 1928 年發表於《マルクス主義》3 月號的版本，發表時內容多伏字（ふせじ），並有部分文字遭竄改。可另見村田陽一（1993: 194-225, 375-378）編譯的全文考證版。

有直接性，被台共列為民主主義革命範疇的「共和國」就沒有提出的必要，或應該把「共和國」口號同樣列屬於將來「一定的時期」才要提出的口號。

因為「共和國」口號有上述矛盾，就不難理解台共為何在後來的「一九三一年綱領」中廢止這個口號，並另外提出精確度更高的「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口號。¹⁸⁹

雖然「一九二八年綱領」的「共和國」口號與「一九三一年綱領」的「蘇維埃」口號都被規定在民主主義革命範疇之中，卻反映了不同的東亞局勢：（1）「共和國」口號體現出台灣要從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脫離出來的願望；該口號必須放在日本對台殖民統治的歷史情境下才能理解並產生意義。（2）「蘇維埃」口號則反映了當時中國各地的「蘇維埃區域」行將匯合為「中華蘇維埃」的局勢。由於「中華蘇維埃」擁有實際的佔領區，因此同時也具有「東亞蘇維埃」的性格。蘇新指出，他們當年為「一九三一年綱領」制定的「蘇維埃」口號實際蘊含著台灣合併於中華蘇維埃的估計。¹⁹⁰

雖然兩岸並沒有在「蘇維埃」的基礎上實現統一，卻因為統一而使兩岸的運動得到整合。在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第二期，台灣的運動成為中國革命的一部分。戰後五年內的統一以及緊湊的全國革命形勢，使產生於台灣與日本之間的「民族主義」相對解消。但由於二二八事件、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以及冷戰、內戰「雙戰結構」的成立，一部分人重新提出「共和國」口號。由於該口號緊密結合於「民族主義」等跨階級統一戰線口號、認為本省籍資產階級有革命性，加上本省籍資產階級從七〇年代開始展現出奪取「上層建築」的傾向，因此「共和國」口號隱沒了「專政」問題。除了史明始終是其中的極端典型之外，越近當代，「專政」就是越發隱晦，¹⁹¹「上層建築」的奪取也因此成為距離「運動」越來越遠的問題。

¹⁸⁹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c: 171-177）。

¹⁹⁰ 蘇新（1993b: 263-267）。

¹⁹¹ 如台灣民族民主革命同盟（1983）、台灣革命黨（1985）。

3.七〇年代以來的島內論述：

「新殖民地」、反壟斷、「波拿巴國家」論

如果以七〇年代海外「台灣左派」的論述為標準，那末以《夏潮》為代表的七〇年代島內社會主義運動顯然難以把握。《夏潮》的典型其實涉及到白色恐怖下的社會主義運動應當如何研究的問題。由於七〇年代仍是戒嚴時期，因此「我們沒有辦法用中共的語言，沒有辦法再回復到第三國際或台共的語言。」¹⁹²由於《夏潮》為代表的島內運動以孫中山或國民黨革命元老的左傾言論，乃至鄉土文學或民歌運動去宣傳社會主義，從而不可能像當時在海外批判《夏潮》的《台灣時代》那樣縱言高論。

雖然白色恐怖的環境造成了很多限制，但陳映真於 1994 年接受訪問時指出，《夏潮》為代表的七〇年代島內左翼運動實際上也沒有一套完整的論述，「《夏潮》的確沒有一個明確的綱領，理由是我們沒有台灣（的社會性質）分析論。」¹⁹³也就是說，《夏潮》主觀上沒有發展「社會性質」論，客觀環境也不允許發展。即便是《夏潮》系統所發動的鄉土文學論戰，陳映真也認為「沒有好好解決這個問題」。¹⁹⁴

但當陳映真深入探索「社會性質」論述史並重讀台灣的文學之後，他開始把他親身參與的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視為一場具有「素樸的歷史唯物論」與

¹⁹² 這是陳映真 1994 年接受郭紀舟訪談時的談話（郭紀舟，1995：訪問錄頁 30）。

¹⁹³ 陳映真緊接著說：「講一個例子，中共提出一套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主要來自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的分析，if 分析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太少而不是太多，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那這個社會需要的言論不是社會主義的言論，而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democratic revolution，中國的資產階級太薄弱了，數量少，而且品質也不是很健康，因為他是半殖民地社會所以這革命就落在以中國工人階級為核心，聯繫中國農民，這樣一個力量來代替資產階級，進行一場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一場革命跟歐洲不一樣，它是新民主革命，它就有這種綱領，它就知道誰是主要敵人，誰是社會變革中的主體力量，誰是同志，這都出來了。《夏潮》沒有……」（郭紀舟，1995：訪問錄頁 24）。

¹⁹⁴ 郭紀舟（1995：訪問頁 19）。

「社會性質論」的討論。他指出：王拓率先在七〇年代提出台灣經濟的「殖民地」性，也就是七〇年代台灣如何成為美日底下的「新殖民地」、「經濟的殖民地」。¹⁹⁵如林載爵所言：「鄉土，作為一種思想類型，它的第一個涵意是被殖民歷史的審視。」¹⁹⁶陳映真試圖透過他對鄉土文學論戰（或者特定作家的作品，如黃春明¹⁹⁷）的梳理，來說明當時的輿論者如何感知台灣被美日帝國主義所「殖民」。而當鄉土文學論戰逐漸豐富了台灣被「殖民」的內容，而這種內容又無法以傳統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概念——「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常常分別聯繫於「外來但強大的」與「本地卻積弱的」上層建築，以及無法資本主義化的經濟基礎（因此陷入「半封建社會」狀態）——來表述的時候，¹⁹⁸便為「新殖民主義」或「新殖民地」這些詞彙創造出使用的條件。

陳映真試圖從「社會性質」與「政權性質」兩方面來說明台灣的「新殖民地」性格：

(1) **社會性質：「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

陳映真發展其社會性質論之初，曾規定兩岸分斷後的五、六〇年代台灣「社會性質」為「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他很快就放棄了這個看法，轉而規定為「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¹⁹⁹雖然這種「社會性質」規定乃「新民主主義論」所未有，兩者之間卻有一貫的邏輯。陳映真的「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說明了台灣本土的資本主義如何在「新殖民地」的條件下發展，並說明了這種資本主義的發展如何因為「新殖民地」的限制而造成其他後果（如分離主義運動的產生）。因此「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既是「社會性質」論的發展，也是有陳映真特色的設定。

(2) **政權性質：「波拿巴國家」。**

又由於陳映真嚴格區分「半資本主義」與「半封建」，沒有把兩者簡

¹⁹⁵ 陳映真（1997）。

¹⁹⁶ 林載爵（1998）或如七〇年代的陳映真（1977: 76）所言：「對『西化』的反動和現實主義，是這一個時期文學的特點」。

¹⁹⁷ 陳映真（1999）。

¹⁹⁸ 比方劉進慶曾向陳映真指出「半殖民地」的概念不清楚，而且國民黨政府有政治上的主權，因此他不主張以「半殖民地」描述當時（1987）的台灣（陳映真與劉進慶，1988: 188）。

¹⁹⁹ 詳細過程請見邱士杰（2009b）的說明。

單視為對方的另外一半。因此陳映真的「半資本主義」規定，正反映了他認為五、六〇年代台灣「經濟基礎」得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持續替代」。然而陳映真的論證並未就此停留，他還進一步從國民黨政權的角色來說明「持續替代」的原因。他認為，由於戰後的資產階級體質孱弱，無力直接掌握上層建築並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因此國民黨政權成為一個形成「高度個人獨裁的」、「反共」的（Anti-Communist）、「次法西斯帝」的（Sub fascist）、「國家安全主義」的（Security-）、「美國附從」的（U.S. Client-）、「擬似」的（pseudo-）「波拿巴國家」（Bonapartist State）。²⁰⁰台灣的「波拿巴國家」為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累積與擴大再生產而設立，因此有一定的「相對自主性」。

陳映真的「波拿巴國家」論與「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規定，與七〇年代海外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論述互有異同。就相同的方面來說，他們基本上都肯定台灣的經濟基礎從五〇年代開始資本主義化，屬於「持續替代」肯定論。不同的是，七〇年代的海外運動者大多把國民黨政權視為「半封建政權」（包括主張「半封建社會」的劉進慶），並認為這種政權客觀上是資本主義化的阻礙。因此，當八〇年代海外部分獨立派運動出現「國民黨資產階級化」的論述時，曾遭「半封建政權」論者的抵制。²⁰¹然而「國民黨資產階級化」的提出，也體現出「半封建政權」論日顯不足。至少在運動內部，陳映真的「波拿巴國家」論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半封建政權」論者的理論困境。「波拿巴國家」論從後見之明的角度指出：國民黨政權在客觀上推動了台灣經濟基礎的資本主義化，代替資產階級而貫徹了資產階級的意志。

由於陳映真肯定國民黨「波拿巴國家」有利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持續替代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此他的眼光就更延伸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階段性發展，也就是從自由競爭向壟斷階段的過渡。特別是公營資本以外的民間資本。其實陳映真並不是第一個注意到壟斷資本問題的人。以《台灣時代》為例，該

²⁰⁰ 陳映真這方面的論述非常多，但請著重參見陳映真（1992a, 2003）、鄒議〔陳映真〕（2000）。值得注意一點：陳映真從來不說國民黨政權只是一個「波拿巴國家」，而是強調這是一個有許多規定性的「波拿巴國家」，比方「反共」、「對美扞從」，等等。如王振寰（1988: 135-136）所言，「即便我們稱第三世界國家為波拿巴式的國家，但本質上卻必須把它界定於世界經濟體系中來看」。

²⁰¹ 高成炎（2005: 497-500）。

刊就曾注意到資產階級內部出現了「壟斷」與「非壟斷」的差異。但由於他們更重視「本省／外省」（或用他們的話來說，「台灣／中國」）的不同，因此他們便略過「壟斷／非壟斷」的差別，而將本省籍的資產階級看成是鐵板一塊的、可以服從台灣「民族」整體利益的「（台灣）民族資產階級」。²⁰²由於《台灣時代》有這種預設，其他派別便也基於相同的預設來對話或者反駁。²⁰³八〇年代中期，由於許多中小企業無法克服島內經濟波動，「壟斷／非壟斷」的差別得以突出，因此當時就出現從經濟波動以及中小企業所遭遇的危機來解釋民進黨成立及其階級屬性的說法。並主張民進黨當時應該以「反壟斷聯盟」作為任務。²⁰⁴當然，既然把某部分的資產階級（無論是本省籍的資產階級或者非壟斷的資產階級）視為可爭取的對象，就具有「民主主義革命」論的性質。

雖然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中早就把「壟斷／非壟斷」當成問題，但陳映真對於這個問題的關心可能起自他所賦予高度評價的八〇年代「韓國社會構成體論爭」。²⁰⁵該論爭的特色就是把「（國家）壟斷資本」的存在視為運動必須重視的對象。²⁰⁶陳映真認為資產階級內部的主要矛盾是「壟斷／非壟斷」的問題，而不是「本省／外省」（或者「台灣／中國」）的問題；與劉進慶一樣，他也認為「階級」利益總是大大於「省籍」利益。據此，陳映真對兩蔣時代之後的形勢發展有幾點觀察：

- (1) 資產階級不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反而享受國民黨對工農的鎮壓。因此蔣經國之死沒有發生資產階級的革命或騷亂。這反映了國民黨政權與資產階級（無論省籍）之間的密切關係。朝野的政見也很類似。²⁰⁷兩蔣時代以後的政權是失去民族資本性質的官商資本的產物、是「世界體系」下「炮製」的國民黨政權「本地化」的延長與發展，而不是否定。李政權的成立使「本地台灣資產階級」全面獲取政權，並使官業私有

²⁰² 趙石（1978）。

²⁰³ 《台灣時代》所遭到的反駁可見何青（許登源）（1982）。

²⁰⁴ 相關論點可見葉芸芸（1988: 101-102）所記錄的李榮武、許登源的說明（他們主張壟斷問題的存在），以及夏沛然、陳玉璽的質疑。

²⁰⁵ 陳映真的相關評價可見：陳映真（1989: 2003: 46-47）、郭紀舟（1995: 訪問頁 22）。

²⁰⁶ 可參見陳映真（1989）以及臧汝興（2000）。

²⁰⁷ 可參見陳映真（1992b: 150）針對「台灣朝野反民族、反統一論的比較」所製的表。

化、由本省藉資產階級接收。²⁰⁸

- (2) 陳映真將上述過程視為「波拿巴國家」對於資產階級的「還政」，特別是其中的壟斷資產階級；李政權的形成則是重要指標。早期陳映真認為這一「還政」的過程導致「波拿巴國家」的「相對自主性向下調整」。²⁰⁹但在 2000 年民進黨取得政權之後，陳映真指出：「波拿巴國家」在八〇年代中期便已瓦解，並由壟斷資產階級所掌控。兩千年的大選並未改變這個局面，但原先代表「中小資產階級」的民進黨卻條地改變階級屬性，成為亟欲代表「大獨佔資本」（即大壟斷資本）利益的黨。因此運動的戰略應該是形成民主主義的「反壟斷聯盟」。²¹⁰

最後補充一點。雖然「波拿巴國家」與「新殖民地」的論述史有可能成為一條研究《夏潮》以來島內社會主義運動史的線索，卻未必只能如此。²¹¹運動的「跨世代結合」就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夏潮》以來的島內社會主義運動是一個由新生代運動者與上一代運動者——主要是獄中獄外的政治受難人——結合的產物。跨世代結合的《夏潮》再現了戰後五年間的情景，從而就某種意義上來說體現了台灣的運動特色。如果用「漫長」與「短暫」來形容，這種「跨世代結合」所形成並接續起來的運動，目前來看是二十世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最漫長的一支，但不是只有這一支。「跨世代結合」意味著：（1）由於運動無法或尚未出現**內在增長的動力**，因此只能因著不同時代階段的刺激而產生不同世代的運動者，並以此為基礎「結合」起來；（2）實現「結合」的運動脈絡可能會與尚未或無法「結合」的其他運動者產生矛盾。因此，如果不把「跨世代結合」這個切入的角度考慮進來，不但可能無法研究形成「結合」的運動脈絡，「未結合」者可能也無法研究。然而應當如何具體運用，還須進一步提煉與探索。

²⁰⁸ 陳映真（1994, 1995a, b）。

²⁰⁹ 陳映真（1992a）。

²¹⁰ 鄒議〔陳映真〕（2000）、陳映真（2000）。

²¹¹ 以郭紀舟對於《夏潮》的研究來說，他援引葛蘭西理論，在「分析架構」上將《夏潮》視為「在市民社會中進行文化霸權的奪權鬥爭，以及有機知識分子從事陣地戰的意識型態運動，以此觀察、檢視夏潮系統在七〇年代於台灣進行的左翼運動形構。」（郭紀舟，1995: 12）。

第三節、研究的總結與再展開

1. 第二節的總結

第二節提示了以下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 (1) 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三個時期的論述**可以有效彰顯運動的對象性**。雖然社會主義運動是多樣性的統一，但台灣運動的持續存在，顯然首先表現在長期存在的「論述」上，然後才表現於各種組織或者個人。又由於長期存在的「論述」始終以「民主主義革命」為主流，而「民主主義革命」論是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產物。因此台灣的「論述」顯然長期與馬克思主義有關。最後，由於「上層建築／經濟基礎」之間的關係是台灣的「民主主義革命」論最突出的框架，因此「民主主義革命」論與「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框架的結合及其演變，正體現了「運動」成為台灣「運動」的過程。
- (2) 此外，無論是哪一個時期，「民主主義革命」論都與某種「半封建」論相結合——無論它是「半封建社會」論還是「半封建政權」論。「半封建」在第一期與第二期多被用來指涉「經濟基礎」，故有所謂「半封建社會」之語；在第三期則被用來指涉「上層建築」，而有所謂「半封建政權」之說法。發生語意變遷的原因有二：首先，「持續替代」趨勢越往後期越顯著，致使越後期的台灣社會主義者逐漸縮減「半封建」的適用範圍；其次，同時把「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規定為「半封建」的「新民主主義論」在第二期輸入了台灣，從而為語意變遷創造了條件。
- (3) 雖然三個時期都存在某種「半封建」論，但是：
 - i. 在台灣確實處於「半封建社會」的第一期，日後看來不盡正

確的「持續替代」肯定論比「半封建社會」論更早出現；

- ii. 在「持續替代」確實展開的第三期，日後看來不盡正確的「半封建政權」論則是首先出現的見解。

這些現象反映了各時期台灣社會主義者認識能力的限制：顯示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如同其他地方的社會主義運動那樣——並不是登上歷史舞台之後便有能力使理論結合實際。

總體來看，「民主主義革命」論與「半封建」論的結合貫穿了二十世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三個時期，此現象說明跨階級的統一戰線始終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試圖實現的目標。**但在二十世紀台灣史上，跨階級的統一戰線並不是只能透過「民主主義革命」論與「半封建」論來表述。**1924年之前在運動中出現的所謂「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就是一個不以「民主主義革命」論與「半封建」論去表述跨階級統一戰線之可能性的論述。這個論述就是本研究的研究重心。

2. 出現於 1924 年之前的「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述

本研究所將說明的「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與山川均與矢內原忠雄所曾注意到的兩個現象有關：首先是涉及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關係的「原始積累」，其次則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資本集中」。這兩個現象被主張「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的台灣社會主義者所注意。雖然他們當時並沒有認識到「原始積累」與「資本集中」這兩個範疇，他們卻意識到了這兩個範疇所共有的「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現象。又由於這一現象為該二範疇所共有，而當時的台灣社會主義者並沒有能力區分，他們便混淆了「原始積累」與「資本集中」，並提出所謂「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該論述認為，台灣人民各階級將因日本資本的侵蝕而陸續同生產資料相分離，終至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

產生「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的原因，可能是提出該論的社會主義者

試圖說明自一九二〇年代之初便透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而登上政治舞台的本土經濟實力者（比方資產階級）與革命的關係。雖然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幾乎都把本土經濟實力者視為反革命的存在，但「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卻提出了反論。該論述認為本土經濟實力者有破產的前景，因此這種前景得以成為社會主義者爭取他們的條件。但本土經濟實力者之所以成為社會主義者想要爭取的對象，則是因為 1923 年底發生的、以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參與者為對象的全島大鎮壓，「治警事件」。該事件體現出請願運動者的反日意志，遂使當時的台灣社會主義者改變了原先敵視他們的看法，轉而在論述上提出爭取他們的方案。

「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可以視為一種「持續替代」肯定論。雖然這種論述僅僅是從階級分化來說明「持續替代」，而不是階級分化背後所可能隱藏的「原始積累」或「資本集中」等範疇來說明。但對當時的台灣社會主義者來說，感知到某種客觀趨勢的存在（比方「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或者從某種客觀趨勢去說明事物存在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乃是逐漸發展起來的認識。

由於當時的台灣社會主義者認為革命動力決定革命性質，因此主張「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的論者同時認為台灣可以直接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然而持這種見解的運動者並沒有如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那樣把「奪取政權」同社會主義革命聯繫起來（也就是把「上層建築」的奪取視為改造「經濟基礎」的前提與「上層建築」本身消亡的前提）。雖然這些運動者在「奪取政權」問題上所出現的這一空白，現象上相似於「專政」問題在日後台灣的長期隱晦。但此時的空白可能更反映出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因為無政府主義反對依靠奪取政權來實現革命或革命成功之後繼續存在政權。

「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的集大成者是許乃昌。由於許乃昌的關係而首先針對該論述提出批判的人則是瞿秋白。瞿秋白反對許乃昌把社會主義革命規定為台灣的革命性質，而認為台灣應當進行具有民主主義革命性質的「國民革命」。瞿秋白的「國民革命」建議，是一個開端。一方面，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自此之後屢屢引入中國革命中的民主主義革命代名詞（如二〇年代的「國民革命」與四〇年代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並規定台灣的革命性質為民主主義革命；另一方面，在大陸上與「國民革命」相結合的「歷史建構」也出現在日後台灣的運動

中。在大陸上，「國民革命」與「歷史建構」的結合產生在革命的「統一戰線」日趨拓展的過程中，並在拓展的過程中同「持續替代」否定論相結合。雖然「持續替代」肯定論——比方「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未必不能展開「歷史建構」，但現實中確實看不到。

3. 研究的再展開：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

「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並不是憑空出現的論述，而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在「萌芽期」的理論成果。因此，只有全面理解該論述所賴以存在的時空環境、組織沿革、個人經歷等存在，才可能更好地理解該論述。這些存在構成了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同時也是既有研究所沒有觸及、或者誤以為觸及的一九二〇年代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之起源。

本研究將指出：島內外曾在既有研究所關注的 1927 年之前出現過各種試圖建立起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社會主義的常設性組織的活動。雖然組織未能得到維持，但成員多能在其他的運動之中獲得保存。1927 年的文協左右分裂，乃至台灣共產黨的成立，都與前一階段的保存或鍛鍊有關。本研究愈前面的章節必須愈從更長的時間才能見其社會主義傾向，愈後面的章節則越縮限於本研究設定的研究下限，也就是 1924 年本身。之所以將下限定於 1924 年，在於當年是台灣社會主義組織前所未見地同時出現（甚至通向組黨）的一年，同時也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理論發展的第一次高峰（「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自此之後，直到 1926 年底至 1927 年初，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才再次抬頭。

除了習見史料——如《台灣社會運動史》——之外，本研究將著重使用一些新史料。

- (1) 檔案：首先是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收藏之《外務省紀錄》。《外務省紀錄》的部份檔案比《台灣社會運動史》更為原始，甚至有收有

史料原件。其次是目前已經部分公開出版的共產國際台灣檔案。²¹²

- (2) 刊物：主要是目前甚少或尚未得到使用的各社會運動組織的機關刊物。比方：上海「平社」的《平平旬刊》(1924)、北京「新台灣安社」的《新台灣》(1922-1926)、廈門「中國台灣新青年社」的《台灣新青年》(1925)，還有各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機關刊物，比方：廣東《春雷》與《民鐘》，上海《新青年》。
- (3) 報紙：主要是既有研究歷來不涉及的大陸報紙。這些報紙都曾登載有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消息。如：上海《民國日報》、北京《晨報》。
- (4) 日記、回憶錄：比方 1924 年連溫卿赴日期間寫下的《蠹魚的旅行日記》，比嘉春潮(1883-1977)的回憶錄等。
- (5) 稀見書籍：比方日本女性社會主義者山口小靜(1900-1923)的遺稿集《匈牙利的勞農革命》等。

本研究擬按照組織形成的沿革為線索，以利於敘述多數互有關連的歷史現象。本研究將分別以日本與島內社會主義者的連帶、島內既有的社會運動、島外無政府主義運動、島外無政府主義運動與共產主義運動的混合，以及島外共產主義運動為主軸。本研究試圖透過此一敘述順序的安排來體現運動當時的變遷。

雖然本研究將把「共產主義」視為「布爾什維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同義語，並且將不細究無政府主義內部的流派之別(實際上，現有的史料也無法使細究成為可能)，但藉由突出「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兩條路線的差別，本研究希望能藉此看到兩條路線之間的聯繫；細心的讀者必然發現，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相容與分離也是本研究的一條主要線索。此外，在不同的章節內，本研究還試圖揭示當時的台灣社會主義者與島外社會主義勢力的接觸關係。這種接觸關係由於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乃至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不同派別)以及社會主義者們的跨地域交往而顯得複雜。

²¹² 收錄於 K. M. Терпский (2005) 所編著書。並可參見 Pantsov (2007) 對該研究的簡短書評。

第一章、一生只能開花一次青春

中以後之歷史，青春之歷史，活青年之歷史也。青年乎！其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茲砥柱中流之責任，即由今年今春之今日今剎那為時中之起點，取世界一切白首之歷史，一火而摧焚之，而專以發揮青春中華之中，綴其一生之美於中以後歷史之首頁，為其職志，而勿逡巡不前。華者，文明開敷之謂也，華與實相為輪迴，即開敷與廢落相為嬗代。……願華常得青春，青春常在於華也。宜有即華不得青春，青春不在於華，亦必奮其回春再造之努力，使廢落者復為開敷，開敷者終不廢落，使華不能不得青春，青春不能不在於華之決心也。

——李大釗，1916¹

整整二〇年代的前一代，和四〇年代後半以迄五〇年代初的您們一代，雖然有世代之別，但是您們都同樣地把一生只能開花一次青春，獻給了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事業；您們都抱著對於自由、光明和幸福的應許與憧憬，打碎了自己。

——陳映真，1995²

¹ 李大釗（1916：抽印頁 7-8）。

² 陳映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受害者春季追悼大會」祭文〉（海峽評論編輯部，1995）。

第一節、余清芳與謝晉青

1. 無政府主義者余清芳

1915年，這是台灣進入二十世紀之後一個非常特別的年份。

首先，台南西來庵爆發了由余清芳（1879-1915）、江定（1866-1915）、羅俊（1854-1915）等人所領導的農民武裝起義。現象上，這是日本殖民台灣期間規模最大、宗教性格最強烈、同時也是具有結束意義的漢人武裝起義，史稱「噍吧哖事件」。其次，由日本伯爵板垣退助（1837-1919）赴台推動的「台灣同化會」遭到總督府當局命令解散，此事乃是《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認定的「台灣社會運動史」開端。其三，由島內知名士紳所出資、波折甚多、籌備也久的「台中中學」正式招生開學，而「台中中學」設置運動正是經歷過那段時光的島內士紳所追加認定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的濫觴」。³

這三個看似互不相關、沿革各異，卻又相互交錯於1915年的事件，使得1915年成為一塊界碑。1915年象徵著「前資本主義的／島內的／漢人武裝鬥爭」向著異質性的「資本主義的／島內外並起的／社會運動」轉化的分水嶺。然而余清芳及其領導的武裝起義並不僅僅是前一階段反抗形式的代表而已。曾親歷那個時代的日本大阪無政府主義者——逸見吉三（1903-1981）——證言了余清芳及其起義之意義實跨越了1915年所劃開的兩個階段。因為領導暴動的余清芳是個有著日本社會運動體驗的無政府主義者。

逸見回憶：當年余清芳因向學心切而曾渡海赴日求學。余清芳到橫濱後，一方面以理髮討生活，另一方面孜孜不倦地自學。當時橫濱有個直接行動派（直接行動グループ）的祕密集會，這是由該派倖免於幸德秋水「大逆事件」的

³ 蔡培火與陳逢源等（1983）。

吉田只次，田中佐市，村木源次郎和渡邊政太郎等人所組織。當時，余清芳工作的理髮店常常有位身材短小，舉止溫厚的日本人來理髮。是個雖有學究氣但與眾不同的工人。當時謠傳他是牽連在大逆事件中的一個危險份子，常有人跟蹤。但透過理髮時點點滴滴的交談，似乎開啟了本來多少有點消沈的余清芳的心扉。而當余清芳受邀前往拜訪，才知此人乃是吉田只次。此後余清芳開始參加直接行動派的集會，而應與該派人其他人士交往。他耽讀他們所提供的書籍，並以幸德秋水為首的直接行動派無政府主義為他自己的思想。⁴不久，日本官憲開始注意余清芳及直接行動派在橫濱的活動，理髮店的台灣人同工怕被牽連，店主亦怕麻煩，遂迫余清芳辭職。此後他輾轉於西日本的神戶、大阪一帶，但不久便音訊杳然。⁵

「我們再度聽到余清芳的消息是來自同情左派的記者宗上先生所秘密傳來有關台南大暴動的查禁新聞。」⁶所謂台南大暴動，就是爆發在西來庵的「噍吧哖事件」。逸見認為：西來庵事件由於其深遠的政治意義，長年來其消息被日本政府所封鎖，即便在解禁之後，亦僅允許官方見解的流傳，將余、羅等人的行動曲解為迷信所驅使的反文明暴動。事實上余清芳等人所謀求的是由台灣人自身相互扶助的共同社會，為其大眾化，遂以所謂大明慈悲國調和入宗教性，實際卻是非常現實的大眾蜂起。「就余清芳試圖將自己在日本所認知到的思想帶回故土實踐來說，他比我們更是先行者，是不二的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者。」⁷

⁴ 幸德秋水(1997: 104):「直接行動是英文 Direct Action 的譯語，是歐美工人運動常用的名詞……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專用名詞。它只是意味著，為了增進工會全體的利益，依靠議會不能解決。」
「但是，現在說贊成直接行動，也並不是說一切直接行動都贊成，不經過議會，什麼都可以幹。說不經過議會就是直接行動，那豈不是暴動、殺人、偷竊、欺騙都是直接行動嗎？用這種比法去推論，當然是錯的。」

⁵ 逸見吉三(1976: 10-11)。逸見這部份的回憶改寫自逸見吉三(1971)，並已有《台灣思潮》的中譯(逸見吉三, 1982)，但譯文為意譯，且文意略有不同。

⁶ 逸見吉三(1976: 11)。

⁷ 逸見吉三(1976: 14)。

2. 無政府主義者謝晉青

雖然逸見看見了余清芳及其大革命實踐而出的無政府主義，但余清芳是否真是一個有過日本社會運動體驗的無政府主義者？這是本研究尚無法證實的問題。但就算逸見的證言只是個故事，以無政府主義者為先驅的社會主義者卻正如逸見的故事那般，在台灣社會運動誕生之初便介入運動。當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者在 1921 年的東京使 1915 年以來的台灣社會運動暗流正式浮上檯面，社會主義者也將同時站上這段運動史的舞台、甚至更早。而大陸留日學生謝晉青（晉青、晉卿，?-1923）就是此時首先站上舞台的一個代表。

謝晉青是誰？他是 1920 年前後赴日留學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也是將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消息及理論大量傳入中國的重要推手。當時的謝晉青曾在東京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中辦起一個販賣進步刊物的「東方書報販賣社」，一時成為各國社會主義者的文化中心與藏匿處。後來，謝晉青與羅任一（羅豁、羅志道，1897-1965）、高一涵（1884-1968）殷汝耕（1885-1947）等旅日學生進一步組織了名曰「東京通信社」（1920.7）的小媒體。⁸假使翻開同時期的上海《民國日報》及其副刊《覺悟》，就能看到許多由謝晉青及羅任一所譯撰的許多日本社會運動消息與理論。通信社成立後不久，謝晉青更迅速將報道的視線從日本「內地」延伸到至日本的殖民地——台灣與朝鮮。1920 年 9 月，謝晉青寫下一篇題為〈台灣與朝鮮〉的文章。此文專述朝鮮與台灣人民的共同苦痛，並以已經展開各種激烈反抗運動的朝鮮為參照，而對尚未產生解放運動的台灣表示惋惜：⁹

我們很長久沒有聽說台灣人對日本有什麼動作的表示。據我所看見的台灣留學生和僑居日本的商人等，似乎都很恭順於日本的。不過我沒有親自到過台灣內地，不能說出他們內地人的真實情況。……

我知道台灣人——有覺悟的——心中是非常痛苦的，有意思不能發

⁸ 關於謝晉青、羅任一等人的組織活動，詳見本研究第三章的介紹。

⁹ 晉青〔謝晉青〕（1920b）。

表。若是一句話不對，立時就要吃瀾天的大禍！他們也想回到中國，但又因為有財產的束縛——財產不得移出境外——況且中國又是終年戰亂的黑暗地方，回來也是不能自由的！

零零丁丁的台灣人，在偌大一個世界裡，竟沒有一塊能容他的地方，更沒有一點容他說話的空氣，真是苦的很呀！

雖然他的惋惜乃以「似乎都很恭順於日本」的台灣留學生及僑商為對象，然此並不意味謝晉青的關懷及視角狹窄。實際上，僅僅一個月之後，謝晉青便把視角轉向了台灣原住民，發表了題為〈台灣生番的精神與道德〉（1920.10.18）的文章。他譴責日本人對於原住民的鎮壓，更歌頌原住民的反抗。¹⁰

也許謝晉青並未將自己當成局外人吧，他對台灣的關心持續著。當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正式展開（1921年1月30日在東京遞交請願書），謝晉青的視角便又轉回僑商士紳。然而，此時的他已不是惋惜這些人沒能形成反抗運動，而是直言譴責其運動所體現的性質。他譴責領導議會請願運動的「紳士們」，只敢要求台灣「自治」而不敢要求從日本「獨立」出去。他在〈台灣人底政治運動〉（1921.2.16）中寫道：¹¹

現在的世界大局變了，台灣底紳士們，聽見愛爾蘭、菲律賓、印度等，都有自治底聲浪，所以他們——台灣紳士——也就來向日本人要求自治。要求獨立底話，它們是不敢說的，並且也是不敢想的；所以只有要求要求極小範圍的自治。他們底目的，是想要日本政府撤廢或改訂這六三法令，給予日本國民所守的同樣的法律與他們。唉！要和日本人守同樣的法律！其實，日本底國民現在是否能得自治？台灣底紳士們呀！你們在奴隸地位上，不必向主子計較待遇底優劣。你們果然想自由，還須轉回頭來，向著三百萬同胞們要求。不然，我就要說：你們運動底目的，是為著當日本底議員，做日本底官吏。

謝晉青的嚴厲批判引來了文學家劉大白（1880-1932）的反詰。他在〈台灣底富翁

¹⁰ 晉青〔謝晉青〕（1920d）。意在言內地說，謝晉青是在歌頌台灣原住民的反日鬥爭；意在言外地看，原住民乃是謝晉青歌頌無政府主義的自然生活的媒介，因為他眼中的原住民的原始生活不需外來文明便能幸福。

¹¹ 晉青〔謝晉青〕（1921a）。

巨紳和橫濱底僑商領袖〉(1921.2.23)一文中指出：¹²

晉青君對於台灣底富翁巨紳底向日本政府要求及小範圍的自治，頗不滿意；但是我覺得他們到底嚐過了亡國奴底滋味，不能不說他們多少有一點覺悟！你看像橫濱底僑商領袖，還在那兒借〔藉〕著日本政府底勢力，拼命地興文字獄，構煽黨禍，鍛鍊株連，陷害同胞，恨不得早點作亡國奴才好哩！

雖然謝晉青與劉大白的討論並無後續史料可以說明，但謝晉青對於請願運動的揭發卻是現知最早來自社會主義者的批評。謝晉青心中大概有個「解放運動」的藍圖吧！與請願運動相比，朝鮮或台灣原住民的反抗形式也許更符合他的期待。雖然謝晉青本人因病早逝（1923年逝世）從而無從猜想其最終想法，然而他在「東京通信社」的同志——羅任一——卻於1924年實現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第一個成功組織化的團體，也就是「平社」（詳見本研究第四章）。

從逸見吉三眼中的無政府主義者余清芳，到關心台灣的謝晉青；從謝晉青批判請願運動，再到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實現組織化。其間經過將近十年的時間，也經歷了余清芳與謝晉青的先後謝世。這些青年革命者的過早逝去似乎是這個時期的普遍現象。而早逝的女性社會主義者山口小靜（1900-1923）¹³就是又一個過早耗盡她「一生只能開花一次的青春」的台灣社會主義青年。

¹² 漢青〔劉大白〕（1921）。

¹³ 近代日本社会運動史人物大事典編集委員會（1997: 688）。

第二節、背叛保守家庭的造反少女：山口小靜

午後，又單獨到海邊，這次才看到蔚藍而燦然的海。一個人真想跳起舞來。好多裸體的人在拖著翻覆的船隻上岸。

躺在沙灘上讀《俊寬》。

七點左右回到家裡，山口小姐已經早一步先走了。

——永倉照子日記，1920年2月18日¹⁴

1. 皇國氛圍的台北與社會主義的東京

山口小靜生於一個全然與社會主義思想扞格不入的保守家庭，同時也生長在日本殖民壓迫之下的台灣。小靜的父親山口透（1856-1938），曾在甲午戰爭之際擔任近衛師團的從軍記者，隨著最終死於台灣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行走各地。後來則擔任起供奉北白川宮之台灣神社的神官。小靜的祖父、父親、母親，均有深厚的漢學或國學背景，祖父並在台北各校教倫理。小靜的大哥也是神官，二哥則畢業於東大法學院，是右翼團體「興國同志會」的一員。對於少女時代就被視為才女的小靜，山口家也進行了有計畫的培養，1916年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女學校（今北一女）之後，便送至東京就讀女子高等師範國文科。¹⁵她

¹⁴ 林てる子（1995: 273）。

¹⁵ 此處關於小靜生平的說明，俱來自山川菊栄（1972: 344）。關於山川菊栄對小靜的回憶，多已收入其文集《山川菊栄集》。其中內容有不少重複，而平凡社版的《おんな二代の記》可同時覆蓋散見於《山川菊栄集》各卷的大部分記載，故本研究將以平凡社版《おんな二代の記》作為研究的底本。《山川菊栄集》中涉及山口小靜的部份可見：山川菊栄（1982a: 14-20, 67-86; 1982b: 260-272, 290-293）。關於小靜就學的詳細資料，則來自竹中信子的記載。竹中信子（1996: 244）並云之就讀「台灣總督府高等女學校」期間，屬於第十期生中組。但當時校名應為「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女學校」。

父親準備讓她在女高師畢業後當上女子學習院的教授，期待有朝一日能成為皇族公主的恩師。¹⁶

小靜十歲時，發生以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1871-1911）為主角的「大逆事件」。當局宣稱幸德等人意圖以炸彈暗殺當時的明治天皇。在一次飯後聊天裡，對著小靜及其母親，山口透以此事問她們兩人的感想。小靜的母親贊同山口透的判斷，認為這些社會主義者都是壞人。然而小靜卻語出驚人表示不以為然的看法。其言一出，不但極大地激怒其父親，她母親也將小靜拉至另處，看著她，悲憤欲絕流著眼淚說：¹⁷

生出會說這種大逆不道之言之女兒，是我的恥辱，我對不起妳父親、對不起國家、也對不起供奉在神社的北白川宮。我要把妳抓起來刺死，我也要切腹謝罪。

小靜幼年的這番經歷，仿若是種預示。

小靜年長之後遂前往東京女高師學習。1919年前後，小靜結識了兩位成為終生友人的女同學：永倉照子（永倉てる子、林てる子，1900-1923）與貝原泰子（貝原たい子、西たい子，1894-1930）。永倉照子曾在其日記中記下了她與小靜當年的苦悶：¹⁸

〔1920年2月17日。〕終於下雪了，一天中翻翻雜誌，在床上翻來覆去，吃著納豆，與山口小姐聊天，感覺到人類被安排的境遇是很重要的，田園的土味，無論如何是拿不掉的，我們會反抗環境，最終還是會被環境所征服。

山口小姐是個懷疑家，因為動彈不得的處境而感到被囚錮。但她卻是一個不能不動的人。

〔1920年2月18日。〕如雪國的陽光那般矇矓的太陽出現於松林之間，仰首看了幾次，會是好天氣吧。很想看藍色的海，真是不看就不想回來，早餐後，兩人相伴到海邊，淺綠色的海，漆黑的天空，山口小

¹⁶ 1916年至1917年間，小靜及其家人曾在《台灣日日新報》上發表許多和歌，小靜自己創作的有兩首（山口小靜，1916, 1917），其中一首收錄在其父親為了恭賀裕仁立為儲君而安排的祝賀專欄。由此可見其家庭的皇國氣氛。

¹⁷ 河崎なつ（1923：附錄頁8）；山川菊栄（1972：226）。

¹⁸ 林てる子（1995：272-273）；林てる（1923：附錄頁6）。

姐在冷風中靜默地佇立著。我將頭縮在風衣裡獨自走著，真受不了這麼憂鬱的海，我滿心渴望著光明。

被禁錮的、在冷風中凝望著海面的小靜，當時想到了什麼？

1919 年秋，作家有島武郎（1878-1923）在東京女子大學發表演講，小靜起而提出挑戰性發言，在女學生中造成轟動。¹⁹不久，小靜等三個女學生前往著名的社會主義女性解放運動家山川菊榮（1890-1980）居所拜訪。²⁰山川菊榮的愛人即山川均（1880-1958），是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先驅及領導人，也是日本共產黨創黨期的關鍵人物。對於始終感到思想受到束縛的小靜來說，她與山川夫婦的接觸是其急劇激進化的契機。小靜自此開始參加山川均所主辦的社會主義研究團體「水曜會」。²¹1920 年夏天，小靜並與永倉、貝原等女學生進一步組織了社會主義研究團體，也集會於山川家中（東京府荏原郡大森新井宿六八二番地²²）。山川均回憶：²³

好像是 1920 年的夏天，有五六位女性說要開研究會而來使用了我的住家。就在這研究會上，我首次認識了山口小靜氏。

在這會上，我也講過一二次話，當時我就認為，這是位難得的、思路明晰的人。

山川菊榮則云：²⁴

這一沒有正式名稱的女學生團體，每週或隔週到我在大森新井宿的家裡集會，有時我作講話，山川先生也來講過。記得當時是好像不以婦女問題而以社會主義的原則論為主題。因時際會，常提起俄國革命，剛好羅素也到中國訪問，改造社的山本實彥就順便請他到日本，這位羅素以純然英國式的自由主義立場對布爾什維克革命提出猛烈批判，當時正值堺利彥與山川進行反擊的時候，當然這些也會被提出來討論。

不久，與會同學希望能進一步與女性勞動者交流。於是山川菊榮便至勞動

¹⁹ 貝原たい（1923：附錄頁 4）、山川菊榮（1972：225-225, 343-344）。

²⁰ 山川菊榮（1972：224, 343）。山川菊榮對於山口小靜等人初次拜訪的時間分別有 1919 年夏天與 1920 年初夏兩種記載。

²¹ 山川菊榮（1972：346）。

²² 山川振作（1976：449）。

²³ 山川均（1923：附錄頁 1）。該文並收錄於山川均（1976b）。

²⁴ 山川菊榮（1972：344）。

總同盟本部與鈴木文治(1885-1946)等人會面。恰巧有一《日日新聞》記者在場，菊榮本不欲明言。但因鈴木與那位記者的保證，菊榮便將女學生們的希望說了出來。同年5月便與富士瓦斯紡織會社幾位熱心的女工在鈴木家進行了半天愉快的座談。本來還想每月進行一次，然而女工旋因罷工失敗而被解雇，而且那名記者竟將座談會寫成同月28日《日日新聞》的頭條，導致警察衝到東京女大恐嚇校長安井哲子。沒有面對過警察的校長便在驚慌中開除了永倉照子與貝原泰子。²⁵

2. 離開學校之後的生活鬥爭

由於小靜自十七、八歲便肺病纏身、又想專心於社會運動，早先即曾自請退學。但校方愛惜她的才華，便勸她保留學籍；只要接受形式上的考試，便能於次年1921 3月畢業。然而《日日新聞》的報導扭轉了一切。女高師一反態度，竟將小靜無預警退學。²⁶

永倉與貝原，後來分別與新人會的指導者林要(1894-1991)以及《社會主義研究》的編輯西雅雄(1896-1944)結婚。隻身離家的小靜，則因愈發嚴重的肺病而決定離京療養。永倉照子寫給林要的信中提到：²⁷

{ 1920年12月11日。關於結婚之事， } 也有山口小姐的恭喜。但她還是要獨行，感覺路是要一個人獨行的。山口小姐與菊榮夫人，可能對我有所不滿。但就積極面而言，大概也不至於放棄我。山口小姐說：「我將暫時對付病魔，等著您重新出發的日子。」

小靜自1920年9月起，連續有38、39度的高燒，10月11日更住進醫院。²⁸與此同時，山川均也因重病而被醫師要求暫離東京去靜養，遂於10月轉移到茅

²⁵ 山川菊榮(1972: 344-345)、山川菊榮(1995)、江刺昭子(1995)。關於這一事件的詳細說明還可見林てる子(1995: 372-373)。

²⁶ 山川菊榮(1972: 346)。

²⁷ 林てる子(1995: 422)。

²⁸ 山川菊榮(1972: 347)。

崎西海岸暫住。²⁹小靜拜託山川菊榮，在山川均居所附近找處套房給她。被退學的貝原泰子也受山川菊榮的拜託而至當地照顧山川均。小靜於 12 月到茅崎海岸。³⁰在茅崎的這段期間裡，山川均與小靜有了更多的往來，山川均回憶道：³¹

那年冬天，在我轉地療養的地方，有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幾乎每天都和山口氏有談話的機會。同志山口小靜氏是我所認識的許多同志中，能最切題提問的人。而且對我前日所講過的話，還能在次日反覆思考的人。幾個月之後回來，她已成為了卓越的馬克思主義者，優秀的共產主義者，並且是一位熱烈的革命家。直到同志山口小靜氏死後，才聽到她為決心投入實際運動而放棄與愛人結婚的悲壯傳言，當時我並不感到意外。她愛無產階級革命更甚於愛其愛人，³²我不僅以稱呼其同志為榮，更以稱呼其勇敢的同志、尊敬的同志為榮。

1920 年冬天到次年春天，我在茅崎海岸進行轉地療養，當時也正如現在過著自炊自食的生活，不久，山口氏離開了大阪的醫院，搬到我居處的附近來，其中幾乎有一半的時間在我住處生活。午飯的時候，她就提著加熱便可食用的牛肉鍋，到我這裡一起吃飯。天氣好的時候，就扛著那塊灰色的毛毯，邀我一起去海邊曬太陽，一起躺在那裡互相朗誦著第三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

在茅崎療養期間，小靜說要做點事情，所以山川均讓她研究匈牙利工農革命。成果則在 1921 年 9 月底的水曜會例會上發表。³³

1921 年春，小靜從茅崎轉到鵠沼的農民家庭療養。因拒家中接濟，上京尋職；但由於有病在身，無法找到適當的工作。那年夏天只好暫時到大森海邊，找個管家兼女傭的工作而住下。然而：³⁴

但是到底是從不知勞苦的學生生活過來的女學生，就算在自由自在的人家裡面，要當女傭還是無法勝任。有次主人要她烤麵包，她竟來信告

²⁹ 山川振作（1976: 449）。

³⁰ 山川菊榮（1972: 347, 349）。

³¹ 山川均（1923: 附錄頁 1-2）。

³² 其愛人叫做溝口義男。小靜認為，雖然溝口對社會主義思想能有共鳴，對於實際運動卻缺乏動機。兩人遂因此分手（山川菊榮，1923: 附錄頁 21-22）。

³³ 山川菊榮（1972: 349）。

³⁴ 山川菊榮（1972: 347）。

訴我〔山川菊榮〕，「這實在是一大侮辱。」有天下雨，主人站在門口不動，聞其所以，說是要她拿出他的雨鞋；取出之後，竟以不高興的口氣要她擦乾淨。這時她隱忍已久的滿腹怨氣爆發了，她舉出那男主人的無理之後，還詰問為何他還扣留前任女傭的工資不發。（前任女傭是她的朋友，也是推薦她來工作的人）當天晚上主人就帶了一個繼任者回來，說：如果還找不到地方去，暫時可以住到找到工作，但是立即宣布解雇。

離職之後，小靜母校的學姊、也是東京女大教師的河崎夏（河崎なつ，1889-1966）暫時收留了她，給她零用錢，也勸她再就學。小靜覺得語言學（語學）很必要，便去拜訪留美歸國的語言學家山田嘉吉（1865-1934）。山田的妻子即是發表母性保護論於《青鞜》雜誌的山田若（山田わか，1879-1957），夫妻均是保守學者。而小靜竟帶著社會主義書籍要學英語。由於山田本就敵視社會主義，又認為對方是個不懂事的小女子，便拋開語言學而大談其社會主義亡國論。初遇失望的小靜，到了第二次就爆起無名火，「你就去為你的國家策劃永遠的道路吧！」於是，學生開除了老師。³⁵

3. 馬克思主義者小靜

1921年4月，社會主義女性解放運動團體「赤瀾會」結成。小靜也是創會會員之一。在赤瀾會的例會上，小靜不改其好問銳進的脾氣，與無政府主義女性運動家伊藤野枝（1895-1923，大杉榮的愛人兼同志）發生爭論。³⁶山川菊榮回憶云：³⁷

當聽說赤瀾會因不易請到演講者而有點意氣消沉之時，她〔小靜〕很

³⁵ 河崎なつ（1923：附錄頁9-11）、山川菊榮（1972：347-348）。

³⁶ 伊藤野枝即著名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1885-1923）的妻子，經常發表文章於婦女解放運動刊物《青鞜》。後與大杉共同慘死於1923年關東震災的蓄意虐殺中。

³⁷ 山川菊榮（1972：350）。

不服氣的說：「一個月只兩次，我可以努力試試。」可惜由於多病而無法實現。不過有一次出席例會，適逢伊藤野枝的演講，她笑著說：「我提出問題時，野枝先生竟不回答而發脾氣！哈哈！」彷彿可以看到始終貫徹熱情卻不談理論的野枝先生的真面目。

據連溫卿(1895-1957)的回憶，小靜激怒伊藤野枝的爭論點，在於「政治機關」(如國家政權)除是社會運動的敵人之外、是否也是社會運動應當奪取利用的對象。對於伊藤野枝這樣的無政府主義者來說，「政治機關」全然不需要；與此相比，小靜的「馬克思」丰采則格外顯著——社會主義運動須以奪取「政治機關」為目標。連溫卿憶云：³⁸

社會上一切政治機關現在都被少數階級獨占，所以生出不平均的事實，以此不平均的事實，來否認政治機關是無益於民眾，這個觀念明白是不當的，現在日本的社會運動，皆由經濟上轉向政治上去爭鬥，就是要用這機關去利用罷。女史滯京時候，曾在水曜會例會聽了伊藤野枝女史講演，因他的講演有誤解此點，向他質問，反被他怒罵，「J」女史曾說過此事，這記憶此時也衝出來。

1921年9月底，為在水曜會例會發表她對匈牙利工農革命的研究，小靜冒著漏夜大雨從千駄谷趕至大森。山川菊榮評價道，「雖然當時的水曜會可以看到女性的面孔，但是男性仍為壓倒性多數，而且當時尚無男女同校制度。所以她在年長的男性中間發表報告和應答提問實是需要膽量的，山口小靜不但勇於承擔、而且瀟灑地完成了。」³⁹不久，這篇文稿便以〈匈牙利的工農革命〉(匈牙利的勞農革命)為題、並以吉田梅子為筆名，發表於《社會主義研究》；二年後以水曜會小冊子的形式，附上其友人知己的悼文而出版。

小靜也協助山川菊榮的翻譯工作。正當山川菊榮拖著病體、抱著嬰兒一點一點地翻譯倍倍爾(August Bebel, 1840-1913)的《婦人與社會主義》以及拉帕波(Philip

³⁸ 越無(連溫卿)(1924: 第九回)。值得注意的是，連溫卿將小靜與伊藤野枝的爭論場合記為「水曜會」，而非「赤瀾會」。孰者為是，尚待核實。連溫卿曾將小靜稱為「J女史」(越無(連溫卿)，1924)，並在另一篇文章中將小靜稱為「K·J」(連溫卿，1926)，亦有「J」字。故此處將「I女史」校訂為「J女史」。

³⁹ 山川菊榮(1972: 349)。

Rappaport) 的《社會進化與婦人的地位》⁴⁰時，小靜與永倉照子自告奮勇去山川家裡幫忙菊榮，並分別協助了後一本書的翻譯工作。⁴¹

由於小靜的病，她的家庭始終要她回家療養；水曜會的同志為了珍惜人才，也不得不讓她回去。這次報告之後，小靜便返回台北，永遠地告別了東京。⁴²

第三節、山口小靜的生與死⁴³

1. 連溫卿與山口小靜的相遇

關於小靜的返台，《台灣社會運動史》有著如下的記載。首先：⁴⁴

台北市大宮町山口小靜(大正十二年三月死亡)於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在學中，和山川均夫妻接近，研究共產主義，大正十年(1921年)十月遭受勒令退學而回來台灣。回台後和連溫卿等相識，盡力於主義的宣傳，並介紹連溫卿予山川均。

對於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來說，小靜與連溫卿的相識，可謂島內社會主義運動的一件大事。如果不是小靜、如果不是連溫卿，在島內社會矛盾因著日本資本主義的滲透而愈發尖銳的情況下，島外(大陸以及日本)社會主義思潮或遲或早一樣會進入島內。但就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向島內的實際發展而言，當以小靜與連溫卿的相遇為轉戾點。以一轉戾點繫於二人之相遇，說來很具戲劇性；但也恰恰是這般戲劇性的相遇，才使連溫卿進而尋得與殖民母國社會主義運動家相聯繫的管道。

⁴⁰ Rappaport (1913)。

⁴¹ 小靜與永倉的協助可見山川菊榮(1929: 5; 1995)的記述。《社會進化與婦人的地位》日後另以節譯方式發表漢譯本於台灣民報(1924i)，但未署名譯者。

⁴² 山川菊榮(1972: 350)。

⁴³ 這個標題借自尾崎秀樹(1982)。

⁴⁴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244)。



圖 1-1：山口小靜與連溫卿

左圖為山口小靜的獨照（水曜會出版部，1923），右圖則為她與連溫卿、綠星旗（世界語運動的象徵）的合照（山川均，1923）。兩張照片的背景相同。

《台灣社會運動史》又云：⁴⁵

連氏早年研究 Esperanto 語（世界語），經此逐漸傾向社會主義，並於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歲末與山川均相識，受該氏的指導進行共產主義研究。

倘若上述二則《台灣社會運動史》的記載不誤，那末連溫卿幾乎是在小靜返台之後不久，便在小靜的介紹下聯繫上山川均。連溫卿本名連嘴，只有公學校學歷，算是自學成才之人。目前尚無史料或研究能說明連溫卿參與社會運動之前的事蹟。但在連溫卿參與創立台灣文化協會之前，便已參與由日人兒玉四郎引入台灣的世界語運動。並在兒玉離開之後將日本世界語學會（Japan

⁴⁵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c: 4）。

Esperanto-Instituto) 台灣支部改組為台灣 ESP 學會，擔任《綠蔭》(La Verda Ombro) 月刊的主編，成為當時日本境內三大世界語刊物之一。連溫卿認為，世界語運動「恰好為從嫌惡政治逃避出來的台灣人準備了一條出路」。但對連溫卿來說，即便他已由參與文化協會的鬥爭而超越「完全與現實的政治游離」的世界語學習，然與社會主義活動家山川均之間的聯繫，才是真正的超越。⁴⁶

連溫卿因為認識小靜而打開了一條聯繫殖民母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道路，而小靜也以其熱情與誠心而被毫無隔閡地接納於台灣人的運動陣營。此時，她在台北的靜修女學校（今靜修女中）覓得一個教職。⁴⁷

山川菊榮回憶：⁴⁸

後來卻驚聞，才回去不到半年，她便於次年春天四月到當地的教會學校任教，不得不使我們擔心，其本人與雙親也因沒有認清其患病的性質而太過樂觀，尤其醫生也難免其責。她不單單在女學校教書，還在台灣青年中組織社會主義團體共同研究，並加入了進步的思想團體——台灣文化協會——融入台灣人的社會之中。當然，在當時的台灣社會裡，日本人是被疑慮的眼光看待著的，絕對不會被當作同志朋友來對待。但只有她，以其純真誠實的為人，加上警察對她的監控，她便與一般日本人不一樣地被接納為真實的台灣人的朋友與戰友。這是文化協會的連溫卿先生所說的。

雖然小靜如此熱切地投入運動與生活，但其逐漸惡化的肺病，卻又迫使她於同年夏天住院達兩個月。⁴⁹即便病情嚴重，小靜仍然為了響應日本內地由左翼所推動的俄羅斯飢荒救濟募捐，與她的高中校友們於 9 月 22、23 日舉辦賑災音樂會於台北鐵道旅館（原址即今日台北火車站對面）。舉辦救濟外國的賑災活動，於情未有不合。但對日本當局而言，蘇維埃政權及其日本境內的同路人卻是威脅其統治的危險存在，而且這一賑災活動還有為促使日本承認蘇聯一事營

⁴⁶ 關於連溫卿與台灣的世界語運動，史可乘（連溫卿）（1954: 91-93）與戴國輝（1975: 57-60）均有概略說明。另外，日本已有專題討論台灣世界語運動的論文（松田はるひ，1977-1978），但筆者目前無法獲得。

⁴⁷ 關於小靜進入靜修教書的資訊，來自於竹中信子（1996: 246）。

⁴⁸ 山川菊榮（1972: 350-351）。

⁴⁹ 山川菊榮（1972: 351）。

造輿論的意味，因此日本當局不可能隨意放任其活動的進行。就台灣而言，恰巧此時大陸汕頭發生風災，總督府當局遂順水推舟，除在御用新聞《台灣日日新報》大炒汕頭風災消息之外，⁵⁰更要求小靜等主辦人應將汕頭風災納入音樂會的主題，稀釋其本來訴求。連溫卿回憶：⁵¹

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之短促期間中，台灣社會之進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勢，這樣情勢必然的影響到各方面所發生之事件，在印刷工第一次罷工⁵²之翌年為募集救濟俄羅斯大饑餓之義捐，曾在鐵道旅館餘興場舉辦音樂會，連續二日，該會之主辦人全部屬於第一高等女學校出身之日人高級官吏及豪紳的子女，例如山口宮司、新元鐵道部長、田倣吉之愛女。唯警察方面則以為專為救濟俄羅斯饑餓，是不宜於國際情勢，當時汕頭亦曾發生大水災，損害甚鉅，應兼行救濟，方能獲得社會人士的讚譽的，其結果，反響果然不錯，出演者全部是日人業餘的青年音樂家，入場者十之八九亦為日人，於此可見當時日人尚未離脫自由主義之傳統。

《台灣日日新報》曾有報導云：⁵³

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同窗會。此回為欲釀〔聚〕集汕頭災害及俄國救飢義捐金。訂來二十二。二十三兩日。會場假台北鐵道旅館。開慈善音樂會。目下正稟請許可中。據聞入場料學生券五十錢一千枚。普通券一圓者三百枚。特別券二圓者百枚。計欲得金千圓。內四百金寄往汕頭。四百圓寄往俄國救飢。其餘二百圓充慈善音樂會開催之一切費用云。

山川菊榮則回憶：⁵⁴

就在這年夏天，在日本本土的社會主義團體和工會組織聯手發起了俄羅斯飢荒救濟運動，在婦女運動這方面，當時首次廣泛地得到活躍於

⁵⁰ 倘若翻開 9 月前後的《台灣日日新報》，會發現汕頭風災的新聞遠遠多於俄國災情，甚至每日都有為汕頭風災募捐的新聞。

⁵¹ 連溫卿（1954a: 41）。

⁵² 連溫卿此處回憶有誤。連溫卿所謂的「印刷工第一次罷工」發生於 1923 年 8 月。台灣印刷製本業者同盟組合以戰後物價跌落為由，聯合降低旗下各工廠的工資，旋引起印刷工人罷工，直至 9 月才抗爭勝利。除連溫卿在〈城內的政治發展〉的敘述外，此事件還可另見台灣日日新報（1923h）。

⁵³ 台灣日日新報（1922: 4）。

⁵⁴ 山川菊榮（1972: 351）。

文化活動的與謝野晶子、深尾須磨子等知名女性的支持，以全國性的音樂會、演講會，以及賣明信片等方式來募款送到蘇聯。在台灣，因病住院的山口小靜也動員同志朋友進行全島性的運動，募到相當於今天幾十萬元的六、七百元捐款，送往蘇聯。

為了協力此一運動，我曾到駿河台的文化學院拜訪與謝野晶子，當時她很爽快地答應援助，但說：「我對事務一竅不通，這方面要請河崎夏小姐幫忙，學校裡面的實務工作都是她在執行」，於是介紹了河崎小姐和我見面。還沒寒暄，她一見面就提到山口小靜的名字說：「十年來教過各個學校，從沒教過這麼一個優秀的學生，她是你們的寶，要多加照顧、珍惜。」在小靜小姐歸鄉之前，能讓小靜以失業之身而無憂無慮地度過一個夏天來靜養與研究，這都應該歸功於河崎小姐的善意。但也恰恰為了這樣的原因，使得河崎小姐受到警方的干涉而不得不搬家。

2. 白色恐怖下的島內秘密讀書會：馬克斯研究會

在島內推動與日本內地同步且具社會主義色彩的活動，在台灣史上大概也屬先驅；但在先驅性之外，島內外社會主義所交織建立起的聯繫也許更值得注意。在聯繫漸次豐富起來的過程中，原來被連溫卿視為「完全與現實的政治游離」的世界語，也成為這些聯繫的良好媒介。除了連溫卿是島內世界語運動的積極份子之外，原來在東京便開始學習世界語的小靜，也在返台之後展現出空前的進步。山川菊榮云：⁵⁵

由於我的姊姊熱中於世界語，從而影響了河崎小姐也開始學習，由於小靜從河崎這位宣傳高手那裡聽到了世界語的妙用，便以其本有之熱心，深入研習，不久有空便能做翻譯，頗能在與外國同志的通信裡忙中作樂，同時也進入英譯資本論的研習。

⁵⁵ 山川菊榮（1972: 3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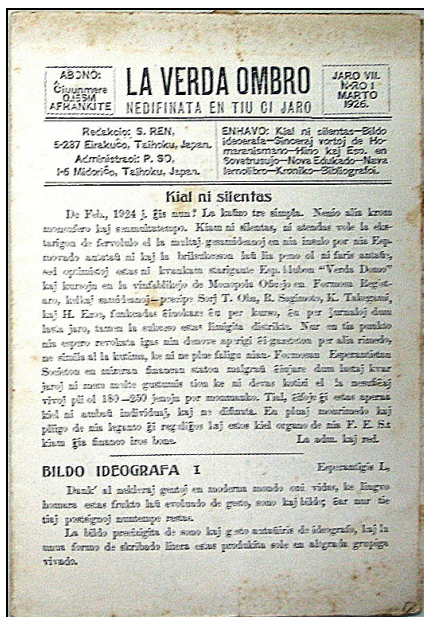


圖 1-2：《綠蔭》(Verda Ombro) 封面

「月刊 *Verde[Verda] Ombro* 是自一九一九年起繼續到一九二四年,在這六年間每月須與會員及同好者外,又和外國交換,在一九三一年第一回全島大會時所展覽的已有一百八十種。*Vesda[Verda] Ombro* 為日本全國三雜誌之一,即與東京之 *Revue Orienta[Orienta]* 大阪之 *Verda Utopis[Utopio]* 並立。」(史可乘[連溫卿], 1954: 92) 雖然連溫卿稱《綠蔭》停刊於1924,但該刊實曾再刊於1926年。左圖為1926年《綠蔭》第7卷第1號(高橋新太郎文庫),刊頭註明了編者(Redaktoro)為「S. Ren」,即連溫卿的世界語名字「Sonkio Ren」。1924與1926年之間,台灣世界語運動分裂。連溫卿的台灣 ESP 學會曾於1925年發行機關誌 *La Formoso*。(本刊資料室,1991: 15-16)

但在總督府當局眼中,世界語卻是極其「不穩」的危險對象,當局的民族歧視與差別統治甚也反映其中。小靜曾被兼任警務局保安課勤務的「色魔的教育課長」田代彥二叫去問話;在小靜寫給連溫卿的信中說:⁵⁶

我最近有機會和台灣當局的某一高等刑事就世界語的事情做了兩三次問答。他說:「通常日本人和台灣人所做的同樣的行為,必須以頗不相同的解釋來區分。例如在信函中的紀元寫為1922年的時候,寫的人如果是日本人,我們會認為他不過是使用了世界通用的年號;但若同樣的字眼出現在台灣人所寫的信函上,這就不得不認為他忽視甚至是敵

⁵⁶ 山口小靜(1923: 32-34)、山川菊栄(1972: 249)。連溫卿(1926)後來回憶起禁止台灣人使用世界語之事例時指出,「說日本人和台灣人學了世界語,然其意義總不能看做相同,因為怎麼呢?譬如日本人讀了世界語用著西曆的年號,這是日本人不過以國際上的慣例用的年號而已。但若是台灣人用了西曆的年號,這可以看做一種的叛逆,因為日本國家有固有的年號『大正〇〇年』而不用之,而卻用西曆,是一種排斥日本固有的年號的行為。當局應難允容之,這是我的友人K·J·由所謂『色魔的教育課長田代』聞及著,那時候他是兼任警務局保安課勤務的。」關於田代彥二,可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a: 978-983)、(旧植民地人事総覧,1997: 445)。

視日本大正十一年這個年號。同理，都是在學習世界語，對於日本人來說，只是在學習全世界所共同使用的語言；然若是台灣人在學，那就充分表示了他對日本語的排斥。……日本的殖民政策，絕不會容許這種叛逆行為……。」……這就是在台灣的日本統治者的態度與心態。……聽到這裡，台灣人諸君又將作何感想？……諸君先為民族戰爭來戰鬥以前，一定要先從不公平的迫害和壓迫中得到解放。所有被迫害者奮起的時機已經到了。讓我們躍入澎湃的世界革命潮流。時代的波瀾必將諸君送往成功的彼岸。

然而民族歧視並不止如此。舉凡前面提到的音樂會，⁵⁷乃至特殊的名詞用語，⁵⁸都能從中聞得總督府當局鮮明的差別態度，連溫卿曾有精采的說明。但無論是日本人或台灣人，只要涉及社會主義運動，同樣都會成為當局嚴密監控的對象。當連溫卿於 1924 年前往日本之時，他在船上回想起他與小靜之間的通信：⁵⁹

去到洗面室洗了臉後，又躺在吊床上，讀一本山川均氏著的書「由井底所看見的日本」，⁶⁰書後有一篇著者的感想，謂自東京至垂水，二日間能得到的書信，因為是他的，經過一週間後，能得被配達著，要算是很早的，我看了後，回憶我的經驗起來了。

1〔J〕女史和我是同住一個市內，若是書信，朝發而夕可到的地方，他寄給我的信，一週間才到，我寄給他的信，是要二週間後，纔能得到。

⁵⁷ 連溫卿（1954a: 41）云：「但是那〔俄羅斯飢荒救濟募捐〕音樂會是屬於日人對日人之對外的行動，自然沒有直接的政治性，倘若是日人對台灣人，或台灣人對外的行動，那麼卻就不簡單。」

⁵⁸ 連溫卿（1954d: 106）云：「記得世界第一次大戰後，日當局鑑於本省人之思想發達，不得不築建一道防線，令全台的新聞雜誌切實遵守從來之內訓，把日本寫作內地，日本人寫作內地人，台灣寫作本島，台灣人寫作本島人，其用心是不要使本省人感覺著，台灣之政治是與日本內地有差別的，進一步，公開場所若說一句『社會主義』或『無產階級』、『無產大眾』、『勞働階級』、『資本主義』、『搾取』等等，在講演會即被終止、注意，若在個人談話，任公職者會被撤職，或被訓責，而到了世界第二次大戰前後，情勢就一變了。這些視為危險的單語，就是不受教育的人也得衝口而出，視為日常的常識了。由此可以知道本省人受思想觀念的洗禮已有隔世之感。」

⁵⁹ 越無〔連溫卿〕（1924：第九回）。

⁶⁰ 山川均（1924）。這本書收錄了山川均自 1921 年 2 月至 1923 年 12 月間所發表的四十篇時評。並於 1924 年 2 月 27 日發行（山川均，1976a: 445）。

在連溫卿與小靜的努力下，他們秘密成立了「馬克斯研究會（マルクス研究會）」，⁶¹以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為學習對象。連溫卿首先取得漢譯本的《共產黨宣言》，意欲以此為講義；但小靜卻需要日譯本，她便寫信向山川菊榮索取：⁶²

文化協會的連溫卿先生拿到漢譯本的共產黨宣言。本想在成立馬克斯研究會時以此為講義，但因會內有日本人，所以也有日譯本的需求。於是山口小姐便向我索取，可是明治時代的譯本已然絕版，無法入手，便只好如此回信。更糟糕的卻是，警察扣下了這封回信，以此恐嚇山口小姐的父親，加上她近日在台北的活動，使她和她的家庭之關係更加惡化。

而且：⁶³

歸鄉後的小靜顧慮到警察，同時認為遲早要上京，所以暫時少作通信。但有關《共產黨宣言》的事情，雖然我在改名寄出的信件中連書名也改變了，但落到警察手裡，事情還是會變大。

最後：⁶⁴

……想不到我的回信和同時送給她的參考書小包裹，竟然被警察扣留沒收，致使她遭到更加嚴密的監視。到了大正十二年（1923年）春天，她的父親也不得不準備辭職，要把她送到東京來。

雖然連溫卿曾先後在不同文章中或詳或略、或明或暗地提及「馬克斯研究會」，但目前並不清楚該組織的詳細經緯。但能確定，它是公開於島內成立之「社會問題研究會」（1923.7.23 成立）的母體，而「社會問題研究會」恰恰是《台灣社會運動史》認定的島內共產主義運動之嚆矢。由此來看，「馬克斯研究會」的意義實是空前的。只是，小靜最終並無以親見「社會問題研究會」的誕生，便因日趨惡化的肺病而謝世了。

⁶¹ 「『馬克斯』研究會」之名乃連溫卿（1927: 12）所明確提及者，故此處均不以目前的通用譯名「馬克思」替代「馬克斯」。

⁶² 山川菊榮（1972: 352）。山川菊榮並另於書中 248-249 頁提及此事。此事可見 A 氏（1923b: 附錄頁 15）。

⁶³ 山川菊榮（1972: 353）。

⁶⁴ 山川菊榮（1972: 248-249）。

3. 花蕾落地

小靜的病竟致於死，這是山川菊榮等人所原無預想的。1923年2月，貝原泰子、永倉照子與山川菊榮再次相聚於大森的山川家：⁶⁵

三個人圍著暖爐，做了一番四年來的話舊暢談。當時山口小姐已回鄉里養病，不過我們各自提起她在東京時的許多天真趣事而笑成一團，大家並都熱切期待曾說三月必回的小靜返京。

但小靜畢竟是死了，正是死於3月、死於母喪的打擊與裕仁皇太子訪台引起的風潮之中。山川菊榮回憶：⁶⁶

最後，她父親決定要帶她到東京，但在啟程前的大正十一年（1922年）底，臥病已久的母親就先逝世了。

「昨（1922年12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母親永眠。在落寞的心情裡，思念及我們許多同志的苦難。現在只有暫時作為有生者的呻吟而繼續下去。」這是次日小靜小姐寫給連溫卿信中的話。

大正十二年（1923年）三月，台灣因那被稱為「攝政宮」的現任天皇之渡台而全島沸騰，「台灣各城市的警察拘留所已然滿員，台北甚至因為無法再收容，就把人銬上手銬，幽禁於個人自宅。各學校的入學考試，奉命延期，困惑著數萬小學生。」連溫卿給我的信中這樣說著。

3月16日，小靜再次住進了醫院。在連溫卿給山川菊榮的信中寫道：⁶⁷

三月十五日的信裡說，她吐了三次血，身體非常衰弱，雖不發燒，但須絕對的安靜。四月底應該可以治好，所以最近要住院，而入院是十六日……

樂觀的預期四月底就能治癒的她，已作不歸之旅。……但這並非無意義

⁶⁵ 林てる（1923：附錄頁6）、山川菊榮（1995）。

⁶⁶ 山川菊榮（1972：352）。山川菊榮所引史料原自B氏（1923：附錄頁16）。

⁶⁷ 山川菊榮（1972：353-354）。山川菊榮所引史料原自A氏（1923a：附錄頁14；1923b：附錄頁15）。

的死。這是深入戰場提供槍彈而殉職的，戰鬥正熾猛著，啊！何等悲壯！聽說臨終之日的早晨，雖然拿起鋼筆，但因不能書寫，竟不出一語而嘆息絕望……。

……當地的人都悼念著山口小姐。但運動還是照常進行。甚至寄予重望而努力著。……比方昨天，聽說那個□□□□〔攝政之宮〕的□□〔行啟〕要從我們的文化協會門口經過，一大早就來個家宅大搜索，出入之人不問男女老幼全都先作身體檢查；加上憲兵、便衣警察約一百五、六十人，在四周圍站崗、警戒、巡視，過路的人只要被認為可疑就一個個攔下盤問……**要之台灣的人民還是徘徊於民族範圍內的底層，有時會打出超乎民族水平之上的旗幟，但其顏色仍是粉紅色〔桃色〕的。**（連溫卿氏）

為了迎接裕仁到神社參拜、為了擔任先導的光榮任務，山口透拖延了帶小靜上京的日期。⁶⁸正當他陶醉於即將到來的榮耀時，小靜走了，時間是3月26日晚上9點40分。小靜以著自己的死，給予父親的皇國狂熱以最後的反叛。此時恰恰是母親逝世於同醫院的百日。28日，小靜於台北三枚〔板〕橋火葬場火化。為了「攝政宮」的渡臺，沒有公開的儀式，骨灰則暫存於斯。⁶⁹對於小靜的死，山川均寫道：⁷⁰

明年的勞動節一定要在東京舉行——山口氏留此一言便回去家鄉了。去年的勞動節有一千五百名工人參加，今年則有五千名工人階級的先鋒參與。在傾盆大雨中踢濺著泥濘而前進，這樣無產階級軍隊壯烈的情境！紅色的工會旗幟之上，則滴著如血的雨水！「高高舉起啊，血紅的旗；在這面旗幟之下發誓……我們堅決死守保衛紅旗！——」我們無產階級先鋒隊更高唱著這首歌！⁷¹我真希望能讓山口氏看到今年勞動節的場面，不過無產階級要得到勝利之前，我們必須付出很大的犧牲，我們所尊敬的許多同志和我們敬愛的同僚將在我們前進的路上

⁶⁸ A氏（1923a：附錄頁13）。

⁶⁹ B氏（1923：附錄頁16）。

⁷⁰ 山川均（1923：附錄頁3）。

⁷¹ 此即改編自德國民謠的革命歌曲《赤旗》歌，此處中譯依據中文版歌詞再行改譯。

向左向右地倒下。我不得不咬緊牙關，跨過我們同志、兄弟、戰友的屍體前進，再前進！

堺利彥（1870-1933）賦悼詩云：⁷²

又見一顆花蕾落地
停下來
回頭看
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
無暇惋惜

永倉照子則在日記中寫道：⁷³

{ 1923年4月24日。}得知山口小姐於三月二十六日過世。真是被奪去應該珍惜的人。再怎麼想，失去了她，對我們婦女是一件憾事。縱使不是從那麼廣泛的範圍來痛惜，對我而言也是失去了一位很有助力的朋友，在我而言，這是最大的悲哀。山口小姐是存在著，在某一個地方存在著，平常這種念頭對我來說是多麼有力的慰勉，然而直到失去了她，我才痛切地感受到。

現在，沒有知心朋友這件事也是寂寞之一。知心的朋友、同一思想的朋友，能夠兼而有之自是很高興的事情，不然，我還是喜歡知心的朋友。
.....

我要使我的生命能完全燃燒的東西。我好像希望要用我的全身去撲擊某些東西。我正衷心地祈求著緊張和燃燒。

同年7月，照子拜訪了山川菊榮，並將小靜未能譯完的《社會進化與婦人的地位》帶回翻譯。然而同年年底，照子也病逝了。⁷⁴

小靜死後不久，山川菊榮在《前進》（進め）雜誌6月號發表了〈給將投入社會運動的年輕女性〉一文。山川菊榮將女性參與社會運動所必須面對的苦痛、危險，以及各種最終退縮轉向的實例寫於文中，提醒必須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與投入實踐的決心。這封信，無論就過去或現在、無論是女性或男性，只

⁷² 堺利彥（1923: 44）。

⁷³ 林てる子（1995: 342-343）。

⁷⁴ 山川菊榮（1995）。

要願意投身社會運動，都是一篇非常值得參考與反思的學習文獻。山川菊榮在全文的最後寫道：⁷⁵

在您心中是否燃燒著可以忍受任何艱苦、任何犧牲、對任何工作都可以承擔而有準備奉獻此一生的強烈信念？您會拋棄一己的安息、平穩的家庭生活、兄弟情誼，以及以前所受教育的價值觀，而自告奮勇的投入慘烈的鬥爭中，並甘於一生當一名痛苦的無名小卒嗎？您能放棄資產階級女兒的安穩地位與溫暖的臥榻，毫不後悔地中彈橫屍、餓倒路旁、甚至刑死獄中，成為階級戰爭之中的一名戰鬥員嗎？在現在直接刺激您、鼓舞您的事情與現象過去之後，您確定能以冷靜的理智與堅定的意志，繼續在我們道路上邁進嗎？

社會運動不是玩遊戲，也不是戲劇，這是慘烈的戰爭。此戰爭所要求的是極大的犧牲，經得起考驗的堅定意志。這是通向未來新社會的階梯與基石。您有這份充當階梯基石的覺悟嗎？

據《台灣社會運動史》記載，連溫卿於 1924 年聯繫上正在台灣當兵的《前進》社同人與野直義，從而將《前進》帶進島內，分送給連指導下的台灣無產青年們購讀。⁷⁶倘若連溫卿在《前進》讀到這篇文章，會否想起小靜？

在通向 1924 年的道路上，小靜先著連溫卿而逝去，在同志們的心中留下了純潔光輝的形象，但畢竟未能繼續接受時間的考驗；在通向 1924 年的道路上，連溫卿承繼著小靜未酬的遺志而前進——既是 1923 年所成立的「社會問題研究會」，也是 1924 年與山川夫婦的會面，甚至更是 1927 年文化協會的左轉——這是連溫卿即將踏上的革命旅行。

歷史對於連溫卿——乃至所有台灣社會主義者——的考驗、一場以集體力量超克過早耗盡「一生只能開花一次青春」之命運的試煉，即將來到。

⁷⁵ 山川菊榮（1984: 70）。

⁷⁶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245）。

第二章、島內社會運動的 社會主義萌芽

現階段的台灣解放運動有兩條路：一是後退，一是前進。前一條路是引導向**自由主義**妥協的，脫離解放陣營，退到屈服帝國主義，與其妥協，受其保護，與御用紳士及其他一切反動勢力和好，與他們握手變成法西斯主義，最終和帝國主義陣營合體，這是把台灣拉回到十年前大逆不道的大反動道路。後一條是解決群眾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解放，即啟蒙勞動者、農民、一般無產市民和小資產者的群眾鬥爭意識，指導日常鬥爭，努力把它組織化，加強群眾運動，促進向勞動者、農民、一般無產市民及小資產階級的同盟（集團），走非資本主義的解放道路。

這兩派的對立，是為了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解放運動，和**自由主義**資產階級之間爭奪主導權的鬥爭。爭奪這個主導權的鬥爭，是要走非群眾性的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群眾性的非資本主義道路的分歧點。

——蔣渭水，1930年7月16日¹

¹ 蔣渭水（1930）。譯文引自王曉波（2005a: 197-198）。

引言、路線對立中的蔣渭水

一九二〇年代是台灣社會運動初次形成並組建許多組織於島內外的時期。如果組織的延續與否可以反映組織的重要性或影響力，也許當時最重要且最有影響力者就是存續時間最長的台灣文化協會。作為島內第一個群眾組織²的文協最初以民族主義為共同底線而成為台灣社會運動的中堅力量，³進而支持了以東京為活動舞台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文協是各種組織從中分化的母體，但這種組織分化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性質。若將「治警事件」（1923.12）到文協分裂（1927.1）間的三年視為過渡期，則分化於過渡期之前的組織（如表 2-1 所列）多在未充分的發展的情況下因《治安警察法》的逐次打擊而分別瓦解、消沉，或被迫外移，只有文協撐下來並形成過渡期中的主力。

過渡期後的文協仍是分化的母體，卻以敵對的姿態發生分裂。1927 年連溫卿（1895-1957）等左派奪取文協領導權之後，蔣渭水（1890-1931）所率領的民眾黨即退出文協。1929 年，文協內部發生「台共／連溫卿」的對立。1930 年，民眾黨內部則發生「民眾黨（蔣渭水）／自治聯盟」的對立。

過渡期之後的組織分化以顯著的路線對立為特色，這是過渡期之前所看不見的現象。不過 1930 年的蔣渭水認為，兩條路線的鬥爭**貫穿**了一九二〇年代台灣社會運動，謂之「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之間的對立。自由主義代表了資本主義路線，民主主義則代表了非資本主義路線。而蔣渭水將自己在 1930 年所面臨的民眾黨分裂，視為台灣在「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兩種前途上的對決點。

² 群眾組織是相對於「指導」型組織而論的，比方島外的東京「新民會」。東京「新民會」雖然出現早於文協、延續時間也長（也達十年），卻是少數台籍菁英的內部團體。因此東京後來才出現以新民會為「指導」團體，其下另設以學生為主體的群眾組織——東京台灣青年會（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25）。

³ 誠如台灣總督府編纂之《台灣社會運動史》的觀察：「這些運動興起以來，……大體上，係以民族自決主義為基調，組成聯合陣線，持續地集中搞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7）。

蔣渭水第一次成對使用「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時機其實是 1929 年。當時蔣渭水比較了托洛茨基（Л. Д. Троцкий，1879-1940）與布哈林（Н. И. Бухарин，1888-1938）對於國共分裂的不同見解。布哈林以「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描述國共兩條路線的對立，⁴蔣渭水則以此成對概念分析 1930 年民眾黨分裂前夕的台灣社會運動。不過蔣渭水亦非首位以「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分析台灣社會運動路線對立之人。1928 年，一名叫做「海東」的作者（見南京《中央日報》副刊⁵）就曾以完全相同的概念與邏輯描述文協創立以來所蘊含的兩條路線。然而海東眼中的路線對決點卻是 1927 年的文協分裂。

用什麼概念描述兩條路線實非重點。關鍵在於蔣渭水與「海東」都承認兩條路線的存在。雖然兩人對於兩條路線的對決時間（1927 或 1930）有不同看法，然而兩人都將過渡期後的組織分化視為既有矛盾的激化與延伸，而這個既有矛盾就是「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的對立。易言之，既有矛盾早在過渡期之前即已存在。如果「海東」與蔣渭水的分析是對的，是否可以認為過渡期前的組織分化早已蘊含了過渡期之後的路線矛盾，而這種矛盾因為某些原因而未能立即激化？

由於「無產青年」乃是幫助連溫卿奪取文化協會領導權的重要助力，因此蔣渭水與連溫卿聯手拉拔並壯大於過渡期之中的「無產青年」乃是考察路線對立的最好對象。然而，在表 2-1 所列各組織遭受打擊之後才以「台北青年會」名義浮上檯面的「無產青年」並非憑空而來。表 2-1 所列的「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分別是島內第一個政治結社與《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認定的島內社會主義組織先驅，就是無產青年崛起的重要背景，也是本研究的主要考察對象。

本章目標之一是從左右路線對立的角度說明一九二〇年代島內社會運動的轉折與總趨勢。目標之二則是探尋 1927 年之前的左右路線對立，特別是先後出現表 2-1 所列各組織的 1924 年之前。目標之三則是說明當時運動者——特別

⁴ 蔣渭水引用托洛茨基與布哈林的論述，集中於蔣渭水（1929）。中譯文可見王曉波（2005b: 540-541）。

⁵ 將「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用語，成對使用於文協分裂，首見於南京《中央日報》副刊《國際事情》，當時曾連載一篇題為〈台灣文化協會的運動狀況〉、署名「海東」的文章（海東，1928a, b, c）。

是當時的社會主義者——眼中的路線對立，及其眼中的對立如何反映島內外政治、經濟、社會背景。而蔣渭水與連溫卿之間的關係將是研究的重要線索。

第一節、社會主義色彩的「台灣第一號政治結社」

鮮少作為研究對象的新台灣聯盟（1922-1930），乃是島內最早登記成立、持續最久，而且很快便陷入有名無實狀態的合法政治結社。日後分別居於右、中、左派的歷史當事人葉榮鐘（1900-1978）、蔣渭水、連溫卿，都曾各自針對新台灣聯盟成立的原因提出解釋。

葉榮鐘認為，由於議會請願運動的政治性無法掩蓋、目標又高，而文化協會又以啟蒙為主，不宜拖累，因此必須形成一個目標較低且可以解決社會大眾之現實問題的政治結社以消除「**對於現實的個（別）問題則格於規定無法顧及**」的問題。⁶雖然葉榮鐘並未詳加說明何為「現實的個別問題」，但既存社會運動無法自我修正以滿足大眾要求，卻由此可見。所以只能另立新性質的組織以謀發展。

葉榮鐘沒說明白的「現實的個別問題」也許可由連溫卿來回答：**一方面是文化協會遭到鎮壓，另一方面則是「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在此內外煎熬的形勢下，「若無政治團體之存在，則將陷於不能統一大眾之意見的狀態」。⁷連溫卿所講的第一個現實問題乃指總督府打擊文協及請願運動之「八駿事件」（1922.9）。在這次事件裡，總督府強迫文協八名領導人（特別是林獻堂）表態脫離請願運動，震動了文化協會。連溫卿所講的第二個現實問題則是台灣人內部的階級對立，而作為台灣社會運動先聲的佃農爭議，就是因為蓬萊米改植而產生的階級對立：⁸

在被壓迫地位的台灣，有社會運動的發生，是僅僅在歐戰後數年間而

⁶ 葉榮鐘（2000: 407）。本段在蔡培火等人改寫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中略有改寫（蔡培火與陳逢源等, 1983: 355）。

⁷ 連溫卿（1988: 80）。

⁸ 連溫卿（1927: 12）。

已。……

然自歐戰以後，貧富的懸隔益甚，一般之工人、農民的生活已極了生活線下。若中南部之農民，在這時候雖沒有具體的運動出現，然而一般形勢，卻是屬於不穩，而「業佃協調會」之組織已在這時候出現了。這是大正七年——一一年間之概觀，自是以後台灣的社會運動亦漸形具體的型態，而為其對象當局的一個「妖怪」了。⁹

……

大正十二年在不景況底下的台灣經濟界、因為內地種米的耕作成功，而農民爭議發生了。這是欲更換從來租谷〔穀〕的標準為高價的內地種米，究竟都未見衝突，而即折衷解決，……¹⁰

蔣渭水也有類似於上述兩大現實問題的見解。就第一個現實問題而言：¹¹

到了十一年，什麼犬羊禍〔八駿事件〕出現了，任三爺〔林獻堂〕被困在犬羊城裡。形勢太壞了，我以為非更加一層的決心去做事不可了。遂組織新台灣聯盟，這是本島政治結社的嚆矢，且是全島唯一無二的政治結社。後來因為事多人少不能彼此兼顧，致使這個政治結社全沒有活動的機會，這是我的一大遺憾事啊！總是今日同志已大昌盛了，後來定有活動這個政社的時期。這發會式的宣言書，以出版法違反，被罰去二十金。

上述見解被連溫卿批評為「蔣渭水之主觀意見」，¹²也許他是就蔣渭水突出個人「更加一層的決心」並孤立看待八駿事件之影響而論的。雖然被連溫卿直稱為同日本人「野合」的「土著資產階級」的林獻堂並未遭到蔣渭水的同聲批判，¹³然而蔣渭水並非沒有意識到連溫卿透過批判林獻堂而引出的第二個現實問題，也就是台灣的階級對立。

⁹ 這種筆法，頗有《共產黨宣言》的遺風：「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盪。……」

¹⁰ 在農民爭議之外，連溫卿緊接著便談到工人的罷工鬥爭，「而工人方面，則有印刷工三百二十名的大罷業，自〔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四日起至九月三日互相對峙，卒見成功。……」，但因此事發生於新台灣聯盟成立之後，故先略去。

¹¹ 蔣渭水：雪谷（1925：45）。

¹² 連溫卿（1988：62）。

¹³ 連溫卿（1988：62）認為，雖然「八駿事件」是「土著資產階級與支配階級」之間的「野合」，但也「刺激了民族主義者在台北組織政治結社。」

蔣渭水在新台灣聯盟發起會上以〈動搖時代的台灣〉為題的講演表露了他對第二個現實問題的看法。蔣渭水認為台灣當時正處於「對台灣而言是最幸福的」「過渡時代」或「動搖時代」。動搖有二：就世界性的動搖而言，是帝國主義的崩潰與頑抗以及被虐者的反抗與解放；就台灣的動搖來看，則是「台灣人全體」與「少數階級」在內地延長主義之下誰將獲利的矛盾。「有了今日的動搖，才能有明日的進步，即動搖終究會導向進步，實乃進步之母」。¹⁴這兩大動搖因為日本同時是帝國主義與內地延長主義的推動者而結合：「到底能不能同化，可另當別論。首先是否**全體台灣人**，一視同仁受其恩惠，抑是止於有利害關係的**少數階級**，容我不加躊躇地說一句話，恐怕還是後者吧。無忌憚地說，過去所行的設施與現行設施，形式本身是變了，但是內容呢？似乎與民眾的利害關係背道而馳了。但是世界大勢是不會捨棄台灣而不顧，反而彼之設施促使民眾覺醒，使民眾充分領悟自己的立場。被因習傳統所桎梏的本島人啊！該覺醒的時刻已來到了！」¹⁵

蔣渭水的「少數階級」與連溫卿的「土著資產階級」，都因共謀（或「野合」）於日本而成為背離台灣多數人利益的存在。台灣社會內部日漸顯著的分裂更因「階級」概念的引入而得到反映。然而兩人對於階級對立的理解未必相同。連溫卿以林獻堂作為引出「土著資產階級」概念的媒介，但蔣渭水卻在不涉及林獻堂的場合批判「少數階級」。兩者的差異提示了一些問題：從殖民地人民之中分化而出並且所占少數的資產階級，究竟是整體反動（比方包括林獻堂）還是部分反動（比方不包括林獻堂）？如果既存社會運動（如議會請願運動）無法面對由於「**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而一觸即發的階級矛盾，該怎麼辦？

被《台灣社會運動史》視為新台灣聯盟特色的社會主義傾向，也許正是上述問題的答案。但《台灣社會運動史》是從聯盟**無法擴大活動的原因**去理解這種傾向的：由於請願運動所代表的民族主義統一戰線得到強化、「社會主義傾向」尚不成熟於當時的台灣，而且「姐妹團體」社會問題研究會遭受打擊，所以聯盟活動無法擴大。¹⁶

¹⁴ 蔣渭水（1922: 47-49）。

¹⁵ 蔣渭水（1922: 49）。中譯文可見王曉波（2005b: 686-687）。

¹⁶ 「依照規約，新台灣聯盟的目的，在於『基於為人類社會永久和平、共存共榮的原理，研究在

連溫卿所聽到的一則傳聞也可證明聯盟的社會主義傾向：「台灣諸運動的中心，〔據〕說是間接的〔地〕由中國方面渡來，新台灣聯盟成立當時，有說是廣東「新青年」的影響。因為這樣緣故，和在中國人們書信的往復，一一皆要抄錄發信受信的氏名住所去報告。」¹⁷「廣東新青年」應即《新青年》雜誌，當時已將編輯部遷往廣州並在中共直接影響之下。¹⁸雖然《新青年》對新台灣聯盟乃至台灣社會運動的影響並不容易估計，但至少說明新台灣聯盟社會主義傾向的可能來源。當時有一位叫做黃逢霖(1901-1993)的學生從台北寫信給曾為《新青年》同人的胡適(1891-1962)：¹⁹

我自從會讀報章以來，和我做過精神上鼓勵切磨的好朋友的，可算是《新青年》，但是它短命中絕了，到本年〔1923年〕十月我才在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圖書室裏重複遇見它，書面上現出一種手執紅色 handkerchief【手帕】的獄中革命黨人的精神來，使我一腔愛護它的熱誠重複發現出來，以為有遠超現代的精神革命出版物做我們青年人的指導，本著奮鬥的精神，向我們黑暗無光、無可奈何的境地裏努力！奮鬥！

黃逢霖是在台的大陸留學生。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陸續在中共以及中華蘇維埃擔任不少重要職務。他的信件顯示《新青年》在台灣並非難以取得。而他所讀到的「手執紅色 handkerchief【手帕】的獄中革命黨人」之《新青年》，則是在瞿秋白(1899-1935)指導下改組為季刊形式的中共中央理論刊物(1923.6.15發行第1期「共產國際號」)。其實，當《新青年》從內容到封面設計都「差不多成了 *Soviet Russia* 的漢譯本」的時候，胡適就已對《新青年》路線頗表不快。²⁰此

台灣所反映的事實，必要時隨時發表演講為目的。」於是，屢次集合會員，研議有關政治問題。」「在當時民族主義統一戰線的陣營，新台灣聯盟上述的結成原委，雖是相當進步的特異存在，但因時值一般人對於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期待升高，輿論的動向也多支持，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傾向在本島當時的狀況下顯然尚未成熟，而可算是姐妹團體的社會問題研究會又惹出了違反出版規則事件，乃陷於自然消滅的狀態，當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組織計畫形成，終於陷入有名無實的存在。」(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b: 9)。

¹⁷ 越無〔連溫卿〕(1924: 第九十七回)。

¹⁸ 關於《新青年》的詳細介紹，可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1979a: 28-29)。

¹⁹ 黃逢霖(1979: 220)。

²⁰ 「差不多成了 *Soviet Russia* 的漢譯本」是胡適的話。這句話是指《新青年》在內容上大量翻譯出

時直接在封面繪上「手執紅色 handkerchief【手帕】的獄中革命黨人」的《新青年》，則已完全同胡適無關。因此，黃逢霖給胡適的信，無疑是錯愛。但這封信卻也生動地為連溫卿所獲知的《新青年》傳聞作下註腳，同時說明了這份刊物的影響力。

《台灣社會運動史》從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運動路線的對立，說明新台灣聯盟之衰亡，頗能呼應蔣渭水與連溫卿從階級對立出發的見解。〈新台灣聯盟宣言書〉實際上已暗示了聯盟的對抗性質：歐戰以來，幾千年的「特殊階級」頓失權威，平民則崛起於「社會連帶之思想。相互扶助之觀念」的潮流之中。面對這一潮流，有人想要逆勢而行。新台灣聯盟的成立，就是為與反潮流者對抗而組織的「研究」團體，除此之外，「夫豈有他意也哉」。²¹這份〈宣言書〉強調自身的「研究」性質並強調除此之外別無用意。只從這裡來看，根本不可能猜到聯盟竟是台灣第一個政治結社。這種定位不清的性質也許正是新台灣聯盟無法順利運作的原因，然而當時對於「政治結社」的設想也可能就是如此。但若考慮到以文化為名而有政治之實的文化協會竟能以同樣定位不清的性質持續運作，就不得不推測新台灣聯盟恐怕具有反潮流者所不能接受的性質。

連溫卿綜合這些反潮流者的階級屬性（資產階級）與路線（民族主義）而稱之為「資產階級之民族主義者」。連溫卿認為一戰後萌發的蓬萊米移植與業佃爭議導致島內「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這種背景促使新台灣聯盟得以形成並促使其消亡。由於「資產階級之民族主義者」無法面對經濟矛盾的激化，「恐其波及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終置之而不顧」，乾脆架空新台灣聯盟。而且「新台灣聯盟之成立終引起治安警察法之實施，與台灣議會設置期成同盟會之結成，此為民族主義者對於政治運動之見解，開始醞釀分歧的端緒。」

版於紐約的 *Soviet Russia* 雜誌。相關討論與考證可見石川禎浩（2006: 40-45）。

²¹ 〈新台灣聯盟宣言書〉：「過去數千年來。於政治社會經濟上之所謂特殊階級。因歐戰之影響。剝脫其假面。頓失其權威。一面如社會連帶之思想。相互扶助之觀念等之思潮。有非使人人覺醒歸於平等自由不止之勢。磅礴汎瀾（泛濫）浸潤生殼。換著表象熱烈正義之自由衣。乘希望之風。而突進於煌煌烈烈世界最高之理想之時也。然其間多有橫行無視此崇高純真之思想者。急於維持自己之地盤。動輒蒙蔽人類之聰明。攪亂人類所欲進之前途。當此之時。使猶趨趨逡巡。日復一日。實非吾人之自棄而甘於退步歟。奚是吾人不揣僭越。為人類社會永久和平計。組織新台灣聯盟。而以嚴肅態度為之研究已耳。夫豈有他意也哉。」（新台灣聯盟，1922b: 40）。

²²「因此，該聯盟雖不致夭折，亦等於無。而聯盟的構成分子欲利用此機會另組織社會問題研究會。」²³居於「資產階級之民族主義者」陣營的葉榮鐘謂其「實踐上似乎不無鞭長莫及的困難」，「可惜這個臺灣第一號的政治結社，結局就因為上述的原因，無法展開活動。」²⁴

第二節、從「馬克斯研究會」到社會問題研究會

1.關於「社會問題研究會」的一般說明

倘若新台灣聯盟是以自我的被架空預示了台灣社會運動所內含的左右分歧，1923年所公開成立的「社會問題研究會」也許即可視為社會主義運動表面化的象徵。「社會問題研究會」正是《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認為的島內社會主義運動之濫觴。

多數與新台灣聯盟有關的史料都把社會問題研究會視為「姐妹團體」。《台灣社會運動史》認為，社會問題研究會的自然消滅是打擊新台灣聯盟的因素之一。²⁵連溫卿則認為新台灣聯盟所遭受的打擊促使聯盟成員藉機另立「社會問題研究會」。²⁶雖然兩者因果不能確定，但因果絕不僅在兩者之間。《台灣社會運動史》認為，社會問題研究會是連溫卿與蔣渭水分別受到日本及中國的社會運動影響而發生的產物：²⁷

在東京，新民會的結成、六三法問題的歸著點，以及接著而來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的組織等本島社會運動的勃興真令

²² 連溫卿（1988: 81）。

²³ 連溫卿（1988: 121）。

²⁴ 葉榮鐘（2000: 407）。本段在《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蔡培火與陳逢源等，1983: 338）中略有改動。

²⁵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b: 9）。

²⁶ 連溫卿（1988: 121）。

²⁷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b: 6-7）。

人眩目。

如此，這些運動雖然在民族自決主義下以大致成功的統一戰線發展下來，但是，在東京及支那各地的諸思想運動也逐漸影響本島人。糾集在接受共產主義者山川均指導的連溫卿，與在中國國民黨革命運動影響下的蔣渭水等麾下的青年同志，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發展性表示灰心，早於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七月，即結成台灣社會問題研究會，……

《台灣社會運動史》並認為，研究會是連溫卿與台灣第一個飛行家謝文達（1901-1983）合作的成果，不但煽動了青年群眾，更為無產階級運動提供了準備：²⁸

此時，居住台北市的連溫卿與山川均取得連絡，並與島內左翼思想家及居住長春之共產主義者謝文達一起，結成社會問題研究會，研究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之理論及戰術，以此對其指導下的青年加以宣傳、煽動，對於當時的民族主義統一運動戰線，逐漸地釀成了無產階級運動抬頭的機運。

不過社會問題研究會並非 1923 年下半年才形成的團體。實際上，它是以「馬克斯研究會」（「マルクス研究會」，可見本研究第一章之介紹）²⁹為基礎而形成的組織。³⁰因此社會問題研究會於 1923 年的「成立」其實是「公開」。而且社會問題研究會也是反映島內「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之形勢而誕生的組織：³¹

其間，台灣曾因蓬萊種米之改植成功，發生小作料（佃租）之換算的爭議，這種爭執蔓延各地。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成立之「社會問題研究會」也是在這經濟狀態下誕生出來的，這未公開出現以前是個研究會，每星期開會一次，會員中亦有日本人參加，其目的是「立腳於近世科學，基于一定社會條件而研究之」。其趣旨如左錄，發起人是謝文

²⁸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244）。

²⁹ 「『馬克斯』研究會」之名乃連溫卿所明確提及者（連溫卿，1927: 12），故此處均不以目前的通用譯名「馬克思」替代「馬克斯」。

³⁰ 「一方面在台灣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即有「馬克斯研究會」的組織，而為大正十二年成立的「社會問題研究會」之先驅，然皆沒長命存立於世至今。」（連溫卿，1927: 12）

³¹ 連溫卿（1953b: 71）。

達、蔣渭水、連溫卿，趣旨書是後者擬的，辦事處在永樂町五丁目連家。

文中所謂的日本人，就是將社會主義運動從日本引入台灣的山口小靜（1900-1923），「社會問題研究會的同人有：連溫卿、蔣渭水、謝文達、石煥長（1891?-?），另外有一位日本人，即山口小靜。」³²

2. 山口小靜的返台與馬克斯研究會的形成

如第一章所介紹，山口小靜的出身背景很特別。她是一個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父親山口透則是台灣神社的宮司。出身可謂高貴了。自幼獨立思考的小靜，高中畢業後即返回日本學習，結識了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者山川均與山川菊榮。她加入了「赤瀾會」（婦女解放組織）、「水曜會」，積極地參與運動，甚至為此慘遭退學。後來，為了療養長年積累的肺病，小靜遂於 1921 年 10 月返台，並與連溫卿等人接觸。「在當時的台灣社會裡，日本人是被疑慮的眼光看待著的，絕對不會被當作同志朋友來對待。但只有她，以其純真誠實的為人，加上警察對她的監控，她便與一般日本人不一樣地被接納為真實的台灣人的朋友與戰友。」³³小靜熱切地投入運動與生活，但其逐漸惡化的肺病卻又迫使她住院。³⁴即便病情嚴重，小靜仍然為了響應日本社會主義者所推動的俄羅斯飢荒救濟募捐而與她的高中校友們舉辦賑災音樂會（1922.9.22-23）。這是台灣史上首次舉辦的、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活動。與此同時，小靜與「馬克斯讀書會」的同人也在台日兩地的文獻傳遞之中展開了《共產黨宣言》的讀書會。讀書會曾因警察扣留來往於兩地的書信而招致恐嚇，除此之外，「馬克斯研究會」的詳情並不清楚。

當時正在「改造社」出版社工作的琉球社會主義者比嘉春潮（1883-1977）回

³² 連溫卿（1988: 122）。

³³ 山川菊榮（1972: 350-351）。

³⁴ 山川菊榮（1972: 351）。

憶：³⁵

為了我至東京而作各種聯繫、並為我的就業進行周全準備的饒平名智太郎與仲宗根源和二位，在當時已與堺利彥、山川均、荒畑寒村、德田球一作為核心，牽連於第一次日本共產黨的秘密結成，並是其中的重要成員。組織的組成本來就於極機密之下進行，當時在外圍的我無從知悉詳情，縱使知道一些，以認同者的立場做進一步的探究，總是不禮貌的事。

……雖與山川夫婦是初見面，但我在沖繩的時候，便經由通信而與台灣的獨立運動家 R 氏（連溫卿）、山川夫婦有著友好聯繫，從而才可能透過運動而在 R 氏、山川，以及我之間建立特殊的關係。

……她（山川菊榮）的學生有作為法官³⁶的女兒卻投入社會主義運動的山口小靜這位女性。她在台灣支持社會主義者的獨立運動、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也就是爭取臺灣人之政治利益的運動。大約是大正四、五年前後，³⁷其中的運動同志之一便經由她而得以聯繫上山川均，並且請教了運動的理論指導。

……當時長谷川如是閑他們的《我等》雜誌刊出了俄羅斯盲詩人愛羅先珂的世界語手記〈盲學校生活的一頁〉一則譯文。我認為這是一篇優秀而且動人的文章，所以從他們的編輯部取得原文，油印送給沖繩的世界語學者與其他各處。台北的世界語學會也收到了，由此我才同山川均先生有來往的 R 氏有密切的交往。山川先生不只指導台灣的運動，也常常將自己的著書版稅投入，作為資金援助。以後各種的聯繫與匯款都由我經手，那時對於警察而言仍是無名小卒的我，比起知名度高的山川均先生來說，做起事來比較安全。

1923年3月，小靜在裕仁抵台前夕因肺病而逝世於台北。也許《台灣社會運動史》是因小靜早逝才未視之為社會問題研究會成員。然而《台灣社會運動

³⁵ 比嘉春潮（1997: 102-104）。

³⁶ 此處有誤，應為神官。

³⁷ 此處有誤，「大正四、五年」時，小靜才十五、六歲，尚未認識山川均等社會主義者。

史》所多列出來的蔡式毅（1884-1976）卻不為連溫卿所承認。³⁸只是，假使蔡式毅並未參加，何以社會問題研究會的成立旨趣書³⁹仍列之為同人？這是連溫卿沒講清楚的問題。

不過，若先撇開長期在島外從事飛行事業的謝文達，⁴⁰那末，**餘下的蔣、石、蔡、連四人，實即依次為表 2-1 所列之四團體的核心幹部。**這是很值得注意的現象——也許社會問題研究會可被視為文協組織脈絡下的、由核心幹部所組成的、並以「研究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之理論及戰術」為主的理論研究團體。

為了成立社會問題研究會，他們印刷了五百份旨趣書散發於島內，卻因此而觸犯了總督府當局的出版法規，「趣意書的發表，又被罰了四十金。」⁴¹但問題並不只是罰錢而已，「石煥長、蔡式毅等逐漸與連溫卿、蔣渭水的思想傾向迥異，事實上研究會已趨於消滅。」⁴²

謝文達與石煥長日後的主要活動地，並不在台灣。蔡式毅、蔣渭水、連溫卿則由右而左步向殊途並分別在 1927 年文協分裂之後，成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右派）、台灣民眾黨（中間偏左），以及新台灣文化協會（左派）的核心領導。曇花一現的社會問題研究會，或者正是文協及其後續發展的縮影與預示。

³⁸ 連溫卿（1988: 121）。

³⁹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247-248）。蔡式毅即列名其中。

⁴⁰ 台灣第一個飛行家謝文達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而加入「社會問題研究會」，尚不清楚。但他當時確實具有左傾思想。他在 1923 年 5 月住進長春的病院之後，便稱「今將為無產者而活動」而退出飛行事業、登報言之，大有挑戰栽培他的日本當局之意（台灣日日新報，1923e, f）。此舉獲得連溫卿的高度評價（連溫卿，1954a: 38-39）。同年底，謝轉赴日本，12 月 3 日拜訪了東京的《台灣民報》社，16 日正式入社參與編輯；直到 1924 年 5 月 25 日才「退社回長春」（台灣民報，1923b; 1924a, j）。

⁴¹ 蔣渭水·雪谷（1925: 45）。

⁴²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c: 4-5）。

3. 社會問題研究會的歷史意義

與〈新台灣聯盟宣言書〉相較，同樣是連溫卿所起草之〈社會問題研究會趣意書〉明確宣示研究會成立於「社會環境所產生之問題」(如佃農爭議)之下：⁴³

最近我輩同人鑑於新店發生之小作(佃農)爭議與南部地主小作人協調會之創立，而依照趣旨及綱領組織，組成社會問題研究會。

人類無一人不被社會束縛、暗示，是故有感於社會之缺陷者，相信以其社會環境所產生之問題為對象，而謀求解決。但其所求解決為何？此為吾人所欲知之處，又為組織本會之所以也。

不但直言歌頌俄羅斯十月革命：

人類有三大歷史時代，即由法蘭西及俄羅斯所表現之革命也。一切古舊傳統主義者及保守主義者因固執頑迷之宿命，對既已突破歷史時代革新期而到之新人類，愚蠢地以嗤笑、罵詈及威嚇欲將瞞著看過。

更質疑當前的社會型態(暗指資本主義社會)的永恆性：

希望較高幸福生活之人類意識的，果能視為一時之現象乎？受一定生產條件影響之社會果能永久保持其永續性與調和性乎？

看！將要踢破社會制度軀殼之所有問題，如勞資問題與小作爭議，在所謂武陵桃源之台灣已舉起狼火矣，此教示人類如何，乃我輩同人所欲研究也。

因此他們決定「立腳於近代科學，基於一定社會條件以研究之。」

也許恰恰是上述鮮明的左傾訴求，才使社會問題研究會成為一個「資產階級的進步份子所不能接受」、「一般人缺乏理解」，從而「任憑支配階級之謾罵惡言」的組織。但連溫卿認為，「社會問題研究會雖被彈壓，但其影響所

⁴³ 這份文獻的中文版由連溫卿所自譯(連溫卿, 1988: 121-122)。關於社會問題研究會的相關文獻,《台灣社會運動史》分別在「文化運動」與「共產主義運動」兩章收錄其旨趣書。但「文化運動」章多收錄了社會問題研究會的「規約」(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244-248; 1989c: 4-5)。

及，決〔絕〕不能謂之甚少。蓋在其主張過程中，無意識所喚起的反日本帝國主義之民族意識，已如燎原之火，由台灣之資產階級及智識階級之少數分子，乃至於青少年各階層、全島公學校同窗會的決起鬥爭即其反映。」⁴⁴

連溫卿強調社會問題研究會的影響力，並視新台灣聯盟的成立為《治安警察法》在台實施的導火線。⁴⁵但事情未必如此。《治安警察法》正式在台灣施行之後（1922.12.28），新台灣聯盟立刻依據該法而被中止過集會；⁴⁶也許當局確實意圖透過該法以整治這些運動份子。但無論是新台灣聯盟還是社會問題研究會，當時總督府當局的對付方法除了整治某些個人（如石煥長⁴⁷）之外，主要仍從《台灣出版規則》的罰則入手。新台灣聯盟被罰「二十金」，而社會問題研究會被罰了「四十金」。僅僅這樣的懲罰就使兩個組織就走向消沈。⁴⁸相較於《治安警察法》直接加在議會請願運動頭上的打擊，依據《台灣出版規則》而來的打擊顯然只是彈壓的前奏。1923年初，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在台北被禁止；同年底，請願運動者便遭遇到全島大檢舉，即所謂的「治警事件」。

從文協成立至治警事件，請願運動匯集了島內外最多的力量並遭遇最大的打擊。此間，社會主義運動也在島內萌芽起來，只是萌芽未能長成樹。但如魯迅所云，「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關鍵並不在於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的火種滅絕，而是刺激這些組織產生的打火石何在。這裡的打火石至少有二，首先是全世界自十月革命以來風起雲湧的社會主義運動，從島外的蘇聯、日本、大陸源源不絕地敲擊台灣；其次則是連溫卿所觀察到的島內「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的形勢（蓬萊米改植，佃農爭議增多）。在這種形勢之下，階級矛盾在民族矛盾之外逐漸激化。

山口小靜還活著的時候曾說，「諸君先為民族戰爭來戰鬥以前，一定要先

⁴⁴ 連溫卿（1988: 122-123）。

⁴⁵ 連溫卿（1953b: 71; 1988: 81）。

⁴⁶ 台灣日日新報（1923c）。

⁴⁷ 石煥長在 1923 年時身陷誹聞與醫療糾紛之中。關於誹聞可見台灣日日新報（1923b, d）；關於石煥長醫療糾紛之事，則可見《台灣民報》為之叫屈的新聞（台灣民報, 1923a）以及 1923 年 2 月 8 日後《台灣日日新報日刊》的系列報導。

⁴⁸ 在針對新台灣聯盟違反出版法的審判上，法官甚至當面斥責蔣渭水「在改造社會之前，要先改造自己的頭腦」（台灣日日新報, 1923a）。

從不公平的迫害和壓迫中得到解放。」⁴⁹在「民族戰爭」之前所應先「得到」的「解放」是什麼？也許小靜是指「階級」上的解放吧。然而台灣社會運動的水平卻處於一種低度的狀態，無法上升到小靜所言的層次。連溫卿曾對山川菊榮說，「總之台灣的人民還是徘徊於民族範圍內的底層，雖然有時會打出超乎民族水平之上的旗幟，但其顏色仍是粉紅色的。」⁵⁰但要如何使旗幟的顏色轉為赤紅，如何使階級旗幟打出來呢？社會問題研究會也許正是對於這一問題的初步回答。

雖然社會問題研究會是島內核心幹部在文協左右分裂前的最後集結，卻不等於社會主義運動在島內的中絕。當連溫卿試圖以「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之形勢解釋島內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時，或許可以把從中成立的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理解為「研究必然產生這兩個階級及其相互鬥爭的那種歷史的經濟的過程；並在由此造成的經濟狀況中找出解決衝突的手段」⁵¹的社會主義組織吧。

第三節、結論

1. 島內社會主義者與島內外社會（主義）運動的關係

若林正丈曾以「本地地主資產階級」的概念分析日本在台殖民政府（若林稱之「現地權力」）與這一階級透過「交換」及「仲介」而形成的互利關係以及這種關係所體現的「政治」。對於這種關係的不滿將導致「本地地主資產階級」游離出民族主義者，「而往台灣社會大眾的方向靠近，也就是往民族主義的方

⁴⁹ 山川菊榮（1972: 249）。

⁵⁰ 山川菊榮（1972: 353-354）。

⁵¹ 恩格斯（1995b: 721, 739）。

向前進。」⁵²最具體的例證即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不過，若林的說明僅止於說明請願運動的主體是「本地地主資產階級」中的民族主義者。這些民族主義者是否還會超越自己的主體，向下，將「台灣社會大眾」延攬為運動的動力？如果要延攬，又該如何為之？

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可說是台灣社會運動領導者（特別是青壯派）思考這一問題的反映。不但反映在青壯派領導人對於社會主義的興趣，也反映在他們希望能透過社會主義了解或解決正在台灣發生的前所未有的經濟社會矛盾。既然「請願運動」無法滿足多數「台灣社會大眾」的要求，意圖反映多數人之更多利益（也許並不包括既有的社會運動領導者）的社會主義運動便可能因此登上歷史舞台。所以連溫卿才會再三強調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是在島內經濟矛盾激化的狀況下誕生的，因為這些矛盾恰恰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正面臨的利害所在。1925年8月，《台灣民報》設了五個問題讓讀者投書回應。其中，連溫卿以「施行蔗農組合法」回答「目今政治急要施政的事項」這一提問，並以有關於經濟的「竹林事件」與「蔗作事件」回答「五年以來發生的重要事項」這一問題。⁵³顯見連溫卿對於「社會問題、經濟問題等接踵而至」之形勢的關心。或者說，社會與經濟狀況的變化已經顯著到連溫卿不得不注意的地步了。

僅由幾個領導者關心底層民眾的生活當然未必能解決民眾的問題或爭取民眾參與運動。而且「治安警察法」的實施以及隨後爆發的「治警事件」都打擊了這些領導者所組織的社會主義小團體。在這種形勢下，島內運動一時萎縮到原點，只剩文化協會。自此而至1927年初連溫卿率領文化協會左傾化之前，台灣島內的社會運動進入了以文化協會為主體的過渡期（1923.12~1927.1）。過渡期本身反映了運動所遭遇的挫敗，卻也成為運動再興的準備。

島外的社會主義運動始終起著觸發並維持島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的作用。《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的開頭語云，「本島共產主義運動侵入的途徑，其一為東京留學生在東京與共產主義者交往並受其影響者，其二為支那留學生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之影響與吸收。前後兩者皆應追溯到大大正十

⁵² 若林正文（2007: 432）。

⁵³ 台灣民報（1925: 53）。

年（1921年）前後來考察。」⁵⁴對於當時的台灣總督田健治郎來說，他比較擔心從日本而來的「侵入的途徑」。⁵⁵山口小靜與連溫卿在台日之間所架起的聯繫就是田所擔心的那種「不穩」來源。而連溫卿在1924年前往日本拜會當地社會主義者的舉動，不但可以視為島內社會主義者重謀再起之信號、更可視為日本社會主義運動深入台灣的前奏。當然，無論當年山口小靜的返台或者後來連溫卿的赴日都是以個人之活動牽繫著運動整體發展，這種現象反映了社會主義運動形成初期的實況。最後，誠如連溫卿在1924年便已所揭示的：由大陸而來的社會主義，也在此時逐漸形成了另一條「侵入的途徑」。⁵⁶

2. 蔣渭水眼中的路線對立

連溫卿在1924年便意識到路線鬥爭的存在，並視之為「無產階級運動／既存的台灣社會運動」之間的矛盾：⁵⁷

現在台灣的政治運動，只是根據這階級要求參加政治而已，不是根據無產階級的運動，以求解放他人即是解放自己。現在的只是要解放他人——即所謂「解放同胞，非自己獲得政權立在議政壇上，否則同胞一定是不能解放」的自由主義範圍內，去表現一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蔣渭水直到1927年文協分裂才意識到同樣的問題。1927年分裂之初，蔣渭水曾用「階級鬥爭／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或者「階級鬥爭／民族運動」區分兩條路線。由於其區分的基準是能否爭取更多的台灣人民參與運動，而「民族主義」就是實現爭取全部台灣人的最好的統一戰線之訴求。因此

⁵⁴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c: 1）。

⁵⁵ 田健治郎於1923年指出：「因對岸充滿危險思想，恐此會侵入台灣來，但本人卻以為從對岸侵入不大，反而此種思想會由內地（日本）而來。在內地東京等處，思想動搖頗利〔厲〕害。在勞動者及學生間甚為利〔厲〕害。」「新思想雖好，但動輒被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所傳染，此又自然流入台灣，想有多少影響波及」上述言論轉引自連溫卿（1988: 86）。

⁵⁶ 越無（連溫卿）（1924: 第九十七回）。

⁵⁷ 越無（連溫卿）（1924: 第四十回）。

蔣渭水當時譴責階級鬥爭、支持「民族運動」。⁵⁸但至後期，蔣渭水則以「階級運動（但明言不是階級鬥爭）／全民運動」來表述民眾黨自己的路線，並稱「我們在政治上主張民主主義，經濟上提倡勞資協調」。⁵⁹蔣渭水的變化反映了他對左右翼重新結成統一戰線的渴求（當然當時的左翼也有這種要求），然而這一渴求尚未達成之前，他自己的陣營內部就先發生了分裂。

晚年的蔣渭水開始對立使用「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之概念。區別路線的基準則是此前並未成為焦點的「民主主義」。此時不談「民族主義」而使用「民主主義」的蔣渭水，將反民主主義的民族主義者——也就是即將分裂而出的地方自治聯盟參與者——視為不可團結的對象，並將這些不可團結的對象以「自由主義」名之。

雖然連溫卿早在 1924 年就已經把「自由主義」當成一條應當批判的路線，但蔣渭水此時對立使用「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之概念的淵源卻是布哈林、是布哈林代表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問題所提出的分析。⁶⁰然而布哈林的敵我友分析也是有淵源的。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來，「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之別，有時候指資產階級內部的不同派別，有時候又指工人階級（工人民主派）與資產階級（資產階級自由派、或者自由主義資產階級）之間的差異。而「民主主義」總是正面的、是工人階級與某部分資產階級所能共享的屬性；「自由主義」則有時正面、有時負面。⁶¹

在中國革命的經驗中，共產國際最初把國民黨視為「自由資產階級民主派」

⁵⁸ 可分見：蔣渭水，〈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1927.5.1）、〈階級鬥爭與民族運動〉（1927.5.15），以上二文在《台灣民報》發表時並未署名，經指認為其作品後，收錄於王曉波（2005a: 123-124, 131-134）。據聞蔣渭水還曾將運動區分為「現實派（穩健份子）、理想派（急進份子）、折衷派」以及「賢人運動、大眾運動（民眾運動）」。以上分見〈解放運動的派別〉（1927.2.13）、〈民眾運動的過程〉（1927.5.1），以上均收錄於王曉波（2005a: 104-107, 118-122）。

⁵⁹ 可分見：蔣渭水，〈我的主張〉（1927.7 月以後），收錄於王曉波（2005a: 125-130）。該書將〈我的主張〉判定為 1927 年 3 月，誤。按內文所述史實（提及民眾黨於 7 月成立），至少在 7 月之後。

⁶⁰ 蔣渭水在〈十年後的解放運動—希望與展望—〉中，是從引用布哈林的一段話中引申出「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立的。但他只說引自布哈林，而未說明其出處。實際上，他所引用的是布哈林為共產國際第八次執行委員會總會而擬的〈中國革命的諸問題〉（1927.5.39）決議。譯文與介紹可見：村田陽一（1981: 179-190, 566-567）。

⁶¹ 如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8），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二）〉（1851-1852），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1875），列寧，〈紀念赫爾岑〉（1912）、〈兩種烏托邦〉（1912）、〈馬克思學說的歷史命運〉（1913）。

並要求中共與之合作。⁶²當國共合作於1927年破裂，共產國際內部則就「自由主義（資產階級）」能否繼續服從「民主主義」統一戰線而發生論爭。反對派托洛茨基自始否定這個階級的革命性，主流派布哈林則經歷了從部分肯定到完全否定的轉變。⁶³雖然共產國際對於國民黨的階級屬性與中國資產階級的分析還有很多複雜的見解（比方把國民黨規定為「四個階級的聯盟」），但在對立使用「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場合中，「民主主義」通常用來指涉某種統一戰線的性質，「自由主義」則通常用來指稱某些資產階級的性質。

雖然1930年的蔣渭水使用了共產國際的概念與分析方式，但他並未說明自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派還是工人階級的「民主主義」派，這體現了蔣渭水政治立場的曖昧性。而且同奉「民主主義」為口號的蔣渭水與共產主義者（特別是台灣共產黨，及其文協、農組）亦未因著相同的口號而產生合作。可以說，此時舉起「民主主義」旗幟的蔣渭水，主要是向右（「自由主義」）區隔，而不是向左聯合。但既然蔣渭水使用了共產國際的論述，應當承認，他為左翼之間的聯合保留了空間。

3. 一九二〇年代台灣社會運動的總趨向：左傾化

在托洛茨基為伊羅生（H. R. Isaacs, 1910-1986）所寫的《中國革命的悲劇》序言中，他針對了工人階級政黨能否同「自由資產階級」在「民主主義」統一戰線下合作進行了討論。更正確地說，托洛茨基另外挾出了「民族資產階級」這個概念，然後把中國革命中的「民族資產階級」類比於俄國革命中的「自由資產階級」而展開論述。⁶⁴

托洛茨基所做的類比體現了這兩個概念有共通性；但既然畢竟是兩個概念，也就存在著差異。一方面，兩個概念並存至1949年，另一方面，兩個概念

⁶² 這個概念的使用可見共產國際確立國共合作的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1981）。

⁶³ 關於兩人的爭論，可詳見孫武霞與許俊基（1985）所編史料。

⁶⁴ 托洛茨基為伊羅生《中國革命的悲劇》所寫的〈導言〉（伊羅生，1947：37-50）。

又很少同時被使用。⁶⁵雖然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尚待深入研究，但托洛茨基所提及的「民族資產階級」無疑最為人所知。僅從這個概念作為一顆「小五角星」而被繪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之上，便可得到說明。而這個概念之所以最為人所知，正因這個概念曾經得到最多使用並在政治上起到實際作用。僅從這個概念的涵義非常複雜，也可證明這點。而其所以複雜，正因為這個概念始終在「指涉部分資產階級以及指涉整體資產階級」之間擺盪：如果比較的對象是外國資產階級，本地的資產階級整體可能被籠統通稱為民族資產階級；如果比較的對象是本地某一部分的「反動」資產階級，則可能縮限民族資產階級的範圍於另一部分的「進步」資產階級。但是，「進步」與「反動」之間的區別又進一步在「部分或整體資產階級已然的實際政治表現以及未然的預期政治表現」之間擺盪：已然「進步」者，可能保持進步；一旦變為「反動」，則可能繼續反動；或者乾脆綜合「進步」與「反動」而稱某一部分的資產階級有「兩面性」。⁶⁶這一擺盪也導致作為階級分析之基礎的經濟分析（如果有的話）處於猶疑。

以上**二重擺盪**也曾出現於殖民地台灣，蔣渭水最為典型。如果 1930 年的蔣渭水眼前所將出現的分裂是整個一九二〇年代台灣社會運動內兩條暗流的總

⁶⁵ 中共於 1945 至 1949 年建國之間的時段最能體現這種同時存在的狀況。當時中共將其所欲爭取的「資產階級」表述為：（1）「民族資產階級」，見：〈中共中央對時局口號〉（1947.7.5）、〈中共中央關於對民族資本家政策問題給東北局電〉（1949.5.31）。（2）「自由資產階級」。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1948.5.1）、〈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紀念「七一」和「七七」的通知〉（1948.6.28）、〈中共中央關於爭取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協助接管上海工作的指示〉（1949.4.7）、〈中共中央關於民主同盟性質的指示〉（1949.5.25）。（3）「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開明紳士）」，見：〈中共關於邊區政權性質給邯鄲局的指示〉（1948.1.16）。此外，「小資產階級與自由資產階級」曾被同時使用（〈中共中央關於民主同盟性質的指示〉），「中間派和中產階級右翼份子」則被作為區別對待的對象而被同時使用（〈中共關於對中間派和中產階級右翼份子政策的指示〉）。而中共為何在公開發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與〈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紀念「七一」和「七七」的通知〉使用「自由資產階級」而不使用「民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在這個時期交叉使用的原因又是什麼？這是很值得繼續探討的問題。上述文件可分見：中央統戰部與中央檔案館（1988: 160-162, 183-184, 195-197, 200-201, 263, 267, 268-269）。

⁶⁶ 德國學者羅梅君有類似的觀察。她指出中共在抗戰期間的階級分析與被分析的階級（主要是資產階級）的實際作為有關，而這一作為又主要體現於對外關係上。她認為，中共「鑒於國民黨投降妥協的立場而稱之為落後力量，這樣，共產黨人實際是把外交行為當作確定社會性質的標準了。與在歐洲通常可見的詞彙應用不同，這裡的『進步』和『倒退』概念主要不是從內政方面定義的範疇。」羅梅君更總結認為，「毛（澤東）在區別實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時，考慮較多的也是他們的政治行為而不是諸如與外國資本的聯繫等經濟標準。」（羅梅君，1997: 130）

對決，他理應在 1927 年或更早的時候就擺出對立的姿態並支持已經展開對決的人（如連溫卿），而不是站到後來他所反對的陣營。然而蔣渭水所體現的二重擺盪又是一個逐漸縮小振幅並確定自我定位的擺盪。在這個縮小的過程中，蔣渭水所選擇的道路愈發明確而艱難，這是一條左傾的道路。

與連溫卿鮮明的社會主義色彩相比，蔣渭水的色彩始終曖昧。眾所皆知，在文協左右分裂時，雖然蔣渭水並未站在連溫卿的左側這邊，卻選擇了中派立場。直到文協右派最終選擇另外組建民眾黨時，蔣、連二人的政治聯繫才徹底撕裂。晚年的連溫卿也許仍對蔣渭水有意見（比方蔣渭水個人的「決心」能否促成新台灣聯盟之誕生）。然而歷史的發展卻將他們兩人推回相近的道路上。1929 年，連溫卿遭到已被台灣共產黨所掌控的新文協開除，成為孑然一身的社會主義個體戶。1930 年，蔣渭水也同當年的文協右派分手，民眾黨最終走上連溫卿當年所選擇的左傾路線。

蔣渭水死前數月，曾與陳逢源（1893-1982）等人在《台灣新民報》上發生論戰。陳逢源是 1926 至 1927 年間「中國改造論爭」的右翼代表，左翼主將則是許乃昌。當時的論爭預示了文化協會的左右分裂。時過四年，右翼代表依然，左翼主將卻換成了蔣渭水。論戰的主題之一是蔣渭水對待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陳逢源（署名南都生）批評蔣渭水云：⁶⁷

如果渭水君對於台灣解放運動的指導原理，已認定三民主義完全錯誤，非歸依於馬列主義不可，這亦是個人自由的志向，我也不必究改其宗了。然而他卻硬說「三民主義可以發展到馬列主義」這種極不透澈的理論……在來蔣君所信仰的三民主義假使有八分，而添上馬克斯主義二分，如今蔣君倒反信仰馬克斯主義八分，三民主義只剩二分了。陳逢源的批評無非是對立看待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並得出「八二開」或「二八開」的結論。關鍵卻在於，如果蔣渭水確實如此調和為之，也必然是其眼中的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具有共性才可能調和。然而這樣的**共性**是什麼呢？這樣的共性是否正是蔣渭水一以貫之的信仰呢？

蔣渭水在〈十年後的解放運動－希望與展望－〉中這麼寫道：⁶⁸

⁶⁷ 南都生〔陳逢源〕（1931: 5）。

⁶⁸ 蔣渭水（1930: 18）。譯文引自王曉波（2005a: 198）。

……十年後的展望是越來越進展、深刻、尖銳化，會跳過許多墮落社會運動家的屍體，走上**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吧。

非資本主義，並不意味著歷史的倒退也是一種選項。而是在**進步**的意義上，**超克資本主義**。而此正是社會主義。如果「非資本主義」就是蔣渭水所要追求的對象，那末，蔣渭水（乃至整個台灣社會運動）貫穿整個一九二〇年代而逐漸明確的想法，不正是社會主義？老台共蕭友山（1907-1992）是這樣看的：「體會到在帝國主義壓制下解放運動合法性之極限的蔣渭水氏，之後也與台灣共產黨保持聯絡，就在這運動繼續展開之時，〔一九三一年〕八月五日午後七時四十分，他滿懷無產階級必勝的信念，因患傷寒症，與世長辭，留下了這樣的遺言」：⁶⁹

台灣社會運動已進入第三期。無產階級勝利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務須極力奮鬥，舊同志亦應倍加團結，積極援助青年同志，切望為同胞解放而努力，實所至望。

⁶⁹ 蕭友山，《台灣解放運動的回顧》（蕭友山與徐瓊二，2002: 64-65）。原書出版於1946年，為日文。

第三章、台灣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

台灣革命運動進化史，以我們研究結果約有三大進化的趨勢：一是，由「無組織」的革命運動，進化到了「有組織」的革命運動！一是，由「狹義」的革命運動，進化到了「廣義」的革命運動！……直到下期的革命，(1920-1925)才純是廣義的革命運動了，……

他是一九二〇年在日本東京設立台灣青年雜誌社；一九二一年提出台灣民選議會於日本；同年組織台灣文化協會於台北；一九二二年北京台灣青年會成立；一九二三年台灣尚志社設於廈門；同年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成立於東京；一九二四年新台灣安社創設於北京；同年，台灣及朝鮮合作平刊社於上海，一九二五年中國台灣新青年社開始設立。……同年台灣同志會成立於上海等等。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的團體次第設立，這種情形是初期和中期的革命所萬萬不能及的。

——漢人，《台灣革命史》，1926。¹

¹ 漢人〔黃玉齋〕（1926: 160-164）。標點按原書。

引言、黃玉齋的《台灣革命史》

1926年，一本不到兩百面的小冊子在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這本名曰《台灣革命史》的小書由署名「漢人」的台灣學生黃玉齋（1903-1975）所作。黃玉齋回憶：²

玉齋早年赴笈歸國求學，於廈門為學生時代，已承師友的慫恿；且當民國十年間吾國革命風潮很高，於是開始蒐集吾台灣抗日革命的史實，在吾國內豈有可求？因此不得不利用學校寒暑假回台北省親的時候，在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台北圖書館」中秘密鈔自日人的著作中關於台灣抗日革命史料，每次鈔譯抗日革命史料之後，不敢自己帶回家中，祇好事前備便的「信封」寫好廈門友人的住址、姓名、貼足郵票等，即刻將鈔就的抗日革命史料分散放在信封之中，即刻投入信箱寄與廈門友人代收。……

這本以台灣武裝及非武裝抗日運動為論述對象的專著，在日新月異的歷史學研究及史料積累面前似乎頗為失色。幾乎不被當成研究對象的這本書彷彿已然過時而又過時了。然而這本小冊子卻是同類型題裁化為書面研究的頭一遭，並是第一本試圖區分臺灣抗日運動的型態變遷（如引文所謂「無組織」至「有組織」的變化）並介紹島內社會運動派系的專著。

如果運動的型態變遷及派系分類可被介紹，也許正意味著運動的發展已臻某種階段，才使黃玉齋有條件為之。從書中內容來看（如上引文），各種台灣青年組織層出於中、台、日三地，確實是「初期和中期的革命所萬萬不能及的」。如果運動還未發展出相對具足的條件，黃玉齋恐怕無法順利寫就其著作。當時的島內的「政治運動」為黃玉齋區分如下（標號按原書）：

1. 「民族主義派」
 - A. 台灣獨立派、

² 黃玉齋（1999: 3）。

- B. 台灣光復派、
 - C. 台灣民選議會派、
 - D. 台灣文化協會派。
2. 「社會主義派」
- E. 無政府主義派
 - F. 社會主義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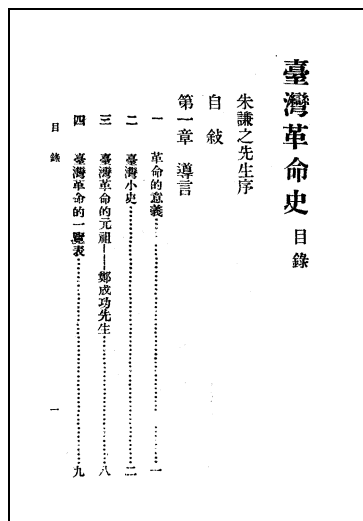
如果黃玉齋寫作的篇幅可以反映當時運動的規模、水平、或聲勢，他所劃出的「F.社會主義派」也許就是最為混雜不清的政治勢力。黃玉齋籠統列以三民主義、共產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國家主義，卻未能說明何者為臺灣人所實際進行者。³相對之下，他對「E.無政府主義派」的說明便

詳細很多，其代表就是 1924 年由台灣人范本梁（1897-1945）創設於北京的無政府主義組織：新台灣安社。

如果直到 1926 年，黃玉齋所能知曉的台灣社會主義組織只有新台灣安社，可能體現出新台灣安社的活動非常顯著，也可能反映了黃玉齋只知道安社的活動細節。甚至，可能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發生了斷層，特別是在大陸上。但只要考慮到 1927 年的文協分裂才使左派全面浮現檯面，那末，無論黃玉齋將新台灣安社特別拔高的原因為何，其意義都不能小覷。

本章的研究對象是台灣最初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組織。范本梁及其「新台灣安社」將是這一研究的主要（但非唯一）的線索。至於敘述的開端，還得從東京（最早出現台灣人青年組織之地）及北京（大陸上最早出現台灣人青年組織之地）說起。

圖 3-1：1926 年《台灣革命史》書影



³ 他只說了一個叫做楊子江的台籍國民黨軍官在福建遭刺。可代表三民主義在「台灣」的發展。

第一節、台灣的無政府主義起源：東京與北京

1. 東京的台灣人與他們參加的社會主義組織：

可思母俱樂部與其他

東京是台灣人最早在島外成立青年組織的地方，同時也是台灣人最早接觸社會主義組織之處。目前的文獻只能說明什麼人參與了什麼組織，具體的活動則難說明。史料中的台灣人幾乎集中參與在東京的「可思母俱樂部」（コスモ俱樂部，1920-1923），參與者有呂盤〔磐〕石（1888-?）⁴、黃登洲（1901-?）⁵、彭華英（1891-1968）、蔡培火（1889-1983），⁶以及范本梁。⁷有台灣人參與的可思母俱樂部可謂同時期日本社會運動組織裡的特殊風景。⁸其中，彭華英還參與了另一個團體：「曉民會」。⁹由於曉民會與台灣的關係並無太多的史料可以說明，¹⁰因此可思母俱樂部將是本節的敘述主線。

「コスモ」（コスモポリタン，Cosmopolitan）之名，蘊含著「創造無國境的新世界新生命」的意味。¹¹用日本學者松尾尊兌的話來說，可思母俱樂部是一個

⁴ 生年據興南新聞社（1943: 468）。

⁵ 生年據興南新聞社（1943: 157）。

⁶ 這些參與者的名字目前僅見於內務省警保局（1921）。松尾尊兌研究可思母俱樂部時，並未用到內務省警保局的這則史料。因此松尾尊兌並未提及這則史料所提到的「黃登洲」、「蔡培火」。但松尾尊兌（2000: 33）曾提到有一名無法辨認其身分的「黃登明」，此人是否可能為「黃登洲」？

⁷ 警視庁特別高等係（1984: 76）。

⁸ 內務省警保局（1924）。警保局的這篇調查就只強調可思母俱樂部有台灣人參與。

⁹ 關於彭華英，並見內務省警保局（1921）、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c: 2）。

¹⁰ 「曉民會底會員，都是缺衣少食的、而對於宣傳演說賣書報，誰都趕不上他們勇猛。出入他們曉民會一口小屋的，日本人外，有高麗人、中國人、台灣人，其餘就是周圍環視的警察偵探。」（晉青〔謝晉青〕，1921c）。另一則1925年的日本情報曾指出，彭華英與高津正道、堺利彥有接觸（外務省記錄，1925b），這兩人實分別是曉民會與可思母俱樂部的領導人（內務省警保局，1923b; 1924）。

¹¹ 松尾尊兌（2000: 24）。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東亞諸民族知識人的交流機關」，¹²是一個跨東亞各地域的集合體。俱樂部由朝鮮社會主義者權熙國、日本社會主義者堺利彥（1870-1933），以及宮崎龍介（1892-1971）所創，活動地點則主要是東京神田區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YMCA），也就是第一章所提到的謝晉青（晉青、晉卿，?-1923）等人之活動地。

在此稍就謝晉青及東京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做一說明。據謝晉青友人高一涵（1885-1968）回憶，謝晉青曾在東京神田區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中組織一個「東方書報販賣社」，販售國內進步書刊。¹³東京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馬伯援（1884-1939）亦憶云，1920年初春，在高一涵的建議下，遂於青年會內代售北京各種雜誌。謝晉青為籌學費，馬伯援便另闢空間於青年會，成立新書店，讓他代售《民國日報》。馬伯援指出，「迨後加入朱鳴田、羅豁（羅任一（1897-1965））」，由小而大，截然是東京中國留日學生的文化中心。惹得日人注意，並常與日人大杉榮、高津正道等開座談會於該書店。」該書店甚至還協助藏匿「上海朝鮮獨立政府派」的抗日份子。¹⁴

後來，謝晉青另組「東方通信社」，高一涵謂其「專向國內報界供給日本方面的有統系的新聞」。據日本情報資料，「東京通信社」乃是謝晉青（負責人）與羅任一（時為「東亞預備校生」、高一涵、殷汝耕（1885-1947）等人於1920年7月組建，社址設於東京中國基督教青年會會館內。¹⁵但通信社旋因日本政府壓制而停辦。¹⁶當時謝晉青曾是上海《覺悟》副刊特闢專欄「旅東隨感錄」的主要撰稿者。謝晉青透過大量的報導性文章將日本社會運動的最新消息傳回國內。

1921年12月，施存統（1899-1970）被日本警視廳拘留時的口供云：「謝晉青（警視廳指定乙類需要監視之人物，現居上海）確為友人，然非同志；彼同羅豁（羅任一）、陳春培皆為無政府主義者，惟其主義與大杉榮派稍異。」¹⁷據高一涵

¹² 松尾尊兌（2000: 21）。

¹³ 高一涵（1931: 1-2）。

¹⁴ 馬伯援（1984: 97）。

¹⁵ 外務省記錄（1930a）。

¹⁶ 晉青〔謝晉青〕（1920c）。

¹⁷ 〈附錄三 施存統口供〉（石川禎浩，2006: 370）。

云，謝晉青由日返國之後，經營木工廠、教學兼課、並從事譯著，旋病故。¹⁸當時高一涵曾去信胡適，希望他能將謝晉青所譯《西洋倫理學史》的稿費交給正在南京的謝晉青治肺病。¹⁹是否胡適給錢，尚不可知，但謝晉青迅即不治而逝。馬伯援曾稱讚謝晉青「苦工求學，取與不苟，記者（馬伯援自稱）之畏友也」。他的無政府主義同志則評價云：「同志晉青，從事主義運動，已垂十年，學問淵博，誠勇動人，猶熱心教育事業，不幸短命死矣。」²⁰就學術貢獻來說，謝晉青是第一個研究《詩經》中的女性的學者，也是第一個將西洋倫理學介紹入中國的學者。²¹

同在東京中國基督教青年會進行活動的可思母俱樂部與謝晉青等人所組織的書報社及通信社，體現了青年會對於激進思想的包容及國際性。雖然謝晉青等人的結社細節還不明朗，但「加盟」或者「出入」可思母俱樂部的成員卻頗清楚。據松尾尊兌研究，其中包括了謝晉青在內的日本、朝鮮、中國（乃至人在北京的李大釗，1889-1927），與俄國（如愛羅先珂，1889-1952）的成員。可思母俱樂部的成立時間與成員幾乎與同時期出現的日本社會主義同盟重疊。同盟遭解散後（1921.5.9，第二次大會召開時當場遭到解散；1921.5.27 被禁止），可思母俱樂部的性質就轉變成為秘密維繫同盟運作及其成員的組織。²²

但可思母俱樂部並不僅僅是個跨地域的組織，而還是個跨主義——「A」派（「安」那其主義，即無政府主義）與「B」派（「布」爾什維主義，當時幾為馬克思主義的代稱）兩派——的集合體。「A」「B」關係是 1917 年十月革命之後整個東亞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大主題。在十月革命之前，無政府主義是東亞社會主義思潮中的主流；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間的關係，也不像歐洲那樣分野清晰或有巨大矛盾。然而十月革命的勝利，加速了馬克思主義以及作為馬克思主義代名詞的「布爾什維主義」在東亞的傳播。於是，「B」派的抬頭，就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分裂的關鍵因素，加速了從「A」「B」混雜向「A」派或「B」派各自

¹⁸ 高一涵（1931: 1-2）。

¹⁹ 高一涵（1979: 209, 215）。

²⁰ 春雷（1923b: 8）。

²¹ 補充一點：在《白堅武日記》（白堅武，1992）中亦可發現有名曰「謝晉卿」者，是否即「謝晉青」？目前尚無法核實。

²² 松尾尊兌（2000）。

的純化。前述章節曾提到，山口小靜（1900-1923）在日期間曾因「A」「B」的不同立場而與無政府主義者伊藤野枝（1895-1923）發生辯論。兩人的爭論點在於社會主義運動是否應該奪取「政治機關」（如國家政權）。伊藤站在無政府主義的立場而反對奪取，小靜則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反對伊藤的見解，於是激怒了伊藤。以後見之明的角度來看，兩人之間的辯論正是「A」「B」矛盾逐漸激化的反映。

「A」「B」混雜下的合作，當然不同於「A」「B」分殊之後所重新產生的合作。但合作與否，始終是1920年前後東亞社會主義運動的問題。在中國，中共建黨前的「社會主義同盟」也具有「A」「B」合作的性質。參與了可思母俱樂部活動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謝晉青，曾向大陸傳回大量關於日本社會運動內的「A」「B」合作的消息。他歌頌這一合作，並對「B」派有正面評價。謝晉青指出，從1921年開始，「赤的色彩，日日濃厚」，「說起他們底漸趨一致——一致於布黨——實在不能說不是社會主義同盟成立底功效。」²³《共產黨宣言》的首位中文全譯者陳望道（1891-1977）則認為，政府的壓迫才是「A」「B」派「一致」的原因。²⁴但顯然兩派終究無法攜手面對政府的鎮壓。松尾尊兌認為，可思母俱樂部的消亡，一方面是官方鎮壓過甚，另一方面則是「A」「B」對立的激化。由於日共在排除無政府主義派大杉榮（1885-1923）的狀況下進行組黨，致使大杉榮重建無政府主義傾向的北風會，停止發行與「B」派共同發行的《勞働運動》；翌年，在日朝鮮人也隨之產生「A」「B」分裂。在此過程中，可思母俱樂部逐漸傾向於「B」派並地下化。

可思母俱樂部所具有的跨地域與跨主義兩種性質，同樣也體現於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上。但前述幾個台灣人的參與首先只能體現其跨地域性質，跨主義的性質則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稍晚才浮上檯面的話題。

在參與可思母俱樂部的台灣人中，彭華英、呂磐石等人的記載較不一致，范本梁的參與則較有蹤跡可尋。²⁵范本梁，嘉義人。目前確認的用名有：一洗、鐵

²³ 晉青〔謝晉青〕（1921b）。

²⁴ 曉風〔陳望道〕（1921）。

²⁵ 各種關於可思母俱樂部參與者的記載不盡然一致。比方彭華英以東京「《台灣青年》社」的身分登記在一份同盟名簿中，但在另一份名簿中卻沒有彭的名字。呂盤〔磐〕石的狀況也類似。可見：松尾尊兌（2000: 33）。

牛、體信、重生、志義、能鳴者，其中「一洗」的名氣似乎較大。²⁶據《台灣社會運動史》記載，范本梁於 1915 年赴日，先後就讀於東京青山學院、茨城縣土浦中學、上智大學。²⁷此後始與東京的無政府主義者來往，如參與領導可思母俱樂部的大杉榮。離開東京後的范本梁回憶大杉榮：「我自己在東京的時候，找他幾次，或是直接間接聽他幾回的演說」；「我在東京的時候，就常常聽他對我們同志說：……」²⁸

1921 年 6 月 21 日，可思母俱樂部在東京神田區的中國青年會館舉辦「人類愛的結合講演會」，發表包括法、俄、中、韓五種語言在內的宣言書，並有來自東方各國的人士發言。這次集會是可思母俱樂部留下最多記載的一次事件。²⁹范本梁亦在會中起而講演，卻遭到臨監警察中止。³⁰根據《台灣社會運動史》的說法，范本梁曾因不妥言論而遭拘禁，同年 8 月轉赴北京；所謂不妥言論，可能就發表在這次集會。³¹范本梁就此離開了他所傾慕的大杉榮：³²

兄弟早就被日人迫開黑暗的東京，早就被日人迫開大杉榮先生的左右，又因為我是個流連性的無產階級，自東都〔東京〕一別，就沒有機會跟他通信，也沒有洋錢買報買誌看，所以他的事蹟或是它的種種事變，一概是兄弟不得知道的，……

除了范本梁，彭華英也因從明治大學畢業而在更早的時候離開了日本。據日本情報，他於 1921 年 7 月前往上海，與蔡惠如（1881-1929）以台灣代表的身分，共同參與了亞洲各殖民地獨立運動者針對華盛頓會議而舉行的協進會。³³

²⁶ 王詩琅謂其自號「一仙」（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95：163），謝雪紅則記之自稱「范一錢」（謝雪紅，2004：153）。范本梁自己在廣東無政府主義刊物《民鐘》所發表文章署名「范一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1979b：704）。曾與范本梁見面（1922 年）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山鹿泰治則稱之「一洗」（向井孝，1974：87-88, 221），可見這是范本梁的常用化名。另外，日本情報檔案還有范本梁用名「鐵仙」的記載（外務省記錄，1926c），此處錄之待考。

²⁷ 范本梁友人張深切（1998：266）對於范本梁在日求學的順序有著比《台灣社會運動史》更詳細的記述，故此處採張深切的說法。此外，在日期間，范志義（蒼亭）〔范本梁〕（1920：60-64）還曾向當時的《台灣青年》投稿。

²⁸ 范一洗〔范本梁〕（1924）。

²⁹ 松尾尊兌（2000：33-41）。

³⁰ 警視庁特別高等係（1984：76）。

³¹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244；1989d：3）。

³² 范一洗〔范本梁〕（1924）。

³³ 外務省記錄（1925b）。

彭、范兩人先後離日之後，可思母俱樂部內仍有台灣人的蹤影，但並無法確知是否為前面曾提到的呂磐石等人。³⁴黃登洲與呂磐石則在 1923 年初在東京成立了一個名曰「曉鐘會」的組織（見本研究第四章，以及表 4-8）。事務所設於《台灣》雜誌社內，並刊登成立宗旨於《台灣》。³⁵同年夏天，《台灣日日新報》與《台南新報》分別登載了兩則攻擊黃登洲的新聞。指控做為「不良學生」與「主義者」的黃登洲去上海領受共產黨的宣傳費，並在東京掛起共產黨支部的招牌。³⁶黃登洲旋於同年《台灣》雜誌發表一篇冷嘲熱諷、橫眉冷對的駁文。³⁷到了 1926 年，黃登洲參與創建「國際俱樂部」（インタナショナル俱樂部）。³⁸黃登洲的經歷可以證實他的左傾，同時也說明了在殖民者眼皮底下進行社會運動的難處。也許這就是彭華英與范本梁早早脫出日本的原因。而日本當地的台灣社會主義者活動，則隨著可思母俱樂部的消亡而進入下一階段。

2. 北京的台灣人組織

以北京為中心的台灣青年啟蒙組織，始於 1922 年 1 月成立的北京台灣青年會。該會由台灣社會運動家蔡惠如所促成。作家張深切（1904-1965）判斷該會為「穩健」團體，因為《台灣社會運動史》所登載的史料顯示青年會以島內幾大家族的子弟為骨幹、並有大陸方面的官學人士為名譽會員。³⁹而張深切之所以特別將「穩健」視為一個組織所有（或者所無）的特質，正是因為日後的島外台灣青年及其組織，幾乎毫無例外走向激進的「不穩」道路。

這種拒絕激進的傾向可以從青年會目前唯一存留的機關刊物《北京台灣青

³⁴ 1922 年 11 月 19 日，秋田雨雀與包括台灣學生在內的三十多名東亞各地學生，在一個咖啡廳裡進行可思母俱樂部內部的談話會（松尾尊兌，2000: 44）。

³⁵ 台灣（1923a: 72）。

³⁶ 台灣日日新報（1923g）、台南新報（1923）。

³⁷ 黃登洲（1923: 83-86）。

³⁸ 外務省記錄（1926b）。

³⁹ 張深切認為，北京台灣青年會包括了北京知名人士，台灣霧峰林家、板橋林家、台中吳家等望族子弟，故為穩健（張深切，1998: 41-42）。

年會月刊·特別號》(閏五月五日發行,即1922.6.29)得到說明:⁴⁰

我們因為要提倡台灣同胞,來中國留學;和要研究中國文化;覺著沒有一個團體,是很不方便的。所以才和在京同人,組織了台灣青年會。現在已經成立了。章程也制定了。(請看後邊台灣青年會章程)

我們又覺著臺灣同胞,所學底文字;所說底言語,跟這邊不同。若是來這邊留學,要入學底時候,得要和這邊底學生,一樣底考試;恐怕有點兒不便。所以用了本會的名義,去和這邊各學校交涉優待台灣學生入學條件;許台灣學生,得和華僑學生享一樣底優待。(請看後邊台灣學生入學優待請願書)幸這邊各學校,十分表同情於台灣同胞;照我們底請願給通過了。這是我們台灣要養成人材底最難得底良機了。

我們又想要在這邊,建一個青年會館;可以給台灣底學生,或是來這邊遊歷底台灣同胞住宿。我們台灣原先在這邊卻有兩座台灣會館;給了一個福州人管理;聽說後來著了火;那位福州人給修理了;⁴¹所以現在若是要他回來;得要八百來元去贖他。我們打算要對台灣同志,捐這一筆錢,來贖回來;可以當作台灣青年會館。那將來有父兄子弟要來,就方便了。

我們又怕台灣同胞,到這邊有言語不通底麻煩;所以我們在這邊,又立了一個白話研究會;給我們同胞,可以隨便研究。我們進一步,又想要把這邊底情形,對我們同胞說明說明;所以又創刊台灣青年會月刊;來疏通疏通這邊底情形;叫我們同胞,都知道這邊底狀況。這個印刷物,就是我們台灣青年會月刊底特別號。比後盼望諸同胞,協力幫助;共圖台灣青年會底進展!這個台灣青年會底成立,可以算是台灣有了人材底懷胎了!但是到了十月臨禱底時候,不知道能夠得個英兒呀不能?

⁴⁰ 許地山(1922: 1-2)。

⁴¹ 由於當時已無台灣會館,北京台灣人多出入於福建會館、漳浦會館(外省省記錄,1925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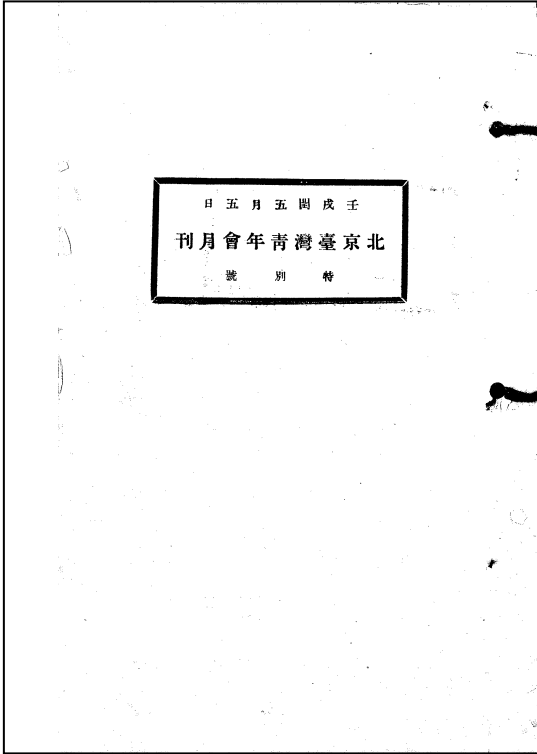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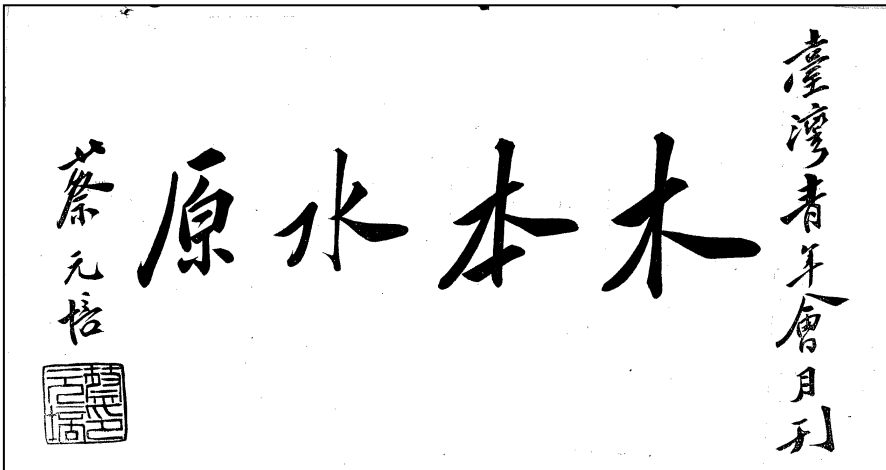


圖 3-2：1922 年《北京台灣青年會月刊》封面與內頁

左圖為許地山所主編的《北京台灣青年會月刊》特別號（壬戌閏五月五日）。內有北大校長蔡元培所題贈的「木本水原」四字。該刊內容有〈序言〉、〈名譽會員姓名〉、〈北京指南概要〉、〈優待台灣學生入學請願書〉、〈北京台灣青年會章程〉等內容。該刊稱：「本刊因時間迫切，不及登載名士講演；僅刊本會事情，並北京概要。故名曰『特別號』。由發刊號起，擬廣索內外名士著述，以成一種文化運動雜誌。」並請「投稿者注意」如下：「本刊投稿，限於文化方面；不牽及政治問題。投稿處：北京，崇文門內，鈞耳胡同，十四號，王宅」。王宅即王悅元宅。



如將《北京台灣青年會月刊·特別號》翻到最後一頁，就能看到該刊編輯兼發行者的大名：這個名字也不是別人，即是著名作家許地山（贊堃，1893-1941），當時他正在北京的燕京大學就讀。許地山的參與反映出青年會組成份子的複雜性。也許彼時台灣割讓不過三十年，離土未遠、親緣仍深，台灣割讓前後即跨海內渡的台灣人，仍可參與其中。也或許始終以「老台灣人」自許⁴²的許地山，對於台灣的情感厚重依舊。不過，許地山的參與還預示了一層更深的意義，即無政府主義向著台灣青年而滲透的開始。然而這個問題，並無法從「許地山」這三個字直接挾出答案；問題還得從另一個重要的臺灣人說起。這個人，正是從東京來到這座古都的范本梁。

3. 范本梁與無政府主義者的交往

范本梁抵京之後，隨後即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旁聽。⁴³此後他的人際關係更有脈絡可循，交往範圍也較廣。他參與了北京台灣青年會的活動，也接觸了著名無政府主義者、老同盟會員景梅九（1882-1961，無論是日文本或中譯本《台灣社會運動史》，均將「景梅九」誤為「梅景九」）。⁴⁴雖然北京當時仍在北洋政府治下，無政府主義的活動卻未嘗稍減。當時由景梅九所主持的北京《國風日報》及其副刊「學匯」，就被無政府主義者視為「北京最堅硬的輿論界代表，亦國內同志互通消息、發表言論的總機關」。⁴⁵

除了報紙之外，景梅九還領導著《台灣社會運動史》稱為「北京安社」的無政府主義組織。《台灣社會運動史》認為「北京安社」與范本梁有密切關係。雖

⁴² 許地山（1930）。

⁴³ 范本梁旁聽於北京大學一事，北京大學方面尚無史料可以耆考。當時北京台灣青年會已為台灣學生爭取到以華僑身份入學的資格，也爭取到旁聽生的資格。據規定，旁聽生要繳小額學費，但不得改為正科生，而且只能自稱「北京大學旁聽生」，不得稱為「北京大學學生」（許地山，1922：8）。

⁴⁴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b：876；1989d：3）。范本梁在北京的活動並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244）。

⁴⁵ 春雷（1923a）。

然「北京安社」是個從「名」到「實」都還弄不清楚的組織，⁴⁶但若以景梅九作為追索的主線，並以此考察圍繞其身邊而建立起來的組織，大概還是可以進行推測的。1922年11月至翌年1月，滯留於中國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山鹿泰治（1892-1970），曾與范本梁（以「一洗」之名）以外國人代表的身份，共同出席景梅九所主持的「北京無政府主義者連〔聯〕盟（北京 AF）」會議。⁴⁷如果「北京 AF」就是「北京安社」，《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記載的范本梁與「北京安社」的關係便能得到證實。

但就算不能證實，范本梁與景梅九等無政府主義者的交往也能得到說明，而且，包括范本梁在內的東亞無政府主義者集結於北京、匯聚在中國的盛況，亦能由此窺見。也許這一盛況才是最值得注意的現象。朝鮮獨立運動者李又觀（李丁奎，1897-1984⁴⁸）當時正在北京。其自作年譜記載云：⁴⁹

1922年（26歲），與友堂李會榮、丹齋申采浩、北京師大教授魯迅兄弟（周樹人、周作人、周建人）、俄國盲詩人瓦西里、愛羅先珂、台灣革命同志范本梁等郊〔交〕遊。

在北京，范本梁還接待過著名朝鮮無政府主義革命家柳子明（1894-1985）。柳子明回憶云：⁵⁰

{ 1923年關東大地震之後， } 那一次我與丹齋先生 { 申采浩，1880-1936 } 來往的時間較長。同時和台灣朋友范本梁、林炳文等交

⁴⁶ 關於北京安社是否存在的問題，分析如下。據當時北京政府的情報顯示，1922年3月18日，無政府主義者曾於平民學校（西城翊教寺街）內開會，討論設立「北京安社」。並在6月5日的內部集會中散發〈安社社約〉，且有俄、日、朝等國的社會主義者出席。然而「北京安社」之名似非公開的或被確定的名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91b: 710-712）。雖然《台灣社會運動史》直呼之「北京安社」，但無論當時的無政府主義者或後世的學者，以「安社」稱呼北京這一組織者不多。本研究目前僅知朝鮮無政府主義者「柳絮」（柳樹人，1905-1980）曾於1926年明確寫下「世界語問題（北京安社）」的字句（柳絮〔柳樹人〕，1984: 719）。但現代的無政府主義研究則常把景梅九的組織稱為「學匯社」，也許正是「北京安社」。1924年5月1日發行的《春雷》有消息云，「北京同志，組織一世界語俱樂部，於世界語專門學校內」（春雷，1923b）。倘若「北京安社」已然存在，為何還需要一個世界語俱樂部？尤其此時的無政府主義者刊物時常毫無避諱地刊載各地的「同志消息」，闕漏「北京安社」的動向就格外奇怪。就筆者所能讀到的同時期無政府主義刊物來說（如《春雷》、《驚蟄》），最多也只提到《學匯》，未曾提到有個「安社」的組織。

⁴⁷ 向井孝（1974: 87-88, 221）。

⁴⁸ 金良守（2004: 73）。

⁴⁹ 《又觀文存·年譜》，三和印刷所1974年版，轉引自金時俊（2005: 53）。

⁵⁰ 柳子明（1987: 1370）。

往。由於台灣朋友的介紹，我寄住在「泉州會館」裡。

誠如朝鮮共產主義者金山對於這時期北京的記載，「那時候（1919-1923），在北京有 800 名朝鮮民族主義者，其中包括 300 名學生。」⁵¹在北京為數不多的朝鮮人竟然出版七份雜誌，這在任何少數民族中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⁵¹但上海也是朝鮮革命者的聚集之地，范本梁曾在上海與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成員四處奔走，此時是 1924 年。⁵²謝雪紅（1901-1970）云：⁵³

當時，我認識的青年還有……范一錢（台南人，原名范本良〔梁〕），後來信仰無政府主義，被捕過。當時他很活躍，和朝鮮人頻繁來往……

當時聽說朝鮮人在法租界組織一個「臨時政府」，可能因我是女的比較突出，一些朝鮮人和范一錢常來爭取我，勸我到租界去看他們臨時政府的要人。我因感到自己沒有文化，又不懂政治而不敢去，所以始終沒去看過他們。

……

當天（1924.6.17「恥政紀念日」⁵⁴）集會參加者只有我一個是女的，那時還沒有台灣女青年到上海唸書，也沒有台灣婦女出來參加社會活動，因此，平時范一錢等就稱我一點紅。當晚，范等推我上台講話……

更重要的，則是范本梁與可思母俱樂部的舊成員羅任一的交往，不過兩者的交往目前僅有日本的情報資料可以證實。⁵⁵羅任一，四川省資中縣球溪河村

⁵¹ 尼姆·威爾士與金山（1993: 90）。

⁵² 張深切曾於 1924 年至上海並與范本梁有密切的交往，可知范本梁至少此時確於上海（張深切，1998: 248）。

⁵³ 謝雪紅（2004: 153-155）。

⁵⁴ 雖然謝雪紅（2004: 151-166）描述此段史實的時間是 1923 年，但她對於時間的回憶其實非常有問題。在她的回憶裡，她於 1923 年 4、5 月間從台灣轉日本而至上海，並於同年 8 月中回台灣。當謝再次前往上海時，已是 1925 年 4 月間。1924 年的回憶可謂一片空白。謝雪紅回憶，1923 年，她首次赴上海時，便在船上初識林木順、李友邦。到上海之後，則認識范本梁，並曾參與范本梁等人在 6 月 17 日的「恥政紀念日」紀念會上發言，地點在「商務印書館」的「國語講習所」。但是，據陳芳明（1998: 52）所得林木順學籍資料，他在 1924 年 3 月 19 日才從台北師範學校退學。據聞這年夏天因與李友邦等人襲擊台北新起街派出所才逃往大陸（嚴秀峰，1995: 616）。此外，在《台灣社會運動史》的紀錄（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87-88, 91）與張深切（1998: 248-249）的回憶裡，謝雪紅確實曾在上海的「6.17」紀念會發言，但卻是 1924 年，地點則是務本專校。由於務本專校與商務印書館均處寶山路上，有可能謝雪紅因此記錯。綜合上述材料，謝雪紅首次赴上海的時間應是 1924 年，否則就是她曾在 1924 年二赴上海，只是她自己忘了（唯此事可能性較低）。

⁵⁵ 外務省記錄（1926c）。

人，他是前述謝晉青的同志，1917年赴日留學，1921或1923年回國。⁵⁶羅任一的重要性首先有兩點：

第一點是可思母俱樂部建立起的跨地域連帶的再浮現。在日期間，羅任一曾與謝晉青共同參與了可思母俱樂部的活動，可能還包括「日本社會主義同盟」。⁵⁷羅任一與謝晉青有很密切的交往，兩人在東京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庇護下，共同創辦了書報社與通信社，前者代售國內進步刊物，後者則將日本社會運動消息大量傳回中國。雖然不能說范本梁與謝、羅兩人在可思母俱樂部時期即相識，然而可思母俱樂部所建立起的跨地域人際網絡，顯然不可小覷。

第二點則是羅任一所懷抱的「A」「B」合作之主張。如前所述，中共創黨黨員施存統被日本警視廳拘留時曾提到羅任一與謝晉青是無政府主義者，但認為他們的無政府主義「與大杉榮派稍異」。雖然施存統並未說明「稍異」為何，但前面提到的「A」「B」合作是個可供推測的方向。羅任一初抵日本之時曾與旅日無政府主義者共組無政府主義社團，但他們兼讀兩種主義的書籍；⁵⁸此外，當時羅任一的翻譯作品也兼具「A」（如大杉榮）「B」（如山川均）兩派文獻；⁵⁹甚至，當時謝晉青讚許可思母俱樂部所實現的日本兩派人物的集合時，羅任一則進而盼望國內的「A」「B」兩派能「以一致進行」作為「今後的方針」。⁶⁰

史料上，范本梁本人始終並未展現出「A」「B」合作的傾向。但在「B」派聲勢日漸高漲於全東亞的總形勢下，范、羅兩人面對「B」派所做出的不同選擇，宛如互相驗證的對照組。而范本梁所需面對的考驗，就是一條沒有「B」派的「A」派道路。

⁵⁶ 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岩佐作太郎，曾引羅豁為友人與同志，並云之1921年6月歸國（松尾尊兌，2000: 32）。至於1923年的記載，則可見葉博夫（1989: 135）、李銀耕（1991: 23）。

⁵⁷ 葉博夫（1989: 135）曾指出羅任一為「社會主義同盟」的盟員，至於是否為「日本社會主義同盟」，則未明言。

⁵⁸ 無政府主義者張景（1983: 117）云：「一九二〇年我們住的宿舍裡來了一個四川學生羅豁，帶來了一些新出版的小冊子，有《克魯泡特金思想文集》、《共產黨宣言》、意大利安那其主義者馬拉特斯泰的《兩個工人的談話》、劇本《夜未央》及《互助論》、《麵包略取》等，分送給同住的一些人閱讀。大家熱情地閱讀，興奮地討論，特別是讀克氏的《告青年》一文和《夜未央》劇本，受了不小的激發，都決心要參加改造舊社會建設理想的新社會運動，這樣就有六七人成為小團體，命名為『光社』，『就以安那其主義為『光社』的主義』，『這樣不到半年就各自分散了，羅回國後沒有消息。』

⁵⁹ 主要是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以及北京《國風日報》副刊《學匯》。

⁶⁰ 羅豁（羅任一）（1921: 4）。

總之，范本梁與群集中國的東亞各地無政府主義者（特別是朝鮮無政府主義者）有很深的交往。雖然這些記載首先體現的只是范本梁之個人「活動」，但若考慮到這些活動包括了他與景梅九、林炳文、羅任一、柳子明、李又觀、山鹿泰治等東亞無政府主義者的跨國籍、跨國界交往，那末范本梁的個人「活動」也可被視為**東亞**無政府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及體現。但若問題的焦點集中在**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本身的起源與形成，無論無政府主義者本身的反組織傾向如何，「組織」產生與否——而非個人活動或人際圈——便成為一個可供考察的切入點。而范本梁為了堅持「A」派本色而遭遇的困境，也是在推動組織工作的過程中才出現的。以下的研究，就從范本梁所組織的無政府主義社團來展開討論。許地山也將再次轉回研究的視線之中。

第二節、難獲「共鳴」：長期獨行的范本梁

1. 「新台灣社」的結成：范本梁與許地山的合作

1923年2月1日，一摺從北京寄往廈門的傳單《新台灣創刊的宣言》被廈門當地的日本領事館所查獲。這是一份創刊宣言書。⁶¹這份刊物由「贊堃」（許地山）發行、「一洗」（范本梁）編輯，並由「之民」（身分不明）會計。通信者與通信處，均賴當時仍在燕京大學的許地山轉交。⁶²這份傳單非常重要。因為，如果僅從《台灣社會運動史》這樣的經典史料出發，對於范本梁及其組織的認識必然只能停留在1924年以及「新台灣安社」。然而這份傳單不但將范本梁的組織活動整整向前推進了一年，還證實了許地山與他的合作關係，更說明了「新台

⁶¹ 即：新台灣社（1923）。《台灣社會運動史》（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 3）所提到的「宣言書」或即此文。

⁶² 關於通信者與通信處，載云：「北京崇文門內，燕京大學第一院。贊堃氏轉交。」（新台灣社，1923）贊堃即許地山。

灣安社」有一個叫做「新台灣社」的前身。當時的范本梁並未直接打出「無政府主義」（乃至音譯的「安那其主義」）旗號，而是以「新台灣主義」代稱其主張。但從他將「道德啊，習慣呀，風俗呀，婚姻呀，家庭呀，宗教呀，國家和強權呀，私有財產制度呀，奴隸和傭工制度呀」這些「不自然的」事物平列為「新台灣主義」所要打倒的對象來看，「新台灣主義」實際就是無政府主義。

雖然目前無法確知許地山認識范本梁的時間，卻絕非《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記載的 1924 年。⁶³又由於許地山在 1923 年 8 月便離華赴美，⁶⁴因此范本梁與許地山的合作顯然非常短暫。范、許兩人的短暫合作，恰恰是范本梁日後一切活動的縮影。當時的日本情報檔案（包括《台灣社會運動史》）顯示范本梁的人際關係破碎而不連續（見表 3-1），如有任何合作也只能是短暫的。這種合作上的短暫性，反映其組織工作的困境。《台灣社會運動史》對此困境有兩點論斷：一是范本梁的個性不易與人相處，二是「A」「B」兩種「主義」開始分化。⁶⁵而本研究還可補充第三點，即人與人之間在地域上的交會與錯別。關於第一點，他的好友張深切有如下描述：⁶⁶

范本梁是一個過激的安那其主義者，一動嘴就是提倡革命、暴動、打手槍、擲炸彈。他專程從北京到上海來鼓舞革命運動。一到上海，就來投宿我們（上海台灣青年會）青年會館，平時他多在外面，到處訪問同鄉青年學生，從事遊說；主張無政府主義，攻擊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其話術的巧妙，我還未見過有人出其右者，他能使人聽他的話，通宵達旦而不感覺厭倦。他的談話，比聽故事或看電影還要有趣。可是他始終未能獲得一個同志的支持，畢竟他的革命理論，雖然能叫人同感，手段和方法，卻難能叫人共鳴，尤其他的生活過於浪漫，過於荒唐，沒法子使人心服。

後面還將繼續提及第一點。第二、第三點則可從《台灣社會運動史》所特別注意的台灣社會主義者——北京的謝廉清（1903-1961）與長春的謝文

⁶³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 3）。

⁶⁴ 周俟松與杜汝森（1989: 481）。

⁶⁵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b: 876; 1989d: 3-4）。

⁶⁶ 張深切（1998: 256, 262）。

達（1901-1983）——來考察。

謝廉清，彰化人。1923年5月進入北京朝陽大學預科，曾於同年10月前往上海參與上海台灣青年會的成立。⁶⁷謝廉清當時的筆名（「虛無」、「廉清虛無」）顯示他有「虛無主義」傾向。然而他所主張的「廢姓」卻是當時無政府主義的常見口號：⁶⁸

有一天一位兄弟問我。「尊姓」{，}我聽著很不爽快。再問我「貴處是那〔哪〕一省。」那就越不爽快了。對了。現在的中國，群雄割據，不能統一。或者這也是其中一部份地原因。還是朝鮮、台灣、和日本的關係不能解決者，也是因為大家，還有這樣十三四世紀底封建思想，所以致成了問題的。大家請想一想。

……

這個「姓」本來是用於區別家庭的（Family name）{，}既然，現代認定社會是家族的延長和擴張底，那就沒有，帶差別性的「姓」地存在了。當然要消滅。至於國境和民族的偏見，自然也要付之水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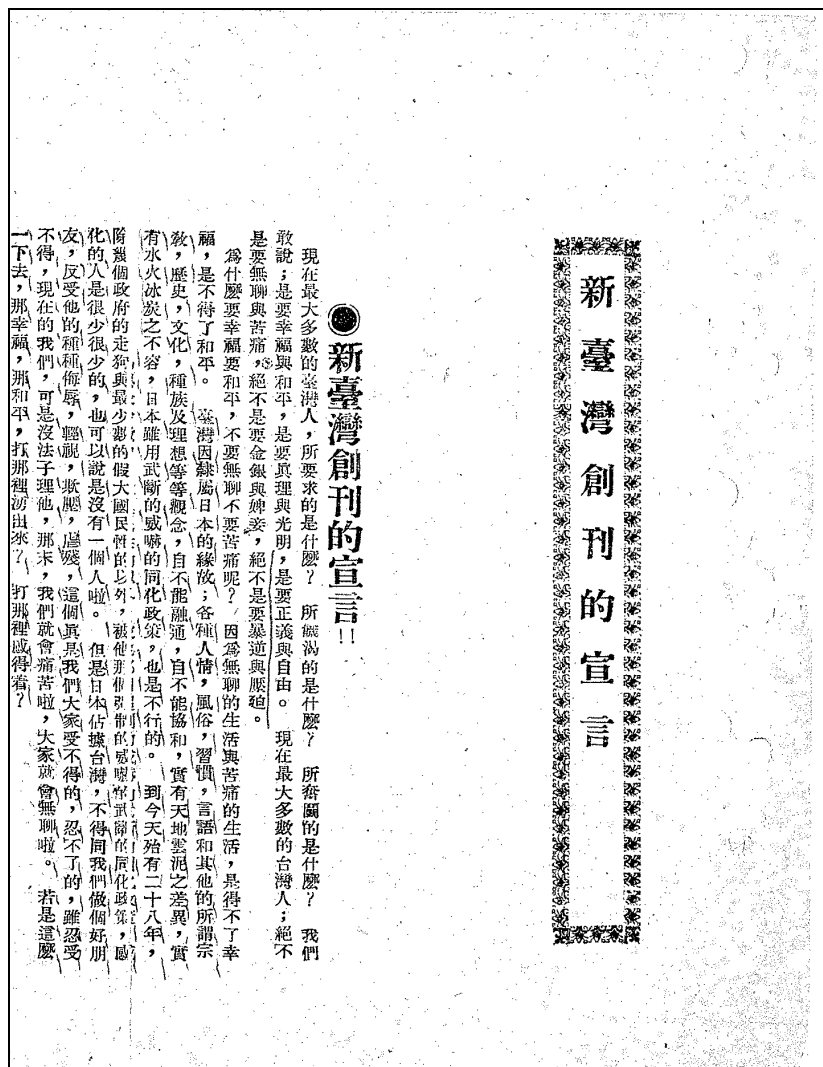
謝廉清的筆名與主張反映了當時中國無政府主義與「虛無主義」的常見結合（或混淆），⁶⁹也可能反映他受到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史料還不足以提供進一步的推斷。不過謝廉清那種希望同時撇開一切姓氏及地域標籤的根本原因，也不只是「虛無」而已。身處故國古都卻無法說出故鄉是「哪一省」，對於殖民地青年來說不曉得是多大的無奈。

⁶⁷ 謝廉清的生平詳見本研究第七章。

⁶⁸ 北京廉清虛無（謝廉清）（1924）。

⁶⁹ 所謂「虛無」，是當時俄國民粹派（「虛無黨」）的中文常用譯語，但因無政府主義之傳入東方，自始就以民粹派思想為媒介，於是「虛無」一詞也常混同於「安那其」（Dirlik, 2006: 59; 鄭學稼, 1980: 70）。

圖 3-3：1923 年《新臺灣創刊的宣言》影像（局部）



這份宣傳品由許地山與范本梁於 1923 年初發行於北京，為單張雙面印刷品，對折為摺子。上圖中線由上而下，正是一個對折處。

作為台灣第一個飛行家的謝文達當時也確實左傾。1923年6月，謝文達在長春以公開信宣稱「今將為無產者而活動」而宣告退出飛行事業。同年底轉赴日本，拜訪並參與了東京的《台灣民報》社的編輯工作；直到1924年5月25日才「退社回長春」。在此期間，謝文達參與發起島內的社會主義研究組織：「社會問題研究會」。⁷⁰但目前無法判斷他對無政府主義的態度。

《台灣社會運動史》認為，「當時僑居北京的台灣人大部分與謝廉清、謝文達一樣傾向於共產主義」，⁷¹所以范本梁的活動很少得到支持。謝廉清確實傾向於共產主義。他不但加入中共、還與當時在北京活動的「異端」共產黨「今日派」合作。⁷²但從謝廉清曾經具有的「虛無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傾向來看，「傾向於共產主義」應被視為並存或較晚的事情，或至少應當認為謝廉清兼具這兩種傾向。如果謝廉清真如《台灣社會運動史》所云協助范本梁發行《新台灣》，⁷³便更能證實上述推測。此外，從上述分析可知，無論是謝廉清、謝文達，並非始終與范本梁處於同一地域（狀況同許地山出國一樣），即便范本梁自己也從未只是呆在北京。如前所述，謝雪紅與張深切都證實范本梁曾前往上海。

2. 從「新台灣社」轉化為「新台灣安社」

1924年2月8日，范本梁在北京大學的「克魯泡特金逝世三週年公祭大會」發表以「大杉榮先生」為題的演說。⁷⁴自1923年范本梁發表〈新台灣創刊的宣言〉並宣告成立「新台灣社」以來，這是現知的首次公開活動。恰恰是在這一天，范本梁發表〈新台灣安社宣言〉，正式打出「新台灣安社」的旗號。在

⁷⁰ 以上詳細過程見本研究第二章注釋 40 的考證。

⁷¹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 3-4）。

⁷² 關於「今日派」，詳見本研究第六、第七章。

⁷³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 5）。

⁷⁴ 關於演講，上海《民國日報》僅記之「台灣人某君」（民國日報，1924e）。這次演講的內容後以〈追慕大杉榮先生（講稿）〉為題，發表於廣東無政府主義刊物《民鐘》（范一洗〔范本梁〕，1924）。關於〈新台灣安社宣言〉一文，《台灣社會運動史》自謂其譯文轉載於《新台灣》。〈宣言〉署名「新台灣安社」，署日期「世界語紀元三十八年二月八日」（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 6-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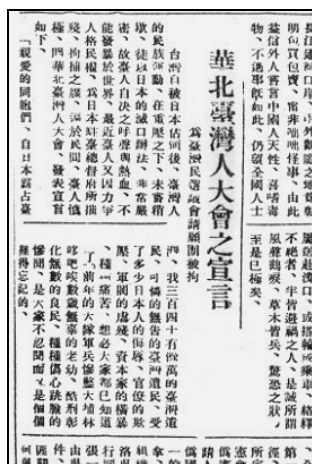
此之後，一些可能與范本梁有關的事情陸續發生；這些事情都緊密聯繫於 1923 年底發生的治警事件：

——首先是 1924 年新春四處散發的「謹迎新春」的反日明信片。⁷⁵透過明信片進行宣傳，乃是當時中日社會主義運動都曾用過的手段；⁷⁶然而這張明信片卻有替「治警事件」受難者伸冤仗義的意味。（全文考證版見本章附錄 1）

——其次則是據聞召開於 1924 年 3 月 5 日的「華北臺灣人大會」。大會發表了一篇反對治警事件的文件：〈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為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被拘〉（全文考證版見本章附錄 2）。「華北臺灣人大會」對於請願運動及其參與者的支持與肯定是此文最值得注意之處。大會決議「用實力支援貧弱稚嫩的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及其期成同盟，務使諸位先鋒能夠進行激烈的**以暴抗暴**的大眾運動。並和他們協力」。⁷⁷

張深切推測這兩篇文獻俱出於范本梁之手。⁷⁸這一推測值得參考。此後不

圖 3-4：〈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



1924 年 3 月 25 日上海《民國日報》

⁷⁵ 《台灣社會運動史》將此明信片記為 1923 年的賀年片（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119），誤。實際上是 1924 年。此由明信片所簽署的年份「甲子年正月元旦」（甲子年即 1924 年）便知。另外，由於這張明信片的中文原文被轉載於 1924 年 1 月 22 日的上海《民國日報》（許天民，1924），亦可據此推知此信實為抗議治警事件而發，不可能是 1923 年。

⁷⁶ 瞿秋白（1982: 167）指出，中共在 1921 年 12 月至翌年 5 月間做了四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新年運動（拜年帖的運動）」。陳獨秀（1981: 2）詳述云：「一九二二年正月一日，上海共產黨全部黨員及中國朝鮮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一百餘人、工人五十人，上午分散『賀年帖』（內載鼓吹共產主義的歌）六萬張於上海市內。……結果一朝鮮青年因散『賀年帖』在法租界被捕。」此外，日本在 1922 年 1 月 1 日也出現署名「日本在鄉軍人革命團本部」向軍隊散發題名「謹賀新年」的社會主義宣傳物（內務省警保局，1923a）。這些行動顯示出一種跨國界的運動性。

⁷⁷ 本文不少過激字句在當時的報刊上都刪去。也許這是因為這篇要求「打破一切不自然的制度」並號召「共同推翻一切強權」的文章明確揭示了反資本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目標並抨擊台灣的總督府與大陸上的軍閥政治。

⁷⁸ 就「謹迎新春」而言，從其「純鳴者同人」的署名來看，可能與筆名「能鳴者」的范本梁關係

久，范本梁正式以「新台灣安社」發行機關誌《新台灣》創刊號，史料記載這天是4月15日。《台灣社會運動史》云，「新台灣安社終於合流於當時存在於北京猛〔孟〕端胡同世界語專門學校內的北京安社，在北京安社出版的宣傳刊物中設《新台灣》做為活動的開始。以後，范本梁停止學業專門從事新台灣安社的宣傳活動。」⁷⁹

雖然范本梁更加公開進行宣傳活動，但主義上的分化與范本梁同其友人之間的錯別，卻導致《新台灣》始終只能是《台灣社會運動史》眼中「幾乎由范本梁一人撰述」⁸⁰的刊物。更正確地說，《新台灣》始終只是大量轉載外稿的刊物。以《新台灣》第2號（1924.12.5）來說——如表3-2的考證——多數文章都是外稿，所轉文章底時間跨度也長。改成報紙型態後的第3號（1926.3.1）有較多專稿，但外稿仍多，連發表於1907年的文章也收錄其中。

雖然需要更大規模的統計，才能說明外稿的大量轉載是否為當時無政府主義刊物所共有的特色。但《新台灣》的例子至少顯示出：（1）《新台灣》的筆陣可能很薄弱、甚至可能只有一人。（2）雖然范本梁所大量轉載的論文乃是東西方無政府主義的名篇（從而看得出范本梁的揀擇能力），然而范本梁在理論上的無力卻也足以見之。值得注意的是，在范本梁所轉載的《實社自由錄》是現知最早關心臺灣革命問題的無政府主義刊物。一個叫「M. Huang」的作者曾號召聯合朝鮮與台灣的志士，「一方謀補助其國民之教育知識，使其有革命之思想。一方而鼓動民氣，實行暗殺，起風潮」。⁸¹

據說《新台灣》的「印刷和北京安社的機關報一起委託北京大學出版部，每號刊行五百份左右，向僑居北京的留學生們、廈門、東京、島內密送分發。」⁸² 范本梁曾刻意將刊物寄給一些具有激進傾向的台灣人（比方程水源⁸³）；也寄給

不淺。〈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為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被拘〉的文風、層出的排比句型，以及不斷出現的關鍵字（如「趣味」、「自然」）范本梁的寫作風格相同。

⁷⁹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b: 876; 1989d: 3-4）。按引文中的「猛端胡同」實乃「孟端胡同」之誤，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在北京西城孟端胡同三十九號（壽田，1924: 3）。

⁸⁰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 5）。

⁸¹ M. Huang, 〈暴動罷工革命〉，《實社自由錄》，第2集（1918.5）。轉引自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1979b: 219）。

⁸²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 5）。

⁸³ 程水源（生卒年不詳），又名陳幸西，台中州彰化郡彰化街人，曾居留於廈門，被日本情報單位視為對於政治思想與時事有「粗暴矯激」者（外務省記錄，1923）。謝雪紅（2004: 216）指出其

大陸上一些作為地方有力者的台灣「籍民」(然而這些有力者竟拿著《新台灣》去當地日本領事館檢舉);⁸⁴甚至范本梁還強迫好友張深切把大量刊物帶回台灣(卻在海關遭到沒收)。⁸⁵總之,收到這份刊物的各地台灣人,並不盡然認同范本梁的主張。然而范本梁仍以著強烈的個人色彩進行他的活動。他力求糾集同志、力圖宣傳主義、力謀壯大組織,從而產生一條到他被捕於1926年為止的活動軌跡。⁸⁶

3. 從勉力維持到返台被捕

「新台灣社」從而「新台灣安社」所形成的軌跡體現了個人活動向組織運動努力轉化的歷程。雖然迄今仍難評價其轉化是否成功,但若相比於台灣人在大陸所組建的其它無政府主義小團體,則此歷程之**持續性**顯得格外突出。1923年出現的北京「韓台革命同志會」就是曇花一現的小組織。洪炎秋(1866-1929)回憶,這個組織由朝鮮與台灣青年所成立。洪炎秋並未稱之為無政府主義的團體,卻指出該會的朝鮮成員均熱中於「暴動、暗殺」,就此來看,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不能排除。雖然洪炎秋強調台籍成員(張鐘鈴、洪炎秋、楊克培等)因消極抵制上述傾向而致組織走上消亡,⁸⁷卻不能把這種抵制簡單看作無政府主義與非無政府主義之間的對抗。因為張鐘鈴(張鳴、張驚聲)正是日本情報機關明確認定的無政府主義者。⁸⁸總之,組織內部的矛盾也許另有所因,但其速起速滅卻是

可能在抗戰中前往蘇聯留學。

⁸⁴ 外務省記錄(1926a)。

⁸⁵ 范本梁之所以要張深切幫他這個忙,是為了追求蔡阿信(1899-1989),但蔡阿信不但不理他,還與彭華英結婚(張深切,1998: 268-270)。

⁸⁶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 4, 10)。

⁸⁷ 洪炎秋(2004: 序言頁4-5)。

⁸⁸ 洪炎秋指出,這個組織的結成,源自於當時就讀於「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的張鐘鈴與朝鮮青年的交往。(洪炎秋,2004: 序言頁4-5)由於這所學校實開學於同年9月11日,因此「同志會」的結成也許應晚於此。謝雪紅(2004: 154)指出:「1923年間,楊克培、游錦順(彰化市仔尾人等)在北京和幾個朝鮮人共同組織一個『韓台協會』,作為台灣人和朝鮮人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的相互支持和聯繫的團體。」前述「同志會」之朝鮮青年的「暴動、暗殺」主張,頗似無政府主義者才會有的不穩行動;但洪炎秋並未說明他們(乃至張鐘鈴等台生)是否確有此種「主義」上的意識。在日本情報單位的眼光裡,張鐘鈴等人都是無政府主義者,並云北京的台灣青年曾在1923

不爭的事實。

范本梁得憑一己之力而持續進行活動的動力何在？「他有怪癖，不和人家取同一步驟，主張個人行動，自作自受，不願意累及別人，所以他的隱密少有人知道。」⁸⁹雖然范本梁未必爭取到更多的同志，但當台灣社會主義者於 1924 年另外組建「平社」於上海時，卻有成員認為當時的台灣社會運動「除開無政府主義少數幾個人而外，要算議會運動頂興盛。」⁹⁰這種評價顯示出：在「B」派勢力日漸壯大於全東亞的情況下，走純粹「A」派道路的范本梁雖然無法達到議會請願運動的規模，卻仍是其他台灣激進份子眼前的一股勢力。雖然不能肯定范本梁離京返台之前是否較好地實現其組織工作，但在無政府主義所形成的跨地域連帶的過程中，范本梁至少留下了自己的足跡。

1926 年發行的《新台灣》第 3 期曾宣稱新台灣安社進行改組。其中有署名的發起人（俱化名）有五人，但宣稱總計十八人（此外，還有六人捐款的名錄，但無法確認與前十八人的關係）。改組的成效究竟如何，無法推測。但《新台灣》過多的轉載稿件卻提示著絕對不能忽視《台灣社會運動史》關於范本梁始終處於一人組織、一人刊物的論斷。實際上，由於旋即丕變的北京政局壓縮了在京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空間，范本梁遂被迫離京。⁹¹范本梁於 1926 年 7 月秘密歸台，並於同月 15 日遭到被捕。⁹²設若范本梁確實組成了一個少則五人，多則十八人的組織，北京的白色恐怖或其個人的被捕，是否能輕易地造成組織的潰滅？或者范本梁的個人活動其實始終難以形成組織運動？

無論如何，島外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至此暫告段落。雖然范本梁的活動可以從 1923 下探至 1926 年，現有的史料卻無法說明島內的無政府主義運動起源與范本梁之間有否直接關係。1926 年，「台灣黑色青年聯盟」成立，這是島內第一個無政府主義組織。范本梁的被捕以及島內無政府主義者的崛起，交錯而生，這就是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的 1926 年。

年 9 月 9 日，與「中韓互助社」的朝鮮人共組「九九社」（外務省記錄，1925d）。「九九社」是否就是「韓台革命同志會」？值得探究。關於中韓互助社，可見本研究第四章的討論。

⁸⁹ 張深切（1998: 266）。

⁹⁰ 貞（1924: 4）。

⁹¹ 就日本內部的情報資料來看，1926 年 1 月，范本梁曾一度行蹤不明，4 月時據說在台中出現（外務省記錄，1925d）。

⁹²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 1, 4, 10）。

第三節、結論

1. 重新檢視黃玉齋《台灣革命史》

范本梁絕非白白走過。黃玉齋的《台灣革命史》恰恰說明了范本梁的足跡如何難以磨滅。黃玉齋將台灣革命分為三期。最近的第三期，就屬於今日習見意義上的「台灣社會運動史」。由於第三期正是黃玉齋直接身處的時代，因此他有一定的條件去運用他所取得的各種運動材料來分析第三期的革命運動（第十八、十九章）。直接引用到材料原文的部份，除了文協系統的刊物（如《台灣青年》、《台灣民報》）之外，也引用到今已不存的《新台灣》創刊號。⁹³其中，引用最多的一份刊物叫做《台灣新青年》，達三次。⁹⁴這是廈門「中國台灣新青年社」所刊行的機關刊物，發行於1925年6月。

黃玉齋所引的這些原文，迄今看來有幾個重大意義。首先，這是一種史料保存。若與收羅並日譯所有史料的《台灣社會運動史》相比，即便《台灣革命史》只擷取若干史料的片段，卻足使後人窺見其原文面貌。其次，顯然黃玉齋當年是能取得這些原始材料的。但他是基於什麼條件而取得呢？是不是他與這些組織或個人有什麼聯繫呢？其三，黃玉齋顯然也知道當時存在過《平平旬刊》或「台灣同志會」⁹⁵之類的刊物或組織，但他為什麼沒有引用，甚至沒有將之歸類？是不是對他來說，這些刊物或組織只是耳聞？

⁹³ 《新台灣》創刊號保存於《台灣革命史》的部分只有片段的〈新台灣安社宣言〉，這份文獻目前只見《台灣社會運動史》中的日譯全文。關於〈新台灣安社宣言〉殘文可見漢人（黃玉齋）（1926: 131-132）。

⁹⁴ 分別是毛常（1925: 137）、仲農（1925: 126）、愛智（1925: 156-157）。

⁹⁵ 關於台灣同志會，可見表4-7: 04的考證。

圖 3-5：1924 年《新台灣》第二號封面



《新台灣》由范本梁編輯，本號為雜誌形式。封面上書世界語「LA NOVA FORMOSO」，即《新台灣》之意。

圖 3-6：1926 年《新台灣》第三號封面



這份刊物從本期開始改為報紙。

黃玉齋這本書，由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朱謙之（1899-1972）校訂，並予序言。⁹⁶雖然不能直接從這個線索斷定黃玉齋對於無政府主義有任何偏好（比方黃玉齋為何特別突出新台灣安社的無政府主義活動），然而朱謙之與台灣之間的關係斷非萍水相逢。1925年4月12日，朱謙之應邀至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演講。登載這篇演講辭的刊物，恰恰是《台灣新青年》。⁹⁷《台灣新青年》是個什麼主義都混雜一通的集合。⁹⁸從作者的筆名就可見其端倪（如「〔馬〕克思」，「〔安〕那其」，見表3-3）。一篇題為〈台灣政府貫連資本家榨取民利之要聞〉的文章，甚至出現極為類同於新台灣安社〈實行部的宣言〉的段落，⁹⁹並在文章最末呼籲：¹⁰⁰

我敢說咱留閩的台灣青年一天快一天緊打倒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可實行無政府於台灣啦，……

1926年的《台灣革命史》，保存了1925年《台灣新青年》及1924年《新台灣》的殘文；1925年《台灣新青年》，似又保存了1924年《新台灣》的遺跡。雖然這不是范本梁所能預想的道路，卻是其無政府主義活動的見證。

⁹⁶ 朱謙之（1926）。

⁹⁷ 朱謙之（1925: 11-15）。

⁹⁸ 有的作者，一邊歌頌列寧主義，另一邊則主張無政府主義式的暗殺暴動（鏡童，1925）。有的作者擁護文化協會（克思，1925；那其，1925b）。有的作者主張返回祖國加入國民革命（仲農，1925）。總的來看，無政府主義比較突出。除了朱謙之的演說詞以外，有的作者則展現出當時無政府主義的復古「國粹」傾向，大談老子與「新老子」，用以古諷今的方式批評辜顯榮，並期待一個小國寡民的世界（愛智，1925）。

⁹⁹ 那其（1925a: 21）：「我再說吾台的納稅看有極點還未極點大家評罷了，土地稅、地基稅、自治稅、街庄稅、手車稅、所得稅、自轉車稅、保甲稅、蓄妾稅、戶口稅、遊興稅、衛生稅、市場稅、煙酒稅、家屋稅、奢侈稅、營業稅、人頭稅、等是一小部分，若論稅屈指也不會完的啦！」新台灣安社〈實行部的宣言〉則云：「他們日本強盜就帶〔帶〕著刀背著銃，提了砲彈用了法律，來命令我們給牠納什麼土地稅，什麼地基稅，什麼家屋稅，什麼戶口稅，什麼人頭稅，什麼家畜稅，什麼屠畜稅，什麼地方稅，什麼所得稅，什麼營業稅，什麼煙酒稅，什麼遊興稅，什麼奢侈稅，什麼蓄妾稅，什麼肥料稅，什麼種苗稅，什麼自治稅，什麼街庄稅，什麼保甲稅，什麼市場稅，什麼衛生稅，什麼清水溝稅，什麼塵埃糞稅，什麼手車稅，什麼自轉車稅，什麼牛馬羊稅，什麼豬狗鵝稅……等等。」（能俠者，1924: 1）。

¹⁰⁰ 那其（1925a: 21）。

2.也是城南舊事：北京無政府主義者跨國人際圈的後續

范本梁足跡的又一見證，則來自共產國際。1928年6月的一份報告裡提到：¹⁰¹

近來，事件接二連三地發生，……嘉義發生范本梁（Han-honryo）事件，此事並可聯繫到宣傳獨立的刊物《新台灣》的發行，……

引文顯然是指范本梁的被捕事件。這份報告中，唯一與無政府主義運動有關的部份，就是范本梁這段。雖然整份報告未將范本梁當成無政府主義者來探討，也從未討論島內是否有過這樣那樣的無政府主義運動。但范本梁留下了一個甚至記載於共產國際檔案之中的足跡。

就在上述報告提交共產國際的同年10月，日本共產黨領導人渡邊政之輔（1899-1928）在基隆港邊拒捕而亡，渡邊之赴台通常被認為是為聯絡台共而來。但此時前往台灣聯繫同志的社會主義者並不只共產主義者而已。同年更早的5月，朝鮮無政府主義者申采浩（申丹齋）就在基隆郵局領取匯款時被捕，與他同案被捕的還有4月28日在安東火車站被捕並轉押大連的北京國際郵局人員林炳文（台灣「竹南郡頭分庄頭分」人，時年二十三歲）。林炳文以「北京華北物產公司」所開具的偽造郵政匯款因在基隆、台中、台南、高雄陸續被發現，引起官方嚴重警戒，並招致他們被捕。申采浩與林炳文等人為了獲取活動經費而進行的上述活動被視為跨國性的「無政府主義東方聯盟」的一次行動。¹⁰²

這兩個人就是前述朝鮮無政府主義者柳子明與范本梁在北京無政府主義者人際圈內的關係人。申采浩是韓國獨立運動史上非常重要的革命家，此處先不贅述。最值得一提的是「竹南郡頭分庄頭分」出身的林炳文，他正是被知名作家林海音（1918-2001）稱為「彪叔」的小叔叔。當年林炳文追隨他的大哥林煥

¹⁰¹ “Formosa under the yoke of Japanese imperialism”（1928.6.31），收錄於 K. M. Терпцкий（2005: 267）。原文為英文。

¹⁰² 相關新聞可見台灣日日新報（1928a, b, c, d）。

文（1889-1931）而從家鄉竹南前往北京，進入郵局工作。林海音回憶：¹⁰³

他本是一個美滿的小家庭，但這時尪叔暗地裡和一些朝鮮人做抗日工作，朝鮮人的抗日，常以暴力方法，我聽母親說，他們的床下竟藏置炸彈。抗日固然很對，但是他們利用叔叔在郵局工作，匯錢方便，叔叔為了逃避父親的注意，就搬出虎坊橋的家，帶了妻兒到外面去住。出事的那次是他們叫叔叔帶款乘南滿鐵路。他們不肯自己去，因為過了鴨綠江就是朝鮮，容易被發現。年輕不更事的叔叔，可說是有勇而無智，到大連被日本人捉到，毒死在牢裡，父親去收屍，傷心生氣，回來不久也吐血病倒……叔叔真是一個反日的無名英雄，他死時還不到二十五歲。約在民國十五、六年。¹⁰⁴

林海音的女兒補充云：¹⁰⁵

心碎的尪孀，帶著年幼的獨子朝楨和年輕丈夫的骨灰回台灣。北平是她的傷心地，她自此再沒回去過。尪叔的死，在英子〔林海音〕無憂無慮的童年留下了陰影。考小學時，是尪叔牽著她的小手去的；第一次臨柳公權玄秘塔的字帖，是尪叔買給她的；是尪叔抓著她握毛筆的小手，一筆一筆教她寫。尪叔是那麼溫和親切，但他的照片登在日本報上，怎麼完全變了呢？他瞪著眼，兩手交胸，從沒見過他這麼兇的樣子，非常可怕，煥文先生看了痛哭起來。

范本梁並沒有參與上述的活動，他當時已在獄中。如果他知道當年北京的小圈子最終能成為跨地域的連帶，並追隨他的腳步而回到他的故鄉臺灣，將會怎麼想呢？

¹⁰³ 林海音（1984）。

¹⁰⁴ 林炳文的死亡時間可能還須斟酌。在一份無政府主義刊物《黑色青年》（不晚於1930年9月）中，曾有如下記事：「東方無政府主義者聯盟同志被害 本年四月十三日午後四時，大連地方法院，對兩個月前被補的同志下了以下的判決：李響〔弼〕鉉（死刑）李鏡云（無期徒刑）申采浩（徒刑十年）以外，林炳文、楊吉慶二同志尚在審訊〔訊〕中。」（《黑色青年》，1930）《黑色青年》刊行年份據刊物中所載〈中國黑色青年聯盟四川區為大杉、伊藤殉道七週年紀念宣言〉之簽署日期「1930.9.16」著錄。該刊為手寫本，無頁碼編號。

¹⁰⁵ 夏祖麗（2000: 40-41）。

3. 「思想武器同爭戰 死筆誰言遜死彈」

日本警特於 1931 年大舉取締台灣勞動互助社時，曾搜出了范本梁的《新台灣》。¹⁰⁶范本梁的腳步雖然艱難，其足跡卻如此難以抹滅。莫怪乎《台灣民報》將范本梁的被捕稱為「社會運動史上」的「四個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之一。¹⁰⁷稍晚於范本梁的社會主義者周合源（1903-1993）曾讀過一本《新台灣》，周合源說，「內容相當激烈，甚至暗示可以訴之於暗殺手段。」但我還是不太能贊同。覺得那種行為畢竟是得不償失。但也有些朋友相當共鳴。我們把這一類人民對權力者的暴力手段，叫做群眾恐怖，來和資產階級的白色恐怖分開。」¹⁰⁸

但在范本梁實現周合源所謂的「群眾恐怖」之前，「白色恐怖」就先將范本梁下獄了。獄中的他，留下「瑣言」曰：「夫余之獲禍而至於此，雖係言之不謹，而全失自由之身軀，然心意既無所愧於前人，則大覺廣大高明，毫無喪本然之象，猶若明鏡為醜婦之冤，設有受損被毀之災，固無自失其氣節之患也。」¹⁰⁹並賦詩云：¹¹⁰

立志男兒要克難 不千荊棘萬重山 思想武器同爭戰 死筆誰言遜死彈

「思想武器同爭戰 死筆誰言遜死彈」——這就是范本梁道路最瀟灑的注腳吧！

¹⁰⁶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 36-37）。

¹⁰⁷ 台灣民報（1927: 10）。

¹⁰⁸ 林書揚（1994）。

¹⁰⁹ 范本梁（1926）。

¹¹⁰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 4, 10）、張深切（1965: 208）。

附錄 1：〈謹迎新春〉明信片全文考證版

中文原文詳見：許天民，〈台灣人的賀年片〉，上海《民國日報》，1924年1月22日，第8版。文中以花括弧〔 〕圈起的字句，乃闕漏之處，此據《台灣社會運動史》所登載的日譯文補上。¹¹¹

《台灣社會運動史》將此明信片誤記為1923年的賀年片，¹¹²實際上卻是1924年。此由明信片所簽署的年份「甲子年正月元旦」（甲子年即1924年）便知。另外，這張明信片的中文原文也被轉載於1924年1月22日的上海《民國日報》，據此可推知此信實為抗議治警事件而發，不可能是1923年。轉載這張賀年片於《民國日報》的「許天民」，在收錄本文的〈台灣人的賀年片〉之開頭中說：「我的朋友台灣人 S 君。前日拿一張他給他們的同胞的賀年片給我看。我讀了那片上的文章。也頗為他所感動。現在就鈔在這裡給我們的文弱沉寂的青年們看一看。題為『謹迎新春』。詞云。」以下則接〈謹迎新春〉。

全文考證版如下：

同胞呵。我最敬愛的同胞呵。無聊的悲苦的嚴冬過去了。活潑的爛漫的新春開幕了。你們如何還是氣息奄奄貪睡作夢而不醒呢。樹間的蟲鳥都活潑地唱著自由之歌。自由自由。是吾儕之終局。然我輩必須灑血而爭鬥。野外的草花盡爛漫地說著和平之曲。和平和平。是大家之究極。然個個必須奮勇而前進。你們為何還不動。而甘心〔沉默〕於威嚇高壓之下呢。唉。同胞呵。我最傷心苦悶的同胞呵。數十年來被〔日本政府〕欺壓的同胞呵。〔備受帝國主義威嚇的〕我台灣諸同胞呵。無聊的悲苦的嚴冬已經過去了。活潑的爛漫的新春早就開了幕了。樹間的蟲鳥都活潑地跳著。野外的草花盡爛漫地笑著。萬物之靈長。華夏之遺民。焉何還不醒來呢。為何還不敢抬頭呢。

唉。唉。同胞呵。可憐的同胞呵。自由之光是何等美麗呵。和平之花是何等燦爛呵。我們情願與大家灑血流淚而為之奮鬥。

¹¹¹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b: 93-94）。

¹¹²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119）。

大家有血有淚的大家啊。

趕快起來奮鬥罷。大膽地併〔拼〕命地去奮鬥。奮鬥。奮鬥。奮鬥就是我們的生活。奮鬥愈猛烈。我們的人生是愈有趣味的。他們的快樂是無可倫比呀。我們不要徘徊不前咧。

活潑的爛漫的新春開了幕了。我們絕不要逡巡不進咧。

{ 甲子正月元旦 }

{ 純鳴者同人鞠躬 }

附錄 2：〈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 ——為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被拘〉全文考證版

中文原文詳見：〈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為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被拘〉，上海《民國日報》，1924年3月25日，第6版。文中以花括弧〔 〕圈起的字句，乃闕漏之處，此據《台灣社會運動史》所登載的日譯文補上。¹¹³「如狼似虎的警察」一句則據漢人，《台灣革命史》所載原漢文補上。¹¹⁴

《民國日報》的編者，在收錄本文的新聞開頭寫了一段補充說明：「台灣自被日本佔領後，台灣人的民族運動，在重壓之下，未嘗稍歇，徒以日本的滅口辦法，非常嚴密，故台人自決之聲與熱血，不能發暴於世界，最近台人又因力爭人格民權，為日本駐台總督府所摧殘，拘捕之牒，遍於民間，台人憤極，開華北台灣人大會，發表宣言如下。」以下則接〈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為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被拘〉全文。但其中有不少過激字句在當時的報刊上被刪去。還需注意一點，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的中譯本漏去「援助我們內政運動的台灣諸先鋒」一句。王詩琅的中譯本則完整譯出。

全文考證版如下：

親愛的同胞們，自日本霸佔台灣，我三百四十有餘萬的台灣遺民，可憐的無告的台灣遺民，受了多少日本人的侮辱，官僚的欺壓，軍閥的虐殘，資本家

¹¹³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b: 93-94）。

¹¹⁴ 漢人〔黃玉齋〕（1926: 123-124）。

的橫暴，種種痛苦，想必大家都已知道了，〔。〕

前年的大隊軍兵慘鑿〔殺〕大埔林哆吧唉〔啤〕數歲〔萬〕無辜的老幼，〔如狼似虎的警察〕酷刑彰化無數的良民，種種傷心跳膽的慘聞，是大家不忍聞而又是個個難得忘記的，〔。〕

又此次我們內政運動的先鋒們，為保持人格，擁護民權，尊重日本憲法第二十九條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權，而溫順地陳情於帝國議會，竟被總督府拘禁四十九名，起訴十四名，還有數百名被警官拷問，受警察無端的家宅搜索〔，以致人心不安，老幼徬徨街頭〕，同胞呀，有志的學生青年呀，你們看這慘無人道〔逆盡天理〕的日本總督府政治〔，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怪物〕，反來剝奪主人翁的自由來了〔，這誰能夠理解的到嗎〕，我們當主人翁的還能忍得嗎，〔同胞們！有血有淚的各界人士！趕快站起來團結吧！趕快驅逐這些殘暴無法的官僚吧！〕

諸位，我們最親愛的諸位，不願意壓迫掠奪殘虐，願意休戚相關的有為的諸位，總督專政，禍害台灣，到現在已達了極點了，政府暴虐〔，軍閥殘暴〕，警察橫行，財主恣志，禍害勞苦的民眾，到現在也達了極點了，做人應當享受的一切的自由，一切的幸福，一切的趣味，也都為他們所侵犯，也全為他們所掠奪，也盡為他們所霸佔了，〔。〕

這樣的蹂躪民權，霸佔一切的自由，掠奪一切的幸福，侵犯一切的趣味，慘無人道而無可申訴，不僅是這回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自身的問題，凡是台灣的遺民，凡是全球的被壓迫的弱少的勞苦的民眾，都應該奮起，都應該一齊奮起，做個很大的運動，一致反抗〔我們共同的仇敵政府——軍閥——資本家及其爪牙〕，援助我們內政運動的台灣諸先鋒，濟度我們全球的被壓迫的勞苦的人類同胞〔，這也正是為我們台灣同胞，為全世界同胞的生存與自由的，也是要剿滅我們的共同仇敵，解除我們共同的壓迫，追求我們人類共同幸福，以圖恢復我們作為人所應享有的一切權力。〕

〔全島的同胞們！有志氣的青年們！有血有淚的各界人士！〕

〔我們華北台灣人大會已全體決議，用實力支援貧弱稚嫩的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及其期成同盟，務使諸位先鋒能夠進行激烈的以暴抗暴的大眾運動。並和他們協力，向全世界暴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毒辣政治，同時聯合各地同志，共

同推翻一切強權，打破一切不自然的制度。}

{ 同胞們！有志氣的學生青年們！全島被壓迫悲苦的同胞們！ }

{ 起來！快起來！快起來奮鬥！各位一齊起來奮鬥。目前正是生死關頭，時間極為緊迫！ }

{ 華北台灣人大會 }

{ 世界語紀元三十八年三月五號 }

第四章、台灣社會主義 運動的首次組織化

引言、上海的兩個秘密集會：1921年7月

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1921年夏天的上海有著不尋常的意義。就在這年的7月下旬，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現中國共產主義者的政治集結。這次大會的召開是秘密的，當然也是不合法的。由於租界警察的破壞，與會的十幾名代表在開會期間被迫從城裡的秘密會場轉移到了浙江的嘉興，並在嘉興「南湖」水上的一艘小船上完成了這次大會。這次大會對於中共的重要性不在話下。但也恰恰是這次重要的大會在中共黨史上構成了一件長期懸案並成為反共者的一件話柄——因為竟沒有人（包括大會代表）能說清這次大會的開會日期。

這件懸案直到一九八〇年代才得到解決。關鍵竟是一場凶殺案。1921年7月30日晚，租界警察突然搜查中共的一大會場；31日凌晨，借居於上海「大東旅社」的一大代表陳公博（1892-1946）在同旅社中遭遇凶殺案。連續遭到兩件事情驚嚇的陳公博驚魂未定，馬上帶著新婚妻子離開上海。由於陳公博在「大東旅社」所遭遇的不凡經歷，史家們才得以透過當時的報紙核對出正確的大會召開時間。¹

就在陳公博逃出上海、離開大東旅社、拋下歷史性的「一大」不管之時。同樣的上海及同樣的大東旅社卻在同樣的31日進行著一個群集台灣、朝鮮、菲

¹ 關於這一考證的故事，可見石川禎浩（2006: 266-273）。

律賓、印度各弱小民族代表的秘密會議。這次會議，是為當時即將召開的「華盛頓會議」(1921.11.11-1922.2.6)而進行的對策集會，議題則是如何實現各殖民地弱小民族的獨立。據日本情報資料，會議至少在7月24日時就召開了(中共「一大」的召開則是23日)，台灣的參與者是著名民族主義者蔡惠如(1881-1929)以及原在日本留學的彭華英(1891-1968)。²

某種意義上，此時聚集了弱小民族份子與激進主義者的大東旅社正是東亞社會運動在上海的縮影。因為當時的上海是東亞各地激進份子的聚集地。蔡惠如從議會請願運動開始之後便奔走東北亞各地從事排日運動，並以上海為基地。³范本梁(1897-1945)曾大力讚揚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和田久太郎(1893-1928，見表3-2:03)當時也在上海。據日本情報，蔡惠如、彭華英等人曾作為「大阪一派的可思母俱樂部成員」而列席於和田於上海舉辦的宴席。⁴和田久太郎就是本研究前面曾提到的大阪無政府主義者組織中的一名。此外，以中國人及朝鮮人的親善合作為目的「中韓互助社」也於同年下半年正式成立。在該社舉辦於大東旅社的一次茶話會上，蔡惠如曾起而發言。當時的報紙記云：「又次台灣人某君報告某國種種慘忍蠻橫。聞者皆為髮指。餘人亦有演說。大致謂〔中韓〕兩國互助之必要。及強力之終不可恃云。」⁵在日本的情報中，甚至還有朝鮮革命者金立(?-1922)將蘇聯提供的運動資金轉交給「台灣社會黨」人的記載。⁶

² 關於該秘密集會的細節，見表4-1。

³ 細節見表4-1。

⁴ 外務省記錄(1921a)。並見表4-1。

⁵ 1921年9月，中韓互助社曾邀廣東政府徐謙出席茶話會，據《台灣社會運動史》云，蔡惠如出席了這次會議，並發表反日言論。《台灣社會運動史》記為1920年，實誤。分見以下三份史料：(1)民國日報(1921)，(2)外務省記錄(1921c)，(3)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82-83)。蔡惠如在茶話會上的講話，在第二份史料裡被加油添醋：「又次台灣代表報告某國統治台灣之黑暗及其種殘忍蠻橫並摧殘台灣教育使人民變成愚蠢無知之動物〔。〕聞者皆為髮指〔。〕其餘到會者多有演說。大致強力之終不可。」第三份史料雖只有明確云及蔡惠如於會上「進行演講報告，抨擊日本佔有台灣後的統治手段」，但同史料另外提及林呈祿與彭華英多次參與互助社集會並發表演說之內容，卻與前述第二份史料類似(但更加油添醋)：「愚民政策，殘忍的革命審判，極端的差別待遇，橫暴的剝削制度」，這段話可能這是被該史料編纂者嫁接後的內容。最後，關於中韓互助社的研究，可見康基柱(1998: 266-279)、裴京漢(2003: 34-43)。

⁶ 金立是朝鮮共產主義者。金立最為人所知的事蹟就是將蘇聯提供的運動資金帶回東亞之事。金立於1921年參與上海的「高麗共產黨」建黨，後因某些人主張該資金應交給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而將之暗殺(강만길성대경, 1996: 64)。金立一行人於該年12月抵達上海。翌年從帶回來的「四十萬圓宣傳費」中寄贈「若干金」給「日本社會黨及中國廣東的社會黨以及台灣社會黨。」金正明, 1967: 319;

由於法租界當局公告於 8 月 1 日之後將加強取締未經告知的秘密集會，因此日本學者石川禎浩推測這項臨時規定可能是為了對付據聞召開的中共一大；石川並指出，租界當局不但曾接獲中共一大將有日本人參加的消息，還曾在搜查會場時誤將陳公博視為「日本社會黨」人。⁷這兩場秘密集會顯示了選擇在上海召開一大的中共並非孤立進行自己的集結，而是與跨地域的、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及社會主義運動連帶同時積極形成。當然，上海租界內的秘密集會也可能僅僅是中共「一大」本身，但這一切都需要更多史料來說明。

不管真相為何，當時的上海成為各國各地域激進份子的集結地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上海是中國最繁榮的城市，也是集一切破敗及罪惡於其中的淵藪。⁸雜揉各種矛盾於一身的特質使上海成為激進主義的產生地以及東方各地革命者的搖籃及避難所。蔡惠如寫給其妹婿郭肇基的信中提到：⁹

我之所以難以留居台灣雖有許多理由，但主要是受到日本政府的壓迫，不容納我的絲毫意見。憤於成功無望並放棄幻想而來到此地。這裡，上海，是東亞第一的大都會，是俄國激進派、朝鮮獨立政府與其他各國不平份子的聚集地，對於日後的運動極為方便。我將投入我蔡家一門之生命，儘可能從事排日宣傳並極力妨礙中日親善交流政策。

曾在上海待過的張深切（1904-1965）則指出：¹⁰

東京的社會運動，當然比不上上海，上海有租界的掩護體，可以大聲疾呼談吐革命，所以各弱小民族或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志士，多避入租界裡從事革命活動。……租界無疑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基地，同時也是中國革命的策源地，培養革命家的溫床。有這特殊的地界，所以中國更

梶村秀樹與姜德相, 1972: 247, 455, 462)《台灣社會運動史》則記載金立於 1921 年 9 月支付蘇聯提供的「三千圓」運動資金給台灣革命者，但未說明收款者（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c: 2）。就收款者而言，《台灣社會運動史》曾有關於「高麗共產黨員崔昌植、呂運亨、金萬謙、姜漢記」與台灣人林呈祿、彭華英來往的記載，並云後者因此而「收受過第三國際提交的運動資金」（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82-83）。就「三千圓」款項而言，目前只有看到關於蔡惠如收到「蔡以修」的「三千圓」匯款的記錄（外務省記錄, 1921a），並請參考表 4-1。

⁷ 石川禎浩（2006: 271-273）。

⁸ 「上海的社會現象，無一不使海外回來的僑胞觸目傷心。」「台灣的智識青年，一看這罪惡淵藪，無不扼腕悲痛，恨不能一手擎天，掀起大革命，把一切的罪惡掃除乾淨。」（張深切, 1998: 39）

⁹ 外務省記錄（1921b）。

¹⁰ 張深切（1998: 274）。

形四分五裂，軍閥層出不窮，任打不倒；也因為有這互不相侵的特殊地界，所以中國革命才能發展進步……

也許正是這樣的原因，各弱小民族激進份子群聚上海尋求跨地域連帶才成為一幕不可磨滅的史像。無論上海租界內的集會只有中共「一大」還是兩場集會兼有，弱小民族在此「集結」的故事本身就是現實的反映乃至未來的預示。

然而蔡惠如與彭華英的活動並不直接是台灣人在上海開展運動的起點。對於 1921 年才首次嘗試「政治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台灣人而言，以東京為主要舞台的請願運動仍有極大的吸引力。此時上海也尚未成為足以撼動中國（乃至東亞）發展的社會運動核心地域。直到 1923 年下半年，以台灣人為中心的社會運動才開始在上海出現。

本章所要討論的對象就是一個在 1923 年下半年之後誕生於上海的跨地域結社——「平社」。這是一個有台灣、大陸、朝鮮、日本等地激進青年參與其中的結社，也是台灣史上首次定期發行機關刊物（《平平旬刊》）並宣傳社團主張的結社。由於「平社」的歷史性準備，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才首次升級進入組「黨」階段，誕生了台灣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赤華黨」。本章的任務是大致描繪這一集結的輪廓。「平社」及「赤華黨」的組織者——台灣青年許乃昌（1907-1975?），則是本章將時時碰觸的重要線索。因為他是唯一能夠全面說明此過程的關鍵人物。

第一節：上海的複雜背景

1. 上海：「主義」的激戰地

從現有史料來看，1921 至 1923 年底之間是台灣人政治性活動在上海的斷層期，也是上海成為社會主義運動中心的蘊釀期。今天的歷史學家對於社會主義運動在上海的發展有自己的理解、分析與回答，當時的台灣人自然也有自己

的答案。許乃昌是最早關注中國社會主義運動並介紹這種運動給台灣民眾知道的第一人，而他通向上海的歷程正是台灣社會主義者在上海實現集結的一個斷面。

許乃昌，彰化市人，1907年生，曾用名「許秀湖」、「秀湖」、「秀湖生」、「沫雲」。家中排行長男。其父許嘉種（1883-1954）是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健將。¹¹據許乃昌留在共產國際的檔案，出生時間記為1905年1月4日，1909年進入私塾並接受了傳統教育，同年休學。1911年至到1918年間在中學學習。從1918年到1922年，他進入商業學校就讀，未畢業。1922年至1923年間，他進入南京的暨南學校就讀，也未畢業。¹²另據許乃昌日後在日本的供詞，他在故鄉就讀商業學校預科，其後則以學習英文的名義前往大陸。¹³

許乃昌確實首先進入以「懷柔」（蘇鄉雨語）華僑子弟為宗旨的南京暨南學校，¹⁴至少至1923年5月底都還留在南京。¹⁵1922年至1923年9月間，許乃昌頻繁地而廣泛地向各地報刊投稿文學評論。部份投稿在現代中國思想史、文學史上甚至具有先驅性地位。剛到大陸的許乃昌，以引介西方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為主要寫作取向，但尚未發現有具體的新文學作品。後來他甚至把大陸新文學運動的發展介紹到台灣，這是台灣史上的第一篇介紹。¹⁶

¹¹ 台灣新民報社調查部（1934: 36）。

¹² 關於許乃昌家庭與出生背景、筆名的考證見邱士杰（2005a: 27, 35, 注釋第5）。關於許乃昌留在共產國際的檔案見 K. M. Терпский（2005: 61）。

¹³ 日本警察單位1925年的情報資料載云：「本人（許乃昌）在故鄉的商業學校預科畢業二年之後，約在三年前以研習英語為目的，渡航至上海，在學於同地之上海大學時，親炙俄國文學。」（外務省記錄，1925e）

¹⁴ 關於就讀暨南學校一事，可從許乃昌投稿於《文學旬刊》的稿件署名知之。關於台灣人就讀暨南學校，可參見蘇鄉雨（1975: 24）。當年蘇鄉雨就是經蔡惠如介紹而進入暨南學校念書的台灣學生。

¹⁵ 此據許乃昌所投〈台灣議會と無產階級解放〉一文所註明之寫作地點（南京）與寫作日期（1923年5月29日）而推知（秀湖生〔許乃昌〕，1923b: 43, 48）。

¹⁶ 許乃昌投稿的報刊包括了：上海《時事新報》副刊《文學旬刊》（文學研究會主辦）、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東京《台灣》雜誌，以及東京《台灣民報》。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許乃昌發表了〈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底見解〉一文（許秀湖〔許乃昌〕，1922）。在目前筆者僅見的研究文獻裡，許乃昌與謝六逸（筆名「路」，1898-1945）並被視為介紹「表現主義」至中國的先驅。關於許乃昌〈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底見解〉的歷史地位，可見趙樂（1986: 735）與陳惇（2003: 19）的述評。此外，1922年底，許乃昌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文學旬刊》上發表〈雜譚〉一文（許秀湖〔許乃昌〕，1923b），此文針對當時中國小說之寫作本質，提出了通論性的批評。後來許乃昌又發表了〈〔雜譚〕讀「心潮」裡底五篇小說〉一文（許秀湖〔許乃昌〕，

漸漸地，許乃昌把視線從新文學轉移到了思想界。許乃昌在 1923 年所撰寫的〈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是台灣史上第一篇介紹五四以來中國思想界諸派系的文章，更是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則素描。這篇文章將這些派系視為引導中國通向革命——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的前提。貫穿其全過程的金線則是社會主義思潮。當時中國思想界日趨左傾並形塑出「激烈赤化中的中國」：¹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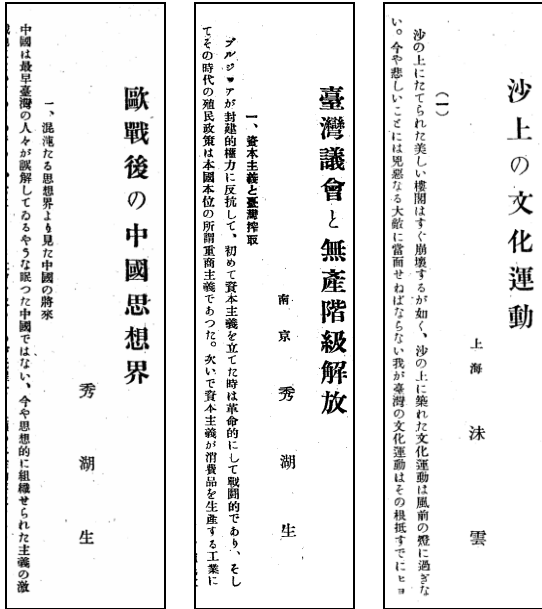
中國已非台灣的人們所誤認的沉睡中國，現在已經是以思想所組織的**主義的激戰地**。通常，追求更好的社會是人類的本性要求，其直接手段則非○○〔革命〕不可。一次的○○〔革命〕會使社會遭受極悲慘的莫大災禍，然此一時性的淒慘，卻能產生美好的社會組織。可以說，○○〔革命〕就是社會進化途上一個非經不可的關卡。而行為——○○〔革命〕——之前，必須有思想為其前驅。我們可以看出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之狀態極端混亂，而其趨勢大部分皆有向左且更左的傾向。研究現在的國情，再觀察這一左傾的思想狀態，不難推測出，在不久的將來，將會有**赤色第四階級**的革命發生。

許乃昌將中國思想界區分為如下派系，並視前兩者為社會主義流派：（1）「中國共產黨與陳獨秀」派；（2）「今日黨、社會主義青年團與江亢虎」三小派；（3）「社會政策」派（張君勱、戴季陶、胡適等）；（4）「過去的人物」（梁啟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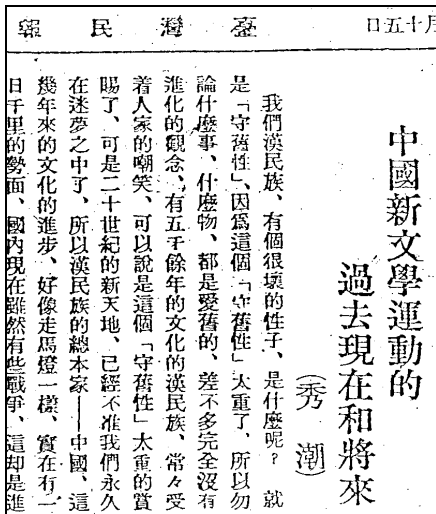
1923a)，批評南京新文藝團體「玫瑰社」之刊物《心潮》充斥著僅能稱為「感想文」的劣質小說（許乃昌這篇文章也顯示他當時正就讀於南京暨南學校）。對於《心潮》的批評，旋即引起反論，而有〈讀「心潮」後〉一文發表於同刊物（第 69 期第 3 版），但討論未能延續。在《台灣民報》上，許乃昌發表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一文。他認為，中國文化的進步正表現在新文學（白話文學）的發達上，對於同樣提倡白話文的台灣來說，介紹大陸新文學的發展將很有意義（秀潮〔許乃昌〕，1923）。楊雲萍（1946: 11）評價這篇文章的歷史地位曰：「這雖然是很簡單的，卻是介紹了中國文學運動的整個情形到台灣的最初的一遍。不過他只是介紹而已，並沒有積〔積〕極的主張到台灣文學自身的問題。」

¹⁷ 秀湖生〔許乃昌〕（1923a: 38）。

圖 4-1：許乃昌著作影像系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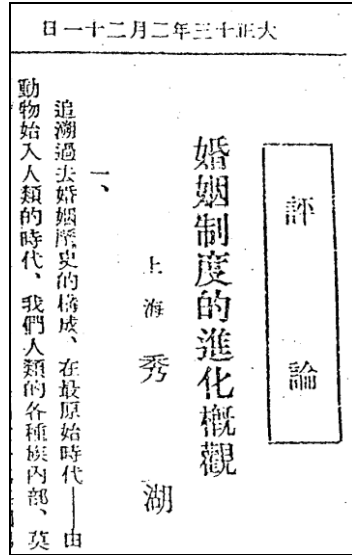


許乃昌發表於《台灣》的三篇文章，署名「秀湖生」、「沫雲」。〈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是第一篇將由台灣人士自己介紹給大陸民眾的文章，文中預示了無產階級革命必將發達的前景。〈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則是一篇以反對台灣運動的文章，請願新與資產階級合流。〈沙上的文化運動〉被認為是台灣「要求大眾文化的萌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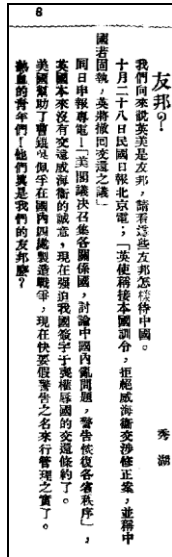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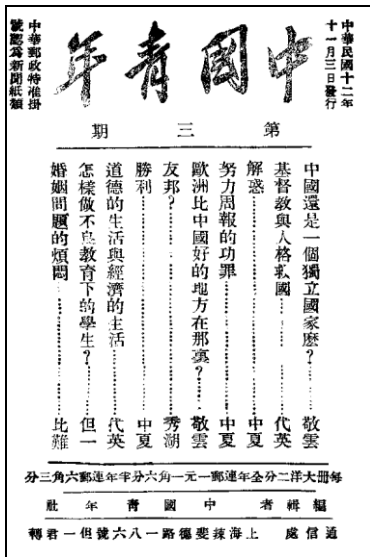


許乃昌發表於《台灣民報》的〈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署名「秀潮」（可能是「秀湖」的誤排）。楊雲萍稱這篇文章是「介紹了中國文學的整個情形到台灣的最初的一遍」。

圖 4-2：許乃昌著作影像系列二



許乃昌發表於《台灣民報》的〈婚姻制度的進化概觀〉，署名「秀湖」。這篇文章是台灣第一篇介紹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文章。就其寫作背景而言，當時蔡和森（1895-1931）正在上海大學教授「社會進化史」，可能許乃昌透過這樣的學習而寫下這篇文章。在此之後，翁澤生（1903-1939）才又發表了一系列更細緻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學論文。



許乃昌發表於《中國青年》第三期的〈友邦〉，署名「秀湖」。《中國青年》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創刊於1923年10月，正是許乃昌留學於上海大學之時。

中共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可以一起說明。青年團的成立早於中共，但都是共產國際指導下所成立的組織。許乃昌寫作〈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之時（1923.3），黨對團的領導關係尚未得到確立（1923.8才正式確認）。所謂的「今日黨」則是國會議員胡鄂公（胡南湖，1884-1951）所領導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創辦有機關刊物《今日》。他們與中共之間存在競合關係，但成員多數最終轉入中共。目前知道台灣社會主義者謝廉清（1903-1961）同他們有聯繫，本研究將集中在第六、七章討論「今日黨」以及謝廉清。

許乃昌所列舉的中共、青年團與「今日黨」俱宗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然而許乃昌還是注意到非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派別，即江亢虎（1883-1954）一派。江亢虎是早期社會主義活動家，而許乃昌主要把江亢虎當成無政府主義者。不過當時的無政府主義者與江亢虎實有理論上的矛盾，已非許乃昌所謂的「無政府主義的大柱石」。¹⁸

許乃昌所列舉的四大派系除了「今日黨」以京津地區為主要活動地，餘皆活躍於上海。如果「激烈赤化中的中國」是「主義的激戰地」，那末「激戰」最集中的地方就是上海。這些派系在「主義」上的激戰還體現於一種特別的實踐，就是辦學校。此點對於台灣人可能更有直接的意義。

在中共（及社會主義青年團）與國民黨的共同指導下，上海大學於1922年正式成立，並從1923年下半年開始招生。圖謀復興其勢力的江亢虎也在上海成立了南方大學（1922）。「辦校」在某種意義上乃是上海特色的一種反映。當時的上海存在著大量學校。雖說學校的數量並必然不反映質量，但對台灣人而言，南方大學、上海大學，以及許多補習學校、教會學校、乃至教會本身，都是容身之所。上海基督教青年會（YMCA）以及台灣社會運動史上常出現的「務本英文專門學校」¹⁹就是最顯著的例子。這些地方不但是台灣人求學、庇護之所，甚

¹⁸ 秀湖生（許乃昌）（1923a: 41）。

¹⁹ 「務本英文專門學校」是一間由外國小型教會所主辦的補習學校，當時不但有許多台灣青年就讀於此，更是此後經常選擇的集會地點。在台灣社會運動的史料中，這間學校第一次出現於「上海台灣人大會」（1924.1.12）。關於這間學校的歷史：從該校刊登於上海《民國日報》的廣告分析，此校本名「創立務本英文專校」，後於1924年改名「美國創立務本文商專門學校」。據廣告，本校校址記為「上海寶山路」。廣告刊登者為「校長林鴻斌」，1924年校名更改後，刊登者改為「總理惟經。主任林鴻斌」。本校招生廣告常與基督教傳教廣告同登一處，刊登者記為「上海寶山路耶穌基督公同使徒教」或「上海寶山路西寶興里口耶穌總堂」（1923c, d, g, h, 1924c。由於招生廣告多連日登

至還是召開社會運動集會的場地，一如東京中國基督教青年會所起的作用。創刊初期的《台灣民報》有大量南方大學的學生投稿，即可為證。²⁰與此相比，北京不但難讓台灣人有可供躲避之處，學校的數量也少，就連青年會的性質也像是個同鄉會。總之上海具有特別有利於台灣人（尤其是激進的臺灣人）群聚於此的條件。

許乃昌所撰寫的〈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以及其他文章都成為重要歷史見證。當台灣人想要了解大陸的社會主義運動時，眼前所能遭遇或認識的「運動」，也許正是這篇文章所記載的這些派系。而當時正在南京的許乃昌，顯然也不只是熱切地遙望著上海（乃至北京）的「激戰」。寫下〈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後不久，許乃昌便從南京轉赴激戰之地上海，並以「試讀生」資格於1923年9月²¹錄取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此後直到許乃昌前往蘇聯的1924年中，許乃昌基本滯留上海。此時的他，還不滿十八歲。

載，此處引用史料則取首次登載日期或登載內容首次發生變化的日期）。從務本英文學校為「郇立」（「郇」即「Zion」之意）來看，可能正是這一教會的附屬學校。若從教會地址「上海寶山路西寶興里口」來看，也與日本《外務省記錄》所記載的務本英文學校校址「上海寶山路寶興里」相同；《外務省記錄》並指出，校長林鴻斌曾在校內的台灣人集會上，發表演說（外務省記錄，1924a）。廣學會（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所編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曾記載上海有個叫做「基督公同使徒在郇」（Christian Catholic Apostolic Church in Zion, CCACZ）的教會，由 C. F. Viking（可能即「惟經」）等美國人主辦（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4）。

²⁰ 朱雙一曾對《台灣民報》創刊初期來自南方大學的投稿進行近乎搜索的研究。當時發表於該刊上的南大學生有：施文杞、劉國定、林耕餘、維濤、曾廣勳、趙吟秋、黃超白等。朱雙一（2006: 4-5）總結云，「最早的一年多時間裡《台灣民報》上的新詩園地，幾乎是以施文杞為首的一群上海南方大學學生的天下。」朱雙一這部份的研究在後來發表於期刊上的版本被刪除（朱雙一，2008）。為利於本研究說明，此處冒昧引用研討會的論文版本。

²¹ 當時的上大社會系是新創科系。全校由「東南高等專科師範學校」改制為上海大學之後，從1923年6月開始連續進行「招生」、「第二次招生」及「續招生」（民國日報，1923a, b, e）。據《民國日報》所登載榜單，許乃昌在「續招生」之後以「試讀生」身分錄取（民國日報，1923f）。關於試讀生的規定，筆者尚無法尋得文獻依據。許乃昌入學之後通過的〈上海大學章程〉則有插班生與特別生的規定，特別生招收於缺額時，可酌量免試入學，並可改編為正式生。試讀生之性質可能近於特別生（黃美真與石源華等，1984: 64）。

2. 上海台灣青年會及其成立前後的局勢

或許可以認為，由於有著上海的特殊環境（以及這種環境所形成的歷史性準備，如各種學校），台灣的激進份子才逐漸聚集於上海。他們不但在上海得到庇護，同時也接觸到各種社會主義勢力，實現自己的組織化。

許乃昌在上海的活動是具體而微的例證。他在上海大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許乃昌是現知最早的台籍中共黨員）²²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²³據聞後來還加入了國民黨。²⁴許乃昌更參與組建上海第一個台灣青年組織——上海台灣青年會。

上海台灣青年會誕生於許乃昌抵滬後不久之後的 1923 年 10 月 6 日。成立地點是江亢虎的南方大學。青年會的指導者恰恰是兩年前積極活動於上海的蔡惠如。兩年的光陰過去，台灣人終於在上海實現首次集結。

在上海台灣青年會成立之前，旅居大陸的台灣人便已依據地域差異，先後在北京、廈門建立起北京台灣青年會（1922.1 成立）、廈門尚志社（1923.6.21 成立）。謝廉清與范本梁²⁵這些以華北為活動據點的台灣人也上海台灣青年會成立前後紛紛南下上海參與活動。其中，謝廉清不但參與了上海台灣青年會的創立，並

²² 1923 年 11 月 22 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批准劉劍華（劉華）、張景曾、龍康莊、薛卓漢、王逸常、徐夢秋、許乃昌、黃儀蕃為中共候補黨員。隔年 2 月 28 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批准上海大學候補黨員轉為正式黨員。就入黨時間與地點而言，極有可能正是當時在上大的許乃昌。上海大學的黨組織自 1923 年 7 月開始編成上海地委領導下的第一小組，早期上大第一小組的成員多由青年團吸收而來。1924 年 1 月 13 日，上海的 49 名共產黨員重新編組，而上大第一小組的改組名單中，亦有許乃昌的名字，其組員還包括：劉劍華（劉華）、張景曾、鄧中夏、瞿秋白、施存統、王一知、張其雄、黃讓之、龍康莊（龍大道）、薛卓漢、王逸常、徐夢秋、許德良、陳比難（陳碧蘭）、向警予、沈澤民。上大第一小組於 1925 年後改組為上大支部，1926 年再改組為上大獨立支部（上海市委黨史徵集委員會，1986：137-138；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等，1991：15-17, 23-24；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與江蘇省檔案館，1987：72, 80）。

²³ 許乃昌於 1923 年 12 月之後列名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地方團員，當時共 136 人（黃志榮與黃妙珍，1986：50-51），許乃昌還曾發表文章於青年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秀湖〈許乃昌〉，1923：8）。

²⁴ K. M. Терпский（2005：61）。

²⁵ 據張深切（1998：266）回憶，1924 年前後的范本梁其實也在上海。

是青年會的幹部。

與大陸上的其他台灣青年組織相比，上海台灣青年會頗為特殊，因為青年會的活動特別積極。從現有史料來看，上海台灣青年會不但有較多且可指的日常聚會，還有其他青年組織所未見的組織分工（見表 4-9）與刊物發行計畫。²⁶最先針對島內「治警事件」（1923.12）做出反應的組織也是最晚成立的上海台灣青年會。1924 年 1 月 12 日，青年會在務本學校召開「上海台灣人大會」，並率先聲援請願運動與譴責日本當局。但上海台灣青年會特有的積極性似與政治性相分離。青年會本身在「上海台灣人大會」之後便再無任何政治性的活動。如果「治警事件」沒有發生，這次帶有政治性的集會或許也不會出現。但治警事件前後各種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並非如此簡單。

治警事件對於包括社會主義者在內的島內外台灣人而言確實是 1923 至 1924 年間最巨大的政治炸彈，本研究前述幾章已略分析。蔣渭水（1890-1931）與連溫卿（1895-1957）所主導的新台灣聯盟及社會問題研究會在官方打壓之下成為治警事件的前奏。范本梁的活動則因治警事件的刺激而在沉寂近一年後重新出現於歷史舞台。治警事件激起了島外輿論對於台灣的同情之聲，如《台灣民報》所言，「台灣這回的受虧一傳國外，如中國諸大新聞前後數回皆報道其消息很詳細，同情的評論也是多的。」²⁷

然而大陸上的同情輿論乃至臺灣人對於這種輿論的歡迎，有更複雜的背景。因為當時大陸上存在著排斥台灣人的輿論。這種輿論發生於沿海，集中於閩台交流頻繁的廈門地區。雖然台灣人只是「籍民」，而不是正式的日本人，然而

²⁶ 青年會的刊物迄今未見。但當時青年會曾向人在檳城的江亢虎邀稿（1923 年 12 月 15 日抵達。並有南方大學的台灣學生林耕餘擔任翻譯）。江亢虎（1928: 36, 42）云：「在檳城時（，）得上海臺灣青年會來函，言將出季刊，屬以一言為弁。游觀之暇。走筆應之。偶錄於此。（『）三十年來志士仁人爭以亡國滅種禍至無日申傲國人。國人淡焉漠焉。或且笑為憂天。不意臺灣同胞乃首當其衝而躬親其境。吾嘗思臺灣同胞（，）蓋處人生所至不堪。而茹苦停辛。乃長忍此以終古。匪唯不能見諒於日人。乃至不能見諒於吾國人。日本既以殖民地視臺灣。不使與諸郡縣等。臺人有內附者。吾國人又異族畜之。其無賴則鋌而走險。為虎佞以噬人。惟優秀青年（，）脫然來歸。恆思有所樹立。不欲以第一等大帝國國民自豪而特接糞為臺灣人。其遇可哀。其志尤可敬也。吾聞泉漳之間。有捐鉅資資緣入臺籍。以間接托庇於第一等大帝國者。豈真其性與人殊哉。為淵駸魚。為叢毆雀。誰為為之。蚩蚩者吾何責焉。今臺灣人在本土不敢言改革。並不敢言教育。其居留上海者。組織青年會。專從教育入手。蓋國破家亡。即受教育之難已如此。顧吾國固儼然猶在。而吾民欲受教育亦難於登天。又安暇為臺人悲哉。臺人勉之。人心一日不死。讀書種子一日不絕。雖謂臺灣未亡可也。（』）」

²⁷ 台灣民報（1924d）。

許多惡劣份子卻挾著日本人的氣焰，在當地作威作福，暴亂逆行，因此常被蔑稱為「台匪」、「台灣歹（呆）狗」。這種行徑自然引起了大陸人民的憤慨，對於同感不平的台灣人（如張我軍、范本梁）而言，除了言論譴責之外，實踐上則幾無解決之餘地。²⁸

自日本殖民台灣以來，因「台匪」而起的閩台衝突頻傳。1923 年下半年則是一次的高潮。夾處於台匪事件與治警事件之間的台灣人——特別是大陸上的台灣人，其矛盾處境必然巨大。但在中國形勢愈趨殘破的情況下，發生在民族之內的艱難處境並不僅僅是台灣人的單方面感受，而是雙方面的。1922 年，「台灣青年 S 君」熱情地寫信給郭沫若（1892-1978），希望能夠「遙飛祖國，向文學煅己一身，欲為個真個的中華人。」郭沫若卻悲愴地回應道：「你這種悲壯熱誠的大志，令我淚涔涔地湧起無限的敬意與感慨。S 君，我們的祖國已不是古時春花爛漫的祖國，我們的祖國只是冢中枯骨的祖國了。你將來縱使遙飛得到，你也不免要大失所望。」然而郭沫若仍鼓勵云：「S 君，人只怕是莫有覺悟。一有覺悟之後，一有覺悟之後，便向任何方面都好，我們儘管努力，努力做個『真個的人』罷！」²⁹

雖然 S 君未必是 1922 年時正汲汲致力文學批評的許乃昌，但許乃昌的人生道路恰如郭沫若所指示的那樣，從一個「遙飛祖國，向文學煅己一身」的青年「覺悟」而向著其他「方面」而去；而這個方面，恰恰就是追求台灣人民的解放了。許乃昌僅僅只是眾多向著這一方面奮鬥的台灣青年的一個代表。在民族內部及民族之間的艱難處境之中，大陸上的台灣人進一步超越上海台灣青年會與請願運動之類的組織與訴求，並在無政府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基礎之上實現了規模空前的集結。

²⁸ 張我軍（1923）曾在《台灣》提出譴責。范本梁所主辦的《新台灣》也批評少數台灣人「借了強盜的勢力來做台匪來做歹狗，而侮辱祖國而蹂躪同胞了，尚至無法度生，也就屈服於強盜而做他們的走狗爪牙來陷害有志的同胞了。」（能俠者，1924: 3-6）

²⁹ 郭沫若（1989: 134）。原載於 1922 年 12 月《創造》，第 1 卷第 3 期。

3.報端上的一瞬：「台灣赤華會」與《平平旬刊》的出現

起點始於 1923 年底。大陸上的共產主義刊物及無政府主義刊物上出現兩則與台灣人有關的組織消息。

第一則消息見於 11 月 10 日發行的上海《中國青年》雜誌。這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誠如「S 君」寫給郭沫若那樣，「台灣一個青年」也寫了一封信投稿給《中國青年》，並由惲代英（1895-1931）轉引於他所寫的〈中國的分立運動〉文中。同月 23 日，這封信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再次登出，不但文字更長，文章的署名者也不再是「台灣一個青年」，而是一個組織、一個叫做「台灣赤華會」的組織。轉錄這篇文章於《覺悟》者則恰恰是許乃昌。這封信並不是一篇希望「向文學煅己一身」的個人戰鬥檄文，而是一個組織針對廈門「台匪」問題而提出的呼籲。其全文如下：³⁰

親愛的全中國人民！

我們一部份無智的台灣人，時常在福建一帶，忽視中國國權，倒行逆施，肆行無忌，實在妨害中國的安甯不小。近日又在廈門暴動，白日殺人，引起日本水兵上陸，這是何等可恨而可哭的事啊！

然後是一段與惲代英所轉錄者略有出入的文字：³¹

但是這個罪惡，不是台灣人應負完全的責任的，若是沒有日本帝國主義者站在後面指揮，無智的台灣人是不会這樣的大膽這樣的猖獗！

日本帝國主義者，因為要永久地保持其榨取台灣經濟的權利，所以百

³⁰ 乃昌〔許乃昌〕（1923a: 4）。

³¹ 惲代英所接著轉錄的內容略有差異：「但是這不是台灣人應負完全的責任的罪惡，若是沒有日本站在後面指揮，無智的台灣人不會這樣的大膽，日本人要使台灣人不能對外結國際的聯合，尤其是要使台灣人和在歷史上地理上有特別關係的中國人，不能親睦，這是他們暗中幫助無智的台灣人行兇的原因。親愛的全中國人民！你們是和我們處於一樣的壓迫之下。你們不但為台灣人，並且要為你們自己，應該站在共同利益的痛切的意識上，起來打破我們的仇敵啊！」〔代英〔惲代英〕，1923: 7〕。兩文之間的差異，或許是文章並非一次寫成所致，也可能是惲代英或許乃昌自己或增或刪了。

般要使台灣人不能對外結國際的聯合，尤其是要使台灣人和在歷史上地理上有特別關係的中國人，不能親睦，這是他們暗中幫助無智的台灣人行兇的第一個原因。

各國資本帝國主義者，為著要侵占中國的利權無不到處尋找機會，以滿其貪血無窮的獸慾。如最近的關於臨城案件的要求，就是其趁火打劫的一個好例。日本帝國主義者，以為中國人若對台灣人有報復的行為時，便可提出無理的抗議和要求。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案中幫助無智的台灣人作惡的第二個原因。以上的二個原因，由日本水兵的上陸，而證明的〔得〕十足無疑。親愛的全中國人民！你們是和我們一樣處於資本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你們不但為台灣人的獨立和自由，並且為你們自己的利益，應該站在共同利益的痛切的意識上，起來打破我們共同的仇敵。我們是被中國的報紙稱為「台匪」的。但相信你們是會完全了解我們的地位的。我們願我們被壓迫的朋友們，都聯合起來，對抗敵人資本帝國主義！

打倒資本帝國主義的聯合萬歲！

中華台灣兩民族的獨立和自由萬歲！

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階級解放萬歲！

台灣赤華會

惲代英與許乃昌所轉錄的文字不但略有出入，轉錄的目的也不同。惲代英是透過台灣人的投書，說明軍閥割據下的「分立運動」（如聯省自治）多麼沒有正當性。³²許乃昌則是為了「消釋我們對於台灣民族的惡感」並「促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覺悟」。

屈指算來，此時距離即將發生的治警事件還不到一個月。「台灣赤華會」——這個既「赤」且「華」的「台灣」組織——並未等待將來的鎮壓以及伴隨著鎮壓而來的同情便打出組織名號，並以階級解放與民族解放兩大目標的並舉作為爭取兩地人民集結的口號。

³² 「日本人最要台灣人與我們生意見，然後使我們不願幫助台灣人，幸而台灣的青年還不曾忘記我們是骨肉兄弟啊！我們要共同打倒仇敵，我們反對一切的分立運動。」（代英〔惲代英〕，1923: 7-8）

第二則消息則見於北京《國風日報》的副刊「學匯」。這是無政府主義者在北京的重要言論機關，由范本梁所結識的景梅九（1882-1961）所主辦。1923年12月20日，即治警事件發生後第四天，遠在北京的這份刊物也登出一則與集結有關的出版預告：³³

《平平旬刊》出版預告

本刊為南方同志所辦，並有台灣、朝鮮等同志數人，內容注重安那其主義學理，定陽曆元日出版。其通訊處：上海戈登路南方大學賀威聖。顯然，除了號召大陸人與台灣人相親睦的赤華會之外，台灣人及朝鮮人也以刊物的形式——《平平旬刊》——集結起來了。《平平旬刊》的出版預告雖不滿百字，卻是個警號。比起1923年還不敢明言無政府主義（而只提「新台灣主義」）的范本梁，明言「注重安那其主義學理」的《平平旬刊》無疑具有更為鮮明的旗幟。另就刊登這則廣告的《學匯》是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無政府主義刊物來看，也足以為證。

僅從上述兩則消息來看，台灣赤華會也許較親近於共產主義系統（如中共、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大學），《平平旬刊》則可能較為親近無政府主義系統（江亢虎、南方大學）。不過，如果組織——台灣赤華會——未能爭取更多人參與並延續自身，就只能像范本梁長期處於一人組織的狀態，撐不起一個「運動」。倘若刊物——《平平旬刊》——最終沒能出版，就比擺脫不了一人刊物色彩的《新台灣》的處境還要糟糕，而出版預告無疑只將「預示」一個現實成為不可能的可能性而已。

然而刊物最終是出版了。並非廣告所說的「陽曆元日」，而是1924年4月1日。當出版成為現實，這份刊物甚至超出了刊物的出版本身而組建起《平平旬刊》所隸屬的社團——平社。許乃昌也加入了平社，成為《平平旬刊》的寫作同人之一。可以說，「台灣赤華黨」與《平平旬刊》在報刊上看似偶然的並現並非沒有關係的兩件事，而是東亞社會主義者即將集結於上海的一次預示。

³³ 〈介紹新著〉，《學匯》，1923年12月20日，轉引自張允侯等（1979: 350）。

第二節、平社與《平平旬刊》：兩種「主義」的兼容與分裂

1. 概觀：平社及《平平旬刊》

平社及《平平旬刊》是一個以上海為活動地並由東亞各地革命者組成的聯合體。如表 4-4 所考證，平社的參與者（以下簡稱平社成員）與《平平旬刊》的寫手們（以下簡稱平平同人），來自中、台、朝、日四地，包含十多名成員。雖然平社成員與平平同人的成分有頗大落差（平平同人，多來自大陸）。但組織規模仍是蔣渭水、連溫卿、范本梁等人所未曾達到的水平。此外，若從刊物屢屢變更的聯絡處與聯絡人來看（見表 4-2），平社及《平平旬刊》與前述南方大學、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關係，必然不淺。

平社像是東亞各地革命者亡命上海而實現的一次集結。其中包括由於日本政府鎮壓而潛赴中國的日本共產黨領袖佐野學（1892-1953，表 4-4: 18），以及不見容於日本當局而流亡上海的朝鮮共產主義者呂運亨（1886-1947）與尹滋英（尹蘇野，1894-1938，見表 4-4: 17）。如《台灣社會運動史》所云：³⁴

在當時有一名共產主義者，因恐懼東京的嚴厲取締而奔逃上海，與在該地留學的台灣左傾學生……等共同組織了「平社」，且發行機關誌《平平》，將其密送散佈於台灣，此人也和蔣渭水保有密切聯繫。

亦如佐野學所言：³⁵

我自脫出了日本已經八個月了，³⁶這八個月之中我在諸國的旅途過很匆

³⁴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245）。

³⁵ 佐野學（1924: 3）。4 月是刊行月份，並非寫作月份。

³⁶ 就佐野學被捕後的供詞來看，他從 1923 年 5 月離開東京之後，於同年 6 月抵達北京。到 1924 年 9 月才從蘇聯出發歸國。但從佐野學自稱「我自脫出了日本已經八個月了」來看，這篇文章至少寫於 1924 年 1 月前後。佐野學也許被捕之後並未供出實情。此外，從當時上海報紙屢稱佐野學潛抵上海來看，也略可為證。以上分見：〈佐野學予審訊問調書〉（山辺健太郎，1982: 193-196）；並見

忙的日子，這回自某處到某處的途中，到上海留住了差不多幾個星期。我在此地會見了，中國，高麗，台灣的同志，大家談論東洋革命的前途。這也可以說是我的亡命生活中一件難忘的事。自命獻身於世界革命的吾人，於東洋的同志，或於歐美的同志，當然沒有甚麼分別。然而我對於東洋的同志總免不了覺得特別的親密

但是使平社實現集結的靈魂人物並不是這些外籍流亡者，而是無政府主義者謝晉青（晉青、晉卿，?-1923）與范本梁的同志——羅任一（羅豁、羅志道，1897-1965）。

與羅任一在日本相遇的無政府主義者張景回憶：³⁷

一九二〇年我們（在日留學生）住的宿舍裡來了一個四川學生羅豁，帶來了一些新出版的小冊子，……大家熱情地閱讀，興奮地討論，特別是讀克氏的《告青年》一文和《夜未央》劇本，受了不小的激發，都決心要參加改造舊社會建設理想的新社會運動，這樣就有六七人成為小團體，命名為「光社」……就以安那其主義為『光社』的主義……這樣不到半年就各自分散了，羅回國後沒有消息。

目前無法獲知羅任一從日本回國後³⁸在什麼狀況下而組成平社並創刊《平平旬刊》。但他至少在《平平旬刊》正式發行之前便已出現於上海的社會運動之中。³⁹羅任一不但是《平平旬刊》撰文最多的作者，更是唯一兼具平平同人以及平社成員身分的大陸青年（見表 4-4）。實際上，當時的日本情報資料（含《台灣社會運動史》）正把羅任一視為實現平社組織化的指導者。⁴⁰但羅任一的重要性不僅僅在

本研究附表 4-5: 07, 14.

³⁷ 張景（1983: 117）。

³⁸ 羅任一由日返國的這一經歷，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說的「有一名共產主義者」。當然，也可能是彭華英或佐野學。

³⁹ 1924年2月7日，羅任一以「羅豁」之名出席上海「二七紀念大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工運史研究室等，1983: 566）。

⁴⁰ 比方《台灣社會運動史》就認為，「中國共產主義者羅豁」以「法租界霞飛路漁陽里」為基地，「讓數名台灣人及朝鮮人青年寄宿其宅，施以共產主義教育。」（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9）。羅任一所曾居住的「法租界霞飛路漁陽里」是中共早期機關的駐在地，即新「漁陽里六號」；至於陳獨秀，則曾居於隔壁的老漁陽里，即老「漁陽里二號」。但中共早期機關主要是在1921年前後活動於此。作為社會主義青年團最初駐地的新漁陽里六號，據許之楨（1980: 39, 41）回憶，原由戴季陶於1919年租住，後由楊明齋、陳獨秀續租。李達（1980: 19, 21）亦回憶，由於選派了十來名團員赴蘇留學，此地遂於1921年7月黨大會之後退租；陳獨秀亦於1922年初出獄後不久，搬離了老漁陽里二號。因此，如果羅任一回國之後確實定居於新漁陽里，有可能與中共擦身而過。但

於他是否起到這樣那樣的指導作用（因為沒有史料可以進一步說明），而在於他所曾主張的「A」「B」聯合（見本研究第三章）。對於研究平社及《平平旬刊》而言，羅任一具有的這一背景是重要的切入點。

平社與《平平旬刊》確實兼具「A」「B」兩種主義。僅從參與者背景即可看出這點。先來看「B」派背景。如表 4-4 所示：（1）以平社成員來說，呂運亨與尹滋英屬於「B」派傾向的朝鮮革命者；（2）就平平同人而言，佐野學是潛逃至上海的日共領導人；（3）至於身兼平平同人與平社成員的許乃昌，則是中共黨員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4）大陸籍平平同人（大多來自浙江與安徽）幾乎都與中共、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大學有關。他們不但在地緣上有所聯繫，組織關係與活動經歷也都互有關聯。或許正因如此，《台灣社會運動史》等史料才把平社及《平平旬刊》當成純粹「B」派的組織及刊物。

然而平社及《平平旬刊》的「A」派色彩也是有的。創刊前後，《平平旬刊》不但被大陸無政府主義刊物引為同志（前引《學匯》即是一例，並見表 4-2），平平同人還包括兩個著名的大陸無政府主義者：盧劍波（劍波，1904-？，見表 4-4: 03）及秦滌清（抱朴，生卒年不詳，見表 4-4: 08）。

不過兩種主義在《平平旬刊》內部的力量對比並不平衡。《台灣社會運動史》將平社判定為「有濃厚的共產主義運動色彩」的社團，日本學者坂井洋史則力圖證明無政府主義傾向的存在，但說服力不強：（1）坂井特別注意平平同人對於蘇聯、俄國或馬克思主義的批判。但是，除了攻擊考茨基的譯稿之外，⁴¹反蘇、反俄或反共，實不足以從反面證明無政府主義是這種攻擊的基礎。因為民族主義情緒以及同人本身思想的不成熟也是可能的原因，遑論這方面的文章僅僅兩篇。⁴²（2）坂井認為，對於議會請願運動的反對，顯示了無政府主義否定代議制的典型態度。⁴³但共產主義者也可能反對代議制：明言以反

是中共早期機關的轉移，是否連帶影響當地作為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的集散地，實待探究。

⁴¹ Kerkeзов（1924: 6-9）。但《平平旬刊》編者仍注言，「本文主觀觀念非常濃厚：好在是表示他個人意見。」這篇連載文章實際亦未續刊下去。

⁴² 這兩篇文章主要是反對中蘇談判，認為蘇方欺負中國（赤人，1924: 1-3；威聖〔賀威聖〕，1924a: 8）。關於《平平同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請見本研究第七章的討論

⁴³ 坂井洋史與嵯峨隆（1994: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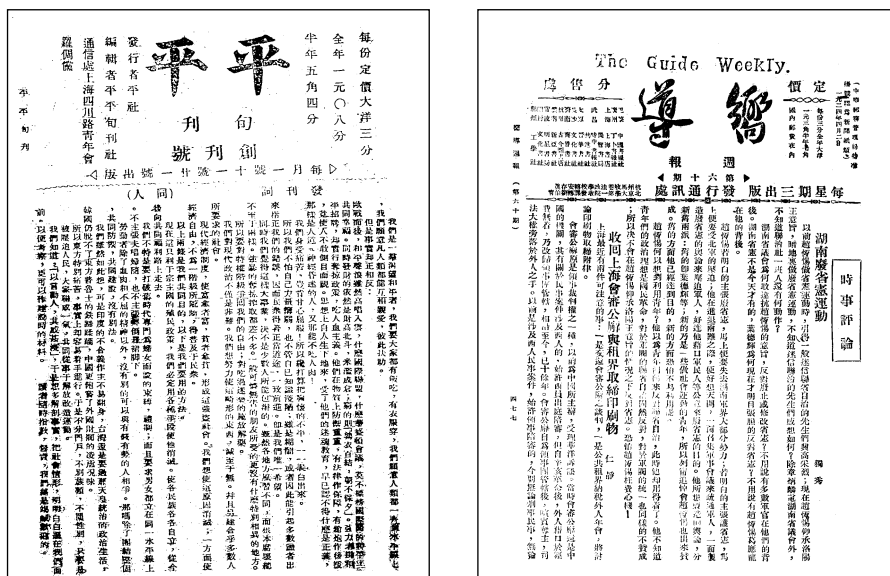


圖 4-3：《平平旬刊》與《嚮導週報》

1924年4月1日發行的《平平旬刊》創刊號封面與同月2日發行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週報》第六十期封面。兩份刊物的封面設計風格類似，這是很值得注意的特點。

對代議制作為否定運動之基本理由的平平同人也極少。(不過，從平平同人賀威聖以代議制作為否定議會請願運動的理由來看，請願運動在平平同人眼中的「負面」面貌值得探究。)(3)坂井從一些外在形式來進行正面的推論：首先，1923年底的無政府主義刊物《學匯》謂之「注重安那其主義學理」；其次，1924年5月出版的無政府主義刊物《春雷》引之為「上海同志」；⁴⁴其三，〈平社簡章〉以無政府主義式的口吻自稱「實行人類互助為宗旨」⁴⁵(又如：「我們是一群渴望和平者，我們要大家都有飯吃，有衣服穿，我們願意人類都一齊到水平線上，我們願意凡人類都能互相親愛，彼

⁴⁴ 春雷 (1924: 113)。

⁴⁵ 平社 (1924a: 16)。

此扶助。」⁴⁶），甚至本研究還可補充指出「平社」二字就是無政府主義式的命名（正如「安社」那般）。⁴⁷但是，實際發行的《平平》旬刊就內容而言幾無傾向相應的文章；就連同人中的無政府主義者（如羅任一、盧劍波）也幾乎不從無政府主義去談問題。坂井最後不得不承認，「綜觀內容，其實缺乏能直接將本刊物視為無政府主義宣傳刊物的有力根據。」⁴⁸

無政府主義在《平平旬刊》中存而又不存的矛盾現象究竟何解？本研究認為，這種矛盾可能是「A」「B」兩派間的力量消長之反映。

2. 「主義」對立：從平社、《平平旬刊》到赤華黨

據俄國學者郭杰（К. М. Терпский）與白安娜（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所轉述，許乃昌交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有如下內容——1923年11月，⁴⁹台灣、中國，以及朝鮮的革命青年在上海組織了平社（音譯：Pingshe / Пиншэ。義譯：Общество “Равенство”，「平等」社）。平社的成立者包括：彭華英、蔡惠如的長子蔡炳曜，以及許乃昌。平社成員發行了定期刊物《平平》（Pingping / Пинпин）⁵⁰並派遣了幾個成員回到台灣工作。根據許乃昌的說法，平社的活動相當成功。不過，由於外國租界當局的壓力，以及「為數不多的無政府主義者」在社團內的非組織化行動，使得社團於1924年5月停止活動。⁵¹

目前尚無其他史料可以說明平社內部的「A」「B」矛盾，不過范本梁與彭

⁴⁶ 同人（1924: 1）。

⁴⁷ 目前所知以「平社」命名之無政府主義社團曾分別出現在1918年的山西、1922年的四川、1923年前後的四川（平平社）、1927年的舊金山（徐善廣與柳劍平，1989: 310, 314, 315；張允侯等，1979: 334）。

⁴⁸ 坂井洋史與嵯峨隆（1994: 50）。

⁴⁹ 郭杰與白安娜認為11月有誤，應為《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記載的3月。但此推測是錯誤的。詳表4-2: 01的史料即可為證。

⁵⁰ 白安娜的碩士論文（Belogurova, 2003: 14）與郭杰與白安娜的合著（К. М. Терпский, 2005: 43）均謂《平平旬刊》發行「一個月兩次」。此說有誤，因為《平平旬刊》實乃一個月發行三次的旬刊。

⁵¹ 並見Belogurova（2003: 14-15）與К. М. Терпский（2005: 43-44）。

華英之間的對立也許可以提供一些參考：⁵²

華英比本梁先到上海，本梁自認是華英的情敵，他本來對華英就沒有好感，及至本梁信奉安那其主義出現於上海的時候，平添一個思想對立，兩人之間就成為冰炭不能相容了。……

我還在上海的時候，老范有一天瘋狂似地跑回青年會，嚷著找菜刀要去殺死彭華英……我趕緊把菜刀藏起來，極力阻止，攔住不放。……鐵牛〔范本梁〕氣憤憤地說：老彭的思想不對，會荼毒台灣民眾，所以他和老彭爭辯起來，詎料他〔彭華英〕不會認錯，反叫外國人打他〔范本梁〕、侮辱他，此仇不報非人。……總之打過架是事實。

范彭兩人的思想，根本不同，各自獨立一家，不能相侵犯。老彭組織平平社，宣傳他們的言論，老范單獨出版《新台灣》，提倡安那其主義，分道揚鑣已久，老范偏要找他辯論，自討沒趣。根本上，兩人之間不止於思想問題對立，老范似乎還夾雜著情敵意識對待老彭，這實在是使老彭出乎意料的。……當時他們兩位都可以說是台灣最重要的革命志士，兩虎相鬥兩敗俱傷，我很不願見他們的仇恨一往趨深，因為我反對蔡培火一派合作「請願」主義，自然擁護彭范等人的革命運動，但我不願意袒護哪一方。

張深切與謝雪紅（1901-1970）都指出，范本梁在平社活動期間正在上海。日本情報也指出，范本梁與羅任一來往密切。⁵³因此《平平旬刊》與《新台灣》的先後創刊⁵⁴乃至社團之間或之內的矛盾，也許都離不開上海地域內的主義紛擾或人事糾葛。

在平社遭遇「A」派「破壞」的形勢下，許乃昌等人另外建立起「B」派傾向鮮明的組織——「赤華黨」。也許這是「台灣赤華會」重新以「赤華黨」之名站回歷史舞台的一次嘗試。⁵⁵許乃昌交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指出：⁵⁶

⁵² 張深切（1998: 256, 272, 273）。

⁵³ 外務省記錄（1926c）。並見本研究第三章。

⁵⁴ 在《平平旬刊》創刊號寄抵台灣後不久（台灣民報, 1924c），《新台灣》也隨即寄達了（台灣民報, 1924f）。

⁵⁵ 就此而言，許乃昌關於「赤華黨」的報告，或許恰恰證實了許乃昌與「台灣赤華會」的關係。但就「赤華黨」本身來說，除了許乃昌的報告與「台灣赤華會」早先的宣言之外，尚無其他史料可

——1924年6月，台灣左翼份子建立了「赤華黨」(Red China Party, RCP / Партия Красного Китая, ПКК)，許多平社成員參與了這一組織。據許乃昌所言，在赤華黨建立前，台灣沒有任何組織敢於以自己的名稱宣示共產主義方向。黨的創建者們希望能在將來與日本共產黨建立聯繫，並將日共組織發展到台灣。

——建黨大會以1924年4月25日與6月1日兩個階段進行。在台中，4月25日的大會選出五名執行委員會委員，黨的非正式成立日期則是五一勞動節。至於6月1日的會議，因為殖民當局的監控，其會議未能舉行。不但推遲至6月20日，地點也改至上海，至此黨才正式成立。至1924年7月為止，⁵⁷黨的成員共49人，包括13名工人，其餘則均是知識份子。⁵⁸

——黨的活動招致了日本警方的注意。1924年6月18日⁵⁹舉辦起反對台灣始政紀念日的集會。除了散發傳單，黨的成員還計畫將之秘密送回台灣，然而警方卻得到了這一消息。同時，台灣的日本當局加強控制並增派額外的警力前往上海。這一切顯然對黨造成負面影響，黨員意志不再熱切如昔。據許乃昌所言，赤華黨由於經費與人力短缺而無法持續她的活動。

如果「赤華黨」的出現，可以理解為「台灣赤華會」轉型的結果；平社及《平平旬刊》就應該理解為實現轉型的媒介。在這個過程中，台灣社會主義者終於超出個人活動而轉為組織運動。相較於蔣渭水、連溫卿、范本梁等先驅的努力，上海台灣社會主義者的奮鬥顯然規模更大、軌跡更可追索。只是前述先驅所未曾面臨的問題卻在上海的台灣社會主義者面前出現，最突出的就是組織內外的「A」「B」兼容與對立。

以兼容「A」「B」兩派為宗旨，羅任一等人開闢出一條通向平社及《平平旬刊》的道路。在這條道路裡，羅任一的同志謝晉青首先把眼光投向了殖民地台灣，首先向台灣呼喚革命並批判請願運動。在這條道路上，謝晉青早逝，卻由他的同志羅任一繼續走了下去。並在台灣、朝鮮、日本，以及大陸各省青年

以進一步提供說明。

⁵⁶ 以下敘述分別轉引自 Belogurova (2003: 14-15) 與 K. M. Терпцкий (2005: 43-44)。

⁵⁷ 白安娜的碩士論文寫「至1924年7月2日為止」，郭杰與白安娜的合著則云「至1924年7月7日為止」。分見 Belogurova (2003: 14-15) 與 K. M. Терпцкий (2005: 44)。

⁵⁸ 就這段的敘述而言，郭杰與白安娜合著明顯優於白安娜碩論。白安娜碩論敘述頗為混亂。

⁵⁹ 疑為「6月17日」之誤，但白安娜碩論及郭杰與白安娜合著均如此轉述。

的合作下，最終組織成了平社及《平平旬刊》。「A」「B」合作雖然失敗，但同范本梁所走的純粹「A」派道路相比，平社及《平平旬刊》兼容「A」「B」兩派的嘗試揭示了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形成過程中的另一條道路。

也恰恰是這條道路的準備，以許乃昌為代表的「赤華黨」才得以從中走出台灣史上前所未有的「B」派道路。發生在1924年上半年的「A」「B」合作與分裂就像是種縮影。這一縮影預示了「A」「B」合作的破裂、預示了無政府主義在東亞各地的衰落，同時也預示了共產主義的「B」派道路之興起。羅任一在6月底所發行的《平平旬刊》上譯載了一篇現在看來意味深長的文章。這篇由日本共產主義者田口運藏（1892-1933）所寫的文章說道：⁶⁰

階級意識這句話，算現代社會主義用得最多的術語中之一……現代的爭鬥，是階級意識醒覺了的解放運動，于是以階級組織的必要為前提這一點，是與從前不同的。社會主義者把持階級爭鬥、高唱平民解放（、）所以大眾前鋒的組織，實為必要。沒有組織的爭鬥，難得有什麼效果。主張依爭鬥而解放的我們，知道我們最終的任務，是取階級爭鬥的本源。而表示階級爭鬥最正當的方法，即是政治運動。沒有政黨的政治運動，定為無組織的反逆而終了。我們努力普及聯合運動，同時主張豎起平民的政黨。我們以馬克司主義為立腳點，做解放運動的前鋒，急急使組織的階級意識越見加強！

無論是建立先鋒隊政黨，投身政治、普及聯合運動（AB合作？）、乃至以馬克思主義為宗。羅任一所譯載的這篇文章不但可以視為赤華黨建黨的最佳註腳，也顯示了羅任一以及平社、《平平旬刊》向「B」派的傾斜。不過，赤華黨所揭示的「B」派道路，還同時包括了上海（乃至日本、台灣）的台灣青年組織與社會主義組織的空前整合。必須旁及各組織間的關係才能更全面地考察赤華黨。

⁶⁰ 田口運藏（1924: 1）。

3. 台灣人青年組織的興衰與轉折：以 1924 年為中心

以下分製兩表。「表 4-5」以 1924 年前後各種台灣人青年組織為對象，列出目前所知的所有事件；「表 4-6」則將「表 4-5」簡化，圖示各團體的沿革及活動軌跡。

表 4-5 與表 4-6 顯示赤華黨（或台灣赤華會）與平社均主要活動於上半年，姑且稱之為 A 組。台灣自治協會、台韓同志會，以及中韓台友誼會（這是既有史料所未載者），則居下半年，姑且稱為 B 組。⁶¹

雖然上海台灣青年會（及改組後的台灣同鄉會）是唯一貫穿 1924 年前後的組織，然而 A 組向 B 組過渡的時間點頗相重合於青年會本身所發生的轉折，特別是青年會所經歷的第一次轉折（1924.5.24）。青年會的活動在這次轉折之後由盛轉衰。這次轉折的性質頗值得玩味：（1）第一次轉折之後的青年會，只有一名幹部是舊面孔（林堯坤，又名鵬飛），其餘都是新幹部。然而這個幹部卻是曾經導致青年會陷入財務危機，並已被青年會開除的成員。⁶²（2）第一次轉折之後的青年會決議支持請願運動與文協、並向文協尋求援助。然而第一次轉折之前參

⁶¹ 不過，縱使存在著 A、B 兩組差異，從新組織依次出現的時間順序來看，新組織與前一個組織總在某些時段並存著。隨著新組織的誕生，新組織的各種活動成為整個上海台灣人的運動主體。這一現象同時體現了組織之間的並存與過渡。

⁶² 如表 4-5 所示。4 月初《平平旬刊》正式發行之後，青年會的「會計科」幹部林堯坤（林鵬飛）出了狀況。先是被日本領事館拘留一周，旋即被青年會決議「脫離」。《台灣社會運動史》指林堯坤涉嫌詐欺案被捕，導致青年會因財務問題停頓。5 月 24 日，青年會在蔡孝乾主持之下遷離原地、進行改組，決議暑假之後重整陣容。奇異的是，林堯坤不但再次成為「會計部」的幹部，而且還是唯一的舊幹部。此後直至 11 月 16 日的秋季大會之間，活動紀錄稀疏。然當秋季大會召開時，青年會的核心議程竟然又是改組。此次乾脆放棄以青年學生為對象的組織原則，改組為同鄉會組織。這次會議選出的幹部，只有蔡孝乾是唯一的舊幹部。然而局面似未透過改組而得改善，1925 年 1 月，又有人圖謀復興卻失敗，實際等於青年會的終結，此時連蔡孝乾之名都已不見其中。由此可見，以 5 月 24 日及 11 月 16 日的兩次會議為界，上海台灣青年會經歷了三個階段，不妨分別稱之第一次青年會、第二次青年會，以及第三次青年會；而 A 組所包含的青年會，也當理解為第一次青年會；至於第二、第三次青年會則可歸入 B 組。前兩階段的關鍵人物是林堯坤、後兩階段的關鍵人物則是蔡孝乾。

與平社的成員卻反對請願運動。⁶³

《台灣社會運動史》等史料經常從正面肯定青年會與其他台灣人組織之間的聯繫。但這種聯繫應當將青年會發展中的不同階段考慮進來。如前所述，第一次轉折之前及之後的青年會說不定是完全不同的團體。此外，雖然無法判斷青年會本身的轉折如何聯繫於其他台灣人組織之興衰。但幾乎同時瓦解的平社、赤華黨，以及第一次轉折之前的青年會恐怕有不淺的關係。⁶⁴

許乃昌的報告可以證實上述推測。報告指出，赤華黨統一了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各個分散勢力，包括了平社、上海台灣青年會、台灣改造同志會、曉鐘會、社會問題研究會（即「表 4-7」中標記★號者）。雖然黨的成員並不多，成立初期卻很有行動力，並透過各種台灣的組織進行合法活動。⁶⁵此外，還有一份收藏於共產國際並題名為《日本帝國主義枷鎖下的台灣》（*Formosa under the yoke of Japanese imperialism*）的檔案（寫於 1928.6.31，原文英文）⁶⁶也提到這些組織，「表 4-7」亦列出比較。在人際方面。許乃昌的報告列出了十三名重要的台灣左翼份子及其組織關係，即「表 4-8」。

許乃昌的報告所列舉的組織顯示赤華黨並未統合「台灣自治協會」、「台韓同志會」，以及「中韓台友誼會」（以上即 B 組）等團體。顯然赤華黨只活動於 A 組存在的上半年。至於赤華黨所統合的組織則分居上海、台灣，以及日本。

上海的組織，前面已介紹了平社、上海台灣青年會。「台灣改造同志會」，可能正是黃玉齋（1903-1975）所謂的「台灣同志會」或者曾在中共機關刊物《嚮導週報》週報上出現過的「台灣青年同志會」。⁶⁷但背景尚待核實。

日本的組織是第三章曾提到的「曉鐘會」。從「表 4-8」可知，曾經參與日

⁶³ 青年會決議：（1）重新協商有關機關誌的發行，（2）支持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3）加強與島內文化協會合作、爭取經費，（4）決議在暑假之後重整陣容，（5）接受李山火等人的協助，（6）重擬幹部人選（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89）。

⁶⁴ 從這個推理邏輯加以延伸，則《台灣社會運動史》將台灣自治協會視為「似乎與上海台灣青年會是同心一體的運動團體」的記述（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90, 96），也應當將此處的台灣青年會，理解為第一次轉折之後的台灣青年會。此外，如果林堯坤確實是《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認定的平社成員，青年會所遭遇的轉折就更可能波及平社。至於這一轉折是否可以聯繫於許乃昌所說的無政府主義者破壞活動，則待考察。

⁶⁵ K. M. Терпцкий（2005: 44）。

⁶⁶ K. M. Терпцкий（2005: 266-269）。

⁶⁷ 參見表 4-7: 04 之考證。

本「可思母俱樂部」的黃登洲（1901-?）與呂磐石（1888-?），都是曉鐘會的成員。

台灣的組織則是「社會問題研究會」。由於研究會的成員只有連溫卿、蔣渭水、謝文達（1901-1983）、石煥長（1891?-?），以及過世的山口小靜（1900-1923），而許乃昌又未將連溫卿歸為赤華黨成員，所以「社會問題研究會」與赤華黨發生組織關係的原因值得思索（比方謝文達乃至蔣渭水可能是黨的成員，或者根本就是許乃昌胡說）。至於許乃昌所說的「無產階級政治研究會台灣支部」，則可能與山川均等人所組織的「政治研究會」有關。「政治研究會」是山川均將日共解黨之後，為創立合法「無產政黨」而成立的準備組織，1924年5月才提出組織章程。然而現有史料並無法證實「政治研究會」有台灣支部之存在。⁶⁸是否許乃昌知曉了連溫卿於1924年前往日本拜訪山川均之事，從而據此推測兩人具有某種關係並進而做出「政治研究會」之「台灣支部」的推論？最後，所謂「共產主義同志會」其實也屬不明，然而謝廉清所曾接觸的「今日派」共產黨就曾組織過「中國共產主義同志會」，是否就是這個組織？或者另有所存？此皆尚待考察。

第三節、結論

1. 介入現實

1923年6月至翌年3月，《民鐸》雜誌先後發表由曾經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易家鉞（1898-1972）所寫的〈中國的丘九問題〉與〈中國的丘八問題〉，⁶⁹引發接連論戰與圍剿。⁷⁰「丘八」即「兵」，蔑稱軍閥士兵。由於流亡學生屢掀學潮，⁷¹

⁶⁸ 法政大學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1973）。

⁶⁹ 易家鉞所寫的〈中國的丘九問題〉發表於1923年，〈中國的丘八問題〉發表於1924年3月1日，恰在《平民旬刊》出刊前夕。筆者未能見得上述兩篇全文，只見存目（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1979b: 1012-1013）。

⁷⁰ 1921年，易家鉞曾因疑似匿名寫作〈嗚呼蘇梅〉一文攻擊蘇雪林（即蘇梅），而遭文化界圍剿，胡適更因此刊登啟事嚴責之（陳雪嶺，1998；陸發春，2003: 61）。

有惡意的批評家遂以「丘九」蔑稱學生，謂之恐怖百倍於軍閥的群體。易家鉞認為學生該好好讀書，不應參與政治。許乃昌在平社成立之前即抨擊云：⁷²

易家鉞君呀！政治問題若不根本的解決，怎樣能夠讀真正的書呢？假使能知道「讀書的價值」知道「讀書的方法」知道「讀書的規式」，在這樣暗無天日的社會，能靜靜地讀書？……（學生若是可說是丘九，易先生是丘十，軍閥大概是丘十一罷）……

唉！可笑的沙上的讀書運動！建設在沙漠上的讀書運動！甘為奴隸的讀書運動！

平平同人賀威聖則認為「社會運動是學術運動的初步辦法——學術運動者應該加入，社會運動」。⁷³他在《平平旬刊》發表的十三篇文章中，有六篇直接討論社會運動與學術運動的關係，其中五篇還是大篇幅的連載文章。⁷⁴可見對於平平同人來說，透過「實踐」介入現實乃是急需提上日程的大問題。

雖然來自不同地域的平平同人分別在《平平旬刊》表現了不同的關懷，但他們都關心各地的壓迫形勢。台灣同人也是如此：

首先是如何面對「冢中枯骨的祖國」並行動起來。許乃昌在平社結成之前便撰文指出，「中國真窮困極了，大多數的人們都沒有得著『人的生活』。（這是二三年前張東蓀氏的話）不但沒有得著『人的生活』，而且時時看見些『平民的慘死』。」⁷⁵「在我們這百鬼橫行的萬惡社會，這樣『平民的慘死』已經變成平常的小事。」但是，「我們卻以為這是一張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沉痛的抗議文，用『死』而寫成的深刻的抗議文！」⁷⁵平平同人「任一」亦痛訴，在勞動者流血流汗、身陷貧乏之時，「資產家」的家犬不但穿金戴銀，就連尋狗啟事的獎金也可以與尋人等值，那真是「人不如狗」的時代！⁷⁶

平平同人「蓄」指出，當時的台灣人通常會「把上海當作中國的代表看」。但他認為這種觀點不但「錯誤」，「他們判斷中國的事實都是很皮毛的。他們的眼

⁷¹ 據云此詞起於安徽。當時安徽反對軍閥的鬥爭方熾。平平同人中的安徽作者亦與安徽學潮有關（顧修，1923）。

⁷² 乃昌〔許乃昌〕（1923b）。

⁷³ 威聖〔賀威聖〕（1924g: 8）。

⁷⁴ 這六篇文章即：威聖〔賀威聖〕（1924b, c, d, e, f, g）。

⁷⁵ 乃昌〔許乃昌〕（1924）。

⁷⁶ 任一〔羅任一〕（1924a: 2）。

光看得太近了。他們看中國這樣鬧法就失望，就以為中國無望了。」他指出，「就是在中國的中國人也往往抱悲觀失望的人不少。但是有志於國事者總應該抱樂觀的態度去努力才好！」⁷⁷總之正如張深切所言，「上海的社會現象，無一不使海外回來的僑胞觸目傷心」，「台灣的智識青年，一看這罪惡淵藪，無不扼腕悲痛，恨不能一手擎天，掀起大革命，把一切的罪惡掃除乾淨。」⁷⁸

其次是日本獨霸東亞之下的台灣處境。署名「真一」的同人在《平平旬刊》創刊號寫了一篇寓言故事（題為〈台灣怎麼樣了〉），分別以「華先生」、「女兒」、「倭寇」代表中國、台灣，與日本；並試圖將馬關割台以來的中、台、日關係微縮其中。⁷⁹這樣的寫作手法與同年更早發表於《台灣民報》的〈台娘悲史〉非常接近。〈台娘悲史〉由留學於上海南方大學的施文杞所寫，是台灣本土白話小說的先驅。在〈台娘悲史〉裡，本有女兒「台娘」的「華大」，因「日猛」以「高麗參」為贖而被打輸，台娘被迫嫁給日猛作妾。嫁過去的台娘，日子過得痛苦；想向日猛請願，卻更不得翻身。這一尚稱委婉含蓄的寓言，卻使當期《台灣民報》在台灣遭禁。⁸⁰（內容極為雷同的〈台灣怎麼樣了〉與〈台娘悲史〉，說明「真一」有可能是就讀於南大的「施文杞」。若從南大與「平社」的關係來看，似更能加強此推測。）

其他平平同人也譴責在大陸作亂的台灣人：「日本是深怕台灣人和中國人攜手。所以才利用台灣的廢物無賴漢來在中國作亂，使中國人痛恨台灣人。」台灣無賴子越鬧得兇，即是日本心越利害，而台灣同胞就越無立足之地。這是多麼可惜，可恨！台匪竟作了日本日本侵略中國的第一犧牲品。」⁸¹

最後一項則是如何看待作為既存社會運動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關於這個問題，留待下一章討論。

⁷⁷ 蕾（1924: 5-6）。

⁷⁸ 張深切（1998: 39）。

⁷⁹ 真一（1924a: 9）

⁸⁰ 施文杞（1924: 15-16）。此外，施文杞又稱〈台娘悲史〉為〈台娘痛史〉（淚子〔施文杞〕，1924: 13）。

⁸¹ 花蕾（1924: 3）。

2.從上海走向全東亞

現有史料顯示平社以發行機關刊物《平平旬刊》為主要活動。實際上，《平平旬刊》賦予自己的任務也是文字宣傳。雖然目前尚未見到平社以集體名義進行出版以外的活動之事實，他們卻成功實現刊物的定期發行：以十天發行一次的頻率成為台灣史上首份定期社會主義刊物。又由於刊物積極討論各種時事問題，幾位刊物同人廣泛向外投稿（甚至發生論戰）⁸²並與當時的許多報刊建立起廣告與被廣告的聯繫，⁸³因此刊物的活動力並不弱。也許恰恰是平社及《平平旬刊》的存在，才為隨後出現的幾個具有激進活動的組織，提供了歷史性的準備（比方台韓同志會）。

1924年6月19日，北京政府通令郵局禁止寄遞一系列過激刊物，《平平旬刊》赫然列名其中。⁸⁴由此可見《平平旬刊》所形成的影響力。除北京政府的禁止外，發行僅有三個月的《平平旬刊》也因暑假的來臨而宣布暫時停刊，大概因為他們及他們的讀者多是學生吧。⁸⁵《平平旬刊》的句點畫在北京政府的禁止、學生的暑假，以及前述無政府主義者的破壞之間，這是頗為弔詭的結局。然而平社成員與平平同人並未因此止步。在國共合作引領整個中國激進化的1924年，在當時大陸報刊所激烈爭論的「讀書運動」與「社會運動」的爭論之中，平社成員與平平同人紛紛走出讀書運動的框框而投身社會運動。又由於他們所個別具有的東亞各地域的背景，因此，他們從上海所邁上的征途，更

⁸² 除了最多同人稿件的《覺悟》之外，在《婦女週報》可見到賀威聖為「西洋人釘死奶媽」問題的投書（阿鳳〔賀威聖〕，1924d）。在《中國青年》也可見到同人「王秋心」關於「文學與革命」問題的來信與惲代英的回應（王秋心與代英〔惲代英〕，1924）。

⁸³ 打廣告也是一種政治傾向的表態方式。不但《覺悟》副刊曾為《平平旬刊》打廣告，《平平旬刊》也替《民國日報》作宣傳。《學匯》、《春雷》（這兩者有無政府主義傾向）、《台灣民報》，以及上大學生主辦的《孤星旬刊》，也與《平平旬刊》互有廣告或被廣告的關係。隨著史料的逐漸發掘，這方面的實例相信將會更多。《平平旬刊》的廣告登載可參見表4-3。

⁸⁴ 《上海出版志》編纂委員會（2000: 61-62）。

⁸⁵ 「現因各學校均將放假，讀者在家的住址我們知道的很少，所以暫停兩月。」（平社，1924b: 16）

是以整個東亞為範圍的長征。如果不是上海此時此刻所具有的特殊背景，這種跨地域的連帶顯然難以形成。⁸⁶

如表 4-4 之考證：除了盧劍波、秦滌清這兩個無政府主義者之外，大陸籍的平平同人——如羅任一、賀威聖、華崗、姜冰生、崔曉立、徐介藩、劉一清、王秋心——大多加入了中共（乃至國民黨⁸⁷）。朝鮮與日本的同人則全與共產主義運動有關。羅任一並未久留於中共黨內。實際上，他同時告別了他曾經想聯合的「A」「B」兩派，而與鄧演達（1895-1931）共同創立了第三黨（即現在的中國農工民主黨），幾次在西安策動張學良反蔣。賀威聖則在犧牲在大革命中，成為中共第一個浙江籍烈士。大革命失敗後的華崗，在白色恐怖的威脅中寫下第一本關於大革命的專書：《中國大革命史》，成為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哲學家。劉一清則是上大的積極份子，是五卅慘案隔日的示威總指揮。⁸⁸最有意思的是崔曉立。最後於抗戰中犧牲的他，在國民黨的「杭州軍人監獄」中結識駱耕漠（1908-2008，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而駱耕漠正是在此處認識了台灣人李友邦（1906-1952）。⁸⁹台灣籍的同人，以許乃昌與彭華英最為突出。同樣加入中共的許乃昌於同年前往蘇聯，回國後轉戰日本、上海、台灣三地，並在 1926 至 1927 年間參與「中國改造論爭」，直接領導左翼對東京台灣青年會的奪權並加速台灣社會運動的左右分化。彭華英雖然逐漸淡出左翼，卻也成為文化協會、民眾黨的重要幹部。朝鮮籍的尹滋英，輾轉滿州等地的組織工作之後，前往蘇聯。最後卻因協助季諾維也夫（1883-1936）的嫌疑而遭清洗，處死於 1938 年。2004 年，韓國政府正式頒發「建國勳章」給包括尹滋英在內的左翼獨立運動家，他所獲得之「獨立章」是同次授勳中最高等的獎章。⁹⁰

⁸⁶ 以同樣誕生於上海大學之內的《孤星旬刊》為例，他們也號召推動「亞細亞各民族革命運動」，並把台灣算進必須團結的「弱小民族」之一（劍平，1992: 3-8）。《孤星旬刊》是後來「中國少年勞動黨」的前身。

⁸⁷ 據羅任一親筆寫給國民黨上海黨部的信，他是在 1924 年的上海加入國民黨的（羅豁〔羅任一〕，1925）。

⁸⁸ 黃美真與石源華等（1984: 139-140）。

⁸⁹ 駱耕漠（1981: 55-59; 1982: 15-19）。

⁹⁰ 金喜坤（2005: 432-443）。

3. 平社及「赤華黨」的歷史意義

平社或赤華黨都以學生知識份子為主體。因此這兩個組織（特別是建黨了的後者）恐怕無法視為「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相結合的產物。當時，台灣島內的工人運動才剛剛起步。1923年，台北爆發由印刷製本業的工人所領導的罷工，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不但連溫卿到老都還記得當年的「印刷工第一次罷工」，許乃昌交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也特別強調他們的罷工。據其所言，印刷製本業工人的工會組織罷工之後即遭鎮壓。台灣直至1924年仍無任何工會。許乃昌認為，只有日本的工會組織提供協助，台灣的工會才可能被組織起來。⁹¹

雖然本研究把「台灣赤華會」與「赤華黨」兩者聯繫看待，但兩者之關係以及平社與《平平旬刊》的作用究竟為何？「台灣赤華會」出現於廈門「台匪」亂事方熾之時。她以呼籲兩岸人民相互親睦、攜手奮鬥的姿態，出現於歷史舞台。然此姿態首先僅僅展示為一紙宣言。許乃昌親身參與了「台灣赤華會」與「赤華黨」。但就實踐上看，也許並不存在一個從「台灣赤華『會』」直線發展為「赤華『黨』」(Schikwo-“tow”)的筆直過程。這個過程既斷裂又連續，平社則是其間的媒介與實際的起點。⁹²

赤華黨可謂台灣共產黨之前的台灣共產黨，但她寫在自己的旗幟上的並不只是「赤色」，而還有「中華」(China / Китай)。雖然1928年的〈日本帝國主義

⁹¹ 許乃昌指罷工發生於1923年3月並於6月被鎮壓(Belogurova, 2003: 16, 62-63)，但目前能核實的印刷工罷工卻發生於1923年8月：由於台灣印刷製本業者同盟組合以戰後物價跌落為由，聯合降低旗下各工廠的工資，旋引起印刷工人罷工，直至9月才抗爭勝利(台灣日日新報, 1923h)。連溫卿(1954a: 41)也曾提及罷工，卻誤記時間為1921年。連溫卿指出：(1)印刷工會乃是台灣極少見的、稍有無政府主義色彩——「自由聯合主義」——的組織(連溫卿, 1988: 222)；(2)印刷「工會」不同於「前資本主義」的「工友會」，但當時多數「集在工會之人們都屬於新興茶葉」(連溫卿, 1953b: 73)。大稻埕的茶業發展是連溫卿非常重視的對象(連溫卿, 1953a)。

⁹² 此外，一個名為「赤星會」的組織也曾記於《台灣社會運動史》之中：「尤其是上海，在旅滬同鄉會名義下促使左傾學生組織化的蔡孝乾、陳炎田等與謝廉清共同組織『赤星會』，發行機關報《赤星》，進行共產主義之研究與宣傳。」(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c: 3)「赤星會」是否與「赤華黨」有關？其間關係值得考察。

枷鎖下的台灣〉將赤華黨意譯為「The Red Celestial Party」，但誠如郭杰與白安娜所推測的，此處的「Celestial」當源於「中華帝國（Celestial Empire）」的概念，也還是「中華」。⁹³這些台灣青年，在廈門匪亂之中崛起、在治警事件後激進、在各種既有的台灣青年團體中吸收力量並最終走向組黨。這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形成於 1924 年時的主旋律。雖然這次集結沒有下文，但是：

Pero era tarde ya, y el movimiento
del hombre, mi partido,
es la invencible primavera, dura
bajo la tierra, cuando fue esperanza
y fruto general para más tarde. (Pablo Neruda, "Se reúne el acero")⁹⁴
已經晚了，
人類的運動，我的黨，
一旦變成未來的希望和普遍的結果，
就成了堅實地扎根地下的
不可戰勝的春天。（聶魯達，〈鋼鐵聚匯〉，張廣森譯）

⁹³ K. M. Тертцкий (2005: 62)。

⁹⁴ Neruda (1970: 475)。

第五章、台灣社會主義者的最初論述

引言、連溫卿《台北市志初稿：社會志—政治運動篇》的背後

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一部塵封將近三十年的著作手稿在校勘之後正式發行。這就是以《台灣政治運動史》為名而公開的連溫卿（1895-1957）遺稿：《台北市志初稿：社會志—政治運動篇》。此時距連溫卿謝世已近三十年。由於他死前所面臨的白色恐怖氛圍，使他的這部遺稿只能躺在友人王詩琅（1908-1984）的書櫃中發黃、塵封。當然，如同其他同時代人的回憶錄那般，這部以二〇年代台灣社會運動為主的著作有相當部份依靠了《台灣社會運動史》。但這部著作的價值卻並不因此而降低。因為這部著作不但記載了連溫卿對於各種歷史事件的評價以及他對其他同類型歷史書寫的批判，更可以發現連溫卿運用於寫作之中的許多稀見史料。

1924年的《平平旬刊》就是最顯著的例子。在日本學者於九〇年代復刻《平平旬刊》之前，只有連溫卿可以不依靠《台灣社會運動史》中的《平平旬刊》日譯文而直接引用《平平旬刊》的漢語原文，¹並多次引以證明自己的論述。如果連溫卿當年收集的史料沒在他死後付之一炬，²也許後世研究者的眼界將大為不同。但消失的史料畢竟已然消失，今日的研究者只能從《台北市志初稿：社會志—政治運動篇》這部著作中探查連溫卿當年所擁有的東西。

該書不但透露連溫卿能直接閱讀《平平旬刊》原件，還透露了他被關在台北刑務所時曾收過范本梁 1897-1945 的幾封信。³無論是《平平旬刊》或范本梁，連

¹ 本章後續注釋將提到連溫卿引用《平平旬刊》的問題。

² 彰生（1983）。

³ 連溫卿（1988: 222）。

溫卿與當時各地的社會主義運動者以不同的方式產生聯繫。這些台灣最早的社會主義者之間的運動連帶，因為連溫卿所留下的《台北市志初稿：社會志—政治運動篇》而隱隱浮現著。

這些台灣最早的社會主義者們形成了以台灣為對象的最早的社會主義論述。他們有著不同的理論背景，卻面對著共同的問題；也就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及其所媒介的各種問題：（1）政權：這是請願運動希望日本統治者與之分享的對象、（2）台灣的「資本主義化」：這是請願運動參與者被視為本土資產階級時所不可迴避的背景、（3）治警事件：這是針對請願運動而來的鎮壓。

請願運動所媒介的這些問題使他們成為同時代人，並進而區別於後一波興起的社會主義者。本章將以范本梁、連溫卿，以及平平同人中的許乃昌（1907-1975?）為主軸，說明他們如何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而發展他們的論述。

以下先從范本梁開始。

第一節、范本梁的論述

1. 兩種暴力觀

范本梁是最早針對台灣社會運動進行路線分析並批判的社會主義者。以下文獻則是考察其論述的重要材料：（1）〈新台灣創刊的宣言〉（1923.2前，署名「一洗」，為范本梁⁴）、（2）《謹迎新春明信片》（寫於1924.1.1）、（3）〈新台灣安社宣言〉（寫於1924.2.8；發表於1924.4.15發行的《新台灣》創刊號⁵）、（4）〈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寫於1924.3.5）、（5）〈實行部的宣言〉（1924.12.5，署名「能俠者」⁶）、（6）〈我們的革命

⁴ 新台灣社同人（1923）。

⁵ 目前只見日譯全文，收錄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 6-10）。

⁶ 能俠者（1924: 3-6）。

運動) (1926.3.1, 署名「斯民, 為范本梁⁷)。雖然部分文獻無法確認為范本梁所作, 但為求敘述上的方便, 以下行文仍將以「范本梁的論述」概稱這些與范本梁有關的文獻。讀者當能自行注意這些文獻之異同以及本研究從中所得論斷之有效性。

1923 年的〈新台灣創刊的宣言〉首次將台灣既存社會運動區分為兩支: 一是日本東京新民會所推動的「政治運動」, 二是台灣台北文化協會所推動的「文化運動」。1924 年的〈實行部的宣言〉則區別為「請願運動」以及「文化運動」。就此來說, 前一篇文獻所謂的「政治運動」, 也許正是指新民會所指導並以東京為舞台的議會請願運動。在所有與范本梁有關的文獻中, 發表於治警事件前的〈新台灣創刊的宣言〉稍微肯定文化協會, 發表於該事件之後的〈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則積極肯定請願運動及其參與者。除了以上文獻, 文化協會以及請願運動都只在被批判的意義上才被提及。而〈實行部的宣言〉不但批評請願運動與文化協會, 更進一步批判當時台灣的三種反日主張。⁸總體來看, 無論范本梁如何區別台灣既存社會運動內部的路線, 他基本上否定或趨於否定既存社會運動。

雖然范本梁否定既存社會運動, 但他否定的理由卻也是他所歌頌的手段, 這一既是理由又是手段的矛盾存在就是「暴(力)」。比方〈新台灣安社宣言〉譴責請願運動是「以暴易暴的運動」, 看來暴力是負面的存在。然而〈華北臺灣人大會之宣言〉卻又希望請願運動者「能夠進行激烈的以暴抗暴的大眾運動」, 顯然暴力也不是不能運用。又比方, 雖然最初的〈新台灣創刊的宣言〉反對新民會「挑戰台灣政府」, 看起來似乎不主張暴力。但日後更多的文獻卻號召台灣人民進行「猛烈的世界大眾革命」、「猛烈的暴動性社會革命」、「民眾用暴

⁷ 斯民〔范本梁〕(1926: 2)。

⁸ 〈實行部的宣言〉這篇文章批判了三種反日主張。第一種是「復回祖國」論者, 他們認為「欲救台灣必先救其祖國」, 故紛紛返回祖國。第二種是「得天時」論者, 他們認為日本因得其天時才能占領台灣, 所以要認命; 但若「天公」顯靈, 日本人必被剿滅。第三種則是「準備」論者, 他們對於請願運動、文化運動深表懷疑, 所以主張開戰, 但開戰之前, 得先準備。「能俠者」批判三種論調的基礎在其認為台灣革命必須在台灣進行, 並且應當直接進行。所以, 他批判第一種主張只是逃回祖國當官僚的走狗, 貪生怕死; 批判第二種主張過分迷信、荒誕不經; 最後則批判第三種主張的「準備」將會準備到無了時, 沒有實現的一天。這篇文章的見解極有趣味, 可以參考若林正丈所區分出的三種「台灣解放構想的座標軸」, 分別是「待機派」、「祖國派」、「台灣革命派」(若林正丈, 2007: 172-181)。

力的革命」、「民眾革命」、「直接革命」、「暗殺」、「暴動」以反對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

一方面反對暴力，另一方面卻又肯定暴力。兩種暴力觀因與「國家政權」以不同的媒介發生聯繫而得並存。一方面是肯定以消滅國家政權為目標的暴力，即「以暴抗暴」；另一方面則否定以維護或奪取國家政權的暴力，此則「以暴易暴」。不過范本梁所引入的「以暴易暴」概念有更特別的意義，因為這是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思想資源的一次復現。

2. 中國革命中的「以暴易暴」問題

范本梁論述中屢屢引入的「以暴易暴」概念源於 1907 年。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在那年實現首次集結。以吳稚暉（1865-1953）、李石曾（1881-1973）等一批人在巴黎組織了「《新世紀》書報局」並發行刊物《新世紀》；以劉師培（1884-1919）、張繼（1882-1947）等人為代表的另一批人則在東京發行刊物《天義》並組織「社會主義講習會」。

集結實現之初，東京與巴黎的兩方人馬即先後提出「以暴易暴」概念。⁹東京的「社會主義講習會」與《天義報》的「以暴易暴」明白針對當時主流革命派的排滿民族主義而來（如同盟會）。他們認為，「雖有志之士漸知民族主義，然僅辨民族之異同，不復計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復之說果見實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¹⁰因此必須直接打出「社會主義」的旗幟，把革命從排滿變為排一切政府，進行一場「社會革命」。以「社會革命」超越民族主義，並超越作為「民權主義」如果用三民主義的這一術語來表述的話的「政治革命」。

⁹ 當時在「種族革命」、「共和革命」，以及「無政府主義革命」三者間的爭論，可見璩峨隆（1994: 15, 152-153, 196）對劉師培、李石曾、吳稚暉相關論述之研究以及王汎森（1995: 4-5）通論性的概括。

¹⁰ 張繼與劉光漢（1907）。該廣告亦陸續為《民報》與《新世紀》所轉載。

同年巴黎的《新世紀》創刊號則把「以暴易暴」視為人類「革命思想進化」三階段中的第一階段。¹¹雖然《新世紀》曾有文章表示他們認同「光復之說果見實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的看法，並稱提出上述意見之「社會主義講習會」證明了《新世紀》的「吾道不孤」。¹²但以吳稚暉為代表的《新世紀》同人卻更意圖在無政府主義與同盟會等主流革命派之間進行調和。《新世紀》把反滿共和革命調和進來，這就導致無政府主義的「社會革命」成為「政治革命」之後的事情、成為**兩階段革命論**。¹³

面對主流革命派，「以暴易暴」概念體現了以無政府主義為肇始的社會主義者之疑慮，更體現他們不信任以建立新國家政權為目標的革命運動（無論這個新國家是共和還是專制）。雖然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選擇與主流革命派繼續合作並暫時放下（乃至永久放下，如吳稚暉）他們質疑的「以暴易暴」，然此反而促使「以暴易暴」成為鑒別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差異或流派分殊的指標。¹⁴而堅決反對「以

¹¹ 該刊以表格示之如下（新世紀, 1907a: 2）：

（舊世紀）	易朝改姓 以暴易暴	大封功臣 維新三傑	名利雙收 升官發財
（新舊過渡時代）	傾覆舊政府 建立新政府 此勝於彼	黨魁院紳 甘言運動	犧牲利祿 飢渴名譽 銅像峨峨
（新世紀）	掃除一切政府 純正自由	廢官止祿 無有私利	素名絕譽 專尚公理

¹² 新世紀（1907b: 3）。

¹³ 就像《新世紀》創刊時所區分的三階段，吳稚暉也將革命分為三階段：「民族革命」、「共和革命」、「無政府革命」，實際上是企圖調和三者：「由民族革命而進為共和革命，由共和革命而進為無政府革命，必愈進而推倒滿州政府之責任愈堅。」（四無〔吳稚暉〕, 1908）也因為吳稚暉的這種調和見解，使得後人得以任意解釋。比方蔣介石就認為世人把吳稚暉當成無政府主義者是「誤解」，蔣引用上面那段話之後說，吳稚暉所謂的「無政府」應當理解為吳自己所說的「大同」，也就是「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因此「決〔絕〕非如一般無政府主義者建立其烏托邦的思想之所謂。」然後蔣又引證了吳稚暉許多言論，以期「解除若干人對於先生思想的疑點。」（蔣中正, 1964: 1-7）另有學者指出：吳稚暉的「三期革命說」是康有為公羊三世說的翻版（曹世鉉, 2003: 68）。

¹⁴ 雖然無政府主義運動中的「以暴易暴」論述並不必然需要出現「以暴易暴」這個術語，但從這個術語在什麼語境或脈絡下被使用，對於理解運動本身也有幫助。可參見以下幾本重要的史料集所收的文獻：①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1982）；②葛懋春與蔣俊等（1984a）；③葛懋春與蔣俊等（1984b）；④高軍（1984）。——**通論性的論述可見**：民〔褚民誼〕,〈普及革命〉（1907: ②）, 182；凌霜〔黃凌霜〕,〈非是非篇〉（1918: ②）, 358；兼生,〈克魯泡特金的道德觀〉（1919: ④）, 307；菊化,〈我們為什麼要革命?〉（1922: ①）, 295-298；三泊,〈我

暴易暴」的劉師復（1884-1915）——他屬於吳稚暉、張繼之後的第二代無政府主義者——就是最可稱為基本教義派的一名代表。

3. 將「以暴易暴」概念引入台灣革命

「以暴易暴」在日後成為屢被引用的思想資源，引用者也包括范本梁。范本梁在〈我們的革命運動〉中定義「以暴易暴的革命運動」為「私圖自家的權威底不徹底的政治革命的運動」，從而批判了那些被認為意圖分享政權的「普選運動，女子參政運動，又如我台灣的民選議會請願運動。」如果考慮到范本梁所反對的新民會正是請願運動的母體，就不能排除范本梁可能是在「以暴易暴」的意義上批判新民會的「挑戰台灣政府」之舉。同理，之所以范本梁還曾稍微肯定文化協會的「文化運動」，也許正因這個訴諸於「文化」的運動不具有「以暴易暴」的性質。

范本梁從反對國家政權出發而批判了所謂的「愛國主義」，而「愛國主義」與所謂「祖國主義」在當時的無政府主義文獻以及范本梁的論述中均同義。范本梁在〈我們的革命運動〉中把「愛國主義」批判為以「率獸食人而使人類同胞互相爭鬥互相殘殺的那個侵略主義」。並批判那些誤解弱小民族（眾）革命運

的社會革命的意見〉（1922：③），639；華林，〈社會革命底目的和方法〉（1923：①），410；非子〔衛惠林〕，〈從自治出發的「革命運動」〉（1923：③），668；哀鳴，〈答懷疑無政府主義者〉（1923：③），695。**批評排滿革命為「以暴易暴」**：自然生〔張繼〕，〈無政府主義及無政府黨之精神〉（1903：②），32。**指控共和革命為「以暴易暴」**：申叔〔劉師培〕，〈亞洲現勢論〉（1907：②），131；震〔何震〕、申叔，〈論種族革命與無政府革命之得失〉（1907：①），70、77。**指控共產黨「以暴易暴」**：區聲白，〈區聲白致陳獨秀的三封信〉（1921：③），579；區聲白，〈中國目前的政治問題如何解決〉（1922：③），634；玄天，〈往鄉村去〉（1922：③），641；區聲白，〈答陳獨秀君的疑問〉（1923：①），348；青年，〈工團主義與無政府共產主義〉（1923：①），429；血鐘，〈騙人的勞工專政〉（1923：①），450。**認為討袁戰爭應從「以暴易暴」上升至「消滅政府」**：師復〔劉師復〕，〈答英白〉（1914：②），292。**認為弱小民族的「民族革命」或「祖國主義」都是「以暴易暴」**：柳絮，〈主張組織東亞無政府主義者大聯盟〉（1926：③），717；震天〔畢修勺〕〈震天復格拉佛的信〉（1927：③），732。**批判國民黨奪得政權只是「以暴易暴」**：矛突〔盧劍波〕，〈時事摭評〉（1927：③），806。**徹底否定以往反對「以暴易暴」的態度，主張以暴力對付日本侵略者，「以戰爭去消滅戰爭！」**：黎民，〈無政府主義與中國抗戰〉（1939：③），891。

動為「愛國主義」運動的觀點。¹⁵范本梁直挑「愛國」而提出的批判意味著弱小民族（眾）的革命不以建立新國家為目標，即便這個國家是共和政體。

由於范本梁拒絕了任何形式的國家政權，便排除了**革命以兩階段進行**的可能。但〈我們的革命運動〉並沒有因此而把革命視為直達車。他認為弱小民族（眾）的革命運動應該是一個與「純粹的社會大革命的運動」有所區別，卻又能聯繫於「最痛快最爽絕的社會大革命——全世界的平民大革命」的「**準備運動**」。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只有弱小民族（眾）與「第四階級」（無產階級）聯手才能完成。¹⁶從而進行「社會大革命」，「來同申正義與人道於四海；來共謀和平與幸福於人群；而來成就一個真平等真自由真博愛的新社會——無政府共產的社會——，而來實現一個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四海皆兄弟五洲同一家的新世界——大同世界——。」

第二節、連溫卿與許乃昌的論述

1. 范本梁：「現實存在」與「客觀趨勢」相對立

前述范本梁的論述中，「自然的趨勢」是一個與「暴（力）」問題同樣時常出現的概念。范本梁亦輒以「自然的趨勢」作為人類所應順應的規律。然而范本梁論述中的「自然的趨勢」並非一元且唯一的存在。因為他的論述中還存在著

¹⁵ 「自稱社會大革命家的人們，誤認我們弱小民眾的革命運動——台灣的革命運動，韓國的獨立運動，安南的反抗運動，印度的自治運動——以為是局（侷）束於愛國主義的運動而所蔑視的偏見；又是一般怕死的狗鼠之輩（政府的爪牙，資本家的走狗），讀過新台灣安社能俠者（實行部）的宣言，所大驚小怪而發出來的一個呼救的咆哮；但是我們的運動是否愛國運動？是否率獸食人而使人類同胞互相爭鬥互相殘殺的那個侵略主義的愛國運動？這是不容我們重新再說的。」（斯民〔范本梁〕，1926: 1-2）

¹⁶ 雖然范本梁把弱小民族之間的聯合視為「社會大革命」的準備，但這不意味著范本梁有民族主義傾向。實際上任何與民族主義有關的訴求在新台灣安社的文獻中呈現為空白。與民族主義所呈現的空白相反，「民眾」是出現最頻繁的關鍵詞。幾乎只存在「民眾」、「民眾革命」，而少有「民族」、「台灣民族」。甚至在「弱小民族」這一慣用語外，還使用了「弱小民眾」一詞。

各種敵對於「自然的趨勢」的現實存在。那些被認為以「暴(力)」為本質的國家政權與請願運動等事物，正包括在這些有時被形容為「不自然」的現實存在中。因此范本梁眼中的「自然」與「不自然」不屬於同一個基準。「自然」是種「客觀趨勢」，而「不自然」則是種「現實存在」。世間一切的不公義就產生在此二者的矛盾之間。¹⁷因此范本梁的論述實隱含著內在矛盾：雖然目的在於復歸「自然的趨勢」，然而手段竟可不惜運用不自然的存在——比方「暴力」（無論是群眾性的「平民大革命」或小眾性的暗殺）、「猛烈的暴動性社會革命」。手段與目的的矛盾，在此表露無遺。這也是當時無政府主義所共有的問題。但就其論述把舊社會與新社會的差別集中在政權可否消滅而言，則必須考慮：台灣所存在的強有力的殖民政權以及一個反殖民政權卻又希望分享政權的運動，是否可能成為范本梁通向無政府主義的時代背景。

2. 連溫卿：把「現實存在」視為「客觀趨勢」的派生物

然而「客觀趨勢」與「現實存在」對於連溫卿而言則無自然與否之別。因為他把「現實存在」視為「客觀趨勢」的派生物，這是范本梁所沒有的見解。把握「客觀趨勢」成為理解世界的關鍵。連溫卿所關心的「客觀趨勢」大致可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跨人類歷史各階段的「客觀趨勢」。連溫卿留下的大量人類學或民族學著作，也許正是為了探尋這一「客觀趨勢」如何派生各種現象而產生的作品（連溫卿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台灣人類學的先驅之一¹⁸）。其中，連溫卿

¹⁷ 關於這種二元性的對立，可比較楊芳燕（2004）關於政治秩序與自然秩序的討論。

¹⁸ 在台灣，連溫卿曾去原住民部落進行考察。在田野調查中，他特別注意男女之間的結合形式。所謂「接竹篙」、「牽手」、「灣妻」、「鮮妻」之類的概念，就是他的調查成果。「接竹篙」係指兄死之後，弟與其嫂結婚的形式；「牽手」則是早期漢人男性移民與原住民女性臨時的性結合，不是正式的婚姻形式。「灣妻」、「鮮妻」的意義同於「牽手」，但卻是日本殖民壓迫台灣與朝鮮的狀況下，日本男性與殖民地女性之間臨時的性結合：「稱結婚後的蕃女為『牽手』，其意義也不過和『灣妻』『鮮妻』的一樣，僅限於在台灣同棲，若一旦男子離開台灣，那自然二人的共棲生活就告消滅，以後二人的行動全屬自由。就這意義而言，牽手一句話是表示男子的專制，由經濟上欲榨取他人的利益，純然由自己的慾望出發，方便索出的。」（越無〔連溫卿〕，1924：第六十八、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回）連溫卿特別重視「灣妻」、「鮮妻」的問題，屢屢在演講或文章中提及（見表 8-2）。在台

曾以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區分了兩種分別在「動物界」與「人的社會」起作用的「客觀趨勢」。即便他的理解不一定正確，他對「客觀趨勢」的重視卻得以體現：¹⁹

「生存競爭」一句話是生物學者達爾文創作所使用的，盡人皆知，又盡人無批評心而使用著。然動物界的生存競爭是全然依靠動物自己的力量，已決定在動物界的優劣，一旦遭遇比自己強的動物即被噬去，從此永遠由生物界消滅了。若於人的社會雖說是生存競爭，而競爭的工具和那動物的不同，動物是以力，人的社會是以金錢，沒有金錢，生活上必須的食物不能到手，那末，對自己的生活是不能維持，所以說此等人是社會的落伍者，生存競爭的劣敗者。但這點和動物界的劣敗者的結果也不相同，動物界是永遠斷絕自己的生命，人卻不是那樣，猶依然繼續自己的生命，不過那時候生活程度較常人稍劣而已，若人們以力為生存競爭的工具，現在社會上的生存競爭的優勝者未必個個具有常人的力量。所以班捏科古的「社會主義和進化論」一書主張動物界的進化，可拿達爾文主義去解剖說明，然在人的社會只可以拿馬克司主義才能說明社會的進化，這是狠〔很〕有理。²⁰

第二個層次則是特定歷史階段的「客觀趨勢」，特別是「資本主義化」的趨勢。社會的「資本主義化」產生了他所關心的幾種派生物，比方新興社會現象。1924年4月至5月間連溫卿的首次日本之行，是他力圖把新興社會現象視為「客觀趨勢」派生物的一次「田野調查」。他當時的心得都具體載於題為〈蠹魚的旅行日記〉的筆記之中。由於他把新興社會現象作為研究的對象，所以他的論述始終具有很強的感性基礎。²¹

灣猶然身陷日本殖民統治的當下，也許正是這樣的切入點，才最能激發殖民地人民之民族意識。當連溫卿訪問日本，調查研究的態度仍繼續實事求是地保持著。比方他在上野公園遊覽時，發現日本古代的生殖器崇拜，竟以佛像的形式殘留下來（見表 8-2）。

¹⁹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七十五、七十六回）。

²⁰ 後來連溫卿將此段抄錄改寫於〈不良少年少女研究〉一文之時，將段落中的「然在人的社會只可以拿馬克司主義才能說明社會的進化」刪去，將其段落改寫如下：「現在社會上的生存競爭的優勝者，未必個個具有常人的力量。所以班捏科古主張動物界的進化可拿達爾文主義去說明，然對於現在社會，那一定是不能的。這樣主張實在不錯。」（連溫卿，1925b：12）

²¹ 詳見本研究最後一章的介紹。

但「資本主義化」更重要的派生物卻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特別是隊伍逐漸擴大的「無產階級」。連溫卿指出：資產階級內部的階級分化將使「一般小資本家」破產並補充於無產階級的隊伍中。雖然「進化是社會發達的生命，社會上沒有進化，就沒有發達」，然而「社會愈發達，貧人愈多」，在「資本主義化的社會」裡，不但「把一般小資本家盡推落在無產者的階級中，驅逐他們在工場內去作工」，還進而「被推出工場外，又著盡在路頭找工作。」²²

在台灣，「飛躍」般發展的「資本主義化」將使社會運動轉變為「無產階級運動」。這導致「只是根據這〔資產〕階級要求參加政治」的請願運動成為落後於群眾的運動；連溫卿以「自由主義」名之：²³

從來設有實力〔本來沒有實力〕的台灣人在經濟上已占得確實的地步，那自然於政治上〔，〕台灣人也要獲得政治權，以擁護自己的地位，這是明明白白的道理。所以現在台灣的政治運動，只是根據這階級要求參加政治而已，不是根據無產階級的運動，以求解放他人即是解放自己。現在的只是要解放他人——即所謂〔「〕解放同胞，非自己獲得政權立在議政壇上，〔否則〕同胞一定是不能解放〔「〕的自由主義範圍內〔，〕去表現一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但不知後進地方的資本主義化是飛躍的，不是照先進國的順序去進化，所以他們的活動，若不再擴張其視線，那運動的性質漸與現在的社會的組織相乖離，恐怕未達目的〔，〕而那「台灣議會設置請願」的口號已去輿論的後援〔太遠〕也未可知，這現象不是可以拿在中國留學的人們皆不參加的事實來說是那〔樣〕的萌兆嗎？然〔而另〕一方面〔，〕那運動又〔具有〕能夠極急速轉換為無產階級運動的可能性，這〔就〕是前〔面所〕說後進地方的資本主義化是加速度飛躍的緣故啦。

但當連溫卿把「無產階級運動」視為「資本主義化」新的派生物時，意味著作為「客觀趨勢」的資本主義化本身乃是有限且非永恆的存在。因為「資本主義化」將在自身的發展中產生自己的對立面。

²² 越無（連溫卿）（1924：第十八回）。

²³ 越無（連溫卿）（1924：第四十回）。

3. 許乃昌的論述：以請願運動發生的變局為中心

連溫卿的論述可以歸結為「『客觀趨勢』(資本主義化)將派生出自己的對立面(無產階級及其運動)」。²⁴但對 1923 至 1924 年間全力發展其論述的許乃昌來說,他更強調作為「客觀趨勢」的「資本主義化」本身也是被派生的結果;即:外來的日本資本影響了台灣的「資本主義化」,而「資本主義化」影響了台灣的本土資本的發生。然而 1923 年底爆發的「治警事件」帶來了重大轉折,許乃昌改變了他對「資本主義化」及其所媒介的兩種資本的認識,並因此而豐富了「『客觀趨勢』將派生出自己的對立面」的見解。

許乃昌在治警事件之前的觀點是這樣的。他在 1923 年發表的〈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中指出,日本資本主義推進了台灣的「資本主義化」,進而派生出本土資本。請願運動參與者就是作為階級的本土資本,即本土資產階級。本土資本將與日本資本「妥協」乃至「共同強化對於台灣無產階級的剝削」。「如果台灣議會真的開設了,也不會是全台灣人的解放,而只是特殊階級(資產階級)的解放。」因此革命的希望落在「第四階級」(即無產階級)身上。²⁴1924 年的連溫卿也有相同見解:「台灣人的富人和日本的富人,由生活的經濟上相同,沒有民族的排斥觀念,反卻結合起來,這是社會進化上必然到達的地點,所以社會上有兩階級,也是從此分出來的,我們為台灣奔走,是不可不從此見地去做。」²⁵

25

雖然前面提到的范本梁、連溫卿,以及許乃昌都批判請願運動,甚至引入「資本主義」諸範疇以強化批判。但 1923 年底爆發的治警事件卻使 1924 年登上歷史舞台的平平同人產生折衷意見。不過這種折衷也不是連溫卿所說的一些人支持請願運動,另一些人則反對。²⁶而是一方面批判請願運動,另一方面則

²⁴ 秀湖生(許乃昌)(1923b: 46)。

²⁵ 越無(連溫卿)(1924: 第十五回)。

²⁶ 連溫卿的〈台灣文化的特質〉一文曾以《平平旬刊》中的〈自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沫雲(許

同情請願運動者。²⁷平平同人「真一」正是這種既批判又同情的代表。他說：「諸位不可誤解以台灣議會就是他們的目的，這種請願也不過是我們戰鬥的一種方法，他們的腦中還有更理想的目的，他們的背後還更有價值的運動！」²⁸甚至暗示了他對醫學出身之蔣渭水（1890-1931）等人的佩服：²⁹

……好的——忠君愛國——沒有學到，反而把那些反叛行為，什麼民族自決，什麼社會運動等等壞名詞都學了回台，竟暗暗地想實行起來。最妙的是台北醫學明明一個只講學問不管政治的學府，而裡面的學生和已畢業的醫生偏偏要和政府麻煩。

但他仍說：³⁰

至於台灣的自治，只能說是總督治，警察治，與平民幾乎沒有關係；請願更是徒取煩惱，長侵掠者的野心；現在只剩了一條路，就是直切了當的對帝國主義宣戰！

同是平平同人的許乃昌也改變了他對請願運動者以及本土資本的看法。1924年，許乃昌發表於治警事件後的〈自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一文仍然認為本土資本是台灣「資本主義化」所派生的新生事物，但本土資本不會從「資

乃昌），1924b: 6）與〈台灣怎麼樣了？〉（真一，1924a: 9-11）為例，謂前者反對議會請願運動，後者「則有相反的意見」（連溫卿，1954c: 129）。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文化的特質〉與連溫卿同時期所撰寫的《台灣政治運動史》第二章有大量的重複，包括他引用許乃昌與「真一」的文章的部分以及評論。然而，「則有相反的意見」一句在《台灣政治運動史》中則為「提出如下的意見」（連溫卿，1988: 86, 356）。〈台灣文化的特質〉一文也收入《台灣政治運動史》一書，這裡討論的段落可並見 356 頁。此外，連溫卿所引用的〈自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文字，正是中文原文，甚至還摘引了一篇《台灣社會運動史》所沒有錄入的〈台灣怎麼樣了〉（署名「真一」）一文。因此當時的連溫卿可能正是根據《平平旬刊》原件而寫作（連溫卿，1988: 85-86, 355）。

²⁷ 在平平同人中反對請願運動最烈者並非台灣人。來自浙江的賀威聖認為：「議會是什麼東西？不過是特權階級所豢養的走狗的狗窠而已，法律是走狗所訂的。當然是壓迫平民的一種工具。」「台灣獨立運動者的一番精神，我們是很尊敬的，然而他們不向人的道路走——奮鬥——偏爬到狗窠裡去磕頭，頭是磕響了，可是人也被狗咬著了。」這就叫做上了狗法的當！」（阿鳳〔賀威聖〕，1924a: 16）賀威聖並指出，「什麼叫做代表會議，就是軍閥為權利和地盤等分配之不均，恐釀成鷸蚌共傷的局面，因此互派代表平分贓物的一幕把戲。」（阿鳳〔賀威聖〕，1924b: 8）賀威聖對於代議制度的不信任也可能是他看待台灣請願運動與日本資產階級之利害關係的切入點。

²⁸ 真一（1924a: 11）。連溫卿對於「他們的腦中還有更理想的目的，他們的背後還更有價值的運動！」這句話有很特別的解釋。連溫卿（1988: 86）認為「這些思想正是代表日本資產階級利害之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所憂慮的思想」，也就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思想。

²⁹ 貞（1924: 4）。

³⁰ 真一（1924c: 3）。另可參考真一（1924d: 2-4）。

本主義化」中得利，因為「資本主義化」的主流是日本資本，它將壓制本土資本的發展。而請願運動就是作為一個階級的本土資本（本土資產階級）之抵抗：³¹

到了近來因受日本資本主義侵掠入的結果，從來的宗法社會便起了階級的分化，而必然地產出新的資產階級來了，而這個新興的台灣資產階級和那獨占台灣經濟利益的日本資本主義，利益完全相反，因此台灣資產階級隨其本身的發展，也就漸漸露出些反抗日本的統治的面目來了……可是台灣資產階級還是在那舉步的幼雅〔稚〕時代，所以也就不能像印度韓國等處作比較上革命的行動，而只在於所謂「台灣議會」的參政權運動戀戀不捨而已。

第三節、結論

1. 范本梁與無政府共產主義之關係

在范本梁的論述中，請願運動屬於圍繞著「國家政權」而產生的「現實存在」，並因此而對立於「客觀趨勢」（「自然的趨勢」）。連溫卿則把「現實存在」視為「客觀趨勢」（資本主義化）的派生物。他認為請願運動作為舊的派生物將落後而終至消亡，「客觀趨勢」將產生作為對立面的新派生物：「無產階級運動」。連溫卿的論述暗示了作為「客觀趨勢」的「資本主義化」僅是有限的存在。許乃昌的論述則把外來的日本資本與台灣的本土資本之間的關係引入對於「資本主義化」的考察。日本資本促成台灣的「資本主義化」，而本土資本則應此而生，兩種資本之間必然共謀，因此體現本土資本利益的請願運動不過是分贓運動。治警事件之後，平平同人產生一種既反對請願運動，又同情參與者的態度。作為平平同人的許乃昌也有同樣見解。因此他重新詮釋其早先的看法而認為：日本

³¹ 沫雲〔許乃昌〕（1924b: 6）。

資本將壓制本土資本的成長，兩者不但無法共謀，反而互為對立面。治警事件成為實證。

現象上看，范本梁所主張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及其周邊概念（如「社會大革命」）都是克魯泡特金（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 1842-1921）的術語。³²就本質而言，范本梁的論述也確實是在克魯泡特金所開闢的道路下前進。這點可從范本梁論述中呈現兩立狀態的「自然」之「客觀趨勢」與「不自然」之「現實存在」來說明。克魯泡特金試圖對於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現象進行歷史的觀察，並歸納、演繹出人類進化的客觀趨勢。克魯泡特金稱此方法是一個與「唯物辯證法」（dialectical materialism）相對立的「歸納演繹法」（inductive-deductive method），由此得出的客觀趨勢則是「互助」（mutual aid）。³³在他的方法之下，必然性與偶然性是對立的存在。凡是被他歸於「客觀趨勢」之內的都屬必然，諸如國家政權之類歸不進去的存在則屬偶然。雖然他不排斥偶爾解釋一下這些偶然性，但他不認為這些偶然性也是某種「客觀趨勢」的必然派生物，因為他只認可他自己所歸納演繹的「客觀趨勢」。「科學的歸納，與宗教的訓誡完全不同，它突然開闢出人類完善與改良的大道。」「如果你應用自然科學家的嚴正的歸納法去研究社會問題，你就會就會跑到我們的隊伍裡面來，你會和我們一樣為社會革命而努力工作了。」³⁴

³² 王遠義（2004: 418）指出，由於「無政府共產主義」完全不考慮蒲魯東（Proudhon, 1809-1865）、巴枯寧（Бакунин, 1814-1876）所在意的勞動報酬公正、公平性，取消整個工資觀念與價格系統而被稱為無政府的「共產主義」。至於通向無政府共產主義社會的方法，就是透過范本梁所接受了的「社會大革命」概念。

³³ 關於這兩種方法的差別可見克魯泡特金（1977: 63-65）。相關論述並可參見收錄於克魯泡特金《麵包與自由》中的論述以及巴金（1904-2005）、Rudolf Rocker（1873-1958）所寫的序。巴金認為克魯泡特金「依著科學方法（自然科學的歸納的演繹法）」而證明了克氏自己的經濟理論（克氏稱「社會生理學」）。Rocker 並認為辯證法對於十九世紀以來的種種學科成就毫無貢獻，反而有賴於「歸納的演繹法」的協助。因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當「我們從草花移到人類，從海狸的村落移到人類的都市時，我們，實在沒有理由來變更我們的研究方法。」並認為克氏的方法是「專門根據著社會生活的已有事實以及對於過去與現在各種社會努力之經濟觀察來立論。他開始便蒐集那些暗示著一個新的文化時代就要到來的兆候，然後將組織上本質的事物與偶然的事物分開，以便可以在這樣得來的基礎上面引出一般的結論。這個方法便必然使他與近代經濟學的規制立即發生衝突，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克魯泡特金, 1981: iv, xlviiii）。

³⁴ 克魯泡特金（1984: 21, 42）。克魯泡特金的這段話，也許可以用王遠義（2004: 419）的疑問來加以思考：「Kropotkin 的學說思想，常常啟人疑問：他的進化思想，是不是一種決定論？在他的思想體系中，是否正視武裝的政治鬥爭？對於這兩個問題，我們之所以不能予以非黑即白的回答之故，正因為 Kropotkin 的思想體系中，既縮合了決定論與意志（will）兩相矛盾的要素，復將革

范本梁的革命理論基本反映了克魯泡特金的上述理論特點，但僅初具體系而且內容不脫原則性表述。可是，在整個一九二〇年代的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史中，除了組建於 1929 年的「台灣勞動互助社」曾留下抄錄自「柳絮」（柳樹人，1905-1980）所著《弱小民族的革命方略》的精密化革命理論外，³⁵其餘大大小小的台灣無政府主義組織都未能留下比范本梁更具體系的理論。

早期中國無政府主義者范天均曾指出，克魯泡特金及其無政府共產主義對於中國的意義遠高於其他任何無政府主義；但他也說，「研究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問題，不能以外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學說來理解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³⁶從范天均這一提示出發，也許還有深入討論范本梁思想的可能。

2. 客觀趨勢與現實存在之關係

與范本梁的論述相比，積極從「客觀趨勢」（資本主義化）去解釋各種「現實存在」的連溫卿顯示了另一種解釋必然性與偶然性之聯繫的觀點。這種觀點承認各種偶然性都有必然性，問題只在於人類可以追索必然性——從現象上的偶然向著本質上的必然——到什麼程度，³⁷以及人類的實踐可以在這個認識過程中起到什麼樣子的作用。其實馬克思主義對於世界的基本信念就是如此。舉例來說，雖然馬克思《資本論》所揭示的客觀趨勢基本適用於該書所研究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他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³⁸，但不意味著該書所沒有解釋的其他偶然現象為不能解釋或不必要解釋。意圖以《自然辯證法》對

命破舊與平民教育，同列在改造的議程上。」

³⁵ 《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轉引的台灣勞動互助社秘密文書，完全從柳樹人所寫的《弱小民族的革命方略》抄錄而來。分別是原書的「C. 殖民地革命黨不應該與統治國的勞動政黨連絡」，「E. 革命的組織」，以及「F. 組織的原則」、「G. 戰略」（柳絮〔柳樹人〕，1929: 20-30, 36-51）。

³⁶ 〈訪問范天均先生的紀錄〉，收錄於葛懋春與蔣俊等（1984b: 1047）。

³⁷ 馬克思（1975b: 923）：「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餘的了。」

³⁸ 馬克思（1975a: 8）。

於自然界提出通盤哲學解釋的恩格斯就是這種信念的最佳（乃至極致）體現。³⁹雖然這種作法似也最遭批評。

無論連溫卿對於馬克思主義接受多少或拒絕多少，當他把「現實存在」視為「客觀趨勢」的派生物，並把「資本主義化」視為最重要的「客觀趨勢」時——如果用德里克的見解來表述——連溫卿至少在與「意識型態」相對的「革命論述」層次上⁴⁰體現馬克思主義色彩。連溫卿也因此出現了范本梁所沒有的問題意識，而這個問題意識是他與許乃昌所共享的。即，他們的論述都著意於各種運動得以派生的原因，以及何種運動能相對於某種存在而派生為對立面。

連溫卿與許乃昌都把運動派生的原因歸於台灣的資本主義化，但 1923 年的許乃昌與 1924 年的連溫卿強調無產階級運動將成為日本資本與本土資本的對立面，1924 年的許乃昌則強調本土資本也是日本資本的對立面，一個幼稚的對立面。問題就在這裡：既然存在著兩種對立面，這兩種對立面能否重合以形成一個更大的對立面？比方一邊是日本資本，另一邊則是本土資本及無產階級？此外，由於 1923 年〈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指出日本資本與本地資本之間必然共謀，而兩種資本又以「資本主義化」作為彼此派生或被派生的媒介。那末，當 1924 年〈自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進而提出兩者也有對立之可能時，如果「資本主義化」仍是媒介，這個媒介又當如何使兩者既共謀且對立？或者，媒介已不是或不只是「資本主義化」，比方民族之間的對立超越了「資本主義化」而成為新的媒介或主要的媒介。如果這種超越是可能的，那末本土資

³⁹ 恩格斯（1984: 92-95）指出：「形而上學所陷入的另一種對立，是偶然性與必然性的對立。」一般的人們「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當做永遠相互排斥的兩個規定。一個事物、一個關係，一個過程要麼是偶然的，要麼就是必然的，但不能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所以二者被一般人認為相並地存在於自然界中，關鍵只在於不要混淆二者。這導致了兩種看法。一種看法認為：「人們解釋為必然的東西就是科學上唯一值得注意的東西，而偶然的東西則是對科學無足輕重的。」這就是說：凡是人們能夠納入規律、因而是人們知道的東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人們不能納入規律，因而是人們不知道的東西，都是無足輕重的，都是能夠不予理睬的。這樣一來，一切科學都完結了，因為科學正是要研究我們所不知道的東西。」「把解釋不了的東西產生的原因，是叫做偶然性或者是叫做上帝，對事情本身來說是完全無關緊要的。這兩個叫法所表示的只是一個意思：我不知道，因此它不屬於科學的範圍。在必然的聯繫失效的地方，科學便完結了。」另一種看法則認為所有的事情都是必然的，但如此一來就使得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平列於同一等級，從而實際上把所有必然性降低為偶然性。解決了兩種看法之矛盾的是黑格爾。黑格爾將偶然視為必然的，同時也將必然視為偶然的。

⁴⁰ Dirlik（2006: 36-38）。

本是否可能是無產階級的盟友？

當年形成「以暴易暴」概念的歷史情境因為這一問題而得到再現。只是當年的無政府主義者面對著以反滿共和革命為訴求的主流革命派，而以范本梁、連溫卿，及許乃昌為代表的台灣社會主義者卻面對著請願運動、一個甚至被視為反映本土資產階級之反抗的運動。當現實發生劇變，范本梁與連溫卿仍以其所把握的既有理論資源與原則考察問題，於是從批判請願運動走向繼續批判請願運動。但同情請願運動參與者的許乃昌卻能重新塑造一個能夠解釋新現實並介入新現實的論述。如下一章所述，許乃昌論述的發展在相當的時期內反映著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論述逐步通向高峰的過程，並為外來的論述創造引入或被介入的空間（就像范本梁引入「以暴易暴」的概念那樣）。

3. 餘話

如果回過頭來看連溫卿在《台北市志初稿：社會志—政治運動篇》所摘引的反請願運動論述，將發現連溫卿非常「精準」地連續引用許乃昌〈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沙上的文化運動〉，以及〈自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三篇文章。雖然他並未指出這些文章都是同一人所寫，也可能他確實不知道是同一人所寫，但他的引用卻體現了許乃昌論述的代表性。⁴¹而在連溫卿所沒能引用到的許乃昌著作中，許乃昌的新見解登上了歷史舞台。此即許乃昌在 1924 年底發表於《新青年》季刊的〈黎明期的台灣〉。

⁴¹ 連溫卿（1988: 85-86, 355）。特別是〈沙上的文化運動〉與〈自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的筆名均同，但連溫卿卻忽略而不全寫出來。似乎刻意讓這三篇文章給人看起來像是三個人的著作。或許這是五〇年代以後的環境之下所不得不為的。

第六章、「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 與革命性質的抉擇 ——兩岸社會主義者的首次對話

引言、從彰化通向莫斯科的道路

就在平社以及赤華黨瓦解之後，許乃昌（1907-1975?）從上海回到了他的故鄉，彰化。

許乃昌回到台灣之時正值暑假。當時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恰好正組團返台進行巡迴文化演講，剛好輪到許乃昌的故鄉彰化。於是他們便選擇了「彰化座」戲院進行活動，許乃昌也參與了這一輪的演講。7月23日那晚，許乃昌以「社會改造之一考察」為題發表講演，話沒說完，就遭到了臨監警官中止。¹

許乃昌在彰化被中止的演講不過是告別故鄉前的一個註腳。不久之後，許乃昌便在中共推薦下²以中國人的身分³進入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⁴許乃昌是目前所知第一個到蘇聯留學的台灣人。日本官方的檔案

¹ 追風（謝春木）（1924: 14）。

² 《台灣社會運動史》謂許乃昌是由陳獨秀（1879-1942）推薦下而赴蘇（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245）。郭杰與白安娜則根據共產國際檔案而謂其由中共及共產國際送往蘇聯（K. M. Терпский, 2005: 61）。

³ 關於許乃昌進入蘇聯所使用的身分，《台灣社會運動史》謂之「以中國人的身分」（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245）。簡炯仁親訪許乃昌（1975.7.27），謂其以「日本殖民地」台灣的名義前往（簡炯仁，1997: 50）。然而簡炯仁所引許乃昌的口述多有錯誤（比方組織的名稱屢誤），且如本章正文所引史料，許乃昌向日警供稱自己自稱中國人而入蘇，故《台灣社會運動史》恐較確實。

⁴ 關於許乃昌到底進入蘇聯何所學校學習，《台灣社會運動史》曾有兩種記載：一個是莫斯科中山大學，另一個是莫斯科某共產主義學校。孫中山在1925年逝世，為了紀念他才有中山大學。所以《台灣社會運動史》中另外記載「進入莫斯科某共產主義學校」的說法較為保守而正確。郭杰與白安娜

指出，許乃昌「在學於同地之上海大學時，親炙俄國文學，又受山川均著作所鼓舞而欲赴俄。去年（1924年）7月放棄學業，與一位中國人（許乃昌自身也自稱中國人）未持護照而達海參崴。滯留約兩個月後，於同年9月7日抵莫斯科。」⁵許乃昌並云，「我因耽溺於閱讀山川均的著作而嚮往俄國，以著永居於彼的決心而與一位中國商人在無護照的情況下抵達海參崴，又因善操中國語而能以中國洗衣工人的身分矇過官憲而抵莫斯科。」⁶許乃昌於9月20日進入東方大學，別名「Ионов」。⁷

雖然許乃昌抱著「永居於彼的決心」而前往蘇聯，但個人的接近畢竟不等於殖民地台灣所有人民的接近。如果1917年的十月革命帶給了俄國以及蘇聯人民一個新社會。那末，對於殖民地人民而言，十月革命是否可以複製、新社會是否也是可能的呢？

隻身在蘇的許乃昌並未忘懷苦難中的台灣人民。雖然他因罹患結核病而未能久留蘇聯，⁸卻曾在10月27日提出報告，題曰〈關於台灣情況的報告〉(Доклад о ситуации на Тайване)。根據俄國學者郭杰與白安娜的描述，這份報告包括了關於島內地理、人口、經濟，以及政治情勢的幾個部份，也包括台灣人在島內、上海，及日本所組成之各種左翼組織的細節。⁹在許乃昌之前，只有維經斯基於1923年在蘇聯向共產國際提出了一個簡略的台灣情況報告。¹⁰雖然目前尚不可知許乃昌報告的全內容，但許乃昌的報告，無疑是共產國際關於台灣形勢的第一手資料。

兩個月後的12月20日，許乃昌以「沫雲」為筆名在中共中央理論誌《新

根據共產國際檔案，證實許乃昌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К. М. Терпцкий, 2005: 61)。

⁵ 外務省記錄(1925e)。《台灣社會運動史》指出，許乃昌進入蘇聯的時機，可能是同年8月或10月進入蘇聯(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38, 245; 1989c: 3)。但就許乃昌交給日本警方的供詞來看，8月應為正確者。

⁶ 外務省記錄(1925e)。

⁷ К. М. Терпцкий (2005: 61)。

⁸ К. М. Терпцкий (2005: 61)。

⁹ К. М. Терпцкий (2005: 45)。

¹⁰ 維經斯基的報告對於台灣社會運動只有略微提及，他認為運動尚未擴散到群眾之中，並只限於林獻堂之類的資產階級或政府雇員（可能是指低階職員）的圈子內。見：“Справка о Тайване” (1923.8.1)，收錄於К. М. Терпцкий(2005: 258-265)。按維經斯基寫作該報告的時間，當時其人正在蘇聯國內(周利生, 2004: 99-102)。

青年》季刊第四期發表題為〈黎明期的台灣〉的文章。由於許乃昌此時仍在蘇聯，因此可能是他早就寫好稿件，也可能是他從蘇聯向國內投稿。無論事實如何，在極相近的時間點間發表的〈黎明期的台灣〉與遞交的〈關於台灣情況的報告〉，可能在內容上有極近的親緣。但本研究目前只能在無法獲得〈關於台灣情況的報告〉的情況下單獨討論〈黎明期的台灣〉。

〈黎明期的台灣〉的重要性體現於幾點：（1）這篇文章綜合了此前幾種台灣社會主義者的革命論述，可謂集大成之作。（2）瞿秋白（1899-1935，中共領導幹部、許乃昌所就讀之上海大學的老師）對於許乃昌的觀點提出反駁，因此這篇文章還是兩岸社會主義者為了台灣革命問題而進行的首次對話。（3）從現象上來看，許、瞿兩人在共產國際所特有的問題意識（即殖民地半殖民地應先進行「民主主義革命」）上發生爭論，並以中國革命所特有的概念「國民革命」來代稱「民主主義革命」。

除了介紹許乃昌論述的內容之外，本章還有幾個方面的分析：（1）比較該論述與其他類似論述之間的關係。（2）從共產國際、無政府主義，以及「國民革命」等角度考察許、瞿對話可能具有的複雜背景。（3）以中共史上最早發生的類似論爭來做比較。

第一節、許乃昌與瞿秋白的對話

1. 許乃昌〈黎明期的台灣〉的內容概述

〈黎明期的台灣〉發表於《新青年》季刊第4期「國民革命號」。文章第一節至第三節，僅概略描述了馬關割台前的台灣史（然而文中記載屢誤¹¹）、經濟現狀、政治壓迫。自第四節「文化狀態一瞥」與第五節「資產階級的解放運動」

¹¹ 比方，它把唐景崧寫成唐景和，台灣民主國寫成台灣共和國。

開始，則開始評價作為一個階級的本土資本——即台灣的本土資產階級——的性質。〈黎明期的台灣〉延續了本研究前一章討論的〈自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的觀點，認為本土資產階級與外來的日本資本之間「利害完全相反」：¹²

到了近年，日本資本主義的侵略，又必然地培養出反對他自己的新階級出來。這便是新興的台灣資產階級。

前面已經說明，本來在日本資本主義高壓下的台灣，自身差不多完全沒有資本主義發展之可言，然而在小工業和商業方面，卻也有些微的發展——自農業到商業、小工業的發展。於是乎新興的台灣小資產階級便成立了。而這個新興的台灣資產階級和那獨占台灣經濟利益的日本資本主義，其利害自然完全相反……

雖然後續文字繼續抄錄〈自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但他補充認為，「再看最近形勢，台灣議會的運動無形中已經消滅，於是台灣小資產階級的非革命的半自治運動也就告終了。」最後的第六節「台灣與社會革命」對於台灣的革命性質提出意見。正如他在〈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所說的，「在行動——〇〇〔革命〕——之前，總是有思想作為先驅。」¹³隨著本土資產階級運動的「告終」以及「思想的前驅」走到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運動」直接在台灣提上日程：¹⁴

有人說：「現在的東亞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社會革命之前，應該有個資產階級性質的國民革命。中國如此，印度如此，台灣也應當如此。」是的，現在的中國，當然非舉行全民族的國民革命不可。然而在台灣卻不應當這樣。原來台灣的資產階級是極幼稚的，並且將來也沒有發展可言。現在的中產階級已經漸漸落為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已經漸漸變為無產階級，這樣而至於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

一方面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台灣的無產階級運動便是日本無產階級運動的一部分。日本朝鮮和台灣的無產階級運動，是一個整個的東西。日本朝鮮和台灣的無產階級運動，應當站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形

¹² 沫雲〔許乃昌〕（1924a: 99）。

¹³ 秀湖生〔許乃昌〕（1923a: 38）。「以……為前驅」似乎是許乃昌慣用的寫法，他在1922年甚至寫過這樣的句子：「我們讀著東西各國的文學史，若有幾個偉大的作家在文壇上活動，同時必定有相當的批評家在那裡做前驅。」（許秀湖〔許乃昌〕，1923b: 4）。

¹⁴ 沫雲〔許乃昌〕（1924a: 100）。

勢，應當自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形勢出發。

這樣台灣的解放運動應當超越「國民運動」，而參加全日本的社會革命運動了。台灣解放運動的意義，不在第三階段而是在第四階段了。我們要看的並且應當看的，是全台灣人的解放，不是特殊階級的解放了。

在這邊文章所附的〈記者附志〉上，署名「記者」的瞿秋白則提出了批評：¹⁵ 沫雲同志這篇《黎明期的臺灣》，描寫日本帝國主義對於臺灣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侵略，很可以表現日本帝國主義對付殖民地之真精神，中國人讀了之後應當作何感想！我在此地希望讀者注意，甲午以前的臺灣就是現在的中國一樣，現在的中國又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心目中將來之臺灣呢！但沫雲同志的結論，說臺灣將不要經過資產階級性的民族革命，即全民族的國民革命，而只要直接行向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這未免有點左禪病，這是讀者須注意的，並且也是沫雲同志應自己明白的；因為在現時的臺灣狀況之下，在最野蠻的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臺灣，只要作到全民族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已經是不容易了，何能遽談無產階級的革命？我們須明白，列寧主義教訓我們，凡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須得經過一個全民族解放運動的過程，給宗主國的帝國主義的一個普遍的打擊，纔能進一步行到無產階級革命。所以此時的臺灣，正是應當作全民族解放運動時期的臺灣，而還未到作單純的無產階級時期的臺灣。所以此時臺灣的無產階級，應該站在第三國際之下，中國共產黨與日本共產黨的幫助之下，去領導一切被壓迫的臺灣民眾，作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

許乃昌的論述以「兩個階級分化」為基礎。第一個分化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分化」，此指前資本主義各階級向「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階級轉化；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原始積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第二個分化則是「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分化」，此指資產階級破產成為無產階級，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集中」(centralization of capital)。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是這兩種分化所共有的現象。

¹⁵ 沫雲（許乃昌）（1924a: 101）。

關於發生在原始積累時的第一個分化，馬克思指出：¹⁶

所謂原始積累，不外是指勞動條件當做獨立的權力，和勞動及勞動者分離。歷史的過程把這種分離表現為社會發展的一個要素。自有資本以來，這種分離的維持和再生產，就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按不斷加大的規模日益發展，直到歷史的轉變發生為止。

使資本家成為資本家的事情，不是貨幣的佔有。要使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生產的各個前提必須已經存在，而資本主義生產的第一個歷史前提，就是上述的那種分離。在資本主義生產內，這種分離，從而勞動條件作為資本的存在，是一個已知的事項，是生產本身的會不斷再生產並且擴大的基礎。

至於資本集中時的第二個分化，馬克思說：¹⁷

……資本集中，因為現在的生產條件需要有大量資本的使用。它還引起大資本家吞併小資本家，並使小資本家「喪失資本家的資格。」在這裡，又是勞動條件和勞動的分離（不過是在另一個形式上），（因為在小資本家的場合，還可以看到更多的本人勞動；一般說來，資本家做的勞動和他的資本量是成反比例的，也就是說和他作為資本家的級別是成反比的。這個過程很快就會使資本主義生產走到盡頭，……），形成資本的和原始積累的概念，然後表現為資本積累的一個不斷的過程，最後在這裡表現為已有資本在少數人手裡的集中和資本在多數人手裡的喪失。¹⁸

¹⁶ 馬克思（1978: 302）。

¹⁷ 馬克思（1978: 347）。

¹⁸ 馬克思《資本論》把「資本集中」下的階級分化放在「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中說明：「社會總資本這樣分散為許多單個資本，或它的各部分間的互相排斥，又遇到各部分間的互相吸引的反作用。這已不再是生產資料和對勞動的支配權的簡單的、和積累等同的積聚。這是已經形成的各資本的積聚，是它們的個體獨立性的消滅，是資本家剝奪資本家，是許多小資本變成少數大資本。這一過程和前一過程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它僅僅以已經存在的並且執行職能的資本在分配上的變化為前提，因而，它的作用範圍不受社會財富的絕對增長或積累的絕對界限的限制。資本所以能在這裡，在一個人手中大量增長，是因為它在那裡，在許多人手中喪失了。這是不同於積累和積聚的本來意義的集中。」資本的這種集中或資本吸引資本的規律，不可能在這裡加以闡述。簡單地提一些事實就夠了。競爭鬥爭是通過使商品便宜來進行的。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商品的便宜取決於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又取決於生產規模。因此，較大的資本戰勝較小的資本。其次，我們記得，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在正常條件下經營某種行業所需要的單個資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因此，較小的資本擠到那些大工業還只是零散地或不完全地佔領的生產領域中去。在那裡，競爭的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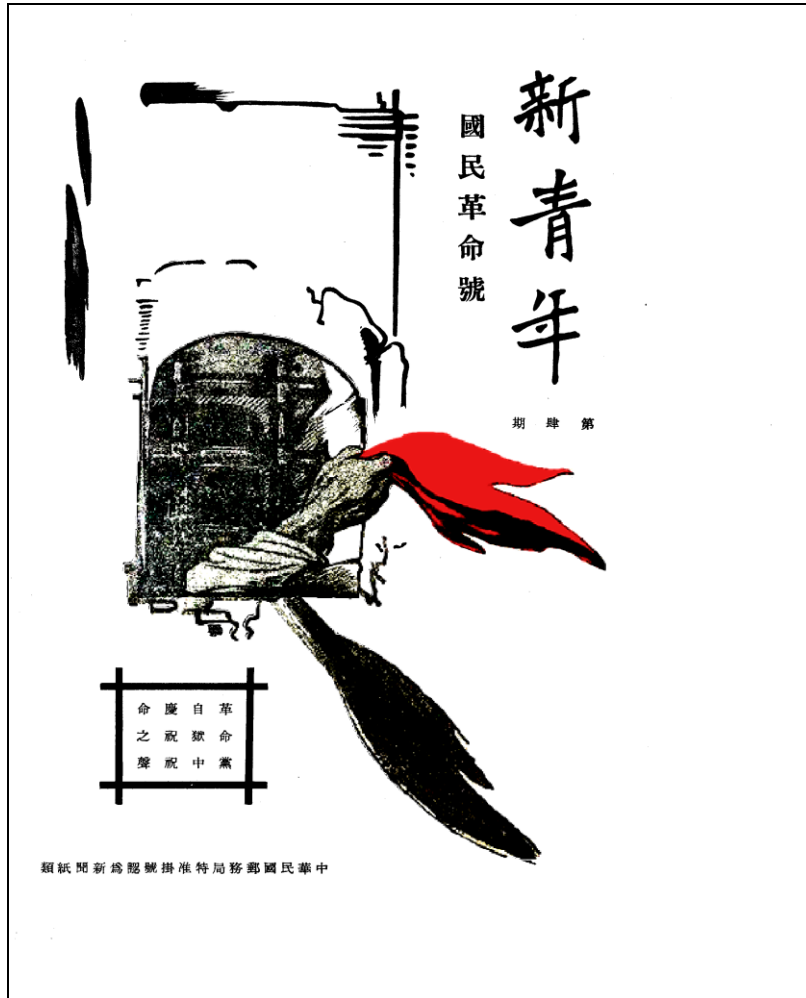
許乃昌把「兩個階級分化」運用於分析兩個階級及其各自的運動是否可能、或者是否具有進步性上。許乃昌認為，本土資產階級及其政治運動（以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代表）因日本資本主義的入侵而產生。就涉及本土資產階級從無到有的發生而言，這是台灣「第一個分化」的現象；就涉及本土資產階級從有到無的破產（由於資本主義內部的競爭所致）而言，則可視為「第二個分化」的現象。然而許乃昌所描繪的無產階級發生史很曖昧。雖然許乃昌的論述都涉及「兩個階級分化」，但許乃昌直至分析「第二個分化」才將「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抉出；又由於許乃昌承認資產階級始終只是少數，因此「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的主體在邏輯上不可能是破產於「第二個分化」中的資產階級，而是破產於「第一個分化」中的前資本主義各階級（比方「受日本資本主義的侵入而產生的新無產階級」）。也因此，「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應該是貫穿「兩個階級分化」的總趨勢：**「第一個分化」中的無產階級化應該是主要過程，「第二個分化」中的無產階級化只是補充。**至於「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的主要動力，則始終是日本資本主義，而不可能是新興的台灣資本主義。

然而許乃昌眼中的「第一個分化」幾乎無法展開。他曾略為提到新式糖廠的發展促使了無產階級的產生：「受日本資本主義的侵入而產生的新無產階級（以前大部分是小農民）大部分都集在這些工廠之下，為勞苦的勞動者。」然而這些無產階級在全台灣的階級結構之中所佔比率多少？許乃昌並未說明。從他的農業階級分析來看，無產階級的比率肯定是低的。因為「農民占有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許乃昌的農民包括自耕農、佃農，以及自耕農兼佃農，沒有考慮農業無產階級）。此外，「現在大地主很少，中等的地主甚多，而這些地主，大部分一方面是小商業資本家。」¹⁹因此許乃昌描述的「第一個分化」在邏輯上顯然不可能是「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的主過程，而且不可能與「第二個分化」並行。

烈程度同互相競爭的資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競爭的資本的大小成反比。競爭的結果總是許多較小的資本家垮台，他們的資本一部分轉入勝利者手中，一部分歸於消滅。除此而外，一種嶄新的力量——信用事業，隨同資本主義的生產而形成起來。起初，它作為積累的小小的助手不聲不響地擠了進來，通過一根無形的線把那些分散在社會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貨幣資金吸引到單個的或聯合的資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競爭鬥爭中的一個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後，它變成一個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機構。」（馬克思，1975a: 696-6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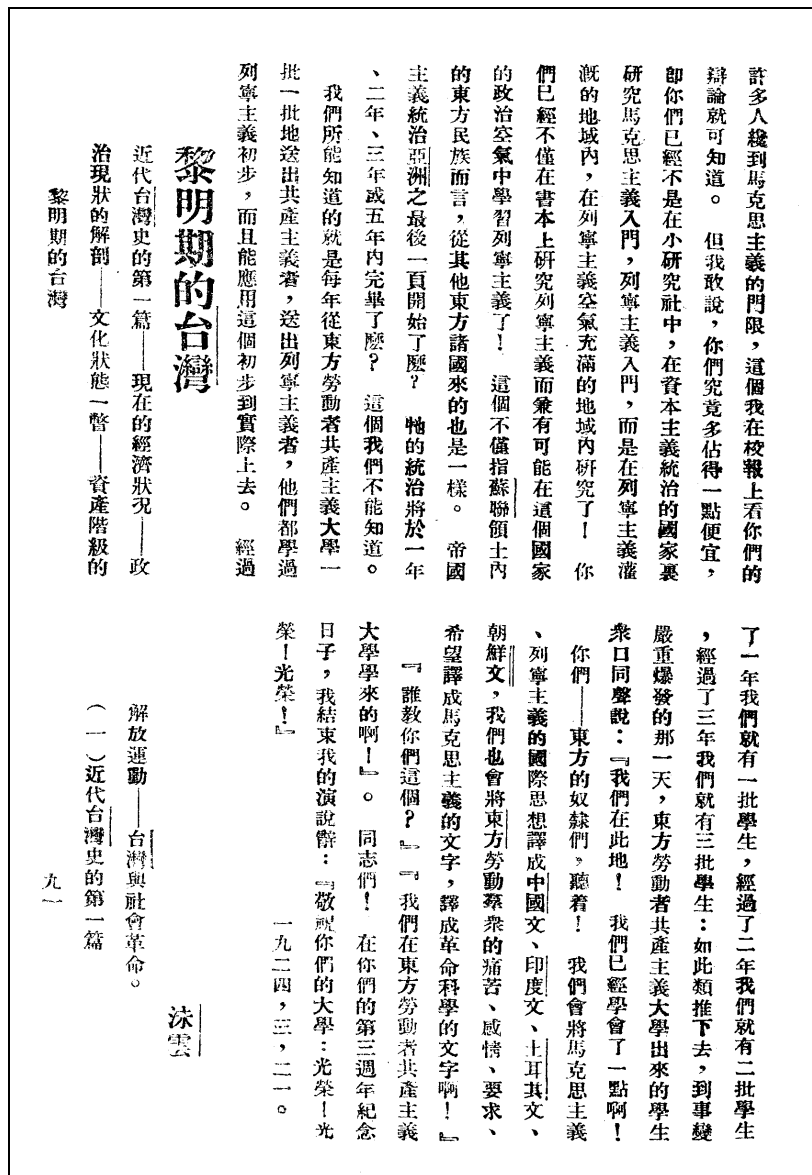
¹⁹ 沫雲（許乃昌）（1924a: 94-96）。

圖 6-1：登載許乃昌〈黎明期的台灣〉一文的《新青年》季刊封面



黃逢霖（1901-1993）這樣描述《新青年》季刊的封面設計：「我自從會讀報章以來，和我做過精神上鼓勵切磨的好朋友的，可算是《新青年》，但是它短命中絕了，到本年 {1923 年} 十月我才能在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圖書室裏重複遇見它，書面上現出一種手執紅色 handkerchief【手帕】的獄中革命黨人的精神來，使我一腔愛護它的熱誠重複發現出來，以為有遠超現代的精神革命出版物做我們青年人的指導，本著奮鬥的精神，向我們黑暗無光、無可奈何的境地裏努力！奮鬥！」（黃逢霖，1979: 220）

圖 6-2：〈黎明期的台灣〉的一頁



總之，許乃昌的論述存在著邏輯上的矛盾。而「第一個分化」與「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之間的關係在許乃昌的論述中是空白的。

此外，本土資本的自身崩潰並不意味著資本主義（或日本資本）在台灣的崩潰。許乃昌所屢言的「自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形勢出發」至少有兩層意義：第一個意義是指以日本資本為主體的「資本主義」可能在上升期就導致「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第二個意義才是指「資本主義」已臻爛熟而導致本身的崩潰。

1924 年底許乃昌發表〈黎明期的台灣〉之前，平平同人也在「兩個階級分化」的角度提出殖民地「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而平平同人中的佐野學（1892-1953）以及許乃昌本人，則在更早的時候提出各自的殖民地「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以這些同類型見解做為比較的對象，可以說明許乃昌〈黎明期的台灣〉的理論特點及其沿革。

2.比較一：其他論述如何論證無產階級運動的可能性

第一：佐野學在 1923 年與 1924 年的論述。佐野學的論述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台灣「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其論述有二：（1）1923 年的佐野學認為，殖民地將因外來資本的影響而快速完成「第一個分化」，除了產生資產階級，還將因「大多數者的無產階級化」而出現大量無產階級。又由於殖民地出現了無產階級，因此佐野學認為殖民地可以同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一同爭取新社會（「社會主義的國際社會」、「世界共和國」）的實現。²⁰（2）1924 年的佐野學則認為，即便殖民地社會的「第一個分化」沒有或剛開始，但在「社會強於傾向國際化普遍化的現代」，「一社會的跳躍的進化是可能的」。因此殖民地可在「第一個分化」沒有或不充分的情況下，透過全世界的幫助而一同進入新社會（「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共產主義的日本」、「東洋共產主義聯邦」、「歐羅巴共產主義聯邦」）。²¹需注

²⁰ 佐野學（1923c: 64-75）。

²¹ 佐野學（1924: 3）。

意，1924年佐野學所謂的「跳躍的進化」是指把資本主義這個階段跳躍過去，而不是連溫卿（1895-1957）所認為的「加速度飛躍」完成資本主義。²²

第二：許乃昌在1923年的論述。許乃昌1923年的論述類似於1924年的佐野學。許乃昌認為台灣的「第一個分化」剛開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均所佔少數。但因日本資本已經「面對臨終」，所以作為日本領土的台灣也可以跳躍地進行推翻資本主義的無產階級運動（就算「第四階級」為數不多，但「從日本的資本主義狀態來估計」，台灣也可能「一氣呵成地躍入正義的新社會」，因此「沒有第四階級的解放就沒有全台灣人的解放」）。²³

第三：平平同人在1924年的論述。平平同人的論述並不統一，因此以下只能大略地概括他們的共同見解。並非每個同人都如佐野學或許乃昌那樣關心「社會主義的國際社會」或者「正義的新社會」。平平同人的核心關懷是論證殖民地人民之間沒有不同的階級利益，從而「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能否重合。他們分別以殖民地的「第一個分化」不存在或剛剛開始（類似於1924年的佐野學），²⁴或者「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類似於1923年的佐野學與〈黎明期的台灣〉），²⁵去說明台灣人民內部沒有太大的階級差異。至於這些同人提及「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的時機，既有「第一個分化」，也有「第二個分化」。

1924年底許乃昌〈黎明期的台灣〉與前述幾種論述之間的結構非常類似。（1）就承認無產階級必在島內大量產生而言，許乃昌的見解類似於1923

²² 越無〔連溫卿〕（1924：第四十回）。並見本研究第五章。

²³ 秀湖生〔許乃昌〕（1923b）。

²⁴ ①「韓國無論資本家，無論勞動者，各不能以自身力量形成獨立階級。僅僅以民族而論，都是被壓迫者，〔被〕榨取者而已。」（尹蘇野〔尹滋英〕，1924：2）

②「他們的財產是一天一天的消耗，所以現在台灣是分不出什麼資本家和勞動者，自然而然台灣的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階級爭鬭是不成問題的。」（真一，1924b：5）

③「比起日本的第四階級。中國的勞動者也不見什麼大區別。」（真，1924：4）

²⁵ ①「我看若是長久下去，保不住十年二十年之後，台灣三百多萬人民，怕都要變成日本資本主義腳下的無產階級勞動者。」（真一，1924b）

②「照目前狀態演譯〔譯〕下去，不僅女人會全為奴隸，男人也很可慮」；「當歐戰初終時，經濟膨脹得過甚，都還不覺苦；及至經濟反動襲來，所謂台灣資產家遂一變而為中產階級，再變為破產者。」（真一，1924c：4）

③「台灣受了日本的政治掠奪，受了日本資本家的無形榨取，窮人要漸次無立身之地，從前的發財人也要變到與窮人同等地位。」（真，1924：4）

年的佐野學與 1924 年的部分平同人（即承認無產階級必在島內大量產生）。（2）就「運動，應當站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形勢，應當自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形勢出發」而言，許乃昌則與 1923 年的許乃昌與 1924 年佐野學的見解相類似（即把國際環境視為無產階級運動是否可能的決定性因素）。如果說，許乃昌在 1923 年的論點可總結為「沒有第四階級的解放就沒有全台灣人的解放」。他在 1924 年所提出的「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則可總結為「第四階級的解放等於全台灣人的解放」。從「（無產）階級」與「民族」的關係來看，可發現 1923 年許乃昌強調解放的條件，一種以無產階級的解放作為整個民族取得解放的條件。²⁶但在 1924 年「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的認識下，這項標準被解除了，因為無產階級就是整個民族本身。

其實〈黎明期的台灣〉最接近 1923 年的佐野學。兩者的差異在於：

- （1）〈黎明期的台灣〉認為全台灣人會無產階級化，但 1923 年的佐野學則只談到「大多數者的無產階級化」。
- （2）〈黎明期的台灣〉把「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放在「第二個分化」裡談論，而佐野學一開始就在「第一個分化」中論及「大多數者的無產階級化」。

如果回顧一下許乃昌在 1923 年所曾考慮過的問題（「台灣的經濟狀態尚未發達到遭雙方發生階級鬥爭的程度」、「就算台灣的經濟發達還很落後」），以及他在 1924 年所承認之大量存在的農民（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顯然他對「第一個分化」在台灣的開展水平始終有所遲疑。那末，〈黎明期的台灣〉之所以沒有在「第一個分化」中討論「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也許正因他可以說明資產階級的些微產生，卻無法說明台灣絕大部分群眾並未無產階級化（實際上，他所論及的糖業無產階

²⁶ 吳叡人評價 1923 年許乃昌〈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云：「台灣人全體的解放：戰前台灣左翼民族運動的思想遺澤。從許乃昌在 1923 年提出『第四階級』論，主張台灣民族解放運動應以廣大的農工階級為主體開始，歷經 1926-27 年的中國改造論爭、文協左右分裂、1927 年台灣民眾黨的成立，到 1928 年台灣共產黨成立為止，台灣民族主義的『台灣人』概念，隨著左翼挾『階級民族』觀念步步進逼而持續擴張。1927-28 年以後，儘管仍有種種爭議，『台灣人全體的解放』已成為左右派的共同目標。」（吳叡人，2006：100）吳叡人的詮釋有誤。因為 1923 年的許乃昌恰恰認為，無產階級（即「第四階級」，不包括農民）在台灣所佔少數，而不是「廣大的農工階級」。即便是 1924 年的許乃昌，其「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觀點下的台灣人民也只是在將來才會無產化。因此無產階級始終不是現實多數的存在。

級並非無產階級，仍然是佃農）。換句話說，他在未來的「第二個分化」中討論無產階級的來源，而不是放在當下（可能正在進行或其實無法進行的）「第一個分化」中討論。這也許反映他當時並沒有「原始積累」之概念，或者反映台灣沒有出現「原始積累」的事實，所以他無法將「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放在理應作為主要過程的「第一個分化」中描述，而是擺在了「第二個分化」。由於 1923 年的佐野學在討論「第一個分化」之時便提出「大多數者的無產階級化」，因此可以避免許乃昌所無法避免的問題。

但反過來看，雖然許乃昌迴避說明「第一個分化」與「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的關係，然而「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觀點的產生，離不開日本資本在許乃昌面前所造成的殖民地人民普遍貧困化之趨勢。然此現象之本質並不必然是「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而可能是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被日本資本所長期維繫（這點在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得到清楚表述）。倘若現象等於本質，無異取消科學本身；沒有認識到這種維繫作用的「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恰恰存在此種取消的危險。當然，要求 1924 年的許乃昌能達到這樣那樣的理論水平，是非歷史的。

3.比較二：其他論述如何論證既存社會運動如何沒有進步性

許乃昌、佐野學，以及涉及台灣問題的平平同人，都拿自己的路線同既存的路線（以請願運動為主）相對立。在兩條路線的比較中，除了論證自己的路線如何可能之外（前已略述），最主要的論證方式是說明既存的路線如何不具進步性。不過，上述論證方式存在著一個發展的過程。分別介紹如下：

第一：沒有論證的論證：資產階級的運動既有進步性，也可能走向反動。1923 年的佐野學以一種面面俱到的方式評價殖民地的本土資產階級。他認為，隨著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化，「有產階級」將從中分化而出。這個階級可能與外國資本對抗或者合作。其中的「小有產階級」或「小資本階級」更是民族運

動的主力，但他們只想追求「自由主義」的「共和國」或「政治獨立」。²⁷佐野學認為，台灣議會對於一步步實現將來的民族解放而言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最初的階段」。但他也認為這一運動所追求的「臺灣議會」只會成為「臺灣有產者壓迫台灣無產者的機關」。所以他期待將來能出現更進步的「無產者的民族運動」。²⁸

第二：資產階級及其運動必與資本帝國主義共謀，所以不具進步性。1923年的許乃昌則把殖民地的本土資本與母國資本（或帝國主義）之間是否共謀互利，視為判斷殖民地「資產階級」及其運動是否具有進步性的標準。而他當時完全否定本土資產階級具有進步性。他認為，誕生於「第一個分化」中的本土資產階級必因依附日本資本而走向反動；又因為日本資本已經「面對臨終」，因此「資產階級便更焦躁地走向反動」。所以，「真正的台灣民族解放運動」必須反對日本資本以及本土資本所共同形成的「二重權力」。「台灣議會」完全無法抵抗這「二重權力」，因為這只是「第三階級」向支配者討價還價的解放運動。必然犧牲無產階級的利益。²⁹誠如連溫卿所言，「台灣人的富人和日本的富人，由生活的經濟上相同，沒有民族的排斥觀念，反卻結合起來，這是社會進化上必然到達的地點，所以社會上有兩階級，也是從此分出來的，我們為台灣奔走，是不可不從此見地去做。」³⁰

第三：無力抵抗帝國主義的運動不具進步性，但運動參與者值得同情。1923年底的治警事件之後，遭到鎮壓的請願運動充分暴露出運動的弱點，但也促使參與者得到顯著同情。雖然「請願運動及其參與者」不能直接等同於「資產階級及其運動」，然而「請願運動參與者」所贏得的同情確實透過理論上的設想而移情於「資產階級」；這一設想就是「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

1924年的許乃昌指出：「台灣資產階級」所推動的「台灣議會是不能給予我們什麼利益」。但是做為「日本資本主義侵掠人的結果」的「新興的台灣資產階級」卻與「獨占台灣經濟利益的日本資本主義，利益完全相反」。³¹如

²⁷ 佐野學（1923c）。關於民族運動，還可參考佐野學（1923a）對於「國民運動」的分析。

²⁸ 佐野學（1923b）。

²⁹ 秀湖生（許乃昌）（1923b: 43-46）。

³⁰ 越無（連溫卿）（1924: 第十五回）。

³¹ 沫雲（許乃昌）（1924b: 6）。

前所述，部分平平同人從殖民地社會的「第一種分化」並不顯著，來說明包括本土資產階級在內的殖民地人民之內並無不同的利益。另一部分的平平同人與許乃昌則透過「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以下代稱許乃昌「全台灣人的無產階級化」)而把他們對於本土資產階級的同情理論化。前面曾提到，把無產階級的來源放在「第二個分化」——而非「第一個分化」——討論的見解，可能反映「原始積累」之事實或概念的缺乏。然而「第二個分化」被過分強調的原因，也可能是一種同情的表現。藉由把當下的資產階級論證為未來的無產階級，論證當下的資產階級值得無產階級去團結。

但無論把「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擺在何種分化之中說明，「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都意味著「(無產)階級運動」與「民族運動」的重合。³²這種重合更意味著民族運動的階級化，因此階級運動的目標就會成為民族運動的目標。³³然而這種重合也意味著階級運動的民族化，平平同人「真一」云，「假使將來有階級爭鬪發生，就是不外乎台灣人全體和日本資本家的爭鬪」。³⁴「假使」一語，精要地點出「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實乃具有政治目的的理論設想——「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作為一種「未來」，其實是為「現在」論證殖民地的本土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也因此，如果本土資產階級「整體」都被視

³² ① 「韓國無論資本家，無論勞動者，各不能以自身力量形成獨立階級。僅僅是以民族而論，都是被壓迫者，〔被〕榨取者而已。所以在韓國今日的運動，為一民族運動。」「以民族為目的，圖恢復生命自由，此外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尹蘇野〔尹滋英〕, 1924: 2)

② 「假使將來有階級爭鬪發生，就是不外乎台灣人全體和日本資本家的爭鬪。為什麼呢？現在台灣的有產階級已經漸漸保不住他們的財產，結果現在的台灣人全體就是現在和將來的無產〔階〕級（現在台灣有產階級也是日本資本家的一種勞動者）因此在現在台灣講資本家就不外乎，在台灣的日本人資本家，台灣總督府就是他們資本家的大本營。總括一句：台灣的階級運動就會變成民族運動，以後的台灣除了民族運動是沒有第二個運動，就是台灣只有驅逐日本人的運動。」(真一, 1924b: 5)

³³ ① 「日本的資產階級顛覆了韓國的封建社會；韓國的民族獨立運動，快會打翻日本的資本主義罷。所以呻吟於日本勢力之下的東亞被壓迫民眾，所組織的協同戰線，在最近的將來，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廢墟之上，要建築起自由的東亞社會！」(尹蘇野〔尹滋英〕, 1924: 3)

② 「台灣也是東方的被壓迫民族，當這印度高麗，比律非利賓，諸弱少〔小〕民族都在猛烈地進行他們的獨立運動，反抗資本帝國主義的時候。台灣若再起來和他們相呼應，做個東方弱少〔小〕民族的大團結，我們東方〔方〕的社會革命，就快在眼前，世界的革命也就很有希望了。」「共同推翻資本帝國主義的日本！這就是你們向自由的路，也就是你們對東洋革命應盡的義務，貢獻於世界革命的功績！」(真一, 1924b: 5)

³⁴ 真一 (1924b: 5)。

為潛在的無產階級，就沒有必要從本土資產階級之中再區分出「民族資產階級」這種更細緻的範疇。無論這種被賦予的「前途」對於資產階級自己而言究竟是現實或僅是理論。

「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在理論上聯繫起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在「極小化」殖民地的本土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時，還創造出團結他們的理論基礎。但是，如果過分期待所有人都成為無產者之趨勢，就可能連帶取消現實的、所佔少數的無產階級之主動性；反而可能使本土資產階級在這種機會主義的理論傾向向下奪取運動領導權。³⁵

第二節、許、瞿對話所可能具有的多重面向

為了對抗台灣既存的社會運動，台灣社會主義者分別以設立組織或發展理論的方式進行路線鬥爭（如蔣渭水、連溫卿、范本梁，以及平社、赤華黨）。在平社內部或平社與新台灣安社之間，也因為「A」「B」矛盾而出現社會主義運動之內的

³⁵ 若要評論「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的機會主義傾向，或可參照曾出現於朝鮮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朝鮮延長論」。由於朝鮮共產主義運動的長期分裂、派系鬥爭，與朝鮮半島本地持續的白色恐怖，大量朝鮮共產主義者流亡滿洲（東北）。當時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因為支配滿洲的主要力量與朝鮮一樣都是日本資本主義，所以滿洲就是朝鮮的延長；換言之，朝鮮與滿洲都是日本資本主義的延長。因此，在滿朝鮮人應先反日帝，而非反對滿洲當地的封建殘餘勢力（中國封建地主與國民黨軍閥）。1930年3月20日朝共ML派滿洲總局發表《朝鮮共產黨滿洲總局解體宣言》，除了宣示在滿朝鮮共產主義者應加入中共外，《宣言》更特別批判了「朝鮮延長論」，要求朝鮮共產主義者也應反對滿洲當地的封建殘餘勢力。不過1930年9月中共的一份黨內指示更明確地指出「朝鮮延長論」的本質問題：「有些在滿自命為朝鮮共產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當然更如此），認定東滿的延邊和朝鮮一樣在日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實際是朝鮮的延長與擴大，唯一的敵人只有日本帝國主義。這完全是脫離了階級的立場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觀念。實際上延邊是東滿的一部份，政治、經濟、軍事的組織系統與奉系軍閥國民黨的統治完全不可分離。中國的地主豪紳封建勢力更是直接剝削與壓迫延邊群眾的敵人。延邊是朝鮮延長的理論避免了與中國統治階級的衝突，離開了階級的立場根本就沒方法解決延邊的群眾（的問題）。」（李鴻文，1996：78-82, 108-109）。「朝鮮延長論」認定日本帝國主義是要打倒的敵人，卻迴避了封建殘餘勢力，這就使民主主義革命被隱沒或被取消。可以說，克服這些問題的《宣言》正是一份具有組織要求的民主主義革命綱領。而那個將台灣視為「日本資本主義的延長」、認為「應當站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形勢，應當自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形勢出發」的「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或許正有同樣的毛病。而且，台灣也曾出現過類似於「朝鮮延長論」的見解。連溫卿即曾指出：「台灣的產業雖有被促進發達，但其實是表現著日本資本主義發達的延長，而同時為台灣人由台灣產業界失墜的第一步。」（連溫卿，1928a：13）。

路線鬥爭。(然而目前的史料無法說明當時的「A」「B」矛盾是否上升到理論層次。)但同一條社會主義路線也可能存在矛盾。許乃昌與瞿秋白在〈黎明期的台灣〉中的對話就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上首次在同一個路線內所發生的不同選擇。

早在 1923 年所發表〈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一文中，許乃昌便在請願運動之外提出了兩條可能路線，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答案(見表 6-1)。到 1924 年底發表〈黎明期的台灣〉，許乃昌進一步論證了自己的答案，並得到瞿秋白的回應。

如表 6-1 所示，許、瞿兩人以「無產階級運動」、「社會革命運動」、「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之類的概念表述一種路線。本研究把他們所表述的這一路線與其他社會主義者所用以對立於既存社會運動的路線歸為同一類，以下暫且稱之為「路線 I」。

但是，許、瞿兩人還用了其他社會主義者所沒有使用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資產階級性的民族革命、全民族的國民革命」之類的概念表述另一種路線(而且這個路線還具有代名詞——即「國民革命」或「國民運動」)。本研究暫且將之歸為同類，稱為「路線 II」

僅僅從名詞來看，許、瞿兩人所爭論的路線，現象上是共產國際內部所特有的問題意識。又由於討論雙方都是中共黨員，他們之間的討論就不免像是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的討論。但本質是否真是如此？

1. 許乃昌對兩條路線的認識是否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運動往往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兩種「革命性質」之間的關係來比較兩條路線。「民主主義」被視為一種歷史現象，它伴隨著「資產階級」對於「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以及「經濟基礎」(base)的要求而發生。所謂的平均地權、建立議會、實行普選、乃至國家統一，都是民主主義的基本內容，而且都要求「上層建築」的革命以及「經濟基礎」的革命。但是，上述歷史現象被認為只出現

在「民主主義」**有利於**資產階級發展、而且資產階級**有能力**爭取「民主主義」的條件之下。如果這些條件不具足，資產階級與民主主義就會發生分離。或者說，「革命動力」（資產階級）就會與「革命任務」（民主主義）相分離。

馬克思主義把「資產階級」作為「無產階級」基本的革命對象。但在前述「動力」與「任務」分離的狀況下，「資產階級」所捨棄或無力完成的任務（民主主義）反而可被「無產階級」所接手。因此「無產階級」（革命動力）與「社會主義革命」（革命任務）之間，也可能因為作為「動力」的無產階級多擔負起「民主主義」這一任務而與原來的「任務」（社會主義）發生實質分離。

無產階級接手「民主主義」任務的目標之一是打擊（或爭取）某些部份的資產階級。更重要的目標則是爭取農民。由於「民主主義」必然使農民受惠（比方平均地權），農民便可能因此而被工人階級爭取並加入革命動力。在俄國革命的經驗中，「民主主義」主要體現為工人階級爭取農民並反對資產階級。但在中國革命的經驗中，「民主主義」最初則體現為工人階級爭取某部分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民主派」，即國民黨），後來才把重心擺在爭取農民。但無論爭取何一階級，「民主主義」都不是最終目標。關鍵在於如何透過「民主主義」通向「社會主義」。但如何正確認識「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始終處於爭論之中。

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兩者的上層建築——特別是**政權**——的問題上。即，當革命形勢發展到必須建立政權之時，這個政權的階級性質究竟為何將成為問題；反過來說，將來的革命政權之階級性質將決定通向這個政權之過程的性質，即革命性質。對無政府主義者來說，社會主義「政權」是他們所完全否認的問題意識。但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所「單獨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權，是消滅國家並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唯一手段；這種政權通常被稱為「無產階級專政」。至於工人階級與其他階級所「共同專政」的民主主義政權，則被視為通向社會主義政權的基礎；這種政權通常被稱為「民主專政」。如果只包括工農，「民主專政」會被稱為「工農民主專政」；若進而包括某部分資產階級，「民主專政」則會被稱為「人民民主專政」。盧卡奇（Lukács Georg, 1885-1971）對於「民主專政」的功能有段相當清晰的說明：³⁶

³⁶ Lukács (1972: 241-242)。

民主專政可以採取各種不同的形式。早在 1917 年，列寧就告訴想要把黨拖回 1905 年的民主專政形式的加米涅夫，民主專政自 1917 年革命開始以來，就在相當確定的形式上實現了：這些形式之一，就是工人與士兵的蘇維埃所組成的反政府（counter-government）。因此，民主專政作為資產階級民主的完全實現，就嚴格的字義而言，是一個鬥爭的領域，是一個一切關鍵性的戰鬥都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領域。同時，當然，這也是最重要的戰鬥手段，一個向廣大群眾直接宣傳的手段，去刺激並領導他們進入自發的革命行動，同時，在正常環境下幫助資產階級使勞動人民中的廣大群眾無法組織起來的組織與意識形態的諸形式，也將因此機會而得到鬆綁。民主專政提供創造這些組織形式的可能性，這些形式則能幫助工人中的廣大群眾在資產階級面前堅持他們的利益。在發展的現階段，民主專政原則是與資產階級的經濟社會權利不調和的，即便民主專政的具體客觀與直接要求的外在的階級內容遠遠超過資產階級社會的界線，卻是資產階級民主最完美的實現。也因此，自俄國革命以來，圍繞著（a）「民主專政」或（b）「無產階級專政」而引發的「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爭，陸續在俄國、中國、日本、乃至盧卡奇所屬之匈牙利等各國共產主義運動內引起波瀾。在俄國，爭論分別表現在老布爾什維克（主張 a）與托洛茨基反對派（主張 b）之間；在中國，爭論分別表現在中國共產黨（主張 a）與托洛茨基反對派（主張 b）之間；在日本，爭論分別表現在講座派（親日本共產黨；主張 a）與勞農派（主張 b）之間；在匈牙利，爭論則分別表現在盧卡奇（主張 a）與匈牙利共產黨主流派（以庫恩貝拉為代表；主張 b）之間。

如果先不考慮術語，而考慮術語所指涉的範疇，便首先必須考慮上述幾個範疇——革命性質、革命動力、革命任務、專政，等等——之間的聯繫是否被 1924 年的許、瞿等人所認識。特別是他們是否認識到取得「政權」的重要性，以及「政權」性質與革命性質之間的聯繫。

然而「政權」恰恰是表 6-1 所列論者所完全沒有說明的問題。

表中唯一支持「路線 I」的瞿秋白並沒有提到「政權」問題。這可以理解為

忽略，因為他在此之前才撰文討論「專政」與民族解放之間的關係。³⁷

支持「路線 II」的其他所有人也沒有提及「政權」問題。但既然所有人都沒有提到這個問題，就很難簡單視為忽略。必須進一步考慮「政權」問題究竟是否在他們的問題意識之中。雖然許乃昌仍然可能以兩種專政之間的選擇——也就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意識下——作為衡量兩條路線的標準。然而主張廢除國家政權本身的無政府主義可能是「路線 II」身後更大的思想背景。擺在許乃昌等人之前的兩條路線也許並不是政權與政權（比方兩種專政）之間的選擇，而可能是要不要政權的抉擇。也就是基於無政府主義對於革命的設想而支持一條沒有專政（或他們認為沒有專政）的路線並否定支持專政的路線。也許此時之抉擇恰恰再現了 1907 年以來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對於「以暴易暴」的否定。

2. 許乃昌眼前的「國民革命」形態是否影響他的選擇？

十月革命的經驗使得此後受共產國際指導的馬克思主義者更加確定專政的必要性，必須先奪取政權再說。僅僅這一點就使得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產生相當的距離。並使馬克思主義者與積極奪取全國政權的國民黨有合作的可能。然而共產黨與國民黨當然不可能共同為了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目標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合作。就國共基於「國民革命」而實現的合作來說，其最初設想與實踐（奪取政權、國家統一、反對帝國主義）都屬於「民主主義革命」的範圍，但更窄。因為僅僅及於「上層建築」的變革而不打算立即改變「經濟基礎」。以中共來說，「民主主義」從「二大」（1922）以來成為正面使用的用語。但至 1927 年國共分裂之前，中共為了國共合作，曾技巧性地在許多文獻中以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代稱「民主主義」。這種代稱恰恰體現他們把「民主主義」的

³⁷ 瞿秋白回應許乃昌之前才剛剛在另一篇文章中說明無產階級專政（當時稱為「無產階級獨裁」）的作用。顯然他的理論認識中是有「專政」的：「只有無產階級獨裁制有了保證之後，民族間的歡喜及自由才算有了保證」「無產階級獨裁制若有動搖，那利於壓迫弱小民族的地主資本家必然要復辟，民族自由仍舊要受摧殘。」（瞿秋白，1924：合訂本頁 755）

內容限制在上層建築的範圍之內，因為必然觸及「經濟基礎」的「民生主義」恰恰不在「民主主義」之內。此外，當時也主要在上層建築的範圍內理解「封建」（即民主主義的對立物），比方「封建武人」（即軍閥）及其「封建割據」，³⁸後來所著重的農村「封建」生產方式或社會形態在當時僅是萌芽。³⁹

雖然國共兩黨都把上層建築的變革作為國民革命的目標，但對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卻有不同設想。國民黨所設想的國民革命，是一種必須以軍隊與軍事行動統一全國的革命（比方東征北伐），本質上是武裝鬥爭；共產黨所設想的國民革命，則是透過「國民會議」以建立民眾政權的革命，本質上是民眾運動。⁴⁰從

³⁸ 關於把「封建」理解為上層建築之存在的問題，可參見德里克的討論（Dirlik, 2005a: 48-49）。德國學者羅梅君（1997: 73）也認可德里克的見解。

³⁹ 如：「中國享有土地及使用土地的制度在經濟上有一種半封建半宗法的階級關係。」（中國共產黨擴大執行委員會, 1989: 247）又如：「中國民族革命有兩個特點：他是繼續或完成辛亥革命，這個革命的內容是反對封建的經濟關係，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1989: 337）

⁴⁰ 「民眾運動」與「武裝鬥爭」是中共所慣用的術語，若用托洛茨基反對派的術語，那末前者可以表述為「民眾武裝暴動」，後者則可表述為「革命軍」的「軍事行動」。兩者的關鍵差異是武裝組織及其鬥爭是否常設化。因為常設化將導致少部分人從民眾之中游離出來成為軍隊，從而使武裝鬥爭從民眾的集體暴動轉化為軍隊的戰爭。恰恰是這個關鍵差異，促使常設化的武裝鬥爭不可能以馬克思主義所傳統訴諸的對象——工人階級——為載體，因為工人階級不可能完全脫離生產，但軍隊基本上由脫產人員構成。（所以日後的紅軍企圖克服這個問題。）「民眾運動／武裝鬥爭」之間的緊張首先產生在國共合作下的「國民革命」中。用蔡和森的話來說，這是「國民會議／軍事運動」之間的矛盾。蔡和森指出，中共在「三大」（1923.6）之後發表宣言「召集國民會議」，但因當時的孫中山沒有「出頭號召」，「以致這口號不能擴大」，甚至「一般民眾都反對」。孫中山之所以沒有出頭，是因為國民黨「只注意軍事運動」，但這種偏重也導致「革命的浪潮不久就消沈下去。」（蔡和森, 1982: 50-51）當一心執著於北伐的孫中山透過蘇聯的支持而成立黃埔軍校（1924.6.16 開學），中共所主導的民眾運動——國民會議運動——也隨著孫中山的北上而以對抗北洋「善後會議」的姿態達到高潮（1924 年底至翌年初）。在武裝鬥爭與民眾運動之間的緊張中，孫中山死在北京，「民眾運動／武裝鬥爭」之間的緊張留在他遺言中：也就是「積四十年之經驗」（當然是武裝鬥爭的經驗），與「最近」才主張召開的「國民會議」（當然是民眾運動）。對於中共來說，真正走上斯大林所謂「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武裝鬥爭是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義之後的事。至於徹底以農村為「武裝鬥爭」之中心——即武裝鬥爭的根據地問題——則到放棄進攻大城市才得到確定。直到 1930 年前後，以農村為根據地並積極準備進攻大城市，是共產國際的主要方針。此外，對於城市內部的民眾運動（工運、學運），也時常不顧條件地要求罷工或飛行集會。由此而形成了如（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之類盲動的武裝鬥爭。毛澤東認為，「一九二七年以後的一個長時期中，許多同志把黨的中心任務仍舊放在準備城市起一和白區工作方面。一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的根本的轉變，是在一九三一年反對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勝利之後。但也還沒有全黨的轉變。」（毛澤東, 1967a: 509）雖然日本的國民革命研究先驅學者野澤豐首先從學術上將「國民革命」區分為「國民會議」運動以及「北伐」戰爭兩個階段，從而成功地將把運動內部的區分納入學術研究（野澤豐, 1974）。但中共領導層在南昌起義之前如何拿捏「民眾運動／武裝鬥爭」之間的尺度，迄今仍然眾說紛紛。毛澤東認為，「在中國，主要的鬥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

許乃昌的文章來看，他很清楚國民黨所設想的那種國民革命。因此他把反對「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和本國軍閥政治」、「民主革命」、「北伐」，通通視為「國民革命運動」的內容。⁴¹

但是，如果許乃昌也清楚共產黨所設想的另一種國民革命，那末這種國民革命所具有的內容，是否也可能成為他反對在台灣進行「國民革命」的原因？比方，如果許乃昌把「國民會議運動」看成是與他所堅決反對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同類的東西，他怎麼可能會接受「國民會議運動」式的國民革命？

如果真是如此，民主主義、國民革命、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國民會議運動的差異馬上就被弭平。因為它們通通都是資產階級的運動、甚至只是及於上層建築的運動。如果真是如此，也許就可以說明許乃昌何以會在〈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之中同時否定請願運動與「民主主義」、何以認為「民主主義」除了「革命」之外還可「建設」（聽起來是一個比較和平的字眼）——因為請願運動就是「民主主義」。同時也可以說明《平刊》強烈否定代議制、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及民主主義的背景。

當社會主義思還處於傳播期，在東方各地共產黨都尚未與群眾建立廣泛聯繫的時代背景之下，許乃昌未能在「純正」的馬克思主義或中共的問題意識之下提出問題並解答，是合理的事情。⁴²（然而什麼才叫「純正」？這也很值得質疑。）就

隊。其他一切，例如民眾的組織和民眾的鬥爭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視的，但都是為著戰爭的。」他總結中共的經驗認為，「我們黨從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參加北伐戰爭的五六年內」「不懂得武裝鬥爭在中國的極端的重要性」，「在北伐過程中，忽視了軍隊的爭取，片面地著重於民眾運動，其結果，國民黨一旦反動，一切民眾運動都垮台了。」（毛澤東，1967a: 508-509）托洛茨基派的鄭超麟則有完全相反的見解。他認為，「北伐勝利轉移了一般人對於『革命』的觀念。」「廣大群眾的武裝暴動確實是變成沒有必要了的。」他認為，暴動及其參與者因此而「不過盡北伐別動隊的作用。」鄭超麟並指出，「北伐以前，一般人，至少在上海作風下工作的幹部，對於『革命』還有正確的認識，即認為革命主要是以群眾暴動手段來實行的。黨把主要力量，把優秀的幹部，配備在下層群眾運動上或黨內工作上，次一等的人才派去做政府的和軍隊的工作，」當時並沒有其他的革命觀。可是北伐問題發生了。上海中央反對北伐。後來北伐居然勝利，而且由北伐引起了更進一步的工農群眾運動，於是一般人，連上海中央在內，改變了原來的革命觀。割據了一個地域，組織政府，編練軍隊，然後出發征伐，以奪取全國政權，——這個方式被視為主要的革命方式；而群眾武裝暴動退入於響應革命軍的別動隊地位。從此，黨就把最好的幹部派去做政府的和軍隊的工作，而留下次等的人做群眾運動了。」（鄭超麟，2004b: 248, 282-283）

⁴¹ 乃昌（許乃昌）（1923b: 4）。

⁴² 共產國際脈絡下的民主主義革命綱領，是很晚才在東方各地取得支配地位的指導理論。①在共產國際存在的期間（1919-1943），除了1927年前後曾因托季聯合反對派全面反對斯大林路線而導致思想混亂及分裂之外，都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性質將首先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列寧指

好比平平同人「少峰」以 1920 年陳獨秀（1879-1942）反對「民主主義」的言論作為中國可以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論據之時，陳獨秀卻已轉軌支持了「民主主義」。⁴³兩者之間的落差，反映了中共當時理論影響力的限制。

當然許乃昌與瞿秋白的對話，仍可能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意識下進行的討論。許乃昌不見得沒有認識到「民主主義」對於無產階級的意義，⁴⁴甚至他可能也知道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性。真相終究已然無法證實，只能揭示各種可能性。許乃昌與瞿秋白在台灣革命性質上的對話在**台灣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無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有一點是有趣的：瞿秋白只與許乃昌爭論兩條路線，而不討論「整個民族

出：「殖民地革命在最初時期不會是共產主義革命」，「在其發展底第一階段，殖民地革命應當按照帶有純粹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各點的綱領去進行，如分配土地等等。」（列寧與斯大林，1953: 85）就是在資本主義佔統治地位的殖民母國日本，也因共產國際認定日本天皇制政權的封建性格有特殊作用，所以日共自 1922 年建黨以來幾乎所有綱領（除了曇花一現的「1931 年綱領」）都規定日本革命有民主主義革命任務乃至階段（日本共產黨史資料委員會，1960；村田陽一，1986, 1993）。在中國，雖然 1921 年中共一大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綱領，卻也隨即在 1922 年中共二大上被共產國際所克服，轉為民主主義革命綱領。甚至台共的 1928 與 1931 年兩份綱領，也規定台灣的革命性質首先是民主主義革命。換言之，共產國際把民主主義革命綱領貫穿在東亞社會主義運動之中。^②雖然日共也是民主主義革命綱領，但日共除了必須同日本既有且混亂的社會主義思潮鬥爭，還必須同強大統一的天皇國家鬥爭。日本共產黨在 1922 年 7 月成立之後，1923 年 6 月便遭到了第一次「大檢舉」；1924 年，以山川均為代表的日共領導人不經共產國際同意而自行「解黨」。在此逆境下，日共連自己的綱領都不能傳播到群眾中（市川正一，1954: 65），人在中國的許乃昌顯然更難了解日共的民主主義革命綱領。^③當時中共的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則有個發展的過程。中共二大改提出民主主義革命綱領之後並未立即系統化；關於綱領系統化的時間至少就有兩種說法。曾是中共早期黨員，後來轉變為中國第一批托洛茨基左派反對派的鄭超麟，認為是 1925 年 1 月的中共四大（鄭超麟，1996: 251-253）。周恩來則認為是 1928 年 6 月的中共六大，「六大前，中國黨是不懂這個問題的。」即便「從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到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承認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但是當時對於民主主義革命的認識「實質上是舊民主主義的、是十八、十九世紀的西歐資產階級革命的觀點。」當大革命失敗，思想混亂便馬上出現（周恩來，1983: 158-160）。無論是中共四大或六大，都晚於〈黎明期的台灣〉成文的時間。或許可以解釋許乃昌對於國民革命、乃至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解何以不全。^④而且，當時的台灣尚未建黨，共產國際的理論規定根本不可能藉由紀律而貫徹在台灣共產主義者中間；就算以中共黨員的身分來要求許乃昌接受共產國際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規定，中共所可能提供的思想指導也有限。對於運動核心的瞿秋白來說，只須指出革命存在階段性，便已足夠。換言之，存在於許乃昌、中共、日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是運動開展的不平衡以及尚不成熟的民主主義革命綱領，當時的東亞社會主義運動也未以共產國際為核心而在組織發展上摺成一體。

⁴³ 少峰（1924: 1）。「少峰」在文中並未指出他所引用的陳獨秀言論之出處。經考證，乃是陳獨秀寫於 1920 年的文章（獨秀〔陳獨秀〕，1920）。

⁴⁴ 許乃昌曾就臺灣人是否應先「先建設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而說，「我只稍承認其具片面的真理性。」（秀湖生〔許乃昌〕，1923b: 46-47）顯然他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也沒有完全否定。

的無產階級化」是否正確。雖然無法揣度瞿秋白此處留下空白的理由，但與「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類似的觀點，卻是中共內部也曾存在的。負責中共北方黨務的李大釗（1889-1927）曾把中國看做是被「世界的資產階級」所壓迫的「世界的無產階級」：⁴⁵

國內的產業多被壓倒，輸入超過輸出，全國民漸漸變成世界的無產階級……在一國的資本制下被壓迫而生的社會的無產階級，還有機會用資本家的生產機關（生產工具）；在世界的資本制下被壓迫而生的世界的無產階級，沒有機會用資本國的生產機關……這就是世界的資本階級壓迫世界的無產階級的現象，這就是世界的無產階級尋不著工作的現象。歐美各國的經濟變動，都是由於內部自然的發展；中國的經濟變動，乃是由於外力壓迫的結果，所以中國人所受的苦痛更多，犧牲更大。

無論許乃昌還是李大釗，他們都用階級對立來描述民族對立；甚至認為這兩種對立將確實在實際生活中重合。這種極端強調「階級鬥爭」、或把「階級鬥爭」加以不斷引伸或者渲染的作法，可能並非偶然。就在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建議而放棄以「階級鬥爭」為主的社會主義革命，轉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特別是國民黨）進行「民主主義」的合作之時，黨內外都曾引起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的爭論（如同許、瞿兩人的對話）。其中最反對中共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勢力，恰恰存在於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共產主義運動中，也就是許乃昌在〈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與中共並列說明的「異端」共產黨——「今日派」。

3.比較：異端共產黨「今日派」與中共之間的革命性質論爭

中國共產黨創建史長期以來都在「南陳（獨秀）北李（大釗）」的單一脈絡中說明。在這種認識裡，中共是由各地「共產主義小組」進行組織準備之後才於

⁴⁵ 李大釗（1920）。

1921年「一大」正式建黨。近年的研究則突破此傳統觀點。楊奎松、石川禎浩等學者指出，「南陳北李」並非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唯一脈絡；各地所進行的組織準備，也並不僅僅是被矮化描述的「共產主義小組」而已。當時確實在各地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共產黨」。只是陳獨秀、李大釗的組織得到共產國際的最終承認才吸納或消滅了那些非正統的異端「共產黨」。比方石川禎浩所專門研究的、由「黃介民」、「姚作賓」所建立的「大同黨」。

「今日派」就是這類異端共產黨，然而迄今少有研究。他們在1922年前後，以《今日》雜誌為中心，建立起被中共稱為「今日派」的團體，領導人則是國會議員胡鄂公。胡鄂公（胡南湖，1884-1951），湖北江陵人，辛亥首義功臣。在一九二〇年代前期，曾任眾議院議員、北京政府官員。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胡鄂公及其周邊友人逐漸左傾。⁴⁶1922年2月15日，胡鄂公組織發行了馬克思主義宣傳刊物《今日》（月刊）。⁴⁷這份刊物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有重要意義，是最早將《哥達綱領批判》、《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等經典文獻翻譯刊行的園地。

據今日派呈交共產國際的報告稱，1922年2月16日，「中國共產主義同志會」正式成立。胡鄂公任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據言建立起遍及全國九省十二個地區、共一萬正式會員的組織。⁴⁸許乃昌於1923年指出：⁴⁹

今日黨（又名共產主義同志會）與社會主義青年團都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團體。胡南湖先生及鄺摩漢先生乃其中堅人物，其下有五十餘名熱誠的黨員，其中還有八九名女性黨員。北京天津一帶都屬此黨的勢力範圍。

鄭超麟（1901-1998）則回憶：⁵⁰

當時中國除了共產黨以外，北京還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組織，出版了

⁴⁶ 目前較詳盡的胡鄂公史實考證，可見賀覺非（1982: 470-476）、江陵縣志辦公室（2000）。唯上述二文仍有考證錯誤之處。早期關於《今日》派的研究，可見皮明麻（1991: 424-425）。對於《今日》雜誌的介紹，則可見〈今日（刊物解題與目錄）〉（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1979b: 435-440, 1118-1121）。

⁴⁷ 這是正式向北京政府登記的合法刊物。詳細資訊見：〈北京地區報刊註冊統計表〉（1912年5月—1928年5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91a: 351）以及〈今日（刊物解題與目錄）〉（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1979b: 1118）。

⁴⁸ 〈中國共產主義同志會報告書〉，《共產主義》月刊第1期，轉引自楊奎松（1997: 3-4）。

⁴⁹ 秀湖生（許乃昌）（1923a: 40）。

⁵⁰ 鄭超麟（2004b: 196）。

《今日》雜誌，領袖是國會議員胡鄂公。

8月15日，《今日》登出〈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宣言（附簡章）〉的啟事，宣告「馬克斯主義研究會」成立。⁵¹因此，當胡鄂公的「馬克思（斯）主義研究會」，與李大釗等「正統」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斯）學說研究會」（1921.11.17公佈發起啟事⁵²，實際建立期間則可能更早。⁵³這是中共建黨前後最知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團體），並列於「反帝大聯盟」的參與團體時，並非名稱恰巧相似或抄錯。⁵⁴只是目前的中共創建史研究常將「馬克斯學說研究會」混同於「馬克斯主義研究會」。⁵⁵值得注意的是，在現存的「正統」派「馬克斯學說研究會」的會員名錄中，也可以看到台灣人的名字：一個是名為「王錚」的「台灣基隆」人，單位記為「北大文學院」，另一個則是前面章節討論范本梁（1897-1945）時所連帶提及的謝廉清（1903-1961）。其姓名記為「謝連清」，出身地記為「台灣」，單位則記為「廈門集美」。⁵⁶「廈門集美」也就是台灣社會運動史上許多運動者（比方翁澤生，1903-1939）曾學習過的廈門集美學校。⁵⁷雖然謝廉清列名於「正統」派的「馬克斯學說研究會」，但他與「今日派」也有關係。下一章將討論這個問題。在此，先把「今日派」的故事繼續說下去。

「今日派」一語典出於1922年12月27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

⁵¹ 馬克斯主義研究會（1922: 60-61）。就此來看，皮明麻（1991: 424-425）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志會」即「馬克斯主義研究會」的說法，恐非正確；後者可能只是前者的群眾組織。

⁵² 〈啟事〉中並言，這一研究會實際創立於1920年3月。據石川禎浩研究，這似乎是各種關於「馬克斯學說研究會」成立於該時間的唯一根據。以上並見：倪興祥（2006: 145）、〈發起馬克斯學說研究會啟事〉（1921.11.17）（高軍等，1986: 408-409）、石川禎浩（2006: 176）。

⁵³ 見李丹陽（2004: 51-59）近年的研究。

⁵⁴ 反帝大聯盟的參與團體，有不少名稱明顯左傾的組織；比方「中俄協進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馬克思經濟學會」、「社會（主義）青年團」、「中俄問題研究會」、「無產者同盟」（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63: 108-109）。當然，今日已無法查考這些組織的虛實。

⁵⁵ 有些資料泛泛寫之，動輒將胡鄂公的「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名之於李大釗的團體，忽略「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另有其組織的歷史事實，如歷史當事人劉仁靜（1980）。有趣的是，雖然學者楊奎松很清晰地注意到胡鄂公及其《今日》雜誌同人的存在及意義，卻將他們的研究會誤稱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如楊奎松（1997: 3-4）。有些資料則泛泛列之，將胡鄂公的組織視同於李大釗之團體，歸類為同組織的研究資料。比方郝志群（2000: 173）。書中收錄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一條，便將《今日》雜誌中的〈馬克思（斯）主義研究會宣言（附簡章）〉列入李大釗的「馬克思（斯）學說研究會」。

⁵⁶ 〈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發起人及部分會員名錄〉（羅章龍，1989: 65-67）。

⁵⁷ 但在集美學校所認可的畢業生名錄中（福建私立集美學校二十周年紀念刊編輯部，1933：全校歷屆畢業生一覽表），卻找不到「謝廉（連）清」的名字，也許他曾就讀，但沒有畢業。

導週報》。在《「今日」派之所謂馬克思主義》一文裡，作者「田誠」點名批判了《今日》與胡鄂公。不過「田誠」的批評實是反批判，因為今日派反對國共合作並首先攻擊了共產黨與陳獨秀。自 1922 年 7 月召開的中共「二大」之後，中共便正式把「一大」認為中國可以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轉換為先進民主主義革命，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兩階段革命論。9 月，陳獨秀於中共機關刊物《嚮導週報》第 2 期發表〈造國論〉一文，將中共的路線轉換公開化，因為這篇文章公開號召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而不是農民）進行「兩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兩階級聯合」體現為共產黨與「民主派」的合作；而當時中共所認定的「民主派」，就是中國國民黨。

中共的改弦易轍引來「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的今日派之批評。其批評集中於 1922 年 12 月 8 日出版的《今日》第 2 卷第 4 期。⁵⁸同人熊得山（1891~1939）反對中共「同民主派的國民黨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並認為中國未必不能直行「社會革命」。他只有一句感想：「馬克思主義啊！你在中國多麼倒霉！」⁵⁹由於陳獨秀在中共黨內的領導地位，使其成為今日派的箭靶。今日派同人「初民」甚以「陳仲甫派」（陳獨秀派）指稱中共，「因為大家深知道陳獨秀先生，總算是共產黨裡面的中堅」。⁶⁰

但中共方面卻只有前述「田誠」發表一篇文章回敬。「田誠」指責率領「共產主義同志會」的胡鄂公不過是北洋政府的扈從者。「田誠」認為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代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個個真實的馬克思派現在都應該跟著中國共產黨去贊助國家主義的革命運動才是。」⁶¹文中所謂「國家主義」

⁵⁸ 請參見：熊得山（1922）、初民（1922）、汝為（1922）等人的批評。

⁵⁹ 熊得山（1922: 2）云：「我說許多朦朧蓋面底話，現在卻要點題了！，）就是陳獨秀君等所著一篇對於「時局底主張」，該文內容，是要同民主派的國民黨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向封建式的軍閥，繼續戰爭，嗣後陳獨秀在《嚮導週報》上又發表一篇『現在中國政治問題底我見』，彷彿先要有資本主義的經過，才可實行社會革命，看他們第一篇，幾如身墮五里霧中，好像看錯了題目似的，接連見著含有該黨分子的出版物如《嚮導週報》，《民權》等通帶「民主主義」的氣味，我才看出蹊蹺來了。哎！赤色的馬克思主義，給你染上了一片深灰色，馬克思主義啊！你在中國多麼倒霉！」

⁶⁰ 初民（1922: 7）。

⁶¹ 田誠：「在他們那幾篇文章裡面把陳獨秀同志實在說得太多。他們居然把陳獨秀同志加入國民黨的問題，認為是他變節了。這個多可笑呢。」「聽說『今日』的作者多半屬於一個什麼共產主義同志會，胡鄂公便是他們的領袖。這就更有趣了。胡鄂公是誰呢？他是從前王占元的政務廳長，現在的國會議員，他曾跑到保定去和曹錕拜拜壽，也曾率領議員到總統府去吵鬧吵鬧，新進又由黎元

應理解為相對於「社會」的「國家」，也就是追求國家統一與反對軍閥割據。

鄭超麟指出：「《今日》雜誌站在左的立場，反對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嚮導週報》回答它，指出胡鄂公在北洋軍閥御用的國會裡當議員；胡鄂公則徵引列寧在新著的《左派幼稚病》中議論議會運動的話替自己辯護。」⁶²當時對中共的路線轉換提出質疑者其實不只今日派，⁶³但中共只對今日派提出嚴厲批評。然而爭論並未引起大波瀾。也許中共除了批評之外，更重視團結；或許今日派也是如此（更何況胡鄂公的議員身分也使今日派處於尷尬地位⁶⁴）。實際上，今日派旋即合流於中共的黨組織，⁶⁵不再公開反對「民主的聯合戰線」。不過「反帝大聯盟」遺下的文獻顯示胡鄂公及其同人直到 1925 年底都還在宣稱以「社會主義」革命——而非中共所主張的「民主主義」革命——反對「帝國主義」。⁶⁶或許胡鄂公為首的今日派份子，終究沒有完全接受中共中央的見解。

胡鄂公加入中共的時間可能是 1923 年底。⁶⁷鄭超麟推測，當時的共產國際

洪保荐他做教育次長，給他二等嘉禾章。他真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他們那一組人中間，也許有些誠實的分，也許有些真正想做馬克思派學生的分子，不過懂得還太少。他們大叫特叫的說：共產主義者要推翻資產階級，反去與資產階級連絡，不是變節麼？」「如果他們自信是誠實的分，如果他們真要做有氣節的馬克思派，或許首先便要拿胡鄂公等的行動，用馬克思派的初淺觀念，加以深深的考慮。」「我們還可以說：中國現在唯一的革命的馬克思派的政黨是中國共產黨，僅僅中國共產黨才能代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而且個個真實的馬克思派現在都應該跟著中國共產黨去贊助國家主義的革命運動才是。」（田誠，1922：合訂本頁 122-123）

⁶² 鄭超麟（2004b：196）。

⁶³ 陳獨秀〈造國論〉發表後，《嚮導週報》馬上收到商榷的讀者投書，並有高君宇加以回覆，但討論極友善（思順與君宇，1922）。

⁶⁴ 今日派同人鄭摩漢批判議會運動云，「社會主義實現手段分二種：（一）革命運動；（二）議會運動。議會運動，近十年來，已經破產，因為從前的社會主義者一到議會裡，即為資本主義官僚主義所迷醉。」然而鄭摩漢卻又回護胡鄂公的議員職，「但我以為這是人品問題，不是場所問題，為什麼？彼人若果是真正社會主義者，就在議會裡亦未嘗不可以宣傳或運動。」（摩漢〔鄭摩漢〕，1922：封面裡）。

⁶⁵ 僅以反帝大聯盟來說，曾經並列於參與團體的「馬克思（斯）學說研究會」與「馬克思（斯）主義研究會」，在日本參謀本部於 1925 年 10 月編印的情報材料裡，就只剩下前者——「馬克思學院（說）研究會」——也許正反映了兩者之合流或後者之瓦解。另外，胡鄂公領導的「國民對英外交聯席會議」等團體也消失了（參謀本部，1925）。

⁶⁶ 胡鄂公：「帝國主義是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反帝國主義是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產業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還沒有充分的實力的時候，抓住沒有發達的希望，……實行社會革命，勵行國家資本主義，以無產階級的權力和理想努力建造共產主義的物質存在條件，以反抗帝國主義，也是站在反帝國主義的戰線上的。」「只有團結起被帝國主義壓迫的世界的無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實行『階級鬭爭』」（胡南湖〔胡鄂公〕，1926：41, 43, 49）

⁶⁷ 關於胡鄂公的黨籍問題，據包惠僧回憶，中共三大（1923.6.12-20）一開幕就討論胡的入黨，爭論很久，終遭否決。包惠僧並回憶，9 至 10 月間，李大釗曾對他說，胡鄂公「要求入黨是真，反

曾有意調解中共與今日派之間的矛盾。⁶⁸假使共產國際對今日派之重視確為史實，也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除了今日派所自稱的實力外，具有眾議院議員身分的胡鄂公更是中蘇建交的早期支持者。當時胡鄂公甚至有過中蘇建交與國家制憲同等重要的言論。⁶⁹但無論共產國際是否極力撮合中共與今日派，胡鄂公都因長期保持秘密黨員身分而不為人知。⁷⁰胡鄂公的後續經歷則多與地下工作有關。夏衍（1900-1995）回憶，1927年，「國民黨北京特別支部書記」胡鄂公自楊度（1874-1931）得到情報，向李大釗等人告知張作霖即將抄入蘇聯大使館。惜功虧一簣，李大釗壯烈犧牲。⁷¹三〇年代，胡鄂公繼續進行地下情報工作。抗戰勝利前夕脫黨並於1949年來台灣，⁷²1951年逝世於台北。⁷³

對賄選是假，「我們不要上了他的當。」（包惠僧，1983: 12, 362-363）但胡鄂公當時可能已經入黨。同年底的三屆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1923.11.24-25）決議「胡鄂公，在未能證明其確未幫忙賄選以前，依舊停止出席小組會議；熊得山汪劍儂因與胡有連帶關係，亦應同樣辦理。」（中央檔案館，1990: 183-184）此事並被瞿秋白特別寫在其黨史報告之內（瞿秋白，1982: 179）。如果胡鄂公此時尚未入黨，大概不可能「停止出席」。

⁶⁸ 以彭澤湘（1899-1970）、林可彝（1893-1928）為代表的今日派份子曾先後赴蘇留學。鄭超麟憶此二人，推測彭澤湘的赴蘇，可能是共產國際意圖調解國內組織矛盾的結果。鄭超麟云：「第三國際在中國的密使圖謀調解，甚至請「今日派」派代表來莫斯科參加第三國際大會。這種幕後秘密，我不很清楚。彭澤湘也許就是「今日派」的代表，與陳獨秀同來莫斯科參加第三國際第四次大會的。我們到時，彭澤湘已經加入了共產黨。後來胡鄂公以下的人差不多都加入共產黨，但在革命中未曾發生什麼作用。」（鄭超麟，1996: 188, 196-197）。可惜彭澤湘在其〈自述〉中，完全未及「調解」之事（彭澤湘，1983: 205），林可彝的相關傳記（林時中，1987）也沒有涉及今日派問題，故無法查核確切狀況。

⁶⁹ 胡南湖〔胡鄂公〕（1922: 1）。

⁷⁰ 比方蔡和森在1926年還認為「投機政客（胡鄂公）等」在建黨初期「借立法運動來欺騙工人」（蔡和森，1982: 34）。在《中國共產黨北京市組織史資料》裡，胡鄂公的黨員身分甚至直到大革命失敗後的1927年11月，才以中共北京臨時市委宣傳部長的職位列出（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1992）。入黨故是無疑，唯細節已闕漏太多。

⁷¹ 夏衍（1988: 403）。胡鄂公在1927年的地下黨務活動還可見張友漁（1990: 119-121）的回憶。

⁷² 賀覺非（1982: 470-476）。

⁷³ 胡鄂公於1951年10月8日病逝於台北和平東路寓所（中央日報，1951）。

第三節、結論

1. 如何決定革命性質

主張「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的社會主義者的問題意識大致如下：一是自己的進步運動是否可能，二是既存的社會運動是否具有進步性。甚至，當既存的社會運動沒有或失去進步性時，還必須面對運動參與者是否仍有進步性的問題。前兩個問題是台灣社會主義者所共有的基本問題，後一個問題則是共產國際陣營底下的共產主義者才有的問題。

當時台灣社會主義者的「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以「勞／資」階級分化為核心。並把問題集中在無產階級能否成長以及資產階級究竟會成長或破產。階級數量被他們視為階級力量的體現，因此他們不但論證無產階級可以分化而出，甚至極力論證可以大量分化而出。從用語的使用來看，當時的台灣社會主義者描述「路線 I」時的常用語常常突顯革命動力（比方「無產階級運動」），這與日後突顯革命任務的規範化用語（如「社會主義革命」）大不相同。這一變化與周恩來所曾回顧的一個歷史轉折是相合的：「後來才知道：應以革命任務來決定革命性質，而不是以革命動力來決定革命性質。」⁷⁴但當革命性質真的由革命任務去決定時，無論是「無產階級運動」或是「社會主義革命」，都讓位給了透過革命任務而被表述的「路線 II」，即「**民主主義**革命」。這種變化是與後來的運動日趨認識到無產階級無法大量分化而出相聯繫的。

雖然後來的運動認識到無產階級無法大量分化，但他們並沒有像 1923 年的許乃昌或 1924 年的佐野學那樣，從世界革命的角度來論證革命。因為在世界革命由於種種因素而日漸難以實現的狀況下，排除世界革命的因素以考慮一國

⁷⁴ 周恩來（1983: 158）。

之內的革命性質，成為很現實的問題。有些人將這種現實性視同妥協，但其中其實也包含如何直接投入戰鬥。誠如主張匈牙利進行民主主義革命而遭共產國際打壓的盧卡奇所言：⁷⁵

人們仍舊普遍認為，由於匈牙利早在 1919 年就存在過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所以，從歷史上講，採取這種後退的（民主主義共和國）步驟是沒有可能性的。

當我認識到……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間，只要它是真正的革命，就沒有隔著一堵萬里長城的時候，我已到了我能夠自由行動的領域，……

這裡還須考慮一個問題，也就是「無產階級」這樣的概念（從而「無產階級化」）賦予了當時的台灣社會主義者以什麼樣子的**感覺**，以及他們為何從當時的台灣經濟狀況中感受到那樣的感覺。他們感受到的也許是種整個民族普遍貧困化的趨勢，而「無產階級」這樣的概念也許正能說明他們對於這種趨勢的感覺。其實無產階級就是工人階級。「無產階級」著重說明生產者同生產資料之間的分離，「工人階級」則著重說明「無產階級」重新與生產資料在僱傭勞動的生產關係之下的相結合。當時的台灣社會主義者之所以普遍使用「無產階級」的概念（從而「無產階級化」），也許正是著眼於生產者同生產資料之間的分離，只是，這一分離並未產生相應的結合。

「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再現出 1848 年《共產黨宣言》所勾勒出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兩階級決戰的預期畫面；在《宣言》中，多數階級都將破產而加入無產階級的陣營。「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也再現了恩格斯於 1845 年發表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根據親身觀察和可靠材料》的觀點：⁷⁶

隨著小資產階級的不斷破產，隨著資本迅速地向少數人的手裏集中，無產階級的人數將按照幾何級數增加起來，使整個民族，除少數百萬富翁外，很快都成為無產階級。但是，在這種發展的進程中必將有這樣一個時機到來，那時無產階級將看到，他們要推翻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多麼容易，於是革命就跟著到來了。

⁷⁵ Lukács (1986: 123, 260)。

⁷⁶ 恩格斯 (1957: 585)。

這種再現也許是向馬克思主義的回歸。但若以更歷史的方式說：其所回歸的對象，也可能是革命者在馬克思主義生根萌芽於任何嶄新的時空環境之時，常把客觀形勢估計得更樂觀的那種憧憬。

2. 為何、如何論證資產階級的革命性

當時台灣社會主義者對於資產階級及其運動的考察，不只從資產階級在萌生與破產之間所出現的數量變動入手，而還著眼於台灣資產階級與日本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一方面，他們認為兩者本質上必然共謀；另一方面，遽變的歷史事態又推翻這種先驗推測。簡而言之，無論以何種「經濟」的概念與邏輯包裝運動者對兩者關係之判斷，都難以擺脫歷史事態所造成的影響。請願運動的資產階級恰恰由於資產階級之請願運動的被打壓（治警事件）而獲同情。也許正因如此，戰後的歷史學解釋便不再將台灣「資產階級」視為「資產階級」本身，而從非資本主義的存在定義這個階級，比方涂照彥（1936-2007）所謂的「本地資本」；⁷⁷或者先從這個階級的實際作為來探索這個階級的實際性質本身，比方若林正丈所謂的「本地地主資產階級」。⁷⁸

⁷⁷ 涂照彥所謂「本地資本」（土着資本，どちやくしほん）的經濟存在，透過「地主制」而得到保存，並與日本資本主義發生並存、拮抗與潰滅。拮抗的政治表現，即是一九二〇年代台灣的民族運動。對於「地主制」的進一步反抗，則形成了農民與工人的階級運動（涂照彥，1999：429-430）。

⁷⁸ 若林正丈（2007：427-435）與涂照彥的方法類似，卻又頗為不同。在涂照彥而言是「日本資本」與「本地資本」相對立的範疇；若林則相應改為「現地權力」（即台灣總督府，不直接等於日本資本主義）與「本地地主資產階級」。這兩者之間存在著若林所謂「由交換・仲介進行控制的機制」透過這個機制，「政治實力」與「經濟實力」相襯地形成，並集中體現於一個階級之上，即若林所謂的「本地地主資產階級」。雖然若林並未從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的聯繫去分析「本地地主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也不討論這一階級與日本資本主義之間有什麼關係。但將「地主」（前資本主義的支配階級）與「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支配階級）合成一個概念，不能說若林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再者，既然「本地地主資產階級」是在「日本權力、資本由上而下強行殖民地式近代化之諸過程——中變形形成的」，換句話說，是從日本殖民之前就既有的階級變形而來的。那末，這種變形就可能意味著前資本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型。但因若林並不處理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寬泛的概念設定便有利於迴避轉型問題。再換言之便是：領台前的「有力者」大體上仍是領台後的「有力者」，若林只關心這些有力者與現地權力之間的「政治」關係，而不關心有力者之所以持續成為有力者的經濟基礎及其變遷。至於現地權力，對於若林來說，由於不直接等於日本資本的政治代表，也

「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最重要的理論進展是將本土資產階級及其運動切割開來：一方面其否定本土資產階級的請願運動，另一方面則肯定參與請願運動的本土資產階級。肯定某部分本土資產階級具有進步性，從而論證整個民族都可以成為革命動力。這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重大理論進展。其實瞿秋白與許乃昌的設想本質沒有不同，因為瞿秋白的革命方案也以整個民族為革命動力。兩者的關鍵差異在於：瞿秋白不以各階級差異的泯除作為論證的基礎，而是把各階級聯合從而以整個民族為範圍的「國民革命」作為他所推薦的方案。

就「國民革命」是共產國際要求中共所推動的運動而言，瞿秋白的推薦是暫時壓制住托洛茨基派的共產國際主流路線的反映。然而許乃昌的「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卻絕非共產國際的觀點。因此許乃昌與瞿秋白的對話並不能簡單看成共產國際內部爭論（斯大林的「民主專政」路線／托洛茨基的「無產階級專政」路線）乃至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爭論的反映。必須同時考慮其中的自發性，甚至必須考慮許、瞿兩人所各自支持、反對的對象的歷史實態。雖然許多爭論都能體現「國際」的共性，但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這種共性可能僅僅屬於形式，內容卻不盡相同。今日派與中共之間的論戰就是最好的例子。兩造在兩種革命性質間的爭論並不完全來自於「國際」。之所以不完全，在於中共是「國際」支部，而今日派只是異端。所以今日派對於中共接受「國際」指令而轉向「民主主義革命」的反應，也許更適合以「基本教義派」的態度來說明。也因此，發生在今日派與中共之間的論戰，恰恰體現「論爭」本身所必有的多樣性。也就是說：雖然現象上看起來像是發生在「國際」內部的論爭，本質上卻未必如此。不能看到中共支持民主主義而今日派支持社會主義，就將兩者分別歸類於斯大林派或托洛茨基派。

然而歷史的弔詭也恰恰在此。1924年9月17日，托洛茨基發報致電由前今日派份子所組織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⁷⁹

反帝國主義大聯盟執行委員會諸君：我以至誠之心歡迎你們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計畫，這種帝國主義現在正在做最後的預備以奴役中國。反帝

就成為了一個相對純粹、獨立的政治力量。

⁷⁹ 全文收錄於李漢石〔李伯剛〕（1926: 259-261）。

國主義運動的進步，端賴中國勞動群眾和忠於人民的智識階級的團結和自覺心的增長；而各國革命的無產階級之自覺的援助，及世界帝國主義寇賊間不可避免的衝突，也在在都足以促你們運動的成功。蘇維埃大聯合國，忠於他的創造者列寧大師，是完全站在被壓迫的民族這一邊而反抗壓迫者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侵凌侮辱，致使中國人民全向排外的方向走，以為凡外人都可恨，凡外來的事物也都可恨。但未免陷於敵友不分的狹義愛國主義的弊病。中國的革命健兒，應該使人民辨識各帝國主義的國家之內都含有明顯的兩個基本階級，即資本主義的有產階級與革命的無產階級。只有與全世界勞動階級聯合起來，中國的民治主義〔民主主義〕才能驅除帝國主義的侵掠和加於中國民族獨立的危害。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能詳細論列這個有關於全世界的大問題，援助中國民族的解放運動，是每個革命者的責任，而反帝國主義大聯盟委員會諸君所肩的責任尤其重大。

此文是否為托洛茨基最早致電中國的文獻，尚不可知。不過托洛茨基在電文中所提到的「希望在最近的將來能詳細論列這個有關於全世界的大問題」是什麼呢？是否正是他始終懷抱心上的「不斷革命論」？歷史讓蘇聯的托洛茨基與中國的今日派的相遇成為一種預示。當托洛茨基再次出現在中國革命上，今日派與「陳仲甫派」之間所爭論的問題，就成為「陳仲甫派」與中共之間論爭的主題了。

3.餘話：許乃昌的蘇聯之行

雖然許乃昌在東方大學的學習狀況尚不可知，但當時滯留蘇聯的日本共產主義領袖片山潛（1859-1933）曾向謝雪紅（1901-1970）提及許乃昌拜訪自己之事。⁸⁰然而許乃昌在 1925 年夏天便離開了蘇聯，留蘇的時間很短。按謝雪紅的說

⁸⁰ 謝雪紅（2004: 216）。

法，許乃昌的離開是「脫黨」。⁸¹

日本警察機關的記述如下：⁸²

……當時感到以前之所想像與現實頗有差距而失望，於是在本年〔1925〕五月三日於同地出發，稱經上海而歸國，八月二十六日進入東京並居住於前述地址，現在正準備進入正則英語學校就讀。⁸³

許乃昌自己供述的材料似乎也可提供佐證：⁸⁴

我因耽溺於閱讀山川均的著作而嚮往俄國，以著永居於彼的決心而與一位中國商人在無護照的情況下抵達海參崴，又因善操中國語而能以中國洗衣工人的身分矇過官憲而抵莫斯科，在當地，找到相識的中國人（洗衣業者），由他介紹而到「瓦斯金」（ワスキン）村的國營農場工作，月薪五十盧布，一天工作八小時，居住於國營宿舍，房租每月兩元，三餐在叫做「可培拉」（コペラ）⁸⁵的消費合作社所經營的餐廳裡解決，每月繳十八元，每日菜色幾乎相同；早餐是麵包、牛油，午餐則是通心麵附湯，晚餐以麵包配肉為通例。依據工農政府的勞動法規定，乃是八小時勞動，但實際需要工作十小時左右，我因年少的原由，只做八小時。工資一般成年人是月薪七十盧布，但有人發牢騷謂之還不及革命前的三分之二。赴俄之前，以為對於俄國勞動者均對勞動問題等都有認識，實際上一無所知者仍然很多。也有向政府大為謾罵者，因此在同宿者中，還有人受到「格別烏」之調查。然而大部分都是放任狀態。聽說現在政府為了消滅過激的團體而忙著，無暇理會惡言謾罵。

雖然不清楚莫斯科有多少日本人，不過，有次因為信件檢查而拜訪了一間有外國留學生的學校（校名不知），認出二位講日語的學生，於是自稱是曾經遊學東京的中國人而向他們攀談，對方也親暱地與我交談，在交談中得知，一位來自於東京南葛的工會，名曰山田，他給了我

⁸¹ 謝雪紅（2004: 216）。

⁸² 外務省記錄（1925e）。

⁸³ 《台灣社會運動史》有許乃昌離開蘇聯之後的兩種記載：一是他在6月返回上海並於8月赴東京，二是於7月歸返北京。如果二者均正確，則有可能是6月去上海之後，於7月抵達北京，隨後8月才去東京（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245-246; 1989c: 3）。

⁸⁴ 外務省記錄（1925e）。

⁸⁵ 此應為「消費合作社」的簡稱念法，不是某個合作社的名字。

一本叫做《前進》（進め）的雜誌。另一位則是曾工作於神戶造船廠，叫做本間。對我看穿俄國工農政府不是無產階級的天下，而是共產黨之天下的看法，有所了解，並對黃種人被侮蔑的態度也起了不少反感。

工農政府當初在中國人與朝鮮人之間竭力宣傳，但已認定中國工人是天生的守財奴，終究不會遵奉共產主義而予放棄；此前在莫斯科，要中國人組工會，朝鮮人也得到不少宣傳費，錢是花了，卻一無所成，這種失信之人輩出的狀況，已到信用掃地的地步。

俄國的出入境對於日本人而言，頗為嚴格，但對中國人、勞動者等則極為寬鬆，住在西伯利亞的官員大都通曉中國語，所以只要說是中國人，就用中國話簡單地問一些入國目的即可。如前述，我入國時沒有簽證，出國時也不需什麼出國證明等，滯俄期間，曾以將近兩個星期的時間前往柏林訪友，此間只借了中國人的工會會員證即可。在前述教育外國留學生的學校之廣場，曾聽到片山潛的演說，他講的是英語，聽不太懂，片山除了經常旅行於各地，幾乎不做什麼事，實處可有可無的地位，一般來說，在俄國，年輕能幹者受歡迎，年老者則相反。

在俄國過著最安樂生活的人，是留俄的外國留學生。因為不工作而能生活者，實在只有他們而已，前述的山田、本間兩位，其穿著也頗為瀟灑。

如果考慮到許乃昌日後仍然持續參與社會主義運動、如果考慮到許乃昌迴避或隻言不提許多事實（比方他在東方大學的學習以及他與片山潛的親自會面），那末這份通篇以批評構成的材料自然有實有虛，是許乃昌選擇性的供述。據郭杰與白安娜所見材料，許乃昌罹患肺結核才是他提早離開的重要原因。⁸⁶因此歷史的複雜性就在這些虛實之間。雖然許乃昌直到 1927 年都還在參與社會主義運動，後來卻突然全面退出。如果從他上面的供詞來看，日後的退出也許早有萌芽之兆。然而許乃昌的社會主義者生涯也伴隨著這種逐漸萌芽的念想而繼續進行。許乃昌作為 1926 至 1927 年間的「中國改造論爭」左派主將與 1927 年的東京台灣青年會左轉的領導者而走向另一個高峰。⁸⁷對於歷史的當事人來說，許

⁸⁶ K. M. Терпцкий (2005: 61)。

⁸⁷ 1926 至 1927 年間，許乃昌與陳逢源在《台灣民報》上展開以「革命」或「改良」為主題的論

乃昌不可能預期他日後的選擇與去向。但在 1924 年這個關口，許乃昌作為殖民地台灣第一個留學蘇聯者，以著十七、八歲的年紀獨闖蘇聯並以台灣人之出身首次向共產國際直接提交關於台灣情況的報告，無論如何都是一次空前的壯行。

戰，即「中國改造論爭」。此外，許乃昌並於 1927 年領導了日本東京台灣青年會的左轉。關於許乃昌 1926 至 1927 年間的思想與活動，可參見：邱士杰（2005a: 26-38; 2005b: 26-40; 2007: 69-140）。

第七章、「歷史建構」的條件

我們對你們朝鮮，台灣，緬甸，菲律賓群島，暹羅，波斯，埃及，阿剌伯，馬來半島，以及各種黑人們來說說罷。……

——「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24年7月20日¹

眾位同志！我們三十年前是中國福建台灣人，現在是帝國主義的日本壓迫下的台灣人。台灣人受日本之壓迫的痛苦，說不勝說，我不大會說北京話，要說也說不出來，——諸位只想想那些殘酷無理的強盜，是怎樣劫掠殺害那些善良的人民，就可以知道我們台灣人是受的怎樣的痛苦了。……

——謝廉清，1924年7月27日，北京「來今雨軒」²

¹ 《台灣民報》曾刊登這則宣言（〈致世界被壓迫民族的一封信〉）的原始版本（台灣民報，1924s）。在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後來出版的〈會刊〉第1期以及宣傳品《反帝國主義》一書中，這則宣言改成了「我們對你們印度，朝鮮，斐利濱群島，暹羅，安南，緬甸，波斯，埃及，阿剌伯，馬來半島，以及各種黑人們來說罷！」（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63: 106; 1926a: 172）。

² 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26a: 212）。

引 言、舊雨來，今雨不來

在民國肇建的年代裡，許多新生事物的萌發，大多脫離不了西力東漸的洋化色彩。對於沒有西方式「公共空間」經驗的中國人來說，近代意義上的「公園」就是這類「新生事物」。但在中國政治中心的北京，「公園」卻是以一種充滿了民族色彩的方式創設出來的。

1914年，由前清「社稷壇」改建而成的「中央公園」（後名中山公園）——首都北京的第一個公園——就是最好的例子。這是一座保存了古建築與古柏所構成之中國式造景的公園。但隨著五四以來群眾力量的崛起，這座古意盎然的公園也超出了育樂游賞的功能，成為北京民眾運動新地標。

1915年建立於公園之內的「來今雨軒」茶社則成為許多群眾集會與革命工作的重要據點。「來今雨」一語所具有之深意，一次又一次在各種舉辦於「來今雨軒」的集會中得到體現。³1924年7月27日午後，又一場集會在「來今雨軒」舉行。不同的是，一名台灣人來到了這裡。這個台灣人叫做謝廉清（1903-1961）。謝廉清，彰化人，別號紹仲、子夷。⁴1921年3月自台中商業學校畢業，1923年5月進入北京朝陽大學預科，⁵後轉入專門部經濟科第三班，並於1926年6月畢業。⁶他曾於1923年10月前往上海參與上海台灣青年會的成立並兼創會幹部。謝廉清於1924年成為本研究第四章的平社與赤華黨之成員。⁷

³ 關於「來今雨」一語的典故，最普遍的說法是典出杜甫《秋述》詩序，有新舊朋友歡聚一堂之意。

⁴ 外務省記錄（1930b）。

⁵ 興南新聞社（1943: 194）。值得注意的是，謝廉清自己所寫的簡歷（收存於女兒謝慧君）是「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預科畢業」（葉芸芸，2006: 174），而非朝陽大學預科。但可確定的是：朝陽大學有學生須先修習預科的規定（晨報，1923），而且謝廉清在1924年3月之後確實就讀於朝大。據《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言，謝廉清於1924年3月入學朝陽大學（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245）。謝廉清給《台灣民報》的投稿亦有「一九二四、三、三、於朝大」的記載（北京廉清〔謝廉清〕，1924）。

⁶ 朝陽大學的通訊錄記下這樣的資訊：「謝廉清 台灣台中 台灣彰化街，就讀於專門部經濟科第三班，1926年6月畢業；此外，還有兩個就讀大學部法律科第六班台灣人與他同屆，即「關錦輝（曉村） 台灣新化街四百零二號」與「周蚶目（翰穆） 台灣台北下奎府町一丁目百十二」（民國二十年大學部畢業同學錄籌備委員會，1931：已畢業同學姓名通訊處一覽表頁8, 9, 18）。

⁷ 詳見：虛無〔謝廉清〕（1924）、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84）。

此外，謝廉清還是「正統」共產黨體系下的「馬克斯學說研究會」會員⁸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⁹甚至可能是中共黨員。¹⁰

在「來今雨軒」那場一百二十餘人的集會中，有七十八人在一小時（三點至四點）之內輪番上台演說。¹¹謝廉清是這七十八人之一，更是當天的演講中少數留下講詞於後世的參與者（見本章附錄1）。與謝廉清相比，7月23日（也就是四天前）在台灣彰化發表講演的許乃昌（1907-1975?）就沒有這般好遭遇。許乃昌還沒把話說完，就被臨監警官中止。¹²

在《台灣社會運動史》眼中，北京的謝廉清與彰化的許乃昌（1907-1975?）是被相提並論的社會主義者，這兩人被認為「賦予指導台灣共產主義運動之使命」。¹³他們都曾是1924年上半年曾組建起來的平社與赤華黨的成員，卻在這兩個組織瓦解之後四散，並在北京或者彰化的不同場合裡面臨了不同的遭遇。雖然如此，他們卻仍在運動中活動著。許乃昌去了蘇聯。至於謝廉清，雖然人在北京，卻也同蘇聯產生了關係。實際上，來今雨軒所舉辦的那場集會，正是當時為了中蘇建交問題而舉辦的記者會；舉辦這場記者會的團體，則是極力支持建交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以下簡稱「反帝大聯盟」）。¹⁴

在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革命中，「反帝大聯盟」的出現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它的主要成員是「今日派」的餘緒；另一方面，由此掀起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促使義和團運動首次在全國範圍內得到重新評價，從而開啟了中國「革命史」之「歷史建構」。

⁸ 〈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發起人及部分會員名錄〉（羅章龍，1989：65-67）。

⁹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地方團，2001：52〉。謝廉清屬於朝陽大學的小組，當時全北京只有一百一十名團員。

¹⁰ 外務省記錄（1930b）。

¹¹ 晨報（1924）、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26a：206-207）。

¹² 追風（謝春木）（1924：14）。並見本研究第六章。

¹³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c：3）。

¹⁴ 關於謝廉清以及「反帝大聯盟」的相關史料，在此說明如下：1924年的謝廉清以《台灣民報》記者的身分在北京活動。在目前能確認為其作品的十一篇通訊裡，十篇發表於1924年（北京廉清〔謝廉清〕，1924；北京廉清虛無〔謝廉清〕，1924；虛無〔謝廉清〕，1924；廉〔謝廉清〕，1924a, b；廉清〔謝廉清〕，1924a, b, c, d），一篇發表於1925年（廉清〔謝廉清〕，1925）。除了《台灣民報》，謝廉清的史料還收存在他所接觸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之相關史料中。首先是謝廉清在來今雨軒的演說（謝廉清，1926a：110-115）。其次是他撰寫的〈帝國主義的運命〉一文（謝廉清，1926b：49-52）。詳情並請見本章後續注釋。

本章將說明以下現象：越寬泛的「統一戰線」越可能產生或需要「革命史」的「歷史建構」、越需要向過去汲取自己的詩情，並且通常與否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持續替代」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論述相結合。一九二〇年代「國民革命」在大陸上的發展就是最好的例子。肯定「持續替代」的論述——比方「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述——通常「歷史建構」很有限，因而限制了開展統一戰線的能力。而對同時代屢屢引入「國民革命」概念並同樣面對「歷史建構」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來說，來自大陸的「國民革命」正是重要參照系。

第一節、在歷史事件的重新評價中建構「革命史」

1. 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國民革命」

許乃昌與瞿秋白（1899-1935）將「國民革命」引入台灣革命討論的1924年之後，台灣社會主義者仍然關心著「國民革命」。1925至1926年之間，當時正在上海大學就讀的翁澤生（1903-1939）與蔡孝乾（1908-1982）為《台灣民報》傳回了大量關於國民革命的新聞。到了1926年底至1927年初的「中國改造論爭」，在許乃昌、蔡孝乾、翁澤生這三位參與討論的左派代表中，前兩位則極力論證了國民革命對於中國革命的重要性，以此說明中國的前途只能是國民革命，而不可能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果當時連溫卿（1895-1957）對於論爭本質的估計——即論爭實借「中國」問題之酒杯來討論台灣問題¹⁵——是正確的，那末，對於1924年否定台灣應該進行國民革命的許乃昌而言，他在中國改造論

¹⁵ 連溫卿（1928b: 15-16）：「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是以一九二七年一月，台灣文化協會改組後，極其多忙長成起來，遂見有兩個潮流的對峙，先是為改組以前，即有由中國改造問題，而引起對資本主義的論爭，亘三箇月間，而雙方的主張：台灣有資本主義也是沒有？很引起一般社會的留意。」「因為有這兩個潮流磅礴了台灣，送給台灣文化協會釀成分裂的動機，而使民族主義者總退卻，即結成了勢力組織著「台灣民眾黨」，以和台灣文化協會對立，自是以後，從來少數者的運動，即變作大眾的運動。」

爭中的主張無疑是一遽變。

1928年，台灣共產黨「一九二八年綱領」的〈政治大綱〉正式規定台灣的革命性質為民主主義革命。並如同1927年之前的中共那樣，稱之為「國民革命」。這意味著瞿秋白在1924年針對台灣革命性質而向許乃昌所提出的建議——「國民革命」——終於在1928年被台灣共產黨所接受（至少在字面上）。但還不止於此。因為台灣共產黨（以及協助草擬綱領的日本共產黨）甚至把「國民革命」這個概念當成歷史建構的材料。在台共的眼中，「國民革命」不僅僅是建黨之後的事情，更是從「台灣民主國」以來就形成的革命傳統。

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的〈政治大綱〉認為台灣民主國「表現出一種全民眾性的大眾行動的國民革命型態」，但日共原擬的〈政治デーゼ草案〉卻認為民主國「不是伴隨全民眾性的大眾行動的國民革命」。台共所做的更改是否是中共的指示？由於台共建黨大會上中共代表「彭榮」對政治大綱的意見並未涉及於此，或許可以推測是台共自己更動的。¹⁶總之，在1928年4月15日建黨的**這一瞬間**，1895年的「台灣民主國」與一九二〇年代的「國民革命」出現前所未有的等同。在等同中建構起橫跨1895至1928年之間的歷史進步主線。

到了1932年，日本共產黨指導下的台灣文化團體除了繼續肯定「台灣民主國」具有「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外，還進一步從「國民革命」的角度出發，將「噍吧哖事件」定義為未能進展至「全民眾的國民革命」。

詳情是這樣的：1932年，在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納普，ナルプ）指導下，留日的台朝左翼份子組成文化小組。「白秀悟」發表於該小組機關報《同志》（カマラード）的〈台灣獨立運動略記〉再次總結了民主國以來的台灣革命運動史。這篇文章明顯與日共為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原擬的〈政治デーゼ草案〉相類似，而與定稿後的〈政治大綱〉不同。（1）就民主國的革命動力而言，〈政治デーゼ草案〉認為是「資本主義的中農地主與小商人」，〈台灣獨立運動略記〉認為是「資本主義的中農地主小作人」（小作人即佃農），〈政治大綱〉則認為是「資本主義的中地主、商人及急進的武士」；（2）在民主國是否具有「全民眾的」和「大眾的」性質的問題上，前二者表示否定，後者則肯定之。

¹⁶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b: 602; 1989c: 25）、山辺健太郎（1971: xxii, 252, 253）。

(3)〈政治デーゼ草案〉否定民主國為「國民革命」，〈台灣獨立運動略記〉認為民主國是未能完成的「資產階級革命」，〈政治大綱〉則完全肯定民主國是「國民革命」。(4)〈台灣獨立運動略記〉論及「噍吧哖事件」時，認為那是一場沒能發展至「全民眾的國民革命」的起義。¹⁷

可見，直至 1932 年，仍有台灣左翼認為民主國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卻不再稱之為「國民革命」；同時，「國民革命」的時代被向後推移，顯示「國民革命」似乎在歷史認識中開始消退。無論如何，從台灣民主國、噍吧哖事件，到台共當下所將進行的革命，「國民革命」被視為一條貫穿這些事件的金線。這條金線意味著過去與當下的革命以「國民革命」為媒介而發生等同，而過去的歷史更因為「國民革命」這一媒介而得到重新評價，形成以「國民革命」為等同之媒介的歷史建構。

將過去的革命納入「國民革命」的歷史沿革，其實是一九二〇年代「中國國民革命」期間便已出現的現象。由於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所引入的「國民革命」概念正是由此而來，因此，探索「國民革命」歷史沿革在「中國國民革命」中的產生過程，有利於考察引入「國民革命」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

2. 重新塑造於一九二〇年代的「國民革命」

在國共合作之前，「國民革命」是孫中山與國民黨寥寥使用、長期廢棄，而且意義不同於國共合作下之「國民革命」的一個概念。孫中山首次提出「國民革命」一詞是 1906 年，但卻是相對於所謂「英雄革命」之語而提出，沒有被具體定義的內容。中華革命黨時期，孫中山縮限了「國民」的概念，認為之前將全國人民名之「國民」，是種「糊塗」，「必其有心贊成共和，而宣誓註冊者，乃

¹⁷ 相關文獻可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b: 66, 602）、山辺健太郎（1971: xxii）。形成於 1928 年的〈政治デーゼ草案〉、〈政治大綱〉與 1932 年的〈台灣獨立運動略記〉之間的關係尚有值得考究的空間，前兩份文件的傳播方式與影響則是更需深究的問題。

得名之曰國民。」¹⁸

孫中山與國民黨在 1924 年的國民黨「一大」正式重新啟用「國民革命」口號。但重新啟用這一口號的契機並非來自國民黨黨內，而來自於中共中央。1922 年，蔡和森（1895-1931）與陳獨秀（1879-1942）先後在中共中央主辦的機關刊物《嚮導週報》（1922-1927）——這是中共中央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發行最久的群眾刊物——創刊號及第二期發表〈統一借債與國民黨〉與〈造國論〉兩文。¹⁹這兩篇文章從中共的立場重新詮釋了「國民革命」。他們的詮釋可概括為幾個設想——

- (1) 第一個設想：「國民革命」由願意參與革命的**跨階級的統一戰線**所構成。陳獨秀當時所設想的跨階級統一戰線僅限於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兩階級：「中國產業之發達還沒有到使階級壯大而顯然分裂的程度，所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尚未成熟，只有兩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時期是已經成熟了，這個時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餘年來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軍閥建設**民主政治**的呼聲可以證明的。」
- (2) 第二個設想：「國民革命」以反對國內與國外二重敵人為號召。也就是反對蔡和森所說的兩大「中國人民根本禍患」：「國際帝國主義與封建的舊勢力」。其中，「封建的舊勢力」指的是「封建的軍閥與官僚」，特別是軍閥。本研究第六章曾指出：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中共主要從「上層建築」去理解「封建」一語，指作為「封建武人」的軍

¹⁸ 孫中山與國民黨在國共合作之前根本沒有系統性的國民革命論，他們不但長期廢棄這個概念，這個概念的原始意義也與國共合作時期的意義不同。孫中山首次提出「國民革命」一詞是 1906 年，但卻是相對於「英雄革命」之語而提出的，沒有具體被定義的內容。中華革命黨時期，孫中山縮限了「國民」的概念，認為之前將全國人民名之「國民」，是種「糊塗」，「必其有心贊成共和，而宣誓註冊者，乃得名之曰國民。」直到 1924 年的國民黨「一大」，孫中山才重新起用「國民革命」口號。此間，應當注意中共是否成為孫中山重新啟用該概念的契機。1922 年，陳獨秀在其《造國論》中將民主主義革命以「國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名之，呼籲中共黨內接受與國民黨合作的策略，從「社會主義革命」轉換為兩階級合作的「國民革命」。（孫中山重新啟用這個概念，脫離不了中共從中的促成。）某種意義上來說，由於「國民革命」概念在孫中山與國民黨的使用上的變化太大，因此可以認為「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具有鮮明的歷史建構之性質。但對今人而言，由於「國民革命」通常被等同於「國民黨的革命」或者「孫中山的革命」，因此其「四十年」也就變得理所當然了。關於「國民革命」意義變遷最精要之研究可見劉曼容（1996: 129-165; 1997）。

¹⁹ 分見：和森（蔡和森）（1922）、陳獨秀（1922）。以下同出處引文不再另注。

閥及其危害國家統一的「封建割據」。並指出：當時已經出現從「經濟基礎」去理解「封建」的實例。（因此以下行文將儘可能在涉及反對「封建武人」、「封建軍閥」，以及「封建割據」的「上層建築」場合裡，以「軍閥」代稱「封建」。而在涉及「封建社會形態」或「封建生產方式」的「經濟基礎」場合裡，逕稱「封建」。）

- (3) 第三個設想：「國民革命」具有某種歷史沿革，而不是國共合作當下才產生的事物。在蔡和森而言，他心目中的「國民革命運動」要從 1922 年起向前回溯「三十年」。而「三十年以來的國民革命運動」就是由於「國際帝國主義與封建的舊勢力」而「刺激起來的」。

這三個設想的存在本身，體現當時的「國民革命」一語有相當的可塑性。正是因為孫中山與國民黨長期廢棄此概念，中共才能以自己的理解方式去填充這個概念的內容。然而這三個設想首先只是中共本身的設想而已，這些設想能在社會上獲得多大迴響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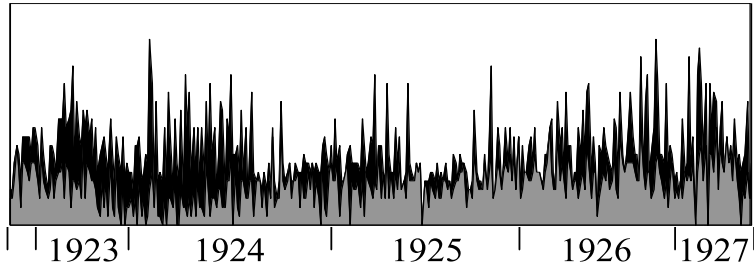
由於第一個設想直接挑明工人階級的合作對象、直接規定了何種階級是革命動力或不是革命動力（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可稱為「階級分析」），從而最為直白地表現出中共單方面設想的、作為一種統一戰線的「國民革命」。這就決定了「階級分析」對中共本身有意義，對於中共以外的政治勢力卻未必如此。比方，被視為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國民黨就不可能用中共所賦予的屬性來標榜自身。

當然，中共的單方面設想仍可能轉化為社會所接受的革命論述，但需要一個過程。²⁰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中共並未消極等待這個過程，他們採用了第二個設想：把「帝國主義」與「軍閥」設定為對立面，以打倒這個二重對立面為宣傳口號來構築統一戰線。從國民黨在 1924 年 1 月將這兩個口號納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來看，這兩個口號確實足以構成某種底線（至少在國共之間）。從統計上來看，中共對這兩個口號的宣傳力度更是極大。以中共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發行第一、第二長的《嚮導週報》與《中國青年》為例，「帝國（主義）」與「軍閥」是出現頻率很高的關鍵字（見圖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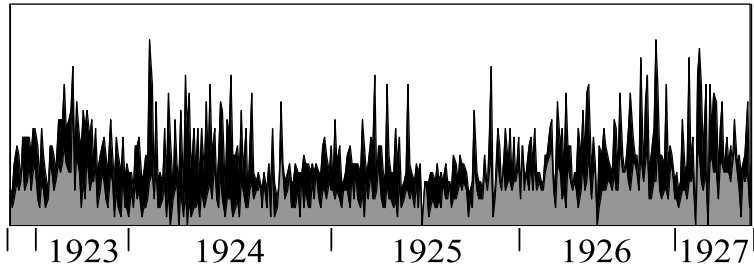
²⁰ 比方陳獨秀等托洛茨基反對派於 1929 年提出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陳獨秀等八十一人，1983: 314-315）就曾批判當時出現的「第三黨」完全照抄中共的革命論述。

圖 7-1：依據表 7-2 的數據 T、A、C、D、F 而進行的比較

單期《嚮導週報》與《中國青年》中，文章總篇數（黑色部分=T）與提及「帝國」之篇數（灰色部分=A+C）。



單期《嚮導週報》與《中國青年》中，文章總篇數（黑色部分=T）與提及「軍閥」之篇數（灰色部分=D+F）。



第二個設想所抉出的二重對立面——帝國主義與軍閥——是中共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最主要的統一戰線口號。這點只需相較於中共所設定的「革命性質」便能知其一二。

「革命性質」的選擇在中共成立之後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運動最關鍵的問題（見本研究第六章）。選擇有兩種：一是工人階級單幹的「社會（主義）」革命，另一則是工人階級與其他階級（特別是某部分資產階級或農民）合作的「民主（主義）」革命。1922年的中共「二大」後，他們開始從「民主」統一戰線的角度設想他們與國民黨的合作。一時間，各種文件充滿了從「民主」設想統一戰線的論述。

雖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通常會進一步將「民族」²¹納入考慮，從而常被稱為「民族民主革命」（National-Democratic Revolution）。但因革命性質的根本

²¹ 由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民族主義」的概念，因此當時中共經常是在涉及三民主義的情況下才談到「民族主義」，中共本身則偏向於使用「民族革命」或「民族運動」這樣的用語。

選擇只在「社會主義」或「民主主義」革命之間，所以「民主」是本質性的規定，「民族民主革命」**不應倒置為「民主民族革命」**。²²

雖然規定革命本質的「民主」並不必然聯繫「民族」，「民族」卻必然聯繫於「民主」。列寧曾言：「毫無疑問，任何民族運動都只能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因為落後國家的主要居民群眾是農民，而農民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關係的體現者。」²³但無論是「民族」或「民主」，當這些源於中共的設想投射在「國民革命」身上，就成為「國民革命」的又一組屬性。否則很難設想為何 1923 年的許乃昌把「民主」視為「國民革命」的主要屬性；²⁴而 1924 年的許乃昌與瞿秋白又把「民族」視為「國民革命」的主要屬性。

1923 年中共「三大」的〈中國共產黨綱草案〉出現了「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的民族民主的總爭鬥」這樣的語句。同年 12 月，陳獨秀在〈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中進一步從「民族」與「民主」去規定「國民革命」：²⁵

人類經濟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種：一是宗法封建社會崩壞時，資產

²² 關於錯誤使用「民族·民主革命」而發生的問題，陳映真（2002b: 15）還曾指出：「猶記在六〇年代，台灣的報紙報導第三世界反美獨立運動時，常常把外電中的『民族·民主革命』(national-democratic revolution) 誤譯成『國民民主革命』，這就是不懂得針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民族主義(反帝)的、民主主義的(反封建)的變革理論所開出來的笑話。陳芳明的錯誤類此。」此外，「民族民主革命」不應倒置為「民主民族革命」的邏輯也適用於一九三〇年代「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半殖民地·半封建」之所以不應倒置，是以毛澤東的論述為典範而確立下來的。在這一典範中，「半殖民地」屬於主權概念，「半封建」則是「社會性質」意義上的規定：前者是外爍的，後者是本質的。也因此，毛澤東才會認為九一八事變之後的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一步變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為東北淪陷了。在台灣，只有劉進慶與陳映真在毛澤東的用詞規範上使用這個概念。令人驚異的是，竟然有人（蔡依伶，2004: 79）顛倒地責備正確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陳映真是把毛澤東的概念設定讀反了。在中國，除了誤寫之外，只有《資本論》的中譯者王亞南始終在其著作中堅持使用「半封建·半殖民地」之概念。吳承明（1996a: 9）讚賞王亞南的這一堅持為「深有見地」。吳承明的稱讚頗令人玩味。此外，學者一般認為，蔡和森於 1926 年寫作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首先將「半殖民地」與「半封建」連用，而有「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國」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之語（蔡和森，1982: 12）。固然詞語的提出並不代表概念的形成，但反帝大聯盟早在 1924 年就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況」一語說明中國的處境（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26a: 217），這點值得進一步探索。近年來的相關討論見：陳金龍（1996: 227-231）、陶季邑（1998: 221-225）、張慶海（1998: 226-234）。

²³ 列寧（1995d: 276）。

²⁴ 關於在「民主（主義）革命」的意義上談到國民革命，可參見乃昌（許乃昌）（1923b: 4）。另外，在「民主（主義）革命」的意義上談到「資產階級」革命，則可參見：秀湖生（許乃昌）（1923b: 43-48）。

²⁵ 陳獨秀（1979: 154）。

階級的民主革命；一是資產階級崩壞時，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此外又有一種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國民革命含有對內的民主革命和對外的民族革命兩個意義。

殖民地的經濟權政治權都完全操在宗主國之手，全民族之各階級都在宗主國壓迫之下，全民族各階級共同起來謀政治經濟之獨立，這是殖民地國民革命的特有性質。半殖民地的經濟權大部分操諸外人之手，政治權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諸本國貴族軍閥之手，全國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都在外國帝國主義者及本國貴族軍閥壓迫之下，有產無產兩階級共同起來，對外謀經濟的獨立，對內謀政治的自由，這是半殖民地國民革命的特有性質。

雖然上述見解反映了對外的「反帝國主義＝民族」與對內的「反軍閥＝民主」的觀念，但「民族」或「民主」卻不是中共表述「國民革命」統一戰線的主要關鍵字。以《嚮導週報》及《中國青年》為例，其中單獨提到「民族」或「民主」的情況很少（如圖 7-2-1、7-3-1），把帝國主義與軍閥當成對立面而攻擊的文章卻很多（如圖 7-2-2、7-3-2）。此外，「民族」及其對立面「帝國（主義）」同時出現的文章也很多（如圖 7-2-3），「民主」及其對立面「軍閥」同時出現的文章卻很少（如圖 7-3-3）。上述現象體現出：後來被規定為**革命任務**的反「帝」與反「軍閥」，是中共更常用來構築統一戰線的素材，而不是後來被規定為**革命性質**的「民族」與「民主」。

圖 7-2：依據表 7-2 的數據 T、A、B、C 而進行的比較

圖 7-2-1：

單期《嚮導週報》與《中國青年》的文章總篇數（黑色部分=T）中，只出現「民族」而無「帝國」的單篇文章數（灰色部分=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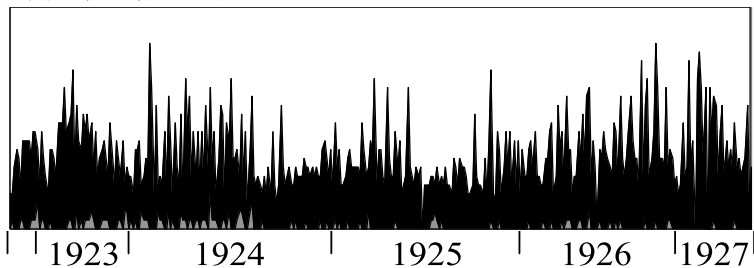


圖 7-2-2：

單期《嚮導週報》與《中國青年》的文章總篇數（黑色部分=T）中，只出現「帝國」而無「民族」的單篇文章數（灰色部分=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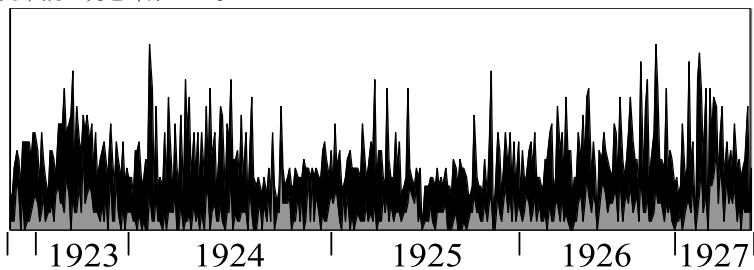


圖 7-2-3：

單期《嚮導週報》與《中國青年》的文章總篇數（黑色部分=T）中，同時出現「民族」與「帝國」的單篇文章數（灰色部分=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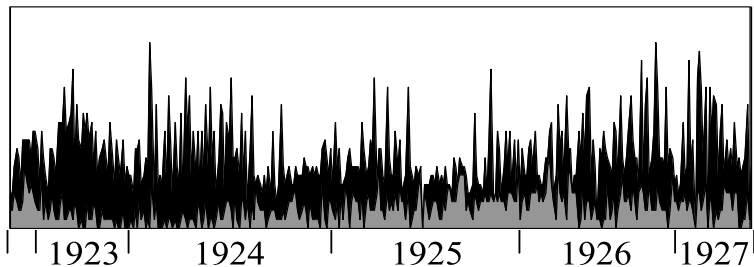


圖 7-3：依據表 7-2 的數據 T、D、E、F 而進行的比較

圖 7-3-1：

單期《嚮導週報》與《中國青年》的文章總篇數（黑色部分=T）中，只出現「民主」而無「軍閥」的單篇文章數（灰色部分=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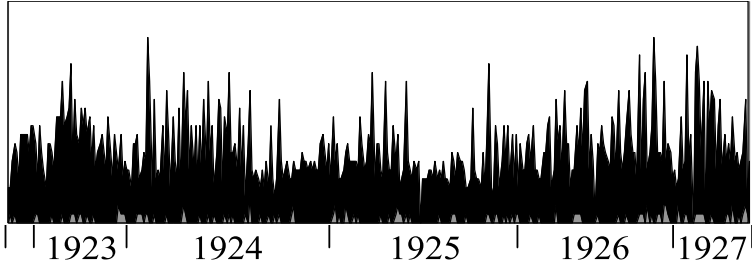


圖 7-3-2：

單期《嚮導週報》與《中國青年》的文章總篇數（黑色部分=T）中，只出現「軍閥」而無「民主」的單篇文章數（灰色部分=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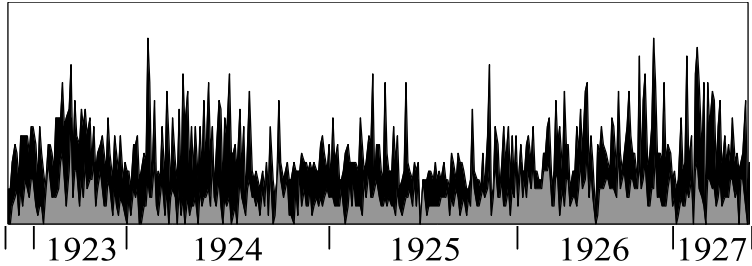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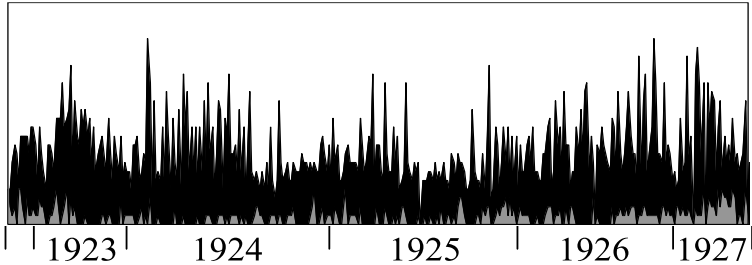


圖 7-3-3：

單期《嚮導週報》與《中國青年》的文章總篇數（黑色部分=T）中，同時出現「民主」與「軍閥」的單篇文章數（灰色部分=F）。



3.關於「國民革命」統一戰線的設想及其發展

然而「民族／民主」與「反帝／反軍閥」有一個共同現象。就「民族／民主」而言，中共內部將「民族」統一戰線規定為中央戰略的時間落後於「民主」統一戰線；就「反帝／反軍閥」而言，「反帝國主義」的社會迴響落後於「反軍閥」。

先談「民主」與「民族」。

早在 1922 年的「二大」，中共中央便提出以「民主」構築統一戰線的正式決議文，即〈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但以同樣的方式處理「民族」問題並單獨提出決議文——〈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卻要等到 1925 年的「四大」。這份決議文從中共與國民黨——「中國民族運動中一個重要工具」——之間的關係，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民族革命運動政策之經過」：²⁶

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全國大會（一九二二年），已經決定中國無產階級應該參加民族革命運動並贊助中國國民黨，提出的口號是：「民主的聯合戰線」「推翻帝國主義推翻軍閥」。在此大會後，共產國際派代表向中國黨提議：中國同志們應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使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更進一步實現，使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加速的進行。當時黨中雖尊重國際的提議，而大多數同志只贊成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對於加入國民黨的組織十分懷疑。因此，在實際上，國際的提議未曾實行。

……

我們參加民族運動，是為了全民族的解放，並且為了無產階級自己的利益，絕不是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若是忘了無產階級的經濟組織及黨的工作，若是忘了民族運動中無產階級的經濟爭鬥，若是忘了無產

²⁶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1989: 334-336）。

階級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階級革命之準備，而沉溺在資產階級性的**民族德謨克拉西運動**〔**民族民主運動**〕中，便遺無產階級以不容易挽救的大害，並且足以減少民族運動之革命性。這些右傾的危險，我們的同志應該時刻警戒在心。

上述總結表明，中共原先只想進行「民主」統一戰線。這種想法具體體現在他們拒絕加入民族主義的國民黨。但如列寧所云，就用語而言，「民族革命運動」比「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更有利於把**革命的**「民主主義」運動同**改良的**「民主主義」運動區別開來，從而確保運動的革命性。²⁷因此中共從「民主」統一戰線向「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也許不僅僅是為了拉大團結面，而是藉著「民族革命」來突出「革命」。

再談「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

陳獨秀在 1923 年 6 月中共「三大」上的報告指出：雖然中共在「二大」時「同意東方民族大會通過的關於共產黨與民主革命派合作問題的決議。情況的發展表明，只有聯合戰線還不夠，我們又接到了共產國際關於加入國民黨的指示。」「我們是在『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口號下工作的。打倒軍閥的口號已得到中國社會上大多數人的響應，而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還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黨員應該更加注意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²⁸由此可見，「打倒帝國主義」落後於「打倒軍閥」是曾經出現過的狀況。雖然鄭超麟（早期中共黨員與最早的中國托洛茨基反對派）認為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打倒軍閥』是隸屬於『打倒帝國主義』的」，這種狀況促使「人們轉移了工農群眾對於本國壓迫者的仇恨，去仇恨帝國主義」。²⁹但即便這種狀況存在，顯然也不是一開始就如此。³⁰

在中共後來的歷史認識中，直到 1925 年上海的「五卅運動」才使中共所認定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出現或出現高潮。但在一九二〇年代期間，「反帝國

²⁷ 列寧（1995d: 276）。

²⁸ 陳獨秀（1989: 168-169）。

²⁹ 鄭超麟（2004b: 278-279）。

³⁰ 其實鄭超麟（2004b: 278-279）自己也認為，真正以反帝國主義掛帥的運動型態是更晚的事情，他認為是 1925 年的「五卅運動」。不過鄭超麟的批評卻恰恰擊中斯大林的觀點。斯大林（1956: 125-126）在 1924 年指出，「在帝國主義壓迫的情況下，民族運動的革命性不一定要以這個運動有……民主的基礎為前提。」「在爭取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驟，即使違反形式上的民主要求，也是對帝國主義國家的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

主義運動」不但是一個曾經與中共沒有直接關係的專有名詞，並專指 1924 年由「反帝大聯盟」發動於北京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本章後面將提及）。這一奇特現象體現出中共確實曾在「反帝國主義」方面非常不力，以至「反帝國主義運動」竟能成為特定民眾運動事件的專有名詞。

然而中共並非與北京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毫無關係。實際上，恰恰是這次運動以及引發這次運動的中蘇建交問題，促使中共針對蔡和森於 1922 年揭示的第三個設想——「國民革命」歷史沿革——進行大討論與大宣傳。又因為第三個設想在這場運動中與重新評價「義和團運動」相結合，使得中共「自為」但施展不開的「反帝國主義」得到「自在」且規模最大的反帝國主義事件——以「義和團運動」所代表——的補充。這不但豐富了「反帝國主義」的意義本身，更豐富了包含「反帝國主義」在內的第二個設想。

以下，就從 1924 年「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興起談起。

第二節、1924 年「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興起

歐洲各國政府……把一座座村莊燒光，把老百姓趕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這些基督徒建立功勳的時候，卻大叫大嚷反對野蠻的中國人，說他們膽敢觸犯文明的歐洲人。

——列寧，1900 年³¹

那麼說起「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給中國帶來傷害和恥辱」的，是義和團呢？還是歐西日本等八國聯軍？再者，是人家老遠組成聯軍跑到中國大屠殺、大劫掠，還是我們貧困農民到西歐日本去「殺人放火」了呢？……義和團運動被

³¹ 列寧（1995a: 279-280）。

「現代文明」和「理性」的「八國聯軍」殘酷鎮壓後十五年的
一九一五年，台灣農民的噍吧年抗日起義，就宣傳「玉皇大帝
九天玄女」可以「隱身」、「避子彈」、「避刀槍的符法」以抗擊
據台日軍。而今日的「台灣人民」能不能據而嘲笑其「愚昧」、「反
理性」、噍吧年的農民起義「藏有仇視東洋人的情緒」？問題是
明白的：在帝國主義無情侵侮的時代，當封建王朝無計可施，當
台灣已成棄地，不甘屈膝的中國農民起而抗擊外侮的思想和行
動只能是自由派百般嘲笑的形式：落後的武器、封建迷信和一
顆不屈的民族驕傲。而歷史上一切被征服民族抵抗強權時，不依
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仇」恨「外」侮的思想與行動，難道
依靠民族自蔑主義和投降媚外主義？

——陳映真，〈文明與野蠻的辯證——龍應台女士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商榷〉，2006年³²

1.1924 年的排外風潮

1924 年北京的「反帝國主義運動」興起於全國逐漸升高的排外氣氛之
中。而《平平旬刊》與《婦女週報》（上海《民國日報》副刊）之間曾經發生的一場
論戰正是這種排外氛圍的體現。

《平平旬刊》與《婦女週報》之間的論戰源於《婦女週報》一則新聞。說：紹
興一名奶媽因沒照顧好洋人的娃娃，意外致死，便遭西洋人用四根鐵釘釘死在
一條長板凳上。³³事經披露，平平同人賀威聖立於《平平旬刊》指出：此事不
但是「某洋人殘忍所致」，更是「資本帝國主義者侵掠弱小民族時所必有的現

³² 陳映真（2006: 137, 138）。

³³ 《婦女週報》於 1924 年 5 月 14 日第 38 期首次報道此事（《婦女週報》，1924: 4；蘇哥，1924: 5-7）。

象」，因此必須「趕走直腳鬼！」³⁴

賀威聖的批判引來《婦女週報》一位叫做「馮魯英」的作者提出反批判，「祇看這個題目，就不免有『義和團』的嫌疑了。」³⁵對此，平平同人羅任一提出反駁。他承認義和團運動是「罪有應得，死不足惜」的「拳匪」。但他更認為，「因為西洋人欺負我們得太厲害了，這種報復正是除去被欺負的原因，也是要想免卻人類多流血的痛苦。」³⁶另一同人「逸民」亦云，「馮魯英先生簡直說『平平旬刊』有義和團的嫌疑，他們眼中的看不起中國人比外國人還要更甚！」³⁷義和團仿若是種極不堪的衡量標準，比洋人還要等而下之。羅任一與逸民的見解，反映了一種既想認同義和團運動所代表的「排外」卻又無法認同排外所伴隨的「野蠻」的矛盾態度，同時也反映了全國逐漸升高的排外氣氛。

不久，賀威聖直接投稿《婦女週報》。他回應馮魯英的批評而解釋云，「平平旬刊並不是仇視外人的刊物，有發刊詞作證」。賀威聖「承認」平平同人們的回應「誠然是蠢」、「誠然是疏忽」，但馮魯英「單就『直腳鬼』幾個字而大發牢騷，這恐怕也過於片面觀察。」³⁸經過《婦女週報》與《平平旬刊》之間的來回論戰，一位對於此事「情跡」深感「離奇」的讀者，在論戰已經「愈加進到空論難辯的路裡」時，查證了真相。原來此事全為虛構。論戰終於平息。³⁹

一場虛構的事件何以輕易引起這種論戰？或者說，這種事件何以能夠輕易被虛構出來並引人相信？這裡有一個時代氛圍的問題，同時也反映當時「義和團運動」的矛盾形象。就在這種氛圍中，「義和團運動」馬上迎來前所未有的重新評價。重評的契機是中蘇建交所爆發的外交衝突。

1924 年是中國外交與國際關係發生巨大變化的一年。十月革命之後遭到西方持續抵制的蘇維埃國家（1922 年，包含「蘇俄」在內的「蘇聯」成立），於 1924 年進入大規模建交期；⁴⁰中國與日本則是蘇聯在東亞的兩大建交對象。由於蘇

³⁴ 阿鳳〔賀威聖〕（1924c: 2-3）。「趕走直腳鬼」的口號與平平同人「蓄」的「快快地起來把街路上的野獸趕走！」很類同（蓄，1924: 6）。

³⁵ 馮魯英（1924: 5）。

³⁶ 任一〔羅任一〕（1924b: 2-3）。

³⁷ 逸民（1924: 4）。

³⁸ 阿鳳〔賀威聖〕（1924d: 6-7）。

³⁹ 李開時（1924: 5-6）。

⁴⁰ 如蘇聯學者所言，「1924 年好像是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在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上互相比賽的一

維埃國家成立後即透過各種使者（如加拉罕）宣示了幾次對華友好的政策，中蘇建交遂成為中國人民少數可以期待的平等談判。同年 5 月 31 日簽訂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通常正被視為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平等條約。

然而中蘇談判並非始終一帆風順。僅僅在 3 月份的時候，談判就曾遭遇破裂。其他國家的干涉自是原因之一，可是蘇聯不願將中東路與外蒙輕易還給中國也是關鍵因素。於是，即便「期待」與「批判」同樣存諸社會輿論，但是期待的失落卻加強了批判的力量。隨著蘇聯逐漸「讓步」，兩種輿論的力量對比才壓倒性地產生有利於正式建交的消長，得到一個「形式上」放棄大部分對華利權的協定。⁴¹就「批判」的輿論而言，存在反蘇言論的《平平旬刊》可為典型。其批判多與 3 月份建交談判之破裂有關。至於言論的基礎，主要來自於民族情緒（而非無政府主義之類的批判）。⁴²

「期待」的輿論則可以謝廉清的言論為代表。在中蘇正式簽字前二十天的 5 月 11 日，《台灣民報》登出謝廉清來自北京的一則報道。他在題為「中國人不明去就」的小節中提到：⁴³

中俄的會議現在是停頓中，究竟中國承認蘇俄是利？或是害？中國民族是永甘久屈服於東交民巷的勢力之下？或是要民族的獨立？脫離壓迫、反抗侵略為是？或是盲從洋大人的使嗾為是？中俄交涉停頓，乃是中國人不能明去就所致罷。

並特別加上一段注言云：

中俄交涉是有帝國主義在外交總長後面種種左右{，}所以不能承認蘇俄，現在外交總長顧維鈞中國通叫他，洋奴走狗（廉清注）

謝廉清將「中蘇建交」與「民族獨立、脫離壓迫、反抗侵略」畫上等號，立場頗為鮮明。顯然謝廉清並不認為蘇聯與其他外國是一丘之貉。

但中蘇正式建交並非問題的結束，而恰恰是開始。蘇方為表示對於中國的尊重，而將派任中國從未有過的、級別最高的大使級使節赴華（以往最高只至公

年。」（Ивашин, 1995: 117-123）。

⁴¹ 關於中蘇建交，目前最新的研究可見何艷艷（2005）與沈志華（2007: 9-13）。

⁴² 這些反蘇文章是：赤人（1924: 1-3）、威聖〔賀威聖〕（1924a: 8）。

⁴³ 廉〔謝廉清〕（1924a: 9）。

使級)，⁴⁴並要求移交舊俄遺下的使館。但多數尚未承認蘇聯之公使團各國卻以辛丑條約為由，認為使館區不屬於中國管轄甚至不承認蘇聯對於帝俄的繼承權，於是拒將使館交還蘇聯。此事一出，輿情譁然。1900年八國聯軍以及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記憶也重新被喚起。就在全國日趨高漲的排外氣氛中、就在中蘇建交所遭遇的阻礙中——誠如柯文（Paul A. Cohen）所注意到的——一個民間組織與運動就此拔地而起，義和團運動也在這次事件後首次得到正面評價。

2. 「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與「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興起

柯文認為：「新文化倡導者把義和團視為落後、迷信和非理性的一群，五四以後人們又把義和團視為反對帝國主義的愛國者，1924年9月，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發表的一篇文章最顯著地反映了這一轉變。時為1901年9月7日簽訂的辛丑條約23周年紀念日。在『反帝大聯盟』的建議下，新近改組的國民黨確定9月7日為『國恥日』，接下來的一周為『反帝周』。這時的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結成了緊密的聯盟，軍事上也處於反對帝國主義的階段。在這種形勢下，原來零零星星稱讚義和團為愛國者的言論在激進報刊上匯聚成了大合唱，以中共主辦的《嚮導周報》，為開路先鋒。」⁴⁵

柯文忽略了以下幾點：（1）這一運動的形成深深根植於當時的中蘇建交事件（各國公使以辛丑條約為由拒將使館交還蘇聯）以及「國民外交」風潮，是在這個牽涉到辛丑條約歷史問題的過程中，才將義和團運動拿出來重新評價。而柯文甚至搞錯了一個基本歷史事實：「反帝國主義運動周」並非9月7日「接下來的一周」（the week following as.....），而是前後一周，即9月3日至9日。⁴⁶（2）又由於「五卅」普遍被認為是一九二〇年代的首次反帝高潮，因此柯文的上述說

⁴⁴ 其他國家當時只派公使駐華。因此，當蘇聯決定派大使駐華，依國際慣例，各國使節在中國的使節團將由最高級別的使節——蘇聯駐華大使——擔任使節團團長。但各國抵制。

⁴⁵ Cohen（1997: 241），中譯參考了Cohen（2005: 202）。

⁴⁶ 關於「運動周」的制定，是反帝大聯盟第四次執行委員會（1924.7.27）所做出的決定（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26a: 206-207）。當時北京政府的情報檔案（載德，1991）也是如此記載。

明，僅僅是為說明「五卅」而做的鋪陳而已。

柯文並未深究 1924 年這場運動的領導組織、細節，以及背景，而是將整個運動的領導權或此或彼地歸於國民黨與共產黨，或把陳獨秀的文章視為開端。但「反帝大聯盟」其實恰恰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在國共之外產生的組織。

7 月 9 日，參眾議員、國民對英外交聯席會議、北京學生聯合會，社會主義青年團聯合發起通告，號召組織「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7 月 13 日下午二時，一個中國史上首次以「反帝國主義」為名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正式於北京來今雨軒成立，眾議院議員胡鄂公（1884-1951）當選主席。⁴⁷原來 3 月份還希望能在暑假返台推廣教育、提升台灣文化水平——也就是許乃昌後來在暑假所做的工作——的謝廉清，⁴⁸就在這樣的運動風潮中登上了 7 月 27 日的來今雨軒演講台，成為了「一個極熱極勇猛的反帝國主義者」。⁴⁹

由於中蘇建交問題，導致「反帝大聯盟」及其「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誕生。「反帝大聯盟」的主要成員包括不少前「今日派」同人（如：胡鄂公、許興凱、熊得山、林可彝等）。⁵⁰從目前所能掌握的「反帝大聯盟」史料來看，⁵¹「反帝大聯盟」的主

⁴⁷ 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26a: 162）。

⁴⁸ 北京廉清（謝廉清）（1924）。

⁴⁹ 謝廉清（1926b: 115）。該書編者的全話如下：「謝廉清同志，台灣人，是一個極熱極勇猛的反帝國主義者。這篇文章是他被壓迫來華後，百忙中抽暇所做的，我們非常感謝。（編者）」。

⁵⁰ 此人物列表係交叉比對自《今日》雜誌撰稿者、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63）所推選之幹部名單，以及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26a）所編《反帝國主義》的撰稿者。

⁵¹ 「反帝大聯盟」的史料介紹如下：《近代史資料》曾於 1963 年重新刊印「反帝大聯盟」發行之《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會刊》第 1 期（以下簡稱〈會刊〉）。這是「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史料的首次（也是目前唯一一次）重新刊行。〈會刊〉收錄了「反帝大聯盟」1924 年 7 月的活動經過與文告宣言，可略為窺知初創期的狀況。據編輯者言，這份〈會刊〉第一期發行於 1925 年 7 月 25 日，但 1925 年應是 1924 年之誤。實際上，《近代史資料》的編輯者正以為「大聯盟」創立於 1925 年（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63）。若以專題研究而言，目前僅知謝蔭明、王凌雲兩位學者專就「反帝大聯盟」提出三篇專題論文：分別是：謝蔭明（1982）、王凌雲（1985: 332-338）（王凌雲的研究相對詳細，他也注意到謝廉清的活動，惜未深究。）、謝蔭明（1984）。然而以上三篇論文僅是下述史料的簡單堆砌：（1）當時的報刊雜誌。如北京《晨報》、中共發行的《政治生活》、《嚮導週報》等刊物。（2）「反帝大聯盟」出版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會刊〉。但不限於重新排印的第 1 期，他們還使用了第 3 期（1924.8.20）、第 4 期（1924.10.1）、第 5 期（1924.10.5）、第 7 期（1925.3.10），大概都是直接接觸了原始史料；然而發行狀況、館藏地均不詳，目前台灣也無法取得。（3）「反帝大聯盟」於 1926 年出版的《反帝國主義》一書。這本書只有王凌雲提及，用以說明「反帝大聯盟」在孫中山逝世（1925.3.12）之後的行動，補充〈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會刊〉所不及之資訊。王凌雲所用《反帝國主義》（詳細目錄可參見表 7-1）值得特別注意，這是「反帝大聯盟」已知的四種文獻之一。這四本書有密切的關係：第一種文獻（李漢石〔李伯剛〕，1925）有

張以及他們對其主張的詮釋有一個變化的過程。他們並非自始就決意重評義和團運動。在謝廉清發表演說於來今雨軒的 7 月 27 日，反帝大聯盟執行委員雷殷（1886-1972，參議院議員）就自稱「我輩之手段異常和平，而所恃之態度又極穩健，斷非義和團排外者之流，深望國人諒解云云。」⁵²同日舉行的反帝大聯盟第四次執行委員會，議決發起「反帝國主義運動周」並發出說明通告。但通告全篇只在指控辛丑條約，雖提到「庚子義和團之役」，卻止此七字，並未重評。

隨著運動收攏各方勢力以及各方勢力對於運動提出批評，反帝大聯盟也更改了自己的看法。反帝大聯盟在「反帝國主義運動周」（1924.9.3-9.9）發表的一則宣言中，把義和團隱諱地定位為具有「壯烈精神」的「愛國運動，民族運動」，但不明言為義和團。與此相比，出現在國共合作大本營廣州的「廣州反帝國主義大聯盟」，就公然以「義和團民族反抗運動」名之。⁵³不過中共方面對於義和團運動的重新評價更為全面。

中共在 1924 年這場「反帝國主義運動」之前只有零散幾篇涉及同情義和團運動的言論。這場運動展開之後，在承認義和團運動野蠻有理或否定其野蠻的基礎上，中共大規模重評義和團運動的言論開始出現。如彭述之（1895-1983）所云：「對於義和團運動須得重新估定其在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上之真價值。我們應該替義和團宣雪其廿三年來被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所加之惡名，刷洗中國一班人腦中對於義和團運動之根本錯誤觀念。」⁵⁴

1924 年 9 月 3 日發行的《嚮導週報》「九七特刊」是重評義和團運動的開

正文 101 頁，是「反帝大聯盟」的歷史回顧與文獻匯集。謝廉清以《台灣民報》記者身份在來今雨軒的演說詞收錄於這篇長文。第二種文獻（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26b）則有正文 148 頁，是該聯盟所編的論文集，其中包括了謝廉清所專門撰寫的〈帝國主義的運命〉一文。第三種文獻則是前兩種的合輯（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26a），正文 267 頁。王凌雲用的就是這本書。此書沿襲第二份文獻的排版方式，但在書末補上第一份文獻，將之改題為〈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第四份文獻（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27）有正文 214 頁，是第三份文獻重新排版後的出版品，不過內容沒有變化。李伯剛（即李漢石）回憶云：「一九二六年，大聯盟準備結束時，編了《反帝國主義》的小冊子，把反帝大聯盟的有關文件幾乎全部都收集在內了。後面有我寫的一篇《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反帝國主義大聯盟》。此書質量不高，印數不多，現在可能不易找到了。反帝大聯盟的宣傳經費，蘇聯大使館有些資助。」（李伯剛，1983：6）

⁵² 雷殷的談話僅為為北京《晨報》所擷取之大意（晨報，1924：7）。

⁵³ 關於文中所提到的反帝大聯盟各種文件，可見：李漢石〔李伯剛〕（1926：198, 216-218, 220）。

⁵⁴ 述之〔彭述之〕（1924a：合訂本頁 646）。

始，「他們解釋義和團是中國民族革命史的悲壯的序幕」。⁵⁵陳獨秀首先在該期〈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中指出，義和團運動是「重要不減於辛亥革命」的事件，然而一般人對之懷著兩個錯誤觀念：（1）「憎惡義和團是野蠻的排外。他們只看見義和團排外；他們不看見義和團排外所以發生之原因」；（2）「以為義和團事件是少數人之罪惡，列強不應因少數人之故懲罰全中國人民以巨額負擔。他們不曾統觀列強侵略中國，是對於全民族的，不是對於少數人的；劇烈的列強侵略，激起了劇烈的義和團反抗，這種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識與利益，決不是出於少數人之偶然的舉動。……情形如果是這樣，還幸虧有野蠻的義和團少數人，保全了中國民族史上一部分榮譽！」最後陳獨秀說：「義和團的野蠻，義和團的頑舊與迷信，義和團時的恐怖空氣，我都親身經驗過；我讀八十年來中國的外交史商業史，**我終於不能否認義和團事件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之悲壯的序幕。**」⁵⁶

此外，義和團運動還被納入「國民革命」歷史沿革之中。

蔡和森認為，「義和團運動是最足以代表中國革命之客觀的需要與性質的；也只有由這一點纔能真正理解義和團的精神與價值。義和團排外的精神，是中國國民革命精神頭一次充分的表現，可是這種本能的幼稚的國民革命運動並不是沒有缺點。」⁵⁷「假設當時義和團具有一個這樣反帝國主義的政綱，義和團是可以領導中國國民革命至於成功。反之，現在具有這好的政綱之國民黨，若加以義和團排斥外國帝國主義的真精神，國民黨更是可以領導中國國民革命至於成功的。義和團是中國國民革命史上悲壯淋漓可歌可泣的遺產——排外精神，我們希望國民黨雙肩承受這種偉大的遺產！」⁵⁷張太雷（1898-1927）也認為，義和團運動是「最有國民革命精神的運動」。⁵⁸

然而得到重評的不僅僅是義和團運動。如 1925 年的鄭超麟所觀察到的，直到「最近一年」才「又估定了以前幾次民族運動，如戊戌政變，義和團，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的價值。」⁵⁹除了這些事件，還包括了更早期的太平天國與

⁵⁵ 代英〔譚代英〕（1924: 5）。

⁵⁶ 獨秀〔陳獨秀〕（1924: 合訂本頁 646）。

⁵⁷ 和森〔蔡和森〕（1924: 合訂本頁 652-654）。

⁵⁸ 大雷〔張太雷〕（1924: 合訂本頁 706）。

⁵⁹ 超麟〔鄭超麟〕（1924: 合訂本頁 333）。

更晚近的二七大罷工（1923）與五卅運動（1925）。

其實早在 1923 年底，陳獨秀就已經做出如下總結：「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可以說自甲午戰敗起，過去歷史已將近三十年，此三十年中，第一期是戊戌前後的變法自強運動，第二期是辛亥革命運動，第三期是『五四』以來學生及工人運動。這三期運動之成績雖然都很微末，而加入運動的各階級都以次擴大，這是不能否認的。」⁶⁰但直到 1924 年的此時，陳獨秀才把義和團納入其中：「現代中國國民運動，起源遠在中日戰爭以後，『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這四件事，都是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開始表現他的社會的勢力以前，小資產階級之重要的國民運動。而也只有這四件事配說是國民運動，因為在這四個運動中，都有廣大民眾參加。」⁶¹

「估定」這些歷史事件能否視為「國民革命」的關鍵指標，是這些事件是否「反帝國主義」。因此張太雷甚至認為，由於辛亥革命不反對帝國主義，因此「完全失掉國民革命的意義」、「在中國國民革命上不能有多大的意義和價值」。⁶²還有人指出，「辛亥革命是中國國民革命第一次試驗的大失敗」。⁶³

就這樣，「國民革命」的歷史沿革建立了起來。當長期廢棄「國民革命」概念的孫中山於 1925 年彌留之際——由汪精衛（1883-1944）草擬其國事遺囑——把「國民革命」建構為「凡四十年」的存在時，中共也依托著上述歷史事件而建立起「國民革命」的歷史。依托於這些事件而建立起的沿革約三十年，也就是以甲午戰爭馬關割台以及戊戌變法為起點。

3.1924 年「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後續發展

「反帝大聯盟」當時曾被質疑他們為何聲稱只管「反帝國主義」而不管國

⁶⁰ 陳獨秀（1979: 27）。

⁶¹ 陳獨秀（1924b: 15）。

⁶² 大雷〔張太雷〕（1924: 706）。

⁶³ 述之〔彭述之〕（1924b: 合訂本頁 703）。

內政治，特別是軍閥政治。也就是他們為何「反帝國主義」卻不「反軍閥」。因此，雖然「反帝大聯盟」有中共成員參與並接受蘇聯使館資助，⁶⁴大聯盟出現之初仍曾遭遇中共中央的陳獨秀以及各方政治勢力的批評。⁶⁵這些批評可能反映了「今日派」所遺下的獨立性，或者中共北方黨組織與南方黨中央之間的不協調。

在「反帝大聯盟」被質疑的情況下，「反帝國主義運動」走向全國的過程逐漸發生變化：（1）運動主導權從今日派轉到中共之手；（2）其他民眾運動得到刺激，比方「非基督教運動」；（3）「九·七」（辛丑條約簽訂日）成為新的「國恥」紀念日。

運動主導權的轉移可分為兩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反帝國主義運動」本身被中共所控制。⁶⁶第二個方面則是中共發起了自己主導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也就是1925年「五卅慘案」所激發的一系列運動。如果「九·七」前後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可以視為北京的前「異端」共產黨——「今日派」——所指導的運動。「五·卅」所引發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則可視為上海的現「正統」共產黨所領導的運動。對於今天的學者而言，後一運動的規模與影響力當然是最大的，因為很少人記得前一運動的存在與意義。華崗（少峰，1903-1972）為「中國大革命」所撰寫的史上第一本專書，正以「五·卅」為起點。

⁶⁴ 李伯剛（1983: 5-6）。其中擔任大聯盟執行委員的中共黨員有劉仁靜（用名劉子雲）、李伯剛（用名李漢石）等人。

⁶⁵ 在收攏各方勢力的過程中，反帝大聯盟也順著運動的內在要求，更改了自己的看法。除了他們改變對於義和團的評價之外。最顯著的例子，則是社會各界對於〈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宣言〉的批評。〈宣言〉聲明，「我們這個大聯盟，除卻反帝國主義的工作外，其外任何事物概不與聞」（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63: 96）。這點被陳獨秀（1924a）、瞿秋白（1988）等人批評有不反軍閥之嫌疑，因為帝國主義的走狗恰恰是軍閥。就連國民黨方面，也有批評者廖百芳（1928: 33）謂之「是不敢向曹（錕）吳（佩孚）言思擬議也。」所以江亢虎（1944: 227-228）曾云「今日所謂反帝國主義運動。外間已頗譏其不徹底。」反帝大聯盟的李漢石（李伯剛）則解釋，〈宣言〉所另外提到的「凡有甘願做帝國主義的走狗或做我們的漢奸者，我們必須用撲滅帝國主義的手段來撲滅他。」恰恰「包括有打倒軍閥，過問內政的意思」（李漢石〔李伯剛〕，1926: 164）。是否反帝大聯盟自始就有李漢石所言的這般打算，實不可知；然而各方輿論壓力卻可見一斑。

⁶⁶ 「反帝大聯盟」，一般是指1924年7月於北京成立者。但受其影響，天津（1924.8.10）、湖南（1924.8）、上海（1924.8.23）、山東（1924.9.7）、武漢（1924.9.5）、杭州、青州、廣州、太原、四川（1925.1.1）分別成立地方的反帝大聯盟，並各自發表宣言。不過學者也指出，這些地方性組織多由共產黨員領導。——就此來看，當反帝大聯盟從北京走向全國之時，反而是逐漸被共產黨控制的。上述各地宣言均收錄於李漢石〔李伯剛〕（1926: 178-206）。成立日期則參考了王凌雲（1985: 335-336）。關於各地反帝大聯盟與共產黨的關係可見金富軍與蔡樂蘇（2006: 233）。

在中共逐漸取得主導權的形勢下，以 1924 年「九·七」國恥為契機而首次重評義和團運動歷史的「反帝國主義運動」被逐漸遺忘。1925 年「五·卅」運動成為「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起點。「反帝大聯盟」與今日派也因融入中共而消失於中共所另外建構的歷史。⁶⁷使歷史得以建構者卻在歷史的建構中隱沒，這就是「反帝大聯盟」與異端共產黨——「今日派」——的歷史命運。

雖然這場 1924 年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一度成為專指這場運動本身的專有名詞。⁶⁸這場運動所取得的此種地位卻逐漸消失。即便如此，首次得到紀念的「九·七」國恥與「反帝國主義運動週」卻是甚有延續性的成功嘗試。在此之前，中共北方執行委員會曾在 1922 年提出以雙十節為「反帝國主義日」的口號，世人知之甚少。⁶⁹然而 1924 年的「九·七」國恥與「反帝國主義運動週」卻引起大迴響。紀念近十年的「五·七」、「五·九」國恥不但首次遭到取代，非基督教運動也受此影響而設立非基督教周。⁷⁰此後，日期雖有不同，「反帝國主

⁶⁷ 日本記者布施勝治（1886-1953）分析反帝大聯盟的衰落云：「但在是年（1924 年）秋間，第二奉直戰爭勃發，北京的警察廳禁止執行委員會開會，並禁止發行會刊，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的運動一時停頓。到第二奉直戰爭的末段，馮玉祥忽向北京行了『苦特打（coup d'etat, 政變）』曹錕吳佩孚失敗，北京的軍權落到馮玉祥手裏，由馮張提攜，擁戴段祺瑞為執政政府，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又復活了。」「但是這個大聯盟在創立的當初，發起人的中間，有商人，有共產黨員，有國家主義者，有新聞記者，有律師，有學生，……形形色色，分子極為複雜，所以缺乏永久繼續的可能性。果然到一九二五年春，孫中山和國民黨各領袖前後繼續來京，與馮玉祥攜手謀為政治的大活動，並且這時候的政治運動漸與蘇俄接近，這個表面上與國民黨沒有關係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也自然有捲入國民黨革命運動中的趨勢，到是年的夏間，聯盟的組織，漸次解體了。其後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就移入共產黨所操縱指揮的學生聯合會手中去了。」（布施勝治，1926: 331-332），中譯可見布施勝治（1927: 275-277）。但文中的「國民黨」仍要擺在國共合作的脈絡下考慮，並非日後反共的國民黨。

⁶⁸ 「反帝大聯盟」在 1924 年發起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曾一度被視為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開端。1924 年，瞿秋白認為「國民革命的大運動」的「聲勢」始於「北京反帝國主義大同盟首先成立」（瞿秋白，1988: 630-631）。1926 年，日本記者布施勝治指出，「反帝大聯盟」是首次把反帝國主義運動「作為革命的標語」的運動，且是「中國近年國民運動的一大成功」。不過布施將之視為「共產黨的暗中積極活動而來」的產物（布施勝治，1926: 320-343）。1929 年，吳壽彭等著《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抄錄布施勝治之書，但直接將「反帝大同盟」視為「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開端（吳壽彭等，1929: 247-253）。把「反帝國主義運動」理解為反帝大聯盟在 1924 年所推動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還有著名的日本「中國通」長野朗、陳彬蘇，以及幾種辭書或事典，如：長野朗（1927: 134-172）、陳彬蘇（1928: 123）、河瀨蘇北（1932: 43，〈反帝國主義聯盟〉條）、長野朗（1940: 167-168，〈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反帝國主義大同盟〉條）、高希聖等（1930: 115-117，〈反帝國主義運動〉條）。

⁶⁹ 〈京師警察廳查禁中共北方執行委員會印刷品有關文件〉（1922.10），收錄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1991a: 546-549）。

⁷⁰ 「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影響力可從當時中共所領導的「非基督教運動」的變化得到說明。「非

義運動週」卻在中國社會主義運動中形成某種傳統。⁷¹而且 1924 年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還曾在殖民地台灣引起關注。⁷²

回過頭看《台灣社會運動史》的謝廉清史料。書中「與中國國民黨左派人物接近」之語，也許正是指胡鄂公以及「反帝大聯盟」。至於謝廉清是否「於翌年 3 月前後進入蘇俄，於同年 7 月左右歸返北京」，則很值得考慮。因為謝廉清與謝雪紅甚熟識，但在謝雪紅的回憶裡，在她之前赴蘇的台灣人只有許乃昌。⁷³再者，既然謝廉清能於 1926 年順利畢業於朝陽大學，是否可能花上四、五個月的時間離校？（或者實情只是出入蘇聯駐京使館？⁷⁴）在謝雪紅眼裡，謝廉清只是汲營於生的「糊塗蟲」。⁷⁵謝雪紅的評價迥異於各種史料所揭示的謝廉清形象；也許她不知道謝廉清的活動，也或許她不願提。囿於材料限制，無法進一步推論。但謝廉清絕非自始至終只是一個「糊塗蟲」。日本激進派鈴江言一（1894-1945）在北京期間即曾與作為中共黨員的謝廉清來往。⁷⁶當時謝廉清曾被組織上評價為「對於主義十分信仰，很熱心服務。」並曾在「洋車夫運動」中擔任組織工作。⁷⁷

謝廉清後來陸續擔任天津地方法院書記官（1926）、北京郁文大學教授（1927）、中國陸軍大學教官（1928）等職，教授日文。但日本特務機關直到 1930 年都還在監視他，視之為「在支台灣籍民・共產主義運動重要人物」，但也觀

基運動」早在 1922 年時就已在中共所領導「非基督教學生同盟」而出現於上海。當時主要從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立場去批判基督教，因此成果有限，迅即消亡。1924 年的「反帝國主義運動」興起後，「非基運動」遂得以從反帝國主義的基礎、從中國史上最大教案（義和團運動）的重評之中而復活，甚至模仿「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運動週」模式（薛曉建，1998：19）。

⁷¹ 比方 1930 年，中共領導的上海反帝大同盟與上海台灣青年團合作，以「6.17」台灣恥政紀念日至「6.23」上海沙基慘案紀念日為「反帝國主義運動紀念鬥爭週」。1931 年，中央蘇區則以 5 月 25 日至 6 月 1 日為反帝國主義運動週。以上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c：312）、江西省文化廳革命文化史料徵集工作委員會等（1994：100）。

⁷² 1924 年的《台灣民報》也曾持續關注中蘇建交與其後之「反帝國主義運動」，影響力可見一斑。分見：台灣民報（1924b, h,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大川周明（1924）、廉〔謝廉清〕（1924a）、蔣渭水（1924）、民國日報（1924j）。

⁷³ 謝雪紅（2004：216）。

⁷⁴ 外務省記錄（1930b）指出謝廉清曾與蘇聯駐京使館有所聯繫。

⁷⁵ 謝雪紅（2004：138, 148）。

⁷⁶ 鈴江言一（1975：202）、衛藤瀨吉與許淑真（1984：37）。其他的研究亦指出：鈴江言一曾以王子言的化名在中國活動，結識了作為「中共黨員」的謝廉清與胡鄂公等人（蔣立峰，1992：626），並請參見張友漁（1990：119-121）的回憶。

⁷⁷ 中央檔案館與北京市檔案館（1991：36, 352）。

察到他似乎在蘇聯大使館被檢舉(1927)後就不再參加活動。⁷⁸抗戰勝利之後，謝廉清因曾參與華北偽政權而一度下獄。最後，與前往台灣的胡鄂公相反，謝廉清留居北京，於1954年任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工作人員並終老於斯。⁷⁹

第三節、結論

「土匪氣」很好，何必克服？

——魯迅致蕭軍，1935年

如果還是擾亂了讀者的心呢？那麼，我們還絕不是奴才。

——魯迅評蕭紅《生死場》，1935年

1. 兩種史觀的抉擇

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史學界曾就何者才是中國近現代史的「進步主線」而發生論爭。論爭中有兩派，以學者林華國(2005)的說法，可分別稱為「兩個過程」派或「兩種趨向」派，或稱「階級鬥爭」史觀派及「近代化」史觀派。⁸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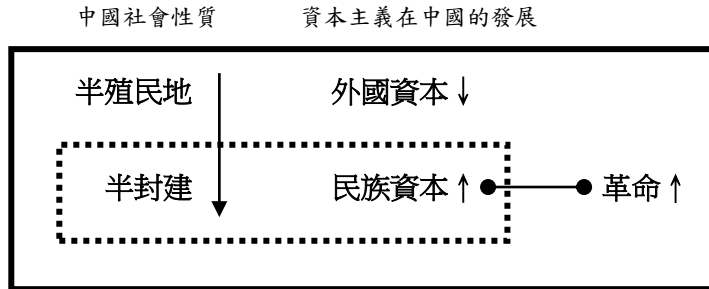
爭論起源於「近代化」史觀派對於做為主流之「階級鬥爭」史觀派的反動，而契機則是重新詮釋毛澤東對於近代中國社會性質——即「半殖民地·半封建」

⁷⁸ 興南新聞社(1943: 194)、外務省記錄(1930b)。這份《外務省記錄》檔案保存不甚清楚，本研究只能概略猜測文意。

⁷⁹ 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室(2006)、葉芸芸(2006: 175-176)。

⁸⁰ 「階級鬥爭」史觀派的早期論爭可見《歷史研究》編輯部(1957)所編論文集，王學典(1996)對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的回顧也頗能說明「階級鬥爭」史觀派的一些想法。「階級鬥爭」史觀派與「近代化」史觀派的論爭則可參見梁景和(2004)的回顧。但本研究著重參考了林華國(2005)的分析。

社會——之定義。下圖中的方形實線框，代表了「階級鬥爭」史觀派所關注的範圍；方形虛線框則代表「近代化」史觀所關心的範圍。箭頭的上下分別代表進步或沉淪：



林華國指出，「近代化」史觀派以黎澍（1912-1988）、李時岳（1928-1996）為代表。他們認為毛澤東僅僅把「半殖民地」視為描述中國主權地位的概念，只有「半封建」才是真正涉及「社會性質」的概念。然而他們的推論比毛澤東更進一步，因為他們試圖論證「半封建」的反面應是「半資本主義」（即民族資本主義），而非僅僅描述主權地位的「半殖民地」。因此他們將民族資本主義視為進步的象徵，而「半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克服「半封建」的過程，就是中國近代史的進步主線。

至於被「近代化」史觀派所批駁的「階級鬥爭」史觀派，則以胡繩（1918-2000）、范文瀾（1893-1969）為代表。他們並不否認「近代化」史觀派所詮釋的毛澤東。但他們更重視由於「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相結合而產生的「沉淪」。挽救沉淪的力量可以是民族資本主義，但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不可能允許它發展；「半封建」的另一半也可以是民族資本主義，但更以壓制民族資本主義的外國資本主義為主體，而且外國資本主義並不導致中國資本主義化。因此挽救沉淪的動力便只能是階級鬥爭（泛指一切革命反抗）。

林華國所總結的兩種史觀在民族資本主義與革命發生結合的歷史事件上（如：太平天國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共同採取認可的態度。但在民族資本主義與革命發生分離的歷史事件上，兩種史觀的真正傾向就突顯出來了。對於「階級鬥爭」史觀來說，他們肯定義和團運動（因為革命），但否定洋務運動（因為反革命）。而「現代化」史觀的見解則恰恰相反，他們否定義和團運動（因為不利於

民族資本主義，所以他們其實還想進而否定太平天國運動），並肯定洋務運動（因為有利於民族資本主義）。換句話說，兩種史觀共同存在兩條歷史進步主線，一條主線是「革命」，另一條主線則是「民族資本主義」。只是兩種史觀所側重的主線不同，而歷史進步主線自然也是歷史建構的主線。至於民族資本主義與革命之間的分離與結合，也自然是民族資產階級與革命之間的分離與結合，從而是革命動力與革命任務之間的分離與結合。

「民族資本主義」之所以可能成為一個共產主義政黨所接受的歷史進步主線，並不在於中共擁護「民族資本主義」，而在於他們要同那些有可能對抗外國資本主義（從而可能服從於「民族」利益）的「民族資本主義」與「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不過，這並不見得是主要的原因。

實際上，從「民族資本主義」出發，正可在「革命」以外尋得新的歷史建構空間，特別是以此說明中國歷史的客觀趨勢與世界歷史的客觀趨勢之間的關係。以「明清資本主義萌芽」來說，它試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40-1949）之前——也就是中國「封建社會」（1840年為下限）之內——補上一個「普世」而且無法證偽的資本主義階段（雖然只是一個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⁸¹的階段）。⁸²因此毛澤東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⁸³這也可以證明中國人民「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國人所組成的社會不應該有什麼不同。」（郭沫若語）

但就「階級鬥爭」史觀而言，「民族資本主義」在歷史建構之中更重要的作用則是要以自身的無力說明「革命」的必要性：雖然中國歷史本來在普世的客觀趨勢之內，卻因帝國主義而走出普遍的客觀趨勢，進入特殊的、只能沉淪的客觀趨勢之中。這種沉淪表現於兩方面，一方面是民族資本主義無法發展。如毛澤東所云，「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

⁸¹ 將研究範圍嚴格鎖定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見解，以許滌新與吳承明所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的先行本——《舊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為代表（《舊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編寫組，1977）。

⁸² 本研究將明清資本主義萌芽也視為民族資本主義。許滌新指出，「繼承明清以來的資本主義萌芽而來的民間企業，即民族資本主義。」（許滌新與吳承明，2003：20）

⁸³ 毛澤東（1967b：589）。毛澤東最初寫下的1939年版並未出現這段話；此乃1949年後加上的，可參見毛澤東（1971b：103）。

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⁸⁴另一方面則是帝國主義也不可能代替民族資本主義而使中國資本主義化，完成馬克思所謂的帝國主義「雙重使命」。因為帝國主義並不根絕中國的前資本主義勢力，而是與之勾結。由於以上兩個方面，讓中國進入一種只能沉淪的畸形社會，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中國唯一的出路只能是革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包括義和團運動在內的各種革命，都得到了肯定。

但就歷史建構本身（或者對於歷史進步主線的發掘）的歷史而言，民族資本主義的歷史建構晚於革命史的歷史建構。革命史的歷史建構——如本章所討論的——則始於 1924 年義和團運動的重評。也許因為革命史的歷史建構先行，才限制了民族資本主義的歷史建構之內容。但這並不意味著，如果革命史的歷史建構能被排除，民族資本主義的歷史建構就可以獨立存在或者取得其他的內容。因為民族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至少就**當時人的感受**而言確實是「不發展」；而這種「不發展」在中國保持形式上之主權地位時更易感受。自國民黨於 1927 年政變分共並逐步取得全國政權以來，此後十年乃至二十二年陸續以國家的名義或資源開辦了各種資本主義企業，然至 1949 年之前，中國不但始終沒有資本主義化，而且似乎越發難以資本主義化。⁸⁵如果可以設身處地感受當時人的想法、如果他們的想法也是可推想的，那末，在民族資本主義已經獲得國家支持卻又不得發展的情況下，⁸⁶人們自然容易從中國無法資本主義化去感受問題。畢竟「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民族資本主義在這種現實的環境下反而以著本身的失敗而強化革命的必要性。

⁸⁴ 毛澤東（1971a: 168）。

⁸⁵ 汪敬虞（2007: 5）：「我在進行中國國民所得的研究和統計的整理編制時，對中國近代社會的性質並沒有真正的認識和了解。在進行估計工作之前以致整個過程之中，並沒有想到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更沒有規定一個事先設想好了的目的。我和巫〔寶三〕先生都是在看到估計的結果以後才動手寫出……文章。」「我們的驚異到了可怕的程度，說明『中國經濟很難得到發展』是我們當時也不曾料到有如此嚴重、然而卻是活生生的客觀現實，而不是如兩位教授〔久保亨、牧野文夫〕所說的『是為了論證共產黨政治統治的必要性』而有意進行不客觀的研究和統計編制。」

⁸⁶ 與國家關係密切的「官僚資本」正可視為「民族資本」的最高形式。雖然史學界通常會將兩者加以區分，但通常難以區分。許濂新的一段說明正可說明兩者之間的聯繫。他認為，「雖然我們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自始就有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兩個體系，但並非所有的資本都是『非此即彼』，都可以劃歸這個或那個體系。」因此「我們並不一一區別每家企業是官僚資本或民族資本，不去尋找這種形而上學的煩惱。」（許濂新與吳承明，2003: 20）這種難以區分恰恰體現兩者之間具有共性。

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直到 1928 年台共提出「一九二八年綱領」才確認台灣並未資本主義化，並藉由「國民革命」的概念而產生了歷史建構。與之相較，台共成立之前的社會主義者即便同情台灣民主國與噍吧哖事件等抗日武裝鬥爭，也並未將之建構成為一條歷史進步主線。因為他們的歷史進步主線很窄，僅僅是資本主義化而已。而在他們認為台灣將因日本資本主義而全盤資本主義化的認識下，他們都把眼光投向了未來、投向了與資本主義直接對立的社會主義革命、乃至僅僅投向了也許可以分化而出的無產階級。

馬克思曾說：「19 世紀的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己的任務的。從前的革命需要回憶過去的世界歷史事件，為的是向自己隱瞞自己的內容。19 世紀的革命一定要讓死人去埋葬他們的死人，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內容。從前是辭藻勝於內容，現在是內容勝於辭藻。」⁸⁷出現歷史建構的中國革命反映出中國革命與馬克思所說的「19 世紀的社會革命」——無產階級革命——有一定的距離。因此中國的現實生活並不會直接喊出這樣的話：

這裡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躍吧！

這裡有玫瑰花，就在這裡跳舞吧！

2. 殖民地「資本主義化」的限制

本研究試圖指出：一九二〇年代存在著一種把「日本資本主義」在台灣的發展，理解為「資本主義」客觀趨勢之展開的觀點（以《資本論》與《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所揭示的客觀趨勢為典範），許乃昌、平平同人、山川均、矢內原忠雄都是這種觀點的代表。這種觀點認為，「日本」只是「資本主義」客觀趨勢的承擔者，除了資本主義本身的崩壞之外，資本主義不會造成資本主義以外的結果，所以這種觀點並不質疑被理解的「資本主義」客觀趨勢本身。而是積極

⁸⁷ 馬克思（2001: 11）。

找尋客觀趨勢的體現處。他們因此而迴避眼前已經觀察到的現象——日本「資本主義」竟然造成了「資本主義」以外的結果——大量存在的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在這種觀點下、在民族資本主義並非在國家支持之下而遭遇失敗的情況下，即便民族資本主義遭遇日本資本主義的打擊而破產，也只會被視為台灣資本主義化過程中的內部矛盾而已（即前章所謂「第二個分化」）。台灣社會主義者面對民族資本主義的這種處境所能獲得的**感覺**，並不是台灣無法資本主義化，而恰恰是資本主義化的過程本身。

這種觀點雖然否定日本，卻無法徹底否定日本帶來的資本主義。其實這是一種沉默或不自覺地、甚至被迫接受帝國主義「雙重使命」的觀點。雖然這種觀點可以成為一個通向未來的末世論述，卻難以從「民族資本主義」或者「革命」的方向上出現歷史建構（因為台灣不被認為無法資本主義化）。雖然這種觀點因為承認台灣的資本主義化而更接近於研究對象相同的《資本論》——其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他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⁸⁸為研究對象——卻只能到此為止。

換句話說：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他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方法是否也適用於研究非資本主義社會？最典型的例子，可從王亞南（1901-1969）撰寫《中國經濟原論》（1946）時所遭遇的問題談起。王亞南是中國最早完整譯出《資本論》的學者（其合作者是郭大力，1905-1976）。他所撰寫的這本書，以說明中國社會性質為主題，並採用馬克思《資本論》所使用的各種經濟範疇來說明，可謂「中國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的最後總結，享有「中國式的《資本論》」之美譽。此書一出，即遭爭議。有批評者認為，既然王亞南認為中國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何能採用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論》諸經濟範疇？王亞南接受這一批評，但他認為，從資本主義的經濟範疇來研究非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並存的社會，就是要說明這個社會的沉淪或不正常性。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比較性的研究。但究竟能不能直面這種兩種經濟型態並存的社會而研究，卻是當時已經提出的要求，也因此，當時的中國才出現了社會主義國

⁸⁸ 馬克思（1975a: 8）。

家或者研究前資本主義社會時才有的「廣義政治經濟學」，從而使得一個本來只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他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為對象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被擴張的學問。具體成果則以王亞南《中國經濟原論》以及許滌新（1906-1988）的《廣義政治經濟學》為代表。⁸⁹

直到「中國改造論爭」（1926-1927），許乃昌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的認識才出現變化，他開始承認前資本主義不見得會被資本主義所克服、反而被保存下來的事實。⁹⁰到了台共建黨（1928），許乃昌所認識到的事實，終於也成為台灣共產主義者的綱領性認識。——雖然殖民主義「雙重使命」的觀點仍交錯於同時出現兩種歷史建構的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之中。⁹¹

然而就算能夠出現「民族資本主義」歷史建構，這種建構也是有侷限的。因為它只是一種單線進步史觀。這種史觀所認定的「進步」，就等於資本主義，只是論者更願意正面承認民族資本主義（而非外國資本主義）的進步性。與此相反，「革命史」歷史建構則以「反對沉淪」來定義「進步」，因此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便不會是唯一的進步主線。「革命史」歷史建構其實是多線進步史觀——雖然他們還是必須從中挑出一條最進步的主線；就中共而言，此即「新民主主義革命」。

3. 遠非成王敗寇

抗戰初期，其實恰恰在七七事變發生後的同月月底，楊達（1905-1985）閱讀了蕭軍（1907-1988）所著《第三代》之後，以「一種難以言喻的愉快」的心情寫

⁸⁹ 關於上述學術史問題，可見陳其人（2005）與吳承明（1996b）的討論。

⁹⁰ 參見邱士杰（2007）的說明。

⁹¹ 台共「一九二八年綱領」的「政治大綱」認為，台灣民主國之前的台灣已經有資本主義萌芽（「初步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民主國的「民主革命雖然不曾成功，但在革命過程中，由於內部資本主義之成長，以及日本帝國主義掠奪性的改革，最主要的土地問題實際上起了一大變化，此乃革命所收的唯一效果。」（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c: 25）

下一篇書評。楊達的「愉快」是這樣來的：⁹²

作品中描寫被欺壓的人民不斷加入「馬賊」的故事。所謂的「馬賊」，並不是我們常常聽到的可怕的強盜，而是相對於壓迫者而成長起來的一股對抗勢力。日本也有「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說法，依這句話的含義，我們天天被灌輸的「土匪」、「共匪」、什麼什麼「匪」，其實是……。但楊達的筆卻在刪節號之後停住了。

光復以後，過去由日本殖民者所正面標榜的「六·一七」「始政紀念日」終於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則是各地的舊社會運動幹部群集此日紀念五十年間死去的烈士。1946年6月17日，這天舉行了台灣島內首次的紀念忠烈祠典禮，並在連溫卿、楊達等人的組織下成立了「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會」。從1924年首次舉行於上海的恥政紀念日集會，到1946年舉行於台灣島內的紀念忠烈祠典禮，台灣人民終於能夠正大光明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悼念成千成萬仆倒在日帝屠刀之下的先烈。在1946年的《台灣新生報》上，楊達將他埋藏近九年而難言的心底話說了出來：⁹³

這個「土匪」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血染的五十年間台灣革命史中我們的革命先烈和志士。他們都是對逃得快的清朝文武百官的絕望，只有用自己的力量和現有的武器，保衛自己山河的悲壯的人民自衛軍。

在日本也有「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諺語，在台灣，日本統治者為了殺戮、侮辱被稱為「土匪」或「匪賊」的革命志士，還特別制定了「匪徒刑罰令」。然而，這種事也並不是日本軍閥的專利，滿清政府稱太平天國的革命為長毛賊之亂，也把孫文國父稱為賊等等，這與現在的軍閥把人民的革命力量稱為什麼「匪」或什麼「賊」的作法都一樣，是什麼人都知道的。……就這樣地，大大小小無數的武力抗爭在台灣島的這個小天地中，毫不畏懼地反覆發生。這是由統治者稱為土匪，而我們尊稱為先烈志士的人們，五十年間前仆後繼地延續至今的志業。

⁹² 楊達（2007a: 28）。

⁹³ 楊達（2007b: 18, 21-22）。

附錄 1：謝廉清的「反帝大聯盟」文獻

1924年7月27日，謝廉清在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發表演說。其演說詞收錄於《反帝國主義》一書。⁹⁴全文如下：

眾位同志！我們三十年前是中國福建台灣人，現在是帝國主義的日本壓迫下的台灣人。台灣人受日本之壓迫的痛苦，說不勝說，我不大會說北京話，要說也說不出來，——諸位只想想那些殘酷無理的強盜，是怎樣劫掠殺害那些善良的人民，就可以知道我們台灣人是受的怎樣的痛苦了。

我們台灣人曾經幾次圖謀脫離日本的羈絆，可惜結果屢次都是失敗。諸位看看地圖，就可以知道，日本挾著在被壓迫階級吸收來的雄厚的經濟勢力與奴隸彼國的人民訓練歷年武裝精緻的海陸軍，圍吞我們孤懸海中，飽受掠奪而羸困了的臺灣，自然是很容易的事。但我們台灣人並不因此灰心，我們只要一死不死，仍常與彼帝國主義的日本奮鬥一日。只要我們能夠繼續努力奮鬥，前途仍然可望得著光明。

因為帝國主義登峰造極的時候，也就是彼要進到墳墓的時候了。帝國主義的日本，此時經濟的勢力固然雄厚，海陸軍的武裝固然精緻，而彼帝國主義的運命，也就必然的要因此顛覆。在帝國主義的日本壓迫之下的，不僅只台灣人，還有和台灣人的境遇一般的朝鮮人，還有產業落後的中國人，還有名列日本籍而實際上同我們一樣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做彼の奴隸的日本工人和農夫；這些人只要都是一樣要生存，就不得讓彼帝國主義長此壓迫，就不得不要起來反抗！台灣人的流血慘劇，朝鮮人的獨立運動，中國人的排日的運動，日本的社會黨興起，就是反抗彼帝國主義的壓迫，要求生存的表現。帝國主義的日本愈雄厚其經濟勢力，則被壓迫者要求生存愈厲害；海陸軍的武裝愈精緻，則一旦倒戈，彼帝國主義的孽類愈益粉碎的〔得〕一個不留！

諸位同志，我們顛覆帝國主義的力量，已經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孕育出

⁹⁴ 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26a: 212-215）。

來了，只差一種組織將之聯合起來，將之一貫的運動。我們有許多同胞因為反抗帝國主義的日本而離開了故鄉。我現在到北京，就是想四處聯合反帝國主義的同志的。前幾天在報上看見了北京忽然有反帝國主義大聯盟之組織，我是欣喜極了；我是極願意加入這個戰團，做一個攻毀帝國主義的戰士。我並願意介紹我們台灣的同胞，一共與這個大聯盟結合起來，聯成一個廣大的聯合戰線，一致向帝國主義反攻！

諸位同志早已知道的清楚，帝國主義只知唯利是圖，彼壓迫產業幼稚的國家，弱小的民族，本國的工人，並不分彼此，任何地方，任何民族，同是一樣壓迫的；所以反帝國主義也不是中國一國的事，也不是台灣一隅的事，也不是任何地方一個地方，任何民族一個民族的事，乃是各地方各被壓迫的民族共同的事，所以我們被壓迫的民族是一個階級的；唯一的方法，只有聯合被壓迫階級的，一致向帝國主義反攻！做階級鬥爭！

諸位同志！我們要堅固我們的意志，普遍我們的宣傳，擴大我們的組織，嚴密我們的陣勢，接連的對著帝國主義攻打，帝國主義自然有被我們攻毀的日子。我們這個反帝國主義大聯盟之成立，是向帝國反攻的開始，我們還要準備著猛烈的戰爭。

諸位同志努力！我們不久就要看見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民族，紛紛樹起反帝國主義的旗幟！

謝廉清所撰寫的專稿〈帝國主義的運命〉亦收錄《反帝國主義》書中。⁹⁵該文有按語謂：「謝廉清同志，台灣人，是一個極熱烈極勇猛的反帝國主義者。這篇文章是他被壓迫來華後，百忙中抽暇所做的。我們非常感謝。（編者）」⁹⁶〈帝國主義的運命〉全文如下：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形式，是以科學的技術，利用蒸氣電氣，機械作工具；所以生產量是非常的大；自由競爭是他頭一個的特色，自然與手工業時代的生產量，是相去很遠了。少量的生產，向來常是供不及需的樣子，但一到資本主義的社會，各資本家挾其資本，而不慮及社會的消費力，就自由競爭的生產下去，結果不但說能夠充分的供給一地方一國內的人的需要{，}並且還有

⁹⁵ 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26a: 119-124）。

⁹⁶ 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26a: 124-125）。

剩餘的生產品——即所謂過剩生產——堆積如山。機械工業的生產量這般大，所以過剩的生產品是有增而無減的。對此過剩的生產品假使沒有相當的辦法，將此放任下去，則過剩生產品越積越多，結局生產自不得不停頓，工廠也就不得不關閉了。若然，則資本的運用豈有獨存之理？這將與生產的停止和工廠的關閉是同樣的運命的——資本的運用不得不告終；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勢必斃命了！但是狡猾的，聰明的資本家，及其御用的財政，金融，經濟……等學者專家，是很會用變通的辦法的，能夠把垂死的資本主義起死回生的。那種高明的辦法，不外乎割他人的肉，來補他自己的瘡，榨取他人的膏血，來肥滿他自己的身體。

當他們的資本在本國沒有運用的餘地的時候，他們就恃素日訓練來的雄厚的兵力，和強悍的外交手腕，向著經濟落後的國家，弱小的民族，加以武力，施以侵略。比方日本的吞併高麗，佔我台灣，就是一個好例。在本國垂死的資本主義得著了新領土，好像將死的人得著仙丹似的。既然得著新市場——新領土——則國內所有的過剩生產品不患沒有銷路。並且能運用將死的資本了。這個時候的資本主義，可說是已經達到最後的階段——即帝國主義。適才所說的佔領新領土，新殖民地——即新市場，我們叫做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發展過程中的第一期。

帝國主義是國際的性質，在國際自由競爭的市場裡經常要做市場的霸王，是他的根性。社會上的一切，統歸他所有，受他取捨，更是他所希望的。所以每一個資本家（工廠主）都是盡量的生產下去，而他們的政府則極力的將種種的產業保護政策使生產量更增加；使與別的帝國主義的國家的生產品競爭，以期博得最後的勝利。然欲達到這個目的，勢必要求原料的來源與自由銷售的市場，是以帝國主義雖得著殖民地，能供給原料，銷售商品；但是還不能夠滿足牠的社會的性質——生產力有加無已而殖民地範圍及其消費力〔有〕限，到一定的時期，總也要告終的。既是不能無窮的發揮它的佔有的性質，就不得不需要能夠毫無障礙的自由銷售生產品和採取原料品的範圍。於是他們的慣技，強悍的外交手腕，雄厚的兵力，不客氣的來脅迫弱小的國家，訂立種種的不平等條約，劃定勢力範圍。比方列強強制中國和他們訂立辛丑條約，及日本強迫中國承認二十一條，把東三省做他的勢力範圍便是。雖然殖民地之財富，勢力範

園之寶藏，固非取之不竭，吸之無窮，如長江之水似的。但人口與消費力有限，經過一定的時間，自又有過剩的生產，和原料缺乏的恐慌。資本家唯一的侵略工具——金融資本——又擋著了。此是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勢力範圍殞命的時候：這是帝國主義的第二期。

資本帝國主義的謀士，財政家，金融家，經濟學家，到這個地步也就漸沒有變通的辦法，而要束手待斃了。地球上所有的市場，分的分，割的割，以外再也不能夠發現新市場了。帝國主義至此可說是日暮途窮了！死，是帝國主義必然的運命。但臨死的帝國主義，決〔絕〕不願將此放任下去的。社會上的弱小民族，經濟落後的國家既侵略殆盡，依他們的根性——社會的性質——乃不得不心與別的帝國主義的國家決勝負——就是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於是離開平和時期而入於衝突時期了。請看侵略中國的各個帝國主義底國家的衝突，就可瞭然。在外交上常有糾紛，便是他們互相衝突的鐵証。如日對美，美對英，英對法，法對日，都免不了相互間的衝突。更舉一個例子說，美國計劃和主張的新銀團與中國的門戶開放，於英日不利，他們就反對起來。又如此回的慘殺案，英日兩國，則大發揮特發揮帝國主義的力量來壓制中國；而美國呢，則乘此機會假仁假義，施了一大推的空人情，欲買中國人的歡心，而圖中國市場的獨占，和排斥與自己分贓的帝國主義底國家。這正是他們相互衝突的好例子。帝國主義者的衝突，依他們的根性發展下去，則彼此的互相排斥衝突是一定免不了的。至於帝國主義者間只能為某種利益而取聯合戰線，或對於或種的事件有時能夠步調一致；但是不能夠說彼此的衝突就打消了，他們依然是衝突。他們的聯合是不可能的。比方此次的屠殺事件，各帝國主義的國家的步趨將近一致，這是他們各個都看到中國群眾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事例，已經達到很高很可怕的程度；為維持他們的勢力，所以不得不取共同一致的態度。雖然，他們互相的衝突，決〔絕〕不因此而打消，是以他們是不會成聯合戰線的。帝國主義者間較大的衝突必然引起戰爭。戰爭的結果，一定有戰敗國的。那我們可以說在社會作孽的帝國主義國家少了一部份。再申言之，帝國主義者間的戰爭，是催促帝國主義的滅亡。這可說是帝國主義如肺病者到了不可醫治的第三期。

資本帝國主義，依他的史的發展，得證明他的崩壞是一種必然的運命。帝國主義的國家那般的衝突，那樣自相殘殺，以促進他們的本身滅亡；他方面又

有在他們的制度底下孕育起來長大起來的解放的革命運動，一天一天跟著資本帝國主義的發展而成長，到這個時候其勢力已經風靡了全世界，將爆發的排置，也差不多快排置好了。如各國都有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在各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各被壓迫民族也都有民族自立的運動。如雨後的春筍，勃勃而起，這兩個運動，都是要帝國主義的死命的。

這兩個革命勢力的聯合，就是帝國主義的催命符。這就是帝國主義的第四期，即滅亡時期。

幾百年間縱橫天下，榨取和殘殺了無數萬無產者的資本帝國主義呀！死路是你必然要跑到的。轉眼的天下，一定是無產階級的天下！

第八章、「蠹魚」的旅行日記 ——1924年連溫卿的赴日之行

引言、一次特別的報告會

雖然有 1923 年底「治警事件」的打擊以及許多組織的接連崩潰，文化協會卻堅持了下來。文協繼續進行著面向群眾的文化啟蒙工作。特別在台北，1923 年以來開設了「短期講習會」¹以及「通俗學術土曜講座」²。前者後來遭到禁止，³後者則在台北「港町」進行至 1924 年。蔣渭水（1890-1931）是「通俗學術土曜講座」講次最多的人，共九次；其次則是講了八次的連溫卿（1895-1957），⁴其間還曾遭到臨監警官的中止。⁵連溫卿指出，就動員力來看，「每回聽眾平均

¹ 首回：1923 年 9 月 11 日。

² 首回：1923 年 12 月 8 日，土曜即週六。

³ 連溫卿（1988: 66）。

⁴ 在將近十個月、共計舉行四十四回六十四次的「通俗學術土曜講座」中，連溫卿便講了八次，僅次於蔣渭水的九次，而與林野並列第二。據連溫卿（1988: 66-73）所言，是「四十四回六十一」次，但同樣根據連溫卿所表列的各回各次講題來計算，卻應該是四十四回六十四次。連溫卿的計算法甚不可解，故此處改以六十四次記之。連溫卿所主講的場次如下：第三回（1923 年 12 月 22 日）：二重生活。第六回（1924 年 1 月 12 日）：烏托邦。第十回（1924 年 2 月 9 日）：生活之意義。第十四回（1924 年 3 月 8 日）：道德之進化。第十五回（1924 年 3 月 11 日，臨時）：道德之進化（續前）。第二十回（1924 年 4 月 12 日）：原始時代婦人之地位。第廿七回（1924 年 5 月 30 日，臨時）：內地旅行談。第卅九回（1924 年 8 月 16 日）：將來的台灣話。以上場次資訊分見：台灣民報（1924k）、連溫卿（1988: 66-73）。

⁵ 連溫卿的講演曾遭中止。在 1924 年 3 月 11 日臨時舉行的第十五回講演，「道德之進化（續前）」中，因為「連溫卿氏演說道德之進化，說到灣妻與台灣所云牽手之正比例」（《台灣民報》的說法），涉有「汙辱（日本）內地的女性之言辭」（這是御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的說法），遂遭臨監的松崎警部「中止解散」這場聚滿二百多人的講演會。這場講演的具體內容與現場狀況，由《台灣》雜誌的記者詳細地報導於同年 5 月 10 日出版的《台灣》雜誌上。以上分見：台灣民報（1924c）、台

以五百名計算，已動員二萬二千人。」若就演講主題來看，則「以社會問題方面之講演為最多，幾乎及半，佔三十次之多，以民族問題，勞動問題及文學方面最少，祇各一次而已。」⁶

連溫卿的八次演講有一次是非學術的，即 1924 年 5 月 30 日臨時舉行的第廿七回講演——「內地旅行談」，這是他赴日本旅行的心得報告會。連溫卿於 1924 年 4 月底至 5 月中旬首次踏上日本進行考察訪問。這是連溫卿第一次離開台灣的土地、為了追尋與殖民母國社會主義運動的聯繫而展開的一場旅行。

第一節、〈蠹魚的旅行日記〉尋蹤

1. 戴國輝的追尋

《台灣社會運動史》的記載是多數研究所引用的說明：⁷

台北市大宮町山口小靜（大正十二年三月死亡）於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在學中，和山川均夫妻接近，研究共產主義，大正十年〔1921 年〕十月遭受勒令退學而回來台灣。回台後和連溫卿等相識，盡力於主義的宣傳，並介紹連溫卿予山川均。大正十三年〔1924 年〕連溫卿為參加世界語學會而上東京時，因有上述緣故乃寄宿於山川家裡，其後，結成密切關係，連溫卿接受山川均共產主義運動的指導，對山川屢次提供有關台灣之諸情況及調查資料。

其實連溫卿於 1924 年赴日期間的經歷並非毫無遺存。他在旅行中的經歷俱以日記的形式保存下來。這份日記與著其他的連溫卿遺稿，均收存於連溫卿的琉球籍好友、學者比嘉春潮（1883-1977）手中。在戴國輝（1931-2001）教授發表

灣日日新報（1924a）、連溫卿（1924a）。

⁶ 連溫卿（1988: 66-73）。

⁷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244-245）。

於立教大學《史苑》學報之〈台灣抗日左派指導者連溫卿及其稿本〉一文裡，⁸他回憶起比嘉春潮與他的交往及自身追索連溫卿史料的過程：⁹

筆者之所以能發現連溫卿的日本關係人物，乃在於一出版就讀到勁草書房出版的《山川均全集七》（1966年8月），並以書內的〈殖民政策下的台灣〉的編者註為契機：「本篇頗得力於山口小靜小姐在台灣的世界語運動同志連溫卿先生所提供之資料。」

不久之後，更得到池田敏雄先生（平凡社）的指點，得知沖繩出身的碩學比嘉春潮老先生的傳記《沖繩的歲月——從自傳式的回想說起》（中公新春1969年3月）裡面，連溫卿以R先生之名而出現，於是委託友人中村女士設法安排訪問比嘉翁之事宜。終於在1972年7月5日及1973年2月24日兩次拜訪並進行訪談。

第一次訪談時，得以借到連溫卿於1954年9月28日寫給比嘉翁的信，以及〈結束旅行之人的日記（旅行を了りたる人の日記）〉（1930年）。當時比嘉先生說：「連先生有一疊尚未發表的稿本在這裡，但不曉得收到哪裡去了。」

記得是第二年（1973年）年初，經過中村女士，比嘉翁說他找到了那份稿本，問我要不要去看，於是便利用借閱稿本的機會，再謀訪問的機會。

當時所得到的稿本就是這裡所發表的〈日本殖民政策在台灣之展望（台灣に於る日本植民政策の展望）〉（文末記有「1930年8月13日」之語以及「先送改造社內」的紅字。此處刊出時，已經題目改為〈在台灣的日本殖民政策之實態（台灣に於る日本植民政策の實態）〉），以及回歸祖國之後執筆的〈土地收奪過程〉、委託出版的「內容目次」和作為樣本之一部份的〈第六節收奪的進化〉等三份稿本。從前述之連先生致比嘉翁信函以及委託出版之樣本的引述來推測，似乎連溫卿將他在戰後以《日本統治期間在台

⁸ 戴國輝教授的這篇文章，迄今仍是關於連溫卿史料及生平最翔實的介紹。以這篇文章為基礎，1983年在《夏潮論壇》上發表了中文的連溫卿生平介紹（彰生，1983：58-61）。日後張炎憲所撰之文（張炎憲，1988：361-369）亦未能超越戴國輝更多。

⁹ 戴國輝（1975：59-60）。

灣所執行的土地收奪過程（日本統治期間中を通じて台灣で行はれた土地收奪過程）》為名的著作，委託舊識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之世界語運動者山鹿泰治與比嘉春潮，去安排發行出版之事宜。

在另一篇文章裡，戴國輝教授則有這樣的說明：¹⁰

……當年比嘉已是九十歲的老翁。但他的記性絕佳又健談，讓我受益良多。日後我將邂逅的經緯詳述並把比嘉貸給的連溫卿未發表稿件加以校訂刊登出來：有(1)〈台灣抗日左派領導人連溫卿及其稿件〉。¹¹(2)連溫卿著〈日本在台的殖民政策之實況〉（同時刊登於《史苑》【立教大學史學會的半年刊】第三五卷二號，七五年三月）。¹²(3)連著〈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掠奪土地的過程（一）〉（《史苑》第三七卷一號，七六年十二月）。¹³(4)連著〈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掠奪土地的過程（二）〉（《史苑》第三九卷一號，七八年十一月）。¹⁴(5)連著〈連溫卿日記——一九三〇年之三十三天〉（刊登於和(4)同號之《史苑》）。¹⁵

比嘉翁另外提供我連的中文〈蠹魚的旅行日記——一九二四年〉的稿件。因是中文，我不便刊登於《史苑》。盼望最近的將來能找出來公諸於世。

戴國輝教授所已校訂發表的上述連溫卿史料，目前均有中譯本¹⁶或中文版¹⁷可供參照。然而直接記載連溫卿於 1924 年訪日期間的史料——〈蠹魚的旅行日記〉——卻迄今尚未「重新」公開發表。

¹⁰ 戴國輝（2002: 35）。

¹¹ 戴國輝（1975）。

¹² 連溫卿（1975）。

¹³ 連溫卿（1976）。

¹⁴ 連溫卿（1978a）。

¹⁵ 連溫卿（1978b）。

¹⁶ 〈台灣に於る日本植民政策の展望〉（連溫卿，1975）的可見《台灣思潮》的中譯本（連溫卿，1981），連溫卿的 1930 年日記〈旅行を了りたる人の日記〉（連溫卿，1978b）則可見林書揚的中譯本（連溫卿，1986）。

¹⁷ 連溫卿以中文發表於 1949 年《公論報》的《台灣風土》副刊的〈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土地被收奪的過程〉（連溫卿，1949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大致可視為〈日本統治期間中を通じて台灣で行はれた土地收奪過程〉（連溫卿，1976, 1978a）的中文版。惟該文章節排序、內容與日文版有所出入，此間細緻的差異，尚待比較。類似的文章還有連溫卿（1958）。

2. 〈蠹魚的旅行日記〉考證

關於〈蠹魚的旅行日記〉，戴國輝教授曾指出：¹⁸

連氏另有一本用中文發表的「蠹魚的旅行日記——一九二四年」。予以登載的是那家報社尚屬不明，不過從比嘉翁所提供的剪貼簿上的剪片和附在卷首的黃希純的介紹加以推測，可能是中國大陸上發行的報紙之一。將來把本誌所載之一連論文與本日記合訂為一本時，予〔預〕定也把該日記照原來中文予以再錄其中。

如戴國輝教授所介紹的，原來收藏於比嘉春潮那裡的〈蠹魚的旅行日記〉，實際上是個剪貼本。是筆名為「越無」的連溫卿將日記投稿到某報紙之後，分期連載，然後依次剪貼成一本。在這系列連載的首篇裡，由「黃希純」所撰寫的引言透露了一些相關線索：¹⁹

越無君。帝國主義壓逼下之弱民族也。與予為精神交。數月前嘗以是編日記郵示。且屬為之發表。惜屢以時事見阻。延擱到今。誠負君多矣。君本漢族。年富願宏。致常為強魔所嫉忌。一切天賦的自由。幾盡被蹂躪。此雖可目之為被征服的民族對其所謂「主人翁」應有之義務。然按之正誼。殆適得其反。而夫已氏之狐惑伎倆。亦往往露其破綻。君子竊羞之。彼日以「人道」「親善」「解放」等名詞作口頭禪以蠱其民眾者。清夜以思。曾亦啞然自笑其失也否耶。適值報業復版伊始。謹為之弁敘數言如左。以介紹於讀者，並藉向越無君道褻慢之歉忱。

十三、十一、十二、黃希純、〔。〕

線索之一，首先即是「黃希純」這個人。據候志平所編〈中國世界語運動年表〉，1922年9月以後，「廣東黃希純在《台山童子軍》雜誌上編輯『世界語

¹⁸ 戴國輝（1978）。此處中譯引自林書揚的翻譯（連溫卿，1986：80）。

¹⁹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一回）。

主義專欄』(La Esperantismo)。」²⁰從「世界語」這層關係來考慮，「廣東黃希純」極可能就是寫下上述引言的「黃希純」。²¹因此，戴國輝教授關於此系列連載發表於大陸報紙的推測，可信度是很高的。線索之二，則是引言所謂「邇值報業復版伊始」一語，這一線索卻暗示〈蠹魚的旅行日記〉實連載於一份剛復刊或剛復版的報紙，且連載必晚於1924年11月12日。

接著來關心《蠹魚的旅行日記》的結構。其連載編號自第1回始，第105回終，記錄了連溫卿首次赴日期間(1924.4.26 離台, 5.20 返台)的種種記聞與心得(見表8-1)。其中第78回重複兩次，因此連載實際共有106回。倘若當時連載於日刊，至少將達三個月。

連溫卿採取日記的形式寫下這份長文，然而4月28日、5月8、9、10、11、15日在比嘉春潮的剪貼本中是不存在或無法判別的。以4月28日來說，由於4月27日與29日之間的連載編號沒有中斷，因此4月28日確定是空白的。換句話說，這份刊行出來的日記——無論是作者連溫卿的因素或刊行者黃希純的原因——並非日日均記。以此為前提，加上比嘉春潮的剪貼本漏貼數回，因此5月8、9、10、11、15日在這份日記中的記錄狀況，其實無法確切判定。日日均記的可能性恐怕較低。只有尋得刊行這篇日記的原刊物，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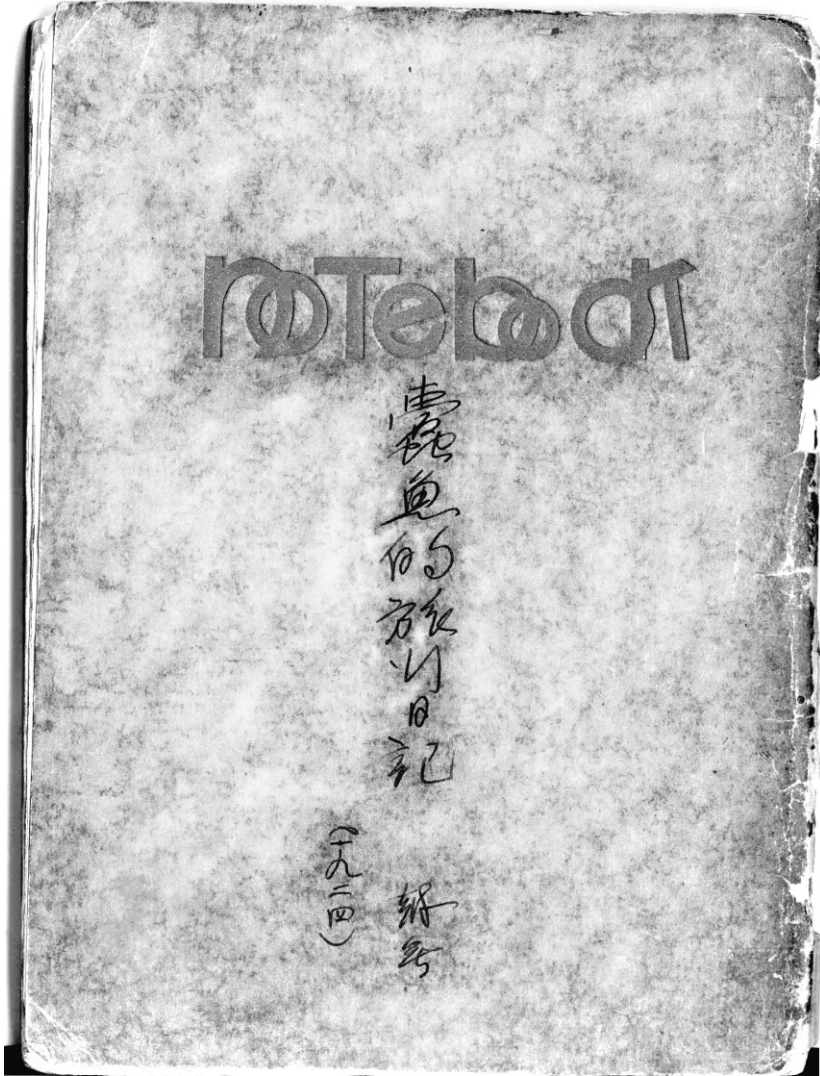
連溫卿所寫的這篇日記非常不容易解讀。問題可分幾個方面：

首先，雖然這是一篇基本上以漢語白話文寫作而成的日記，然其語法乃至漢字的運用，必須時時兼以閩南語才能加以理解，其中甚至還包括不少日語漢字辭彙。換言之，倘若缺乏閩南語以及日語的背景，將不容易閱讀這份史料。

²⁰ 侯志平(1985: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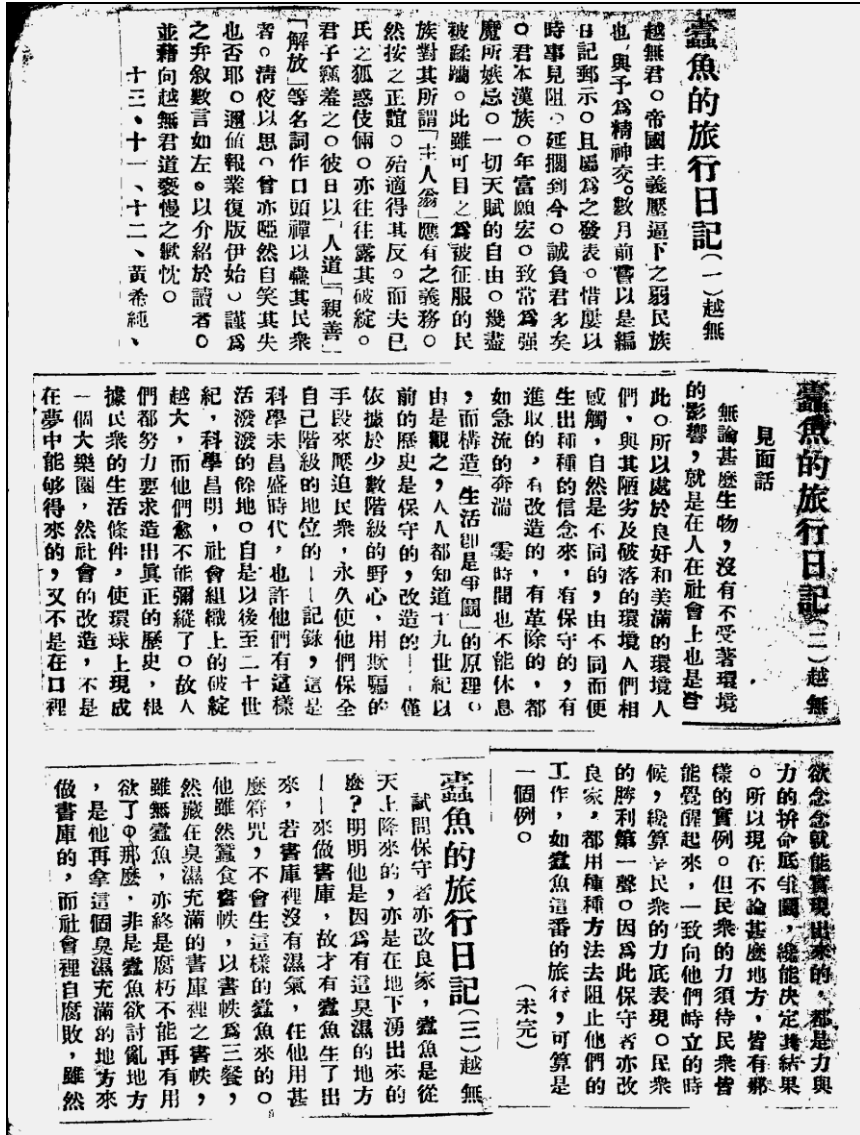
²¹ 關於黃希純，1922年至1923年間，文學研究會定期刊物《文學旬刊》亦有同名作者翻譯或詩作。有可能是同一人(賈桂芳, 1985: 1116, 1118)。另外，在中國國民黨黨史上，也有一位同名的海外華僑，1911年曾任中國同盟會加拿大支部支部長(劉國銘, 2005: 2064, 〈黃希純〉條)。是否為同一人，尚待考察。

圖 8-1：1924 年《蠹魚的旅行日記》剪貼本封面



比嘉春潮轉交戴國輝之《蠹魚的旅行日記》剪貼本，現已移交中研院收藏。上書：「蠹魚的旅行日記 越無（一九二四）」（原件寬 14.5cm，高 19.4cm，封面為綠色）。值得一提的是：比嘉晚年也曾出版過一本以「蠹魚」為名的文獻隨筆集《蠹魚庵漫章》，細數其如蠹魚般「啃紙」的閱讀生涯（比嘉春潮，1971: 295）。

圖 8-2：《蠹魚的旅行日記》剪貼本內頁



其次，連溫卿的這篇稿子是以夾敘夾議的方式書寫的。由於連溫卿常在觀察到某些現象或實況之後大加議論一番，加上有時針對不同的現象提出類同的見解，因此從中體現的思想見解總是零碎不堪。連溫卿對此寫作方式實亦深有檢討，「我的話思著就寫，所以常常脫出歧路，……但總要後退數步，才能繼續前話」。²²這些論說文字的長短不一，在閱讀的過程中，讀者感到累沓難解，乃是勢所必然。

其三，連溫卿的這篇文稿常有第一、二、三人稱混用的狀況，加上文中標點符號的排版錯落不一、文章剪貼不全，連溫卿又常以化名代稱所記述的對象，更容易導致讀者不易知曉連溫卿的敘述脈絡。對於後世的研究者來說，這些化名也是殊難破解的難題。

倘若將《日記》與連溫卿日後所撰寫的其他文章結合起來看，那末《蠹魚的旅行日記》簡直可謂那些後續著作的祖本（見表 8-2）。若欲探究連溫卿如何延續或改變其思想，細緻地針對《日記》及其後續著作進行比較，將是不可迴避的任務。

3. 「蠹魚」為何得以成行

連溫卿在〈蠹魚的旅行日記〉中寫道，他本來就有前往東京「研究東西洋文物的志向」，並曾有某間報社為了做為日本媒體熱點的殖民地問題而找他前往東京。²³雖然 1923 年山口小靜（1900-1923）的驟逝與東京震災大大地打擊他前往東京的意向，²⁴但終因飛行家「S 君」（即「社會問題研究會」同人謝文達，1901-1983）的鼓動而重下決心。1924 年 4 月 26 日，連溫卿終於從基隆港搭船前往日本「內地」——「這算是蠹魚旅行的第一幕，由此展開起來了。」²⁵

²²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七十六回）。

²³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三回）。

²⁴ 越無〔連溫卿〕（1924：第四回）。

²⁵ 越無〔連溫卿〕（1924：第五回）。

連溫卿將這場旅行視為一次在已然腐敗不堪的資本主義核心地帶——日本內地——所進行的考察。倘若資本主義社會可以比擬為「書庫」、而資本主義在日本的發展程度已屆「臭濕」，那末連溫卿便是在臭濕之中誕生的「蠹魚」。並非「蠹魚欲討亂地方」，而是蠹魚總是「拿這個臭濕充滿的地方來做書庫的」，所以他要向最為臭濕的日本內地而去。²⁶

這還是一場始終在警方彈壓下進行的旅行。如連溫卿所言，「保守者亦〔或〕改良家，都用種種方法去阻止他們的工作，如蠹魚這番的旅行，可算是一個例。」由於日本警察始終光明正大地「尾行」在他身邊監視著，因此連溫卿與警察間的相處幾乎構成了旅行全過程中的主要部份。²⁷

即便有虎視眈眈的警察「尾行」著他，連溫卿仍參加了令他動魄懾魂的五一勞動節遊行，甚至參與了中國留學生的「五·九」國恥遊行。此外，在謝文達以及比嘉春潮等人的協助下，他也陸續拜會了當時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領導人物，比方堺利彥（1870-1933）、堺真柄（堺利彥女兒）、仲宗根源和（1895-1978）、仲宗根貞代（源和妻），而且還包括了許多迄今仍無法考證的人物（比方「S. R 夫人」、「K 氏」、「K 君」）。由於警察跟監不舍，讓他很想早日回台。卻因日本世界語學會的邀請演講而延長旅行時間。也恰恰是這個延長了的旅行時間，他才透過謝文達等人的協助而戲劇性地在火車站掉包車票，擺脫了警察的追蹤。行進於微雨中的夜行火車，引領連溫卿與山川均、山川菊榮夫婦順利見面。他們一起討論了台灣的情況，也回憶起小靜的死。最後，他心滿意足地返回台灣。

²⁶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三回）。

²⁷ 當時的《台灣民報》諷刺那些跟監的警察云：「台灣世界語學會幹事台北連溫卿君，五月一日抵東京遊覽，宿於本社，據連君云，自神戶至東京車中尾行刑事一路護衛，至東京間連換十三個，及至東京驛又有東京的刑事迎接，幫帶行李至本社〔。〕其後日日有人引導，連君之東京此回初次，人地兩疎〔，〕有人如此日日跟隨，甚是利便滿足，蓋台灣人，受此待遇的，實以連君為嚆矢了。」（台灣民報，1924g）

第二節、向著五一節的東京而去的蠹魚

1. 在前往日本的船上（4月26日至30日）

4月26日，這是在大雨中揭開序幕的一天。

上午十一點多，連溫卿告別還在病榻上的父親，在母親的送別中離開台北。雨還是下個不停，坐在母親叫來的人力車上，耳邊不斷傳來紛雜急促的聲音：²⁸

那車衝雨驀進，我坐車中覺腦袋裡還是空空虛虛，沒有甚麼離愁別恨的東西，只聽得雨落幌上，「浙瀝的」作響，除了此聲以外，又有輪輦和大地摩擦聲音，和車夫「踢踏」聲音，直透我的耳神經，好比促我緊行的命令一樣。我在途中沒有別的念頭，但我這回到了京中，一定要那樣做去，這樣做去的思想，時時衝出腦裡來，不一時又消滅去了，沒有甚麼結果的，接踵又衝出那個〔恐〕怖的思想來，促我的注意，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

由於連溫卿所服務的南國公司裡的一小廝，在前幾日不慎向便衣憲兵透露了連溫卿的訪日行程，才使連溫卿產生這般患得患失的恐怖情緒。他忿忿地想：²⁹

量是有參加甚麼政治運動或其他的團體，總是〔在〕法律範圍內面³⁰〔裡面〕，已有所容認的，此番旅行全屬個人，設使被了官憲誤解為我帶有甚麼政治的，或其他的色彩，於我個人的事業難道也不能成功的嗎，而不受他阻害，這是我不要官憲知道的緣故呢。我又轉來〔回過頭來〕想想，這班忘八的瞎馬知道我這回的旅行，他若不論那是個人

²⁸ 越無〔連溫卿〕（1924：第五回）。

²⁹ 越無〔連溫卿〕（1924：第六回）。

³⁰ 「內面」：閩南語。

的，也是有甚麼的，總要起了野蠻人的吠，皂白不分，要怎麼呢。我想他必定有對待束縛我的手段，是故不可不先籌一個好好計來抵當〔抵擋〕他才是……

還在想著，連溫卿已抵達了台北火車站。他要就此乘車至基隆港搭乘「亞米利加丸」赴日。³¹

……我向車外遂與 E 君道別〔。〕那車筒上鳴然一聲啟行，此時不知什麼緣故，悲哀的觀念抱住我的理性，幾乎就要迸出熱淚來。……及身子坐定以後，思之不覺自笑自憫起來，為甚麼那霎時間能變得那麼的狀態……

到了基隆，連溫卿首先至 N 公司（南國公司）³²的基隆出張所拜託 T 君購船票。才上船，馬上就有水上警察來訪，幫他換了個較好的二等艙。³³

4 月 27 日，晴天。連溫卿起床後，讀了讀山川均的新書《由井底所看見的日本》，想起了山口小靜。在船上，他遇見一位舊識 C 君。連溫卿與 C 君，是在連溫卿因社會問題研究會違反出版法而在高等法院受公判的 3 月時認識的。他並認識了來自新竹的「禾某兄弟」——「兄焜君是中央大學學生，弟霖君是北京大學學生」——顯然，此兄弟即蘇惟焜與蘇維霖（即蘇薊雨）。此外，他還認識了 H 氏三兄弟、「卓兩階氏之子 K 君」和「獻氏之甥屯君」。³⁴

在連溫卿的籌畫下，當晚舉行了場台灣人茶會，有二十多人參加，多為學生。會上才知，H 氏三兄弟原以為連溫卿是「總統〔督〕府」派來調查留學生的日本刑事，自此誤解始消。連溫卿想：³⁵

似不知被誤認為偵探的人，反受真正的偵探尾行，這不是趣味的事麼。

4 月 28 日，連溫卿未留日記。

4 月 29 日，晴天。船已進入福岡的門司港。連溫卿收到一封昨夜由 S 君（謝

³¹ 越無〔連溫卿〕（1924：第六、七回）。

³² 蘇新（1993a：100-101）指出，連溫卿「青年時代曾在台北的『南國公司』（當時一家經營台灣—中國大陸之間的貿易公司）任高級職員。」

³³ 越無〔連溫卿〕（1924：第八回）。

³⁴ 越無〔連溫卿〕（1924：第十、十三回）。

³⁵ 越無〔連溫卿〕（1924：第十四回）。

文達)³⁶從東京拍來的電報，催促其一定要來東京。連溫卿與蘇氏兄弟等人原欲登岸參觀，卻因他們的臺灣人身分而遭水警滯留調查。³⁷

雖然日記缺少第 17 回，但從第 18 回來看，連溫卿一行人還是登岸了。按文中所述，蘇維霖即是欲於此處下船；而連溫卿返船之後，則將朝著瀨戶內海前進。³⁸

2. 從神戶到東京（4 月 30 日）

4 月 30 日，晴天。上午九點，「亞米利加丸」進入了神戶港。在準備登岸的過程中，水上警察特別針對連溫卿進行檢查，引起船上人們的目光。檢查行李時，水警甚至連木瓜都要檢查。登岸後，一行人遂前往「亮君」處拜訪，連溫卿也因此回憶起自己的家史：³⁹

亮君二十餘年前曾在台灣，在台灣稔識我父，二十餘年前，我的家庭是何等幸福，那時候我的父親可是北部屈指的大商人，然今已零落久矣。而二十餘年前——當我七八歲的時候——一個落魄者〔亮君〕，由中國至台灣，由台灣而之神戶，以期挽回失遇，而今他雖不至大商人，已是一店之主，……然我不意在此能聞得這樣懷舊的話，焉不得感慨起來，……

此間，又換了個跟監的刑事，蘇惟焜索性叫他帶大家去導覽市區。⁴⁰

當天下午一點四十分，決定先經大阪去京都逛博覽會的連溫卿一行人抵達京都。此時又換了個刑事。交接時，大阪刑事又云，可請京都刑事陪你們逛博覽會，「我聽了，覺他們猜事甚是機敏，只點了頭，就下車了。」逛完後，要離開

³⁶ 連溫卿曾云「我的友人 S 君是飛行家」（越無〔連溫卿〕，1924：第四十三回）。可見 S 君即「謝文達」。

³⁷ 越無〔連溫卿〕（1924：第十六回）。

³⁸ 越無〔連溫卿〕（1924：第十九回）。

³⁹ 越無〔連溫卿〕（1924：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回）。

⁴⁰ 越無〔連溫卿〕（1924：第二十四回）。

京都。連溫卿托蘇惟焜去郵局拍電報給謝文達，通知連溫卿將於次日早上八點三十五分到京。並旋於晚上 7 點 38 分於京都站出發。在車上，肚子痛了起來，連溫卿遂拿出木瓜與蘇惟焜分食，希望木瓜有助緩解腹痛。只是，火車的晃動還是讓他不易入眠：⁴¹

頓醒時，向後一瞧，那尾行的刑事，兩個眼睛像著電球不少減的光耀。連溫卿觀察到，各地刑事交接有其按照地域之別而分配的原則。但在這種交接與監視中，連溫卿也成了火車旅客的焦點。⁴²

3. 參與東京的五一節遊行（5 月 1 日）

5 月 1 日，天氣晴。

上午 8 點 35 分抵達東京站，卻沒碰到謝文達。新來跟監他的刑事，幫他拿行李，卻又帶著他亂繞。浪費了一個多小時，才到了目的地：⁴³

……轉入一小路，約再行百步許，見牆圍的門上掛著「□□□□〔台灣議會〕請願期成同盟會」的招牌，步入內門上還有「□□〔台灣〕青年會」及「□□〔台灣〕雜誌社」的招牌掛著，及推開門，則 K 君和 R 君立著說，來得好！來得好！我們在樓上看見你來，K 君目著了我，又轉視那刑事，說他是你的朋友麼，我說不是不是，他是個狗啊，…… K 君疑惑，何以連溫卿沒在車站遇到早上六點就出門的謝文達。但 K 君與連溫卿並未選擇留在社內等待謝文達：⁴⁴

K 君說今日是閑散的，可與我共遊，今日是人日，有勞働〔動〕祭，⁴⁵

⁴¹ 越無〔連溫卿〕（1924：第二十六、二十九回）。

⁴²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三十回）。

⁴³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三十一回）。

⁴⁴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三十二回）。

⁴⁵ 「五月一日（May day「人日」），就是「勞働〔動〕祭」日，一八八四年十月七日在北美「市加我」市，開國際的和國民的八大會議，決定每年五月一日為期，為實行八點鐘制度，而舉示威遊行，總同盟罷工。於是一八八六年遂為世界第一回的實行，這就是「五一」的起源。今年（1924 年）東京的「五一」也熱鬧的很，參加人員將近數萬。」（台灣民報，1924g）

我兩人欲往觀此，遂即出門，搭了電車，在途中乘換一次，到了上野公園前下了車。時午前十一時半，上野公園是拿一個圖造就的，觀岡上沒有甚麼異常光景，g君說那示威遊行，還不能即到，所以人們也不圍集起來，我們可先往咖啡店，用了午飯再去觀看罷，而那咖啡店的女茶倌很不親切，用了飯擬再飲著咖啡，呼之，像沒有聽著的，而又遲遲不來，我們拿錢置在棹〔桌〕上遂出，往岡上吃卵冰去了，〔。〕

但在大馬路上，卻全然感受不到遊行即將開始，或將經過此處的跡象：⁴⁶

在大路上看見行人沒有什麼豫兆，使人能夠推想那示威遊行一定能從這兒經過與否。不若再往山麓看了形勢，也是問了個消息，以決我們的行止。及到了山麓，那樣子依然是和山上不異。報紙的報導是正午十二時從這兒經過，在岡上再集合然後解散的豫定，但今已下午將近二時，恐迫是變更了豫定，也未可知。欲向他問一問，然在這兒往來的人們，誰知道那個事情，我們是不能猜定的，這時候覺得自己孟浪，空費時間在〔山〕麓一往一來，恰適躊躇之間，忽到了一個電車，走出十幾個的巡警來。這時候我們也無意識中〔，〕無言集注視線在那群巡警身上，看見他們耀武揚威，揚揚然由坂上步登岡上去。K君始向笑說，風來必有雨，我們可隨後去罷！他們都進入自治會館內，又返步，在那會館前後一巡，見了巡警陸續到來，也有步行的，也有乘自轉車的，也有乘自働〔動〕自轉車的，都到了自治會館就沒了形影。

原來這是遊行即將抵達的徵兆：⁴⁷

我們已明白這是「非常召集」，那末遊行將到矣，乃決在公園正面的石堦〔階〕的傍邊等一等，及至了正面，也不知何時來了個交通巡警，站立在那石堦〔階〕整理著往來的人們，這時候人們在公園內獨集，已暫暫增加起來了。

……忽傳來一句話「遊行將到矣」，這是第三次的，覺得人們大噪起來，即從岡上瞰〔瞰〕下山麓及公園對面那條大路上，看見在那地方站立的人們都紛紛蜜〔密〕集堵列起來，霎時間那條大路上的兩傍立

⁴⁶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三十三回）。

⁴⁷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回）。

著「人」的墻垣一樣，而山麓至岡上都被人們站立著如蓋上在的，表
出「人山」那句話的議〔意義〕的光景。

在自治會館內的巡警〔，〕已於一時間前各以三四十人為一隊，陸續從墳上下來，駐在那山麓和那條路傍，「遊行到矣」這句話一傳來，即看見那巡警分隊堵列在人們的前面，少久，見了沒有那的形勢，巡警又分散在路傍休憩，這時候和從前二次的堵列是不同的，見他們的面都緊張起來，兩個眼睛眦裂甚大，他們的左手力握著劍柄，造出一種雄壯的零圍氣⁴⁸〔氛圍〕，令人振奮，而我左右前面的人們各伸頸遙望，或說「那遊行已到了某處，再一轉街道便得到來」，或說，「你不看旗影在那兒麼」，既聽了，也隨人們向那條大路上去看，極我的眼界，在那白白坦坦的路上，卻沒有甚麼影子可望，而人們都說著來的，也有只是著，然這時候有從他處來的電車，到了停留場就停止便不稍動了，而一種雄大的歌音微微陣動我的耳膜，使人如在劇場見了掀起幕面那瞬間的狀態，人們反卻寂寞起來了，而那聲音漸近，歡呼之聲如遠雷一樣，殷殷傳來，少頃，則旗影井然可觀，前半都揭著黑的會旗，而後半是真紅的，表出日本社會運動的傾向，前者是安那其主義派的組合，主張自由聯合的，後者是布爾塞維克派的組合，主張統一合併的。那示威遊行將近山麓，而一聲「萬歲」(讀曰琶思雜以)又作，如白晝以霹靂，天崩地裂一般，在那兒站立的人們都脫了帽子高握手中給那遊行聲援，和那遊行歡呼。這時候民眾的前面雖有警隊堵列，然他們所說的威權也是秩序似不知逃往何處。歡呼之聲又作，**看那黑旗在空中振搖，而遊行的步武⁴⁹〔步伐〕**堅踏著地上，緩緩而進，這時候我的感想是用筆紙難以表現出來，這不是勞働者指示他們的力量〔，〕崩壞著那金字塔的社會嗎；〔？〕這不是勞働者欲在那光明地方建設新社會的實力麼；〔？〕

⁴⁸ 「零圍氣」：日語漢字詞。

⁴⁹ 「步武」：日語漢字詞。

圖 8-3：前田寬治於 1924 年所繪的《五一節》（メーデー）



72.7 × 91，圖片取自朝日新聞社（1992）

日本畫家前田寬治（1896-1930）於 1923 年前往法國巴黎。由於受到滯留當地的馬克思主義者福本和夫（1894-1984）的影響，其思想遂轉入馬克思主義。1924 年福本和夫回國（8 月），開始激起了日本國內的「福本主義」旋風。前田則在同年陸續創作出以勞動者、工廠為主題的畫作，其中也包括了這幅《五一節》（繪於 1924 年 9 月 28 日）。前田作為一名日本人而在法國所見的五一節示威，以及連溫卿作為一名台灣人而在日本所見的五一節示威，在歐亞大陸的兩端共同為 1924 年的 5 月 1 日留下彌足珍貴的見證。

「明年的勞動節一定要在東京舉行！」⁵⁰這是山口小靜於 1922 年返台時，向山川均所發出的偉願。就在小靜離世後的一年，連溫卿站上了這片小靜所曾期盼的、戰鬥著的熱土。看著眼前雄偉壯盛的階級隊伍、看著漫天翻飛的

⁵⁰ 山川均（1923：附錄頁 3）。

赤旗與黑旗，連溫卿內心的澎湃與激動躍然紙上。⁵¹——此時的連溫卿，心中會否想起小靜？

遊行過後，K 君送連溫卿回到雜誌社。⁵²這次總算見到謝文達了。⁵³謝文達說，他一大早就跑去車站等他，卻沒等到人。而在連溫卿與 K 君觀看遊行之時，刑事竟不斷地騷擾雜誌社，每三十分鐘就來找連溫卿一次。他只好不斷的保證連溫卿住在雜誌社。但謝文達並未在連溫卿回來後阻止他出門，反而帶他出去見東君（比嘉春潮）。⁵⁴到了比嘉春潮的家，才知比嘉跑到雜誌社找他們了。於是他們只好再等他回來。比嘉說，他直到今天早上九點才收到連溫卿從京都發的電報，出奇地緩慢；然而這種電報一般只需三小時便能送達。但當比嘉想要進一步通知謝文達的時候，他已不在了。於是比嘉就自己跑去東京站等連溫卿，卻也沒有等到他。⁵⁵連溫卿這樣寫道：⁵⁶

是夜我們雜談至十時餘，恐怕沒有電車，遂告辭了，自台北至東京，在船中四日，在火車中半日，一夜，及至了東京終日勞勞，還不覺著身體的疲憊。這是異常的例。然是夜 { , } 因為想念過去的事 { , } 都難急眠去， { 。 }

⁵¹ 這年五一勞動節後九天，5月10日出版的《台灣》雜誌刊出一則題名〈關於五一勞動節〉的文章。文中記述1923年日本當地的勞動節場景，但對認識1924年的五一來說，或許也有參考價值：「去年〔1923年〕東京與大阪各約有一萬人參加（其中朝鮮人約五百人）。」「臨急，都是以啤酒箱或肥皂箱疊成演講台。」「穿著工作服的強健的年輕人，在臺上展開雙手怒目演講，台下拍手不斷。一激動，聽眾就一起站起來，大搖工會旗幟，高呼萬歲。其間會宣讀大會宣言。在尚未獲得八小時工作制的國度，要求八小時勞動立法的項目必然列於其中。不承認工農俄羅斯的國家裡，也應該會及時列入承認俄羅斯的條件吧。而在佔有殖民地的國家裡，他們也會高呼「□□□〔殖民地〕解放」。去年〔1923年〕在東京就採用了「制定八小時工作制、承認工農俄羅斯、解放□□□〔殖民地〕」的三大口號。」「演講大會之後，就進行示威遊行。各工會以工會旗幟為前導，各隊分別推出一人擔任指揮，在其領導下整齊行進，行進時，會唱起《國際歌》與勞動歌曲。在日本，遊行隊伍中被認為是社會主義者或左傾嫌疑者，會全部被拘留收押。就如此進行到下一個演講會場，聽講完畢才宣佈解散。這一天，無分主義立場，所有的工會都會參與，所以這一天的共同宣言、共同口號便成為這一個城市、這一個國家勞動階級的共同目標，將成為勞動階級運動的原理與戰術。」（記者，1924：74-75）

⁵²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三十六回）。

⁵³ 按連溫卿在文中所記，乃是「K君」。但從前後文義來看，應是「S君」的誤排，即謝文達。

⁵⁴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三十七回），連溫卿云：「東君的本姓叫做『比嘉』，而這一字的意思在沖繩說是『東』，所以便宜上以東字代比嘉二字外沒有甚麼意思在。」（越無（連溫卿），1924：第九十八回）由此可見東君即「比嘉春潮」。

⁵⁵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三十七、三十八回）。

⁵⁶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三十八回）。

第三節、為了與山川夫婦的見面

1.在東京展開訪問行程（5月2日至4日）

5月2日，天氣晴。出門之前，連溫卿赫然發現自己的行李少了一些東西，裡面的墨水罐也灑沾出來。雖然「籠內籠外沒有絲毫的破損」，但是「籠內物已不翼而飛」：⁵⁷

咳，我明白了。若是朝鮮人那籠內藏的東西必是炸彈，抑是爆彈，若是露西亞人那籠內藏的東西一定是不穩文書抑，是宣傳赤化的書籍，然而台灣人的那籠內東西藏的是甚麼？想他們統治者要試嘗嘗這個趣味，將我要贈給他人能吃的東西搶去，這不是因為他們匆匆檢查而拿忘記再要收入來作原因的。台灣的社會，可算是平和了，台灣人的思想可說像我失去甘甘甜甜的東西一樣平穩了，他們可以放心，不要猜疑，而斷送大和魂的優越能力罷！

早上九點，從若松町搭電車到水道橋，再轉火車到終卓、再換電車到瀨田，要去玉川，此處已是東京郊外。連溫卿一行人吃過午飯後近一點，便去訪去年曾在台灣見過面的K氏（與K君不是同一人）。旋即轉往日比谷公園遊覽。下午五點，回到《台灣》雜誌社。⁵⁸回雜誌社後，才知今天刑事來了五六回：⁵⁹

他說自神戶尾行你至東京交過我，尚未把你的身體交過警視廳，他的責任是對上司不住的。我們聽了悻責他，說你不是個犯人，也不是個罪人，那有將你的身體交過警視廳的必要麼，說了不要理他，他默然退出，……

⁵⁷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三十九回）。

⁵⁸ 越無〔連溫卿〕（1924：第四十三、四十五、四十六回）。

⁵⁹ 越無〔連溫卿〕（1924：第四十六回）。

至此，連溫卿才知曉刑事交接的原則：⁶⁰

至此我明白，東京驛是日比谷署管轄的，我到了東京驛下車是那刑事的責任。我住的雜誌社是早稻田署轄的。所以他要在我的面前先和警視廳的刑事交代換，然後由警視廳的刑事和早稻田署的刑事交代換，方能完了他的職責，〔。〕

晚上收到來自台灣家裡問安的電報，「遂即返電謂我無事到京了。」⁶¹

次日，即5月3日，早上下了雨。與K君會談之時，警視廳的高等刑事突然來訪。（#48）高等刑事將跟蹤他的原因與原則做了一次詳細的說明：⁶²

他對我說，你的性質什麼，警視廳全然不知道的，但打總督府已經有通牒來，我們不得不照那通牒尾行你，從來的慣例在內地——在東京不〔需〕要尾行的人們，住了台灣就受了總督府的尾行很多，若照你所說，未曾有在台灣不受了尾行的人，來了東京就要動起警視廳來尾行的。然警視廳自己也有個獨立意見，你可以被他尾行，待三四日後看見你的樣子什麼、再講究個方法罷。像你入京的第一日和昨日刑事後沒尾行著，警視廳說那二日間你的行衛〔為〕是不明的。……若尾行的刑事對你有不滿的事情，你可以叫他不要那樣，他一定是聽你吩咐。我是關係政治方面的，受了思想取締係〔系〕的懇願所以來〔打〕擾你，這也要你諒解。你若不〔接〕受了刑事的尾行，其實是〔對〕你不利，因為刑事每日要報告上司，既尾行你不得，便沒有報告的材料，一定要捏造事實，你不住的地方——譬如界利彥也是山川均的處〔譬如堺利彥或是山川均的住處〕，他若報告你住了，是〔對〕你不利的。

午後持續下雨。刑事幾次來訪。本欲訪問S·R夫人的連溫卿決定乾脆不出門了，以免「擾阻他的將來」，於是寫了封信給S·R夫人，請她有空時找他。不過K氏今日回訪連溫卿，「K氏來訪很惹起我昨日去訪問他的印象，他不在家，他的夫人和我見面後，問我這次旅行是單獨上京，或是帶著家眷的，使我對他躊躇了回答。但他已來，我這次旅行大半的原因都解決了。」從這句話來

⁶⁰ 越無〔連溫卿〕（1924：第四十六回）。

⁶¹ 越無〔連溫卿〕（1924：第四十六回）。

⁶² 越無〔連溫卿〕（1924：第四十九、五十回）。

看，K氏應是連溫卿訪日的主要會面對象之一。⁶³

晚上，比嘉春潮與石君來訪。相約次日至「井頭」地方遊覽。連溫卿忽然想起前天晚上發生的一件趣事：⁶⁴

我說那東京驛的刑事帶了一個單子，寫著我的住址，姓名，年齡，而觀看那「職業欄內」寫著「無職業」三字，我不是無職業〔，〕是告假〔假〕來的，想是總督府通牒所以然。石君聽了，便嬉嬉說，「你旅行中是沒有甚麼職業的，所以要那樣寫著」的這時候的樣子。我想那話是不錯，這旅行那是我的職業麼。

5月4日，是個晴天。連溫卿與比嘉春潮、石君、仲曾根（仲宗根源和⁶⁵）、謝文達一同去「井頭」郊遊。下午四點，與比嘉春潮、仲宗根源和、石君分別回到雜誌社。晚上則在刑事的跟蹤下，去銀座喝了麥酒。仲宗根源和向連溫卿轉述了他在獄中所體驗的關東震災，並說明了朝鮮人與社會主義者如何藉機遭到屠殺。⁶⁶

2. 為日本世界語學會而續留於東京（5月5日至14日）

5月5日，仍是晴天。因著刑事的持續跟監，連溫卿一度萌生離京返台之念頭。然而日本世界語學會的事務卻讓他決定再留下來看看：⁶⁷

我上京的目的，大半已告終了。因為我四圍的情形既是這樣，很使我思出立即回家的意思。本擬搭乘八九日的輪船歸台，而以有人互相勸留，又以J.E.I.〔Japana Esperanto-Instituto，日本世界語學會〕欲於十一日歡迎芬蘭公使RaMsteq博士〔G. J. RaMstedt, 1873-1959⁶⁸〕和自日

⁶³ 越無〔連溫卿〕（1924：第五十七回）。

⁶⁴ 越無〔連溫卿〕（1924：第五十八回）。

⁶⁵ 連溫卿文中均將「仲宗根」記為「仲曾根」，實有誤。

⁶⁶ 越無〔連溫卿〕（1924：第六十、六十三、六十四、六十六回）。

⁶⁷ 越無〔連溫卿〕（1924：第六十六回）。

⁶⁸ G.J.Ramstedt 是芬蘭首任駐日公使。

內瓦國際聯盟歸國的藤澤法學士，倘若我還要逗留至那時候，那學會也要招待我的緣故，乃決定再滯在數天。

5月6日，晴天。連溫卿去京橋區拜訪友人。⁶⁹連溫卿思考：與台灣相比，東京是個小得太多的地方，然其警察人數卻比台灣還多，連溫卿認為，「警察人員多是表示那社會上的治安很紊亂。」這是資本主義導致道德敗壞的具體反映，「社會的道德較未發達的地方是很頹廢，所以治安上要那樣多數的警察。」⁷⁰警察實為鎮壓特定的少數群體——境內弱小民族與社會主義者——而大量存在。連溫卿被警察跟監的根據之一，正是他的台灣人身分。不過「他們對台灣的知識是令人嘖飯，可傳為笑柄」，竟然有警察「把台灣人〔當作〕即是生蕃人的想念。」此外，日本警察眼中的台灣人還是特別狡獪、野蠻的對象。而動輒叫刑事帶他去觀光、叫刑事幫忙付錢的連溫卿則自嘲，「事事都照我指示，連我一日間的電車費，皆誠意代我支出，然若以三四毫的電車費要買我對他的同情，俾我推塞他們所豫想的未開〔化〕人的性質，未免覺得太廉〔價〕了。」⁷¹

5月7日，晴天。「今天半日以上的電車費也是刑事代我支出，午前中往上野公園觀『觀月橋』。」「吃了午飯，攜一個映像機，往日比谷公園遊覽，那映像機是比嘉春潮攜往『井頭』公園拍照的，尚剩餘二葉，俾我出遊，可以照完。」然後在江戶川公園遊覽，那刑事太親切，時時說他不甚麼疲勞，叫我拿那映像機給他幫帶，我只向他說謝。」這天恰巧是中國的「五七國恥紀念日」，遇上當地中國留學生所舉辦的遊行。⁷²回到雜誌社，K君告訴他去年更為激烈國恥紀念日之景況，K君自己甚至還參加了學生佔領中國公使館的行動。⁷³

自5月8日至11日間，因日記殘缺而無法辨明具體日期。其間，連溫卿見到了甫出獄的堺利彥：⁷⁴

我們進入門內看見門邊貼住一條白紙，用紅的墨水寫著「社會主義大

⁶⁹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七十三回）。

⁷⁰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七十四、七十五回）。

⁷¹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七十六、七十七回）。

⁷² 「五月七日，日華二十一條協約最後通牒之日，中國國民以此為國恥紀念日，每年舉行大會，本年（1924年）五七，在東京的中國學生，也在小石川基督教聖公會內開會，聚集的男女學生數百，慷慨悲歌，示威行列到，公使館，至黃昏時無事散會。」（台灣民報，1924g）。

⁷³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回）。

⁷⁴ 越無〔連溫卿〕（1924：第八十三回）。

意，壹毫，」而界〔堺〕氏夫人從樓上導我們上去。界〔堺〕氏面色黃白點兒，說因為共產黨事件在獄很久的影響，現在稍不健康，適恰「馬克斯主義」月刊初期已出，⁷⁵他拿那月刊問東君〔比嘉春潮〕看見不看見，〔。〕我們談話未及十分久，他的夫人又上樓說〇〇組合〔工會〕的人要面談，遂約再會下樓，適和那〇〇組合人們在內相遇，皆是二十多歲的人。

並且曾去「牛這〔込〕區」的中國餐館吃炒麵。「咳！這和台灣的不同，是炙油的麵了，可做陪酒的菜，是不能代飯吃的。因為這緣故，枉得刑事在外面多等候點兒。是夜我已不再出去了。」⁷⁶

5月12日，晴天。上午同炳君去池袋找S·R夫人，十一點回到雜誌社，然後又來了個刑事。午後又下雨，日本世界語學會的委員來訪，他同時也是三田新聞人員、慶應世界語會幹事。這位委員找了連溫卿很久，聽說連溫卿一直遭到跟監，遂乾脆向警視廳問到連溫卿的住址。他邀請連溫卿在5月14日去慶應大學演講。不過，管理慶應大學的芝警察署提出但書，「說不令我講演關於政治問題，倘若饒舌著一句也要命令中止。」當天晚上，與□君去I君處。後來仲宗根夫婦也至。「仲君即介紹我給他的夫人，隨這機會我對貞代夫人〔仲宗根貞代〕說，M娘⁷⁷很要望你使真柄氏（界利彥氏的女兒）學習世界語罷。」⁷⁸

5月13日，是個涼天。比嘉春潮至，還相機給他。晚上比嘉春潮與仲宗根源和再次來訪，並與謝文達一起去附近咖啡店。⁷⁹

⁷⁵ 即《マルクス主義》雜誌，創刊於1924年5月，乃自日本共產黨合法機關刊物《階級戰》改組而來的後續刊物，由西雅雄掛名負責（二村一夫，1974）。

⁷⁶ 越無〔連溫卿〕（1924：第九十二、九十三回）。

⁷⁷ 文中還有一個「M嬢」，按前後敘述，應與「M娘」為同一人，但真實身分尚無法查考。

⁷⁸ 越無〔連溫卿〕（1924：第九十三、九十四回）。

⁷⁹ 越無〔連溫卿〕（1924：第九十七、九十八回）。

3. 訪問山川夫婦與返台（5月14日至20日）

5月14日，晴天。上午，謝文達與女僕先將連溫卿的行李帶往東京站。午飯之後，由於跟監的刑事始終沒來，他們乾脆自行至警署報備慶應大學的演講事宜。⁸⁰

因為我不熟悉街道的原故，遲一時間〔小時〕到了慶應大學，但講演
的順序我是在第一番〔第一順位〕的，為了遲到這時候恰適第二
番〔第二順位〕的正在講演中。A君看見我，即說你很忙，我不予先知
道中村君去擾你勞駕，實在對不住。我的演題是「社會的言語性質」，本
欲以日語講演，為中村君的希望，卻用世界語講演的，而他做我的通
譯。

演講的大意如下：⁸¹

可以說言語的起緣是由保護自己生存的工具，但到了經濟稍發達時
候，那保存自己生命的工具卻要變做侵略他人的工具，是和民族問題
相全〔相同〕。

現在社會言語的性質是一方面排斥他民族的言語，一方面卻準備著自
己的言語，要使他民族使用的，這不是一個矛盾麼？

而不知被支配者使用著支配者的言語，只是限於主權上，那有絕滅自
己的言語地〔的〕理由嗎？像民族問題被統治者在統治者社會內。雖
要犧牲自己的利益以期博得偌大的幸福，卻不可誤認（犧牲）二字為（絕
滅）的意思。言語問題也是這樣〔，〕所以我說言語問題不可看作感情
問題，可以當作社會問題而觀方可。

演講完後，連溫卿向場外刑事告知晚上不再出門。然而連溫卿卻早了一小時吃
飯，並與謝文達、炳君坐車回東京站，但連溫卿並未返回住所——他離開了東

⁸⁰ 越無〔連溫卿〕（1924：第九十八回）。

⁸¹ 越無〔連溫卿〕（1924：第九十九、一百回）。

京：⁸²

我和炳君在站內等等，將我的往三宮的車票——午前中購的——給 S 君〔謝文達〕帶去，不久，S 再入來，我的車票已改札〔剪票〕了，乃將水道橋的車票換給 S 君，坐在車內等待開車了。S 君突然說，你不可逞身在車窻〔窗〕外，曾尾行你的刑事打那兒來的，我引身坐定，即有個人從車內行過，這雖不是我的尾行，然將開車時候，說事刑〔刑事〕要在車調查的。稍頃列車振動⁸³〔開動〕了，我對 S 君炳君只得目禮說謝，這時候天下雨了。

在車上，回顧起這次日本行被跟蹤的情景，也想起匈牙利「乞丐與國王」的故事：人人棄之的乞丐與眾人追擁的國王，究竟誰比較自由呢。這次，算是成功地擺脫了跟監的刑事了，「我想若至了明日，纔知道我已離開東京，那時候不知道他〔刑事〕要怎麼〔辦〕呢？」只是，沒能參觀勞動學校仍讓連溫卿覺得是此次旅行的一大憾事。「在黑闇〔暗〕中火車只是驀進，若細心〔，〕也能辨別兩聲滴滴的聲音，我也坐著睡去了。」就在這列總算沒有刑事跟監的火車上、在夜幕中，睡去了的連溫卿向著神戶的垂水而去，也許這是蠹魚旅行的最終目的、也許是那唯一存著一點光明的所在。那裡住著小靜與他的共同導師——山川均以及山川菊榮。⁸⁴

由於第 102 回漏貼，無法得知連溫卿是在 14 日或 15 日抵達山川家、也無法知曉他與山川夫婦初見面時的狀況。然從殘存的第 103、104 回來看，山川夫婦仍得到連溫卿細緻的記述。在山川家，連溫卿與山川菊榮共同追憶了「J 女史」山口小靜的死。山川均讓山川菊榮帶他去逛逛號稱日本第一的舞子公園，但因連溫卿是在避開刑事嚴密盯梢的狀況下進入山川家的，只好再以秘密的方式摸出門去。對於舞子公園，「這公園的特色不過沒有甚麼雜木，遍地都是老年的松柏而已。」但他仍不禁想起小靜：⁸⁵

在這舞子公園，這時候只有我一人，覺〔得〕很寂寞，若 J 女史在，我

⁸²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一百回）。

⁸³ 「振動」：閩南語。

⁸⁴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一百零一回）。

⁸⁵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一百零三回）。

想一定和我在這兒飽滿著這單調的光景。

由於當地沒有旅館，連溫卿便留宿於山川家一夜，並與山川夫婦討論台灣問題到晚上九點。⁸⁶

次日晨起，連溫卿不禁走到樓上的窗邊眺望對面可見的大海，山川菊榮趕緊阻止了他，以免被刑事看見。連溫卿準備搭上八點五十分的列車返回神戶。離開前，山川菊榮想要送他山川均所寫的新書《由井底所看見的日本》，——這正是連溫卿在「亞米利加丸」上所讀的那本書——於是菊榮又改贈以她與小靜、照子共同翻譯的《社會進化和婦人地位》。連溫卿便又避開刑事的監視，別過了山川菊榮，前往神戶登船。

在船上，他想起昨日在山川家看到的望遠鏡：⁸⁷

船將過內海的燈台恰適船內要吃午飯時間，若山川氏夫婦在他的樓上以望遠鏡，欲在這甲板上找我，怎麼能找得出來呢；趕緊吃了，便抓上甲板，船已經離遠了。

在船上，仍有不少刑事。連溫卿無暇顧之，只是不斷地回想這次旅程；也如來程那般，不斷想起小靜、想起她的死。終於，到了 20 日，抵達了基隆港。完成了蠹魚的這次旅行。

⁸⁶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一百零三、一百零四回）。

⁸⁷ 越無〔連溫卿〕（1924：第一百零四回）。

結 語、其實地上本沒有路

赤潮澎湃，曉霞飛湧，
驚醒了五千餘年的沉夢。
遠東古國，四萬萬同胞，
同聲歌頌神聖的勞動。
猛攻，猛攻！
捶碎這帝國主義萬惡叢！
奮勇，奮勇！
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勞工，
無論黑，白，黃，無復奴隸種！
從今後，福音遍天下，
文明只待共產大同。
看！
光華萬丈湧。

——瞿秋白詞、許地山曲
《赤潮曲》，1923年

第一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起源問題的總結

一九二〇年代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是在三個層次的背景之下誕生的。

第一，從世界的範圍來看，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以及一戰以後世界民族自決風潮，構成了主要的國際背景。第二，從東亞的範圍來看，日本大正議會民主時期、中國國共合作以及國民革命，構成了第二層的地域背景。第三，從台灣的範圍來看，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則以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興起為直接的原因。

1. 世界背景

在第一個層次的背景下，導致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自誕生之日起，即具跨越性。

自十九世紀末以來，西方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乃至馬克思主義或其他——進入東方的時候，彼此尚未相互敵視，此間，無政府主義取得了壓倒性優勢。然而十月革命以及共產國際的成立，卻促使「B派」的布爾什維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迅速在東方傳開，進而擠壓「A派」的無政府主義的生存空間。所以，台灣的社會主義運動自始就出現以下幾種現象：（1）純粹「A派」的活動者，幾乎無法把個人的活動轉化為組織化的運動（如范本梁）。（2）真正實現組織化運動者，都必須面對「AB」合作以及「AB」破裂的歷史性挑戰（如平社）。（3）純粹的「B派」組織——台灣赤華會·赤華黨——雖然誕生，但旋即消亡，以致僅能在許乃昌（1907-1975?）交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尋其蹤跡。（4）無論是「A派」、「B派」、還是「AB」合作或破裂，運動本身都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於台灣的侵占，並以驅逐日本人作為運動的目標。這種「反日」以及社會主義相複合的歷史現象，也許意味著兩

者互為因果。但在本研究的研究時段裡，反日或者反帝，並不直接導致「國家」意識或者「民族」意識的產生，這些意識反而還成為被極端反對的對象。相較於 1928 年台灣共產黨成立以來所提出的「共和國」、「蘇維埃」、或者「台灣民族」的主張，1924 年及其之前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並無根除「A 派」思想，從而體現出更為純粹的、具有世界（革命）意義的理想傾向。

雖然本研究按照組織沿革而有幾種區分。但這些組織之間的界線並不見得清晰。「AB」之間的複雜關係是一個原因，但主要是組織的興滅太快（這種快速的興滅並不意味著運動的消失，而是運動匯入更大的運動之中，即第二個層次的背景）。本研究曾分別提到「海東」在《中央日報》上對於台灣社會運動路線分歧的分析，¹以及黃玉齋（1903-1975）在《台灣革命史》所做的更早區分。²1926 年的黃玉齋，將台灣區分為「民族主義派」與「社會主義派」，並將後者再簡單分為「E.無政府主義派」以及「F.社會主義派」。至於 1928 年的「海東」，則區分為「自由主義派」與「民主主義派」。在文化協會左右分裂前後所分別出現的兩種區分，構成了台灣光復以前大陸知識份子建構台灣知識的主要寫作根據，並在不斷的傳抄中保存下來。但這兩種區分更反映了台灣社會運動以及社會主義運動的變化趨勢；而對 1926 年之前的黃玉齋而言，當時的「社會主義派」還只是初生且難以區分之勢力而已。

2. 東亞背景

以第二個層次為背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從誕生之日起，即以中日兩國為存在範圍、直接構成運動本身的島外起源；同時也使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能夠把自己鑲嵌在更大的、卻又擁有具體的組織關係的運動之中。誠如《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的開頭語所言，「本島共產主義運動侵入的途徑，其一為東京留學生在東京與共產主義者交往並受其影響者，其二為支那留學生受中

¹ 海東（1928a, b, c）。

² 漢人〔黃玉齋〕（1926）。

國共產主義運動之影響與吸收。前後兩者皆應追溯到大正十年〔1921年〕前後來考察。」³

日本的大正議會民主時期，促使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得以恢復生氣，進而成為最早期的台灣社會主義者的誕生地。當時的「主義者」都參與了當地的社會主義組織。而且，恰恰是因為大正議會民主的時代條件，促使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成為可能，從而進一步讓請願運動以一個被批判對象的姿態，成為台灣社會主義者藉以樹立自身的依託。在1924年及其之前，個別社會主義者在台灣與日本之間的往來——比方山口小靜（1900-1923）的返台或者連溫卿（1895-1957）的赴日——成為兩地社會主義運動交流溝通的渠道。然而日本警特對於兩地社會主義者的鎮壓卻也未曾停歇。無論是山口小靜的被迫退學（僅僅因為與女工進行座談會），或者來往信件遭到無理檢查，乃至連溫卿在日本所遭到的日夜跟監，日本政府對於社會主義者與弱小民族始終抱持敵意。也因此，在日本與台灣之外另尋活動地點便成為必需；中國大陸則成為奔逃、迴旋的好地方。本研究所提到的蔡惠如（1881-1929）、范本梁（1897-1945）、彭華英（1891-1968），乃至在平社組建前夕從日本逃赴中國的日本共產黨領袖佐野學（1892-1953），皆是如此。

在中國，由於中國的廣袤地域、軍閥割據，以及各帝國主義勢力瓜分中國，促使社會主義者能在各種力量交錯的地方生存下來，比方上海、北京、乃至更南方的廣州（國民黨根據地）。上海與北京最主要的流亡勢力，是朝鮮人；上海甚至還存在著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因此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誕生之始，便脫離不了與朝鮮革命者的合作。從1921年上海的「中韓互助社」、范本梁在北京上海與朝鮮革命者的交往，到1924年最終成立的「平社」，乃至1928年呂運亨（1886-1947）參與台共的建黨，率皆如此。

在1924年及其之前，大陸上的社會主義運動仍處於分裂狀態，不但無政府主義的組織大量存在，以共產主義為主要訴求的組織也尚未統一。所以當時避居大陸的台灣社會主義者接觸到的當地社會主義者與團體很多樣，大不同於中共取得獨占性地位之後的中國社會主義運動。遊走北京的范本梁與無政府主義者景梅九（1882-1961）組織的無政府主義團體合作，同樣在北京的謝廉

³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c: 1）。

清(1903-1961)則與該地的異端共產黨(今日派)接觸並參與了他們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至於上海,圖謀復興「中國社會黨」的江亢虎(1883-1954)以南方大學為基地,吸收了不少台灣學生,同時也一度成為「平社」組建之時的通訊地。此外,中國共產黨則以上海大學、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以及國共合作的有利形勢,吸引了大陸各省以及殖民地台灣的激進學生群集上海(有上海大學)與廣州(有黃埔軍校)。在上述客觀條件下,才使「平社」能以兩岸學生為基礎,加上朝鮮、日本兩地革命者,綜合「A」「B」兩種勢力而組建完成。

然而中國所具有的「有利」之處並不僅僅是地域廣袤、軍閥割據、或者帝國主義瓜分而已。中國革命當時取得的進展與激變,在東亞以及世界的範圍之內俱屬僅見。關鍵因素是1924年正式實現的國共合作以及兩黨合作進行的「國民革命」。這一客觀條件的形成,促使中國進一步成為東亞激進份子的中心,使得包括台灣人在內的各地社會主義者、激進派有可能以中國(特別是像上海這樣的地方)作為成長、避禍的地方。形象地說,當時的中國社會主義運動是在「怒潮澎湃,黨旗飛舞」⁴的「國民革命」中,向著「赤潮澎湃,曉霞飛湧」的未來而前進的。

許地山(1893-1941)與瞿秋白(1899-1935)所合作的《赤潮曲》是中國第一首無產階級歌曲。⁵但歌曲並不只在中國唱響而已。許地山與瞿秋白兩人與台灣社會主義者的接觸,正顯示了「B」派的「赤潮」不但從蘇維埃俄國溢入即將陸沉的神州,還與「A」派的「黑潮」同時溢出,並滲入殖民地台灣。許地山與瞿秋白對於台灣及其社會主義運動的關心可能並非偶然。從後見之明的角度來看,直到1930年台灣人宋斐如(1903-1947)在北京參與創辦《新東方》雜誌,還能看到許地山的身影。瞿秋白則與參與組建「平社」的朝鮮共產主義者呂運亨在1928年參與了台共建黨,⁶瞿秋白甚至以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名義介入其後的

⁴ 「怒潮澎湃,黨旗飛舞」語出《黃埔軍校校歌》(即《陸軍軍官學校校歌》),作詞者陳祖康(1901-1979),創作於1926年。

⁵ 雖然也有詞曲均為瞿秋白創作的見解(張懷智,1988),但此處採用許地山夫人周俟松所編研究集的說法(周俟松與杜汝森,1989:126)。

⁶ 何池(2004)指出,普遍被認為是「彭榮」本人的彭湃,當時正在廣東海陸豐指導作戰,並不可能參與上海的台共建黨大會。而當時的中共中央只有瞿秋白可能出席。而且從「彭榮」在台共建黨大會上的報告內容來看,正是瞿秋白即將在中共六大上所進行的報告概要:〈中國革命與共產黨〉。

台共改組問題，並且始終關心他在上海大學教出來的台灣學生。⁷

3. 台灣背景

第三層背景的存在，則使整個一九二〇年代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能夠依憑著這個對立面而確認自身。

在 1924 年及其之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是被社會主義者所批判的對象，但主要是批判前者。請願運動之所以成為批判對象，來自於運動本身的以下弱點：（1）誠如葉榮鐘（1900-1978）所注意到的，請願運動是一個政治目標極高的運動，文化協會則是以文化啟蒙為主的、政治目標極低的運動。因此，無論是以東京為舞台的請願運動，還是以台灣為基地的文化協會，都無法解決台灣島內所發生的其他政治、社會問題。所以，蔣渭水、連溫卿等人才會力促實現以政治（新台灣聯盟）及社會（社會問題研究會）為目標的新型結社——即便最終仍在島內的嚴峻形勢下潰散。（2）但就算運動有其「高度」，其實質卻確實如社會主義者所批評的那樣：運動的政治要求只能等日本政府點頭才能實現，是一個「叩頭請願」運動。（3）更重要的是，1923 年底的治警事件徹底顯示了請願運動的無力。這種無力既反映了台灣島內的客觀政治條件如何嚴峻，反映了請願運動者本身的無力，當然也連帶引來社會主義者的同情。雖然請願運動仍在島外的日本繼續進行，但島內的社會運動卻自此回到以文化協會為運動主體的狀態。當文協再次成為如當年分化出新台灣聯盟與社會問題研究會那般的母體時，就是文協本分發生左右分裂的時候——1927 年。

雖然本研究儘可能從上述三個層次來說明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截至 1924 年為止的發展，但仍有相當多的部份未能觸及。以島內的社會運動來說，治警事件以後，島內右翼運動展開擁護總督府政權的運動，辜顯榮等推動的「有力者大會」便是一個頂點，但本研究未能針對右翼的進攻以及左翼的反撲（比方「無

⁷ 瞿秋白與台灣學生之間的師生情誼，可見蔡孝乾（1970）。

力者大會」)進行說明。而且,在本研究的研究範圍裡,請願運動與文化協會在本研究的方法之下是個相對消極的存在。如果要特別針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與這些既存的台灣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也許還有其他更好的研究方法。此外,本研究雖然針對上海的台灣人運動進行了概略的說明,但畢竟沒有針對社會主義運動以外的組織進行分析(比方台灣自治協會、台韓同志會等)。而且,本研究始終沒有直接觸及華南的台灣人運動。雖然當時華南的台灣人運動並未展現出鮮明的社會主義色彩,但隨著南方各省——以廣東為中心——由於國民革命而產生的激進化,從1924年以後便分別在南京(中台同志會)、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等地誕生各種台灣人組織,這些組織的社會主義性質究竟如何?與此同時,從1925至1928年之間的上海台灣人活動,卻在《台灣社會運動史》呈現一片空白。是否當時的激進台灣人都向南轉移?或者這種空白來自於《台灣社會運動史》本身的缺陷?上述問題,都還需要繼續研究。

第二節、台灣社會主義者的革命論述

1. 台灣「全盤資本主義化論」、革命性質論,以及歷史建構

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特異的存在。其特點之一,就是馬克思主義特別重視政治經濟學(politische Ökonomie)。但馬克思更將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稱為「政治經濟學批判」(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⁸政治經濟學對於馬克思主義乃至社會主義的意義很重大。因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使「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⁹恩格斯指出:¹⁰

訴諸道德和法的作法,在科學上絲毫不能把我們推向前進;道義上的

⁸ 這也是馬克思《資本論》的副標題。

⁹ 恩格斯(1995b: 740)。

¹⁰ 恩格斯(1995a: 492)。

憤怒，無論多麼入情入理，**經濟科學**總不能把它看做證據，而只能看作象徵。相反地，經濟科學的任務在於：證明現在開始顯露出來的社會弊病是現存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這一生產方式快要瓦解的標誌，並且在正在瓦解的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憤怒出詩人，在描寫這些弊病或者在抨擊這些替統治階級否認或美化這些弊病的和諧派的時候，憤怒是適得其所的，可是憤怒在每一個這樣的場合下能證明的東西是多麼的少，這從下面的事實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現在為止的全部歷史中的每一個時代，都能為這種憤怒找到足夠的材料。

如果「憤怒出詩人」，那末馬克思主義則要求「憤怒」者能夠成為探索經濟規律的革命家。也就是從現狀中追索歷史規律，並從規律中發現未來的可能。

在 1924 年及其之前，台灣社會主義者多數能各自提出具有「經濟科學」性質的論述。圍繞著資本主義在台灣所產生的問題而發生的論述，說明了多數的台灣社會主義者都希望能將自己主觀上的「道義上的憤怒」，尋得一個能以「經濟科學」（而不是「道德與法」）為依託的客觀基礎。不是依據「道德與法」而討論社會應該是什麼，而是透過「經濟科學」去分析社會為何是這樣或者那樣。范本梁所追求的「自然的趨勢」類同於「道德與法」，其他比較親近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論述則類同於「經濟科學」。兩者的差異就在於能否說明客觀趨勢與現實存在之間在歷史上所呈現的關係。

當時主張「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的台灣社會主義者在無視眼前已經觀察到的現象（台灣社會並未資本主義化）的情況下肯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持續替代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直到整個社會剩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階級。雖然當時主張「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的台灣社會主義者不必然對於馬克思主義有深刻與正確的理解（當然不可能深刻與正確），但是：

- (1) 就他們試圖從台灣未來的資本主義化之中發現——而非發明——未來社會的可能性而言，是一個有馬克思主義色彩的想法。許乃昌認為，「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將使無產階級（同時也是整個民族）成為革命動力。瞿秋白則批評許乃昌的觀點。瞿秋白並不否認革命動力應該是整個民族，但並不是未來無產階級化了的整個民族，而是現下各階

級聯合起來的整個民族。因此，雖然許乃昌與瞿秋白都認為必須爭取整個民族成為革命動力。但由於兩人對於革命動力之內的階級差異（只有一個階級或包含多個階級）有不同的估計，所以前者自然從無產階級本身利益的高度來規定革命任務，後者則必須國民整體的共同利益的低度來規定。雖然當時的共產國際對於以上兩種革命——前者稱為社會主義革命，後者稱為民主主義革命（在中國則代稱為「國民革命」）——的革命任務有其定見，但並不能保證處在共產國際組織體系之下的許乃昌就完全能按照國際的想法去理解這兩種革命。而其理解的不完全性，也許正反映了其他社會主義思潮（如無政府主義）對他的影響。

- (2) 即便是更晚近的學者，也未必能夠避免「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論所存在的問題。1989年，金寶瑜與柯志明曾就如何理解「原始積累」的問題而發生爭論。金寶瑜將之理解為前資本主義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特別是「無產階級化」），柯志明則著重把「原始積累」理解為因為「分離」而產生的財富積累（即其所謂「資源轉移」）。兩種不同的側重促使兩人互相注意到對方的偏向。其中，金寶瑜因站在馬克思主義強調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分離的立場而突出無產階級化的面向，並指出，「大規模的原始積累是在資本主義形成的初期進行的。」¹¹雖然它在資本主義形成的初期就完成了，但原始積累卻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繼續著，因為在這發展過程中，小生產者不斷地破產。¹²柯志明則認為，「金寶瑜的用意……似乎要告訴我們，只有大規模無產化與小規模無產化之分，而沒有原始積累問題。」¹²柯志明只是在邏輯上回應金寶瑜，而沒有進一步說明兩個無產階級化的差異；而當柯志明明言採取「original accumulation」以迴避金寶瑜從原始積累的「primitive accumulation」所提出的批評時，便表明了其論述與馬克思的差距。對於本研究來說，評價上述兩位學者的見解並非任務所在。但金寶瑜與柯志明所共同揭示的兩個無產階級化——一者發生在「原始積累」，一者發生於「資本集中」——卻是「經濟科學」伴隨著台灣社會主義運

¹¹ 金寶瑜（1989: 145-146）。

¹² 柯志明（1989: 167-168）。

動的出現而登上歷史舞台時的基本內容（雖然不盡相同）。雖然，這些早就登上歷史舞台的思想資源並未隨著時代的前進而能積累並且得到反省或及時的清理。

由於許乃昌的「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暗示了資產階級有在未來加入革命陣營的可能，因此有一定的機會主義傾向。然而這種傾向也體現許乃昌相信台灣各階級都有革命性。在這種信念之中，既有的社會運動——以請願運動與文化協會為主——的參與者成為其理論所必然團結的對象。因此，許乃昌雖是社會主義者，但他恐怕也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瞿秋白建議台灣應該進行「國民革命」，這個建議反映了共產國際革命戰略——「民主主義革命」以國民革命為其形式——在東亞的擴散與逐步貫徹。對於台灣而言，再一次討論「民主主義革命」與國民革命的時機，是 1926 至 1927 年間的「中國改造論爭」。¹³真正接受「民主主義革命」的時間，則是建立台灣共產黨的 1928 年。到了 1930 年，蔣渭水甚至也開始自稱為民主主義者（但不講革命）。從許乃昌與瞿秋白的對話出發，可以看到一條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民主主義革命」接受史。

不過，這個「民主主義革命」接受史同時也是一個歷史建構的歷史。從 1928 年台共建黨以來，開始將馬關割台以來的各種反日抗暴稱之為「民主主義革命」。甚至，由於國民革命在大陸上的迅猛發展，當時的台共也將這些「民主主義革命」稱之為「國民革命」。在大陸上，歷史建構從「革命史」與「民族資本主義」兩個方向出發，但主要是藉由論證後者的「不發展」來論證前者的必要性。在台灣，類似的兩種建構只出現在共產國際體系之下的台灣共產黨之中。由於其他流派認為台灣已經（或即將）受日本資本主義支配而資本主義化，所以不可能出現「民族資本主義」歷史建構，也無法出現「革命史」歷史建構。也許正是上述原因，凡是主張「全盤資本主義化」者（或者承認資本主義取得支配），都因缺乏歷史建構的能力而難以在兩岸社會主義運動之中發揮作用——當然也包括本研究所研究的、擁有類似見解的這些台灣社會主義者。

¹³ 邱士杰（2007）。

2. 如何透過「民主主義革命」與「國民革命」改善研究

從民主主義革命（或國民革命）出發，還有利於改善現有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研究。

目前研究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最優秀的成果，體現在若林正丈（2007：第二、三章），蕭聖鐵與 Sullivan（Frank S.T. Hsiao, 1983），以及盧修一（1989）的台灣共產黨研究。盧修一的成就在於他的考證，但他未能就運動本身的問題而論之。因此可供檢討的理論性問題很少。至於若林正丈、蕭聖鐵及 Sullivan，則緊扣共產國際的戰略變化而立論。這個變化就是以 1928 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為標誌的激進化。此後，共產國際從跨階級的統一戰線時期，進入「階級對階級」的激進時期。若林據此認為成立於「六大」前夕的台灣共產黨，表現出了兩個時期之間的過渡性質。但本研究還可補充一點：使用「國民革命」的台灣共產黨，甚至還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餘波。

盧修一與蕭聖鐵、Sullivan 都曾指出，台共第二次組黨時（即所謂「改革同盟」）所實行的是一條共產國際在激進時期所推行的「布爾什維克化」路線。其實質目的是加強國際的控制。雖然盧修一、若林正丈、蕭聖鐵及 Sullivan 都注意到共產國際對於台共所實現的制約，卻沒能注意到台共為何援引中共表述民主主義革命的用語——國民革命。雖然蕭聖鐵及 Sullivan 注意到這個現象，甚至從中發現歷史建構（比方把 1895 年的台灣民主國定性為「國民革命」），卻沒有深究。而「國民革命」對於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是否是一個可以忽略或不加深究的存在呢？本研究所揭示的答案，是否定的。

若林正丈研究台灣社會運動史的方法有三種：（1）當他研究民族主義運動（即議會請願運動）時，是透過「現地權力／本地地主資產階級」兩者之間的互動來把握運動。（2）但當他在研究大陸上的臺灣人民族主義運動之時，則把「國民革命」視為一種民族主義運動，並以此討論臺灣人對於「國民革命」的參與（其中並包括了以大陸為根據地的台灣社會主義活動）。（3）至於他對台灣共產主

義運動之研究，則如前所述，共產國際的戰略變化成為他的主要方法。雖然若林採用的三種方法有其分開使用的適用性和成果。

但以上三種方法卻能透過「民主主義革命」而在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之中得到統一的理解。因為：（1'）「民主主義革命」必須處理「本地地主資產階級」是否可以成為革命動力的問題。所以「民主主義革命」必須在當下就衡量「現地權力／本地地主資產階級」兩者之間的關係。這種歷史當事人所做的衡量，有利於後人的研究。（2'）「民主主義革命」由於中國革命的影響而取得「國民革命」的代名詞。因此「國民革命」不只是民族主義革命，而還具有共產國際的民主主義統一戰線的意味。（3'）「民主主義革命」本身就是共產國際意圖貫徹在東方的戰略，但也確實存在變化。但激進化的本質為何？以 1927 年的中國「大革命」失敗與 1928 年的共產國際「六大」為標誌，原來被視為「民主主義革命」之革命動力的「民族資產階級」，終於被踢出去。動力只剩無產階級與農民。

在「國民革命」中實現的國共兩黨「黨內」合作也是一個研究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切入點。當時，中共將國民黨視為幾個階級聯盟的統一戰線黨而加入，企圖藉此擴大統一戰線及其影響力。這種「兩黨論」指導下的運動方針其實並非中國所獨有。在日本，遭到天皇制政權瘋狂鎮壓的日本共產黨，在 1927 年前後透過合法無產政黨「勞働農民黨」（1926-1928）開展統一戰線、參與國會選舉。在朝鮮，朝鮮共產黨各派系也與民族主義者共同組織了統一戰線黨「新幹會」（1927-1931）。在匈牙利，由於 1919 年革命的失敗，匈牙利共產黨也透過「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作為公開的合法政黨進行活動。以上這些在「兩黨論」指導下進行的社會主義運動，有些與「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選擇有關。但在共產國際開始強化「布爾什維克化」的過程中，「兩黨論」卻遭到「國際」的批判。「國際」認為，運動的開展不應是共產黨選擇一個統一戰線黨作為掩護或者作為爭取群眾的方式，而應該是共產黨本身實現「大眾化」。

在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語境裡，「大眾」的概念在 1927 年之後開始廣泛流行。將「大眾」理解為無產階級者所在多有。在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大眾黨」的概念至少具有三種用法，一是指稱一種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黨。（比方 1928

年台灣共產黨建黨於上海時，曾提出要將文化協會改組為一種「大眾黨」。日本共產黨所控制的勞農黨也被視為一種具有「大眾黨」性質的政黨。）二是指稱一個實際的統一戰線黨的名稱。（比方不少文獻都把前述台共的「大眾黨」主張理解為一個叫做「台灣大眾黨」的黨）三是指共產黨本身「大眾化」之後的性質。（這是共產國際反對兩黨論的結果。共產國際要求共產黨本身實現大眾化，而不是建立一個大眾黨來掩護自身。）這三者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三者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之間的關係，必將成為研究文協左右分裂以後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的重要切入點，¹⁴同時也能研究「台灣話文論戰」時期的路線爭論。此外，如果將早期台灣社會主義者的想法——「整個民族的無產階級化」——納入考慮，也許更能理解當時社會主義者對於「大眾」的看法。

3. 通向 1927 年的道路

本研究觀察到：1920 至 1924 年之間所出現的台灣社會主義者主要是知識份子，特別是學生。這一特殊身分使得他們多以教會、學校（甚至教會學校）為活動地與庇護地。換言之，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多屬業餘，而非職業革命家。然而這種業餘性多發生在島外，島內社會主義者的職業化程度則更高，舉凡蔣渭水，連溫卿，皆是如此。

因此，當 1924 年過去，雖然島外的社會主義者（特別是在大陸）有較大的活動空間，然而復興運動的主體，卻始終留在島內。在本研究第二章所界定的過渡期（「治警事件」到文協分裂）之中，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有兩條復興的線索，一個是歷盡打壓而存活下來的台灣文化協會，另一個則是「無產青年」的崛起。

¹⁴ 初步研究可見邱士杰（2009a）。

(1) 許乃昌所批評的「沙上的文化運動」與文協左轉

1923 年底，許乃昌在上海發表一則號召青年學生投入「國民革命運動」的文章。許乃昌寫作這篇文章的原因是為了反駁易家鉞（1898-1972）關於學生應當「速行讀書運動」而不應參與政治的論點。許乃昌認為，「政治問題若不根本的解決，怎樣能夠讀真正的書呢？」他抨擊易家鉞只是在宣傳一種「可笑的沙上的讀書運動！建設在沙漠上的讀書運動！甘為奴隸的讀書運動！」¹⁵

1924 年 5 月，許乃昌在《台灣》發表〈沙上的文化運動〉一文，將反對「沙漠上的讀書運動」的訴求轉化為適應台灣的運動方針。此時許乃昌的重點並非「讀書」與「政治」之間的緊張關係。而是要求台灣人應該要排除陳舊的中國舊文化與資產階級的日本新文化。因為，「文化經常是依經濟組織的變化而變化，時時刻刻進展的經濟組織將時時刻刻產生新的文化。」所以「不與我們的時代的經濟組織相矛盾的文化，才是新文化、合理的文化。」

許乃昌指出：¹⁶

看吧！我們台灣各處可以看到高大的製糖工廠的煙囪，那巨大的煙囪經常吐出漆黑的煤煙。在那煙囪下面，有許多男女甚至孩童在配合著機器而勞動。這就是說，我們新的文化必須是這製糖工廠實景的反映才對。¹⁷

因此我們的文化運動不單要排斥日本的資產階級文化，也應該開始反抗橫臥在我們面前的污濁的「五千年的文化」，並且要有為創造新的文化而戰鬥的鮮明意識。在此將會有美麗的文化的花朵開放，新的人類歷史的一頁由此展開。

¹⁵ 乃昌〔許乃昌〕（1923b）。

¹⁶ 沫雲〔許乃昌〕（1924c）。

¹⁷ 許乃昌在另一篇文章中有類似的說明：「看呵！看那製粉工廠的大而且高的煙筒，騰騰地吐出暗黑的煤煙出來了！現社會的惡魔正在這黑烟中沉沉地演死的跳舞！唉！唉！」〔乃昌〔許乃昌〕，1924）。

「新文化」不是既有的存在物，必須在現代的物質基礎上、在鬥爭中得來。雖然此文之討論主題是台灣文化運動的方向，但因當時的台灣社會運動諸團體（無論是文協或公益會等）均訴諸文化以為掩護，從此文也可視為一篇號召社會主義者投入政治鬥爭——也就是山川均（1880-1958）所謂「方向轉換」——的檄文。

三年後，連溫卿在〈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中評論這篇文章為台灣「要求大眾文化的萌兆」。¹⁸連溫卿發表此文於《台灣民報》的這天，正是台灣文化協會召開臨時理事會的日子——1927年1月2日。就在這天，以連溫卿方案為底稿的新台灣文化協會會則通過，文協「綱領」改立為「促進大眾文化之實現」。這是台灣社會運動的一次重大轉折。1924年的許乃昌也許未能預見這樣的變化，然其努力不但預示了變化本身，也成為了實現變化的前提。許乃昌向密切聯繫於文協與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台灣》雜誌投稿這篇文章，或許也是想在文協之內促進某種改造或發出變革的警號。——雖然這一改造或變革的來臨，並不及時。

如果許乃昌的〈沙上的文化運動〉——如連溫卿所見——是台灣社會主義者從文協內部爭奪領導權的「萌兆」，那末許乃昌的〈台灣議會與無產階級解放〉（見本研究第六章的討論）便可視為社會主義者在文協外部開展新路線的警號。同出於許乃昌之手的這兩篇文章，也許更反映了形成過程中的台灣左翼運動與既存的台灣社會運動之間的競合關係。更不可忘記的，則是許乃昌在1926年底至1927年初同陳逢源在「中國改造」問題上所發生的論爭。左派以許乃昌為核心，糾集翁澤生（1903-1939）、蔡孝乾（1908-1982）等人，向右派陳逢源（1893-1982）發起了總攻。在文協即將分裂的前夕，中國改造論爭為左派的奪權形成輿論準備。¹⁹誠如連溫卿所云：²⁰

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是以一九二七年一月，台灣文化協會改組後，極其多忙長成起來，遂見有兩個潮流的對峙，先是為改組以前，即有由中國改造問題，而引起對資本主義的論爭，亘三箇月間，而雙方的主

¹⁸ 連溫卿（1927: 12）。

¹⁹ 相關研究可見邱士杰（2007）。

²⁰ 連溫卿（1928b: 15-16）。

張：台灣有資本主義也是沒有？很引起一般社會的留意……因為有這兩個潮流磅礴了台灣，送給台灣文化協會釀成分裂的動機，而使民族主義者總退卻，即結成了勢力組織著「台灣民眾黨」，以和台灣文化協會對立，自是以後，從來少數者的運動，即變作大眾的運動……

（2）文協左轉與無產青年的崛起

本研究認為：社會問題研究會可被視為文協島內核心幹部基於台灣社會問題以及社會主義的興趣而發生的集結（見本研究第二章的說明）。如果此說成立，那末，幾乎與社會問題研究會同時成立的「台北青年會」就可視為蔣渭水與連溫卿向文協以外的底層青年——更正確的說：「無產青年」——招手的一次嘗試。其實，早在「無產青年」興起之前，蔣渭水便開始指導校園內的「騷擾事件」，推動校園反日活動。風潮起於1922年2月的台北師範學校學生，「這些學生中的主要份子，都是經常出入文化協會幹部蔣渭水處，受其指導，進行研究的人。」²¹後以1923年7月30日翁澤生大鬧集美學校同學會為標誌，宣告了「無產青年」的興起。「這些行動不容置疑是無產青年團體的宣傳活動；由十數名預謀者有計畫地加以發動，從同學會退出後，翁澤生、洪朝宗、鄭石蛋等十數人立即往江山樓與蔣渭水、王敏川、許天送等人會合，就青年會組織事宜協商。之後寫成台北青年會宗旨書與會則草案並接受文化協會幹部的指導，進行組織青年會的籌備工作，聲稱八月十二日舉行創會式。」²²他們最初的組織叫做「台北青年會」。也許連溫卿關於社會問題研究會激起「青少年各階層、全島公學校同窗會的決起鬥爭」的論斷，就是這樣來的。

此時距離社會問題研究會的成立，僅僅一周而已。雖然「台北青年會」的結社計畫，立遭當局以《治安警察法》取締（1923.8.11）而無疾而終。然而「無產青年」卻以「台北青年讀書會」、「台北青年體育會」的名義開展組織工作，「仍

²¹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228）。

²²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 11）。

舊在連溫卿、蔣渭水等文化協會幹部之指導下進行活動」。²³實際上，1924 年以後島內社會主義運動的主體，就是「無產青年」。1926 年，無產青年組成了無政府主義的「黑色青年聯盟」；1927 年，無產青年協助連溫卿奪取文協領導權；1928 年，另一部份的無產青年在上海組織了台灣共產黨。

從《台灣社會運動史》來看，蔣渭水在無產青年形成之初，起了比較顯著的指導作用。然而最終使無產青年成為一股足以奪取文協的政治力量的人，卻是連溫卿。連溫卿在無產青年形成初期的作用，是個值得與蔣渭水相比較而同時探討的問題。就史料所見，蔣渭水所贏得的欽慕最多、最顯著，此與連溫卿形成了對比。《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記謝玉葉之事例，可略為說明：²⁴

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學生謝氏玉葉，不上學而時常出入文化協會辦事處，詢問其理由時，毫不怯懦地回答說：「蔣先生等的意見很高遠，令人不勝感激。我和其他很多朋友加入了文化協會。雖然現在的台灣在日本政府的統治下，但不久會歸入台灣人的手來統治」。……

然而最終領導無產青年奪取文協領導權的人為何仍是連溫卿？

一種可能的原因是連溫卿與山川夫婦所建立的關係。山口小靜當年的返台，建立起連溫卿與山川夫婦之間的聯繫；連溫卿本人。也在 1924 年 4 至 5 月前往日本旅行，當面拜訪山川夫婦。無論是從日本到台灣，或是從台灣到日本，都體現了社會主義依靠少數先覺者而進行傳播、形成聯繫的早期特色。雖然並不能認為連溫卿壟斷了這種聯繫，這種聯繫卻實實在在地給連溫卿貼上標籤，或者替他背書。所以連溫卿總被視為山川均的台灣門徒（或者負面用語：「落胤」——私生子），總被視為社會主義的一面旗幟。但連溫卿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個「山川主義」者？這個問題實需再行探究。²⁵

²³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 12）。

²⁴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233）。

²⁵ 由於連溫卿曾於 1924 年首次前往日本時，曾拜訪山川均夫婦，因此連溫卿的政治傾向常常同山川均聯繫起來。又因為山川均與連溫卿分別被日共與台共打為「社會民主主義者」，而且山川確實在戰後參與了日本社會黨的建設，因此，把山川乃至連溫卿兩人（的一生）簡單視為「社會民主主義者」或者鐵板一塊的整體就變成最現成的解答。但這種成見是很危險的。因為：（1）雖然山川均或堺利彥等日共創黨領導人後來紛紛與日本共產黨決裂，但這些領導人在日共創黨初期就代表著日本共產黨。因此不能脫離日共的組織運動脈絡去理解連溫卿與山川均等人的接觸，不能把當時的山川均視為一個與日共無關的存在。（2）連溫卿本人的思想很複雜。他在 1924 年東京街頭遭遇五一遊行隊伍時所產生的感想正能體現這種複雜性：一方面是共產主義（以布爾什維主義為

另一種可能的原因則可能來自於他對「不良少年少女」的關心。這個問題不妨先〈蠹魚的旅行日記〉來說明。連溫卿踏上日本本土後便不斷觀察並比較他所看到的各種社會現象。他把這些社會現象同「資本主義化」聯繫起來，視之為「資本主義化」的派生物。雖然他首先觀察到的現象就是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的並存，²⁶但他主要仍從資本主義化的角度探討了關東震災的影響、²⁷大量存在的文盲、²⁸當地台籍移住勞工有關的失業問題、²⁹日本的性別與婦女問

代表)、另一方面是無政府主義:「而那聲音漸近,歡呼之聲如遠雷一樣,殷殷傳來,少頃,則旗影井然可觀,前半部揭著黑的會旗,而後半是真紅的,表出日本社會運動的傾向,前者是安那其主義派的組合,主張自由聯合的,後者是布爾塞維克派的組合,主張統一合併的,……」看那黑旗在空中振搖,而遊行的步武〔步伐〕堅踏著地上,緩緩而進,這時候我的感想是用筆紙難以表現出來,這不是勞動者指示他們的力量〔,〕崩壞著那金字塔的社會嗎;〔?〕這不是勞動者欲在那光明地方建設新社會的實力麼;〔?〕(越無〔連溫卿〕,1924:第三十六回)。連溫卿對於「黑旗」的感動體現了他的無政府主義傾向。這種傾向貫穿其一生。其實,證明連溫卿無政府主義傾向的現象還有不少。(1)從組織上來看,連溫卿與無政府主義者胡柳生等人所組織的「自由勞動者聯盟」就有一個具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名稱(「自由勞動」)。此外,連溫卿以「機械工會」為對象而組織工會的方式,則與中國無政府主義者以「機器工會」為對象而組織「行業別」工會的方式相同,從而迥異於馬克思主義者所重視的「產業別」工會。請參見:連溫卿(1988:166-173,181-188,235-220)、黃藝博(1982:507-521)、劉石心(1984:937-939)。(2)從活動上來看,連溫卿則始終熱中於無政府主義者的世界語,而且畢生未曾與無政府主義者斷絕交往。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山鹿泰治(1892-1970)於四〇年代旅台期間,曾與連溫卿有密切來往;大陸無政府主義者毛一波赴台之後,亦曾為連溫卿撰寫極為欽慕的追悼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總督府的秘密文書〈文化協會對策〉裡,也曾將彭華英與連溫卿(且只有此二人)並列為無政府主義者。總督府的這一歸類雖不無啟發,然在忽略彭、連二人的馬克思主義傾向下,這一判斷顯然又過份武斷了。見:向井孝(1974:157-159)、毛一波(1957:1-2)、若林正丈(1978:165)。然而連溫卿的馬克思主義傾向也是存在的。關於連溫卿承認馬克思主義有效性的論述,可見越無〔連溫卿〕(1924:第七十五、七十六回)。另就連溫卿把一切社會問題歸因於「資本主義化」而言,也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傾向。關於「資本主義化」,可見本章後續敘述。

²⁶ 當連溫卿搭上火車,窗外是一片仿若台灣蕃社的風景,但車上卻同時有人賣著氣球與氣枕之類的工業製品。連溫卿認為,似乎日本文明只表現在都市,鄉村是沒有的。這種城鄉差異不但表現在車廂內,更存在於東京這樣的大都市,「不覺將那『大都市就是這樣』的感想幻滅過去」。東京雖已急劇地資本主義化,但從路上仍有大量獸力馱運的交通工具來看,他認為恰恰反映了非資本主義的殘餘(越無〔連溫卿〕,1924:第二十五、七十七、七十八回)。

²⁷ 當時正是關東震災之後。連溫卿舉目所見常是震災之後臨時用「白鐵釘成的」廠舍,據說是「東京市內第一不潔的,又小又不高,又建築的材料大半也是舊的。」不但大型公園(如:日比谷公園、上野公園、芝公園)之內佔滿白鐵廠舍,其好友比嘉春潮所任職的「改造社」也是棟白鐵屋。比嘉向他說,「當立在愛巖山上的時候,東京市的全景可綜合在眼下,廠舍的所在一目瞭然,若適那日的天氣很好,日光在那白鐵的屋頂照耀,眩然幾欲刺目。」(越無〔連溫卿〕,1924:第三十、四十五、四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回)

²⁸ 東京市內外處處可見「手紙(一讀疊嘎密)喀圭麻斯(譯音)」(能寫書信)的招牌,「這現象可以證明在這地方一定有自己不能寫信的人很多,所以有這個招牌的存在。」雖然日本號稱有高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兒童就學率,卻仍存在此一現象,「益增我對日本產業發達和國民教育的疑

題，³⁰以及美國排日法案與人口、產業問題之間的關係。³¹連溫卿著重討論了人口矛盾、民族矛盾、國際矛盾，以及產業矛盾等三大問題（甚至以七回的篇幅——第 51 回至第 57 回——翻譯了眾議院議員阪上的相關言論），並以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產業矛盾視為根本原因。³²總的來看，連溫卿眼中的日本全無好處——空氣、道路、甚至公園，都不見得比台灣好；他也常常將這些不好聯繫於資本主義。甚至就「讓座」這一行為來說，他在東京也只看到人們爭先恐後；反而台灣人比較會讓坐。他認為，「民族性與動物性是相同的」，所以「愈獨立的民族，排他性是愈濃厚」。日本之所以在震災中屠殺朝鮮人，正是震災「誘出六十年前之排他性，如野獸一樣的本能。」³³

除了上述現象，資本主義還產生了「不良少年少女」，³⁴這是資本主義在台灣城市地區的體現。後來連溫卿就此問題而分別撰寫〈不良少年少女研究〉1925)、〈不良少年少女研究(續)〉1925)、〈人類之家·台灣 ESP 學會〉1954 等

念。」他認為，只有針對勞動者進行教育才能解決這一問題（越無〔連溫卿〕，1924：第四十五、七十八回）。

²⁹ 失業問題是當時日本勞動者最大的威脅，「在資本主義社會，可算是個致命的問題了。」一次，連溫卿要求跟監他的刑事帶他遊覽芝公園，四處均是白鐵廠舍以及大量的失業勞動者，這是震災後愈發顯著的現象。京都博覽會所展售的「還壯餅（即不老餅）」，也令他聯想到失業問題，「若人們食著那塊餅，年老就能變個年少的。那末，失業的人越生越多，像這社會怎麼有了法子，去解決那問題呢。」同時也直接聯繫到當地台灣籍勞動者的處境。由於震災後的重建工作需要人手，許多台灣人便被招募至東京工作。然而日本大量的失業人口導致台灣籍勞動者時常處於失業邊緣，並遭不合理的工作待遇。「若數日間為兩天繼續沒有工作的時候，那日人就要逐出他們的樣子，不但不給與他們三餐，輒以瑣事摧辱他們，而他們又不解日語，欲和他們理論自然是不能的，不得已來訪問雜誌社（《台灣》雜誌社）以求解決。」（越無〔連溫卿〕，1924：第二十七、二十八、五十、六十七回）。

³⁰ 旅行中的連溫卿也關注日本的性別與婦女問題。一路上，連溫卿也與不少女性有著饒富趣味的對談。連溫卿筆下的這些女性（即便是妓女），個個色彩鮮明、英姿颯爽，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連溫卿特別觀察了東京當地的娼寮。他認為娼妓實與私有制及資本主義有深刻關係，「若現在的資本主義！私產制度不能革除，那末，任憑有甚麼救濟他們的方法，也不過是在社會政策範圍內而已，決〔絕〕不是改革〔改革〕社會的根本。」飛行家謝文達曾向連溫卿說，「賣淫者的生活可說是個時代的產物，和那詐騙，欺騙是相比例的。」但連溫卿更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人們說那是賣淫生活，蓋譏其生活態度和賣淫者的生活態度是一樣的。」在台灣，私娼年年增多，其中甚至包括許多女學生；這是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淪落（越無〔連溫卿〕，1924：第十一、十二、二十、四十二、四十三、六十三、八十九、九十、九十二回）。

³¹ 越無〔連溫卿〕（1924：第五十、五十一回）。

³² 越無〔連溫卿〕（1924：第五十七回）。

³³ 越無〔連溫卿〕（1924：第十五、十九、五十八、五十九、八十、一百零一回）。

³⁴ 越無〔連溫卿〕（1924：第四十二、四十三、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四、九十六回）。

文。連溫卿指出，由日本人稻垣藤兵衛所主辦的「人類之家、稻江義塾」，就是針對「不良少年少女」而創設的社會救助機構。連溫卿所關心的「不良少年少女」問題可以同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在 1920 年發生的一次論戰相比較。論戰起於謝晉青（晉青、晉卿，?-1923），論戰集中討論「浮盪少年」是否假藉「自由戀愛」之名欺侮婦女，並討論這一現象與「婦女解放」之間的關係。³⁵然而連溫卿的論述與「覺悟」副刊上的論戰內容仍有差異。連溫卿關注「不良少年少女」如何產生於資本主義之下並聯繫這一現象於社會進化。他認為不良少年少女是在資本主義的「生存競爭」中遭遇挫敗而矢志墮落的「意志薄弱的人們」。「現在的社會愈發達，而這不良少年少女便愈生愈多。」³⁶連溫卿所注意到的「不良少年少女」，也許正是那些與他攜手並進推動社會變革的「無產青年」。

前面提到的謝玉葉（葉綠雲、謝玉娟、謝志堅、玉鵬），後來成為翁澤生的妻子，並共同參與台灣共產黨的建黨。雖如翁澤生、謝玉葉這些早期的台灣激進青年最終都成為比蔣渭水、甚至比連溫卿更激進、更為旗幟鮮明的社會主義者。然若文化協會並未在連溫卿指導下而發生 1927 年的左右分裂，蔣渭水又將對這些青年起到什麼作用呢？雖然，歷史是沒有如果的。葉榮鐘評價道：³⁷

蔣渭水在「無產青年」及日共山川派系連溫卿的牽制與蠱惑下，思想日趨尖銳，行動也自難免有遷就的行跡。於是自然而然與由蔡培火所代表的合法的民族運動派形成對立，但是初時因總理林獻堂的權威與聲望足以抑制對立的激化，源此協會的活動也不致有阻礙團結

³⁵ 1920 年 8 月，旅日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謝晉青在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發表〈不良的少男少女〉一文（晉青〔謝晉青〕，1920a）；同月，陳望道（首位將《共產黨宣言》全文漢譯者、中共早期黨員，曾脫黨）發表〈婦女解放和浮盪少年〉一文（佛突〔陳望道〕，1920），從而激起長達數月（至 1921 年 5 月仍在討論）的論戰。輿論者包括沈玄廬（筆名「玄廬」，中共早期黨員，後脫黨）、邵力子（筆名「力子」，中共早期黨員，後脫黨）、劉大白（筆名「漢胄」，文學家）等知名人物。

³⁶ 連溫卿（1925b: 13）。

³⁷ 葉榮鐘（2000: 383）。本段在《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中改成：「蔣渭水在『無產青年』及日共山川派系連溫卿的牽制與蠱惑下，思想發生變化，行動也自難免有出軌的行跡。於是自然而然與由蔡培火所代表的合法的民族運動派形成對立。初時因總理林獻堂的權威與聲望，足以抑制雙方對立的激化，文化協會的活動還不致發生問題。及至民國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文化協會在新竹市舉開第六次年會的時候，由於修改章程的提議成立，遂導致分裂的局面。」（蔡培火與陳逢源等，1983: 338）

的情事。及至民國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文化協會在新竹市舉開第六次年會的時候，由於修改章程的提議成立，遂導致分裂的破局。

雖然葉榮鐘語帶批評，卻肯定了一件事，也就是蔣、連兩人的思想相近性，以及兩人對於無產青年的指導地位。雖然「無產青年」並不等於「台灣社會大眾」。然而「無產青年」的出現，不但使運動主體從「本地地主資產階級」向下轉移，並使社會主義從既有的社會運動之中抽離出來，而逐漸成為獨立於既有的社會運動之外的新路線。此間過程，無論自覺與否，蔣渭水與連溫卿始終參與其中。

不過，即使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在 1927 年得到復興，運動的形式卻未能發生轉變。「轉變」是同海峽彼岸的革命運動相比而論的。在大陸上，國共合作下的「國民革命」自始就出現「民眾運動」（社會運動）與「武裝鬥爭」兩種形式。兩者的差別不僅僅是常設性武裝（軍隊）及其鬥爭是否存在，還包括是否出現「根據地」（如廣州國民政府）。中共直到 1927 年之後才開始拿起槍桿子進入「武裝鬥爭」並建立「根據地」。後來甚至建立起蘇聯以外唯一的蘇維埃政權——中華蘇維埃。

對於日本及其殖民地內的社會主義運動而言，只有朝鮮因為地近大陸，所以稍有武裝鬥爭。但台灣及日本卻始終無法從「民眾運動」（社會運動）轉化為「武裝鬥爭」，更遑論是「根據地」。這種侷限，可能來自於地域過分狹小，也可能來自於日本國家的強大鎮壓力。對於一九二〇年代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而言，這種侷限所造成的危機，宛若無法擺脫的宿命。但也恰恰是在這種持續不絕的危機中，運動渡過了他的一九二〇年代，乃至更久。

第三節、「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馬克思在其十七歲時，曾寫下一篇作文。他是這麼說的：³⁸

在選擇職業時，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

³⁸ 馬克思（1982: 7）。

完美。不應認為，這兩種利益是敵對的，互相衝突的，一種利益必須消滅另一種的；人類的天性本來就是這樣的：人們只有為同時代人的完美、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達到完美。

如果一個人只為自己勞動，他也許能夠成為著名學者、大哲人、卓越詩人，然而他永遠不能成為完美無疵的偉大人物。

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讚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誨我們，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為人類犧牲了自己——有誰敢否定這類教誨呢？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麼，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恆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馬克思的一生正如這篇作文所述，早在少年時代他已經思考著這樣嚴肅的問題：唯有追求社會完善的個人實踐，才是個人的完善過程。以十七歲少年的領悟，那是何等的純真。而更可貴的是，護著這分童真，他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沿路把它珠玉般地鑲嵌在他的作品中。」³⁹人生是有限的，馬克思也無法逃脫這個自然律。然而馬克思以及他的先行者與後來者，卻共同在實踐中走一條最終讓世界各地的被壓迫者也走上的道路。走上這條道路的革命者，也把他們有限的人生，珠玉般地鑲嵌在這條尚未走向盡頭的大路上。

在 1920 年到 1924 年之間，殖民地台灣的少數先行者也開始走向這條大路，甚至想要引領全台灣人民一起走上去。雖然這條道路很曲折，但畢竟從未中絕。「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歷史，在 1924 年之後繼續走了下去。

³⁹ 林書揚（1992b: 179-180）。

表

表 2-1：治警事件前夕，文協與島內相關團體、核心幹部^①

組織名稱	成立、申請	聯絡人辦事處	主幹者	專務理事	發起文獻
台灣文化協會	1921/01/17 成立	蔣渭水。太平町三丁目大安醫院		蔣渭水（共一名。僅次於總理、協理。蔡培火亦曾任此職） ^②	由連溫卿提出組織規則。 ^③
新台灣聯盟	1922/10/17 成立	石煥長。永樂町四丁目長安醫院。後因石煥長渡華，轉移至蔣渭水處。 ^④	蔣渭水（即主要負責人。共一名。原主幹者為石煥長。）		有中、日文二種。日文由連溫卿起草。 ^⑤
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被禁止）	1923/01/30 申請 ^⑥	蔡式毅。太平町二丁目蔡式毅律師事務所。 ^⑦	石煥長（被日官方視為主要負責人。共一名。） ^⑧	蔣渭水（另一名為蔡培火。共二名。）	
社會問題研究會	1923/07/23 成立	連溫卿。永樂町五丁目連溫卿宅			原文日文。由連溫卿起草。 ^⑦

①在《台灣社會運動史》的編纂者眼中，與文協有直接關係的結社是：（1）新台灣聯盟、（2）被禁止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台北）、（3）現在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東京）、（4）社會問題研究會、（5）台灣雜誌社。本研究認可這樣的分類，唯此處略去地處東京並以刊物發行為主的台灣雜誌社，並略去後來在東京申請成功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以下所列之主要資訊，除特別另外注釋者外，俱來自：〈文化協會員の各種結社關係〉（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b: 160-165）。《台灣社會運動史》另外編纂了〈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關係主要の各種結社關係〉一表（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b: 337-340），內容大體與〈文化協會員の各種結社關係〉相同，唯將「社會問題研究會」寫為「時事問題研究會」則誤。

②文協創立時，按〈台灣文化協會會則〉（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b: 140-141），未有「專務理事」的設置，只有次於總理、協理的「理事」一職（若干名）。修改〈會則〉後，則於總理、協理之下設置「專任理事」（一名），以「輔佐總理協理擔任一切會務」，是會內排名第三的職務（台灣文化協會，1924）。

③「組織上之規則是由連溫卿提出，曾在艋舺徐慶祥家加以修改，並據此招募會員。」（連溫卿，1953b: 68）

④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b: 7）。

- ⑤連溫卿（1988: 80-81）。日文版的宣言書（新台灣聯盟, 1922a）收錄了新台灣聯盟的規約，此為漢文版宣言書（新台灣聯盟, 1922b）所無。
- ⑥此為正式向總督府當局提出申請的時間，但旋於2月2日被駁回。
- ⑦連溫卿（1953b: 71）。
- ⑧若據〈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會則〉，會務由二名「專務理事」所總理，並無「主幹者」之職稱。然而總督府禁止台北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命令書，卻以僅任「理事」職的石煥長為對象而發出，並謂之「主幹者」（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39b: 160, 356-357）。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至東京重建之後，首次選出的「專務理事」則有五名（台灣, 1923b）。

表 3-1：范本梁的人際關係網

●表示與范本梁有可指之往來者，◎表示同時期的其他關係人

		A	B	C	D	E	F	G	H	I	J
		北京台灣青年會的結成 (1922.1)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116) 3	北京台灣青年會月刊特別號 (1922.5.5) (許地山·1922)	北京台灣人活動的情報 (1922.6.5) (外務省記錄·1922c)	北京台灣人的思想運動 (1922.8月後)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3-5)	《新台灣創刊的宣言》的發行 (1923年初) (外務省記錄·1922a)	《新台灣創刊的宣言》的散布 (1923.2.1) (外務省記錄·1922b)	新台灣安社的結成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3-5)	《新台灣》的協力者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d:3-5)	北京台灣運動人際圈 (1925.4) (外務省記錄·1925d)	關於《新台灣》的發行回顧 (外務省記錄·1926c)
01	林炳坤	◎									
02	陳江棟	◎					●				
03	鄭明祿	◎									
04	劉錦堂	◎		◎							
05	黃兆耀	◎									
06	林子明	◎									
07	林飛熊	◎									
08	范本梁	●			●	● ¹	●	●	●	●	●
09	林瑞膽	◎									
10	蔡惠如	◎									
11	吳子瑜	◎									
12	林松壽	◎									
13	廖景雲	◎									
14	林煥文	◎									
15	關錦輝				● ⁶				●		
16	謝廉清				●			●	●		
17	謝文達				●			●			
18	許地山		◎ ²			● ³		●			
19	王悅元		◎ ⁴	◎							
20	林阿謨								●		

21	之民					● ⁵				
22	羅志道									●
23	鄭開源									●
24	游祥耀								●	
25	程水源					● ⁶				
26	張鐘鈴								●	
27	周德仁								◎	
28	蔡淑梅								◎	
29	蘇泰源								◎	
30	巫啟聖								◎	
31	呂茂宗								◎	
32	林深測								◎	
33	丁華鄉								◎	
34	林宏謀								◎	
35	林篤信								◎	

❶署名「一洗」，負責「編輯」。

❷署名「贊堃」。

❸署名「贊堃」，負責「發行」。

❹本則史料記為「王宅」，即「王悅元宅」之意。

❺署名「之民」，負責「會計」。

❻關錦輝與程水源都被日本當局視為需要注意的危險人物（外務省記錄, 1923）。

表 3-2：新台灣（創刊號—第三號）目錄

打*號者表示轉載自其他刊物

No.	作者	篇名	性質
創刊號 1924.4.15			
01	新台灣安社	新台灣安社宣言 ^①	文
第二號 1924.12.5			
02	能鳴者（范本梁）	卷頭言	文
03	一洗（范本梁）	頌揚同志和田久太郎的堅強勇敢的一擊！！	文
04	能俠者（范本梁？）	實行部的宣言	文
05	體信（范本梁）選	新詩拔萃	詩
06	時潮兒（范本梁？）	日美戰爭與台灣革命	文
07	健民（黎健民）	*非孝 ^②	文
08	竹英女士	論貞節	文
09	安敦	*我要說的話 ^③	文
10	云賁	*敬告勞働界同胞 ^④	文
11	平民之聲	*巴枯寧的革命精神 ^⑤	文
12	師復（劉師復）	*無政府淺說 ^⑥	文
13	伯克曼	*暴動與無政府主義 ^⑦	文
14	克魯泡特金	*秩序 ^⑧	文
15	高德曼	*組織論 ^⑨	文
16	森芳生	*最後之革命 ^⑩	文
17	儀呵巴尼智著、安民譯	在公有地的說教	文
18	大能	*血與淚（劇本） ^⑪	文
19	體信（范本梁）選	悲壯淋漓	專題 詩抄
20	一洗（范本梁）	飄零者	
21	光華	菲律賓革命兒黎沙兒之絕命詞	
22	儀呵巴尼智	共和國	
23	宗岱譯	波蘭戰歌	
24	愛羅先珂	*盲目詩人的童話 ^⑫	文
25	本社同人	要緊通告	文
26	能鳴者（范本梁）	編輯後記	文
第三號 1926.3.1			
27	鳴俠、致遠、贊是、慕真、愛陽，（等十八人）	新發議文	文
28	本社同人	年頭言	文
29	斯民（范本梁）	我們的革命運動	文
30	革新之一人	*革命原理 ^⑬	文
31	鞠普	*毀家譚 ^⑭	文

32	玄玄女士	*男女平等說 ¹⁵	文
33	安敦	*勞動運動 ¹⁶	文
34	燃(吳稚暉)	*有宗教與無宗教 ¹⁷	文
35	森芳生	平民的疾呼	詩
36	菸僧	感事	詩
37	全上	友於	詩
38	能鳴者(范本梁)	*編輯後記 ¹⁸	文

①這是目前僅知的《新台灣》創刊號內容。以日譯本收錄於《台灣社會運動史》。

②健民,〈非孝〉,《民鐘》,第1卷第2期(廣州,1922.8.1)。本書目見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1979b:702)。

③安敦,〈我要說的話〉,《互助》,第1期(上海,1923.2.15)。本書目見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1979b:726)。

④云貴,〈敬告勞動界同胞書〉,《實社自由錄》,第2集(北京,1918.5)。本書目見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1979b:696-697)。

⑤萬聲,〈巴枯寧的革命精神〉,《學匯》,第34-36期(北京)。本書目見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1979b:714)。

⑥師復,〈無政府淺說〉,《晦鳴錄》,第1號(廣州,1913.8.20),2-8。

⑦ Alexander Berkman 著、震瀛譯,〈暴動與無政府主義〉,《實社自由錄》,第2集(北京,1918.5)。本書目見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1979b:696-697,但本書誤植為「Alexunder Berkman」)。

⑧克魯泡特金著、真民譯,〈秩序〉,《民鐘》,第1卷第1期(廣州,1922.7.1)。本書目見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1979b:702)。

⑨高德曼著、凌霜譯,〈組織論〉,《實社自由錄》,第2集(北京,1918.5)。本書目見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1979b:696-697)。

⑩森芳著、W.S.譯,〈最後之革命〉,《學匯》,第190期(北京)。本書目見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1979b:712)。該文另有「M.S.譯」的記載(徐善廣與柳劍平,1989:367)。

⑪大能,〈血與淚(劇本)〉,《民鐘》,第1卷第9期(廣州,1924.8.1)。本書目見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1979b:704)。

⑫愛羅先珂著、魯迅譯,〈時光老人〉,《晨報副鐫》(北京,1922.12.1)。本書目見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1979a:503)。

⑬革新之一人著、真(李石曾)譯,〈革命原理〉,《新世紀》第22-24號(巴黎,1907.11.16-1907.11.30)

⑭鞠普,〈毀家譚〉,《新世紀》,第49號(巴黎,1908.5.30)。

⑮玄玄女士,〈男女平等說〉,《良心》,第1期(上海,1913.7.20)。本書目見於:曹世鉉(2003:307)。

⑯安敦,〈勞動運動〉,《互助》,第1期(上海,1923.2.15)。本書目見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1979b:726)。

⑰燃,〈宗教問題〉,《新世紀》,第54號(巴黎,1908.7.4)。范本梁僅節錄這篇文章的部份段落並改動若干文句。

⑱附記有「捐助者芳名」,分別是:「Jack」、「G生」、「春子」、「BT」、「俊蓮生」、「Woo」。

表 3-3：《台灣新青年》創刊號目錄

No.	作者	篇名
01		卷頭語
02	中國台灣新青年社	本社宣言
03	毛滄	台灣新青年祝詞
04	守株	台灣新青年社序
05	浪嘯社	台灣新青年刊
06	陳笑奇、王瘦農、邱少陵、李振文	台灣新青年刊
07	美華中學輔德自治會	台灣新青年刊
08	瘦瘦	李序
09	朱謙之	台灣學生聯合會演說辭
10	黃炳炎	我對台灣之感想
11	浚清	台灣新青年之感想
12	克思	我所知的文化協會與公益會
13	那其	台灣政府貫連資本案搾取民利之要聞
14	仲農	小宣言
15	武鑾冥鴻榮陽	泣告同胞
16	愛智	新老子的政治哲學
17	陳兆元	台灣的青年們應該起來工作嗎?
18	光華	望同胞努力前進
19	李革面	盼望我同胞
20	其本	思想之自由說
21	玉樹	平等說
22	季思華	台灣慘史之感言
23	陷天山人	台灣人心改造論
24	救青	余之懺悔
25	郭名同	台灣被日本壓迫的苦狀
26	那其	黑暗的台灣
27	鏡童	革命歌
未 存	黃炳炎	敬告台灣學生
	黃炳炎	感懷
	玉鵬女士（謝玉葉）	祝台灣新青年社成立
	仝人	敬告台灣諸姐妹
	王樹（玉樹？）	感作
	陷天山人	政府抽稅感作

表 4-1：蔡惠如在 1921 年

No.	日期	事件內容
01	1921.03.18	蔡惠如從東京赴北京（外務省記錄, 1921b）。
02	1921.04 月	蔡惠如與林呈祿於本月以處理「五國合資公司貿易部」的名義到天津、北京、上海，以及廣東等地。與當地「過激派」、「不逞韓人」、當地民眾等互通聲息，謀廣募同志。其間曾於天津訪問美國公使，批評日本。他們的言行遭天津日僑檢舉，但他們在檢舉之前便逃往上海，並與當地「過激派」、「不逞韓人」，以及中華全國學生會等進行排日宣傳（外務省記錄, 1921b）。
03	1921.07 月	蔡惠如於本月自東京到上海，意圖利用太平洋會議之機策動台灣獨立於日本之外的運動（外務省記錄, 1921c）。
04	1921.07 月上旬	蔡惠如與彭〔彭〕華英經東京、朝鮮、天津，到上海（外務省記錄, 1921c）。據日本情報，彭華英前往了上海，與蔡惠如（1881-1929）以台灣代表的身分，共同參與了亞洲各殖民地獨立運動者針對華盛頓會議而舉行的協進會（外務省記錄, 1925b）。
05	1921.07.24 前後	蔡惠如在上海「大東旅舍〔社〕」與菲律賓、印度，以及朝鮮人聚會，對於否派遣台灣代表參與太平洋會議作了討論。但以台灣對日關係異於朝鮮對日關係，以及成效有疑，故僅提出請願書，決議不派代表參加（外務省記錄, 1921c）。
06	1921.07.31	台灣、朝鮮、印度、菲律賓等三十餘人在上海大東旅館〔社〕集會。祕議要利用太平洋會議的機會來進行各自的獨立運動。在東京就學的台灣人學生曾在暑假回台期間與上海東京等地的同志互通信息，並研議利用太平洋會議以進行獨立運動的方法。雖有中國方面的同志提出以台灣復歸中國向太平洋會議請願，但也有台灣人同志鑑於中國的現狀而希望台灣能成為比利時那樣的永久中立國（外務省記錄, 1921a）。
07	1921.08.18	在上海的「日本社會主義者」和田久太郎在「一品香」宴請朝鮮人與台灣人，不過此等同人作為「日本社會主義者大阪一派之『可思母俱樂部會員』」而出席，此會並無政治性（外務省記錄, 1921c）。
08	1921.09.17	中韓互助社於上海大東旅社舉辦茶話會，蔡惠如出席並發表講話。蔡惠如在上海時，常常向當地台灣人進行排日宣傳，並與林呈祿共同訪問了華僑聯合會總理台灣人許又銘（冀公），許曾發起獨立運動並曾組織敢死隊。蔡惠如長子就讀於上海靈〔震〕旦大學（外務省記錄, 1921c）。
09	1921.09.20	蔡惠如到香港廈門旅行之時，在當地收到上海「南成都路一九六號寶裕坊」「蔡以修」經日本郵局而匯來的款項三千圓（外務省記錄, 1921c）。
10	1921.10.01	蔡惠如致郭肇基信。由於郭肇基將兩萬數千圓委託蔡惠如投資某企業，卻因股價下跌而失敗。因此郭肇基向別人說蔡惠如是「詐欺師」、「賊人」。故蔡惠如去信向之說明原委，並向郭肇基指出，他之所以無法留在臺灣是因為日本當局的壓制，所以他才來到各國革命者聚集的上海，並云他將「投入蔡家一門之生命，儘可能從事排日宣傳並極力妨礙中日親善交流政策」。並云，只要日美開戰，他就能致富並把錢還給郭肇基（外務省記錄, 1921b）。

11	1921.10.23	蔡惠如與林瑞騰住「大東飯店〔旅社〕」，時值籌設大東銀行之事（外務省記錄, 1921c）。
12	1921.11.16	蔡惠如現居上海，住在「南成都路一九六號成都劉寓」（外務省記錄, 1921c）。
13	1921.11 月中旬	林瑞騰由廈門抵滬（外務省記錄, 1921d）。
14	1921.11.21	為請願運動之事欲與林獻堂商議，林瑞騰偕林建寅由上海搭船返台灣。林瑞騰預定嗣後再赴東京，然後預定再往下一個事業關係地北京。林瑞騰當時被預定為北京大東銀行的總理（外務省記錄, 1921d）。
15	1921.12.16	「胡萃英」抵滬，住「東亞飯店」，由於此人被視為與「不逞鮮人」與「中國無政府主義者」有密切關連故受日本當局密切注意（外務省記錄, 1921d）。
16	1921.12.18	為議會請願運動事，蔡惠如偕其長子及助手從上海到東京。此行由「胡萃英」促成（外務省記錄, 1921d）。
17	1921.12.21	徐慶章從台灣抵上海（外務省記錄, 1921d）。

表 4-2：關於《平平旬刊》聯絡人及聯絡處的記載

No.	登載處	登載日期	記載內容	可參考 表 4-4
01	1923 年 12 月 20 日《學匯》的《平平旬刊》廣告	1923.12.20	「上海戈登路南方大學賀威聖。」（張允侯等, 1979: 350）	04
02	《平平旬刊》創刊號	1924.04.01	「上海四川路青年會羅儂儂」 「上海北四川路（一）百二十號青年會羅儂儂」	01、02
03	《平平旬刊》第 2 期	1924.04.11	「上海四川路青年會王德豐」	
04	《春雷》第三期	1924.05.01	「上海四川路青年會轉羅儂儂」	01、02
05			《春雷》上海代售處：「戈登路南方大學羅赤人」	

表 4-3: 《平平旬刊》目錄

No.	作者	欄目	標題	可參考 表 4-4
創刊號. 1924.4.1 (16 面)				
01	同人	評論	發刊詞	
02	尹蘇野	評論	韓國的民族運動	17
03	佐野學	評論	過上海	18
04	赤人	評論	祥經絲織廠大火以後	02
05	沫雲	評論	自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	12
06	Kerkeзов 著、抱朴譯	譯述	柯祖基也招承了! ❶	08
07	任	文藝	軍隊化的四川	01
08	真一	文藝	台灣怎麼樣了?	15
09	同舟	特載	麵包 (獨幕劇) ❷	24
10	王之石	特載	回鄉	21
11	赤人	詩	月下	02
12	白弓	詩	參透	25
13	阿鳳	隨感錄	上狗法的當	04
14	威聖	隨感錄	北洋學潮雜感	04
15			平社簡章	
16	平平社		代表章程	
17			編輯室啟事	
第二期. 1924.4.11 (8 面)				
18	赤人	評論	中俄交涉破裂的原因	02
19	沫雲	評論	印度獨立運動的發展	12
20	沫雲	評論	第二次限制軍備會議	12
21	真一	特載	再談台灣問題	15
22	赤人	詩	月下 ❸	02
23	同舟	特載	麵包 (獨幕劇) (續)	24
24	威聖	隨感錄	責備賢者的幾句話	04
25			編輯室啟事	
26			前期正誤	
第三期. 1924.4.21 (8 面)				
27	一之	討論	實行社會主義的第一步工作	22
28	威聖	談話	讀書難	04
29	花蕾	談話	台匪	13
30	蘇野	特載	韓國民族運動史上的一件重要文獻	17
31	任一	遊記	象山一周記	01

32	同舟	戲劇	麵包（獨幕劇）（續）	24
33	赤人	詩	旅夜	02
34	任一	隨感錄	老成人的談話	01
35		(廣告)	民國日報 四大特色	
36		(廣告)	僑務旬刊	
第四期，1924.5.1（8面）				
37	威聖	評論	吳佩孚的供狀	04
38	劉一清	評論	調和與革命	10
39	任一	談話	人不如狗	01
40	真一	特載	台灣的人造地震	15
41	蕃	特載	一個回到中國的台灣人	13
42	任一	遊記	象山一周記（續）	01
43	同舟	戲劇	麵包（獨幕劇）（續）	24
44	阿鳳	隨感錄	至死不悟	04
五一紀念特刊，1924.5.1（8面）				
45	蘇野		五月一日的過去和現在	17
46	任一		五一節的暗示	01
47	貞		台灣在五一紀念日的意義	16
第五期，1924.5.11				
48	威聖	評論	接踵而來的三個紀念日——「五一」、「五四」與「五七」	04
49	任一	評論	戀愛與經濟	01
50	威聖	專載	學術運動與社會運動	04
51	任一	遊記	象山一周記（續）	01
52	劍波	談話	南京學生造反了	03
53	王之石	詩	醉後	21
54	扶雅	詩	父親的滋味	23
55	小立	戲劇	血	07
第六期，1924.5.21（8面）				
56	阿鳳	評論	趕走直腳鬼	04
57	真一	評論	日本人口裏的文化政策	15
58	威聖	專載	學術運動與社會運動	04
59	任一	遊記	象山一周記（續）	01
60	劍波	詩	暴雨	03
61	王秋心	戲劇	女巫（遊戲的喜劇）	11
第七期，1924.6.1（8面）				
62	少峯	評論	更待何時	06
63	沫雲	評論	日本對台灣的武裝大示威	12
64	真一	評論	台灣的自治和請願都不中用	15
65	威聖	專載	學術運動與社會運動	04
66	任一	遊記	象山一周記（續）	01
67	姜冰生	文藝	將你們這種人一概殺盡	05
68	介藩	文藝	海濱的晨光	09

69	王之石	文藝	野花	21
70	王秋心	戲劇	女巫（遊戲的喜劇）（續）	11
第八期：1924.6.11（8面）				
71	任一	評論	誰是和平障礙物	01
72	任一	評論	嫌疑解釋	01
73	逸民	談話	我對於懷疑洋人釘死奶媽的感想	14
74	威聖	專載	學術運動與社會運動	04
75	任一	遊記	象山一周記（續）	01
76	王秋心	戲劇	女巫（遊戲的喜劇）（續）	11
77		(廣告)	孤星（旬刊）	
78		(廣告)	民國日報（日刊）	
79		(廣告)	上海大學校刊	
80		(廣告)	安徽黎明週報	
81	發行部	(廣告)	改正定價	
第九期：1924.6.21（與增刊合計16面）				
82	田口運藏著、任一譯	評論	階級意識	01、19
83	少峯	評論	應該動手了！	06
84	真一	評論	台灣的保甲法當如何廢除？	15
85	一之	評論	到自由之路的障礙	22
86	威聖	專載	學術運動與社會運動	04
87	王秋心	詩	火災（劇詩）	11
第九期增刊：1924.6.21				
88	王之石	詩	夢	21
89	王之石	詩	雜感	21
90	王秋心	戲劇	女巫（續）	11
91	平林初之輔著、真一譯	譯述	家族制度與婦女參政運動 ^❶	15、20
92	冰生	小說	沒相干！「五九紀念日衢州學生界的寫真」	05
93	王之石	隨感	中國出版界的悲觀	21
94		(廣告)	新建設月刊	
95		(廣告)	孤星旬刊	
96		(廣告)	上海大學校刊	
97		(廣告)	民國日報	
98	平社		啟事	

❶文後標註「未完」。第三期「編輯室啟事」並云此文續稿未到，留待第四期發表。實際上卻再無下文。又，本文刊出時，作者「抱朴」誤植為「抱林」，見表4-4: 08。

❷文後標註「未完」。

❸本詩為重新發表，原已登載於創刊號。

❹本文之後還附一則《平平旬刊》的「記者附誌」。

表 4-4：「平平同人」資料考證略表

No.	<p>凡例：</p> <p>筆名（撰稿篇數+譯稿篇數*） 本名（生卒年）：活動概述與考證</p> <p>（打*號者代表為譯稿，打?號者表示存疑）</p>
四川	
01	<p>任一、任（13+1*） 羅任一（1897-1965）：詳見正文。</p>
02	<p>赤人（5[●]） 羅赤人（生卒年不詳）：</p> <p>1921年，一個署名「赤人」的中學生即投稿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以控訴某校（顯然是中學）破壞學生會（赤人, 1921）。1922年，羅赤人等人上海浦東中學學生，組織《人》刊，這是一份被同時歸類為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刊物。社團約有三四十人，並開辦義務夜校（趙耿梅, 1989: 146）。1921年的「赤人」可能就是浦東中學的「羅赤人」。自1922年至1923年12月底，「羅赤人」列名於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地方團員（黃志榮與黃妙珍, 1986: 50）。表 4-2 所載之上海南方大學的「羅赤人」，應該就是《平平旬刊》的「赤人」。</p>
03	<p>劍波（2） 盧劍波（1904-?）：</p> <p>原名盧廷杰，四川省合江縣人。盧劍波是五四後期的著名無政府主義者。1923年，他在南京創辦無政府主義雜誌《民鋒》。1925年五卅慘案後，他從南京搬至上海，並在1926年於上海復刊《民鋒》（蔣俊, 1984）。</p>
浙江	
04	<p>威聖、阿鳳（13） 賀威聖（1902-1926）：</p> <p>字剛峰，浙江象山縣人。幼時乳名鳳寶，故又常稱「阿鳳」。《平平旬刊》中署名「威聖」以及「阿鳳」的文章，均應其作品，且為《平平旬刊》撰稿第二多的作者。賀威聖在1923年進入滬江大學，退學後轉入南方大學（從而可以說明《學匯》上的《平平旬刊》出版預告為何記為「上海戈登路南方大學賀威聖」），後因不滿校方而自行退學，最後於1924年進入上海大學就讀社會學系，同年加入中共，並在冬天返回故鄉象山，建立起當地第一個中共支部（朱華庭, 1986: 1-2）。</p>
05	<p>姜冰生、冰生（2） 姜冰生（1906-1937）：</p> <p>浙江象山人，在寧波四中學習期間結識華崗（少峰），並成為中共寧波特委刊物《火耀》週刊的主要撰稿人。1924年，姜冰生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6年春加入中國共產</p>

	<p>黨。五卅慘案後，曾與賀威聖回象山開展宣傳活動。後來成為中共象山獨立支部領導成員（象山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1）。1925年曾以本名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發表文章。</p>
06	<p>少峰（2） 華崗（1903-1972）：</p> <p>又名少峰，幼名延年，浙江衢縣人。其於1924年前後多以此二者為筆名。若以《平平旬刊》為準，華崗在此之前所公開發表的文章，目前僅知有《學生雜誌》的〈關於學生政治運動與入黨問題〉（1923年12月）與〈學生與賭博〉（1924年2月）二文，分別署名「華延年」、「華少峰」。在《平平旬刊》之後所首次發表者，則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第61期（1925，上海）所刊之〈青年團體報告：社會科學研究會〉，署名「少峰」。如上所述，可知華崗當時所用的筆名多為「少峰」無疑（向陽，1989：258；華丹坡與李彥英，2003：467）。1924年暑假，華崗以華少峰為名進入寧波四中學習，同年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此間，華崗也曾參與主編《火耀》週刊（傅能華，1985：281-312），並曾到象山進行過組織工作（王慶祥，1997：2）。</p>
07	<p>小立（1） 崔曉立（1900-1941）：</p> <p>又名小立、紹立、尚辛，曾化名邵林（麟）書，浙江鄞縣人。1923年進入上海大學文學系，後轉社會學系。1924年加入中共，1925年參與五卅運動，同年赴蘇留學（浙江省社會科學研究所，1984；崔紅軍等，1981：44-54）。1924至1925年間，曾以「小立」、「崔小立」為名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大五卅特刊》等刊物發表文章（黃美真與石源華等，1984：240-241）。</p>
08	<p>抱朴（抱朴）（1） 秦滌清（生卒年不詳）：</p> <p>筆名抱朴，鄭超麟則記之為「秦滌青」（鄭超麟，2004a：194-195）。浙江鎮海人。一九二〇年代之著名無政府主義者，曾參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赴蘇留學，回國後反共，投靠國民黨（胡慶雲，1994：355）。《平平旬刊》將「抱朴」誤植為「抱林」，後刊出勘誤表校正之。</p>
安徽	
09	<p>介藩（1） 徐介藩（1910-1983）：</p> <p>原名徐齊邦。安徽省固鎮縣人，1920年前後組織安徽學生會，1923年秋於安徽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後因學潮遭鎮壓，徐介藩與王步文（安徽人）遭通緝並開除學籍。徐介藩逃往南京，1924年報考東南大學未果。旋於1925年進入黃埔軍校，加入中國共產黨（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9）。</p>
10	<p>劉一清（1） 劉一清（生卒年不詳）：</p> <p>除於《平平旬刊》第4期發表〈調和與革命〉此則文章外，第8期還有廣告云：「安徽黎明週報：武力壓迫下的新刊物，富有反抗精神，定價二分，通信處上海大學劉一清轉」（平平旬刊，1924：8）。安徽《黎明》週報創刊於1919年6月，前述之王步文是創辦人之一。1923年10月，《黎明》週報被查封。隨著王步文於1924年春進入上海大學社會系，《黎明》週報亦在上海復刊（王傳厚，1991：85-86）。</p>
江西	

11	<p>王秋心（5） 王秋心（生卒年不詳）：</p> <p>江西永修人。他與其堂弟王環心（1901-1927）在1924年之時均於上海大學就讀，兩人同因其文藝創作而一時聞名，出版有《海上棠棣》一書。王秋心曾在1924年春天受孫中山接見，並受中共派遣回江西進行革命活動（王秋心，1981: 26-28；戴啟棠，1989: 66-72）。1923至1925年間，曾以本名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發表文章。</p>
台灣	
12	<p>沫雲（4） 許乃昌（1907-1975?）：詳見正文。</p>
13	<p>花蕾、蕾（2） 彭華英（?）（1893-1968）：</p> <p>《平平旬刊》中署名「花蕾」與「蕾」的文章，均與台灣問題有關；「花蕾」這一署名，則令人聯想到「華英」二字，也許可以推定「花蕾」與「蕾」即彭華英的筆名。</p>
14	<p>逸民（1） 林耕餘（?）（生卒年不詳）：</p> <p>江亢虎曾云：「林君生閩南晉江。寄居臺灣，留學東京。畢業高師。今入南方大學文科。專攻國學。」（江亢虎，1928: 4）江亢虎南遊東南亞時，只帶了林耕餘隨行。在《台灣民報》創刊初期，常見林耕餘以「逸民」、「海外逸民」之名發表文章。後來林耕餘曾以南方大學附屬中學學監的名義，出席1926年11月舉行於日本長崎的「亞細亞民族會議」，負責翻譯工作（周斌，2006: 128-159）。</p>
15	<p>真一（6+1*）貞（1） 張沐真（?）施文杞（?）：</p> <p>「真一」或「貞」，有兩種可能。（1）張煥珪（1902-1980，台中人）。張煥珪即《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記載的平社成員「張沐真」。據秦賢次指出，張煥珪也曾在上海大學學習，並曾在《平平旬刊》上發表文章（秦賢次，1998: 7）。但是《平平旬刊》上並未有署名「沐真」的作者，或可推測「真一」或「貞」即張煥珪；當然「真一」與「貞」也可能並非一人。據坂井洋史與嵯峨隆所編書目：在1924年9月底發行的無政府主義刊物《工餘》上，有署名「一真」的譯稿；1928年3至6月間，無政府主義刊物《革命》周報上，也能看見署名「真一」或「一真」的作者（坂井洋史與嵯峨隆，1994: 152-155, 168）。上述這些類似的筆名間的聯繫為何？是否張煥珪便是「真一」？此事仍待考證。但《平平旬刊》上的「真一」與「貞」均以台灣問題為寫作主題則無疑。（2）施文杞（生卒年不詳）。「真一」在其發表於《平平旬刊》的〈台灣怎麼樣了〉中，寫作了一則寓言，以「華先生」、「女兒」、「倭寇」，分別代表著中國、台灣，與日本。這種寫作手法與同年2月11日發表於《台灣民報》的寓言小說〈台娘悲史〉（施文杞，1924）極類似。作者又稱此篇為〈台娘痛史〉（淚子（施文杞），1924）。〈台娘悲史〉由留學於上海南方大學的施文杞所寫，是台灣本土白話小說的先驅。施文杞同時也是上海台灣青年會成員的成員，《台灣民報》創刊初期的重要作者。〈台娘悲史〉使當期《台灣民報》在台灣遭禁。這兩則極為雷同的文章，說明「真一」不但可能是「張煥珪」，也可能是就讀於南大的「施文杞」。若從南大與「平社」的關係來看，似乎更能加強後一推測。</p>
朝鮮	
17	<p>尹蘇野、蘇野（3） 尹滋英（1894-1938）：</p>

	尹滋英，曾用名蘇野、S.Y.生，加入中共後用名「丁一英」。曾任朝鮮青年會聯合會領導工作的執行委員，並是「大韓民國」上海臨時政府改造派的核心。他同時也是上海高麗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後來則任職於朝鮮共產黨滿州省委，並曾加入過中共（金喜坤，2005）。其餘資訊詳見正文。	
日本		
18	佐野學（1） 佐野學（1892-1953）： 早期日本共產黨領袖，1933年在獄中發表轉向聲明叛黨。翻譯其發表於《平平旬刊》的文章譯者不明。	
19	田口運藏（1） 田口運藏（1892-1933）： 1921年1至2月間，他曾化名「乃木」，代表日本出席第一次遠東民族大會（村田陽一，1987: 135, 506, 561, 609）。著有《赤い廣場を横ぎる》（東京：大眾公論社，1930）一書。生平與著作可參見荻野正博（2004）的介紹。他發表在《平平旬刊》上的文章由「任一」所譯。	
20	平林初之輔（1） 平林初之輔（1892-1931）： 日本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奠基人。因1922年在《播種人》雜誌發表《文藝運動與工人運動》而嶄露頭角（劉柏青，1985: 26-27）。本文由「真一」所譯。	
無法確認		
21	王之石（6）	目前無法考察三人之身分，但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均能看到署此三名的文章。其中「王之石」與「扶雅」的文章均集中於1923至1924年，且與《平平旬刊》上的同名投稿一樣，多為詩歌、小說類的藝文性文章。從二者所署之寫作地點來看，當時均在上海。
22	一之（2）	
23	扶雅（1）	
24	同舟（4）	不明
25	白弓（1）	

❶其中包括一篇重複刊登兩次的文章，按兩次計。

表 4-5：1924 年前後上海台灣人諸組織的活動簡表

No.	日期	事件內容
01	1923.10.06	「上海台灣青年會」在上海南方大學成立，辦事處設於閘北寶山路振盛里 948 號（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84；外務省記錄，1924c: 164）。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84）與外務省記錄（1924c: 164）均以 10 月 12 日為成立日，但據謝廉清於同年 10 月 10 日寄給《台灣民報》的報導，卻是 10 月 6 日（虛無〔謝廉清〕，1924）。此處以謝為準。
02	1923.11.10	《中國青年》（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登出「台灣赤華會」關於廈門「台匪」之宣言（代英〔樺代英〕，1923: 7）。
03	1923.11.23	許乃昌將「台灣赤華會」之宣言轉投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乃昌〔許乃昌〕，1923a）。
04	1923.12.20	北京《學匯》登出《平平旬刊》出版預告（張允侯等，1979: 350）。
05	1924.01.12	上海台灣青年會在務本英文專門學校召開「新年會」，或稱「上海台灣人大會」。通過譴責治警事件之宣言（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86-87；外務省記錄，1924a；民國日報，1924a, b, d）。目前只有《台灣民報》將上海台灣人大會說為「1 月 14 日」舉行（台灣民報，1924e）。
06	1924.3 月上旬	上海台灣青年會在務本英文專門學校召開春季大會（外務省記錄，1924c: 164；民國日報，1924f）。
07	1924.03.13	本日上海《民國日報》述及佐野學潛行至滬之事。平社機關刊物《平平》即有佐野之文章〈過上海〉。旋即引起日本警察機關的注意（外務省記錄，1924b；民國日報，1924g）。
08	1924.04.01	平社正式發行《平平旬刊》。中有台灣青年會成員參與研議。事務所在「洽〔哈〕同路民厚北里四〇八號」（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96, 245；外務省記錄，1924c: 167-168），通信處為四川路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羅偶儻」（據《平平旬刊》）。
09	1924.04.03	上海台灣青年會委員林鵬飛（林堯坤）被駐滬日領事館叫去，拘留一星期（台灣民報，1924e）。
10	1924.04.05	上海台灣青年會召開本年第四次委員會，議決（一）本年六月中發行本會季刊，（二）向各方捐募基金，（三）舉連啟南為東京方面通信員，（四）會員林鵬飛脫離本會（民國日報，1924h）。
11	1924.04.07	台灣總督府在外研究員訪問東京的《台灣民報》社，詢問上海所召開的臺灣人大會以及上海台灣青年會要出版雜誌的事宜（台灣民報，1924e）。
12	1924.04.11	《平平旬刊》第 2 期發行，通信人改為「王德豐」。
13	1924.04.21	《平平旬刊》第 3 期發行。
14	1924.04.23	本日上海《民國日報》再及佐野學潛行至滬之事（民國日報，1924i）。
15	1924.04.25	「赤華黨」建黨會議在台中舉行，選出五名執行委員。
16	1924.05.01	《平平旬刊》第 4 期及《五一紀念特刊》發行。
17	1924.05.09	上海台灣青年會幹部與部分朝鮮人參加「國民對日外交大會」之國恥紀念日大會。並在中散發傳單（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87；外務省記錄，

		1924c: 166)。
18	1924.05.11	《平平旬刊》第 5 期發行。
19	1924.05.21	《平平旬刊》第 6 期發行。
20	1924.05.24	本月，上海台灣青年會負責張羅經費的林堯坤因詐欺案被捕，使該會活動因經費問題陷入停滯（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89）。停頓後的上海台灣青年會，5 月 24 日在幹部蔡孝乾的主持下，將辦事處移至「法租界筐（巨）籟達路鉅興里六號」（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89）。
21	1924.05.31	5 月前後，上海台灣青年會幹部與平社關係台灣人共同組織「台灣自治協會」，辦事處設於平社以及法租界巨籟達路鉅興里六號的上海台灣青年會內（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90; 外務省記錄, 1924c: 168）。5 月 31 日，台灣自治協會發表〈台灣自治協會宣言〉（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90-91）。
22	1924.06.01	《平平旬刊》第 7 期發行。
23	1924.06.11	《平平旬刊》第 8 期發行。
24	1924.06.17	本月，上海台灣青年會發出檄文散發於島內及各地，反制「全島有力者大會（6.27 舉行）」（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88-89）。6 月 17 日，上海台灣青年會與台灣自治協會在務本專校召開反對台灣始政紀念日集會，散佈傳單數萬份（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87-88, 91; 外務省記錄, 1924c: 166-170）。本章內文討論的「赤華黨」也可能參與其中。
25	1924.06.20	「赤華黨」建黨會議在上海舉行，正式宣告建黨。
26	1924.06.21	《平平旬刊》第 9 期及增刊發行。
27	1924.06.25	台灣自治協會印發傳單（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91）。
28	1924.06.29	本日下午三點，台韓同志會正式成立於才〔戈〕登路南方大學。這一組織的成立，曾有台灣青年會幹部及「文協上海支部」成員參與研議（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103-104; 外務省記錄, 1924c: 170-172。但這兩則史料均將「戈登路」記為「才登路」，誤）。
29	1924.07.10	台灣自治協會成員向中國各學校團體新聞社散佈傳單（外務省記錄, 1924d: 175-177）。
30	1924.07.29	本日晚，台韓同志會在霞飛路上海商科大學第一講堂召開「台鮮人大會」，分發數萬份傳單。並製作要求中華全國學生總會允許臺鮮人入會的案文（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104; 外務省記錄, 1924f: 204-206）。
31	1924.07.31	台灣自治協會成員向中國各學校團體新聞社散佈傳單（外務省記錄, 1924d: 198-200）。
32	1924.08.02	本日，日本情報指出，台韓同志會現有八九十名成員，製有會徽，並有組織暗殺隊的打算（外務省記錄, 1924e: 200-204）。
33	1924.08.05	台韓同志會派遣會員至中華全國學生總會的預備會會場（舉辦於復旦大學中學部），分發傳單。並計劃在將來的大會上進行大大的宣傳（外務省記錄, 1924g: 207-209）。
34	1924.08.14	台韓同志會在中華全國學生總會預備會上散發傳單，並在 8 月 15 日與該會學生代表一同被招待於某餐廳（外務省記錄, 1924g: 209-211）。
35	1924.08.21	台灣自治協會派遣會員在「市民外交大會」上向八百餘名聽眾述說台灣人的悲慘境遇，並分發傳單（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91; 外務省記錄, 1924h: 213-216）。
36	1924.08.28	台灣自治協會至「全國學生大會準備會」（舉辦於南洋大學中學部）散發傳單，「要求收復失地、同情台灣人、並煽動他們抵抗日本」（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89a: 92; 外務省記錄, 1924h: 213-217）。

37	1924.08.31	台韓同志會在「國貨維持會」舉辦的「第一次國貨救亡大會」會場上，攜帶傳單申請演說，然以外國人而遭拒，散發傳單後離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106-107；外務省記錄，1924h: 213-219）。
38	1924.09.22	台灣自治協會在務本專校開會。決議繼續進行運動，並在附近散發傳單（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92；外務省記錄，1924h: 213-218）。
39	1924.11.16	上海台灣青年會召開青年會秋季大會（於閩北公興路共和樓茶館）。同會將青年會改組為「旅滬台灣同鄉會」（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89）。
40	1924.11.30	台韓同志會委託「國立南洋大學學生會」散發傳單（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107）。
41	1924.12.02	台灣自治協會在上海大學學生會散發傳單（外務省記錄，1924i）。
42	1924.12.11	台灣自治協會在「務本英文學校」舉行「茶話會」（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92；外務省記錄，1924i）。其中，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92）所提到的茶話會記載為12月1日，所描述情形同於11日者，可能即是同一場集會。本文選擇12月11日，乃預設當時的情報資料較《台灣社會運動史》可靠之故。
43	1924.12.14	台韓同志會在「對日外交會」之第八次國貨會（舉辦於愛而近路紗業公所），散佈傳單（外務省記錄，1925a: 224-225）。
44	1924.12.21	台韓同志會、「中韓台友誼會」在「對日外交會」之第九次國貨會（舉辦於愛而近路紗業公所）散佈傳單（外務省記錄，1925a: 224-225）。
45	1924.12.23	台韓同志會在東方大學召開的學生會散佈傳單（外務省記錄，1925a: 225）。
46	1925.1月	旅滬台灣同鄉會因經費不足而無力再興。1月份，許又銘、謝呂西、林振聲等人以台灣同鄉會名義召集，但失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89-90）。
47	1925.01.04	台韓同志會在務本英文學校召開茶話會並散佈傳單（外務省記錄，1925a: 225）。
48	1925.01.10	中韓台友誼會在天后宮內的「對日外交市民大會」散發傳單（外務省記錄，1925c: 236-237）。
49	1925.01.18	中韓台友誼會在天后宮內的「江蘇同鄉會」散發傳單（外務省記錄，1925c: 236-237）。
50	1925.01.26	中韓台友誼會在「學生總會」散發傳單（外務省記錄，1925c: 237）。
51	1925.02.02	台韓同志會在「勸業女子師範學校學生會」散發傳單（外務省記錄，1925c: 237）。
52	1925.02.16	中韓台友誼會與台韓同志會在「東方大學」開學式後，散發傳單（外務省記錄，1925c: 237）。

表 4-7：各種組織及刊物的中文、英文、俄文名稱對照表^①

說明：並具音譯與義譯者，均分行處理。打★者表示為「赤華黨」所統一起來組織，詳見本研究第四章。

No.	白安娜碩論所用漢字	白安娜碩論所用英文	郭、白專書所用俄文	〈日本帝國主義枷鎖下的台灣〉所用英文	正確原名或可供參考的名稱
01	赤華黨	Red China Party, RCP	Партия Красного Китая, ПКК	The Red Celestial Party	台灣赤華會
			чи хуа дан	Shikwotow	
02	平社★	Pingshe	Общество “Равенство”	Levelers	—
			Пиншэ	Heisha	
03	平平	Pingping	Журнал “Пинпин”	Hei-hei	—
04	台灣改造同志會★	Taiwan Reform Society	Тайваньское Товарищ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реформ		可能是「台灣同志會」 ^②
05	晨鐘會★	society “Bell”	Общество “Колокол”	Morning Bell	曉鐘會 ^③
				Gyoshokai	
06	社會問題研究會★	Social Problem Study Society	Общество изуч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		—
07	上海青年會★	Shanghai Youth League	Шанха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тайваньской молодежи		上海台灣青年會
08		the trade union of the printing workers	профсоюза печатников		印刷製本業工人的工會
09	無產階級政治研究會台灣支部	the Political Study Proletarian Society, Taiwan Branch	тайвань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Пролетар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可能即日本「政治研究會」的台灣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支部
10	共產主義同志會	Communist Comrade Society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товарищ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可能是「中國共產主義同志會」
11	台灣民報	略	略	略	略

① 臺灣人許乃昌抵達蘇聯之後，於 1924 年 10 月 27 日遞交一份材料給蘇方，材料題為〈關於台灣情況的報告 (Доклад о ситуации на Тайване)〉。據發掘史料者轉述，這份報告包括了關於島內地理、人口、經濟，以及政治情勢的幾個部份，也包括台灣人在島內、上海，及日本所組成之各種左翼組織的細節，是共產國際關於台灣形勢的第一手資料。這份報告在 2003 年由當時正在政治大學留學的研究生白安娜 (Белогурова А. Э) 首先運用於其碩士論文《台灣共產黨與共產國際 (1928-1931)》(Belogurova, 2003)。該論文以英文寫成。本文亦有電子檔收於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網，唯其排版格式異於紙本。2005 年，白安娜與郭杰 (К. М. Терпский) 合撰之《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 (1924-1932)》出版 (К. М. Терпский, 2005)。該書再次提及許乃昌〈關於台灣情況的報告〉(可見該書第 45 頁)。然就討論許乃昌的這份報告以及 1924 年之前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而言，2005 年這部專著的內容並未超越 2003 年的論文更多，幾乎只是白安娜碩士論文的轉譯。不過上述兩書均未指明許乃昌報告的原文為何。

② 黃玉齋曾指出「台灣同志會」於：「一九二五年」「成立於上海」。但成立時間顯然與此處的 1924 年有落差 (漢人 [黃玉齋], 1926: 160-164)。中共機關刊物《嚮導》週報則曾出現「台灣青年同志會」參與了 1926 年紀念「五卅」一週年的活動 (碩夫, 1926: 合訂本頁 1507)。

③ 〈日本帝國主義枷鎖下的台灣〉所用拼音顯然以日語為準。從其拼音來看，郭杰與白安娜二人所譯的「晨鐘會」有誤，應為「曉鐘會」。「赤華黨」則應無誤。

表 4-8：許乃昌所謂的十三名台灣左翼積極份子
（對照表 4-7）

No.	白安娜碩論及郭、白專書所用漢字	正確原名或可供參考的名稱	白安娜碩論所用英文	郭、白專書所用俄文	學經歷（欄內號碼請參見表 4-7）
01	連溫卿	〔同左〕	Lian Wenqing	Лянь Вэньцин	師範學校畢業，曾在小學當老師。 09 的創建者。 1
02	賴維種	〔同左〕	Lai Weizhong	Лай Вэйчжун	畢業於台灣商業學校，1924年居住於北京。中共黨員。 2
03	王傳枝	陳傳枝 〔？〕	Wang Chuanzhi	Ван Чуаньчжи	台灣記者。 01 與 02 的成員。 3
04	張煥珪	張煥珪	Zhang Huanwei	Чжан Хуаньвэй	中學畢業。 01 與 02 的成員。 4
05	吳沛然	〔同左〕	Wu Peiran	У Пэйжань	在中國學習。 01 與 02 的成員。 5
06	黃呈聰	〔同左〕	Huang Chengzong	Хуан Чэнцун	畢業於早稻田大學。 11 的記者。
07	黃周	〔同左〕	Huang Zhou	Хуан Чжоу	畢業於早稻田大學。 11 的記者。 6
08	謝廉清	〔同左〕	Xie Lianqing	Се Ляньцин	畢業於台灣商業學校。 11 的記者， 01 與 02 的成員。 7
09	李金錄	李金祿	Li Jinlu	Ли Цзиньлу	畢業於台灣商業學校。 8
10	蕈登洲	黃登洲	Xun Dengzhou	Сюнь Дэнчжоу	畢業於早稻田大學。 10 的創建者、 05 的積極份子。 9
11	呂盤石	呂磐石	Liu〔Lü〕Panshi	Люй Паньши	畢業於早稻田大學， 05 的積

					極份子， 09 的創建者。 ^⑩
12	蔡炳曜（耀）	蔡炳曜	Cai Bingyao	Цай Биньяо	畢業於早稻田大學。 11 的記者， 01 與 02 的成員。 ^⑪
13	蔡珍曜	〔同左〕	Cai Zhengyao	Цай Чжэнья	畢業於東京商科大學。 11 的記者， 02 的成員，蔡炳曜的弟弟。

①「師範學校（Normal College /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колледжа）」更正確的譯法可能是總督府「國語學校」的「師範部」。但世言均云連溫卿只唸到公學校。

②賴維種，臺南商業專門學校畢業（台灣新民報社調查部，1934: 189；林進發，1932: 616）。

③可能即《台灣社會運動史》視為平社成員的「陳傳枝」（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245）。

④白安娜將「張煥珪」記為「張煥娃」，誤。張煥珪畢業於公立臺中中學校，後來進入明治大學就讀（林進發，1932: 570；台灣新民報社，1937: 224；台灣新民報社調查部，1934: 110；興南新聞社，1943: 247）。

⑤可能即《台灣社會運動史》視為平社成員的「吳沛法」（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89a: 245）。

⑥即黃醒民，又名省民。國語學校師範部、早稻田大學專門部政治經濟科畢業（台灣新民報社，1937: 128；興南新聞社，1943: 154）。

⑦謝廉清應就讀於「台中商業學校」。關於謝廉清的研究，詳見本研究第六章，或見邱士杰（2006）。

⑧可能是「李金祿」。日本大學法科畢業（台灣新民報社，1937: 404；興南新聞社，1943: 435）。

⑨應為「黃登洲」，明治大學畢業（興南新聞社，1943: 157）。細節請見正文。

⑩白安娜將「呂磐石」記為「呂盤石」，誤。呂磐石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商科（興南新聞社，1943: 468）。

⑪郭杰與白安娜記為「蔡炳耀」。1922年的《台灣》記為「蔡炳耀」（台灣，1922），《台灣社會運動史》記為「蔡炳曜」（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9b: 27, 163, 338, 357, 366），近年關於蔡惠如的專著《蔡惠如和他的時代》全書記為「蔡炳曜」（謝金蓉，2005）。

18	許乃昌	◎7	◎	◎	●		●	●	◎		●		
19	彭華英				●	●	●		◎				
20	蔡炳 耀〔曜〕					●	●				●★		
21	蔡珍曜										●★		
22	蔡孝乾							●	◎			◎8	
23	林耕餘				●								
24	林堯坤	◎9	◎12	◎10			●					◎11	
25	林瓊樹		◎	◎									
26	林存本			◎									
27	林維金								◎				◎15
28	李金錄										◎		
29	李孝順	◎14	◎	◎									
30	張煥娃				●?		●19				●★19		
31	張我軍		◎										
32	張樂君			◎									
33	張漢樹			◎									
34	張桔梗		◎										
35	張吉敬			◎									
36	張深切								◎				
37	施文杞	◎17			●?								
38	吳沛然 ¹⁸							●19			●★20		
39	陳傳枝							●21			●★22		
40	陳滿盈		◎										
41	甘文芳		◎										
42	高金義											◎23	
43	黃呈聰										◎		
44	黃康榮			◎									
45	黃載鑫			◎									
46	黃 周										◎		
47	洪輯德											◎24	
48	洪輯洽								◎				
49	謝廉清		◎	◎							●★		
50	謝雪紅								◎25				
51	黃登洲										◎26		
52	呂磐石										◎27		
53	游金水	◎28					●						
54	王金章											◎29	
55	鄭進來		◎										
56	鄭雲鵬			◎									
57	羅渭章		◎	◎									
朝鮮人													
58	尹滋英				●	●30	●						

59	呂運亨					●		●											
日本人																			
60	佐野學					●													
61	田口運 藏					●													
62	平林初 之輔					●													
不 明																			
63	王之石					●													
64	一 之					●													
65	扶 雅					●													
66	同 舟					●													
67	白 弓					●													

按：表中「上海台灣人大會」的兩種記載顯示出時間較早的記載異於較晚者（即《台灣社會運動史》），極有可能是後者將前者中的陌生人名改成他們所熟知者。較早的記載也許比較正確。

①該文獻記為「羅豁」、「羅志道」。

②該文獻記為「羅豁」。

③《台灣社會運動史》將卓武初視為朝鮮人，但實際上是廣東人，並是何海鳴所創辦之北京《僑務旬刊》的上海代辦員（外務省記錄，1924c；胡訓珉與賀建，1991：217）。《平平旬刊》曾登載有《僑務旬刊》之廣告，也許正說明了兩份刊物之間的關係。可參見表 4-3：36。

④《台灣社會運動史》謂之從東京逃到上海，並與蔣渭水有密切聯繫。

⑤②該文獻謂連枝旺與高金義負責「總務部」。

⑥②該文獻謂許水與游金水負責「庶務科」。

⑦①該文獻謂許乃昌與施文紀負責「文書科」。

⑧該文獻謂蔡孝乾負責「出版部」。

⑨①該文獻謂其負責「會計科」。

⑩①該文獻記為「林鵬飛」。

⑪②該文獻謂林堯坤與王金章負責「會計部」。

⑫②該文獻謂林維金與洪輯德負責「文書部」。

⑬該文獻記為「張沐真」。

⑭該文獻記為「張煥焯」。

⑮《台灣社會運動史》記為「吳沛法」。但外務省記錄的檔案與郭杰與白安娜所轉述的許乃昌報告均記為「吳沛然」（外務省記錄，1929，1930c）。由於外務省記錄的形成年代較早，可信度較《台灣社會運動史》為高。如果正確記載為「吳沛然」的許乃昌報告是正確的，那末，《台灣社會運動史》所記載的「陳傳枝」恐怕也應改為郭杰與白安娜所轉述「王傳枝」。

⑯該文獻記為「吳沛法」。

⑰該文獻記為「吳沛然」。

⑱該文獻記為「陳傳枝」。

⑲該文獻記為「王傳枝」。

⑳該文獻記為「謝氏阿女」。

㉑該文獻記為「蕈登洲」。

㉒該文獻記為「呂盤石」。

㉓該文獻記為「尹滋英」。

表 6-1：兩條路線

文獻	路線 I	路線 II	選擇
佐野學 (1923c)	「國際的勞動革命」		路線 I
	「社會主義的國際社會」		
	「世界共和國」		
秀湖生(許乃昌) (1923b)	「無產階級運動」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	路線 I
		「建設」資產階級民主主義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	
	「全台灣人的解放」	「特殊階級的解放」	
佐野學 (1924)	「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		路線 I
	「共產主義的日本」		
	「東洋共產主義聯邦」		
	「歐羅巴共產主義聯邦」		
尹蘇野(尹滋英) (1924)	「東洋革命」		路線 I
	「社會革命」		
	「自由的東亞社會」		
真一 (1924b)	「東力〔方〕的社會革命」		路線 I
	「世界革命」		
少峰 (1924)	「社會主義」	「共和」	路線 I
		「民主主義」	
越無(連溫卿) (1924)	「無產階級運動」		路線 I
沫雲(許乃昌) (1924a)	「社會革命」	「資產階級性質的國民革命」	路線 I
	「無產階級運動」	「全民族的國民革命」	
	「社會革命運動」	「國民運動」	
	「第四階段」	「第三階段」	
	「全台灣人的解放」	「特殊階級的解放」	
記者(瞿秋白) (1924)	「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	「資產階級性的民族革命」	路線 II
		「全民族的國民革命」	
	「單純的無產階級時期」	「全民族解放運動時期」	
斯民(范本梁) (1926)	以「弱小民眾(族)的革命運動」實現「無政府共產的社會」		路線 I
	「全世界的平民大革命」		
	「社會大革命」		
	「民眾革命」		

表 7-1：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目錄

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武昌：時中合作書社，1926）

頁數	作者	文章名稱	寫作日期
50	胡南湖	反帝國主義	1925.12.10, 「初稿」
10	許興凱	反帝國主義的教育	
5	熊得山	反帝國主義運動周	
9	王建侯	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時代意識	
7	呂一鳴	反帝國主義與打倒軍閥	
8	林可彝	反帝國主義與東方民族	1925.8.11
34	周敏偶	關稅會議與中國前途	1925.11.20, 「北京」
7	謝廉清（台）	帝國主義的運命	
4	金天友（韓）	怎樣打倒帝國主義	1925.8.8, 「於平大」 ^①
8	郭宗圭	一年來反帝國主義的進展	1925.5.8, 在「南昌青年會暑期學校」的講演 ^②
11	張寧靜	帝國主義的道德觀	
15	胡南湖	五卅事件與反帝國主義運動	
107	李漢石	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反帝國主義大聯盟	1925.12月, 「於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秘書處」

①按原書排為「一五二五」，應為「一九二五」之誤。見該書第 128 頁。金天友是曾經出現在魯迅日記中的人物，他曾在 1925 年 5 月與魯迅來往通信，並曾拜訪魯迅（魯迅，2005b: 564）。雖然今日的魯迅研究仍不知金天友為何（魯迅，2005c: 151），但《反帝國主義》顯示該氏為住在北平的朝鮮人。據日帝時期朝鮮慶尚北道警察部發行的《高等警察要事》一書，金天友是北京天道教一個名為「金弘善」者的雅號。該氏曾牽連於 1923 年底朝鮮革命組織「義烈團」的資金募集事件（慶尚北道警察部，1934: 277-279）。「金弘善」這個名字後仍陸續出現。比方 1925 年 8 月北京「亞細亞民族大同盟」的發起人就有「高麗金弘善」者。該同盟與 1926 年「亞細亞民族會議」有關，本研究第四章提到的台灣人「林耕餘」（見表 4-4: 14）與第七章提到的今日派與反帝大同盟關係人（如林可彝）均有參加（周斌，2006: 130）。另外在朝鮮共產主義運動的史料中，「金弘善」則是 1928 年以來曾任職朝鮮共產黨（火曜派）滿州總局與東滿道的幹部（梶村秀樹與姜德相，1972: 439, 598），並有別名「金洪憲」。朝鮮無政府主義者柳樹人（別名「柳絮」、「友竹」等，1905-1980）則於 1930 年提到：「近年以來，日本人之偵探走狗等在東三省上海北平天津一帶，被革命黨人暗殺者，不知凡幾。其中最著名的偵探被暗殺而在報章上被披露過的，有北平之金達河，金天友，朴容萬，天津之李泰和等。」（友竹〔柳樹人〕，1930: 43）

②按原書排為「一九五二」，應為「一九二五」之誤。見該書第 135 頁。

表 7-2：以《中國青年》與《嚮導週報》為對象的數據統計表

- T：單期刊物的文章總數。
 A：單期刊物中只出現「帝國」二字而無「民族」二字的文章數量。
 B：單期刊物中只出現「民族」二字而無「帝國」二字的文章數量。
 C：單期刊物中同時出現「民族」二字與「帝國」二字的文章數量。
 D：單期刊物中只出現「軍閥」二字而無「民主」二字的文章數量。
 E：單期刊物中只出現「民主」二字而無「軍閥」二字的文章數量。
 F：單期刊物中同時出現「民主」二字與「軍閥」二字的文章數量。

	刊物	期號	T	A	B	C	D	E	F	
1.	嚮導	001	1922.09.13	4	1	0	2	0	0	4
2.	嚮導	002	1922.09.20	4	1	1	2	0	1	2
3.	嚮導	003	1922.09.27	7	1	0	4	2	0	1
4.	嚮導	004	1922.10.04	9	6	0	3	3	1	2
5.	嚮導	005	1922.10.11	8	4	0	2	4	0	0
6.	嚮導	006	1922.10.18	5	0	1	2	1	0	4
7.	嚮導	007	1922.10.25	10	4	1	3	4	0	4
8.	嚮導	008	1922.11.02	10	0	0	7	2	0	2
9.	嚮導	009	1922.11.08	10	1	0	5	5	0	0
10.	嚮導	010	1922.11.15	10	1	0	4	4	0	3
11.	嚮導	011	1922.11.22	8	2	1	5	3	0	1
12.	嚮導	012	1922.12.06	11	3	1	4	5	0	1
13.	嚮導	013	1922.12.23	11	4	1	3	5	0	2
14.	嚮導	014	1922.12.30	9	3	3	2	2	1	1
15.	嚮導	015	1923.1.	5	1	0	2	1	1	1
16.	嚮導	016	1923.01.18	11	2	1	6	2	0	3
17.	嚮導	017	1923.01.24	8	4	1	1	2	0	2
18.	嚮導	018	1923.01.31	6	1	0	3	0	0	2
19.	嚮導	019	1923.02.07	4	2	0	1	3	0	0
20.	嚮導	020	1923.02.27	9	2	1	2	7	0	0
21.	嚮導	021	1923.04.18	9	3	0	4	5	0	1
22.	嚮導	022	1923.04.25	8	1	0	2	3	1	1
23.	嚮導	023	1923.05.02	6	4	0	1	3	0	2
24.	嚮導	024	1923.05.09	12	5	0	1	3	0	4
25.	嚮導	025	1923.05.16	12	3	0	3	4	0	2
26.	嚮導	026	1923.05.23	12	3	0	4	7	0	0
27.	嚮導	028	1923.05.23	16	2	0	1	8	1	1
28.	嚮導	027	1923.05.30	11	6	0	1	5	0	2
29.	嚮導	029	1923.06.13	12	4	1	2	2	0	4

	刊物	期號	T	A	B	C	D	E	F	
30.	嚮導	030	1923.06.20	13	0	1	2	6	0	0
31.	嚮導	031+ 032	1923.07.11	18	4	0	1	12	1	3
32.	嚮導	033	1923.07.18	7	2	0	3	3	1	1
33.	嚮導	034	1923.08.01	14	2	2	2	6	1	2
34.	嚮導	035	1923.08.08	10	5	0	0	6	0	0
35.	嚮導	036	1923.08.15	9	2	1	1	2	1	0
36.	嚮導	037	1923.08.22	13	9	0	0	5	1	0
37.	嚮導	038	1923.08.29	11	3	1	0	3	0	0
38.	嚮導	039	1923.09.08	13	4	1	3	7	0	1
39.	嚮導	040	1923.09.16	10	5	1	1	4	1	0
40.	嚮導	041	1923.09.23	12	4	2	1	5	0	0
41.	嚮導	042	1923.09.30	7	2	1	3	5	0	0
42.	嚮導	043	1923.10.17	11	2	0	2	7	1	0
43.	中青	001	1923.10.20	6	2	0	0	2	0	0
44.	中青	002	1923.10.27	8	1	0	0	4	0	0
45.	嚮導	044	1923.10.27	9	3	1	2	6	0	0
46.	中青	003	1923.11.03	10	1	1	1	4	0	1
47.	嚮導	045	1923.11.07	8	4	1	1	2	0	1
48.	中青	004	1923.11.10	6	0	1	1	2	0	0
49.	嚮導	046	1923.11.16	12	6	0	1	5	0	1
50.	中青	005	1923.11.17	8	1	0	1	4	0	1
51.	中青	006	1923.11.24	5	1	0	0	1	0	0
52.	嚮導	047	1923.11.27	10	6	0	1	4	0	0
53.	中青	007	1923.12.01	8	2	1	0	2	0	0
54.	中青	008	1923.12.	6	0	1	0	1	2	0
55.	嚮導	048	1923.12.12	10	3	0	2	3	1	3
56.	中青	009	1923.12.15	5	0	2	0	2	1	0
57.	嚮導	049	1923.12.19	7	2	2	0	1	1	1
58.	嚮導	050	1923.12.29	6	2	0	0	0	0	1
59.	中青	012	1924.01.05	6	2	1	1	3	0	1
60.	中青	013	1924.01.05	4	1	0	0	1	0	1
61.	嚮導	051	1924.01.09	9	1	1	2	4	0	1
62.	中青	014	1924.01.19	9	0	0	0	3	0	0
63.	嚮導	052	1924.01.20	10	2	0	3	4	1	0
64.	中青	015	1924.01.26	5	0	2	1	0	1	1
65.	中青	016	1924.02.02	6	1	1	2	0	1	2
66.	中青	017	1924.02.09	8	0	1	0	2	0	0
67.	中青	018	1924.02.16	7	0	1	1	2	1	1
68.	嚮導	055	1924.02.20	21	4	0	0	5	1	0
69.	嚮導	053+ 054	1924.02.20	16	1	0	5	3	0	3
70.	中青	019	1924.02.23	4	1	0	1	3	0	0
71.	嚮導	056	1924.02.27	14	4	0	3	7	1	0
72.	中青	020	1924.03.01	5	1	2	0	2	0	0

	刊物	期號	T	A	B	C	D	E	F	
73.	中青	021	1924.03.08	6	1	1	0	1	0	1
74.	中青	022	1924.03.16	5	0	1	0	3	0	0
75.	嚮導	057	1924.03.19	11	2	0	1	5	0	0
76.	中青	023	1924.03.23	5	0	0	0	1	0	0
77.	嚮導	058	1924.03.26	15	2	2	1	4	1	0
78.	嚮導	059	1924.03.26	10	2	0	1	0	0	0
79.	中青	024	1924.03.29	4	2	1	0	3	0	0
80.	嚮導	060	1924.04.02	12	4	0	1	4	0	0
81.	中青	025	1924.04.05	7	0	0	0	3	0	2
82.	中青	026	1924.04.12	5	0	0	0	0	0	0
83.	嚮導	061	1924.04.16	13	3	2	1	4	0	0
84.	中青	027	1924.04.18	4	0	1	2	1	0	0
85.	嚮導	062	1924.04.23	17	1	1	1	3	2	1
86.	中青	028	1924.04.26	11	1	0	0	0	1	0
87.	嚮導	063	1924.04.30	15	2	1	1	3	0	0
88.	中青	029	1924.05.03	6	0	1	1	1	0	0
89.	嚮導	064	1924.05.07	11	3	0	1	2	0	0
90.	中青	030	1924.05.10	6	1	1	0	2	0	0
91.	嚮導	065	1924.05.14	11	2	1	3	3	0	0
92.	中青	031	1924.05.17	5	0	0	2	0	0	1
93.	嚮導	066	1924.05.21	11	2	1	0	4	1	0
94.	中青	032	1924.05.24	6	0	1	1	2	0	0
95.	嚮導	067	1924.05.28	14	4	1	3	3	0	0
96.	中青	033	1924.05.31	7	4	0	0	3	0	1
97.	嚮導	068	1924.06.04	16	0	4	1	4	1	1
98.	中青	034	1924.06.07	8	2	1	1	2	0	1
99.	嚮導	069	1924.06.11	11	3	1	0	7	0	0
100.	中青	035	1924.06.14	4	1	1	1	3	1	0
101.	嚮導	070	1924.06.18	8	1	0	3	2	0	0
102.	嚮導	071	1924.06.18	14	3	0	1	5	0	1
103.	中青	036	1924.06.21	13	1	1	1	2	0	1
104.	中青	037	1924.06.28	4	0	1	2	0	0	1
105.	嚮導	072	1924.07.02	12	2	0	3	3	1	0
106.	中青	038	1924.07.05	10	2	2	3	2	0	1
107.	嚮導	073	1924.07.09	17	6	0	2	3	1	0
108.	中青	039	1924.07.12	8	0	0	0	0	0	1
109.	嚮導	074	1924.07.16	8	2	0	4	1	1	1
110.	中青	040	1924.07.19	9	1	1	1	2	0	1
111.	中青	041	1924.07.19	6	1	2	0	0	0	1
112.	嚮導	075	1924.07.23	13	2	2	3	5	0	0
113.	嚮導	076	1924.07.30	6	2	1	3	3	0	1
114.	嚮導	077	1924.08.06	11	2	0	1	2	0	0
115.	嚮導	078	1924.08.13	3	0	0	3	1	1	1
116.	嚮導	079	1924.08.20	9	5	2	0	4	0	0
117.	嚮導	080	1924.08.27	15	2	3	3	5	3	0

	刊物	期號	T	A	B	C	D	E	F	
118.	中青	042	1924.08.30	6	0	0	1	3	0	0
119.	嚮導	081	1924.09.03	5	0	0	5	3	0	1
120.	中青	043	1924.09.06	6	2	0	3	2	0	2
121.	嚮導	082	1924.09.10	5	3	0	2	3	0	2
122.	中青	044	1924.09.13	4	0	1	2	1	1	1
123.	嚮導	083	1924.09.17	6	3	0	2	4	0	1
124.	中青	045	1924.09.20	4	1	0	0	2	0	0
125.	嚮導	084	1924.09.24	7	4	0	1	6	0	0
126.	中青	046	1924.09.27	4	1	0	2	1	1	0
127.	嚮導	085	1924.10.01	11	8	0	2	6	0	1
128.	中青	047	1924.10.04	5	0	0	2	0	0	1
129.	嚮導	086	1924.10.08	3	2	0	1	1	1	1
130.	中青	048	1924.10.11	5	2	0	1	5	0	0
131.	嚮導	087	1924.10.15	14	10	0	1	8	1	1
132.	中青	049	1924.10.18	7	3	0	2	5	0	1
133.	中青	050	1924.10.18	5	3	0	1	3	0	0
134.	嚮導	088	1924.10.22	6	3	0	2	4	0	0
135.	嚮導	089	1924.10.29	7	4	0	3	5	0	1
136.	中青	051	1924.11.01	5	0	1	3	1	0	1
137.	嚮導	090	1924.11.07	5	1	0	4	1	1	1
138.	中青	052	1924.11.08	7	1	1	4	0	2	2
139.	嚮導	091	1924.11.12	6	4	0	2	4	0	0
140.	中青	053	1924.11.15	6	1	0	1	1	0	0
141.	嚮導	092	1924.11.19	6	4	0	2	6	0	0
142.	中青	054	1924.11.22	8	0	0	3	2	0	0
143.	中青	055	1924.11.29	7	1	1	2	4	0	0
144.	嚮導	093	1924.12.03	7	6	0	0	2	0	0
145.	中青	056	1924.12.06	6	1	0	3	2	0	0
146.	嚮導	094	1924.12.10	7	6	0	1	4	0	1
147.	中青	057	1924.12.13	6	1	0	1	1	0	2
148.	嚮導	095	1924.12.17	7	4	0	1	2	0	4
149.	中青	058	1924.12.20	6	2	0	1	3	0	0
150.	中青	010	1924.12.22	6	0	1	0	2	0	0
151.	嚮導	096	1924.12.24	9	2	0	5	3	0	1
152.	中青	059	1924.12.27	10	1	0	1	2	0	2
153.	中青	011	1924.12.29	8	1	1	0	3	0	0
154.	嚮導	097	1924.12.31	6	3	0	3	4	0	1
155.	中青	060	1925.01.03	9	4	0	3	3	0	1
156.	嚮導	098	1925.01.07	5	3	0	2	3	0	1
157.	中青	061	1925.01.10	12	4	1	1	3	1	0
158.	中青	110	1925.01.16	7	4	0	3	2	2	2
159.	中青	062	1925.01.17	9	1	1	0	2	0	1
160.	嚮導	099	1925.01.21	5	0	0	4	2	1	0
161.	嚮導	100	1925.01.28	5	4	0	1	4	0	0
162.	中青	112	1925.01.30	6	1	0	5	2	0	2

	刊物	期號		T	A	B	C	D	E	F
163.	中青	063+ 064	1925.01.31	8	4	1	3	0	2	4
164.	中青	065	1925.02.07	9	0	0	0	2	1	0
165.	嚮導	101	1925.02.07	7	2	0	3	5	0	1
166.	中青	066	1925.02.14	7	0	0	4	2	0	1
167.	嚮導	102	1925.02.14	7	1	0	3	5	1	1
168.	中青	114	1925.02.20	7	2	0	3	2	0	1
169.	中青	067	1925.02.21	6	1	1	1	2	1	0
170.	嚮導	103	1925.02.21	12	1	0	4	2	0	2
171.	中青	068	1925.02.28	9	1	0	0	1	0	0
172.	嚮導	104	1925.02.28	6	3	0	3	5	0	0
173.	中青	069	1925.03.07	7	1	2	4	3	0	0
174.	嚮導	105	1925.03.07	10	2	0	2	6	0	0
175.	中青	070	1925.03.14	9	1	0	2	3	0	0
176.	嚮導	106	1925.03.14	17	3	0	2	3	0	0
177.	中青	071	1925.03.21	5	0	0	4	4	0	0
178.	嚮導	107	1925.03.21	9	1	0	7	5	0	2
179.	中青	072	1925.03.28	9	1	0	2	3	0	0
180.	嚮導	108	1925.03.28	6	4	0	2	2	1	0
181.	中青	073	1925.04.04	5	2	0	1	2	0	0
182.	嚮導	109	1925.04.05	16	4	0	4	3	0	2
183.	中青	074	1925.04.11	8	1	0	2	2	0	1
184.	嚮導	110	1925.04.12	6	3	0	3	3	1	0
185.	中青	075	1925.04.18	6	1	0	2	2	0	0
186.	嚮導	111	1925.04.19	11	2	1	4	2	0	1
187.	中青	076	1925.04.25	7	2	0	2	1	1	0
188.	嚮導	112	1925.04.26	10	2	0	5	4	2	1
189.	中青	077+ 078	1925.05.02	4	1	0	3	2	1	0
190.	嚮導	113	1925.05.03	5	2	0	3	1	1	2
191.	中青	079	1925.05.09	6	2	0	1	2	0	2
192.	嚮導	114	1925.05.10	16	3	0	4	3	1	1
193.	中青	080	1925.05.16	7	5	0	0	3	0	0
194.	嚮導	115	1925.05.17	6	4	0	1	4	1	0
195.	中青	081	1925.05.23	5	3	0	2	2	0	0
196.	嚮導	116	1925.05.24	7	5	0	2	5	0	0
197.	嚮導	117	1925.06.06	6	1	0	5	2	0	0
198.	嚮導	118	1925.06.20	7	2	0	5	5	0	1
199.	嚮導	119	1925.06.22	0	0	0	0	0	0	0
200.	嚮導	120	1925.07.02	5	1	0	4	5	0	0
201.	嚮導	121	1925.07.16	5	1	0	3	3	0	1
202.	中青	082	1925.07.18	5	1	0	1	1	0	0
203.	中青	083	1925.07.23	6	3	1	2	2	0	0
204.	中青	084	1925.07.25	6	1	1	3	2	0	1
205.	嚮導	122	1925.07.26	5	0	2	3	2	0	0

	刊物	期號	T	A	B	C	D	E	F	
206.	中青	085	1925.07.28	7	2	1	3	2	0	0
207.	中青	086	1925.08.01	5	2	0	1	2	0	1
208.	中青	087	1925.08.08	6	2	1	1	2	1	0
209.	中青	088	1925.08.08	5	2	0	3	3	0	2
210.	嚮導	123	1925.08.10	7	3	0	2	3	0	0
211.	嚮導	124	1925.08.15	5	0	0	4	3	0	0
212.	嚮導	125	1925.08.18	5	0	0	5	4	0	1
213.	中青	089	1925.08.22	4	0	0	3	1	0	1
214.	嚮導	126	1925.08.23	8	1	0	3	3	1	0
215.	中青	090	1925.08.25	7	2	0	3	2	1	1
216.	嚮導	127	1925.08.31	5	0	0	5	4	1	0
217.	中青	091+	1925.09.01	8	0	0	6	3	0	2
		092								
218.	嚮導	128	1925.09.07	7	0	0	6	1	0	3
219.	中青	093+	1925.09.07	7	1	0	6	2	0	3
		094								
220.	嚮導	129	1925.09.11	6	0	0	2	3	0	1
221.	中青	095	1925.09.14	4	1	0	3	1	1	0
222.	嚮導	130	1925.09.18	4	2	0	2	3	0	0
223.	中青	096	1925.09.21	5	2	0	1	2	0	0
224.	嚮導	131	1925.09.25	13	4	0	4	7	0	0
225.	中青	097	1925.09.28	6	2	0	3	4	0	0
226.	中青	098	1925.09.28	5	2	0	2	2	0	1
227.	中青	099	1925.09.28	5	1	0	3	2	0	1
228.	嚮導	132	1925.10.05	4	1	0	3	3	0	0
229.	中青	100	1925.10.10	8	3	0	4	4	0	2
230.	嚮導	133	1925.10.12	4	1	0	3	3	0	1
231.	嚮導	134	1925.10.30	10	3	0	3	4	1	2
232.	中青	101	1925.11.07	18	4	1	4	6	1	2
233.	嚮導	135	1925.11.07	3	0	0	3	1	0	0
234.	嚮導	136	1925.11.21	4	0	0	4	3	0	0
235.	中青	102	1925.11.24	11	4	0	3	7	1	1
236.	中青	103	1925.11.28	9	2	1	4	3	1	2
237.	嚮導	137	1925.12.03	4	1	0	3	3	0	1
238.	中青	104	1925.12.06	7	3	0	3	5	0	2
239.	嚮導	138	1925.12.10	11	5	0	2	2	1	2
240.	中青	105	1925.12.12	7	2	0	4	2	0	3
241.	中青	106	1925.12.19	11	4	0	4	4	1	1
242.	嚮導	139	1925.12.20	5	1	0	4	1	0	3
243.	中青	107	1925.12.26	10	5	0	3	4	1	1
244.	嚮導	140	1925.12.30	5	1	0	3	3	0	2
245.	中青	108	1926.01.02	10	3	0	7	7	1	0
246.	嚮導	141	1926.01.07	4	2	0	1	2	1	1
247.	中青	109	1926.01.09	9	1	0	3	7	0	2
248.	嚮導	142	1926.01.14	6	2	0	4	3	0	1

	刊物	期號	T	A	B	C	D	E	F	
249.	嚮導	143	1926.01.21	6	4	0	2	5	0	1
250.	中青	111	1926.01.23	9	3	1	2	3	0	1
251.	嚮導	144	1926.02.03	10	1	0	4	6	0	1
252.	中青	113	1926.02.06	7	2	0	4	4	1	0
253.	嚮導	145	1926.02.10	11	4	0	4	7	0	0
254.	中青	115	1926.02.27	6	1	0	5	4	0	0
255.	中青	116	1926.03.13	6	3	0	3	4	0	1
256.	中青	117	1926.03.13	5	1	0	4	4	1	0
257.	嚮導	146	1926.03.17	5	1	1	3	4	0	0
258.	嚮導	147	1926.03.27	8	2	0	4	6	0	0
259.	中青	118	1926.04.03	8	0	0	7	6	0	1
260.	嚮導	148	1926.04.03	11	3	0	8	6	0	2
261.	嚮導	149	1926.04.13	12	1	1	5	7	0	2
262.	嚮導	150	1926.04.23	4	1	0	3	2	0	2
263.	中青	119	1926.04.24	6	3	0	1	2	0	0
264.	嚮導	151	1926.05.01	14	3	0	7	6	2	1
265.	嚮導	152	1926.05.08	9	1	0	4	5	0	1
266.	嚮導	153	1926.05.15	11	4	1	3	1	0	2
267.	中青	120	1926.05.22	6	1	0	4	4	0	0
268.	嚮導	154	1926.05.22	15	2	1	1	2	0	0
269.	中青	121	1926.05.30	9	1	1	7	5	0	2
270.	嚮導	155	1926.05.30	9	0	1	6	5	0	0
271.	嚮導	156	1926.06.03	4	0	0	4	2	0	2
272.	中青	122	1926.06.06	6	1	0	4	3	0	2
273.	嚮導	157	1926.06.09	6	1	0	4	3	1	1
274.	中青	126	1926.06.10	11	3	1	0	2	1	0
275.	中青	123	1926.06.13	8	4	1	1	4	1	0
276.	嚮導	158	1926.06.16	13	1	0	5	7	1	0
277.	中青	124	1926.06.20	8	3	0	1	4	0	0
278.	嚮導	159	1926.06.23	15	6	0	3	5	0	0
279.	嚮導	160	1926.06.30	16	4	2	3	8	0	0
280.	中青	125	1926.07.03	6	2	0	1	3	0	0
281.	嚮導	161	1926.07.07	10	4	0	2	6	0	0
282.	嚮導	162	1926.07.14	7	3	0	3	3	0	3
283.	嚮導	163	1926.07.14	1	0	0	1	0	0	0
284.	中青	127	1926.07.17	9	2	1	1	1	1	1
285.	嚮導	164	1926.07.21	8	5	0	0	4	0	0
286.	中青	128	1926.07.24	11	5	0	1	4	0	0
287.	嚮導	165	1926.07.28	9	4	0	1	4	0	0
288.	嚮導	166	1926.08.06	8	2	0	5	5	0	0
289.	中青	129	1926.08.07	7	3	1	1	5	0	0
290.	嚮導	167	1926.08.15	6	3	0	2	4	0	0
291.	中青	130	1926.08.20	12	4	0	4	4	0	2
292.	嚮導	168	1926.08.22	11	4	1	0	4	0	0
293.	嚮導	169	1926.08.29	6	1	0	2	3	0	1

	刊物	期號		T	A	B	C	D	E	F
294.	中青	131+ 132	1926.08.31	15	6	1	4	8	1	1
295.	中青	133	1926.09.07	8	1	0	6	4	0	2
296.	嚮導	170	1926.09.10	6	3	0	3	5	0	1
297.	嚮導	171	1926.09.20	8	4	0	3	6	0	1
298.	中青	134	1926.09.21	11	3	0	4	3	1	2
299.	嚮導	172	1926.09.25	15	5	0	2	3	0	1
300.	中青	135	1926.09.28	10	2	0	5	5	0	2
301.	中青	136	1926.10.05	8	4	0	1	4	0	2
302.	嚮導	173+ 174	1926.10.10	5	1	0	4	4	0	0
303.	嚮導	175	1926.10.12	19	6	0	5	7	1	1
304.	中青	137	1926.10.15	6	2	0	4	4	1	1
305.	中青	138	1926.10.	8	3	0	3	5	0	2
306.	嚮導	176	1926.10.19	14	2	1	2	5	1	2
307.	嚮導	179	1926.10.25	17	4	0	2	7	0	2
308.	中青	139	1926.11.01	6	1	0	5	2	2	1
309.	中青	140	1926.11.	8	1	0	2	2	0	1
310.	中青	141	1926.11.	11	2	0	2	4	1	1
311.	嚮導	177	1926.11.04	21	5	1	2	4	0	1
312.	嚮導	178	1926.11.15	16	3	0	5	8	0	1
313.	中青	142	1926.11.22	8	3	0	3	3	1	1
314.	中青	143	1926.11.25	8	3	0	2	3	1	0
315.	嚮導	180	1926.12.05	16	3	0	2	2	2	2
316.	中青	144	1926.12.06	7	2	1	0	2	2	1
317.	中青	145+ 146	1926.12.20	9	3	1	2	4	1	2
318.	中青	147	1926.12	7	1	0	2	2	0	2
319.	中青	148	1927.01.01	8	1	0	6	6	0	1
320.	嚮導	181	1927.01.06	5	0	0	3	2	0	1
321.	中青	149	1927.01.08	6	1	0	3	3	0	0
322.	嚮導	182	1927.01.11	4	1	0	2	0	0	2
323.	中青	150	1927.01.15	5	2	0	3	1	2	2
324.	嚮導	183	1927.01.17	12	0	0	3	3	0	1
325.	嚮導	184	1927.01.21	6	2	0	4	2	0	2
326.	中青	151	1927.01.22	7	3	0	2	2	1	1
327.	嚮導	185	1927.01.27	19	3	0	3	4	1	1
328.	中青	152	1927.01.29	7	2	0	3	3	0	2
329.	嚮導	186	1927.01.31	10	5	0	2	5	0	1
330.	嚮導	187	1927.02.07	17	2	0	4	6	1	2
331.	中青	153+ 154	1927.02.12	20	4	0	4	7	1	1
332.	嚮導	188	1927.02.16	16	7	0	2	4	1	1
333.	中青	155	1927.02.19	8	2	0	3	3	1	1
334.	中青	156	1927.02?	0	0	0	0	0	0	0
335.	嚮導	189	1927.02.28	16	4	0	5	2	1	4

	刊物	期號	T	A	B	C	D	E	F	
336.	中青	157	1927.03?	0	0	0	0	0	0	
337.	嚮導	190	1927.03.06	16	5	0	3	5	0	
338.	中青	158	1927.03.12	11	5	0	3	5	0	
339.	嚮導	191	1927.03.12	15	6	1	0	4	1	
340.	嚮導	192	1927.03.18	14	9	0	2	4	0	
341.	中青	159	1927.03.19	6	3	0	1	2	0	
342.	中青	160	1927.03.26	11	7	0	2	3	0	
343.	嚮導	193	1927.04.06	14	5	0	2	5	0	
344.	嚮導	194	1927.05.01	6	1	0	5	2	0	
345.	嚮導	195	1927.05.08	10	6	0	4	3	0	
346.	中青	161+	1927.05.30	7	3	0	4	3	1	3
		162								
347.	嚮導	196	1927.05.31	9	4	0	4	3	1	
348.	嚮導	197	1927.06.08	7	3	0	2	5	0	
349.	中青	163+	1927.06.13	12	5	1	4	5	2	4
		164								
350.	嚮導	198	1927.06.15	7	1	0	4	3	0	
351.	中青	165	1927.06.20	8	3	0	0	4	0	
352.	嚮導	199	1927.06.22	6	0	0	0	0	1	
353.	中青	166	1927.06.25	7	3	0	1	5	0	
354.	中青	167	1927.06.30	8	2	0	1	5	1	
355.	嚮導	200	1927.07.08	14	2	0	4	2	2	
356.	嚮導	201	1927.07.18	3	2	0	1	0	1	
357.	中青	㉔	1927.10.10	7	2	0	1	7	0	

①之所以關鍵字不採用「帝國主義」而用「帝國」，是因為兩者誤差很少。《嚮導》只有十篇出現「帝國」二字的文章沒有「帝國主義」一語，《中國青年》則只有七篇出現這同樣情形。而這些有「帝國」卻沒有「帝國主義」的文章，如果不是使用「帝國資本主義」一語，就是內文已經與帝國主義有關。故本研究採用「帝國」為關鍵字，而不以「帝國主義」為關鍵字。其餘關鍵字（「民主」、「民族」、「軍閥」）的狀況也類似。

②表示合刊，以下同。

③表示目前尚未尋獲該期，以下同。

④第八卷第三期。

表 8-1：〈蠹魚的旅行日記〉結構簡表

連載期	內容	補充說明	行程
1	黃希純引言	寫於 1924.11.12	
2-3	見面話		
3-4	我旅行底希望		
5-8	(1924.4.26)	日期按文章內容推定。	都在在前往日本的船上。30 日登岸後，從神戶到東京
9-16	1924.4.27, 晴		
16-21	1924.4.29, 晴	缺第 17 回	
21-30	1924.4.30, 晴		
31-38	1924.5.1, 晴		
39-47	1924.5.2, 晴天	缺第 44、47 回	參與東京的五一節遊行 在東京展開訪問行程
48-58	1924.5.3, 雨天	報紙誤排為「五月二日」。	
58-66	1924.5.4, 晴天	第 63 回後段誤貼至第 68 回之後	
66-73	1924.5.5, 晴天	第 68 回後段缺	
73-78	1924.5.6, 晴天		為日本世界語學會而續留於東京
78-81	1924.5.7, 晴天	報紙將連載第「78」回重複二期。	
82-93	無法判別日期	缺第 82、86、88 回；第 85、87 回依次貼於 91 之後	
93-96	1924.5.12, 晴天		
97-98	1924.5.13, 晴天		
98-101	1924.5.14, 晴天		訪問山川夫婦與返台
102-104	(疑 1924.5.15)	缺第 102 回	
104	1924.5.16, 晴天	報紙誤排為「九月十六日」。	
105	1924.5.17-20, 完		

表 8-2：〈蠹魚的旅行日記〉與連溫卿後續文章之關係略表

討論課題	〈日記〉所刊回數	後續相關文章
論日本的生殖器崇拜傳統殘存於公園中所供奉之佛像	第 78 回	連溫卿 (1954b)
台灣出現不良少年少女的問題	第 94、95、96 回	連溫卿 (1925b, c)、史可乘〔連溫卿〕(1954)。 ^❶
論諸種婚姻結合概念(「牽手」、「接竹篙」、「灣妻」、「鮮妻」), 離婚與自殺問題, 賣淫與私娼私生子問題	第 68、69、70、71、72、73、92 回	連溫卿 (1924a, 1925a)、溫・連〔連溫卿〕(1926a)、連溫卿 (1943, 1954d)。
論階級鬥爭與進化論的異同	第 75、76 回	連溫卿 (1925b)。
論蘇維埃政權與各國社會運動之關係	第 97、98 回	溫・連〔連溫卿〕(1926b)。
論「言語的社會性質」	第 99、100 回	連溫卿 (1924b)。
論社會進化可以飛躍以及台灣急遽地資本主義化	第 40 回	溫・連〔連溫卿〕(1926c, d)。

❶連溫卿以「史可乘」為名撰寫的〈人類之家・台灣 ESP 學會〉一文，是筆者目前所能尋得的、由連溫卿親自總結台灣世界語運動史的唯一一篇論文。但連溫卿可能早在 1936 年於 *La Revue Orienta* 發表的〈台灣 에스ぺ란ト運動の回顧〉一文中便已說明。唯筆者迄今仍無法取得此文，僅在若林正丈所撰文中見其引用（若林正丈，1979: 85）。

徵引書目

以下書目依據英文字母順序排列。書目首字為漢字者，以漢語拼音排序。首字為韓文或日語假名者，以該語拼音排序。首字為俄語字母者，以羅馬化列入排序。凡沒有註明作者的書目，以下均代擬作者，以利排序。但均標註*號以示其為代擬。

A

- Amin, S. (1974).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A 氏 (1923a)。〈臺灣の同志より・その一〉(1923年4月5日)。收錄於：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附錄頁12-15)。東京：水曜會出版部。
- A 氏 (1923b)。〈臺灣の同志より・その二〉(1923年4月19日)。收錄於：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附錄頁15-16)。東京：水曜會出版部。
- 阿鳳〔賀威聖〕(1924a)。〈上狗法的當〉。《平平旬刊》，創刊號(上海)，16。
- 阿鳳〔賀威聖〕(1924b)。〈至死不悟〉。《平平旬刊》，第4期(上海)，8。
- 阿鳳〔賀威聖〕(1924c)。〈趕走直腳鬼〉。《平平旬刊》，第6期(上海)，1-3。
- 阿鳳〔賀威聖〕(1924d, 06/11)。〈平平旬刊阿鳳君來信〉。《婦女週報》(上海)，6-7。
- 愛智(1925)。〈新老子的政治哲學〉。《台灣新青年》，創刊號(廈門)，27-34。
- 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9)。〈徐介藩〉。收錄於：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安徽省志·人物志》(頁197-198)。北京：方志出版社。
- 奧村哲(2004)。〈序に代えて——日本における近現代中国の社会構成体論と社会主義体制観〉。收錄於：奧村哲，《中国の資本主義と社会主義：近現代史像の再構成》。東京：櫻井書店。

B

- Balibar, É. (2001)。〈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李其慶等譯)。收錄於：É. B. Louis Althusser, 《讀《資本論》》(頁243-383)。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Belogurova, A. (2003).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intern (1928-1931)*.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 Ben Fine, L. H. (1993)。《重讀《資本論》》(魏墳等譯)。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
- B 氏 (1923)。〈臺灣の同志より・その三〉(1923年4月27日)。收錄於：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附錄頁15-16)。東京：水曜會出版部。
- 白堅武(1992)。《白堅武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柏克(1977)。〈簡評「台灣時代」的發刊詞〉。《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歐洲分會會刊·鄉訊》，1977

- 年5月號(奧地利), 24-25。
- 柏也(1982)。〈論台灣革命的阿爾巴尼亞派——兼評台灣時代社〉。《台獨季刊》, 第2期(Kearny NJ), 55-60。
- 坂井洋史與嵯峨隆(編)。(1994)。《原典中國アナキズム史料集成》「解題・總目次」。東京: 綠蔭書房。
- 包惠僧(1983)。《包惠僧回憶錄》。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北京廉清〔謝廉清〕(1924, 03/21)。〈〔雜錄〕對於今年暑假的希望〉。《台灣民報》(東京), 12。
- 北京廉清虛無〔謝廉清〕(1924, 03/21)。〈〔雜錄〕若廢姓則如何〉。《台灣民報》(東京), 10。
- 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室(2006)。〈參事介紹〉擷取於2007/03/02, 來自:
<http://www.bjcss.gov.cn/fore/csjs/viewcs.asp?cscol=csjs&memid=287>
- 貝原たい(1923)。〈山口小静さんの思出〉。收錄於: 水曜會出版部(編), 《匈牙利的勞農革命》(附錄頁3-5)。東京: 水曜會出版部。
- 本刊(1974)。〈本刊聲明〉。《台灣人民》, 第9期(法國), 1-5。
- 本刊評論員(1973a)。〈〔社論〕國台合作與台灣新民主主義革命〉。《台灣人民》, 第6期(Halifax), 1-5。
- 本刊評論員(1973b)。〈〔社論〕再論國台合作與台灣新民主主義革命〉。《台灣人民》, 第7期(Halifax), 1-4。
- 本刊評論員(1974)。〈論無產階級聯合〉。《台灣人民》, 第9期(法國), 6-8。
- 本刊資料室(1991)。〈世界與台灣及中國日本國際語運動史〉。《綠蔭》, 創刊號(東京), 9-20。
- 比嘉春潮(1971)。〈薩摩統治下的沖繩農民〉(1970.1.1)。收錄於: 比嘉春潮, 《比嘉春潮全集》(第2卷, 頁295-299)。那霸: 沖繩タイムズ。
- 比嘉春潮(1997)。《沖繩の歲月——自傳的回想から》。東京: 日本圖書センター。
- 布施勝治(1926)。《ソウエート東方策》。北京: 燕塵社。
- 布施勝治(1927)。《蘇俄的東方政策》(半粟譯)。上海: 太平洋書店。

C

- Callinicos, A. (2007). The Drama of Revolution and Reaction: Marxist History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C. Wickham (Ed.), *Marxist History-Writ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 158-17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4).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4)*. Retrieved 2007/3/24, from <http://ricci.rt.usfca.edu/institution/view.aspx?institutionID=227>
- Cohen, P. A. (1997). *History in Three Key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 Cohen, P. A. (2005)。《歷史三調: 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杜繼東譯)。上海: 江蘇人民出版社。
- 「初期コミンテルンと東アジア」研究会(編)。(2007)。《初期コミンテルンと東アジア》。東京: 不二出版。
- 蔡和森(1982)。〈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1926)。收錄於: 中央檔案館(編), 《中共黨史報告選編》(頁1-76)。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 蔡培火與陳逢源等(1983)。《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 自立晚報社。
- 蔡孝乾(1970)。《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台北: 中共研究雜誌社。
- 蔡依伶(2004)。〈理論陳映真與小說陳映真〉。《印刻文學生活誌》, 第12期(台北), 79。
- 參謀本部(1925, 10/01)。〈北京ニ於ケル主要思想団体〉。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A03023733600, 《各種情報資料・参情報》(4.3.2) (国立公文書館)。
- 曹世鉉(2003)。《清末民初無政府派的文化思想》。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曹世鉉(2005)。〈東亞三國(韓、中、日)無政府主義的比較〉。《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2月號(湖南)，53-58。
- 長野明(1927)。《支那の反帝國主義運動》。東京：行地社出版部。
- 長野明(1940)。《支那事典》。東京：建設社。
- 超麟〔鄭超麟〕(1924)。〈醒獅派的國家主義〉。《中國青年》，第72期(上海)，332-338。
- 陳彬蘇(1928)。〈十七、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過去〉。收錄於：陳彬蘇，《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頁121-130)。上海：世界書局。
- 陳獨秀(1922, 09/20)。〈造國論〉。《嚮導週報》(上海)，合訂本頁9-10。
- 陳獨秀(1924a, 07/23)。〈反帝國主義運動聯盟〉。《嚮導週報》(上海)，合訂本頁598。
- 陳獨秀(1924b)。〈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新青年》，季刊第4期(上海)，15-22。
- 陳獨秀(1979)。〈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1923.12.1)。收錄於：人民出版社(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冊，頁26-36)。北京：人民出版社。
- 陳獨秀(1981)。〈中共中央執委會書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22.6.30)。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一九二二—一九二六年)》(頁1-9)。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 陳獨秀(1989)。〈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3.6)。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頁167-173)。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 陳獨秀等八十一人(1983)。〈我們的政治意見書〉(1929.12.15)。收錄於：彭述之，《彭述之選集》(第1卷，頁305-335)。香港：十月出版社。
- 陳惇(編)。(2003)。《西方文學史》(第3卷)。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 陳芳明(1991)。《謝雪紅評傳：落土不凋的兩夜花》。台北：前衛出版社。
- 陳芳明(1998)。《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社。
- 陳芳明(2004)。《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出版社。
- 陳河石〔左雄〕。〈建立革命的自由主義運動〉。《海外政論》，第4期(New York)，2-4。
- 陳佳宏(1998)。《海外台獨運動史：美國台獨團體之發展與挑戰：50年代中至90年代中》。台北：前衛出版社。
- 陳金龍(1996)。〈「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過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北京)，227-231。
- 陳銘城(1992)。〈十三、日本台獨左派——史明與朱世紀〉。收錄於：陳銘城，《海外台獨運動四十年》(頁73-79)。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
- 陳其人(2005)。〈理察德·坎蒂隆的經濟思想——一種從分析土地關係開始研究社會經濟的理論〉。收錄於：陳其人，《陳其人文集——經濟學爭鳴與拾遺卷》(頁489-450)。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陳信行(2008)。〈一個臺灣人的毛派之路：回應「新民主主義者」陳明忠先生〉。《思想》，第10期(台北)，271-290。
- 陳雪嶺(1998)。〈《閒話揚州》與作者易君左其人〉。《民國春秋》，第4期(南京)。
- 陳映真(1977)。〈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仙人掌雜誌》，第1卷第5號(台北)，65-78。
- 陳映真(1989)。〈因為在民眾中有真理：韓國社會構成體性質的論戰和韓國社科界的英姿〉。《人間》，1989年6月號(台北)，123-127。
- 陳映真(1992a)。〈祖國：追求·喪失與再發現——戰後臺灣資本主義階段的民族主義〉。《海峽評論》，第21期(台北)，21-37。
- 陳映真(1992b)。〈台灣現代文學思潮之演變〉。《中華雜誌季刊》，第31年總1期(台北)，122-154。
- 陳映真(1994)。〈帝國主義者和後殖民地精英：評李總統和司馬遼太郎的對談(下)〉。《海峽評論》，第43期(台北)，42-47。
- 陳映真(1995a)。〈臺獨批判的若干理論問題：對陳昭瑛「論臺灣的本土化運動」之回應〉。《海峽評論》，第52期(台北)，30-38。

- 陳映真(1995b)。〈省籍、統獨都是「假問題」——總評臺灣幾個關鍵問題〉。《財訊》，第154期(台北)，78-87。
- 陳映真(1997)。〈向內戰·冷戰意識形態挑戰——七〇年代臺灣文學論爭在臺灣文藝思潮史上劃時代的意義〉。《聯合文學》，第158期(台北)，57-76。
- 陳映真(1999)。〈七十年代黃春明小說中的新殖民主義批判意識——以《莎啞娜啦·再見》、《小寡婦》和《我愛瑪莉》為中心〉。《文藝理論與批評》，1999年2月號(北京)，89-101。
- 陳映真(2000)。〈資產階級的辦公室和代理人〉。《勞動前線》，第31期「2000年五一勞動節特刊」(台北)，5-7。
- 陳映真(2002a)。(序)。收錄於：杜繼平，《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統獨問題的上下求索》(頁1-23)。台北：人間出版社。
- 陳映真(2002b)。(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收錄於：許南村(編)，《反對言偽而辯》(頁7-48)。台北：人間出版社。
- 陳映真(2002c)。(如炬的目光——讀蘇新先生遺稿《談台灣解放問題》)。《左翼》，第27號(台北)，10-14。
- 陳映真(2003)。(李友邦的殖民地台灣社會性質論與台共兩個綱領及「邊陲部資本主義社會構造體論」的比較考察)(1992)。收錄於：嚴秀峰(編)，《紀念李友邦先生論文集》(頁45-78)。台北：世界綜合出版社。=>
- 陳映真(2005, 11/20)。(東望雲天：紀念劉進慶教授)。《聯合報》(台北)，E7。
- 陳映真(2006)。(文明與野蠻的辯證——龍應台女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商榷)。收錄於：陳映真(編)，《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28：文學與歷史」(頁124-140)。台北：人間出版社。
- 陳映真(編)。(2001)。(《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因為是祖國的緣故…」)。台北：人間出版社。
- 陳映真與戴國輝(1988)。(「台灣人意識」與「台灣民族」——戴國輝與陳映真於愛荷華對談)(1984)。收錄於：陳映真，《思想的貧困》(頁147-184)。台北：人間出版社。
- 陳映真與劉進慶(1988)。(台灣經濟發展的虛相與實相——訪劉進慶教授)(1987)。收錄於：陳映真，《石破天驚》(頁177-192)。台北：人間出版社。
- 晨報*(1923, 07/05)。(北京朝陽大學招生)。《晨報》(北京)，1。
- 晨報*(1924, 07/28)。(反帝國主義聯盟招待新聞界情形)。《晨報》(北京)，7。
- 程玉海(1987)。(共產國際統一戰線策略演進的曲折性及其原因)。《國際共運史研究》，第2輯(1987, 北京)，67-79。
- 赤人(1921, 05/25)。(破壞學生會的卑劣手段)。《覺悟》(上海)，4。
- 赤人(1924)。(中俄交涉破裂的原因)。《平平旬刊》，第2期(上海)，1-3。
- 初民(1922)。(我對於陳仲甫派變更態度的批評)。《今日》，第2卷第4號(北京)，7-12。
- 春發(1974)。(中國實行新民主主義政策的經驗——倒蔣統一戰線上指靠誰、團結誰、打擊誰的問題)。《台灣人民》，第9期(Halifax)，9-23。
- 春雷(1923a)。(國內同志消息)。《春雷》，第1卷第1期(廣州)，133-135。
- 春雷(1923b)。(同志消息)。《春雷》，第1卷第2期(廣州)，7-14。
- 春雷(1924)。(新刊介紹)。《春雷》，第3期(廣州)，112-114。
- 崔紅軍等(1981)。(回憶爸爸崔曉立烈士)。《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18輯(浙江)，44-54。
- 村田陽一(編譯)。(1981)。(《コミンテルン資料集》(第4卷)。東京：大月書店。
- 村田陽一(編譯)。(1986)。(《資料コミンテルンと日本》(第1-3卷)。東京：大月書店。
- 村田陽一(編譯)。(1987)。(《コミンテルン資料集》(第2卷)。東京：大月書店。
- 村田陽一(編譯)。(1993)。(《資料集・初期日本共産党とコミンテルン》。東京：大月書店。
- 瑤峨隆(1994)。(《近代中国アナキズム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
- 郝志群(編)。(2000)。(《北京史百年論著資料索引》。北京：燕山出版社。

D

- Dirlik, A. (2005a)。《革命與歷史》(翁賀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Dirlik, A. (2005b)。〈東亞的現代性與革命：區域視野中的中國社會主義〉(譚翠鶯、曹義恆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5年第3期(北京)，8-16。
- Dirlik, A. (2006)。《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孫宜學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大川周明(1924, 09/21)。〈東方諸國的民族運動〉。《台灣民報》(東京)，10。
- 大雷〔張太雷〕(1924, 10/08)。〈辛亥革命在中國國民革命上之意義〉。《嚮導週報》(上海)，合訂本頁705-706。
- 代英〔惲代英〕(1923)。〈中國的分立運動〉。《中國青年》，第4期(上海)，5-8。
- 代英〔惲代英〕(1924)。〈介紹八十一期以後之「嚮導」〉。《中國青年》，第51期(上海)，1-7。
- 戴國輝(1975)。〈台灣抗日左派指導者連溫卿とその稿本〉。《史苑》，第35卷第2號(東京)，57-60。
- 戴國輝(1978)。〈連溫卿の二つの日記〉，附錄於〈連溫卿日記——一九三〇年の三十三日間〉。《史苑》，第39卷第1號(東京)，99。
- 戴國輝(2000)。〈探索《台灣警察沿革誌》有感——《台灣抗日運動史》中譯本出版代序〉。《海峽評論》，第117期(台北)，62-63。
- 戴國輝(2002)。〈旅日時台灣史料及資料的蒐集與運用〉。收錄於：戴國輝，《台灣史研究集外集》頁17-51。台北：遠流出版社。
- 戴啟棠(1989)。〈王環心〉。收錄於：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江西英烈》(頁66-72)。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 荻野正博(2004)。〈解說 田口運藏「赤旗の靡くところ」〉。收錄於：田口運藏，《赤旗の靡くところ》(解說頁1-7)。東京：株式会社ゆまに書房。
- 獨秀〔陳獨秀〕(1920)。〈(101) 民主黨與共產黨〉。《新青年》，月刊第8卷第4號(上海)，隨感錄頁4-5。
- 獨秀〔陳獨秀〕(1924, 09/03)。〈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嚮導週報》(上海)，合訂本頁645-646。
- 讀者 C.K (1970)。〈何謂「今日臺灣在殖民地統治之下」〉。《獨立台灣》，第25號(東京)，2-6。

E

- 恩格斯(1957)。〈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根據親身觀察和可靠材料〉(1845)。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頁269-587)。北京：人民出版社。
- 恩格斯(1984)。《自然辯證法》(于光遠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 恩格斯(1995a)。〈反杜林論〉(1878)。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頁343-677)。北京：人民出版社。
- 恩格斯(1995b)。〈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0)。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頁687-760)。北京：人民出版社。
- 恩格斯(1995c)。《〈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1894)、《法德農民問題》(1894)。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頁437-451、484-505)。北京：人民出版社。
- 二村一夫(1974)。〈雜誌『マルクス主義』の5年間〉。オンライン版『二村一夫著作集』。擷取於2007/6/21，來自：
<http://oohara.mt.tama.hosei.ac.jp/nk/mxmkaidai1.htm>

F(Φ)

- Frank S.T. Hsiao, L. R. S. (1983).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1928-1931.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Ann Arbor, Mich., etc.), 42, 269-288.
- Фирсов, Ф.И. (1985). 〈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策略和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摘錄)〉,《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第14輯(北京),221-243。
- Фирсов, Ф.И. (1988). 〈關於1921-1924年統一戰線策略的問題〉,《國際共運史研究》,第6輯(北京),221-243。
- 法政大學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編)。(1973)。《政治研究會·無產政黨組織準備委員會》。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
- 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63)。〈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會刊〉。《近代史資料》,第2期(北京),96-109。
- 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編)*。(1927)。《打倒帝國主義》。上海:公理書店。
- 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編)。(1926a)。《反帝國主義》。武昌:時中合作書社。
- 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編)。(1926b)。《反帝國主義概要》。上海:經濟研究會。
- 范本梁(1926,12/26)。〈獄中瑣言〉。《台灣民報》(東京),15。
- 范一洗〔范本梁〕(1924)。〈追慕大杉榮先生(講稿)〉。《民鐘》,第1卷第8期(廣東)。
- 范志義(蒼亭)〔范本梁〕(1920)。〈結婚の改善を絶叫す!!〉。《台灣青年》,第1年第5號(東京),60-64。
- 馮魯英(1924,05/28)。〈「通信」對於西洋人釘死奶媽的懷疑〉。《婦女週報》(上海),4-5。
- 馮天瑜(2007)。《「封建」考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 佛突〔陳望道〕(1920,08/17)。〈婦女解放和浮盪少年〉。《覺悟》(上海),1。
- 福建私立集美學校二十周年紀念刊編輯部(1933)。《福建私立集美學校二十周年紀念刊》。福建:集美學校秘書處、消費公社。
- 婦女週報(1924,05/14)。〈女子的生命權在哪裡?劊子手「何其多也!」〉。《婦女週報》(上海),4。
- 傅能華(1985)。〈華崗〉。收錄於: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1卷,頁281-312)。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

G

- 高成炎(2005)。〈一個海外留學生的認同經歷〉。收錄於: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自覺與認同——1950~1990年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頁485-500)。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台灣史料中心。
- 高軍(編)。(1984)。《無政府主義在中國》。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 高軍等(編)。(1986)。《五四運動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介紹與傳播》。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 高橋新太郎文庫。〈昭和40年以前雜誌リスト:エスベラント01〉。擷取於2006/4/1,來自:<http://www.noracom.co.jp/takahashi/zassi/esupe/03.jpg>
- 高希聖等(編)。(1930)。《社會科學大詞典》。上海:世界書局。
- 高一涵(1931)。〈弁言〉。收錄於:三浦藤作,《西洋倫理學史》(謝晉青譯)。上海:商務印書館。
- 高一涵(1979)。〈高一涵致胡適〉(1923.7.15)、〈高一涵致胡適〉(1923.8.6)。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卷,頁209、214-215)。北京:中華書局。
- 葛懋春與蔣俊等(編)。(1984a)。《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葛懋春與蔣俊等(編)。(1984b)。《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1981）。〈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1923.3.3）〉。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1輯，頁76-7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顧修（1923，12/07）。〈青年們能忍受丘九的名詞嗎？〉。《覺悟》（上海），4。
- 官土生〔曾健民〕（2000）。〈左的幻視——就教於《連結》諸君〉。《左翼》，第3號（台北），35-38。
- 郭紀舟（1995）。〈一九七〇年代台灣左翼啟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私立東海大學，台中。
- 郭沫若（1989）。〈反響之反響·答一位未知的臺灣青年〉（1922.10.3）。收錄於：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6卷，頁133-135）。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國際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主義者）（1997）。〈中國托洛茨基主義的起源：不斷革命與「反帝統一戰線」的對立〉。擷取於2006/5/1，來自：
<http://www.icl-fi.org/chinese/oldsite/ORIGINS.HTM>

H

- Harvey, D. (2003).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海東（1928a，05/25）。〈台灣文化協會的運動狀況〉。《國際事情》（南京），3-4。
- 海東（1928b，06/01）。〈台灣文化協會的運動狀況（續）〉。《國際事情》（南京），1-4。
- 海東（1928c，06/08）。〈台灣文化協會的運動狀況（續）〉。《國際事情》（南京），3-4。
- 海峽評論編輯部（1995）。〈五〇年代政治案件殉難者春季追悼大會〉。《海峽評論》，第53期（台北），46-49。
- 漢人〔黃玉齋〕（1926）。《台灣革命史》。上海：泰東圖書局。
- 漢胄〔劉大白〕（1921，02/23）。〈台灣底富翁巨紳和橫濱底僑商領袖〉。《覺悟》（上海），4。
- 何池（2004）。〈「彭榮」究竟是誰——試析中共黨史上的一樁迷案〉。《黨史文苑》，2004年第6期（江西），106-108。
- 何青〔許登源〕（1981a）。〈對台灣社會階級分析的一些看法〉。《台灣思潮》，第2期（Los Angeles），3-22。
- 何青〔許登源〕（1981b）。〈對台灣社會階級分析的一些看法〉。《台灣思潮》，第3期（Los Angeles），10-26。
- 何青〔許登源〕（1982）。〈對台灣社會階級分析的一些看法〉。《台灣思潮》，第4期（Los Angeles），12-29。
- 何艷艷（2005）。〈「國民外交」背景下的中蘇建交談判（1923-1924）〉。《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北京），237-273。
- 和森〔蔡和森〕（1922，09/13）。〈統一借債與國民黨〉。《嚮導週報》（上海），合訂本頁4-6。
- 和森〔蔡和森〕（1924，09/03）。〈義和團與國民革命〉。《嚮導週報》（上海），合訂本頁652-654。
- 河瀨蘇北（編）。（1932）。《滿洲及支那辭典》。東京：東方文化協會出版部。
- 河崎なつ（1923）。〈噫 山口さん〉。收錄於：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附錄頁7-12）。東京：水曜會出版部。
- 賀覺非（1982）。〈胡鄂公〉。收錄於：賀覺非，《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頁470-476）。北京：中華書局。
- 黑色青年（1930）。〈內外消息〉。《黑色青年》，第6期（出版地不詳）。
- 洪明仁（1972）。〈評「民族解放、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台灣人民》，第2期（Halifax），14-18。
- 洪明仁（1973）。〈台灣農民、資產階級，與國民黨政權〉。《台灣人民》，第3期（Halifax），6-16。
- 洪炎秋（2004）。〈序〉。收錄於：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序言頁1-9）。台北：三民書局。
- 侯外廬（1987）。〈社會史導論——生產方式研究與商榷〉。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 中國思想史研究室編（編），《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卷，頁 22-41）。北京：人民出版社。
- 侯外廬（2007）。〈我對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收錄於：冷溶（編），《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論叢》「史學篇」（頁 252-28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侯志平（1985）。〈中國世界語運動年表〉。收錄於：侯志平，《世界語運動在中國》（頁 20-105）。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
- 胡南湖〔胡鄂公〕（1922）。〈主張承認勞農政府的一個意見〉。《今日》，第 2 卷第 2 號（北京），1-7。
- 胡南湖〔胡鄂公〕（1926）。〈反帝國主義〉寫於 1925.12.10。收錄於：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頁 1-50）。武昌：時中合作書社。
- 胡慶雲（1994）。《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想史》。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
- 胡如雷（1979）。《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北京：三聯書店。
- 胡訓珉與賀建（1991）。《上海幫會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花蕾（1924）。〈台匪〉。《平平旬刊》，第 3 期（上海），3。
- 華丹坡與李彥英（2003）。〈華崗著作年表補遺〉。收錄於：劉培平（編），《戰士·學者·校長 華崗同志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
- 黃登洲（1923）。〈台灣日日及台南新報を讀みて〉。《台灣》，第 4 年第 8 號（東京），83-86。
- 黃逢霖（1979）。〈黃逢霖致胡適〉（1923.11.17）。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卷，頁 220-221）。北京：中華書局。
- 黃美真與石源華等（編）。（1984）。《上海大學史料》。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黃藝博（1982）。〈無政府主義者在廣州搞工會運動回憶〉。收錄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編），《中國無政府主義資料選編》（頁 507-521）。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
- 黃玉齋（1999）。〈台灣初期抗日史略〉。收錄於：黃玉齋，《台灣抗日史論》（頁 1-87）。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 黃志榮與黃妙珍（1986）。〈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七年上海地區青年團組織發展概況〉。《報刊資料選匯：D421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86 年第 6 期（北京），49-55。

I(И)

- Иващин, И. Ф.（1995）。《蘇聯外交簡史》（春華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Ильенков, Э. В.（1993）。《馬克思《資本論》中抽象和具體的辯證法》（孫開煥等譯）。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

J

- 《舊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編寫組（1977）。《舊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北京：人民出版社。
- 記者（1924）。〈メーデーに就いて〉。《台灣》，第 5 年第 2 號（東京），73-78。
- 記者〔瞿秋白〕（1924）。〈〈黎明期的台灣〉記者附誌〉。《新青年》，季刊第 4 期（上海），101。
- 賈桂芳（編）。（1985）。《文學研究會資料》。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
- 簡炯仁（1997）。《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史》。台北：前衛出版社。
- 劍平（1992）。〈亞細亞革命與世界改造〉（1924）。收錄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小黨派》（頁 3-8）。北京：檔案出版社。
- 江刺昭子（1995）。〈解說〉。收錄於：林要（編），《小なき命・林てる子遺稿集》（解說頁 1-5

- ）。東京：大空社。
- 江亢虎（1928）。《江亢虎南游迴想記》（第五版）。上海：中華書局。
- 江亢虎（1944）。〈亞東新聞國恥紀念特刊題詞〉（1924.5）。收錄於：江亢虎，《江亢虎文存初編》（頁 227-228）。南京：現代印書館。
- 江陵縣志辦公室（2000）。〈胡鄂公（1884-1951）〉。收錄於：湖北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湖北省志：人物》（下冊，頁 141-143）。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 江西省文化廳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員會等（編）。（1994）。《中央蘇區革命文化史料匯編》。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 蔣俊（1984）。〈盧劍波先生早年的無政府主義宣傳活動紀實〉。收錄於：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頁 1009-102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蔣立峰（1992）。〈鈴江言一〉。收錄於：劉德有、馬興國（編），《中日文化交流事典》（頁 626）。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
- 蔣渭水（1922）。〈動搖時代的台灣〉。《台灣》，第 3 年第 9 號（東京），47-49。
- 蔣渭水（1924, 09/21）。〈隨感錄：七一與五九〉。《台灣民報》（東京），11。
- 蔣渭水（1929, 03/31）。〈中國々民黨の歴史（十一）〉。《台灣民報》（台北），10。
- 蔣渭水（1930, 07/16）。〈十年後の解放運動—希望と展望—〉。《台灣新民報》（台北），18。
- 蔣渭水・雪谷（1925, 08/26）。〈五個年中的我〉。《台灣民報》（東京），43-45。
- 蔣中正（1964）。〈蔣總統為吳敬恆先生百年誕辰致詞〉。收錄於：吳稚暉先生全集編纂會編（編），《吳稚暉先生全集》（第 1 卷，頁 1-7）。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
- 堺利彦（1923）。〈吊意〉。收錄於：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頁 44）。東京：水曜會出版部。
- 金寶瑜（1989）。〈農工部門間的資源轉移：從評《原始積累、平等與工業化》開始〉。收錄於：馬克・薛爾頓（編），《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頁 145-160）。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 金富軍與蔡樂蘇（2006）。〈陳獨秀對義和團的認識變化及其政治意涵〉。《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 59 卷第 2 期（武漢），230-234。
- 金良守（2004）。〈日本佔領時期韓國和台灣地區接受魯迅之比較〉。《當代韓國》，2004 年冬季號（北京）。
- 金時俊（2005）。〈流亡中國的韓國知識分子和魯迅〉。收錄於：魯迅博物館（編），《韓國魯迅研究論文集》（頁 50-64）。鄭州：河南文藝出版社。
- 金喜坤（2005）。〈追封建國勳章的被遺忘的革命家尹滋英——領導社會主義獨立運動的朝鮮共產黨核心領導〉。《新東亞》，第 48 卷第 1 號（首爾），432-443。
- 金正明（1967）。《朝鮮獨立運動》（第五卷「共產主義運動篇」）。東京：原書房。
- 近代日本社会運動史人物大事典編集委員会（編）。（1997）。《近代日本社会運動史人物大事典》（第 4 卷）。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
- 晉青〔謝晉青〕（1920a, 08/02）。〈不良的少男少女〉。《覺悟》（上海），4。
- 晉青〔謝晉青〕（1920b, 09/02）。〈台灣與朝鮮〉。《覺悟》（上海），1-2。
- 晉青〔謝晉青〕（1920c, 09/17）。〈〔特載〕東京通信社の成立、經過、和現在停辦的理由〉。《覺悟》（上海），1-3。
- 晉青〔謝晉青〕（1920d, 10/18）。〈台灣生番的精神與道德〉。《覺悟》（上海），1。
- 晉青〔謝晉青〕（1921a, 02/16）。〈台灣人底政治運動〉。《覺悟》（上海），4。
- 晉青〔謝晉青〕（1921b, 03/14）。〈日本社会運動家底最近傾向〉。《覺悟》（上海），1。
- 晉青〔謝晉青〕（1921c, 05/29）。〈日本勞工底急進派〉。《覺悟》（上海），4。
- 警視庁特別高等係（1984）。〈特別要視察人狀勢調（大正十年度）〉（1921）。收錄於：松尾尊兌（編），《社会主義沿革》（二，頁 57-97）。東京：みすず書房。
- 鏡童（1925）。〈革命歌〉。《台灣新青年》，創刊號（廈門），49-50。

旧殖民地人事総覧* (1997)。《旧殖民地人事総覧・台湾編》(第4卷)。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

K(K)

- Kerkeзов (1924)。〈柯祖基也招認了!〉(抱朴譯)。《平平旬刊》，創刊號(上海)，6-9。
- K. M. Тергцкий, A. Э. Б. (2005)。《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гг.)》。Moscow: AST, Vostok-Zapad。
- 강만길성대경 (編)。(1996)。《한국 사회주의운동 인명사전》。서울: 창작과비평사。
- 康基柱 (1998)。〈「中韓互助社」述評〉。《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北京)，266-279。
- 柯文 (2005)。《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杜繼東譯)。上海：江蘇人民出版社。
- 柯志明 (1989)。〈「所謂的」原始積累——補論與答辯〉。收錄於：馬克·薛爾頓 (編)，《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頁161-173)。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 柯志明 (2006)。《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群學。
- 克魯泡特金 (1977)。《無政府主義》(天均〔范天均〕等譯)。台北：帕米爾書店。
- 克魯泡特金 (1981)。《麵包與自由》(巴克〔巴金〕譯)。台北：帕米爾書店。
- 克魯泡特金 (1984)。《一個反抗者的話》(畢修勺譯)。台北：帕米爾書店。
- 克思 (1925)。〈我所知的文化協會與公益會〉。《台灣新青年》，創刊號(廈門)，17-21。

L

- Lukács, G. (1972)。Blum Theses (Extracts)。In R. Livingstone (Ed.) , *Lukács Political writings, 1919-1929: the question of parliamentarianism and other essays* (M. McColgan, Trans.)。London: NLB。
- Lukács, G. (1986)。《盧卡奇自傳》(李渚青、莫立知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Luxemburg, R. (2004)。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歷史研究》編輯部 (編)。(1957)。《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討論集》。北京：三聯書店。
- 《連結》編輯部 (2000)。〈台灣「左翼」何去何從——關於統獨問題和社會性質討論的幾點意見〉。《左翼》，第4號(台北)，1-7。
- 《連結》雜誌社 (1999)。〈對於黎建江〈左翼社會運動的展望〉的幾點意見〉。《左翼》，第2號(台北)，25-28。
- 藍博洲 (2007)。〈孤墳下的歷史：張志忠及其妻兒〉。《思想》，第5期(台北)，153-190。
- 蕾 (1924)。〈一個回到中國的台灣人〉。《平平旬刊》，第4期(上海)，4-6。
- 淚子〔施文杞〕 (1924, 04/11)。〈是我的罪〉。《台灣民報》(東京)，13。
- 黎建江 (1999)。〈左翼社會運動的展望——從局勢演變談起〉。《左翼》，第1號(台北)，1-3。
- 李伯剛 (1983)。〈自述〉。《黨史研究資料》，第4期(成都)，1-15。
- 李達 (1980)。〈回憶老漁陽里二號和黨的「一大」、「二大」〉。《黨史資料叢刊》，總第2輯(上海)。
- 李大釗 (1916)。〈青春〉。《新青年》，月刊第2卷第1號(上海)，抽印頁1-12。
- 李大釗 (1920)。〈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新青年》，月刊第7卷第2號(上海)，47-53。
- 李丹陽 (2004)。〈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與中國共產主義組織的起源〉。《史學月刊》，2004年第6期(河南)，51-59。

- 李根蟠(1997)。〈中國封建經濟史若干理論觀點的邏輯關係及得失淺議〉。《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3期(北京)，125-129。
- 李根蟠(2004)。〈中國「封建」概念的演變和「封建地主制」理論的形成〉。《歷史研究》，2004年第3期(北京)，146-172。
- 李漢石〔李伯剛〕(1925)。《反帝國主義運動》。上海：經濟研究會。
- 李漢石〔李伯剛〕(1926)。〈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反帝國主義大聯盟〉。收錄於：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編)，《反帝國主義》(頁161-267)。武昌：時中合作書社。
- 李鴻文(1996)。《三〇年代朝鮮共產主義者在中國東北》。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 李開時(1924, 06/18)。〈〔通信〕調查「西洋人釘死奶媽」消息的結果〉。《婦女週報》(上海)，5-6。
- 李寬(1973)。〈台灣社會主義者與民族自決〉。《台灣人民》，第5期(Halifax)，29-36。
- 李明(1987)。〈台灣民族解放運動中的左右聯合問題〉。《台灣解放》，創刊號(Darien IL.)，16-23。
- 李銀耕(1991)。〈羅任一在安陽的革命活動〉。《安陽文史資料》，第6輯(河南)。
- 李振芳與郭德欽(年份不詳)。《日據時期南京、廣東臺灣學生的政治活動史：南京中臺同志會、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抗日史實》(手抄本)。
- 李忠杰(1988)。〈評共產國際對中派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國際共運史研究》，第6輯(北京)，20-37。
- 連溫卿(1924a)。〈道德の進化〉。《台灣》，第5年第2號(東京)，61-64。
- 連溫卿(1924b, 10/01)。〈言語之社會的性質〉。《台灣民報》(東京)，13-14。
- 連溫卿(1925a, 08/26)。〈婦人的地位和社會的關係〉。《台灣民報》(東京)，22-26。
- 連溫卿(1925b, 10/11)。〈不良少年少女研究〉。《台灣民報》(東京)，12-13。
- 連溫卿(1925c, 10/18)。〈不良少年少女研究(續)〉。《台灣民報》(東京)，10-11。
- 連溫卿(1926, 10/24)。〈怎麼是世界語主義?〉。《台灣民報》(東京)，11。
- 連溫卿(1927, 01/02)。〈過去台灣之社會運動〉。《台灣民報》(東京)，12-13。
- 連溫卿(1928a)。〈台灣殖民政策的演進(一)——日本資本主義的發達及其發展〉。《台灣大眾時報》，第6號(東京)，12-14。
- 連溫卿(1928b)。〈台灣社會運動概觀〉。《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東京)，15-16。
- 連溫卿(1943)。〈牽手考〉。《民俗台灣》，第3卷第8號(台北)，2-13。
- 連溫卿(1949a, 01/10)。〈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土地被收奪的過程：一、關於收奪土地；二、財閥企業團體和政治的關係〉。《台灣風土》(台北)，6。
- 連溫卿(1949b, 01/17)。〈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土地收奪的過程(續)：二、財閥企業團體和政治的關係；三、法的根據〉。《台灣風土》(台北)，6。
- 連溫卿(1949c, 01/24)。〈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土地收奪的過程(續)：四、收益權〉。《台灣風土》(台北)，6。
- 連溫卿(1949d, 01/30)。〈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土地收奪的過程(續)：四、收益權；五、收奪的進化；六、生產者—農民的生活〉。《台灣風土》(台北)，4。
- 連溫卿(1949e, 02/07)。〈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土地收奪的過程(續)：七、抗爭；八、大竹林之由來〉。《台灣風土》(台北)，6。
- 連溫卿(1949f, 02/14)。〈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土地收奪的過程(續)：八、大竹林之由來；九、暴力的勝利〉。《台灣風土》(台北)，6。
- 連溫卿(1949g, 02/21)。〈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土地收奪的過程(續)：十、喪失了土地的農民們的生活〉。《台灣風土》(台北)，6。
- 連溫卿(1949h, 02/28)。〈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土地收奪的過程(續)：十一、崩潰下去的鬥爭〉。《台灣風土》(台北)，6。
- 連溫卿(1949i, 03/07)。〈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土地收奪的過程(續)：十二、三叉事件的發端〉。《台灣風土》(台北)，6。
- 連溫卿(1949j, 03/28)。〈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土地收奪的過程(續)：十三、欺瞞〉。《台灣風土》(台北)，6。

- 連溫卿(1949k, 04/02)。〈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土地收奪的過程(續)：十三、欺瞞；十三〔四〕、權利條件取得運動〉。《台灣風土》(台北)，6。
- 連溫卿(1949l, 09/26)。〈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土地收奪的過程(續)：十五、危機〉。《台灣風土》(台北)，6。
- 連溫卿(1949m, 10/17)。〈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土地收奪的過程(續)：十五、危機〉。《台灣風土》(台北)，6。
- 連溫卿(1953a)。〈大稻埕的經濟發展〉。《台北文物》，第2卷第3期(台北)，13-25。
- 連溫卿(1953b)。〈台灣文化協會的發軔——台灣政治、文化、社會運動的第一頁〉。《台北文物》，第2卷第3期(台北)，68-73。
- 連溫卿(1954a)。〈城內的政治發展〉。《台北文物》，第2卷第4期(台北)，35-44。
- 連溫卿(1954b)。〈是不是性器崇拜之遺物〉。《台北文物》，第3卷第1期(台北)，49-52。
- 連溫卿(1954c)。〈台灣文化的特質〉。《台北文物》，第3卷第2期(台北)，118-130。
- 連溫卿(1954d)。〈再就台灣文化的特質而言〉。《台北文物》，第3卷第3期(台北)，97-106。
- 連溫卿(1958)。〈日人土地收奪所演出的兩事件〉。《南瀛文獻》，第4卷下期(台南)，16-27。
- 連溫卿(1975)。〈台灣に於る日本植民政策の実態〉。《史苑》，第35卷第2號(東京)，61-83。
- 連溫卿(1976)。〈日本帝國主義の台灣に於る土地收奪の過程(一)〉。《史苑》，第37卷第1號(東京)，36-57。
- 連溫卿(1978a)。〈日本帝國主義の台灣に於る土地收奪の過程(二)〉。《史苑》，第39卷第1號(東京)，51-77。
- 連溫卿(1978b)。〈連溫卿日記——一九三〇年の三十三日間〉。《史苑》，第39卷第1號(東京)，79-99。
- 連溫卿(1981)。〈日本對台殖民政策の真相〉。《台灣思潮》，第1期(Los Angeles)，46-62。
- 連溫卿(1986)。〈連溫卿日記——一九三〇年の三十三天——備忘錄〉(林勞歸(林書揚)譯)。《台灣風物》，第36卷第1期(台北)，57-80。
- 連溫卿(1988)。《台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出版社。
- 廉〔謝廉清〕(1924a, 05/11)。〈〔內外通信〕北京通信〉。《台灣民報》(東京)，9。
- 廉〔謝廉清〕(1924b, 09/11)。〈〔內外時事〕北京通信〉。《台灣民報》(東京)，2。
- 廉清〔謝廉清〕(1924a, 03/21)。〈〔內外時報〕北京通信：國務總理難免其責〉。《台灣民報》(東京)，9。
- 廉清〔謝廉清〕(1924b, 04/11)。〈〔內外通信〕北京通信〉。《台灣民報》(東京)，11。
- 廉清〔謝廉清〕(1924c, 04/21)。〈〔內外通信〕北京通信〉。《台灣民報》(東京)，8。
- 廉清〔謝廉清〕(1924d, 06/21)。〈〔通信〕北京通信：神田正雄先生來京〉。《台灣民報》(東京)，8。
- 廉清〔謝廉清〕(1925, 01/01)。〈〔內外時事〕北京通信〉。《台灣民報》(東京)，2。
- 梁景和(2004)。《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的論辯》。南昌：百花洲文藝。
- 梁三(2000)。〈可議的提問——給《連結》的幾點意見〉。《左翼》，第3號(台北)，33-34。
- 廖百芳(1928)。〈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之先決問題〉(1924)。收錄於：廖百芳(編)，《濛江餘影》(下卷，頁31-33)。出版地不詳。
- 列寧(1949)。《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曹葆華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列寧(1990a)。〈紀念赫爾岑〉、〈「俄國土地問題」的實質〉、〈斯托雷平土地綱領和民粹派土地綱領的比較〉、〈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均1912)。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21卷，頁261-268、312-316、388-394、426-432)。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列寧(1990b)。〈兩種烏托邦〉(1912)、〈論民粹主義〉(1913)。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22卷，頁129-134、326-330)。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列寧（1995a）。〈對華戰爭〉（1900）。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選集》（第1卷，頁278-282）。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列寧（1995b）。〈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1900）。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選集》（第1卷，頁283-287）。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列寧（1995c）。〈怎麼辦〉（1902）。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選集》（第1卷，頁290-458）。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列寧（1995d）。〈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1920）。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選集》（第4卷，頁275-280）。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列寧與斯大林（1953）。《列寧斯大林論中國》（張仲實、曾葆華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 林てる（1923）。〈失はれたる闘士〉。收錄於：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的勞農革命》（附錄頁5-7）。東京：水曜會出版部。
- 林てる子（1995）。林要編，〈小さき命・林てる子遺稿集〉。東京：大空社。
- 林海音（1984，07/26）。〈番薯人〉。《中國時報》（台北），8。
- 林華國（2005）。《近代歷史縱橫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林進發（1932）。《臺灣官紳年鑑》。台北：民眾公論社。
- 林盛中（2009a）。〈悼念我的良師益友許登源先生〉（2009.4.5，未刊稿）。北京：台灣同學會。
- 林盛中（2009b）。〈悼念我的良師益友許登源先生〉（2009.8.6，修定稿）。北京：台灣同學會。
- 林時中（1987）。〈林可彝〉。收錄於：中共福建省委黨史資料徵委會、福建省民政廳（編），《福建革命烈士傳》（第2卷，頁125-132）。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 林書揚（1992a）。〈台灣左翼運動的歷史發展——第一週期與第二週期〉。收錄於：林書揚，《從二二八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頁79-87）。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林書揚（1992b）。〈遲來的春天〉。收錄於：林書揚，《從二二八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頁175-180）。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林書揚（1994）。〈追述世紀的旗手周合源先生〉。《海峽評論》，37期（台北），57-59。
- 林書揚（2001）。〈人民左翼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的島外接續部分〉。《左翼》，第22號（台北），10-13。
- 林載爵（1998）。〈本土之前的鄉土〉。收錄於：陳映真（編），《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台灣鄉土文學、皇民主義的清理與批判」（頁77-89）。台北：人間出版社。
- 鈴江言一（1975）。《中國革命的階級對立》（第2卷）。東京：平凡社。
- 劉柏青（1985）。《日本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簡史》。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
- 劉國銘（編）。（2005）。《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北京：團結出版社。
- 劉進慶（1970）。〈「帝國主義下の台湾」における「資本主義化」の問題点について〉。《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2期（東京），36-39。
- 劉進慶（1971）。〈台湾農民の呻吟〉（1971.2）。《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3期（東京），62-74。
- 劉進慶（1972a）。〈戦後台湾經濟の構造——公業と私業〉。《思想》，通号576（東京），26-48。
- 劉進慶（1972b）。〈台湾の經濟と政治の問題——公業と私業を中心に〉。《東大中国同学会会報・暖流》，第14期（東京），2-12。
- 劉進慶（1973）。〈台湾における国民党官僚資本の展開——国家資本主義研究に寄せて〉。《思想》，通号591（東京），27-52。
- 劉進慶（1974）。〈台湾國民黨官僚資本の開展：寄與國家資本主義的研究（上）〉（水車譯）。《台灣人民》，第9期（法國），26-37。
- 劉進慶（1975a）。《戦後台湾經濟分析：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
- 劉進慶（1975b）。〈台湾國民黨官僚資本の開展：寄與國家資本主義的研究（下）〉（水車譯）。《台灣人民》，第10期（法國），25-38。
- 劉進慶（1992）。《台湾戦後經濟分析》（王宏仁、林繼文、李明俊譯）。台北：人間出版社。

- 劉曼容（1996）。《孫中山與中國國民革命》。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
- 劉曼容（1997）。〈孫中山國民革命觀的歷史演變〉。《廣東社會科學》，1997年第1期（廣東），86-92。
- 劉仁靜（1980）。〈回憶「五四」運動、北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黨的一大〉（1957.4）。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頁113-117）。北京：人民出版社。
- 劉石心（口述）。（1984）。〈關於無政府主義活動〉。收錄於：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柳絮〔柳樹人〕（1929）。《弱小民族的革命方略》。上海：中山書局。
- 柳絮〔柳樹人〕（1984）。〈主張組織東亞無政府主義者大聯盟〉（1926）。收錄於：葛懋春、蔣俊、李興芝（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下冊，頁716-71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柳子明（1987）。〈朝鮮愛國史學家申采浩〉。收錄於：楊昭全（編），《關內地區朝鮮人反日獨立運動資料匯編》（下冊，頁1370-1377）。遼寧：遼寧民族出版社。
- 盧修一（1989）。《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前衛出版社。
- 魯迅（2005a）。〈文藝與革命〉（1928.4.4）。收錄於：《魯迅全集》修訂編輯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4卷，頁78-87）。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魯迅（2005b）。〈日記十四（一九二五年）〉。收錄於：《魯迅全集》修訂編輯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15卷，頁547-602）。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魯迅（2005c）。〈人物注釋·注釋條目〉。收錄於：《魯迅全集》修訂編輯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17卷，頁6-261）。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陸發春（2003）。〈蘇雪林與胡適二則史實的考證〉。《魯迅研究月刊》，第12期（北京）。
- 呂正惠（2007）。〈我的接近中國之路：三十年後反思鄉土文學運動〉。《思想》，第6期（台北），105-122。
- 呂正惠與陳宜中（2008）。〈一個臺灣人的左統之路：陳明忠先生訪談錄〉。《思想》，第9期（台北），71-108。
- 羅春雄（1975）。〈參加台獨運動的回顧〉。《台灣人民》，第10期（法國），9-19。
- 羅豁〔羅任一〕（1921，06/28）。〈今後應取的方針〉。《覺悟》，4。
- 羅豁〔羅任一〕（1925）。〈羅豁致上海執行部組織部〉（1925.5.10）。
- 羅梅君（1997）。《政治與科學之間的歷史編纂——30和4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形成》（孫立新譯）。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
- 羅章龍（1989）。《椿園載記》。北京：東方出版社。
- 駱耕漠（1981）。〈回憶崔曉立烈士在獄中〉。《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18輯（浙江），55-59。
- 駱耕漠（1982）。〈赤誠的愛國主義者——紀念台灣義勇隊創立人李友邦〉。《文史通訊》，1982年第6期（北京），15-19。
- 駱駝英〔羅鐵英〕（1999）。〈論「台灣文學」諸論爭〉（1948.7.30-8.22）。收錄於：陳映真、曾健民（編），《1947-1949台灣文學問題論議集》（頁169-184）。台北：人間出版社。

M

- 馬伯援（1984）。《三十年的臆話》。台北：非賣品。
- 馬克思（1962）。〈《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頁7-11）。北京：人民出版社。
- 馬克思（1975a）。《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馬克思（1975b）。《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馬克思（1978）。《剩餘價值學說史》（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馬克思(1982)。〈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1835)。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馬克思(1995)。〈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1877)、〈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覆信〉(1881)。收錄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頁339-342、761-775)。北京：人民出版社。
- 馬克思(2001)。《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 馬克斯主義研究會(1922)。〈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宣言(附簡章)〉。《今日》，第2卷第2號(北京)，60-61。
- 毛常(1925)。〈台灣新青年祝詞〉。《台灣新青年》，創刊號(廈門)，4-6。
- 毛一波(1957)。〈哀悼連溫卿先生〉。《台灣風物》，第7卷第6期(台北)，1-2。
- 毛澤東(1967a)。〈戰爭與戰略問題〉(1938.11)。收錄於：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506-521)。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澤東(1967b)。〈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1939.12)。收錄於：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584-622)。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澤東(1971a)。〈新民主主義論〉(1940.1)。收錄於：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集，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第7卷「延安期III」)。東京：北望社。
- 毛澤東(1971b)。〈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12)。收錄於：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集，竹內實監修，《毛澤東集》(第7卷「延安期III」，頁97-136)。東京：北望社。
- 美國B.T.O(1970)。〈來信問答〉。《獨立台灣》，第25號(東京)，A21。
- 美麗島週報*(1981a, 05/02)。〈費城政治討論會實況記錄(上)〉。《美麗島週報》(Los Angeles)，9-12。
- 美麗島週報*(1981b, 05/09)。〈費城政治討論會實況記錄(下)〉。《美麗島週報》(Los Angeles)，8-14。
- 美麗島週報*(1981c, 06/06)。〈費城政治討論會記錄補遺〉。《美麗島週報》(Los Angeles)，7。
- 民國二十年大學部畢業同學錄籌備委員會(1931)。《民國二十年畢業同學錄》。北京：朝陽學院大學部。
- 民國日報*(1921, 09/18)。〈中韓互助社之茶話會·徐謙對太平洋會議之悲觀〉。《民國日報》(上海)，10。
- 民國日報*(1923a, 06/01)。〈上海大學招生〉。《民國日報》(上海)，1。
- 民國日報*(1923b, 07/15)。〈上海大學第二次招生〉。《民國日報》(上海)，1。
- 民國日報*(1923c, 07/23)。〈鄒立務本英文專校招男女生〉。《民國日報》(上海)，4。
- 民國日報*(1923d, 07/23)。〈主耶穌將速重來接受聖徒上天〉。《民國日報》(上海)，4。
- 民國日報*(1923e, 08/13)。〈上海大學續招生〉。《民國日報》(上海)，1。
- 民國日報*(1923f, 09/04)。〈上海大學錄取新生案〉。《民國日報》(上海)，1。
- 民國日報*(1923g, 12/30)。〈美國鄒立務本文商專門學校招生〉。《民國日報》(上海)，4。
- 民國日報*(1923h, 12/30)。〈主耶穌能救人能醫病〉。《民國日報》(上海)，4。
- 民國日報*(1924a, 01/10)。〈〔本埠消息〕旅滬台灣人將開大會。假寶山路某處舉行〉。《民國日報》(上海)，8。
- 民國日報*(1924b, 01/13)。〈台灣人在滬集會〉。《民國日報》(上海)，10。
- 民國日報*(1924c, 01/15)。〈美國鄒立務本文商專門學校招生〉。《民國日報》(上海)，4。
- 民國日報*(1924d, 01/17)。〈旅滬台灣人秘密集議。在滬人數之調查〉。《民國日報》(上海)，10。
- 民國日報*(1924e, 02/14)。〈追悼克魯泡特金〉。《民國日報》(上海)，6-7。
- 民國日報*(1924f, 03/08)。〈〔團體消息〕台灣旅滬青年會〉。《民國日報》(上海)，11。
- 民國日報*(1924g, 03/13)。〈日當局偵共產主義者〉。《民國日報》(上海)，11。
- 民國日報*(1924h, 04/07)。〈〔團體消息〕台灣青年會〉。《民國日報》(上海)，11。
- 民國日報*(1924i, 04/23)。〈日共產黨領袖來滬說〉。《民國日報》(上海)，11。
- 民國日報*(1924j, 10/11)。〈雪國恥的第一步(九月七日民國日報評論)〉。《台灣民報》(東京)，9。

- 摩漢〔鄭摩漢〕(1922)。〈革命運動與議會運動(卷頭語)〉。《今日》，第2卷第2號(北京)，封面裡。
- 沫雲〔許乃昌〕(1924a)。〈黎明期的台灣〉。《新青年》，季刊第4期(上海)，91-101。
- 沫雲〔許乃昌〕(1924b)。〈自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平平旬刊》，創刊號(上海)，6。
- 沫雲〔許乃昌〕(1924c)。〈沙上的文化運動〉。《台灣》，第5年第2號(東京)，35-38。

N

- Neruda, P. (1970). *Canto general*. Santiago: Pehuén Editores Limitada.
- 那其(1925a)。〈台灣政府貫連資本家榨取民利之要聞〉。《台灣新青年》，創刊號(廈門)，21-23。
- 那其(1925b)。〈黑暗的台灣〉。《台灣新青年》，創刊號(廈門)，48-49。
- 乃昌〔許乃昌〕(1923a, 11/23)。〈被壓迫民族的呼聲〉。《覺悟》(上海)，4。
- 乃昌〔許乃昌〕(1923b, 12/14)。〈(雜感)學生運動的啟蒙——駁易家鉞的「中國的丘九」問題〉。《覺悟》(上海)，4。
- 乃昌〔許乃昌〕(1924, 01/10)。〈平民的慘死〉。《覺悟》(上海)，4。
- 南都生〔陳逢源〕(1931, 04/04)。〈討究蔣渭水君的理論的重大矛盾〉。《台灣新民報》(台北)，5。
- 南民〔南方朔〕(1986)。〈蔣經國後的台灣政治(三之三)——論台灣新封建化的趨勢〉。《台灣與世界》，1986年5月號(New York)，17-25。
- 內務省警保局(1921, 01/15)。《思想要注意人名簿》。擷取於2007/3/24，來自：<http://members.at.infoseek.co.jp/kafuka1964/meibo.html>
- 內務省警保局(1923a)。〈(D)軍隊ニ対スル宣傳〉。《(02)最近に於ける特別要視察人ノ狀況》(警視總監旧藏文書第一卷)。
- 內務省警保局(1923b, 01)。〈主ナル思想團體調(大正十二年一月現在)〉。《(03)最近に於ける社会思想團體ノ狀況》(警視總監旧藏文書第一卷)。
- 內務省警保局(1924, 06/15)。〈主ナル思想團體調(大正十三年六月十五日調)〉。《(201)最近ニ於ケル本邦社會主義運動概況》(警察庁移管文書)。
- 能俠者(1924)。〈實行部の宣言〉。《新台灣》，第2號(北京)，1-10。
- 尼姆·威爾士與金山(1993)。《阿里郎之歌——中國革命中的一個朝鮮共產黨人》(趙仲強譯)。北京：新華出版社。
- 倪興祥(編)。(2006)。《中國共產黨創建史詞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紐約客(1972)。〈徐慶鐘有苦衷?〉。《台灣人民》，第2期(Halifax)，65。

P

- Pantsov, A. (2007). *Taiwan'skoe kommunisticheskoe dvizhenie i Komintern (1924-1932 gg.) : Issledovanie. Dokumenty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the Comintern (1924-1932): Study. Documents)*. K. M. TERTITSKII AND A. E. BELOGUROVA. Moscow: AST, Vostok-Zapad, 2005. 624 pp. \$38.95. ISBN 5-478-00152-X. *The China Quarterly*, 189 (London), 218-219.
- 裴京漢(2003)。《從韓國看的中華民國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彭明敏* (1981, 07/31)。〈「台灣國民主義」的確立〉。《台灣公論報》(Temple City)，7。
- 彭澤湘(1983)。〈自述〉。《黨史研究資料》，第5期(成都)，205-224。
- 皮明麻(1991)。〈秘密黨員和「今日派」〉。收錄於：皮明麻，《近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潮覓蹤》。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

- 平平旬刊* (1924)。〈廣告一〉。《平平旬刊》，第 8 期（上海），8。
 平社 (1924a)。〈平社簡章〉。《平平旬刊》，創刊號（上海），16。
 平社 (1924b)。〈啟事〉。《平平旬刊》，第 9 期（上海），16。

Q

- 邱平田〔蘇新〕(1993)。〈台灣人民之出路〉(1948.5.1)。收錄於：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頁 229-233)。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 邱士杰 (2005a)。〈從〈黎明期的台灣〉走向「中國改造論」——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 (1923-1927) (上)〉。《批判與再造》，第 20 期（台北），26-38。
- 邱士杰 (2005b)。〈從〈黎明期的台灣〉走向「中國改造論」——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 (1923-1927) (下)〉。《批判與再造》，第 21 期（台北），26-40。
- 邱士杰 (2006)。〈崛起：台灣左翼運動的 1924 年 (4)〉。《批判與再造》，第 38 期（台北），28-38。
- 邱士杰 (2007)。〈從〈黎明期的台灣〉走向「中國改造論」——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 (1923-1927)〉。《史繹》，第 35 期（台北），69-140。
- 邱士杰 (2009a)。〈一九二〇年代台灣社會運動中的「大眾黨」問題〉。收錄於：若林正文、松永正義、薛化元（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續集》(頁 129-184)。台北：稻鄉出版社。
- 邱士杰 (2009b)。〈從中國革命風暴而來——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與他的馬克思主義觀〉。論文發表於：台北「陳映真創作 5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 邱武川 (1973)。〈工作札記〉。《台灣人民》，第 7 期（Halifax），23-27。
- 秦賢次 (1998)。〈《新知識》導言〉。收錄於：傳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新知識》(復刻本)。台北：傳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慶尚北道警察部 (1934)。《高等警察要事》。京城：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 瞿秋白 (1924, 11/07)。〈十月革命與弱小民族〉。《嚮導週報》(上海)，合訂本頁 754-756。
- 瞿秋白 (1926)。〈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國民黨右派與國家主義派之分析〉。《新青年》，不定期刊第 3 號（上海），21-41。
- 瞿秋白 (1982)。〈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1929-1930)。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頁 151-199)。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 瞿秋白 (1988)。〈反帝國主義運動與國民黨〉(1924.9.20)。收錄於：瞿秋白文集編輯組（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 2 卷，頁 628-635)。北京：人民出版社。
- 瞿宛文 (2008)。〈重看台灣棉紡織業早期的發展〉。《新史學》，第 19 卷第 1 期（台北），167-227。

R(P)

- Rappaport, P. (1913). Looking forward; a treatise on the status of woman and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 Rosdolsky, R. (1992)。《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
- Резников, А.Б. (1988)。〈共產國際第五、六、七次代表大會對東方政策的進一步制定(摘譯)〉，《國際共運史研究》，第 5 輯（北京），179-200。
- 任一〔羅任一〕(1924a)。〈人不如狗〉。《平平旬刊》，第 4 期（上海），2-4。
- 任一〔羅任一〕(1924b)。〈嫌疑解釋〉。《平平旬刊》，第 8 期（上海），2-3。
- 日本共產黨史資料委員會（編）。(1960)。《共產國際關於日本問題方針、決議集》(林放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汝為 (1922)。〈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並質陳獨秀先生〉。《今日》，第 2 卷第 4 號（北京），13-22。

- 若林正文 (1978)。〈台湾総督府秘密文書「文化協会対策」〉。《台湾近現代史研究》，創刊号（東京），159-173。
- 若林正文 (1979)。〈黄呈聡における「待機」の意味——日本統治下台湾知識人の抗日民族思想〉。《台湾近現代史研究》，第2号（東京），61-118。
- 若林正文 (2007)。《台湾抗日運動史研究》（台湾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台北：播種者出版有限公司。

S

- Sweezy, P. M. (1983). Socialism. In L. H. Tom Bottomore, V. G. Kiernan, Ralph Miliband (Ed.),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上海出版志》編纂委員會（編）。(2000)。《上海出版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山川菊栄 (1923)。〈同志山口小静を憶ふ〉。收錄於：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附錄頁 17-25）。東京：水曜會出版部。
- 山川菊栄 (1929)。〈はしかき〉（山川菊栄譯）。收錄於：ラッパボート，《社會進化と婦人の地位》（頁 3-6）。東京：改造社。
- 山川菊栄 (1972)。《おんな二代の記》。東京：平凡社。
- 山川菊栄 (1982a)。《山川菊栄集》（第8卷「このひとびと」）。東京：岩波書店。
- 山川菊栄 (1982b)。《山川菊栄集》（第9卷「おんな二代の記」）。東京：岩波書店。
- 山川菊栄 (1984)。〈社会運動に投ぜんとする若き女性へ〉。收錄於：鈴木裕子（編），《山川菊栄女性解放論集》（第2卷，頁 62-70）。東京：岩波書店。
- 山川菊栄 (1995)。〈追憶〉（1924.11）。收錄於：林要（編），《小さき命・林てる子遺稿集》（附錄頁 8-16）。東京：大空社。
- 山川均 (1923)。〈尊敬すべき同志山口小静氏〉。收錄於：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の勞農革命》（附錄頁 1-3）。東京：水曜會出版部。
- 山川均 (1924)。《井の底から見た日本》。京都：更生閣吉田書店。
- 山川均 (1926a, 05/16)。〈弱少民族の悲哀：在「一視同仁」「内地延長主義」「同化融合政策」下の台灣〉（張我軍譯）。《台灣民報》（東京），8-9。
- 山川均 (1926b, 05/23)。〈弱少民族の悲哀：在「一視同仁」「内地延長主義」「同化融合政策」下の台灣（續）〉（張我軍譯）。《台灣民報》（東京），9-11。
- 山川均 (1926c, 05/30)。〈弱少民族の悲哀：在「一視同仁」「内地延長主義」「同化融合政策」下の台灣（續）〉（張我軍譯）。《台灣民報》（東京），8-10。
- 山川均 (1926d, 06/06)。〈弱少民族の悲哀：在「一視同仁」「内地延長主義」「同化融合政策」下の台灣（續）〉（張我軍譯）。《台灣民報》（東京），9-11。
- 山川均 (1926e, 06/13)。〈弱少民族の悲哀：在「一視同仁」「内地延長主義」「同化融合政策」下の台灣（續）〉（張我軍譯）。《台灣民報》（東京），11-14。
- 山川均 (1926f, 06/20)。〈弱少民族の悲哀：在「一視同仁」「内地延長主義」「同化融合政策」下の台灣（續）〉（張我軍譯）。《台灣民報》（東京），8-11。
- 山川均 (1926g, 07/04)。〈弱少民族の悲哀：在「一視同仁」「内地延長主義」「同化融合政策」下の台灣（續）〉（張我軍譯）。《台灣民報》（東京），7-9。
- 山川均 (1926h, 07/11)。〈弱少民族の悲哀：在「一視同仁」「内地延長主義」「同化融合政策」下の台灣（續）〉（張我軍譯）。《台灣民報》（東京），9-11。
- 山川均 (1926i, 07/18)。〈弱少民族の悲哀：在「一視同仁」「内地延長主義」「同化融合政策」下の台灣（續）〉（張我軍譯）。《台灣民報》（東京），9-10。
- 山川均 (1926j, 07/25)。〈弱少民族の悲哀：在「一視同仁」「内地延長主義」「同化融合政策」

- 下的台灣（續）（張我軍譯）。《台灣民報》（東京），8-9。
- 山川均（1926k, 09/30）。〈嗚呼台灣的民眾（三）〉（李繼煌譯）。《民國日報》（廣州），6。
- 山川均（1926l, 10/01）。〈嗚呼台灣的民眾（四）〉（李繼煌譯）。《民國日報》（廣州），6。
- 山川均（1926m, 10/02）。〈嗚呼台灣的民眾（五）〉（李繼煌譯）。《民國日報》（廣州），6。
- 山川均（1926n, 10/05）。〈嗚呼台灣的民眾（六）〉（李繼煌譯）。《民國日報》（廣州），6。
- 山川均（1926o, 10/06）。〈嗚呼台灣的民眾（七）〉（李繼煌譯）。《民國日報》（廣州），6。
- 山川均（1926p, 10/08）。〈嗚呼台灣的民眾（八）〉（李繼煌譯）。《民國日報》（廣州），6。
- 山川均（1926q, 10/09）。〈嗚呼台灣的民眾（九）〉（李繼煌譯）。《民國日報》（廣州），6。
- 山川均（1926r, 10/20）。〈嗚呼台灣的民眾（十一）〉（李繼煌譯）。《民國日報》（廣州），6。
- 山川均（1926s, 10/21）。〈嗚呼台灣的民眾（十二）〉（李繼煌譯）。《民國日報》（廣州），6。
- 山川均（1926t, 10/26）。〈嗚呼台灣的民眾（十三）〉（李繼煌譯）。《民國日報》（廣州），6。
- 山川均（1926u, 10/28）。〈嗚呼台灣的民眾（十四）〉（李繼煌譯）。《民國日報》（廣州），6。
- 山川均（1926v, 10/29）。〈嗚呼台灣的民眾（十五）〉（李繼煌譯）。《民國日報》（廣州），6。
- 山川均（1926w, 11/19）。〈嗚呼台灣的民眾（十六）〉（李繼煌譯）。《民國日報》（廣州），6。
- 山川均（1926x, 11/20）。〈嗚呼台灣的民眾（十七）〉（李繼煌譯）。《民國日報》（廣州），6。
- 山川均（1926y, 11/22）。〈嗚呼台灣的民眾（十八）〉（李繼煌譯）。《民國日報》（廣州），6。
- 山川均（1926z, 11/23）。〈嗚呼台灣的民眾（十九）〉（李繼煌譯）。《民國日報》（廣州），6。
- 山川均（1926a, 11/24）。〈嗚呼台灣的民眾（二十）〉（李繼煌譯）。《民國日報》（廣州），6。
- 山川均（1926β, 11/25）。〈嗚呼台灣的民眾（二十一）〉（李繼煌譯）。《民國日報》（廣州），6。
- 山川均（1926γ, 11/26）。〈嗚呼台灣的民眾（二十二·完）〉（李繼煌譯）。《民國日報》（廣州），6。
- 山川均（1930a）。《台灣民眾的悲哀》（蕉農〔宋斐如〕譯）。北平：新亞洲書局。
- 山川均（1930b）。〈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蕉農〔宋斐如〕譯）。《新東方》，第1卷第3號（北平），127-159。
- 山川均（1930c）。〈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續）〉（蕉農〔宋斐如〕譯）。《新東方》，第1卷第4號（北平），93-115。
- 山川均（1976a）。《山川均全集》（第5卷）。東京：勁草書房。
- 山川均（1976b）。〈尊敬すべき同志山口小静氏〉。收錄於：山川菊栄、山川振作（編），《山川均全集》（第5卷，頁199-201）。東京：勁草書房。
- 山川均（1976c）。《山川均全集》（第7卷）。東京：勁草書房。
- 山川振作（1976）。〈編者あとがき〉。收錄於：山川菊栄、山川振作（編），《山川均全集》（第3卷，頁439-448）。東京：勁草書房。
- 山辺健太郎（編）。（1971）。《台灣》（二）。東京：みすず書房。
- 山辺健太郎（編）。（1977）。《社會主義運動》（一）。東京：みすず書房。
- 山辺健太郎（編）。（1982）。《社會主義運動》（七）。東京：みすず書房。
- 山口小静（1916, 11/04）。〈晴天鶴〉。《台灣日日新報日刊》（台北），1。
- 山口小静（1917, 01/03）。〈遠山雪〉。《台灣日日新報日刊》（台北），1。
- 山口小静（1923）。〈赤化か緑化か〉。收錄於：水曜會出版部（編），《匈牙利的勞農革命》（頁32-34）。東京：水曜會出版部。
- 上海市委黨史徵集委員會（編）。（1986）。《上海大學（一九二三—一九二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少峰（1924）。〈更待何時〉。《平平旬刊》，第7期（上海），1-2。
- 社盟鋤頭組（1973）。〈台灣牌的社會主義〉。《台灣人民》，第3期（Halifax），31-39、29。
- 社盟角尺組（1972a）。〈關於台灣革命的若干看法（一）〉。《台灣人民》，第1期（Halifax），4-14。
- 社盟角尺組（1972b）。〈關於台灣革命的若干看法（二）〉。《台灣人民》，第2期（Halifax），5-13。
- 社盟評論員（1972）。〈〔社論〕世界大局與台灣問題〉。《台灣人民》，第2期（Halifax），1-4。
- 沈志華（編）。（2007）。《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北京：新華出版社。

- 施文杞（1924, 02/11）。〈〔寓言小說〕台娘悲史〉。《台灣民報》（東京），15-16。
- 石川禎浩（2006）。《中國共產黨成立史》（袁廣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石家駒〔陳映真〕（1999）。〈一場被遮斷的文學論爭——關於台灣新文學諸問題的論爭（一九四七—一九四九）〉。收錄於：陳映真（編），《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噤啞的論爭（頁 14-31）。台北：人間出版社。
- 史可乘〔連溫卿〕（1954）。〈人類之家·台灣 ESP 學會〉。《台北文物》，第 3 卷第 1 期（台北），91-93。
- 史明（1962）。《台灣人四百年史》。東京：音羽書房。
- 史明（1967）。〈怎麼樣來達成台灣獨立〉。《獨立台灣》，第 2 號（東京），3-12。
- 史明（1969a）。〈台灣民族——其形成與發展（六）：第四章 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殖民地社會的近代發展〉。《獨立台灣》，第 14 號（東京），6-19。
- 史明（1969b）。〈台灣民族——其形成與發展（七）：第四章 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殖民地社會的近代發展（二）〉。《獨立台灣》，第 15 號（東京）。
- 史明（1970a）。〈台灣民族——其形成與發展（十一）：第五章 中國蔣政權軍閥式專制獨裁下之「台灣殖民地」（一）〉。《獨立台灣》，第 21 號（東京），2-22。
- 史明（1970b）。〈史明 答〉（1970.6.6）。《獨立台灣》，第 23 號（東京），D-H。
- 史明（1970c）。〈史明 答〉。《獨立台灣》，第 25 號（東京），6-13。
- 史明（1970d）。〈〔專刊〕台灣革命過程中的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社會革命〉。《獨立台灣》，第 27 號（東京），1-35。
- 史明（1972）。〈階級·民族·革命〉（1972.10.24）。《獨立台灣》，第 50 號（東京），4-15。
- 史明（1974）。《台灣人四百年史》。東京：新泉社。
- 史明（1980）。《台灣人四百年史》。聖荷西：蓬萊島文化公司。
- 史明（2001）。《台灣民族主義與台灣獨立革命》。台北：前衛出版社。
- 矢內原忠雄（1929）。《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京：岩波書店。
- 矢內原忠雄（1963）。《植民及植民政策》（1926）。收錄於：楊井克己等（編），《矢內原忠雄全集》（第 1 卷，頁 1-518）。東京：岩波書店。
- 矢內原忠雄（2002）。《日本帝國主義下の臺灣》（周憲文譯）。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 市川正一（1954）。《日本共產黨鬥爭小史》（田舍譯）。北京：世界知識社。
- 壽田（1924, 03/08）。〈國內世界語團體調查〉。《覺悟》（上海），3。
- 述之〔彭述之〕（1924a, 09/03）。〈帝國主義與義和團運動〉。《嚮導週報》（上海），合訂本頁 646-652。
- 述之〔彭述之〕（1924b, 10/08）。〈辛亥革命的原因與結果〉。《嚮導週報》（上海），合訂本頁 699-703。
- 水曜會出版部（編）。（1923）。《匈牙利の勞農革命》。東京：水曜會出版部。
- 碩夫（1926, 06/03）。〈上海五卅周年運動之經過及其意義〉。《嚮導週報》（上海），合訂本頁 1505-1514。
- 思順與君宇（1922, 10/04）。〈讀獨秀君造國論底疑問〉。《嚮導週報》（上海），合訂本頁 34-35。
- 斯大林（1956）。〈論列寧主義基礎〉（1924.4）。收錄於：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斯大林全集》（第 6 卷，頁 62-165）。北京：人民出版社。
- 斯大林（1972）。《論反對派》（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 斯民〔范本梁〕（1926）。〈我們的革命運動〉。《新台灣》，第 3 號（北京），1-3。
- 四無〔吳稚暉〕（1908）。〈無政府主義可以堅決革命黨之責任心〉。《新世紀》（巴黎），10-13。
- 松田はるひ（1977-1978）。〈緑の蔭で——植民地台灣エスベラント運動史〉。《La Revuo Orienta》，第 58 卷第 6-9、11 期，第 59 卷第 1 期。
- 松尾尊兌（2000）。〈コスモ俱樂部小史〉。《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紀要》，第 26 号（京都），19-58。

- 宋洪訓(1987)。〈共產國際歷史上的兩次策略轉變〉，《國際共運史研究》，第1輯(北京)，26-44。
- 蘇哥(1924, 05/14)。〈洋大人家裡的奶媽〉。《婦女週報》(上海)，5-7。
- 蘇蕪雨(1975)。〈祖國廿五年回憶錄(上)〉。《傳記文學》，第27卷第1期(台北)，23-28。
- 蘇新(1993a)。〈連溫卿與台灣文化協會〉。收錄於：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頁100-106)。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 蘇新(1993b)。〈關於「台獨」問題〉(1980.5.5)。收錄於：蘇新，《未歸的台共鬥魂》(頁258-304)。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 蘇新(2002)。〈談台灣解放問題〉(1949.2.16)。《左翼》，第27號(台北)，2-4。
- 孫達人(1999)。〈論前進與後退：「建設台灣新文學之路」讀後〉(1948.5.28)。收錄於：陳映真、曾健民(編)，《1947-1949 台灣文學問題論議集》(頁105-112)。台北：人間出版社。
- 孫武震與許俊基(編)。(1985)。《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北京：人民出版社。

T

- 台風(1970)。〈「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的讀後感〉(1970.8)。《獨立台灣》，第26號(東京)，B22-B24。
- 台南新報(1923, 08/07)。〈學生の主義者〉。《台南新報》(台南)，7。
- 台松(1974)。〈內容和形式的辨證關係〉。《台灣人民》，第8期(Halifax)，11-18、31。
- 台灣*(1922)。〈本社幹事異動〉。《台灣》，第3年第8號(東京)，69。
- 台灣*(1923a)。〈「學界消息」曉鐘會ノ成立〉。《台灣》，第4年第1號(東京)，72。
- 台灣*(1923b)。〈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の成立〉。《台灣》，第4年第3號(東京)，80。
- 台灣革命*(1975a)。〈關於李清一事件的討論〉。《台灣革命》，第1期(Toronto)，8-23。
- 台灣革命*(1975b)。〈愛國主義與台灣新民主主義革命〉。《台灣革命》，第1期(Toronto)，50-52。
- 台灣革命*(1976a)。〈台灣民間資本與國民黨政治體制：現階段的機會主義問題之五〉。《台灣革命》，第4期(Toronto)，55-62。
- 台灣革命*(1976b)。〈資產階級與民主革命問題〉。《台灣革命》，第5期(Toronto)，51-57。
- 台灣革命黨*(1985, 01/05)。〈台灣革命黨建黨宣言〉。《美麗島週報》(Los Angeles)，2。
- 台灣民報*(1923a, 08/01)。〈石煥長君被拘事件〉。《台灣民報》(東京)，5。
- 台灣民報*(1923b, 12/11)。〈編輯餘話〉。《台灣民報》(東京)，10。
- 台灣民報*(1924a, 01/01)。〈編輯餘話〉。《台灣民報》(東京)，17。
- 台灣民報*(1924b, 03/21)。〈中國對露國的承認條件〉。《台灣民報》(東京)，7。
- 台灣民報*(1924c, 03/21)。〈台灣通信〉。《台灣民報》(東京)，11。
- 台灣民報*(1924d, 03/21)。〈編輯餘話〉。《台灣民報》(東京)，16。
- 台灣民報*(1924e, 04/11)。〈編輯餘話〉。《台灣民報》(東京)，16。
- 台灣民報*(1924f, 04/21)。〈編輯餘話〉。《台灣民報》(東京)，16。
- 台灣民報*(1924g, 05/11)。〈編輯餘話〉。《台灣民報》(東京)，16。
- 台灣民報*(1924h, 06/11)。〈中俄國交恢復〉。《台灣民報》(東京)，2。
- 台灣民報*(1924i, 06/11)。〈社會進化與婦人的地位〉。《台灣民報》(東京)，7-10。
- 台灣民報*(1924j, 06/11)。〈編輯餘話〉。《台灣民報》(東京)，15。
- 台灣民報*(1924k, 06/21)。〈文協消息〉。《台灣民報》(東京)，3-4。
- 台灣民報*(1924l, 07/01)。〈既經受諾的中國國權恢復主義〉。《台灣民報》(東京)，3。
- 台灣民報*(1924m, 07/21)。〈加拉罕捧呈國書〉。《台灣民報》(東京)，2。
- 台灣民報*(1924n, 07/21)。〈中國反帝國主義之民眾運動〉。《台灣民報》(東京)，2。
- 台灣民報*(1924o, 08/11)。〈中俄正式會議〉。《台灣民報》(東京)，2。

- 台灣民報* (1924p, 08/11)。〈勿落人後（七月十日東京日日社說）〉。《台灣民報》（東京），9-10。
- 台灣民報* (1924q, 08/11)。〈中俄互派大使〉。《台灣民報》（東京），10-11。
- 台灣民報* (1924r, 08/11)。〈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北京八校教職員發表宣言〉。《台灣民報》（東京），13。
- 台灣民報* (1924s, 09/11)。〈廢約同盟敬告使團〉。《台灣民報》（東京），9。
- 台灣民報* (1924t, 09/21)。〈北京通信：中國外交上開一新紀元〉。《台灣民報》（東京），3。
- 台灣民報* (1924u, 09/21)。〈北京的反帝國主義聯盟致世界被壓迫民族書〉。《台灣民報》（東京），9。
- 台灣民報* (1924v, 09/21)。〈中國新國恥日排外運動：反帝國主義聯盟對全國的支部發會宣言〉。《台灣民報》（東京），10。
- 台灣民報* (1924w, 10/01)。〈論廢止不平等條約運動（中華新報社說）〉。《台灣民報》（東京），9。
- 台灣民報* (1924x, 10/11)。〈辛丑紀念（九月七日中華新報社說）〉。《台灣民報》（東京），9。
- 台灣民報* (1925, 08/26)。〈本社特設五問〉。《台灣民報》（東京），52-55。
- 台灣民報* (1927, 12/25)。〈來年に繰越す・重大事件の決算・社會運動史上に特筆すべきもの四つ〉。《台灣民報》（台北），10。
- 台灣民族民主革命同盟* (1983, 07/16)。〈台灣民族民主革命同盟的「革命建國綱領」〉。《美麗島週報》（Los Angeles），15。
- 台灣前進會馬列主義研讀小組 (1981)。《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說與台灣革命》。Stockholm：台灣前進會。
- 台灣人民* (1972)。〈內部書信討論數則〉。《台灣人民》，第2期（Halifax），40-45。
- 台灣人民* (1974a)。〈編輯報告〉。《台灣人民》，第8期（Halifax），封底裡，52。
- 台灣人民* (1974b)。〈編輯報告〉。《台灣人民》，第9期（法國），65。
- 台灣人民社會主義同盟鋤頭組 (1972)。〈台灣人民的獨立、解放、革命兼論台、中關係〉。《台灣人民》，第1期（Halifax），15-19。
- 台灣日日新報* (1922, 09/18)。〈開慈善音樂會〉。《台灣日日新報日刊》（台北），4。
- 台灣日日新報* (1923a, 01/27)。〈社會を改造する前に自己の頭腦を改造せよと蔣渭水を戒告せる峻烈なる檢察官の論告〉。《台灣日日新報日刊》（台北），7。
- 台灣日日新報* (1923b, 02/04)。〈新台灣聯盟主幹新しがつてゐる娘との豔事から色消の裁判沙汰を起す〉。《台灣日日新報日刊》（台北），7。
- 台灣日日新報* (1923c, 02/05)。〈新台灣聯盟の演說會中止〉。《台灣日日新報日刊》（台北），7。
- 台灣日日新報* (1923d, 02/06)。〈石醫師之醜態〉。《台灣日日新報日刊》（台北），6。
- 台灣日日新報* (1923e, 06/02)。〈謝氏罷飛行業〉。《台灣日日新報日刊》（台北），6。
- 台灣日日新報* (1923f, 06/02)。〈謝文達君飛行界から隱退・今後は無産者の分相應な・工場の一職工一運轉手として働く〉。《台灣日日新報日刊》（台北），7。
- 台灣日日新報* (1923g, 08/07)。〈不良學生の過激主義。或は金の為か〉。《台灣日日新報日刊》，7。
- 台灣日日新報* (1923h, 08/22)。〈持久戦に入つたらしい・臺北印刷製本業主對本島人の賃銀爭議〉。《台灣日日新報日刊》（台北），7。
- 台灣日日新報* (1924a, 03/12)。〈文化協會の講演會解散・連溫卿の講演最中に〉。《台灣日日新報日刊》（台北），7。
- 台灣日日新報* (1928a, 05/11)。〈無政府主義東方聯盟を組織・宣傳費十萬元を・巧妙な國際為替詐欺で騙取した事件・主犯は新竹州生れの林炳文〉。《台灣日日新報夕刊》（台北），2。
- 台灣日日新報* (1928b, 05/11)。〈偽造を發見した・全島郵便局・警戒が嚴重なので・一文も詐取出來なかつた〉。《台灣日日新報日刊》（台北），7。
- 台灣日日新報* (1928c, 05/12)。〈宣傳無政府主義之鮮人逮捕詳報・被係官質問猛然反抗終自吐漏事實〉。《台灣日日新報日刊》（台北），4。

- 台灣日日新報* (1928d, 05/12)。〈お前は鮮人の申丹齋であらうと・係官に一喝され・猛然として反抗した・基隆署逮捕の劉文祥・遂に泥に吐く〉。《台灣日日新報夕刊》(台北), 4。
- 台灣時代* (1981)。〈編輯報告〉。《台灣時代》, 第 12 期 (Ontario), 1。
- 台灣時代* (1982)。〈編輯報告〉。《台灣時代》, 第 13 期「史明問題討論專刊」(Ontario), 1。
- 台灣思潮社 (1982)。〈致一群人信 (1981/7/1)〉。《台灣思潮》, 第 4 期 (Los Angeles), 93-95。
- 台灣文化協會* (1924, 03/11)。〈台灣文化協會會報(創立第三年度第一回報告)〉。《台灣民報》(東京), 14-16。
- 台灣新民報社 (編)。(1937)。《台灣人士鑑(昭和十二年版)》。台北: 臺灣新民報社。
- 台灣新民報社調查部 (編)。(1934)。《台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台北: 台灣新民報社。
-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編)。(1939a)。《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警察機關の構成》。台北: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編)。(1939b)。《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編)。(1989a)。《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北: 創造出版社。
-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編)。(1989b)。《台灣社會運動史》「政治運動」(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北: 創造出版社。
-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編)。(1989c)。《台灣社會運動史》「共產主義運動」(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北: 創造出版社。
-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編)。(1989d)。《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北: 創造出版社。
-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編)。(1995)。《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王詩琅譯)。台北: 稻鄉出版社。
- 陶季邑 (1998)。〈關於「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首次使用問題——與陳金龍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 1998 年第 6 期 (北京), 221-225。
- 田誠 (1922, 12/27)。〈「今日」派之所謂馬克思主義〉。《嚮導週報》(上海), 合訂本頁 122-123。
- 田口運藏 (1924)。〈階級意識〉(任一(羅任一)譯)。《平平旬刊》, 第 9 期 (上海), 1。
- 同人 (1924)。〈發刊詞〉。《平平旬刊》, 創刊號 (上海), 1。
- 涂照彥 (1999)。《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李明峻譯)。台北: 人間出版社。

W

- Wallerstein, I. (1993). *Historical Capitalism*. New York: Verso.
- Wallerstein, I. (1999)。《歷史資本主義》(路愛國、丁浩金譯)。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外務省記錄 (1921a, 09/22)。〈太平洋會議ヲ機トシ台灣獨立運動計畫ニ関スル件〉。《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外務省記錄 (1921b, 10/07)。〈要視察者蔡惠如ノ行動ニ関スル件〉。《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外務省記錄 (1921c, 11/16)。〈太平洋會議ヲ機トシ台灣人獨立運動計畫ニ関スル件〉。《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外務省記錄 (1921d, 12/24)。〈台灣政治運動者ノ來往ニ関スル件〉。《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外務省記錄 (1922a, 02/19)。〈新台灣社創刊宣言配布ノ件〉。《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4.3.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外務省記錄 (1922b, 02/19)。〈新台灣社組織ニ關スル件〉。《不逞團關係雜件/台灣人ノ部》

- (4.3.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外務省記録(1922c, 06/05)。(在北京台灣學生ニ關スル件)。《不逞団關係雜件/台湾人ノ部》
 (4.3.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外務省記録(1923, 03/16)。(皇太子殿下行啟ニ關スル各種要視察人ノ件)。《不逞団關係雜件
 /台湾人ノ部》(4.3.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外務省記録(1924a, 01/17)。(在滬台灣人ノ決議文提出ニ關スル件)。《不逞団關係雜件/台
 湾人ノ部》(4.3.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外務省記録(1924b, 06/10)。(10・共産党機關雜誌「平平」)。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
 ター) Ref.B03040865600, 《新聞雜誌ニ關スル調査雜件・第二卷》(1.3.2) (外務省外交
 史料館)。
 外務省記録(1924c, 07/14)。(在上海一部台灣青年學生等行動ニ關スル件)。《不逞団關係雜
 件/台湾人ノ部》(4.3.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外務省記録(1924d, 07/31)。(在上海一部台灣青年學生等ノ傳單配布ニ關スル件)。《不逞団
 關係雜件/台湾人ノ部》(4.3.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外務省記録(1924e, 08/02)。(臺韓同志會ノ規約其他ニ關スル件)。《不逞団關係雜件/台湾
 人ノ部》(4.3.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外務省記録(1924f, 08/12)。(臺韓同志會主催ノ臺鮮人大會ノ件)。《不逞団關係雜件/台湾
 人ノ部》(4.3.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外務省記録(1924g, 08/30)。(中華全國學生總會豫備會ニ於ケル臺韓同志會ノ宣傳ニ關スル
 件)。《不逞団關係雜件/台湾人ノ部》(4.3.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外務省記録(1924h, 10/06)。(在上海台灣自治協會及台韓同志會ノ宣傳ニ關スル件)。《不逞
 団關係雜件/台湾人ノ部》(4.3.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外務省記録(1924i, 12/27)。(台灣自治協會ノ傳單配布ノ件)。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
 ター) Ref.B03041024600, 《在内外協會關係雜件/在内ノ部 第四卷/15・台灣自治協
 會》(1.3.3)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外務省記録(1925a, 01/14)。(台韓同志會ノ傳單配布ニ關スル件)。《不逞団關係雜件/台湾
 人ノ部》(4.3.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外務省記録(1925b, 02/13)。(特別要視察人台灣人彭華英渡支ノ件)。《不逞団關係雜件/台
 湾人ノ部》(4.3.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外務省記録(1925c, 03/04)。(中韓台友誼會及台韓同志會ノ傳單配布ニ關スル件)。《不逞団
 關係雜件/台湾人ノ部》(4.3.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外務省記録(1925d, 04/02)。(在北京台灣籍民ニ關スル件)。《不逞団關係雜件/台湾人ノ部》
 (4.3.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外務省記録(1925e, 09/21)。(露國ヨリ歸來セル台灣人ノ言動ニ關スル件)。《不逞団關係雜
 件/台湾人ノ部》(4.3.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外務省記録(1926a, 03/29)。(不穩印刷物押收ニ關スル件)。《不逞団關係雜件/台湾人ノ部》
 (4.3.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外務省記録(1926b, 04/23)。(東京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俱樂部ニ關スル件)。JACAR (アジア
 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03041029600, 《在内外協會關係雜件/在内ノ部 第五卷/21・
 東京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俱樂部》(1.3.3)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外務省記録(1926c, 05/19)。(秘密出版物「新台灣」ニ關スル件)。《不逞団關係雜件/台湾
 人ノ部》(4.3.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外務省記録(1929, 05/07)。(要視察台灣人ノ來往ニ關スル件)。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
 ター) Ref.B04013163300 (第13画像目から), 《要視察人關係雜纂/本邦人ノ部/台湾
 人關係 5・昭和五年》(1.4)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外務省記録(1930a)。(13・東京通信社)。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02030938800

- ，《本邦通信機關及通信員關係雜纂／通信機關ノ部／2 昭和5年4月4日から昭和5年5月12日》(1.3.1)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外務省記録(1930b)。〈第三號。在支台灣籍民ノ共產主義運動重要人物名簿(昭和五年四月調)〉。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04013047900, 《各国共産党關係雜件／中国ノ部／共産黨員名簿關係 1・北京》(1.4)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外務省記録(1930c, 10/14)。〈要視察台灣人／來往ニ關スル件〉。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04013163400 (第37画像目から), 《要視察人關係雜纂／本邦人ノ部／台灣人關係 5・昭和五年》(1.4)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汪暉(2008)。〈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60年代的消逝〉。收錄於：汪暉, 《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頁1-57)。北京：三聯書店。
- 汪敬虞(2007)。《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心線索問題研究》。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 汪鐵峰〔王學文〕(1929a)。〈日本帝國主義治下的台灣——殖民地台灣之經濟的意義〉。《世界雜誌》，第1卷第1期(上海)，111-118。
- 汪鐵峰〔王學文〕(1929b)。〈日本帝國主義治下的台灣——殖民地台灣之經濟的意義(續完)〉。《世界雜誌》，第1卷第2期(上海)，327-350。
- 王傳厚(1991)。〈中共安徽省第一任省委書記——王步文傳略〉。收錄於：安徽省政協《安徽著名歷史人物叢書》編委會(編), 《革命中堅》(頁85-88)。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王德權(2003)。〈古代中國體系的搏成——關於許倬雲先生「中國體系網絡分析」的討論〉。《新史學》，第14卷第2期(台北)，143-201。
- 王汎森(1995)。〈劉師培與清末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大陸雜誌》，第90卷6期(台北)，1-9。
- 王凌雲(1985)。〈大革命時期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黨史研究資料》，第5期(成都)，332-338。
- 王茂盛(1981a)。〈從革命觀點看台灣製造業就業人口的演化：壹、本世紀初到一九三七年〉。《台灣思潮》，第1期(Los Angeles)，2-14。
- 王茂盛(1981b)。〈從革命觀點看台灣製造業就業人口的演化：貳、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九年〉。《台灣思潮》，第2期(Los Angeles)，72-84。
- 王茂盛(1981c)。〈從革命觀點看台灣製造業就業人口的演化：參、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九年〉。《台灣思潮》，第3期(Los Angeles)，56-67。
- 王茂盛(1982)。〈從革命觀點看台灣製造業就業人口的演化：肆、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九年〉。《台灣思潮》，第4期(Los Angeles)，30-47。
- 王慶祥(1997)。《范船僧》。浙江：象山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
- 王秋心(1981)。〈親切的教誨 難忘的記憶——回憶孫中山先生兩事〉。《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6輯(江西)，26-28。
- 王秋心與代英〔惲代英〕(1924)。〈文學與革命(通訊)〉。《中國青年》，第31期(上海)，12-14。
- 王曉波(編)。(2005a)。《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上冊)。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 王曉波(編)。(2005b)。《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下冊)。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 王學典(1996)。《二十世紀後半期中國史學主潮》。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 王學文(1930)。〈中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其發展及其前途〉。《新思潮》，第5期「中國經濟研究專號」(上海)，抽印頁1-27。
- 王學文(1986)。〈中國經濟學界概觀(1928.11.26)〉。收錄於：王學文, 《王學文經濟文選(一九二五—一九四九)》(頁64-71)。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 王遠義(2004)。〈無政府主義概念史的分析〉。《台大歷史學報》，第33期(台北)，399-425。
- 王振寰(1988)。〈國家角色、依賴發展與階級關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期(台北)，117-144。
- 威聖〔賀威聖〕(1924a)。〈責備賢者的幾句話〉。《平平旬刊》，第2期(上海)，8。
- 威聖〔賀威聖〕(1924b)。〈讀書難〉。《平平旬刊》，第3期(上海)，2-3。
- 威聖〔賀威聖〕(1924c)。〈學術運動與社會運動〉。《平平旬刊》，第5期(上海)，4-5。

- 威聖〔賀威聖〕(1924d)。〈學術運動與社會運動〉。《平平旬刊》，第6期(上海)，4-6。
- 威聖〔賀威聖〕(1924e)。〈學術運動與社會運動〉。《平平旬刊》，第7期(上海)，5-6。
- 威聖〔賀威聖〕(1924f)。〈學術運動與社會運動〉。《平平旬刊》，第8期(上海)，5-6。
- 威聖〔賀威聖〕(1924g)。〈學術運動與社會運動〉。《平平旬刊》，第9期(上海)，5-8。
- 尾崎秀樹(1982)。〈山口小静の生と死——山川菊栄の回想にふれて〉。《山川菊栄集月報》(第4回第9卷，頁1-3)。東京：岩波書店。
- 梶村秀樹與姜德相(編)。(1972)。《朝鮮》(五)。東京：みすず書房。
- 衛藤瀋吉與許淑真(1984)。《鈴江言一伝》。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溫・連〔連溫卿〕(1926a, 08/15)。〈印度的實淫〉。《台灣民報》(東京)，12-13。
- 溫・連〔連溫卿〕(1926b, 09/19)。〈「亡羊補牢」〉。《台灣民報》(東京)，12-13。
- 溫・連〔連溫卿〕(1926c, 12/12)。〈要怎麼看〉。《台灣民報》(東京)，11-13。
- 溫・連〔連溫卿〕(1926d, 12/12)。〈要怎麼看(下)〉。《台灣民報》(東京)，13-15。
- 吳承明(1996a)。〈中國近代經濟史若干問題的思考〉。收錄於：吳承明，《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頁7-20)。雲南：雲南大學出版社。
- 吳承明(1996b)。〈論廣義政治經濟學〉。收錄於：吳承明，《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頁29-43)。雲南：雲南大學出版社。
- 吳明時(2004)。〈一九九〇年代的基層臺獨運動——一個社會運動的觀點〉。《國史館學術集刊》，第4期(台北)，229-285。
- 吳叡人(2006)。〈台灣後殖民論綱：一個黨派性的觀點〉。《思想》，第3期(台北)，93-103。
- 吳壽彭等(1929)。《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訓練處。
- 吳志成(1973)。〈從島內出來的一份報告〉。《台灣人民》，第4期(Halifax)，32-35。

X

- 夏衍(1988)。《夏衍選集》(第4卷)。四川：四川文藝出版社。
- 夏祖麗(2000)。《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向井孝(1974)。《山鹿泰治·人とその生涯》。東京：青娥房。
- 向陽(1989)。〈華崗著作年表〉。《衢州文史資料》，第6輯(衢州)。
- 象山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91)。〈姜冰生〉。收錄於：象山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象山文史資料》(第五輯，頁113-114)。浙江：象山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
- 蕭友山(1946)。《臺灣解放運動的回顧》。臺北：三民書局。
- 蕭友山與徐瓊二(2002)。《臺灣光復後的回顧與現狀》(陳平景譯)。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 曉風〔陳望道〕(1921, 03/15)。〈日本社會運動家態度漸趨一致的原因〉。《覺悟》(上海)，1。
- 謝金蓉(2005)。《蔡惠如和他的時代》。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 謝廉清(1926a)。「謝廉清演說的大意」。收錄於：李漢石(李伯剛)(編)，《反帝國主義運動》(頁49-52)。上海：經濟研究會。
- 謝廉清(1926b)。〈帝國主義的運命〉。收錄於：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編(編)，《反帝國主義概要》(頁110-115)。上海：經濟研究會。
- 謝雪紅(2004)。《我的半生記》。台北：楊翠華。
- 謝蔭明(1982)。〈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北京黨史資料通訊》，總第4期(北京)。
- 謝蔭明(1984)。〈北京反帝大聯盟的成立及其主要活動〉。《歷史教學》，1984年第9期(北京)，13-15。
- 新國際(2009, 05/08)。〈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許登源紀念專輯〉。《新國際》(台北)，1-4。
- 新世紀(1907a)。〈新世紀之革命〉。《新世紀》，第1號(巴黎)，1-3。
- 新世紀(1907b)。〈吾道不孤〉。《新世紀》，第13號(巴黎)，3。
- 新台灣大眾時報*(1931)。〈台灣文化協會當面的任務〉。《新台灣大眾時報》，第2卷第1號(東

- 京), 17-37。
- 新台灣聯盟 (1922a)。〈新台灣聯盟宣言書〉(日文)。《台灣》, 第3年第8號(東京), 67-68。
- 新台灣聯盟 (1922b)。〈新台灣聯盟宣言書〉(漢文)。《台灣》, 第3年第9號(東京), 40。
- 新台灣社 (1923)。〈本社要緊啟事〉。《新台灣創刊的宣言》(北京), 2。
- 新台灣社同人 (1923)。〈新台灣創刊的宣言!!〉。《新台灣創刊的宣言》(北京), 1。
- 興南新聞社 (編)。(1943)。《台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台北: 興南新聞社。
- 幸德秋水(1997)。〈獄中致三律師的申辯書〉(1910.12.18)。收錄於: 幸德秋水,《基督何許人也——基督抹煞論》(頁99-108)。北京: 商務印書館。
- 熊得山 (1922)。〈「名」「實」底討論〉。《今日》, 第2卷第4號(北京), 1-6。
- 秀潮〔許乃昌〕(1923, 07/15)。〈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台灣民報》(東京), 3-4。
- 秀湖〔許乃昌〕(1923)。〈友邦〉。《中國青年》, 第3期(上海), 8。
- 秀湖生〔許乃昌〕(1923a)。〈歐戰後的中國思想界〉。《台灣》, 第4年第5號(東京), 38-42。
- 秀湖生〔許乃昌〕(1923b)。〈台灣議會と無產階級解放〉。《台灣》, 第4年第7號(東京), 43-48。
- 虛無〔謝廉清〕(1924, 01/01)。〈〔雜錄〕上海台灣青年會之創立〉。《台灣民報》(東京), 13。
- 徐三郎 (1974)。〈團結於進步〉。《台灣人民》, 第9期(法國), 24-25。
- 徐善廣與柳劍平 (1989)。《中國無政府主義史》。湖北: 湖北人民出版社。
- 許登源 (1987)。〈二·二八前夕的台灣經濟〉。《台灣與世界》, 1987年4月號(New York), 20-28。
- 許滌新與吳承明 (編)。(2003)。《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1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北京: 人民出版社。
- 許地山 (1930)。〈許序〉。收錄於: 山川均,《台灣民眾的悲哀》(蕉農〔宋斐如〕譯)(序言頁1-2)。北平: 新亞洲書局。
- 許地山 (編)。(1922)。《北京台灣青年會月刊》(特別號)。北京。
- 許宏義 (1987)。〈左雄路線與政客左雄〉。《台灣解放》, 創刊號(Darien IL.), 24-38。
- 許可成與孔寒冰 (1988)。〈從「工人政府」口號到「工農政府」口號——共產國際前五年策略思想的兩次轉變〉,《國際共運史研究》, 第6輯(1988, 北京), 1-19。
- 許銘義整理 (1993)。〈臺灣前途和兩岸關係: 紐約鄉情座談會紀錄〉。《海峽評論》, 第33期(台北), 21-34。
- 許乃昌 (1926a, 10/24)。〈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續)〉。《台灣民報》(東京), 9-11。
- 許乃昌 (1926b, 10/31)。〈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續·完)〉。《台灣民報》(東京), 9-11。
- 許南村〔陳映真〕(編)。(2002)。《反對言偽而辯》。台北: 人間出版社。
- 許天民 (1924, 01/22)。〈台灣人的賀年片〉。《民國日報》(上海), 8。
- 許秀湖〔許乃昌〕(1922, 12/22)。〈〔藝術談〕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底見解〉。《覺悟》(上海), 2。
- 許秀湖〔許乃昌〕(1923a)。〈〔雜譚〕讀「心潮」裡底五篇小說〉。《文學旬刊》, 第64期(上海), 4。
- 許秀湖〔許乃昌〕(1923b)。〈雜譚〉。《文學旬刊》, 第59期(上海), 4。
- 許之楨 (1980)。〈關於新漁陽里六號的活動情況〉。《黨史資料叢刊》, 總第2輯(上海), 39-42。
- 薛曉建 (1998)。〈非基督教運動述評〉。中國人民大學, 北京。

Y

- 嚴秀峰 (1995)。〈李友邦與中國抗戰和台灣光復〉。《海峽評論》, 第60期(台北), 53-55。
- 楊芳燕 (2004)。〈激進主義、現代情境與中國無政府主義之崛起〉。《臺大歷史學報》, 第33期(台北), 365-397。
- 楊公哲 (1981, 06/06)。〈論海外台灣革命運動中右派理論的真空狀態〉。《美麗島週報》(Los

- Angeles), 7。
- 楊克煌(1956)。《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 楊奎松(1997)。《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台北：東大圖書。
- 楊逵(2007a)。〈《第三代》及其他(1937)〉(曾健民譯)。收錄於：陳映真(編)，《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學習楊逵精神」(頁23-28)。台北：人間出版社。
- 楊逵(2007b)。〈六月十七日前後——紀念忠烈祠典禮〉(1946)(曾健民譯)。收錄於：陳映真(編)，《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學習楊逵精神」(頁15-22)。台北：人間出版社。
- 楊文隆(1973)。〈與一位右派朋友談台灣問題〉。《台灣人民》，第7期(Halifax)，11-15。
- 楊雲萍(1946)。〈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台灣文化》，第1期第1期(台北)，10-13。
- 野沢豊(1974)。〈序章 中國の國民革命についての序論的考察〉。收錄於：野沢豊(編)，《中國國民革命史の研究》(頁3-31)。東京：青木書店。
- 葉博夫(1989)。〈羅任一傳〉。《內江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四川)，135-151。
- 葉榮鐘(2000)。《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冊)。台北：晨星出版社。
- 葉芸芸(1988)。〈樂觀其成，寄予厚望：關於新黨成立的座談紀要〉(1986.11.1)。收錄於：葉芸芸(編)，《中共對台政策與台灣前途》(頁99-128)。台北：人間出版社。
- 葉芸芸(2006)。《餘生猶懷一寸心》。台北：INK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 伊羅生(1947)。《中國革命的悲劇》(劉海生譯)。上海：嚮導書局。
- 逸見吉三(1971)。〈台灣獨立運動に散つた無名鬼〉。《現代之眼》，第12卷第4期(東京)，200-209。
- 逸見吉三(1976)。《墓標なきアナキスト像》。東京：三一書房。
- 逸見吉三(1982)。〈記日據時代台灣兩位無政府主義者〉(游清水譯)。《台灣思潮》，第4期(Los Angeles)，89-92。
- 逸民(1924)。〈我對於懷疑洋人釘死奶媽的感想〉。《平平旬刊》，第8期(上海)，4-5。
- 尹蘇野〔尹滋英〕(1924)。〈韓國的民族運動〉。《平平旬刊》，創刊號(上海)，2-3。
- 友竹〔柳樹人〕(1930)。〈日本掠奪朝鮮與朝鮮獨立運動〉。《新東方》，第1卷第3號(北平)，31-45。
- 于光遠與韓綱(2005)。《「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讀史筆記》。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
- 越無〔連溫卿〕(1924)。〈蠹魚的旅行日記〉。琉球：比嘉春潮所藏剪貼稿本。

Z

- 朝日新聞社(1992)。《美術特集：前田寬治》。東京：朝日新聞社。
- 載德(1991)。〈載德報告中華學生廢約同盟會紀念九七國恥活動呈〉(1924.9.2)。收錄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民眾運動」，頁628-629)。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
- 臧汝興(2000)。〈韓國的社會結構體論爭(一)〉。《左翼》，第5號(台北)，24-25。
- 張繼與劉光漢(1907)。〈社會主義講習所廣告〉。《天義》，第3卷(東京)，51。
- 張懷智(1988)。〈瞿秋白與《赤潮曲》〉。《中國音樂》，1988年第1期(北京)，12-13。
- 張景(1983)。〈安那其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活動片斷〉。《文史資料選輯》，第90輯(北京)，113-124。
- 張良澤(1989)。《四十五自述：我的文學歷程》。台北：前衛出版社。
- 張隆志(1998)。〈劉銘傳、後藤新平與臺灣近代化論爭——關於十九世紀臺灣歷史轉型期研究的再思考〉。收錄於：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民國以來的史料與史學論文集》(頁2031-2056)。台北：國史館。
- 張隆志(2004)。〈殖民現代性分析與台灣近代史研究——本土史學史與方法論芻議〉。收錄於：若林正文、吳密察(編)，《跨界的台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頁133-160)。台北：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

- 張敏（1975）。〈階級鬥爭的問題〉。《台灣革命》，第2期（Toronto），48-54。
- 張慶海（1998）。〈論對「半封建」「半殖民地」兩個概念的理論界定〉。《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北京），226-234。
- 張深切（1947）。《在廣東發動的台灣獨立革命運動史略》。台中：中央書局。
- 張深切（1961）。《里程碑》。台中：聖工出版社。
- 張深切（1965）。《我與我的思想》。台中：張深切。
- 張深切（1998）。《里程碑》。台北：文經社。
- 張我軍（1923）。〈南支那に於ける排日對策〉。《台灣》，第4年第7號（東京），49-53。
- 張炎憲（1988）。〈社會民主主義者——連溫卿（一八九五——一九五七）〉。收錄於：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頁361-369）。台北：稻鄉出版社。
- 張友漁（1990）。〈回憶與鈴江言一的交往〉。收錄於：陳荷夫（編），《張友漁回憶錄》（頁119-12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張允侯等（編）。（1979）。《五四時期的社團》（第4卷）。北京：三聯書店。
- 彰生（1983）。〈日據時期台灣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連溫卿（一八九五～一九五七）〉。《夏潮論壇》，第1卷第3期（台北），58-61。
- 趙耿梅（1989）。〈漫談我中學生活與再晤蔣經國同學〉。收錄於：政協川沙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川沙文史資料》（第1輯，頁145-147）。上海：政協川沙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
- 趙樂（1986）。《西方現代派文學與藝術》。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
- 趙石（1978）。〈台灣的資本壟斷問題〉。《台灣時代》，第4期（Ontario），2-5、13。
- 浙江省社會科學研究所（1984）。〈崔曉立〉。收錄於：浙江省社會科學研究所（編），《浙江人物簡志》（下冊，頁280）。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 貞（1924）。〈台灣在五一紀念日的意義〉。《平平旬刊》，五一紀念特刊（上海）。
- 真一（1924a）。〈台灣怎麼樣了？〉。《平平旬刊》，創刊號（上海），9-11。
- 真一（1924b）。〈再談台灣問題〉。《平平旬刊》，第2期（上海），4-6。
- 真一（1924c）。〈台灣的人造地震〉。《平平旬刊》，第4期（上海），4。
- 真一（1924d）。〈台灣的自治和請願都不中用〉。《平平旬刊》，第7期（上海），2-4。
- 真一（1924e）。〈台灣的保甲法當如何廢除？〉。《平平旬刊》，第9期（上海），2-3。
- 鄭超麟（1996）。《鄭超麟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
- 鄭超麟（2004a）。《鄭超麟回憶錄》（上卷）。北京：東方出版社。
- 鄭超麟（2004b）。《鄭超麟回憶錄》（下卷）。北京：東方出版社。
- 鄭鴻生（2001）。《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鄭鴻生（2002）。〈變生肘腋——民族主義論戰突起（八）：記台大校園裡的第一場統獨論戰〉。《海峽評論》，2002年6月號（台北），61-63。
- 鄭鴻生與陳信行（2009）。〈紀念左翼前輩許登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4期（台北），501-504。
- 鄭學稼（1980）。〈劉師復和他的思想〉。收錄於：帕米爾書店編輯部（編），《劉師復文存》（頁67-97）。台北：帕米爾書店。
- 鄭衣德（2009，04/08）。〈保釣統運知名左翼理論家許登源逝世〉。《僑報》（洛杉磯）。擷取於2009/5/1，來自：http://www.usqiaobao.com/newscenter/2009-04/08/content_205523.htm
- 中村哲（1997）。〈中國前近代史理論的重構——序說〉。收錄於：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編），《中國前近代史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34）。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 中村哲（2002）。《東亞近代史理論的再探討》。北京：商務印書館。
- 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編）。（1992）。《中國共產黨北京市組織史資料：1921-1987》。北京：人民出版社。
-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與江蘇省檔案館（編）。（1987）。《江蘇革命鬥爭紀略》。北京：檔

- 案出版社。
- 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等（編）。（1991）。《中國共產黨上海市組織史資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199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1979a）。《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1卷）。北京：三聯書店。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1979b）。《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3卷）。北京：三聯書店。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1991a）。《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文化」）。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1991b）。《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政治」）。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
-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1989）。〈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1925.1）。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頁329-341）。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 中國共產黨擴大執行委員會（1989）。〈農兵士間的工作問題議決案〉（1924.5）。收錄於：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頁247-250）。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 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1951）。〈關於台灣工作〉（1948.5-6）。收錄於：國防部保密局（編），《搜獲共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重要秘密文件》（頁1-11）。台北：國防部保密局。
- 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編）。（1982）。《中國無政府主義資料選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2008）。《封建名實問題討論文集》。上海：江蘇人民出版社。
-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地方團（2001）。〈1924年北京地方團「公開解散、秘密另組」及審查合格的團員名單〉。收錄於：王效挺、黃文一（編），《戰鬥的足跡：北大地下黨有關史料選編》（頁51-5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中華全國總工會工運史研究室等（編）。（1983）。《二七大罷工資料選編》。北京：工人出版社。
- 中央檔案館（編）。（199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 中央檔案館與北京市檔案館（編）。（1991）。《北京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22-1926年）》。北京：北京市檔案館。
- 中央日報*（1951，10/09）。〈胡鄂公病逝〉。《中央日報》（台北），3。
- 中央統戰部與中央檔案館（編）。（1988）。《中共中央解放戰爭時期統一戰線文件選編》。北京：檔案出版社。
- 仲農（1925）。〈小宣言〉。《台灣新青年》，創刊號（廈門），23-25。
- 周斌（2006）。〈亞細亞民族會議與中國的反對運動〉。《抗日戰爭研究》，2006年第3期（北京），128-159。
- 周恩來（1983）。〈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1944）。收錄於：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周恩來選集》（上卷，頁157-187）。北京：人民出版社。
- 周利生（2004）。《吳廷康與中國大革命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周俟松與杜汝森（編）。（1989）。《許地山研究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朱華庭（1986）。〈「要將投袂興神州」——賀威聖烈士傳略〉。收錄於：中共浙江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辦公室、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不朽的戰士：浙江革命英烈傳》（第一集，頁1-6）。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 朱謙之（1925）。〈台灣學生聯合會演說辭（1925.4.12）〉。《台灣新青年》，創刊號（廈門），11-15。
- 朱謙之（1926）。〈序（1925.11.20）〉。收錄於：漢人〔黃玉齋〕，《台灣革命史》（序言頁1）。上

海：泰東圖書局。

- 朱世紀（1981）。〈台灣革命中的民族與階級問題〉。《美麗島週報》（Los Angeles），11。
- 朱雙一（2006）。〈《台灣民報》對五四新文學作品的介紹及其影響和作用〉。論文發表於：台北「日據時期台灣的文化與社會運動」研討會。
- 朱雙一（2008）。〈《台灣民報》對五四新文學作品的介紹及其影響和作用〉。《台灣研究集刊》，2008年第4期（廈門），84-93。
- 竹中信子（1996）。《殖民地台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大正篇）》。東京：田畑書店。
- 追風〔謝春木〕（1924, 09/11）。〈東京留學生夏季回台講演日記〉。《台灣民報》（東京），13-14。
- 準台灣人（1972）。〈回鄉前夕〉。《台灣人民》，第1期（Halifax），20-28。
- 卓言若〔陳映真〕（1999）。〈駱駝英對當代台灣文藝理論建設的貢獻——讀《論「台灣文學」諸論爭》筆記〉。收錄於：陳映真（編），《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噤啞的論爭」（頁45-64）。台北：人間出版社。
- 鄒議〔陳映真〕（2000）。〈讓歷史整備我們的隊伍〉。《左翼》，第5號（台北），1-4。
- 左雄（1970a）。〈「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1970.1.14）。《獨立台灣》，第23號（東京），B-D。
- 左雄（1970b）。〈從「台灣獨立」到「台灣革命」——讀林伯仁「切心總檢討」有感〉（1970.4.10）。《獨立台灣》，第23號（東京），J-N。
- 左雄（1970c）。〈兩個盲點〉（1967.6.15）。《獨立台灣》，第25號（東京），A14-A16。
- 左雄（1970d）。〈台灣革命的階級性與民族性〉（1970.7.28）。《獨立台灣》，第26號（東京），B8-B14。
- 左雄（1970e）。〈試論台灣革命的正確路線〉（1970.11.29）。《獨立台灣》，第26號（東京），B16-B19。
- 左雄（1971a）。〈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吧！〉（1970.12.20）。《獨立台灣》，第29號（東京），B18-B19。
- 左雄（1971b）。〈國際主義與台灣革命〉（1971.3.4）。《獨立台灣》，第31號（東京），B4-B7。
- 左雄（1971c）。〈階級鬥爭與思想路線〉（1971.3.17）。《獨立台灣》，第33號（東京），4-7。
- 佐野學（1923a）。〈將來の殖民政策について〉。《台灣》，第4年第1號（東京），12-18。
- 佐野學（1923b）。〈台灣議會の設置を助けよ〉。《台灣》，第4年第3號（東京），37-40。
- 佐野學（1923c）。〈弱小民族解放論——社會主義和民族運動〉。《台灣》，第4年第6號（東京），64-75。
- 佐野學（1924）。〈過上海〉。《平平旬刊》，創刊號（上海），3-4。

後記

Escribo para el pueblo, aunque no pueda
leer mi poesía con sus ojos rurales.
Vendrá el instante en que una línea, el aire
que removió mi vida, llegará a sus orejas,
y entonces el labriego levantará los ojos,
el minero sonreirá rompiendo piedras,
el palanquero se limpiará la frente,
el pescador verá mejor el brillo
de un pez que palpitando le quemará las manos,
el mecánico, limpio, recién lavado, lleno
de aroma de jabón mirará mis poemas,
y ellos dirán tal vez: “Fue un camarada”.

Eso es bastante, ésa es la corona que quiero.

—Pablo Neruda, “La gran alegría.”

要謝的人總是太多，太多的話我也已經寫在碩論的謝辭之中。此處僅列出協助我完成論文的師長朋友們的大名。更多的感謝的話，也許當面說吧！

關於論文的完成，首先感謝我的指導老師與口試委員：王遠義老師、黃俊傑老師、劉季倫老師、周婉窈老師。其次，在史料收集、閱讀、改寫的過程中，得到許多師友與單位的協助、指導，及建議。感謝張增榮先生、林書揚先生、陳映真先生、陳明忠先生、王津平老師、林彩美女士、劉孝春老師、曾健民醫師、胡冬竹學姊（上智大學）、陳大剛學長（人民大學）、唐曙老師、宋奎汶學姊（交通大學）、王武郎先生、臧汝興先生、施善繼先生與曾淑霞女士、杜繼平老師（世新大學）、曾育勤學姊（University of Essex）、藍博洲先生、葉芸芸女士、何學政學長（復旦大學）、宋文揚學長（台灣大學）、林哲元學長（南京大學）、陳乃慈學姊（人間出版社）、卞恩真博士與具聲哲博士（친일반민족행위진상규명위원회）、黃國治學長以及陳福裕先生、林炳炎先生（台灣電力公司）。感謝提供協助的同系所或同師門或同領域的師

兄師姐學弟學妹們：坤騰、崇凱、純純、景雯、立宜、立仁、帛燦、韻如、冠妃、廣平、宰豪，還有一同學習的 R94 級與 D97 級諸君。感謝系辦的呂怡燕助教與陳南之助教。感謝文威（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 7）、明軒（東華大學）、RC（台北大學）等「北十社」（與停止更新已久的 C. C. DataBase）以來諸同人的長期支持。感謝台灣大學圖書館（的密集書庫及五樓）、中研院近史所圖書館、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上海市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同志社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吳三連台灣史料中心、遠雄印刷品社，以及惠我良多的各地電子資料庫。此外還要特別感謝促成本論文的出版的乃雯（台灣大學）、王曉波老師，以及忍受（或不能忍受）我拖稿的洪宜勇主編與「輪速」李小姐。感謝惠賜序言的林書揚先生與唐曙老師，感謝協助設計封面的士博，感謝俺爹俺娘，以及所有長輩。

以下我所撰寫的幾篇論文是本研究的寫作基礎：（1）〈從〈黎明期的台灣〉走向「中國改造論」——由許乃昌的思想經歷看兩岸變革運動與論爭（1923-1927）〉（2005 年《批判與再造》與 2007 年《史繹》）；（2）〈崛起：台灣左翼運動的一九二四年〉（連載於 2006 年至 2008 年《批判與再造》）；（3）〈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及其資本主義論（1920-1924）〉（2008 年台大史研碩士論文）；（4）〈蔣渭水與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從「新台灣聯盟」、「社會問題研究會」到「無產青年」〉（2008 年台北「第一屆蔣渭水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5）〈一九三〇年的翁澤生與台灣共產黨——以新發現的翁澤生佚文為中心的考察〉（待刊）；（6）〈一九二〇年代台灣社會運動中的「大眾黨」問題〉（2009 年台北「台灣史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論文，已刊）；（7）〈從中國革命風暴而來——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與他的馬克思主義觀〉（2009 年台北「陳映真創作 5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但改寫的主要基礎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及其資本主義論（1920-1924）〉（以下簡稱〈起源〉）。

我在寫作與改寫過程中遭遇的最大問題有三。首先是如何安排史實考證與論述分析之間的關係，其次是如何給予本研究以一個「開端」，其三則是注釋格式。關於第一個問題，本研究某些章節主攻史實考證（一至四章），某些章節則著重論述分析（五至八章）。這樣的安排與〈起源〉不同，只希望能讓論文更好讀。關於第二個問題，筆者原先在〈起源〉中安排了一個「方法」論的探討，作為導言。但始終難以令人滿意，感覺很不歷史。因此決定改以八十年間的運動論

述為線索，先挾出一個有對象性的運動發展略史（雖然因此增加很大的篇幅），然後再討論本研究時段內的「運動」在這段歷史中的位置。這樣的方法未必適切，但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我在〈起源〉中所感到的不足。關於第三個問題，本研究原依《台大歷史學報》格式撰寫，但由於論述分析的比例隨著改寫而大量增加（到一半以上），而出版社只給我一定限度的篇幅，原格式遂顯非常瑣冗。雖然本研究仍力求遵循歷史學規範，但幾經各種注釋格式之間的實驗與周折之後，最終仍決定採用比較陌生的 APA Style 來進行注釋。這是痛苦的決定，而且排版並沒有因此而比較不擠，但我實在沒辦法了。

在改寫的過程中，我刪除了原先附在〈起源〉中的一些原始文獻，僅保留了需要考證或者台灣找不到的范本梁史料與謝廉清史料。

最後補充一點：無論是史料或者論述，本研究都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與檢討必要：首先，社會主義理論本身是有一定難度的對象，而台灣有著這樣多的社會主義（研究）者，因此本研究未必能讓所有讀者都滿意。比方說，筆者為求用語一致，便對立使用了「資本主義社會／前資本主義社會」這兩個術語，而不去深究「資產階級社會」是否比「資本主義社會」得當，也不深究「資本家階級」是否比「資產階級」合宜。又比方說，本文選擇在「生產方式」（而不是生產關係或生產力或其他）的抽象層次上，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複數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持續替代」，來描述各種肯定台灣「資本主義化」的論述。但筆者並沒有把握這種方式全然適當。其次，以台灣為對象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已有不少成果積累，然而筆者有限的的能力導致本研究沒有辦法把這些成果納入比較或者避免應當避免的錯誤。本研究只試圖針對既有研究所歷來不研究的、「運動」中的政治經濟學論述做簡單的梳理、勾勒一個輪廓，為將來的討論搭構一些基礎。

於我，我希望這份投注了溫情與敬意的研究能有「引玉」之效。除了為有興趣的讀者留下可能的線索，更希望有興趣的讀者能進一步發展出更多更好的研究，讓更多更廣的讀者知曉這段歷史、從中獲益，並回饋給廣大勤勞者及一切進步事業。倘若本研究能在此間起到一點微薄作用，就很充分了。

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

邱士杰

*

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

(發行人 黃溪南)

(116) 台北市景興路193號4樓之7 02-8663-2559〔電話〕 02-8663-2466〔傳真〕
電子郵件: sreview@ms47.hinet.net 劃撥帳號: 19389534 (戶名「海峽學術出版社」)

問津堂書局 台灣總經銷

(100) 台北市師大路165號 02-2367-7878〔電話〕 02-2367-7431〔傳真〕

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書局門市批發

(231)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2弄2號4樓 02-2219-2080〔電話〕 02-2219-2180〔傳真〕

邱士杰 排版

電子郵件: d97123006@ntu.edu.tw

輪速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02-2226-4796〔電話〕 02-2226-5250〔傳真〕

2009年10月初版 ISBN 978-986-6480-19-5〔平裝〕 定價420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

La Ekanta Socialisma Movado de Tajvano gis 1924

/邱士杰著. -- 初版. -- 臺北市：海峽學術，2009.10

面； 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6480-19-5 (平裝)

1.社會主義 2.社會運動史 3.日據時期 3.台灣

549.233

98017990

勘誤表

本書是〈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年初版）的電子版。電子版訂正了紙本未能消除的錯漏處，但各章內容和圖文排版均維持紙本原貌。

紙本版錯誤處	電子版改正處	頁碼（紙本版同電子版）
殖民	植民	頁 i
的會應外	的回應外	頁 xi
偏離的	偏離了	頁 17
謝晉青（19...	晉青（謝晉青）（19...	頁 72 註 9; 頁 73 註 10; 頁 73 註 11; 頁 123 註 16; 頁 125 註 23
劉大白（1921）	漢曹（劉大白）（1921）	頁 74 註 12
連溫卿（1954...	史可乘（連溫卿）（1954...	頁 84 註 46
民族自覺主義	民族自決主義	頁 96 註 3
陳逢源	南都生（陳逢源）	頁 116 註 67
黃玉齋	漢人（黃玉齋）	頁 119 註 1; 頁 143 註 93
陳望道	曉風（陳望道）	頁 125 註 24
范本梁（1920...	范志義（蒼亨）（范本梁）（1920...	頁 126 註 26
范本梁 （1924b, c, d, e）	范一洗（范本梁） （1928a, b, c, d）	頁 126 註 28 頁 147 註 102
大東旅社內	上海租界內	頁 157; 頁 158
日本當局	租界當局	頁 157
斯民	斯民（范本梁）	頁 191 註 7
啟示	啟事	頁 232
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26）	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1926a）	頁 265 註 50
李伯剛	李漢石（李伯剛）	頁 269 註 66
謝廉清（1924a）	廉（謝廉清）（1924a）	頁 271 註 72
絕不是	還絕不是	頁 272
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室	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室（2006）	頁 272 註 79; 頁 376
2007	2007a	頁 279 註 92; 頁 402
2007	2007b	頁 279 註 93; 頁 402
瀨戶內海	瀨戶內海	頁 297
（ Politischen Ökonomie ）	（ politische Ökonomie ）	頁 317
許乃昌	乃昌（許乃昌）	頁 324 註 15
許乃昌。	乃昌（許乃昌）	頁 324 註 16
明一	名義	頁 341
B 赤華黨 C 台灣赤華會 D 平社 E 台灣自治 協會 F 台韓同志會 G 中韓台友誼會	B 赤華黨與台灣赤華會 C 平社 D 台灣自治 協會 E 台韓同志會 F 中韓台友誼會	頁 353 表 4-6
（1924b, 05/11）	（1928a, 05/11）	頁 396
（1924c, 05/11）	（1928b, 05/11）	頁 396
（1924d, 05/12）	（1928c, 05/12）	頁 396
（1924e, 05/12）	（1928d, 05/12）	頁 397

在風雷激盪的一九二〇年代，社會主義運動伴隨著一代運動者的誕生而萌芽於東亞海域中的台灣。他們是背叛皇國家庭的「灣生」日本少女、是掙扎於左右之間的島內社會運動家、是輾轉於東京與北京的安那其主義者、是從彰化前往莫斯科的黨人、是與「異端」共產黨接觸的馬克思主義青年、是前往東京參與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未來指導者，同時也是秘密集結於上海的台灣、日本、朝鮮與大陸各省過激派。他們活動、集結、潰散，並且再起，同時也發展出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最早的論述。這是一幅集中在一九二四年之前揮灑開來的畫卷，同時也是本研究所將追尋、鉤沉，與細數的史像。

